

# 中国当代史研究 (二)

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	王海光
建国前后王芸生的“投降”与《大公报》的改造	杨奎松
上海商人如何走上公私合营之路	冯筱才
“穷棒子社”故事中的权力与社会裂痕	刘一皋
私人历史叙述的解读与考证	沙青青
接生的故事	贺 萧



《大公报》可以做到「沪、津、渝、港四馆不易名、不换人，照原样出版」。王芸生喜出望外，很快即表态：「甘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 在官方档案、报刊报道、历史记述、访问、回忆，以及大多数被文学化的相关作品中，「穷棒子社」故事都与国家历史高度同构，村庄史就是国家整体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

● 中国当代户籍制度具有明显的「苏联因素」，但不是对苏联户口管理制度的简单移植，而是中共在全面引进斯大林体制中自然延伸的结果。

● 毛泽东点名邀请王芸生北上，并许诺《大



## 中国当代史研究（一）

- 国内战争结束不久，一方面毛泽东巧施谋略，另一方面各将领知趣而退，很快就再现了一场现代版的“杯酒释兵权”。
- 国家权力摧枯拉朽般地取代了上海文化消费市场，但新政权对上海文化人的掌控，却不像延安时期改造从上海投奔革命的“亭子间文人”那样得心应手。
- 共产党接管上海前夕，刘鸿生权衡比较了几种选择。他最喜爱的一句英语格言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筐子里。”

## 中国当代史研究（三）

- 一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重塑了中国城乡的所有制结构与民众经济生活。但是不久便有了一个回潮，许多小商贩恢复了个体经营者身份，成了“社会主义中国”里的边缘人群。
- 1949年毛泽东对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中共为什么不打算马上占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时，明白地告诉米高扬说，早占领上海一天，就要早一天负担几百万人的粮食和燃料供应。
- 《上甘岭》和《猪排山》是1950年代中美各自反映朝鲜战争的早期冷战宣传的经典影片。半个世纪以后，当我们把这两部影片放在一起欣赏时，它们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冲击？

ISBN 978-7-5108-1034-3



定价：52.00元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 编

# 中国当代史研究

(二)

韩 钢 主编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史研究. 2 / 韩钢主编; 王海光等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108-1034-3

I. ①中… II. ①韩… ②王… III. ①中国历史: 现代史—研究 IV. ①K2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6897 号

### 中国当代史研究 (二)

---

作 者 韩钢 主编 王海光等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ublish.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ublish.com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6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034-3  
定 价 52.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卷首语

这一辑关注的重心仍在 1950 年代，努力重建更逼近真实的共和国第一个十年的历史。

在“专题研究”栏目，我们编发了七篇文章，涉及户籍制度、报人和报纸的改造、公私合营、乡村合作化、农业技术改革、农村等问题。从对这些问题的梳理中，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新政权在建立之后最初十年改造社会的历史轨迹。

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不少都能讲出几个跟户口有关的故事，或庆幸，或伤感。覆盖城乡的二元户籍制度对国民和国家的影响至深至远，迄今仍是热门的时政话题。王海光的《从政治控制到社会控制：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梳理了这个制度的由来和演变。他认为，在二元户籍制度建立过程中，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是两个关键因素，二者造成农村社会紧张，农民大批流入城市，城市人口压力剧增，政府因此采取种种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并逐渐把限制人口流动和迁徙的功能纳入到了户籍管理之中，从户口管理、粮油供应、劳动用工等方面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划分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以行政手段强行建立起了城乡隔离带，形成了“户警一体”的管理体制和城乡分治的管理方式，最终将限制人口自由迁徙的功能纳入了户籍管理制度。

曾标榜“不党不私”的《大公报》在新社会和新制度下如何生存，是杨奎松的《建国前后王芸生的“投降”与〈大公报〉的改造》讲述的故事。文章以细腻的笔法呈现了这样的历史场景：在《大公报》政治命运危若垒卵之机，王芸生临机应变，逢凶化吉，使上海《大公报》得以继续发行；王芸生又因其在“三反”运动中



的出色表现，以及《大公报》在工商界中的影响力，最终挽救了上海《大公报》的历史。在作者看来，尽管《大公报》从此再也不是过去的《大公报》了，但至少它又一次保住了这块招牌，而且还得以存续了十几年的时间。

公私合营的历史是个老话题，但冯筱才的研究显出独到之处。他更关注的是公私合营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变化”与“差异”。他在《政治生存与经济生存：上海商人如何走上公私合营之路？》中，以上海商人为考察对象，阐释了公私合营政策的演变过程：初期的“公私合营”主要与接收“官僚资本”有关；“三反五反”时期，政府用合营的办法抵充私企负债，公私合营企业因此增加。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政府选择性地将一些“有前途”的大中型私营企业乃至行业逐步加以吸收，以壮大“国营经济”的力量；到1955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政策转向激进，全国各地掀起“合营高潮”，“公私合营”成为各级中共干部非理性“政绩数字竞赛”的平台。

新旧政权的更替是以城市易手为标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接管城市是中国当代史的起点。林超超在《中共对城市的接管与改造》一文认为，这足以应当引起研究者更多的关注。事实上，近些年来已经有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国外研究经过了几次范式转换，国内学界则注重对一些问题的研究，但是国内研究大多还只是满足于历史真实的发现和梳理，而缺乏对既有的史观、研究视角以及方法论的反思与批判。林文预期，进行实证性研究，还原“人”在历史中的真实状态，以便寻找众多历史面相背后的合理逻辑，这些可能是未来这一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突破中国当代史研究瓶颈的重要方法。

与前述几篇论文关注精英阶层和城市生活不同，刘一皋的《“穷棒子社”故事中的权力与社会裂痕》和葛玲的《水旱之争的历史审视》，把目光对准了乡村。河北遵化县的农民王国藩组织了一个只有一条瘸腿驴的农业合作社，人称“穷棒子社”。因为最高领导人的赞誉，“穷棒子社”在1950年代闻名遐迩。刘文讲述的不是“穷棒子社”的故事而是故事的故事，梳理各种“穷棒子社”故事的叙述，分析



其中的缺失、变化和逻辑冲突，揭示权力因素对于故事叙述内容、取向的影响和所造成的深刻社会裂痕，以及在新时期社会转型中的惯性冲击，并指出了依据既有材料进行直线式研究的缺陷。葛文涉及的是1950年代的地方稻改运动。1950年代，地方政府在皖西北地区推行旱地改水田的稻改运动，在只有种植旱地作物传统的地区强行推广水稻种植。面对自上而下的稻改任务，乡村基层干部与农民基于传统种植经验表达了普遍的抵制态度；对来自底层的抵制，政策的制定者及其执行者则是以一种政治化的手法强力推动之。文章的意义在于，从技术层面的视角展示了1950年代的多面向改造的历史。

《私人历史叙述的解读与考证：以天津地震日记为例》，是本辑唯一一篇不属于讨论1950年代问题的论文。作者沙青青透过一位天津高中学生1976年大地震前后大约半年的日记，窥见了“文革”末期特殊的社会氛围与个人心态在遭遇突发自然灾害时，究竟是如何发生异变的。相对于宏大叙事的文献，日记、信函这类私人化的史料常常更能真实而直接反映国民的心理和情绪，因而颇具研究价值。在当代史的研究中，这类文本愈来愈为研究者重视。这也是我们刊发本文的意图所在。当然，任何史料对历史的记录都难免有局限甚至错讹，使用私人化的历史记录同样应当审慎，一如作者所说：“在利用这类历史材料前，同样需要研究者先进行仔细的解读与考证。”

在“外稿选译”栏目，作为性别研究的“领军”人物，美国学者贺萧的文章通过讲述1950年代中国农村接生的故事，试图回答国家公开宣扬的各种政策，和当时国家机构内外的人们对即将发生的一切的理解，以及大约半个世纪之后回顾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这些人所想起的之间，分别是什么关系这样一个问题。

“学术评论”是一个新栏目，刊载了萧延中的《近期中国的毛泽东研究：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草图》。作者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近期毛泽东晚年研究状况的作了一个有相当深度的评价性报告。他将目前这一研究领域中的基本倾向概括为“主流意识形态”、“否定批判取向”、“‘新左翼’研究论述”和“历史主义学派”四个

流派，文章在对各家观点的基础预设和争论焦点进行初步梳理后指出：在当下的中国，“毛泽东”已演变成了某种政治符号，而“毛泽东问题”实际隐含着研究者自身对于良好社会制度和正当政治秩序的一种愿景。

“回忆和口述”和“史料辑录”栏目分别登载了《怪诞莫名法官路》、《一位中学教师的整风笔记》，或为事后的记忆，或为当年的笔记，都具有史料的性质，给读者提供了关于那个年代历史的个人信息。

编者

2010年4月



# 目 录

## 卷首语

## 专题研究

### 从政治控制到社会控制：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

——对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历史渊源和形成建立过程的考察……王海光 3

### 新中国新闻报刊统制机制的形成经过

——以建国前后王芸生的“投降”与《大公报》改造为例……杨奎松 49

政治生存与经济生存：上海商人如何走上公私合营之路？……冯筱才 91

### 中共对城市的接管与改造

——一个初步的研究回顾与思考……林超超 139

“穷棒子社”故事中的权力与社会裂痕……刘一皋 164

### 水旱之争的历史审视

——1950年代皖西北稻改中的政府与农民……葛玲 200

私人历史叙述的解读与考证：以天津地震日记为例……沙青青 235

## 外稿选译

### 接生的故事

——1950年代中国农村接生婆……贺萧 257

## 回忆和口述

怪诞莫名法官路……张思之 283

## 史料辑录

一位中学教师的整风笔记(一九五八年)..... 309

## 学术评论

近期中国的毛泽东研究:一个政治意识生态的框架草图..... 萧延中 361

## 书评书介

王亚志回忆,沈志华、李丹慧整理:《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

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 391

龙应台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394

贾植芳著:《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 397

李思慎著:《李立三后半生——前中央常委及中央秘书长、

中国工运先驱》..... 400



中國當代史研究

專題研究





# 从政治控制到社会控制： 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

——对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历史渊源和形成建立过程的考察

王海光\*

**摘要** 中共的户籍管理工作首先是从接管城市开始的。最初的户籍管理功能主要是实现新政权的有效统治，是公安保卫工作的重要手段。新中国在镇反运动中，在城市和重点地区建立了户口登记制度。其功能主要是对嫌疑人员进行政治控制，维护社会治安，对人口迁徙流动没有加以限制。1953年国家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后，建立全国城乡户籍制度的迫切性凸现出来了。其中，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是两个关键因素。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运动造成农村社会十分紧张，农民大批流入城市，城市人口压力剧增，政府采取了种种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并逐渐把限制人口流动和迁徙的功能纳入到了户籍管理之中。户籍管理的重心开始由政治控制向社会控制偏移。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工农收入差距越发拉大，在短缺经济下的城乡冲突越来越激烈，政府阻止农民进城的措施也越发严厉起来。政府从户口管理、粮油供应、劳动用工等方面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划分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以行政手段强行建立起了城乡隔离带，形成了“户警一体”的管理体制和城乡分治的管理方式，最终将限制人口自由迁徙的功能纳入了户籍管理制度。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在法律意义上的正式建立。在1960初经济调整中，中国当代户籍制度得以最终确立。

\* 作者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关键词** 户籍制度 社会控制 人口流动 城乡二元结构

## 引论：中国当代户籍问题的由来

户籍制度是政府运用相关行政手段对所辖人户进行登记和管理的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法律制度。学界一般认为，狭义的户籍制度是指国家依法收集、确认、登记人口基本信息的有关法律制度。如姓名、年龄、民族、职业、教育程度、亲属关系、法定地址，以及出生、死亡、婚姻、领养等内容，类似西方社会的民事登记；广义的户籍制度不仅是提供人口统计的基本信息资料，而是包括与人户的身份、职业、迁徙等基本权利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制度。<sup>①</sup>中国户籍制度概念，一般都是指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意义上的广义的户籍制度。

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了一套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中国传统户籍制度源远流长，发展于春秋，定型于秦汉，以后各朝各代历经变化，从秦汉的“编户齐民”发展到明清的保甲制度，沿袭了两千多年。传统户籍制度是与中国王朝体制相联系的一项基本制度。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基本功能是通过人口统计，“人户以籍为定”，提供分配土地和征发税赋徭役的依据，强制百姓履行为国家服役的义务，是皇权专制主义“纳贡制度”的法律体现。同时，这种和土地制度密切联系的，以家庭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也为农业社会的稳定秩序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口系于户、户著于地”的传统户籍制度下，以编户为单位，把血缘和地缘紧密地结合起来，提供了维护社会治安、教化乡里、规定身份等级、稳定宗族组织、限制人口自由迁徙、实现安土重迁等诸项社会整合功能，使中国农耕文明具有周而复始的系统稳定性。<sup>②</sup>

清政府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以土地税取代了人口税，“滋生人户，永不加赋”，将户籍与赋税剥离开来。利用户籍制度建立身份等级的做法，在清代也大为弱化，取消了过去匠户身份。户籍的赋税功能退减后，保甲治安和人口统计功

<sup>①</sup> 相关概念的界定参见：俞德鹏著：《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导论部分；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页；陆益龙著：《超越户口——解读中国户籍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sup>②</sup> 《汉书》提出“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意为：治理国家之道，是以把人口固定在土地上为根本）。宋昌斌认为：这八字箴言是以后历代户籍管理的基本指导思想。参见宋昌斌著：《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长春：长春出版社，2003年，第140页。

能凸显出来了。保甲制度兼有乡村基层组织和民兵的双重性质，可以将各色人等编入其中，形成一个维护社会治安的网络。依保甲册籍统计人口，也较之过去赋役制度的人口编审能更准确地反映人口数据。保甲户籍制度虽表现了逐步向人口统计方向发展的趋势，但仍需要为政府承办钱粮杂役等事务，对民众的人身束缚没有彻底改变。在王朝政治下，户籍制度不能不被附加其他社会职能，成为政府役使人民的首选工具。

现代户籍制度是建立在保障公民自由平等、居住自由、迁徙自由等基本权利之上的人口管理制度，意味着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从臣民身份到公民身份、从人身依附到独立人格的转变。建立现代户籍制度是从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标志。在20世纪初年，晚清政府被迫预备立宪，中国即开始了从传统户籍制度到现代户籍制度的转型。到了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更是把现代户政建设作为“训政时期”国家政治建设的一项基础工作，即使战乱时期也没有停顿，构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现代户籍法律制度体系。公民的居住自由、迁徙自由等基本权利基本实现。<sup>①</sup>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是指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法定标志的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在这个户籍制度上，长期附着了粮油供应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教育制度、福利制度等十几项制度，形成了一整套城乡隔离体系，限制了公民迁徙自由，堵塞了农村人口迁往到城镇的道路，以保障城镇人口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这项制度将全体国民分割成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两大社会集团的户籍身份，在古今中外的世界范围中都是罕见的，人数最多的农民实际上长期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国民待遇。可以说，这是一项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在城市与乡村建构起来户籍壁垒的同时，城市与城市之间也建构起了几乎同样严格的壁垒。包括农村与农村之间的流动，也是被控制的。国家通过户籍制度，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人们的活动被限定在特定的地域（单位）范围内，市民和农民的身份不同只是在国家新的“编户齐民”下的待遇差异，公民的自由迁徙权利和自由居住的权利名存实亡。<sup>②</sup>中共执政以后，也曾承认人民有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的基本权利。它之所以遭到颠覆和阻断，相当程度上也与苏

<sup>①</sup> 有关晚清至民国中国现代户籍制度演进的概要情况，可参见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一书。

<sup>②</sup> 在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形式上仍旧规定公民有自由迁徙权利和自由居住等项权利，到1975年重新修订颁布的宪法中，连这一形式上的自由权利也被取消了。

联制度的影响有关。

新中国的户籍制度与苏联、东欧等国有很深的体制渊源，都属于治安户籍制度的类型。在户籍管理上具有“户警一体”的共同特征，都是由警察机关负责，警察掌握户口登记的一切方面，都具有管制敌对势力和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的相同功能。而且在斯大林模式的户籍制度建立过程中，农业集体化政策和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斯大林模式的户籍制度创立于上世纪30年代。当年，苏联以国家暴力的手段强迫农民实行集体化。在这场集体化运动中，斯大林为了镇压反抗者，发明了消灭富农的特殊移民政策。<sup>①</sup>这一政策，不仅消灭了富裕农民，而且摧毁了整个乡村经济，直接后果是造成了1932年到1933年的大饥荒。<sup>②</sup>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为造成的大饥荒。农村各处爆发骚乱和暴动，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被饿死，成千上万的饥民逃离了集体农庄，四处颠沛流离，成群结队地涌入城市。为了阻止饥饿的农民大举涌入城市，斯大林恢复了早已废弃的沙俄时代的国内居住证制度，全面实行严格的人口登记与迁徙管理。1932年12月27日，联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在苏俄建立统一居住证体系和强制性居住证法令》，并于1933年1月开始正式实施。<sup>③</sup>

苏联居住证的发放范围最初限定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25个重点城市。1933年4月，又扩大到所有的市镇、工人居住点、国营农场、农机站所在居民点、部分大城市郊区和西部边境地区。居住证的登记内容主要有九项，分别是姓名、出生时间、出生地点、民族、家庭状况、社会地位、服兵役状况、居住证、发证单位签章，有效期为3年。每个居住证上加盖有居住证的印章以显示持证者的居住地和工作地信息，拥有当地居住证是就业、教育、发放生活配给卡和享受其他社会福利的法定凭证。广大农民是没有居住证的。如需要外出，必须在当地村苏维埃开具外出许可证。进入居住证管理区后，须在24小时内到所到地政府部门申请

<sup>①</sup> 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迁徙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在全国掀起大规模的消灭、迁徙和驱除富农的运动。沈志华执行主编：《苏联历史档案汇编》第15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00页~607页。

<sup>②</sup> 苏联1932年至1933年间的大饥荒。据估计，苏联全盘集体化至少造成了1000万人的死亡，其中有一半死于大饥荒。参见沈志华著：《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29页。

<sup>③</sup> 接栋正：《国外民事登记制度及其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启示》，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人口研究所，博士论文，2009年，第30页；纪晓岚：《苏联城市化历史过程分析与评价》，《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3期。



暂时居住许可证。如不批准，必须在3日内离开。如违反规定和丢失居民证，将受到罚款、强迫劳动和监禁的严厉惩罚。<sup>①</sup>居民证制度的实行，用行政手段强行把城乡分割开来，农民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又回归到了过去农奴制的境地。

苏德战争爆发后，实行了更严格的居民证管理制度。1940年9月10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了1667号决议。规定一个人要从居住的城市、地区外出，除了要带居民证，还必须要有当地公安、安全甚至警备司令部签发的通行证。这种在战时状态的限制措施在斯大林生前一直没有取消。<sup>②</sup>

由上可见，苏联的居民证与中国后来的城镇户口具有同样的功能特点。在户籍制度的管理逻辑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是通过警察机关对农村人口的流动和进入城市进行严格控制；都是从政治控制的手段演变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工具。农民被强行束缚在土地上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实际上处于“二等国民”的身份地位。农民转变身份的可能只有招生录取、招工录用、提干、参军等几条有限的途径。

苏联和中国采取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政策演变，也是在同一个历史逻辑下发生的：由于工业化的内部积累而引发了粮食供给不足，由于粮食供给不足而加速推进农村集体化，由于激进的集体化政策引发了农村社会的恐慌，由于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而使执政者不得不匆忙以强制手段构建起了城乡二元壁垒。这正是说明了推行斯大林体制的制度路径问题——计划经济必须把人们迁徙和居住的自由权利一并“计划”进来。在这个新制度的建立过程中，一路上弥漫着消灭富农的阶级斗争的血腥气息。

中国当代户籍制度具有明显的“苏联因素”，但不是对苏联户口管理制度的简单移植，而是中共在全面引进斯大林体制中自然延伸的结果，虽然其性质和管理逻辑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管理方式和管制程度上有所不同。这主要是由人口土地状况、工业化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而造成的差异。相对中国而言，苏联的工业化程度高，人口基数比较小，所能提供给农民转换身份进入城市的出口自然会更大一些，对人口迁徙的户籍管束也要宽松一些。这种同质性的不同程度差异也反映在东欧各国对苏联居民证制度的移植上。

如果从中世纪传统来看，中国农民的境遇显然要比俄罗斯农奴优越很多。中国两千多年的农业社会，农民的主体是自耕农，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可以自

<sup>①</sup> 接栋正：《国外民事登记制度及其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启示》，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人口研究所，博士论文，2009年，第30～32页。

<sup>②</sup> 闻一著：《回眸苏联》，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8页。

由买卖，耕作效率极高。虽然也有军户、乐户、匠户、灶户等世袭职业身份和社会贵贱等级，但与把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动弹不得的俄国农奴制粗放式经营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显然，受制于僵化的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当代户籍制度不仅是延承和变通了中国传统户籍制度的某些特点，也是移植了沙俄时代居民证制度的某些特点。

从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看，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存在着巨大的历史悖论。这个以城乡二元分割为特征的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建立，既不是自晚清以来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自然延续的结果，也不是对苏联、东欧的人口管理模式简单的制度移植，更不符合党在革命时期所主张的人民民主的共和理念。中共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对农民的重视程度远胜于苏共和中国其他政党。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高度肯定农民，赞扬“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sup>①</sup>但在进入城市之后，短短几年中，却反而采取了把农民堵在城外的政策。这个结果绝非中国共产革命者的初衷。那么，这项制度生成的历史社会条件是什么？传统与借鉴的制度路径是什么？继承与变异的诸项因素是什么？在制度选择中的内在历史逻辑又是什么呢？本文拟就此略作考察。

## 一、接管城市和新中国户籍制度的草创

中共政权建立户籍制度的最初实践，是从接管和建立城市政权中开始起步的。在接管城市和维护城市治安的过程中，中共很快意识到户籍管理对新政权执政的重要性。

中共过去是在农村根据地环境进行战争动员，发展壮大起来的。因农村社会成分单纯，同质化程度高，中共对民众的组织动员活动不需要建立户籍制度。城市人口集中，成分复杂，流动性大，社会治安问题多，如果不能准确掌握人口的数量和变动情况，城市治安秩序和各项工作难以正常开展。中共在抗战后相继占据了一些大中城市，很快认识到建立户籍制度对维护接管城市治安秩序的重要性，开始了建立户口管理制度的最初实践，并相继总结了一些经验。如1946年7月13日晋冀鲁豫公安局印发了邯郸市建立户籍管理制度在维护新解放城市治安秩序的经验。期

<sup>①</sup>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5页。

间，中共在东北占据大城市较早，统治时间长，积累的户籍管理经验也最为完整。<sup>①</sup>特别是中共接管哈尔滨市后，为了控制城市、维护治安，建立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户政管理法规，对新中国的户政工作的创建具有直接的影响。

哈尔滨市的日本统治者在投降前夕，焚毁了全市的户口档案，给城市管理工作带来巨大困难。1946年4月，苏联红军撤出后，中共进据哈市，确定了长期执政的工作方针。中共哈尔滨新政权在管理城市中很快认识到，如果掌握不了人口数字和人口变动情况，就难以建立革命秩序和开展各项工作。1946年10月15日，中共哈尔滨市政府颁发了《开展户口调查布告》。1946年10至11月，公安机关在全市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清查登记，但受东北战事的影响，人口清查效果并不理想。1947年，中共哈尔滨市委决定全面清查登记人口。当年9月，在市委统一组织下，由公安机关牵头，在全市进行了第二次人口大清查。这次大规模调查登记，基本查清了全市的户数人口和社会关系，破获了一批政治性和刑事性案件，初步建立起了户口管理制度，为城市的社会治安管理提供了基本的依据。<sup>②</sup>居民怕被牵连，不敢留无户口人员住宿；无户口人员不敢留居，要求登记；坏人无处躲藏，被迫自首；限制了无业游民流窜，清查了逃亡地主分子；发现并控制了一批可能的犯罪嫌疑人和潜在的敌对分子。这使新政权的执政者备受鼓舞。

为了统一管理城乡居民的流动，1947年6月4日，东北公安总处通令各地区统一旅行证制度。5日，哈尔滨市政府张贴布告，规定了市民迁出、迁入、出生、死亡、临时外宿、临时居住旅行、事项变更等申报制度。同时，市公安局制定户口移动手续制度。市民外出，需携带证明身份的路条、旅行证等证件。1948年4月26日，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命令，依照苏联实行居民证制度，废除旅行证制度。是年8月，东北公安总处发出通知，规定：居民证是证明居民身份和在东北地区旅行的通行文件。居民证按捺指纹，并留存底档登记注明，每年查验一次，临时居民证半年查验一次。这是中共最早实施的居民证（居民证并未在以后接管的城市中通用，1950年宣布废除）。<sup>③</sup>

<sup>①</sup> 该书编写组：《中国人民公安史稿》（内部发行），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10页。

<sup>②</sup> 《黑龙江省志·公安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5页；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哈尔滨市志·人口》，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96、997页；《哈尔滨市志·公安司法行政》，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4、195页。

<sup>③</sup> 《哈尔滨市志·公安司法行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3页；《中国人民公安史稿》（内部发行），第172页。



1948年6月10日，中共东北中央局发出《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强调今后要保护和依靠城市。25日，东北公安总处根据哈尔滨市、佳木斯市、北安、双城等地的经验，制定并颁布了《关于户口暂行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就户口管理的目的、范围、方法和重点作了明确规定，并且将“反革命嫌疑及有违法行为、破坏治安之嫌疑住户”，另设嫌疑住户登记册。在这些嫌疑住户发生迁移变动时，要求区街公安机关之间，“应相互通报情况，随时登记材料，以便继续了解，发现问题，打击坏人”。<sup>①</sup>这是中共在这一时期最早制定的比较全面的地方户口管理法规。

在户口调查登记后，东北各地公安机关按照《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建立起了统一的户口管理制度，对参加过国民党各类组织的人员和危害社会治安的危险分子，都按特殊人口（即嫌疑住户）专门控制和重点掌握。

东北地区运用户籍管理城市治安工作的经验，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和推广，为关内城市接管工作提供了范本。1948年5月，中共中央社会部下发《新解放城市的公安工作介绍》的文件，指出：“户口工作是管理城市的重要环节，是建立革命秩序、掌握社会动向，了解阶级关系、限制坏人活动的工作基础，是公安工作不可缺少的工作”。<sup>②</sup>8月4日，中共中央社会部批转《关于东北城市公安工作经验通报》。《通报》指出：“户口问题是管理城市的重要环节之一，因城市集中而又复杂，良莠难分，坏人到处活动，毫无限制，无有户口、门牌，搬来搬去，不但在治安方面有很大困难，就是邮政、电话、电灯、自来水等管理，亦无法进行。同时建立户口管理制度，弄清人数户数，阶级成分，掌握户口动向，不但利于公安，而且对于战勤负担，国民教育，发展生产，配给粮食，组织群众，都有帮助。”<sup>③</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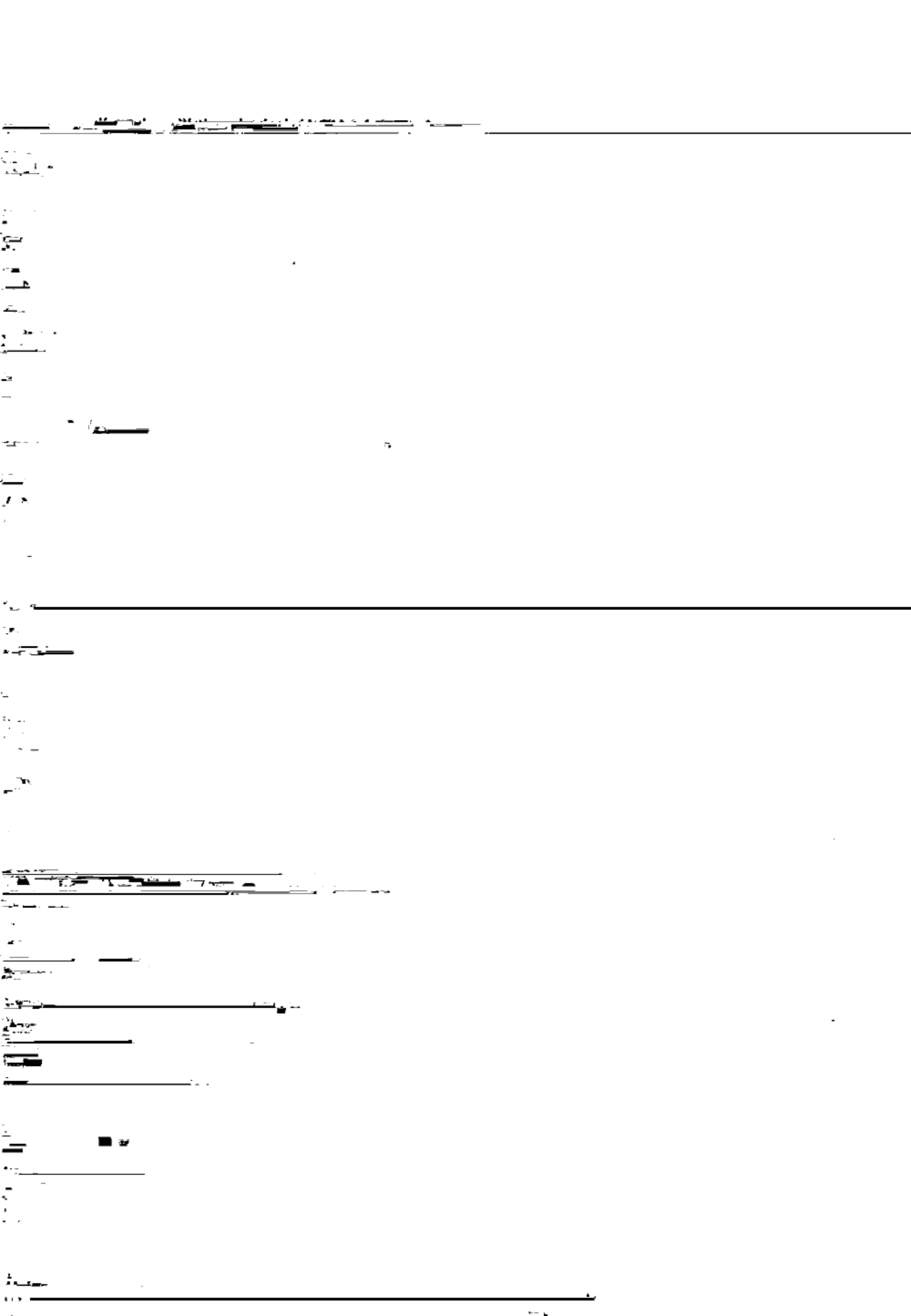
各地在接管城市中，有些城市的户籍档案基本保留下来了，也有不少城市的户籍档案毁坏散失。加之居民为躲避战火，纷纷择地迁徙，人户分离严重，门牌号码混乱，居民人口数目不清。这给新政权的治安管理带来极大的困难。各地在接管城市的军事管制时期，首先是暂时利用原保甲体系管理现有人口，待各系统接管完毕，建立街区组织后，即开始清查户口，补报登记人户，重建户籍管理制度。通行的清查方式是：由城市公安机关组织专门机构，动员党、政、军各系统的干部，吸

<sup>①</sup> 《中国人民公安史稿》编写组：《中国人民公安史稿》（内部发行），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71页；《黑龙江省志·公安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5页。

<sup>②</sup> 《中国人民公安史稿》（内部发行），第163页。

<sup>③</sup>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政策汇编》，中共中央华北局印，1949年6月，第544页。





理归属民政机关，有关治安的人口动态管理由警察机关负责，管理户口的职能多有交叉。中共在接管城市后，将民政机关的户籍登记职能移交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的治安部门统一管理户籍。由警察机关办理户籍行政业务，在当时社会治安混乱的情况下，有利于迅速实现新政权对城市的控制，恢复和建立社会秩序，确立城市管理的基础。这是1949年以后中国“户警合一”的户籍管理体制的滥觞所出。

然而，“户警合一”具有鲜明的“管制性”色彩，也势必影响到户籍管理的社会服务职能的正常发挥。<sup>①</sup>这在当时就有所反映。1948年4月5日，中共哈尔滨市委在对公安工作的决定中，就提出要改善户籍管理的制度，要简化户口手续，允许没有户口的人落户等问题。<sup>②</sup>中共建政以后，全国战事结束，社会秩序稳定，公安部正式提出了改进户籍管理办法，方便和服务群众的问题。1950年11月，中央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指出：“过去我们的户籍工作，多少侵扰了人民，麻烦了好人……这样我们就成了‘警察人民’，而不是人民警察了。应该改正”。<sup>③</sup>

2. 关于“特种人口”的管理办法。“特种人口”调查和管理，是国民党警察机关发现和控制各类“犯罪嫌疑人”，特别是对付中共地下人员的一个重要手段。<sup>④</sup>中共进城之后，即把这个手段拿过来，对付对新政权有危险性的政治敌对分子和社会不安定分子。在登记国民党军政宪特人员、党团骨干分子的基础上，各城市的公安部门确定了一批需要严加防范的特种人口。特种人口（简称“特口”）是指对新政权具有威胁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危害治安分子，大致分政治性和社会性两类人员。“特口”的类别划分和数量，具体到各地又有不同。以南京市为例，据1950年2月的特种人口统计，分为匪特嫌疑、窃盗嫌疑、吸售烟毒嫌疑、赌博嫌疑、暗娼嫌疑、歌女舞女、无业游民七类。而且各地的“特口”在人口所占比例也差异很大。当时南京市人口976117人，其中“特口”为6457人，占总人口的0.66%。<sup>⑤</sup>另据天津市1949年3月统计，全市共有居民221246户，793463人，其中“特口”即为21537人，占总人口的2.71%。<sup>⑥</sup>

① 朱海天：《谈我国应废止“户警一体”体制》，《辽宁警专学报》2008年第3期。

② 《哈尔滨市志·公安志》。

③ 罗瑞卿：《在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摘录）》（1950年11月）。

④ 国民政府内政部警察总署1947年颁发《戡乱时期警察中心工作实施方案》，将户口分为甲乙丙丁四种，列有十六种嫌疑人口情况。在调查户口中发现的嫌疑人口和“反动分子”均填写特种户口调查表，纳入刑警控制范围。

⑤ 《南京政报》第6期，1950年3月，第13、14页。

⑥ 《闪光的金盾——沈阳公安五十年回顾》上编（内部资料），第109页。

从政治控制到社会控制：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

1950年8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在内部颁发了《特种人口管理暂行办法（草案）》，对特种人口的类别、管理方针、管理方法、确定与撤销、材料调查与档案管理等多项，作了统一的规定。确定列为“特口”的划分条件是：“凡曾为反动党团、特务、军政官员、或为反动派掌握的外围组织之活动分子，尚无证明其确已改悔者，及有反革命可疑尚不足构成侦察条件者，均得认为政治性特口”；“凡属封建地主、封建会门、散兵游勇、隐藏武器、扰乱金融、假冒伪造、抢劫偷盗、贩毒、聚赌、窝娼等首要分子、可疑分子及前科犯、假释犯，均得认为社会性之特口”。管理方式分“公开管理”和“秘密调查”两种。《暂行办法》是新中国出台的第一个户籍管理文件，统一了全国公安部门对重点人口的管理工作。

在接管城市初期，为维护社会治安，各地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十分严格，规定了旅店和住户对暂住人员的即时上报制度。如北京市1949年规定，“大小旅栈、客店、妓院均需建立旅客登记循环簿及旅客统计日报表，于每日就寝前，向该公安派出所呈送之备查。”一般住户的来客登记是“住宿3日以上者，应由户主于即日持户口簿申报登记，离去时即日申报注销……”<sup>①</sup>但对正常的户口迁移是放开的，包括对“特口”的迁徙都没有特别限制。《特种人口管理暂行办法（草案）》第七条规定：“特口”之迁徙手续与普通户口同，但须事先即时报告分局，非依法不得公开限制。

中共在接管城市时，原有户口档案大都残缺不全，有的全部损失，人户变迁情况很乱，公安机关组织了相当大的力量进行清查整顿。到1950年底，全国各大中城市大都已将户口的底数清理完毕，初步掌握了必要的人口信息，发现和控制了政治上和刑事上的嫌疑人员，进而建立起了户口管理制度（申报迁徙、出生、死亡、旅行等），基本上克服了城市人口的混乱情况。这项工作的完成，不仅对城市治安管理发挥了重大作用，提供了施政的依据，也为中共学习管理国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50年11月，罗瑞卿在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的总结中，深有体会地说：“户籍工作是一件巨大的工作，做好了，对于我们保卫人民利益，发现和控制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均有很大好处，并可得到很多供国家施政参考的有价值的资料。去年高干会议时，朱总司令、周总理都着重告诉我们，要我们下决心在十年之内做好这个工作”。<sup>②</sup>

<sup>①</sup> 《北京志·公安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380页。

<sup>②</sup> 罗瑞卿：《在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0年11月），文中提到的高干会议，应是指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

## 二、镇压反革命运动与城市户籍制度的建立和统一

中共掌握全国政权之后，即把户政建设工作作为建设新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开始着手建立全国统一的户籍制度。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公安部“首先把眼睛向下，搞户口调查”。<sup>①</sup>新中国的户籍制度建立过程，是按照先城市、后农村的顺序逐步建立起来的。城市的户籍制度，初建于政权接管，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实现了统一，达到了新政权对敌对势力进行政治控制的需要。

1950年7月6日至8月12日，公安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会上明确了治安行政管理工作的职责，通过了城市和农村的两个治安工作条例（草案），并围绕治安工作制定了包括户籍在内的一系列规章，提出了进一步搞好户籍工作的要求。<sup>②</sup>

会议明确地规定了户口工作的任务，即是：“了解社会动态，阶级关系，蒐集人口资料为施政之重要依据。保证人民居住迁徙之自由，安心从事生产建设……发现、控制反动分子，管制他们不许乱说乱动，取缔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会道门、盗匪小偷等不务正业分子，使他们改恶从善，以巩固革命秩序。”<sup>③</sup>并就户籍管理的登记簿卡、统计报表、情况通报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作出了统一规定。

会议还提出了建立全国户政体系的规划和目标要求。指出：全国户籍制度的建立，必须立足长远打算，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现在先从城市做起，然后扩大到农村。农村户口工作从1951年开始试建，先从集镇试办，创造经验，逐步推广，以求十年之内达到弄清全国人口户数。<sup>④</sup>

建国初期城镇户籍制度的建立和统一，是配合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中心任务进行的，直接目的是对新政权的敌对分子进行政治管制。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强调指出：户口工作在调查管制反动分子发挥的作用“非常不够”，必须使之“成为公安保卫工作中有力武器之一”。<sup>⑤</sup>

1950年底，全国性镇反运动全面展开。各地结合镇反运动，核查居民的历史

① 陶驷驹主编：《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北京：群众出版社，1996年，第107页。

② 《中国人民公安史稿》（内部发行），第253页。

③ 《关于户口工作的几个问题》（1950年11月），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文件。

④ 罗瑞卿：《在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0年11月）；《关于户口工作的几个问题》（1950年11月），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文件。

⑤ 《关于户口工作的几个问题》（1950年11月），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文件。



背景、政治面貌和现实情况，开展了对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会道门头子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及其阶级基础的调查，从中发现和掌握反革命身份的线索。这种拉网式的全面排查，对清查镇反对象发挥了很大作用。如天津市在镇反中逮捕的犯人，有 88% 是由户口调查提供的。<sup>①</sup>

通过户口调查，各地公安机关还及时发现了许多到处流动躲藏的反革命分子。东北是中国迁徙人口最集中的地区。松江省<sup>②</sup>结合镇反开展户口调查，发现无证件黑人黑户 1567 户，黑人 6775 人。在已经查明的 4549 人中有问题的占 11%，其中反革命首恶分子 135 人。哈尔滨、齐齐哈尔、鹤岗 3 市及尚志县即通过户口调查发现反革命分子的社会基础 39206 人，建立档案 58956 份。<sup>③</sup>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各城镇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将镇反运动和户籍制度建设相结合，加强了对重点人口的控制和管理，建构起了一套对可能危害新政权统治的嫌疑敌对分子全面实施政治控制的管制系统。

首先是管制对象的范围扩大。公安机关最初管理的特种人口，其社会性“特口”种类，随着禁娼禁毒等社会改造运动的开展而逐渐减少，而政治性“特口”种类，则随着镇反等政治运动开展而不断增多。以北京市为例，在接管初期，按“特户”进行管制的政治对象只是已自首登记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和国民党党、团骨干分子。镇反运动开始后，根据镇压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的要求，北京市修改了《特户管制暂行办法》，将管制对象增加到 7 种人。除国民党军政警宪的旧官吏，还乡团队中小头目，日伪汉奸分子，会道门骨干分子外，还包括了郊区被斗之地主、刑事犯罪分子和经司法机关结案释放，剥夺公民权、假释、缓刑的犯罪分子。<sup>④</sup>1952 年 7 月，公安部公布《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北京市据此制定了《管制工作细则》，将上述十种人列为应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规定了对其进行管制和撤销管制的具体办法。

其次是社会治安网络的建立。1951 年 5 月，毛泽东在全国第三次公安工作文件中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在镇反运动中普遍建立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1952 年 8 月，公安部公布《治安保卫委员会组织条例》。治保会是群众性的治安保卫组织，

<sup>①</sup> 《天津通志·公安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558 页。

<sup>②</sup> 松江省辖现黑龙江省南部地区，抗战结束后由国民政府设立。1949 年 4 月，东北人民政府决定将合江省并入松江省，省会置哈尔滨市。1954 年 6 月 19 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松江省建制，与黑龙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

<sup>③</sup> 《黑龙江省志·公安志》，第 348 页。

<sup>④</sup> 《北京志·公安志》，第 333、334 页。

受公安派出所和居民委员会双重领导，主要任务是组织群众防范灾害，协助公安机关检举、监督和管制反革命分子，维护社会治安。三年的镇反运动，全国共逮捕处理 262 万人，管制了 120 万人。<sup>①</sup> 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 17 万个，治保积极分子 200 万人。<sup>②</sup> 全国城乡治保会的普遍建立，在基层社会构建起了一个公安机关与群众相结合、严密防范犯罪活动和监督管理重点人口的群众性的社会治安监控网络。

在镇反运动的第三阶段，为清查逃匿的反革命分子，于 1952 年底开展了“水上镇反”运动。在“水上镇反”中，公安部门开始着手建立“水上户口”。<sup>③</sup> 在各水系地区设置水上派出所，对渔民、船民进行户口登记，发放船民证和船舶户口簿。建立“水上户口”与建立城镇户籍的政治逻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建立巩固新政权的革命秩序。

各地在重新建立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时，许多管理办法还是沿用了过去户口管理的规章制度，存在着内容陈旧，形式繁琐，名称各异等问题。如北京市的立户分类，有住家户、工商户、寺庙户、锅伙户、公寓户和集体单位共同食宿的机关户、团体户、医院户、工地户、集体宿舍户等，户口变动登记有 18 项。<sup>④</sup> 上海的立户分类则是：住家户、工商户、公寓户、船舶户、寺庙户、外侨户六类，户口变动登记是 16 项。<sup>⑤</sup> 这种各行其是的情况，很不利于人口的管理和跨地流动。

1951 年 7 月 16 日，公安部颁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废除了过去各地颁布的城市户籍管理规则，统一规定了城市户口登记制度。

《暂行条例》是新中国最早的一个全国性的户籍法规。《暂行条例》将住户分类为：住家户、工商户、公寓户、船舶户、寺庙户、外侨户六类；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学校、军事工厂等单位，另设为公共户。户口变动登记合并为五类，即迁入、迁出、出生、死亡、婚姻职业等变动。根据《条例》规定，各地将核实的城镇人口户数，按一户一簿颁发了户口簿。

《暂行条例》还规定，来客住宿凡居住 3 日以上者，须向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报告。客栈须备旅客登记簿，在每晚就寝前送公安机关阅查。这是新中国暂住户口登记制度的开始。

在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结束后，1953 年 9 月，公安部召开第二次全国民警

① 《徐子荣关于镇反以来几项主要数字的统计报告》（1954 年 1 月 14 日）。

② 《中国人民公安史稿》（内部发行），第 268 页。

③ 《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1952 年 10 月 18 日）。

④ 《北京志·公安志》，第 395 页。

⑤ 《上海公安志》，第 242 页。

治安工作会议，总结三年治安工作，确定今后工作方针，提出了以后加强各项业务建设的要求。户籍管理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

关于户籍建设工作，会议认为：当前户口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抓紧对敌人社会基础的调查工作，并在现有基础之上，逐步地系统地建立健全重点户口管理工作，以严密掌握社会情况，发现与控制反革命与刑事犯罪分子的活动。从这个任务出发，必须分清轻重缓急，采取重点加强的方针，不应过早地一律强调建立正式的全面的户口管理和推行居民证，以免影响重点城市、重点地区、重点户口的管理。<sup>①</sup>

会议确定户口管理的重点是，大中城市、工矿所在地、水上、军事要塞及其周围地区，着重掌握反革命嫌疑分子、被管制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家属、逃亡地主等阶级敌对分子，以抢偷骗堵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社会治安分子和刑满释放者，以及从台、港、澳和西方国家归来的形迹可疑人员。力量不足的地方暂缓建立。农村户口管理工作暂不进行。

根据第二次全国治安工作会议的精神，各大中城市和相关地区将“特种人口”改为“重点人口”，建立了人口卡片和档案材料管理制度，改进了管理方法。随后，公安部相继出台了《关于重点人口管理工作的规定（草案）》（1955年），《关于重点人口管理工作的暂行规定》（1956年）等文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严密控制重点人口的监管系统。

从上述可见，新中国草创的户口管理方式是在接管城市中形成的，更多地延续了中共战争时期的经验，是以“巩固革命秩序”为目的，实施对重点人口的监控管理，带有鲜明的军事治安的特点。对户籍制度重要性的认识，是从巩固新政权的阶级斗争思维出发的。即所谓“保护好人，限制坏人”，把户口管理作为对敌人进行政治控制的治安工具。这种观念对新中国的户籍制度建设影响非常深远。新中国的户籍建设所以采取先城市、后城镇、再农村的步骤，也正是出于国家政治控制的理由。农村处于国家政治控制的低端，户口管理制度的建立可以缓行。城市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处于政治控制的高端，所以必须首先建立健全户口管理制度。而城市的户籍建设步骤，是从重点人口的管理，再到一般户口管理，也都是出自于同样的政治控制的理由——通过户口登记来控制 and 发现敌人。如公安部1954年7月的一份内部报告中所讲：“只有做到人人有户口，彻底消灭漏口、露户，才

<sup>①</sup> 《第二次全国民警治安工作会议决议》（1953年9月），徐子荣：《关于三年来民警治安工作的基本总结与今后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1953年9月15日）。



便于发现与控制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才便于寻找通缉罪犯，才能有效地达到严密社会面的控制。”<sup>①</sup>这与国民党政府“户政为庶政之母”的执政理念大不相同。所以，中共执政后并不像国民党政府那样急于建立全国统一的户政系统，而是期以十年完成的计划。但是，随着国家经济的复苏，城乡人口流动频繁，给城市治安和居民生活带来许多问题，政府在控制人口流动中逐渐加快了户政建设的步伐。

### 三、建国初城乡冲突的出现和对流动人口的初步管理

新中国最初的户籍制度设计，并不干涉人民享有居住迁徙的自由权利。1951年7月颁布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第一条即开宗明义地说明，制定条例的目的是“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安全及居住、迁徙自由”。《暂行条例》规定，户口迁徙实行事后申报的登记办法，要求迁入者凭迁徙证在3日内向当地派出所申报入户，对城乡之间的人口迁徙并没有特别的限制。但在维护城市公共秩序、解决就业等社会问题时，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性管理功能开始凸显。最初，政府对人口流动的管理是通过说服教育、劝导动员、组织生产劳动等柔性方式进行的。

建国之初，大中城市拥挤了大批难民灾民，工人的大量失业，成为城市中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在1950年，新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失业高峰。1950年全国失业人数166万多人，约占职工总数的21%。<sup>②</sup>失业问题已成为当时影响社会安定的最大因素。

当时各级政府采取“政府介绍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就业方针，把户口管理、社会治安和解决就业的各项具体措施结合起来，综合治理失业问题。主要措施有：（1）组织公安、民政、生产救灾委员会等部门，集中收容难民灾民、乞丐、小偷等流浪人员，分别遣送回乡和组织生产自救；（2）对城市中失业、无业而又无原籍可归的人员，在自愿的原则下，集体组织移民外地。北京市从1949年底到1951年，动员迁到察哈尔和绥远省的移民人口就有8800人；<sup>③</sup>（3）由城镇政府与当地政府联系，结合农村正在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说服、动员和资助家在农村的失业人员回乡务农。失业人员还乡后，同当地农民一样分给土地、房屋和农具。据不完全统计

<sup>①</sup> 《公安部黄耕夫同志关于上海、南京、杭州户口管理工作的考察报告》（1954年7月）。

<sup>②</sup> 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1949～1952），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868页。

<sup>③</sup> 《北京志·公安志》，第373页。

从政治控制到社会控制：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

计，全国返乡务农的失业人员有 16.5 万多人。<sup>①</sup>大量城市闲杂人口的迁出，有助于稳定城市治安，缓解就业压力，为城市经济的复苏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政府的措施得当，很快消解了城市的失业问题，没有影响城市人口正常的迁徙活动。

随着国民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城镇人口的数量增长迅速。1949 年至 1952 年三年间，全国城镇人口从 5765 万增加到 7163 万，增加了 1398 万。1952 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 1949 年的 10.6%，上升到 12.5%。1950～1952 年，城镇人口年均增长 7.5%，远高于同期农村人口年均增长 1.3% 的水平。<sup>②</sup>大城市的人口增长更快。上海市在 1950 年迁入人口 56.6 万多，迁出 62 万多，两者相抵，净迁出 5.6 万多人。到 1951 年迁入 100 多万，迁出 56.6 万多，净迁入 43 万多人。<sup>③</sup>北京市这一时期虽然迁出人口略大于迁入，但流动人口的数量逐年增加。1949 年，在北京登记的滞留 3 天以上的流动人口只有 6.07 万人。1950 年增至 9.37 万，1951 年增至 13.43 万人，比 1949 年增长了一倍多。<sup>④</sup>天津市 1951 年人口比 1949 年增长 17.2 万多人。<sup>⑤</sup>

建国初期，虽然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都在增加，但两者的收入差距拉大。1949～1952 年，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为 60%～120%，而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约为 30%。<sup>⑥</sup>特别是 1952 年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已无地可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要寻找出路，农民涌入城市的人数日益增多。在 1952 年前后，形成了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第一个高峰。

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本是经济发展必然出现的现象。但在农村人开始向城市迈步的同时，城市却出现了建国以来第二次失业高峰。1952 年，在“三反”、“五反”运动后，城镇的工商业萎缩，大量工商户歇业停产，劳资关系紧张，失业人数猛增。1952 年 4 月，全国失业人口比 1951 年底增长 1.5 倍。全国失业、半失业的人数约 280 万左右。其中失业、半失业工人约有 120 万人，失业知识分子约有 43 万人，没有职业或没有正当职业的旧军官约 20 万人，其他各种无业游民共约有 98 万人。另据 1952 年 7 月政务院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上的统计，当时全国有

① 何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年，第 45 页。

② 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中国社会统计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 年，第 15 页。

③ 《上海公安志》，第 255 页。

④ 《北京志·公安志》，第 388 页。

⑤ 《天津通志·公安志》，第 549 页。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第 916 页；《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第 35 页。

失业人员 312 万人，其中五反运动中新失业人员有 45.7 万人。上海、天津、武汉、重庆、广州、北京 6 个城市占新增失业人员的 53%。到 1952 年底，全国无业者有 376.6 万人。<sup>①</sup> 城市本身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大量农村劳动力又涌入城市谋求工作，由此出现了新中国第一次城乡冲突。

为解决城镇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和大批农民涌入城市问题，政府改变了过去政府和企业“两条腿走路”的就业政策，提出了逐步实现对劳动力统一调配的要求，开始对农民进入城市施以行政干预。

1952 年 7 月，政务院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解决失业问题，确定了由劳动部门“统一介绍就业”的政策，并成立政务院劳动就业委员会。7 月 25 日，政务院发布了会议起草的《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对城镇失业的工人、知识分子、旧军官的就业应对之策，但农民进城就业问题是不包括在内的。《决定》认为：农村中大量剩余劳动力不同于城市的失业半失业人员，是有饭吃有地种的。城市和工业建设在短时期不可能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故必须大力说服农民，以克服农民盲目地向城市流动的情绪”。<sup>②</sup>

但是，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利益驱动下，农民进城的趋势是很难遏制住的。1953 年入春以来，许多地区出现了外地农民大规模进城找工作的情况。一些县、区、乡政府也为他们开绿灯，开介绍信让农民进城谋生。<sup>③</sup> 仅沈阳、鞍山两市，来找工作的外地农民的就有 2 万多人。<sup>④</sup>

1953 年 4 月 17 日，政务院第 175 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要求县、区、乡政府劝止农民自行进城找工作，动员滞留在城市的无业农民回乡，企业未经政府劳动部门批准不得擅自招工。<sup>⑤</sup> 20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应该回到农村去》的社论。沿用至今的“盲流”一词就是这篇社论中提出来的。

这场建国后的第一次城乡冲突，还引发了一场关于工业化战略的著名争论。1953 年 9 月 11 日，政协常委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发言说：“近几年，城里的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第 864，868，879 页。

② 《人民日报》1952 年 8 月 4 日。

③ 《中央转业建设委员会、内务部、劳动部关于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动问题的处理意见的联合指示》（1953 年 4 月 1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 349 页。

④ 《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第 127 页。

⑤ 国务院办公厅大事记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未刊）第 2 卷，1991 年，第 152 页。《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第 8 页。



工人生活提高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向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sup>①</sup>他还说：工农生活差距“悬殊”，“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毛泽东认为梁漱溟是在有意拨弄是非，否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国家工业化政策，亲自上阵对梁漱溟的观点进行了严厉而尖刻的批驳。<sup>②</sup>

对于建国后很快出现的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问题，新中国执政者显然是缺乏思想准备的。从1952年起，政府多次提出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问题，相继出台了一些措施但都未能遏制住人口涌向城市的势头。

建国初期，国家对城市户籍的控制还是比较宽松的，对外地人口迁入城市的政策是由城市自己决定的。上海市是最早开始实行限制外地人口迁入政策的城市。1951年7月，上海市公安局规定，凡从外省市迁来上海市者，应凭迁移证向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经批准后方可入户。当时规定经国家正式批准招工、入学和在沪工作人员家属等5种人准予迁入上海入户。<sup>③</sup>北京市对外地人口迁入则无限制性规定。只要本人拟在北京长期居住，并持有户口迁徙证件，即可入户。<sup>④</sup>1953年以后，各大中城市都收紧了进城的迁徙政策，但所限制的主要还是自发流入城市，无正当职业、无生活保障的农村人口。根据中央有关规定，对1954年前流入城市且已有生存基础者，大部分都给予了城市户籍。<sup>⑤</sup>在1951～1954年四年间，北京市净迁入人口总计达59.9万人；<sup>⑥</sup>上海市净迁入人口总计达90万人。<sup>⑦</sup>随着城市人口压力的增大，各城市相继出台了一些限制外地人口迁入的政策。

#### 四、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和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分立

1953年是国家开始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引进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的一年，也是促使加速建立全

① 汪东林著：《梁漱溟问答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页。

② 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1953年9月16日至18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07～115页。

③ 《上海公安志》，第255页。

④ 《北京志·公安志》，第369页。

⑤ 《公安部复华东公安部未领迁徙证迁出的居民是否补办迁徙问题》（54）公治字第5号，1954年1月12日。

⑥ 冯晓英：《北京地区流动人口的演变及其特征》，《北京党史》1999年第1期。

⑦ 《上海公安志》，第255页。

国统一的户籍制度的一个关键年份。最直接的重大影响因素有二：一是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二是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

“一五”计划引进的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工业化战略，是一种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资金的途径来自内部积累，需要农业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1953年，城市粮食供应出现严重紧缺。为把主要农产品掌握在国家手里，陈云在全国粮食会议上提出了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即在农村中采取征购粮食的办法，在城镇中采取配售粮食的办法。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11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11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制定了《关于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命令》和《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并立即在各地实施。

统购统销的实施，对粮、油、棉布等生活必需品的计划供应，必须有准确的人口数据，以核准供应对象和供应数量。各地从11月开始，对城镇户口进行了大规模紧急整顿，核对户口，凭户口簿签发购粮证。户口簿册开始具有城镇身份的效力。

国家为把农民的余粮都掌握在手里，加快了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改造步伐，使统购统销形成的工农业剪刀差进一步加大，形成了城乡反差越来越大的二元利益结构，大量农村劳动力纷纷涌入城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对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势头加以遏制，首先就是要加强户口管理。由此，原来预期10年建立较为完备的全国城乡户籍制度的计划提前进入实施阶段，并成为配合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措施。

促进提前建立农村户籍制度的另一个因素，是1953年的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1952年10月，斯大林建议中共进行全民普选，召开人大，制定宪法，以确立合法执政的法理根据。中共中央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直接目的，是以常住人口登记为依据进行选民登记，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代表普选作准备。

1953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选举法》。4月3日，政务院发布《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这次全面的人口普查登记，虽然登记内容比较简单，<sup>①</sup>但这是国家第一次掌握了比较准确的人口数字，意义重大。不仅为人民代表的选举工作准备了条件，为国家经济建设提

<sup>①</sup> 第一次人口普查仅有姓名、与户主关系、性别、年龄、民族以及现住址六项。

供了人口依据，而且也给普通民众灌输了人口登记的观念。这些都为以后建立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打下了基础。

通过1953年的全国第一次人口调查和第一届基层选举，特别是地、富、反、坏分子被剥夺选举权和公民权，从两个方面强化了户籍工作的治安管理功能：一是通过选民资格审查整顿了管制工作；二是通过讨论酝酿候选人名单整顿了治安保卫委员会。<sup>①</sup>这反映了围绕大规模经济建设计划的实施，国家加强政治控制的需要。

1954年5、6月间，公安部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分析了镇反运动后的对敌斗争形势，确定了过渡时期公安工作的基本任务和具体措施。会议认为，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结束后，今后面临的敌人，主要已经不是比较暴露的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而是受帝国主义直接、间接指挥或策动的，隐蔽起来、伪装起来和不断派遣进来的特务间谍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人民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必须与治安及其他公开斗争手段相结合，必须与组织和发动群众性的防奸反特斗争相结合”。<sup>②</sup>

公安工作由过去以运动为重点的状态转入了经常性工作，这意味着需要加强制度化 and 规范化的建设。户籍管理是社会治安的基础，在制度建设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在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特别提出了加强户籍管理的问题。指出：“户口管理工作是控制反革命分子与一般刑事犯罪分子的一项必要措施，必须严密管理制度，加强社会面的控制。有重点地加强大、中城市工矿地区、军事要地和边防口岸、沿海城镇的重点户口的管理工作……发现和限制反革命分子和一般刑事犯罪分子的活动。”并要求各大、中城市着手建立人口卡片，“以便严密户口的管理”。<sup>③</sup>

根据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的精神，各省、市、自治区公安部门结合本地情况，调整和制定了工作计划，加强了户籍管理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制定工作计划中，除了要求开展对反革命社会基础的调查研究工作，逐步建立比较正规的档案管理制度外，还提出了对游民和流动人口的调查和清理问题。如河北省公安厅提出，要在一年之内把北戴河的游民分子清除出去。河南省公安厅提出，要切实掌握工地户口中的流动人员情况。北京市公安局决定对首都游民分子进行调查处理，制定游民分子的标准、范围及做法。<sup>④</sup>这意味着在镇反以后各地户籍管理的治安重点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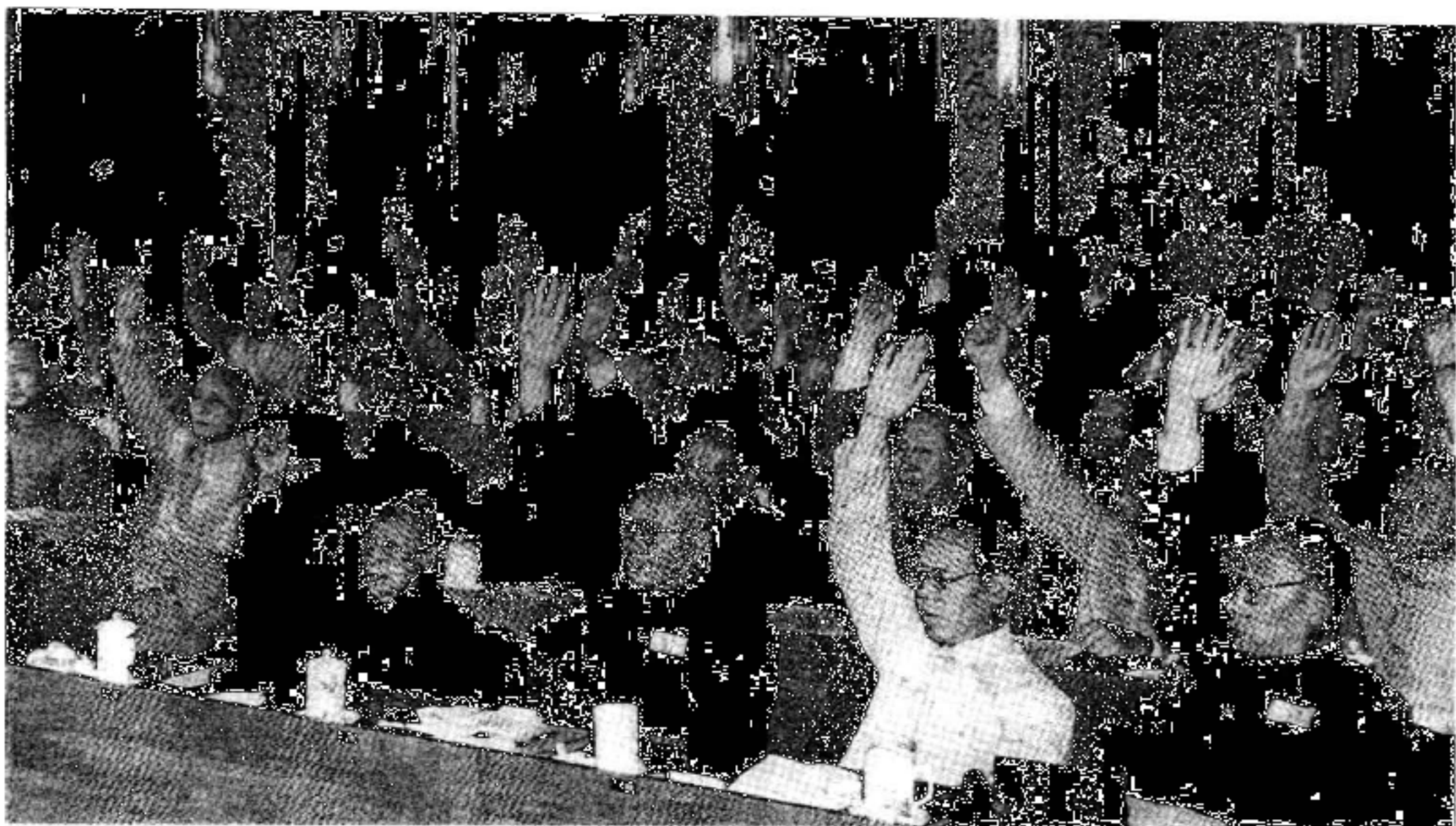
① 《中央公安部关于保护棉花计划收购的指示》（1954年9月）。

② 《中国人民公安史稿》（内部出版），第271、272页。

③ 《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1954年6月17日）。

④ 《北京市公安局西四分局贯彻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实施计划》，（1954年10月）。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第三章第九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图为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悄然的变化，开始注意对社会面的控制。

此时，虽然户籍管理的治安功能开始由政治控制向社会控制偏移，但并没有与控制人口流动挂起钩来。在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后，国家没有马上把全国城乡户政体系就势建立起来，户口建设的中心工作是大中城市、工矿地区、军事要塞及沿海边境地区的重点人口管理，规范和严密大中城市的户籍管理，在农村的户口登记制度尚未提上日程。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宪法》。五四宪法是苏联宪法的中国化翻版，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法律体现，在保障公民权利上规定的十分详细。《宪法》第三章第九十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sup>①</sup>对这个法律条文的解读，此时还不能认为只是保留在字面上的公民权利。在当时有关部门制定的关于户口管理的具体规定中，对人口迁移只是要求办理相关规定手续，还没有附加上其他限制性条件。

但是，1954年是国家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的第二年度，政策的后发效应开始全面显现。由于统购统销的方法不尽合理，加之自然灾害的影响，国家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20页。

从政治控制到社会控制：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

收购粮食过多，城乡二元利益结构的矛盾公开化了。

在开始实行计划供应粮食时，从当时国家划定城市和建制镇的标准来看，粮食供应的口子是开得很大的。<sup>①</sup> 国家所规定的供给范围，不但包括县以上城市、集镇，还有缺粮的经济作物区、农村人口十分之一的缺粮户和灾区灾民的粮食供应，仅在农村的供应户就近1亿，加上城市的1亿，供应人口总数接近2亿，超过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如遇到灾年，则要供应2.5亿左右。<sup>②</sup> 同时，国家在统销之初对城市的粮食供应方法也比较粗略，“有组织的群众，可通过其组织，对一般市民，可暂凭户口簿来购买”。<sup>③</sup> 由于城镇居民用粮一般是以其自定计划为主，所谓审批大多是流于形式，不少居民超出需要购粮。也就是说，统销政策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城市管得松，农村管得紧的“一头沉”的问题。

1953年至1954年度的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是在“全党动手，全力以赴”的号召下完成的。各地普遍出现了强迫命令的情况，很多农民被迫卖了“过头粮”，有的连饲料粮、种子粮、口粮都卖了。而国家对农村的粮食统销供应又不到位，一些缺粮农民被迫到黑市上买高价粮，有余粮的农民也认为多增产就多征购，农民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sup>④</sup> 许多农民跑到城市寻找活路。在1954年至1955年粮食年度，政府虽然部分调整了征购办法，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1953、1954连续两年，农业没有完成粮棉增产计划，加重了粮食供应的紧张。加之，1954年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严重水灾，国家又多购了70亿斤粮食，1954至1955年度购“过头粮”情况更严重，而且继粮油后把棉花也列入了统购名单，使得粮食形势非常紧张。到1955年春季，几乎是“人人谈粮食，户户要统销”。

由于统购的购粮过多，再加之供应制度上城市粮食供应指标一般高于农村，从1954年9月起，全国城镇的粮食销量就开始了不正常的上涨，甚至出现了城市粮食向乡间倒流的现象。到1955年春，许多地方的粮食销量大大超过国家规定指标。

<sup>①</sup> 据1955年11月7日《国务院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常住人口在2万人以上的县以上政府所在地和工商业地区都可列为城市；市级或县（旗）以上政府所在地、常住人口超过2000人（其中半数以上居民是非农业人口）或常住人口1000以上不足2000但非农业人口超过75%的居民区，为建制镇。城镇以外的地区为乡村。

<sup>②</sup> 赵发生：《当代中国的粮食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78页。

<sup>③</sup> 《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953年10月16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第482页。

<sup>④</sup>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1955年3月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6页。



据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的统计，从1954年8月到1955年4月，8个月人口增加了5%，而粮食平均每月增加12.64%，粮食增加速度比人口增加速度要大两倍多。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发展。<sup>①</sup>中南、东北、华北地区的许多地方，农民无论缺不缺粮，一律纷纷要求国家供应粮食。有的省份1955年3月份的销售量等于供应了全省三分之二的人口粮食消费，其中有些县全部由国家供应。<sup>②</sup>国家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遏制其上升势头。

粮食的紧张带来农村社会的全面恐慌。“毛人水鬼”之类的各种谣言流言四起，群体性骚乱、围攻干部、集体请愿的事件层出不穷，农民不务生产、杀猪宰牛、砍伐树木，偷盗、抢劫的治安案件倍增于前，少数边远地方还发生了农民暴动。公安部给中央的报告说：这已不是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而是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分子，没有什么组织指挥。<sup>③</sup>

从1954年入春开始，大批农民纷纷离开本乡本土，外出谋生。背井离乡四处求食的农民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1954年，迁移人数为2200万人；1955年为2500万人；1956年为3000万人。<sup>④</sup>许多人流入了城市，有的生活无着流浪街头，有的沦为乞丐，甚至偷盗犯罪，城市治安刑事案件大幅度飙升。据北京、天津、广州、沈阳等大城市统计，刑事案件中的百分之七十是盗窃案件。<sup>⑤</sup>

为了使农民安于从事农业生产，在源头上遏制住农民向城市流动的猛烈势头，减轻城市的人口压力，国家加紧了建立农村户籍制度的步伐。

1954年9月21日，中央内务部下发了《户口登记暂行办法（草案）》，对农村户口迁出迁入的手续制度作出具体规定。对未改变成分的地主分子的迁徙，必须经区公所批准，被剥夺政治权利、保外就医、缓刑、假释和被管制分子的迁移，必须经原处理的司法机关或者公安机关的批准，再按照以上规定办理迁出迁入手续。<sup>⑥</sup>

1954年12月20日，内务部、公安部、国家统计局下达《关于共同配合建立户口登记制度的联合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民政、公安、统计等有关部门共同配合，把户口登记制度在1953年人口调查的基础上确实建立起来，以适应国家各项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整顿城市粮食计划供应工作的指示》（1955年5月16日）。

② 《当代中国的粮食问题》，第84页。

③ 《中央公安部关于1953年下半年到1954年上半年的工作简要总结向政务院的报告》，（1954年9月）。

④ 《人口统计年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409页。

⑤ 《中央公安部党组关于1954年公安工作主要情况向中央的总结报告》（1955年5月）。

⑥ 《辽宁省志·公安志》，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第270页。



建设的需要。农村户口登记制度的建立，民政部门应担负主要责任，但有关迁徙问题，公安部门应当协助。省市的人口数字由省市民政厅和统计局汇总后，报送内务部和国家统计局。<sup>①</sup>

按照《联合通知》的要求，农村地区在1953年全国人口调查的基础上，相继建立起了简易的户口登记制度。因为农村居民居住比较固定，需要出示户口簿证明公民身份的事项很少，所以规定居民不发户口簿，一个村的居民发一本户口登记簿，一式两份，分别由村委会和乡政府管理。农村户口迁徙手续由乡政府办理。

根据全国第六次公安会议精神和日趋紧张的社会治安形势，公安部制定了1955年工作计划，其中对户口管理提出了两点新要求：一是针对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情况，要求各大、中城市根据户口管理的统一规定，改进和健全户口登记工作，掌握人口变动情况。北京等中心城市须于1955年做好人口卡片的准备工作；二是针对统购统销以来农村紧张局势，要求在农村开始对重点人口开展调查研究，严格监视其中心怀不满坚持反动立场的分子，及时打击有现行破坏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侦查有重大嫌疑的分子。<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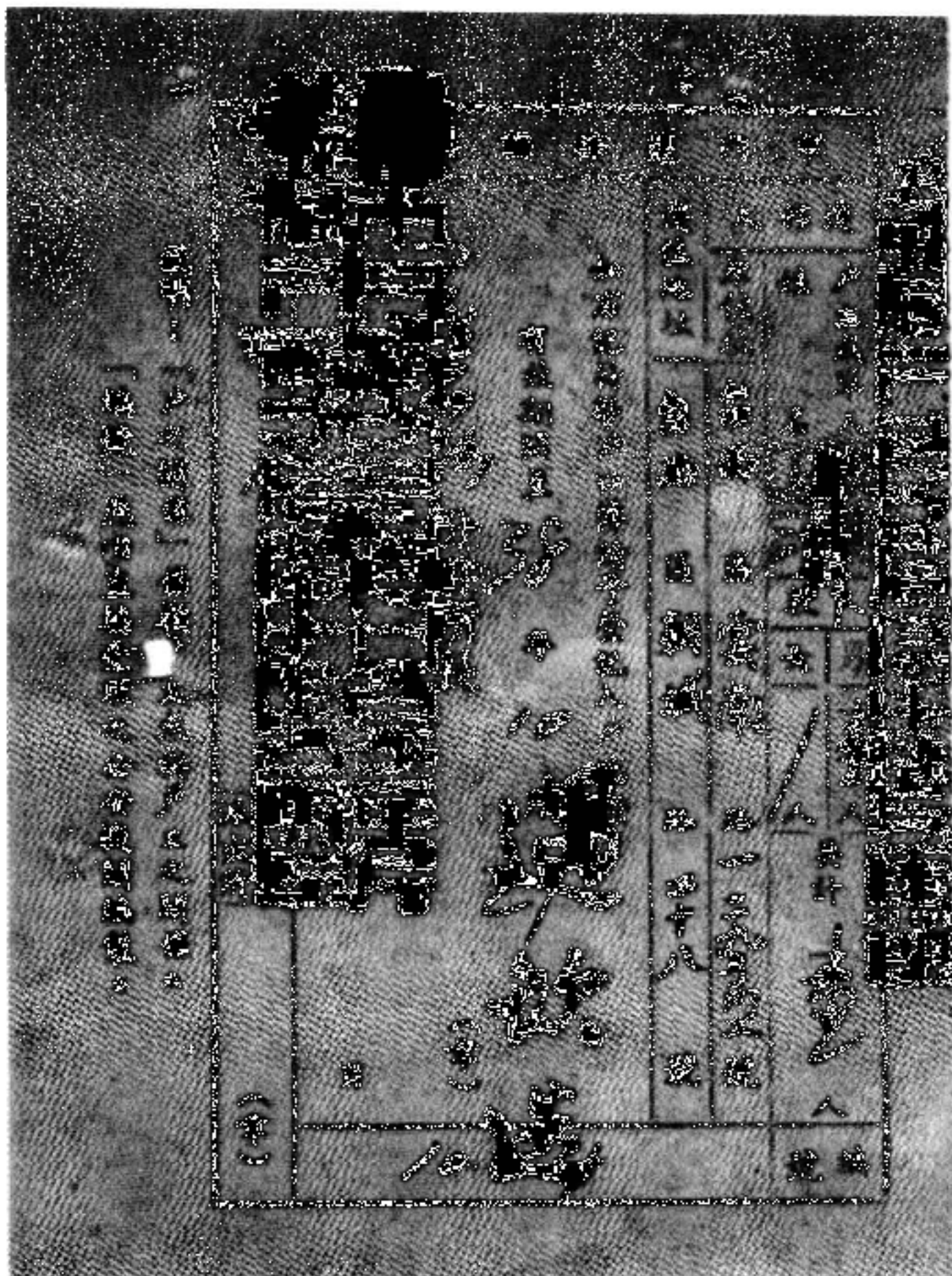
但是1955年刚一开春，在天灾和高征购的双重影响下，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发生了闹粮风潮，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粮食的紧张局势不仅比1954年来得更早，而且范围更大。中央不得不紧急采取措施，对统购统销政策进行整顿。

1955年3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执行粮食定产、订购、定销（简称“三定”）的办法。即以乡为单位，确定全乡每户的常年计划产量和全乡粮食统购统销的数量，并向农民宣布，使农民预先对粮食的生产、收购、留用、供应做到心中有数，能够安心生产。各地迅速派出几十万干部下乡贯彻《紧急指示》，稳定了农民的生产情绪。

为把庞大的统销粮数目降下来，1955年4月28日和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先后联合发出《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和《关于整顿城市粮食计划供应工作的指示》。整顿统销的办法是：在农村，发动群众对要求供应的农户逐户评议，核发购粮证，凭证供应。在城市，普遍开展节约粮食的宣传，将原来的凭证买粮，改为“按户核实”供应。通过整顿城市粮食统销，许多城市以公安部门批

<sup>①</sup> 《内务部、公安部、国家统计局关于共同配合建立户口登记制度的联合通知》（1954年12月20日）。

<sup>②</sup> 《1955年公安工作计划》（1954年12月）。



民国时期的户籍迁移证明。

准的正式户口为基础，核  
实了供应人口，堵塞了  
“凭证买粮”的一些漏洞，  
调整了供应标准，逐渐压  
缩了粮食的销量。

为从根本上改变粮  
食统购统销的被动局面，  
1955年8月25日，国务  
院正式颁布了《农村粮食  
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  
《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  
办法》两个文件。前者详  
细规定了“定产、定购、  
定销”一定三年的政策，  
明确农民吃粮问题自行解  
决的办法，从而确立了国  
家与农民订立协议的基础。  
后者在“按户核实”  
供应的基础上，规定对非

农业人口一律实行居民口粮分等定量供应（按人分等核定供应标准），对工商行业用粮实行按户定量供应，对牲畜饲料用粮实行分类定量供应。并规定了对粮食转移证、购粮证、粮票等管理使用办法。这两个文件的全面实施，意味着粮食统购统销的基本定型。从此，粮食的计划供应指标就与城镇户口直接联系起来。

1955年8月18日，粮食部颁发《全国通用粮票暂行管理办法》，对粮票的领发、收回与上解、登记与统计等作了具体规定。从1955年11月1日起，全国各地普遍使用全国通用粮票和地方粮票。这是新中国票证时代到来的时间标志。1956年4月，根据粮食部《关于加强市镇粮食定量供应业务工作几项规定的指示》，全国各地切实地建立了三种粮食管理制度：（一）以户为单位，按分等合计供应数量，核发“居民粮食供应证”的管理制度；（二）居民口粮供应标准的变更和迁居转移供应关系等管理制度；（三）粮票管理制度。

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既要保障城镇居民最基本生活供给，又要保证农业为工



内 蒙 古 宁 城 县 八 里 罕 公 社 天 巨 复 大 队 第 六 生 产 队

阶 级 成 份 登 记 表

编 号 乙

户 主 姓 名	性 别	男	家 庭 出 身	贫 农	家 庭 人 口	在 家 人 口	7 口
何 清 翼	年 令	40	本 人 社 份	影 员	在 外 人 口		
民 族		汉 族					
家 庭 经 济 状 况	土 改 时	土改前：七人一个劳动力，有房子三间，二亩地，地均分，分地均分，土改后：共有二十三亩地，三间房子，七人，男200-1，以没地。					
	高 级 社 时	入社前，房子三间，二十三亩地，因唐那呼森康依法主是董瑞影，在一九五六年把土地全部入社。					
	现 在	房子三间，七人的自留地，耕一亩二分六，靠集体劳动挣工。					
		(男女劳动力各一个)					
家 庭 主 要 社 会 关 系 及 其 政 治 面 貌	董，职董忠，中农成分，农民，现住八里罕公社天巨复大队。						
家 史 简 述	<p>父亲：何旭林，从八岁就做自己帮做的活，到十七岁时打旱地做小买卖维持家中生活。</p> <p>本人：从八岁在家做活，九岁读一年书，十二岁到队当学徒，一直干到三十九岁，(不记)。现在参加农业生产。</p>						
备 考							

撰 写 人 沁 国 秀

撰 写 日 期 1965 年 6 月 17 日

中国当代户籍制度在 1950 年代的确立，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和城市单位体制互为表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中，完善了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重点人口的监控手段，构成了严密的社会控制网络。图为 1965 年内蒙古宁城县的《阶级成分登记表》。



业化提供有效积累，最终必然是对人民生活的票证化管理。而实行票证化管理，需要准确的人口资料为依据。在整顿统购统销政策的同时，国家一方面继续加强对迁徙人口的管理，一方面开始着手建立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

1955年3月，内务部、公安部就当前办理户口迁徙的一些政策问题发出联合通知。通知规定：（1）农村正式建立户口登记制度后，不论在县境内迁移或迁出县境以外，一律使用公安部门规定的迁徙证；（2）对盲目要求迁往城市的农民（包括复员回乡军人和烈属、军属），不应随便开给迁徙证；（3）确实因残、病、老到城市依靠子女或亲友供养、子女随父母到城市上学、妻子到城市找丈夫同居，国家企事业单位在农村有计划招收的农民和考入城市学校的学生，以及其他正当理由到城市的居民，不属于盲目流入城市，应发给迁徙证。在城市已找到正当职业或考入学校就学的，可给予登记正式户口。<sup>①</sup>

由于城市人口膨胀过快，城市管理者均感压力很大。在整顿城市粮食供应的过程中，各城市都收紧了落户政策。1955年，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指示说：“北京市人口增加太快，现在工业还未大发展，人口已达342万（含暂住人口），急需加以控制。”据此，北京市公安局于是年5月制定了《关于户口管理的几项补充规定》，对由市外迁入申报正式户口者，严格了审批权限，同时取消了寄宿户口。对1949年后来京居住的户口进行清理，凡不符合申报正式户口规定者，一律取消正式户口，改为暂住人口，不发购粮证。<sup>②</sup>6月6日，中共北京市委指示：今后从外地迁来北京居住的，必须在本市有正当和固定职业的人或者是他们的直系亲属需要抚养的，才允许申报正式户口，其余的人只能申报临时户口。对于临时户口，因在外地已经供应粮食，应带粮票来，否则不供应粮食。<sup>③</sup>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也都结合整顿粮食供应，加强了户口管理，使迁入人口数量大为减少。1955年，北京市的迁入人口比上年减少了0.3万人，外来人口从上年的15.46万减少到7.92万；上海市大力动员城市人口回乡，净迁出58万人；天津市居民净迁出4.88万。<sup>④</sup>

1955年6月，国务院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要求“争取在几年之内，将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建立和健全

① 《内务部、公安部关于办理户口迁徙的注意事项联合通知》（1955年3月）。

② 《北京志·公安志》，第370页。

③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节约粮食的报告》（1955年6月6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5）》，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410页。

④ 《北京志·公安志》，第388页。《上海公安志》，第255页。《天津通志·公安志》，第550页。

起来”。22日，以周恩来总理的名义签署颁布。

《指示》根据1953年10月第二次全国民政会议确定的政府民政部门主管户政业务的规定，明确了户政管理体制是：“全国户口登记行政，由内务部和县级以上政府民政部门主管。办理户口登记的机关，在城市、集镇是公安派出所，在乡和未设公安派出所的集镇是乡、镇政府”。这一规定意味着户籍管理有了与过去不同的功能性变化，开始突出了人口统计的功能。《指示》重点是要解决农村户口登记管理问题。乡、镇政府建立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四种登记簿，负责办理所辖人口的迁徙手续；城镇户口登记仍按1951年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办理。被刑事处理和被管制分子的迁徙须经公安机关的批准。并对公共户口的管理，户口登记的统计汇总上报作出相应规定。

在《指示》下达后的半年时间里，随着统购统销政策的基本定型，国家在户籍管理上又做出了相应的制度安排。

一是从统计技术上，把农民和非农民划分开来。

1955年11月7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确定“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作为人口统计指标。1956年，在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制定的《人口变动情况统计表》中，除“农村人口”外，又增加了“农业户数”。<sup>①</sup>在统计说明中专门解释说：“农业人口”，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和依靠农业生产者抚养的人数；全年从事农业生产，不论其副业收入多少，均为农业户。<sup>②</sup>由此，以“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进行划分与管理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体制开始形成。

二是在户政体制上，统一由公安机关归口管理。

1956年1月13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将内务部和各级民政部门掌管的农村户口登记、统计工作，以及有关国籍问题的处理工作，全部移交公安部和各级公安部门统一归口管理。<sup>③</sup>从而改变了半年前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中由民政部门主管户政的规定。统一公安机关为全国城乡户口登记、管理工作制度和主管机关，标志着“户警一体”的管理体制的正式确立。这意味着国家要借助专政机关的强力，强化户籍管理的限制性功能。

1956年2月，公安部发出通知，统一了全国的户口迁徙制度。从5月1日起，

① 殷志静、郁奇虹著：《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页。

② 张庆五编著：《户籍手册》，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年，第139～140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未刊），第263页。

在全国范围内一律启用新规定的迁徙证和户口专用章。<sup>①</sup>

三是在户籍管理上，加强和严密城镇户口管理。

(1) 加强单位户口管理。1956年1月7日，公安部发出通知，要求健全机关、团体、学校、企业（包括工地）等单位户口登记制度，在全面登记的基础上严格执行凭迁徙证申报登记户口的制度。

(2) 加强人口卡片工作。在沈阳、上海等20多个城市已有的工作基础上，公安部要求，在1956年省辖市一律把户口卡片建立起来。<sup>②</sup>

上述这些工作，形成了新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户口对民众生活越来越重要。据北京、天津等城市1956年时的统计，公民经常需用户口证件作证明的事项，即达30多种。<sup>③</sup>以后，附着在户口上的各种项目又不断增加，发展到41种之多。

户籍工作由公安机关归口管理后，为总结建国以来户籍制度建设的工作经验，明确户口管理工作的性质和任务，公安部报请国务院批准，于1956年3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户口工作会议。

会议第一次全面和完整地阐述了新中国户籍制度的性质和任务。指出：“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户口工作是维护公民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的有力的工具，也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它的基本任务是：证明公民身份，便于公民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统计人口数字，为国家经济、文化、国防建设提供人口资料；发现和防范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活动，密切配合对敌斗争。为了实现上述任务，必须建立严密的户口登记制度和开展深入的户口调查工作。”<sup>④</sup>

会议部署了1956年和1957年的户政建设任务。要求：(1) 在两年内普遍建立起常住人口登记和人口变动制度；(2) 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出生证、死亡证和外出证制度；(3) 城市在1956年、农村在1957年，将重点人口全部管起来；(4) 1956年在户口变动统计表内增加农业人口项目，原城市户口变动统计表改为人口迁移状况统计表，并增加职业、文化和年龄统计表。

<sup>①</sup> 《公安部为启用新的户口专用章及迁徙证的通知》（1956年2月6日）。

<sup>②</sup> 《1956年全国公安工作计划》（1956年3月）。

<sup>③</sup> 黄耕夫：《户口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意见》（1956年3月10日在全国户口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sup>④</sup> 黄耕夫：《户口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意见》（1956年3月10日在全国户口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根据第一次全国户口会议精神和工作部署，各地公安机关加紧建立和完善了相关制度。主要是：重点人口的管理制度，人口卡片的管理制度，公共户（集体户口）的管理制度，户口迁徙证的统一管理制度，农村常住户口和变动登记制度。到1957年4月，据不完全统计，吉林、辽宁、甘肃、内蒙古、浙江、云南、陕西七省全部地区，湖南、江西、甘肃、内蒙古、山东、青海五省70%以上地区，都建立了农村户口登记制度。半数以上城市进行了户口普查核对，大中城市的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的集体户口，初步完成了登记管理工作。部分地区整顿了水上户口。已建和在建人口卡片的城市人口占城市人口总数83%。<sup>①</sup>城乡户政管理的制度建设已是初成规模。

总之，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国家工业化起步阶段，也是新中国户政建设大规模推进时期。不仅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模式和工业化的内部积累方式是照搬苏联的，出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是大体一致的。苏联通过城乡二元管理的户籍制度，把人口流动和迁徙纳入国家计划的范围，有效地推动了工业化的实现。在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户口会议及其草拟的《户口登记条例》，重点也是要完善城乡户籍制度建设和加强规范化管理。特别是对户籍制度人口统计功能的强调，反映了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数字化管理要求。在户政建设的具体制度方面，也都移植了许多苏联因素。如：（1）在人口管理方式上，当时准备实施的公民证、出生证、死亡证和外出证等，直接是借鉴了苏联的户口管理办法。（2）在户口类别上，为限制农民的自由流动，苏联采取的是只给城镇居民发放居民证的办法，新中国采取的是城镇户口的办法，性质是一样的。（3）在政治控制上，对重点人口的管理方式，与苏联警察机关的政治监控；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管制和强迫劳动，与苏联的特殊移民政策，也都有异曲同工之处。

另一方面，苏联地多人少，劳动力紧缺，国家管理的制度化程度高，因而可以通过二元户籍管理方式有序地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而中国的农业人口基数大，城市就业容量小，农民外流的冲击力强；加之国家管理的制度化程度低，各级干部普遍缺乏文化知识，大都不具备计划经济所需要的计划理性，政策的随意性很大。所以，苏联经验在中国的变通就显得格外重要。中国将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给附着在户口上的票证制度，可以认为是在短缺经济下的一种变通方式。

<sup>①</sup> 《全国户口工作的基本情况》（治安工作简报第5号，1957年4月1日）。

## 五、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形成

1956年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终于列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门墙。但是，这个社会主义的门槛是很低的，当时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仅142元，不但基数低而且城乡居民之间也生活差异很大。1956年农民人平均消费水平78元，非农业居民人均消费197元，高出农民2.5倍。从储蓄存款年底余额看，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是84.8%，但农户储蓄存款的数额只占到全国储蓄总量的16.1%。<sup>①</sup>城镇经济国有化和农村经济集体化的实现，并没有促进粮食生产的大幅度提高，没有改变粮食供给不足的局面，没有使国家与农民持续紧张的关系有所缓解，而且由于“大锅饭”单位体制和“铁饭碗”用工体制的形成，使得城乡二元利益结构的矛盾冲突更加深刻和激烈了。<sup>②</sup>

1956年农业集体化的完成，遗留了许多旧问题，又带来了许多新问题。

首先，农民收入明显减少。1956年粮食虽比上年增产5.4%，但也只是完成了计划的97.3%；而且所增产的部分也是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取得的，单产并未提高，反而有所下降。一些主要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下降。此外，由于生产没有增加，再加上副业收入减少和合作社开支过大，许多农户收入减少。1956年农户减少收入比例约占总农户的1/3或1/4。<sup>③</sup>

农业集体化剥夺了农民的自由。农民劳动更加辛苦而收益反而不如过去，有的连口粮都不够。这与干部动员农民加入合作社时的许诺实在是天上地下。加之一些地方又多购了农民的“过头粮”，部分地区发生严重灾情，造成农村社会的普遍恐慌。

第二，粮食供应持续紧张。1956年灾情严重，受灾人口达7000万，比1954年的灾民还多1000万人。虽然粮食总产量有所增加，但统购统销的完成情况反不如去年。1956至1957粮食年度的收购减少了25.6亿斤，市场销售却增加了127亿

① 《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第6~7、64、574、581页。

② 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168、169页。

③ 陈吉元等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247页；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编：《当代中国农业变革与发展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88~93页。

从政治控制到社会控制：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

斤。仅国家供应受灾地区人民的粮食就有 120 亿斤左右。<sup>①</sup>

第三，农民外流的情况日益严重。农业集体化的激进政策，使统购统销以来的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出现了城乡之间人口迁移频繁的高峰时期。据当时国家有关部门掌握的数字，仅 1954 年到 1956 年的 3 年间，迁移人数就达 7700 万。<sup>②</sup>1957 年的城镇人口为 9949 万，比 1952 年的 7163 万增加了 2786 万。其中仅 1956 年、1957 年两年，城镇人口就增加了 1664 万。<sup>③</sup>据估计，这一时期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约占新增城市人口的 56%。<sup>④</sup>这使决策者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城乡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不但没有让农民增产增收，反而使农民向城市流动的数量猛增，这是决策者始料未及的。

从 1956 年秋冬，许多地方开始出现农民闹粮，闹社，大批农民向城市流动。安徽、河南、河北、江苏等省灾区和非灾区的农民大量外流，流出的人口一般奔向各大城市和工业建设重点地区。<sup>⑤</sup>1956 年 8 月，河北灾民流入北京的已有 2 万多，郊区小店被挤满，还有的露宿街头，有的成群结伙找国家机关或拦截首长汽车，要求找工作，甚至有的向外国人讨钱。<sup>⑥</sup>到 1957 年初，出现了全国范围的“退社”风潮，流民问题更为严重。灾区饥饿和半饥饿的农民纷纷逃离农村另找活路，老幼妇孺逃荒要饭，青壮劳力外出打工。在大量农村外流人口中，不仅有一般农民，还有党团员、复员军人和乡社干部。

在农业集体化前，农民向城市流动的动因，主要是为城市生活吸引。被集体化后的农民对已经不属于自己的土地再无眷恋，不习惯合作社对他们的严厉管束，纷纷到城市和工矿企业来谋生。他们的动机首先是为了逃离农村，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加入“盲流”队伍的农民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难遏制。

据内务部不完全统计，从 1956 年秋到 1957 年 3 月，北京、天津、南京、南宁等 18 个城市和陕西、甘肃、新疆、黑龙江等 8 个省一些主要城市流入的农民，

<sup>①</sup> 《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 98 页；罗平汉著：《票证时代：统购统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244 页。

<sup>②</sup> 《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6 年 12 月 30 日）。

<sup>③</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编：《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年，第 9 页。

<sup>④</sup> 马洪、孙尚清主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505 页。

<sup>⑤</sup> 《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第 127 页；《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6 年 12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劳动工资和职工福利保险卷，第 360～361 页。

<sup>⑥</sup>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1973 期（1956 年 8 月 30 日）。



即达40余万人。<sup>①</sup>再据黑龙江省当时的不完全统计，仅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四市，1957年盲目流入的没有户口的人就有71689人。<sup>②</sup>许多人被遣返回乡又复返回城，形成拉锯战。上海市在1957年春节期期间，花了很大气力清理了2000多灾民回乡，但不久他们又回来了，还带来了更多的人。到3月春耕期间，上海市还滞留有1.3万多名灾民不肯回乡生产。<sup>③</sup>另外，由于农村生存环境的劣化，在农村的职工家属迁入城市的，也较前些年大大增加。北京市1956年由农村迁入的20多万人口中大部分是职工家属；沈阳市1956年9月到1957年2月的半年中，由农村迁入16万余人，据10个派出所调查，职工家属即占到34%，比过去同一时期增长了1倍。<sup>④</sup>

就在1956年，受到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鼓舞，各部门各地区为了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五计划，一度又不适当地加大基本建设、生产和其他事业的计划，对劳动力的需求也随之加大。国家计委和劳动部为适应这种形势，下放了在计划外增加人员的批准权限，同时放宽了招工政策，允许招工单位按比例招用家居城镇或农村的职工家属。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区将招工权层层下放，不少企业事业单位不按计划随意增人，结果使职工人数增长失去控制，造成人、财、物的全面紧张。<sup>⑤</sup>

1956年全国职工人数比1955年末增加224万人，不仅大大突破了原计划增加84万人的指标，并且超过了1957年劳动力的需要量。<sup>⑥</sup>城市职工总数从1952年的1603万增加到1957年底的3101万，增加了1498万。<sup>⑦</sup>其中至少有几百万农业劳动力进入工厂和矿山就业。他们大多数是国家计划招工来的，也有不少是自发流入的。公安部在1957年5月的一份报告中，不无恼火地指出：“有些地区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劳动力未能充分加以组织，甚至有的还随便开给证明或迁徙证，让农民到城市找工作”；“有些企业、基本建设单位，不经过劳动部门审查批准，私自到农

<sup>①</sup> 《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关于各地执行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和紧缩城市人口工作中发生的问题及解决意见的报告》（1957年7月29日）。

<sup>②</sup> 《黑龙江省志·公安志》，第350页。

<sup>③</sup>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第2159期，1957年3月22日。

<sup>④</sup> 《公安部关于各地执行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和紧缩城市人口工作中发生问题及解决意见向国务院的报告》（1957年5月27日）。

<sup>⑤</sup> 《公安部关于各地执行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和紧缩城市人口工作中发生问题及解决意见向国务院的报告》（1957年5月27日）。

<sup>⑥</sup> 国务院《关于制止企事业单位盲目招收工人和职员的通知》（1957年1月12日）。

<sup>⑦</sup>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第123页。

村去招工，或者随便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sup>①</sup>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3月全国户口工作会议上部署的实施公民证的准备工作，也在8月间叫停了。<sup>②</sup>如此突然地放弃实行公民证制度，自然是出于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需要。

1949年到1957年，新中国就业人数新增加1300多万人，过去遗留的400万失业职工基本解决，但全国失业问题仍然很严重。<sup>③</sup>其中，如何安置城镇新生劳动力的问题最为急迫。1956年的城镇失业人员有212.9万；1957年仍有200.4万。<sup>④</sup>在这200万人中，既有过去遗留的失业无业人员问题，还有新增的就业人口，特别突出的是中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1957年，天津市约有5万多失业待业人员，其中仅不能升学就业的中学毕业生就有2万多人。<sup>⑤</sup>

鉴于当时经济发展出现的种种不正常情况，1956年6月，中共中央接受了周恩来、陈云等人反“冒进”的意见，正式提出了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sup>⑥</sup>根据这一精神，中央压缩了各项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并采取措施限制城镇人口急速增长。

1956年11月，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继续贯彻反“冒进”，确定1957年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鉴于1956年企业增人过多，国务院决定，1957年停止从社会上招收职工。<sup>⑦</sup>11月16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各级国家机关即日起一律停止增设新的机构、增加人员，有空额也不再补充。<sup>⑧</sup>

1957年4月，劳动部召开全国劳动力调配工作会议，对1956年“招工过多”的教训进行了深刻检讨，指出：“在我国生产尚不发达，人口众多的情况下，国家对于国民经济各部门职工人数增长的控制，只宜紧，不宜松，特别是对生产准备人员、间接生产人员和非生产人员的增长，尤需严加控制。”<sup>⑨</sup>

<sup>①</sup> 《公安部关于各地执行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和紧缩城市人口工作中发生问题及解决意见向国务院的报告》（1957年5月27日）。

<sup>②</sup> 《公安部第三局对贯彻全国户口工作会议中几个具体问题的公函》（1956年8月9日）。

<sup>③</sup> 宋平：《劳动就业问题》（195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44页。

<sup>④</sup> 《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第48页；另据有关部门估计，1956年8月，全国省辖市以上城市就大约有160万失业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未刊），第73页。

<sup>⑤</sup>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第2158期，1957年3月21日。

<sup>⑥</sup>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68～272页。

<sup>⑦</sup> 《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第50页。

<sup>⑧</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186页。

<sup>⑨</sup> 劳动部长马文瑞：《1957年的劳动力调配工作问题》（1957年4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150～153页。

为了减轻急剧增长的城市人口压力，参加农业劳动成为以后劳动就业的主要方向。从1957年起，政府就已经在大力提倡向农村转移城市劳动力的就业政策了。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劳动部门提出了控制城市人口的具体政策：加强城市的户口、粮票管理，继续劝导乡村人口不要迁入城市。企业尽可能不向农村招工，向职工宣传尽量把家属留在乡村，动员家属回乡生产，并且实行回家探亲的办法。动员青年劳动力和毕业学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sup>①</sup>

据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旅大、重庆、浙江、黑龙江等六市二省的统计，1955年至1956年间失业人员下乡插社和插场的，连同家属一起有86万人。从1955年到1957年，政府动员了7.9万多城镇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参加农业生产。<sup>②</sup>

实际上，从1956年秋季起，政府控制城市人口的措施一个比一个严厉了。到1957年，城乡人口流动的对冲性矛盾已显现出白热化的趋势。一方面，集体化后的农村人口推力极其强劲，对城市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为保障城市居民的就业和供给，极力制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一步步关闭了城市的大门。

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要切实劝阻农村的盲目外流人员。只有对于原住重灾区生活十分困难、外地又确有可以投靠的亲友或者已经找到工作，外出后生活不致发生困难的，才可以允许他们外出；但应当取得外出地区有关方面的确实证明，并事先办好工作移交和户口迁移等各项手续。工厂、矿山、铁路、交通、建筑等部门不应当私自招用农村剩余劳动力。<sup>③</sup>1957年1-3月，国务院又接连下发了几个专门的通知，严禁盲目招收各种工人或临时工。

1957年3月2日，国务院又发出了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要求各地政府必须“反复地、耐心地”“劝阻”农民外出进城。<sup>④</sup>

4月11日，公安部、粮食部下发《关于解决预约工、临时工的户口和粮食供应关系的联合通知》，明令限制临时工在城市用粮。

<sup>①</sup> 宋平：《劳动就业问题》（195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21～23页。

<sup>②</sup> 《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第46、59页。

<sup>③</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360页。

<sup>④</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362、363页。



5月27日，公安部向国务院报呈了劝止农民流入城市和紧缩城市人口的有关情况及其解决意见，国务院两月后正式批复转发执行，从户口登记和粮食供给两方面扎住了农民通过务工进入城市的渠道。

9月14日，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规定对盲目进城农民应采取随到随遣（返）的办法。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7月12日和9月27日，公安部还先后下达了关于当前治安工作的两个指示。指示要求：加强户口工作，严密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在户口迁移上，仍应严加控制。对于已经流入城市的农民、灾民、复员军人，则应及时动员说服他们回乡生产。其中个别无理取闹，屡教不改的，可以强制送回当地处理。此外，各城市对于流散在社会上的一些不务正业、屡教不改又不够判刑的流氓懒汉，必须继续进行收容，加强改造。<sup>①</sup>对于农村迁往城市的人口，应当坚决按照7月29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继续劝止农业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的报告执行，并对执行情况进行一次检查。<sup>②</sup>

各城市根据自己情况，大力进行了清理盲流人员的工作，将大批滞留城市的农民遣送回乡。如1957年北京市公安局制定了关于《控制入户内部掌握标准和手续的一些规定》，开展了“闲人返乡”的清理活动，全年市外迁入人数比1956年减少了16.4万人。在1957年内，上海市公安部门与其他部门合作，清查并动员了40万盲流人员回乡生产。<sup>③</sup>

在控制城市人口中，各城市相继整顿了公共户口，建立起公共户口中流动人口登记、统计制度。公安机关对户口迁徙的严格控制，是与单位体制配合进行的。如天津市规定，“为了有效地做好限制工作，派出所应依靠各单位的人事部门进行劝阻，凡符合登记常住户口条件者，先经本人单位审查同意，并在迁移证上注明盖章后，派出所再进行登记。已谋取正式职业的，应由其所在单位审查批准，并出具证明，再经市级或区级劳动部门审查同意，凭迁徙证登记常住户口。”<sup>④</sup>这表明，在执行中央严格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指示过程中，各城市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事先审批凭证落户的户口迁移管理制度。

尽管城市的大门上加上了一道又一道门锁，但是农民生存境遇的持续恶化，造

① 《中央公安部关于当前在治安方面应注意的几项工作》（1957年7月12日）。

② 《中央公安部关于当前在治安方面应注意的几项工作的指示》（1957年9月27日）。

③ 《北京志·公安志》，第370页；《上海公安志》，第28页。

④ 天津市公安局：《从户口方面劝阻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天津市的几点规定》（1957年6月），《天津通志·公安志》，第546页。

成的农村人口推力过于强大，这是很难一下子阻挡住的。1957年春天，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情况再度反弹。仅据北京、江苏九个省、市和新疆等地不完整材料统计，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约有20余万人。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员，大部分是农民，也有小县城的贫民、复员军人和不少乡村社的干部。有的地方，农村社队干部和青壮年都外出了，土地无人耕种。流入城市的农民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严重地影响了城市治安和社会秩序。<sup>①</sup>此外，城市原已经安置到农村、边疆的知识青年和外迁居民，也有不少人不同意当地的生活，又倒流回城。到1957年秋天，山东、江苏、河南、河北等省又发生了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现象。

1957年12月，中央连续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了关于劳动招工计划和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等问题，通过并下达了阻止农村人口外流的两个重要文件。

一个文件是12月12日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企业、事业、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需用的临时工，必须贯彻先城市，后农村的原则，尽量使用城市剩余劳动力，少从农村招工。需要从农村招用临时工的，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批准，由当地劳动部门统一布置，在县、乡人民委员会的指导下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协商招用，并由招用单位与农业社和被招社员共同签订劳动合同。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从此，严格控制招工批准手续，成为用工制度的一项基本政策。<sup>②</sup>

第二个文件是12月18日由内务部内部下达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其要点是：(1)本地的乡政府和合作社不得给外流人员随便开发证明信件；(2)在铁路沿线或交通要道严格盘查和劝阻外流人员；(3)城市和工厂区对“盲流”必须动员他们返回原籍，并严禁流浪乞讨。在农村人口流入较多的大城市设置收容所，“临时收容，集中送回原籍”；(4)一切用人单位一律不得擅自招用工人或者临时工；(5)对于由外地流入本地农村的人，尚未安置的，也应当动员他们返回原籍。<sup>③</sup>

<sup>①</sup> 《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通知》(1957年3月2日)，《劳动通讯》综合报道：《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现象非常严重》(195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351～352页、364～366页。

<sup>②</sup> 《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第12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未刊)，第349页。

<sup>③</sup> 为了避免被遣返农民很快又跑回城里来，1958年2月25日，国务院还进一步发出通知规定：“遣返农民应送至离其家乡最近的一站，不应只送至中途或超程远送省会”，并做好交接工作。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未刊)，第24页、349页。

在限制农民进城和压缩招工数量的同时，中共中央对干部制度、复员军人政策等也作了相应调整。

1957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今后干部工作方法的通知》，提出：各级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一律停止增设机构和增加人员，所有企业、事业单位的非生产人员必须严格地加以限制；对生产人员脱离生产，必须严加控制，各地基本上不应该再从农村中录用脱离生产的干部，个别确实需要的，须经省委或省委指定的机关批准。各地贯彻《通知》精神，大大压缩干部吸收录用计划，抑制了干部队伍的进一步膨胀。1957年全国总共增加干部5万名，仅是1956年的4%。<sup>①</sup>另外，在反右派运动开展以后，中央国家机关部门和地方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结合清理右派分子，精简机构，下放了大批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这对于限制农村人口进城政策的落实，也是很有影响力的。

在向城市盲目流动的农民队伍中，有不少是复员军人。他们往往成为流民队伍的骨干分子，让政府处理起来非常棘手。1957年，国务院对复员军人政策作出规定：士兵退役称为复员，由民政部门负责安置；担任军官职务的排以上干部退役后称为转业，由人事部门负责安置。并把军队转业干部的安置纳入全国人事工作规划。<sup>②</sup>1958年，国家进一步调整了复员军人的安置政策，确定了“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的安置原则。国务院在2月16日的通知中规定：军官本人和家属的家均不在城市的，应动员回乡安家。<sup>③</sup>这就堵住了农村人进城的另一条路线，一个人的出生地基本上决定了他的未来的归宿。

在1957年之后，公安部门的户籍治安管理功能基本上实现了从政治控制到社会控制的转变。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对宪法规定的公民居住自由和迁徙自由作出了新的解释。在实行限制农村人口到城市落户的政策后，引起不少职工和群众的强烈不满。仅公安部1956年即收到群众为解决户口问题的来信来访达1100余次，1957年上半年第一季度更达827次。群众以宪法和法律为据，质问有关部门：“这是不是违反宪法和侵犯人权？”“这算什么仁政？”<sup>④</sup>在整风鸣放中，许多言论都提到了保障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的问题。为此，公安部在1957年5月27日给国务院的报告中，首次对宪法

① 张志坚主编：《当代中国的人事管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127页。

② 《当代中国的人事管理》，第218页。

③ 《国务院关于军官家属在城市安家问题的通知》（1958年2月16日）。

④ 《公安部关于各地执行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和紧缩城市人口工作中发生问题及解决意见向国务院的报告》（1957年5月27日）。



规定的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作出新的解释：当前控制城市人口不但符合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也符合广大群众目前的利益……正是为了保障公民真正居住迁徙自由的一种正确措施。11月20日，《人民公安》杂志1957年第16期上，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解答。认为：宪法上所指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是指不违背国家、人民利益下的自由，而不是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绝对自由。所以，不准随便迁移户口，不违背宪法的规定。<sup>①</sup>这个非常勉强的解释逻辑，为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所沿用。这就为通过户籍制度控制社会提供了新的法理根据。

第二，在重点人口管理上的社会性人口成分增加。重点人口管理是中国当代户籍制度实施政治控制的主要部分。公安部1956年3月颁布的《关于重点人口管理工作的暂行规定》，其重点是历史反革命分子、敌对阶级和政治嫌疑分子。但无论是在统购统销和集体化出现的骚乱，还是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发生的社会治安案件中，都没有多少政治因素。所以，在公安部修改并于1957年11月10日颁布的《关于重点人口管理工作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现实活动重于历史问题”的原则，重点加强对现行反革命可疑分子和刑事犯罪可疑分子的控制。所划定的重点人口的范围中，除了过去已有的“尚未得到改造的反革命分子和阶级敌对分子”外，特别增加了曾经是和可能会煽动群众骚乱、闹事的可疑分子，被单位开除和清洗人员中有严重不满情绪分子等。各地公安机关结合全国反右派运动和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整顿和加强了对社会重点人口的控制。

第三，采取更为严厉的清理流民、收容遣送和户口管理政策。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城市游民就进行清查和收容改造工作，目的要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政策比较宽松。直到1955年，公安部还明确反对把搜捕刑事犯罪分子与收容游民合并在一起搞。认为：“把这两类对象一起处理，会使打击重点混淆不清，造成混乱，在掌握上也确有困难”。收容改造工作必须做，但搞得太急了也会造成被动。还批评了青岛把收容对象捕起来，强迫劳改的做法。<sup>②</sup>但从1957年起，公安机关对游民一律采取强制收容和劳教的措施。广东省清查外来人口的做法是“凡是北方跑来的，调查无着落，先把他捉起来劳动教养审查”。查清没有问题属于盲目流动没有户口证明的人员，一般地动员其回乡生产……凡是来历不明没有正式证

<sup>①</sup> 公安部三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资料汇编》第2册，第368页、372～373页。

<sup>②</sup> 周兴：《在全国刑事侦察会议上的报告》（1955年2月21日）。

明文件者一律不得招用。<sup>①</sup>公安部肯定了广东省的做法。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颁布以后，全国各地开展了清理外来人口的“肃残”运动（肃清外流人员中残余反革命分子）。按照公安部要求，肃清外逃反革命分子必须与户口登记等社会面控制密切结合起来。“除了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外逃反革命分子以外，还应当引导群众揭发批判在户口登记上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和犯罪行为，形成遵守法律和纪律的一种声势”。<sup>②</sup>由此，公安机关通过对散落在社会上的游民分子进行收容审查等工作，强化了户口管制功能。

可见，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城乡二元利益格局的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为减轻城市人口压力，政府阻止农民进城的各种措施也就越发严厉起来。一头是关住城市大门。从户口管理、粮油供应、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全面控制外来人口的进入；另一头是拴住农民的腿。从过去的“资助”返乡，到“劝止”进城，进而实行“收容”，予以强制“遣返”。在农民“盲流”大军屡禁不止的情况下，为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政府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连续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强硬措施，以行政手段构建起了一个城乡隔离带。并促使国家出台相应的法规，将限制人口自由迁徙的功能纳入了户籍管理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化了已经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

##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确立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以毛泽东名义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条例》以法律形式规范了全国的户口登记制度，既是新中国户籍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也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确立的标志。在统购统销、合作化运动中形成的城乡二元利益格局，最终以行政和法律的方式强行固定下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形成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逻辑。但中国当代户籍制度建立过程峻急，深受政治运动的政策影响，权力意志的因素更重于制度理性的因素。相比苏联的户籍制度，虽然都是城乡二元分割的性质，但中国当代户籍管理的制度化程度较低，规范性和稳定性更逊之。

《条例》以法律的形式对户籍管理的宗旨、户口登记的范围、主管户口登记的

<sup>①</sup> 《公安部转发广东省委批转省公安厅关于清查隐藏在外来人口中的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报告》（1958年1月）。

<sup>②</sup> 《公安部转发杨奇清副部长在七省市公安厅局长汇报会议上的发言》（1958年1月22日）。

机关、户口簿的作用、户口申报与注销、户口迁移及手续、常住人口与暂住登记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户口登记的内容，城镇实行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更正等七项登记；农村实行常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等五项登记。制定该条例，固然有准确地及时地掌握全国人口的数据、证明公民身份、便于治安管理需要，但酝酿多年的《条例》此时的匆匆出台，首先还是为了“制止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正如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对户口登记条例的说明中所讲的：出台《条例》的主要目的，是“既不能让城市劳动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让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他还批评有的城市机关、单位“私自招工”，“向农村索要户口”，或让“从农村盲目流入城市没有户口的人员”长期居住。<sup>①</sup>

《条例》的第10条第2款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sup>②</sup>这反映了急于出台《条例》的真正意图——阻挡住自1956年以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浪更比一浪高的农民流动大潮，以行政法律手段建构起一个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制度壁垒。

《条例》明确规定了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这是控制人口迁徙的两项基本制度。公民要求由农村迁入城市的，必须首先向城市拟迁入地的户口登记机关申请迁入。城市户口登记机关审查合格后，签发“准予迁入的证明”。申请人拿到准迁证明后，到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迁出。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验证无误，则给办理相关迁出手续，交本人再回到迁入地的户口登记机关办理迁入手续。为防止出现有人长期滞留外地的情况，《条例》还对于公民外出暂住时间作出了限定，一般不得超过3个月。<sup>③</sup>这些制度规定，彻底改变了建国以来人口自由迁移的政策法规。

《条例》是户籍管理的基本法律依据，标志着以城乡分割为基本特征的户籍制度正式形成。《条例》对农民进城、公民外出和暂住的限制，无疑是与宪法规定的“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条款相抵触的。对此，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从国家利益的角度予以解释说：“这种抵触，并不是限制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这是因为宪法所规定的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不是无政府状态；是广大人民的自由，不是少数人的个人绝对自由。”“限制少数人这种不合理的盲目流动迁徙‘自由’，正

<sup>①</sup> 罗瑞卿：《关于户口登记条例草案的说明》（1958年1月9日），《人民日报》1958年1月10日。

<sup>②</sup>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58年1月9日）。

<sup>③</sup> 《公安部关于户口登记条例中几项条款具体执行意见的通知》（1958年1月10日）。



是为了保护多数人正当的居住和迁徙自由”。<sup>①</sup>这个说法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解释，实际上不仅限制了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而且还限制了全体公民的基本权利。

《条例》确立的城乡二元管理的户籍制度，为制止农村人口外流和紧缩城市人口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手段。农村地区，主要通过对迁出和外出人口管理加以控制，对没有城市证明的人，一律不发给迁徙证，对盲目外出到城市的则予以劝止。城市主要通过对迁人和暂住人口的管理加以控制，对不应迁入城市的一律不发给准予迁入的证明，对盲目来城市暂住和暂住超过三个月不需要继续暂住的人口，坚决动员返回常住地。但是，控制农民流入城市的逻辑的延伸，必然会带来不同城市之间的限制。公安部门规定：“公民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迁徙，不需要事先取得迁入地准予迁入的证明，但为控制人口盲目流动，应当掌握由较大城市迁到较小城市从宽，由较小城市迁到较大城市从严的精神”。<sup>②</sup>从以后的实际情况看，不仅向更高级别城市的居民迁徙被严格限制，就是同级城市之间的迁徙也相当困难。同为城镇居民，也因居住地的不同而被设定了身份上的差异。在限制农民的同时，也限制了市民。人们居住自由和迁徙自由的公民权利，为计划经济的行政意志逐步封杀了。然而，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下，最高决策者们既要从农业最大化地提取工业化的积累，又要保护城市的稳定，除了用法律和行政手段把农民挡在城外，也实在难有别的选择。

《条例》把农民限制在土地上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和保护城市的人口管理思路，与苏联当时管束农民的情况是大体一致的。从理论上讲，国家可以根据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合理调配劳动用工指标，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地吸纳城乡劳动力。苏联的工业化过程实际也是这样做的。但是，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兴起，出台《条例》以限制农村人口外流的意图没有能够贯彻下去。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中央仍然继续强调要严格控制增加职工。毛泽东主席在会上还对1956年招工过多进行了批评。但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掀起了“大跃进”高潮，造成了到处都喊人手短缺的虚假需求。这给人们一种错觉，以为“大跃进”运动使“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失业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sup>③</sup>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放权，招工放任自流，大批农民进城做工。1958年一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猛增到4532万人，比上年度增加了2081万职工，等于前8年净增职工人数总和的1.26倍。城镇人口净增长2066万人。据统计，这

① 罗瑞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草案的说明》（1958年1月9日）。

② 《公安部三局关于执行户口登记条例的初步意见》（1958年4月）。

③ 《解决“三农”问题之路》，第465页。

一年新增的职工，从社会招收的有 1661 万人，占 80%；而其中从城市招收的只有 557 万人，占 26.7%；从农村招收的有 1104 万人，占 53%。<sup>①</sup>

随着吃商品粮的人口大幅度增长，国家不得不提高粮食征购率，以增加城市的粮食供应。在 1959 年、1960 年两年粮食产量连续减产的情况下，粮食净征购量仍提高到粮食总产量的 28% 和 21%，远高于 1957 年 17.4% 的水平。<sup>②</sup>

在发动“大跃进”的同时，毛泽东又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是把工、农、商、学、兵融为一体的“政社合一”的农村基层组织。毛泽东希望“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sup>③</sup> 人民公社体制使农村人口的户籍管理有了可靠的行政手段，成为长期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的一项制度安排。

“大跃进”造成了全国城乡大饥馑，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数千万人。政府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全面调整残破的国民经济。在城乡粮食严重匮乏的严峻形势下，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大量精简职工队伍，紧缩城镇人口，将近年新招的职工送回农村，增加农业劳动力。从 1961 年至 1963 年，全国共精简职工 2546 万人，回农村的有 1641 万人，占 67%。<sup>④</sup> 毛泽东在 1962 年 8 月的北戴河会议上自豪地讲：“2000 万人。招之即来，遣之即去，没有共产党，哪一个党能办这样的事情。”<sup>⑤</sup> 而共产党能办成这种事情，正是因为建立了一套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

在食品严重短缺的困难时期，城镇居民的食品及大多数日用消费品实行配给制，以户口凭票证供应。在公安部门的人口统计中把是否吃国家计划供应的商品粮作为划分户口性质的标准，城镇居民户属于“非农业户口”，实行“农业”与“非农”户籍分立的管理方式。<sup>⑥</sup>

同时，国家对城镇户口的控制更加严格，对向大城市迁徙更是实行特别控制。许多地方的户口迁徙是由党委直接控制的。

1964 年 8 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文件规定：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从小城市迁往大城

① 《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50、130 页。

② 董辅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35 页。

③ 毛泽东：《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 年）初稿的批语和修改》（1958 年 11 月）。

④ 《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32 页。

⑤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第 571 页。

⑥ 殷志静、郁奇虹著：《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5 页。

市，从其他城市迁往北京、上海两市的，要适当限制。这不仅堵死了农村向城镇、城镇向城市迁徙的大门，实际上也把小城市向大中城市、大中城市向特大城市的迁徙道路也给限制住了。国家给民众划定的迁徙路线图，只能是从大到小，从城到乡，逐层递减。

为了严格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国家不仅堵死了农民投亲靠友的迁徙途径，还扎住了夫妇随迁的口子。1964年有关部门明确规定：农村妇女要求迁往城市投靠丈夫的问题，数量很大，情况复杂，不能放开口子。<sup>①</sup>这个似乎不近人情的无奈之举，彻底关上了城市大门的最后一个缝隙。再加之孩子户口随母落户等政策规定，使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婚姻链条基本上切断了。

调整时期严重的短缺经济，使户籍因素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渗透，户口注册登记功能向利益分配功能全面异化。生活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供给、教育、就业、住房、劳保和其他社会福利的提供，无不以户口的属地和职业性质为依据。由此，以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为中心，附着了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生产资料供给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婚姻生育制度等十几项制度，从而构建了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壁垒。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为国家提供粮食，成为传统纳贡体制的一个现代变种。在政治控制方面，中国当代户籍制度在60年代的确立，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和城市单位体制互为表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中，完善了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重点人口的监控手段，构成了严密的社会控制网络。

## 结语

中国当代户籍制度衍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而剥夺农民提供原始积累的斯大林式工业化模式，形成于建立计划体制的50年代后期，在60年代初严重经济危机中得以最终确立。但相比苏联通过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很快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历史过程，中国在建立了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后，却没有按照计划经济的理性逻辑实现工业化的人口有序转移，反而使其搁浅于群众运动的“大跃进”。“大跃进”运动的骤起骤败，使城乡关系较前更加紧张。为应对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国家不得不加倍强化户籍管理的制度刚性，严格限制城乡人口的迁徙和流

<sup>①</sup> 《公安部三局关于贯彻执行“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若干具体问题的报告》（1964年11月24日）。



动，以保障严重短缺条件下的资源分配。可见，中国当代户籍制度从形成、建立到确立的过程，是在既消灭了市场，计划又失灵的混乱情况下，由一系列意外事件构成的短缺经济下的被动选择。它的确立，不仅人为地割裂了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造成了城镇居民与农民的公民身份的不平等，而且成为继续制造经济短缺的一项制度条件，同时也为大规模政治运动——“四清”和“文革”的发生——提供了一个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的机制。

## 新中国新闻报刊统制机制的形成经过

以建国前后王芸生的“投降”与《大公报》改造为例

杨奎松\*

**摘要** 1948年底,《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应中共中央之邀北上参加新政协。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指示从内部夺取天津《大公报》,使之脱离大公报社。新中国建国前夕,《大公报》的政治命运可谓危若垒卵。王芸生临机应变,终于逢凶化吉,保住了上海《大公报》得以继续发行。但是,在新社会和新制度等种种新形势下,《大公报》的经营、管理、地位及前途依旧危机重重。重庆《大公报》资不抵债,被迫交由政府办成党报,同样必须要靠政府资金支持的上海《大公报》实际上也已经在上海市政府报刊合并计划的名单之中了。王芸生在“三反”运动中的出色表现,以及《大公报》在工商界中的影响力,最终挽救了上海《大公报》。尽管,《大公报》从此再也不是过去的《大公报》了,但至少它又一次保住了它的这块招牌,而且还得以存活了十几年的时间。

**关键词** 王芸生 大公报 新闻报刊 思想改造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sup>①</sup>共产党人相信,新闻报刊从来都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政党手中,用以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有力的

\* 作者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①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50页。



1961年大公报报影。

工具。<sup>①</sup>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报刊就理当是党的组织的喉舌。<sup>②</sup>因为“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从而最有利于达成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和组织群众的政治目的。<sup>③</sup>因此，共产党人一旦握有政治权力，一定会把一切新闻报刊，乃至其他各种可能被用来进行思想宣传的传播手段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采取一种从传媒到文化到思想的严格的统制政策。中共从在江西等地创立根据地，开始握有政权之日起，在一切割据之区域即无不如此行事。即使是抗战期间奉行“三三制”，公开承认其他党派可在陕甘宁边区办党办报的情况下，根据地的新闻报刊实际上也仍旧实行的是一元化的党化管理的做法，保持着高度的舆论一律。

但是，当中共开始在全中国创立新政权之际，却不得不面对一种全然不同的局

① 参见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创刊号发刊词，1930年8月15日。

②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9～105页；《致读者》，《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第1版。

③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317～1320页。



面。这是因为，新中国最初实行的是“联合政府”，基于在全社会范围内体现这一统战政策的现实需要，中共显然不能简单地出于舆论一律的目的，对一切传播机构实行党化管理，而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允许一部分私营媒体继续存在一个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这些私营媒体受到有效控制，使之服从于自己的政治宣传目标，就成为对中共能否有效推行新闻统制政策的一种重大挑战。事实证明，新政权的应对是相当成功的。依据抗战期间在政权建设上实行的“三三制”的办法，<sup>①</sup>它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创办党报党刊，起舆论主导作用；一方面将部分私营大报大刊改组或改造成进步的“民主报刊”，以与党报党刊相配合；同时保留少部分具有中间性质，主要用于满足一般“落后市民”文化娱乐需要的纯文化类报纸杂志，成功地达成了两相兼顾的政治目标。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新闻史著作深入考察过在这样一种复杂情况下新政权破旧立新，成功施行新闻统制政策的具体经过。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建国前后中共利用统战政策促使王芸生改变政治立场，进而通过王芸生对在中国新闻行业中影响最大的私营报刊《大公报》成功改造的案例，对新政权改造旧报旧刊的方法和情形，做一历史的考察与剖析。

本文选择报人王芸生和《大公报》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是因为前人在这方面留下了较多的回忆史料，并已有相当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因为，已有的关于建国前后王芸生转变和《大公报》改造的研究成果，都还只是建立在报刊资料和回忆史料的基础上，鲜有利用到第一手的档案史料，因而对这段历史的复杂情况，甚至对许多史实，常常不是说法各异，就是过于简略，语焉不详。据此，本文拟依据已经开放的档案史料，勾勒出建国前后王芸生政治转变和《大公报》被改造的曲折经过与复杂情形，以便使众多关心新中国新闻史的读者能够了解到新政权是如何在新闻报刊领域中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的。

### 天津《大公报》缘何“革命”？

《大公报》，自1930年代以来，在中国开设的报馆数、发行量、言论影响及其在政治和社会中的声望，都称得上是中国报刊界的“龙头老大”。它甚至还是中国

<sup>①</sup> 即所谓统一战线政权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见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年3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736页。

唯一在国际上得到过密苏里新闻奖的一份报纸。<sup>①</sup>和那些在中共新政权建立之后注定要被关闭的，有着国民党官方背景的报纸不同，始终以私营和中立为标榜的《大公报》照理应当能够搭上中共统战政策之车，跨进新中国的那道门槛。但是，实际上的情况却并不那样简单，《大公报》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命运可谓是一波三折。

1948年初夏，国共战争已进入最后关头，中共军事上气势如虹，节节胜利，国民党眼看大势已去。各民主党派及社会名流纷纷开始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准备参加新政协，共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代理宣传部长的恽逸群却突然推出《蒋党内幕》<sup>②</sup>一书，

在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种种丑陋内幕的同时，专门把《大公报》挑出来痛加批判。书中把自视为立场中立的《大公报》定性为反动政学会的机关报，指责《大公报》一直明里暗里地帮助国民党蒋介石，维护其反动统治。文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就已经开始“与蒋介石合作”。到1933年，“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群僚，各院部会长以下到者数百人，首席的主客却是《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蒋介石对他推崇备至，与席者大有‘韩信拜将，一军皆惊’之慨。”张季鸾从此成为蒋的顾问，可以不待预约通报，直接见蒋。《大公报》也投桃报李，“小骂大帮忙”，“表面上使读者觉得它颇为公正，并不偏袒蒋政府，实际上则偏袒得最有力，最有效果。”在各种关键的历史时刻，它都巧妙地站出来给蒋介石帮忙。《大公报》也因此“成为蒋介石每天唯一阅读的报纸”，并因此可以从国民党那里得到种种其他报纸所得不到的好处。它“不直接拿国民党的津贴，但比接受津贴的报纸要多得实惠数百倍以至千倍。”仅日本投降前经特批按最低官价20元法币兑换1美元的标



青年时代的王芸生。

<sup>①</sup> 1941年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将当年度新闻奖授予中国的《大公报》，以赞赏该报作为一张自由报纸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对公众舆论所做出的贡献。见《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赠本报荣誉奖章》，《大公报》（重庆），1941年4月17日，第2版。

<sup>②</sup> 建国后出版时书名改为《蒋党真相》。



准从财政部获得 20 万美元的外汇一项，在当时美元市价要 3000 元法币兑换 1 美元的情况下，《大公报》就等于是把 400 万元法币一下子变成了 6 亿元。“其所得超过一千个职员全年的薪金，比《大公报》全年的开支要大几倍”。<sup>①</sup>

《大公报》这时的总编辑王芸生心里非常清楚，恽逸群所以如此痛恨《大公报》，根本上是《大公报》给人印象，这些年来和蒋介石走得过近，得到过太多好处，在立场和言论上不能不处处替事实上的中央政府着想。《大公报》为此甚至常常和其他私营报纸唱反调，以至于国民党几度查封报刊，它却都能稳坐钓鱼台。

不仅如此，《大公报》还因为想要维护中央政府的地位与权威，不止一次得罪过共产党。尤其是 1940 年代以来，围绕着国共之间的纷争，无论是张季鸾，还是王芸生主笔时代，《大公报》都曾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上，直接或间接地批评过中共，甚至在蒋介石或国民党有关机构授意下写文章帮当局说话。<sup>②</sup>1945 年抗战结束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之际，王芸生不仅当面劝告毛泽东，万不可脱离中央政府，“另起炉灶”，甚至还撰文批评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词中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来比量，有明显的帝王思想。<sup>③</sup>如今斗转星移，共产党即将统治中国，恽逸群的书明显的是代表中共给《大公报》做了政治定性。而把《大公报》与国民党蒋介石视为同类，事实上无异于在政治上宣布了《大公报》的死刑。

王芸生贫苦出身，性格内向，不善于交际，但相当有才气，也因此敏感而自傲。<sup>④</sup>他能够在《大公报》取得如此地位与名望，十分不易，自然会把《大公报》看成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本。《大公报》如今眼看要毁在自己手里，王芸生精神上和心理上压力之大，情感上之难以接受，可想而知。据身为《大公报》社评委员，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李纯青回忆，王芸生这段时间完全是一副病态，魂不守舍，整日里长吁短叹，有时甚至连话都说不完整了。他总是一会儿自言自语，说：“国民党完了！”一会儿又唉声叹气地冒出一句，说：“没有出路了！”无论李纯青怎

① 翊勋（恽逸群）：《三十年来见闻杂记蒋党真相》，武汉，华中新华书店，1948 年，第 46～48 页。

② 最著名的就是 1941 年 5 月王芸生因为中条山战役公开撰文批评共产党，以至于和周恩来所发生的笔战。另如 1947 年“五·二〇”学潮发生时，国民党新闻党团遵照国民党中宣部指示，商请上海《大公报》撰写关于学潮问题之社论，主张学潮应迅速平息，《大公报》即据此发表了《论学潮》等社评，委婉表达了当权者的意见主张。转见张济顺：《经历国共交替：1949 年前后的执政党与上海报界》，新中国建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香港中文大学 2009 年 6 月；《论学潮》（社评），上海《大公报》，1947 年 5 月 19 日；《学潮演变可虑》（社评），上海《大公报》，1947 年 5 月 22 日。

③ 王芸生、曹谷冰：《1926 至 1949 年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 27 辑，第 154 页。转见陈建云：《大变局中的民间报人与报刊》，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88～89 页。

④ 可参见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年，第 230 页；李纯青：《笔耕五十年》，北京：三联书店，1994 年，第 510 页。



表 1 解放后市内出版报纸情况一览表

报纸名称	创刊日期	停刊日期	主办单位	地址	备注
天津日报	1949-01-17	——	中共天津市委	——	——
进步日报	1949-02-27	1952-12-31	——	——	民营
天津公安报	1949-04	2000-12	市公安局	——	——
天津青年报	1949-06-12	——	共青团天津市委	——	——
天津工人日报	1952-05-01	1960-06-01	天津市总工会	——	——
新晚报	1953	1960	——	——	——
天津广播电视报	1955	——	市广播电视局	——	——
天津晚报	1960	1966	——	——	——
科学园地报	1963	1966	市科协	——	——
天津科技报	1979	1985-01-01	市科协	——	——
今晚报	1984-07-01	——	市委宣传部	天津日报社内	后迁至南京路
开发报	1985-01-01	——	市科协	——	——
家庭报	1985-09-05	——	市计生委	——	——
今日和平	2000-01-01	——	中共和平区委	长春道庆泰里3 门601室	——
天津政法报	2001-01-01	——	市政法委	——	——

解放后境内出版报纸情况一览表。

么劝解，包括提示他投向中共，他听了都只是摇头。他早已没了自信，不相信共产党会接受他，而是再三表示：“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sup>①</sup>

在1948年的这段时间里，中共中央虽然已经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发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筹组联合政府的呼吁，并且在9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要准备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的问题，但由于这个时候中共中央还没有估计到国民党在军事上会垮得那么快，因此，它还没有做好进入大城市和全面接收、重建新闻报刊行业的准备。恽逸群和李纯青的工作步调显然并不十分协调。这边恽逸群公开宣判了《大公报》的死刑，那边李纯青，以及另一位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大公报》女记者，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杨刚，却在尽可能多地动员社会贤达都北上到中共的解放区去，参加政协，包括做《大公报》主编王芸生的工作。他们甚至告诉王芸生称，是毛泽东点名邀请王芸生北上的，并许诺，在新政权下《大公报》可以做到“沪、津、渝、港四馆不易名、不换人，照原样出版”。<sup>②</sup>不难想象，能够得到这样的消息，王芸生自然喜出望外。他很快即表态称：“甘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随后，他马上与李纯青等秘密布置，做好了倒向中共一方的准备，

① 李纯青：《笔耕五十年》，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532～533页。

② 转见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75页。

同时也开始准备经由香港北上中共解放区。<sup>①</sup>

就在王芸生抵达香港，与中共香港党组织接洽好，准备登船北上之际，中共中央对《大公报》的态度却因为形势估计的变化，而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1948年11月，随着山东济南战役和辽沈战役很快取得胜利，毛泽东开始着手组织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准备一举解决国民党在华北的全部主力。中共中央也因此对胜利到来的时间有了新的估计。毛泽东通知全党负责同志：“我全军九十两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改变了敌我形势。”“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正规师，基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sup>②</sup>

一年左右要全面夺取全国政权，这意味着中共必须要马上着手准备进入和接管大城市。鉴于新闻报刊必须严格管控，但又需要顾及统一战线和将要建立联合政府的现实，中共中央于11月8日正式发布了相关的指示。说明：“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能采取对待生产事业那样的保护和扶持的政策。它同时又要求各占领机关对大中城市中存在的对城市人民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必须区别情况，“凡属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系统下的各机关、各反动党派（如国民党各个反动派系、青年党、民社党等）及反动军队的各级组织所出版及发行的”，包括“有明显而确实的反动政治背景，又曾进行系统的反动宣传”的私人经营的报刊与通讯社，“连同其一切设备与资财，应一律予以接收，并不得再以原名复刊或发稿。”凡属进步的，或中间性的报刊和通讯社，包括新发行的报纸刊物，向政府登记并取得批准后，允许出版。<sup>③</sup>

为了迅速了解全国各大报刊的情况，制定相应的接收和管控方案，中共中央这时紧急召集了杨刚、宦乡等在新闻界工作的中共党员，到中共中央当时所在的河北平山西柏坡村，向他们了解相关情况，并讨论研究处置办法。讨论结果，不仅认定

① 李纯青：《笔耕五十年》，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533页。

② 《毛泽东关于再有一年左右即可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统治的估计》，1948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卷，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78～479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1948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745～749页。

《大公报》有国民党“官僚资本”<sup>①</sup>的背景，而且肯定了恽逸群对《大公报》的政治定性，故中共中央已初步决定“不让其继续出版”。考虑到各大城市中，除可以利用没收接管的办法，将国民党背景的报纸直接接收过来作为本地党报出版以外，讨论还明确了各地均应切实保证本地要有一党外民主报纸配合党报工作的方针。<sup>②</sup>

就在杨刚等人来到西柏坡后不久，平津战役打响了。很快，1949年1月14日中共军队就成功攻占了天津城。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进城伊始，就明令天津原有各报馆，不得出报出刊。对此，中共中央17日去电指示称：对天津的报纸刊物，不要笼统下令查封，“可采取拖的办法，既不给予合法地位，亦不忙于封闭，而令其报告并从旁调查，待查明后再行决定”办法。由于中共中央这时最熟悉的的就是天津《新星报》、《益世报》、《大公报》这三大报纸，因此它给出的办法是：“新星是李宗仁的报，应即实行封闭，只要证据充足，即应实行没收。益世是天主教的报，常常公开表示反共，应首先以其反共反人民停止其出版，但勿牵涉到宗教问题……不要没收其财产，因该报在国内有相当地位，言论尚非极端反动，其财产有限，不必因此给中外天主教一个反共的借口”。对于《大公报》，因为周恩来很清楚天津大公报馆内部地下党员人数多，且多为其南方局旧部，故明确指示对《大公报》可“从内部革命，加入外力，利用其原有资财、班底，发表宣言，改换名称，组成进步分子的报纸，使平津解放后除党报外有一党外的民主报纸配合。”<sup>③</sup>

不过，由于中共中央这时对天津总的报刊情况调查尚不深入，包括对《新星报》的切实背景亦不是十分清楚，故当天津市委回电对此提出疑问后，它又不得不去电说明：“对《新星报》应搜集其确系国民党李宗仁机关报的证据宣告没收，如

<sup>①</sup> 大公报社股东中新记公司创办人吴鼎昌因被蒋介石延揽成为国民党高官，故其股份即被定为“官僚资本”。据李纯青回忆，吴的股份当时占大公报股份的四分之一。但据王鹏考察相关史料，认为吴的股份在大公报1948年6万股中，只有不足1万股，即9750股，即不足六分之一。分别见李纯青：《笔耕五十年》，第536页；王鹏：《大公报的资金与股份变动情况》，《百年潮》2001年第8期。另据上档所藏李纯青（1950？年）12月11日致陈虞孙函附了一份“关于吴达诠、吴前溪两户股款的说明”，内称：大公报股份总额六万股，其中吴达诠、吴前溪两户共计九千七百五十股，占总额的16.25%。另据大公报1948年股东清册，吴达诠6350股；吴前溪3400股（吴达诠另户）。故李纯青这里的记忆可能不尽准确。

<sup>②</sup> 《中央对处理天津广播事业、报纸及登记国民党党员等问题给天津市委的指示》，1949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第774页。

<sup>③</sup> 天津《大公报》这时有地下党员近十人之多。其中包括市政党委委员李定、傅作义之女傅冬菊，以及杨胡邦定、李光治、刘桂良、徐盈、彭子冈、谭文瑞等。见李定：《在〈大公报〉工作的情况回忆》，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天津解放纪实》，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第260页；《中央对处理天津广播事业、报纸及登记国民党党员等问题给天津市委的指示》，1949年1月17日。



有疑点再向中央请示。”“对《益世报》虽已没收，亦须搜集罪证，以备宣布理由。”惟对《大公报》，中共中央坚持原先部署，并任命杨刚负责领导改组天津《大公报》为进步的“民主报纸”的工作。它在19日的指示中明确要求天津方面应在表面上显示和缓，用以稳定天津大公报馆的人心，暗中“经过其内部人员设法使其资财不致逃匿，以待杨刚等前来由该报内部解决，实行革命”。<sup>①</sup>

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已批准将天津《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另行出版，并要求杨刚、徐盈、宦乡等搜集《大公报》，尤其是天津《大公报》几年来的“反动言论”，编辑成册，做好了“内部革命”的舆论准备。同时决定：一、按私营企业对待《大公报》，政府不予接管；二、发动《大公报》职工对该报进行批判；三、在天津《大公报》基础上改组易名；四、由全体职工选举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五、以全体职工名义，发表宣言，宣布新生。<sup>②</sup>

在杨刚等动身前往天津后，中共中央即指示天津市委：“可即以接收其中官僚资本股份名义找该报经理公开谈判改组，指出该报过去对蒋一贯小骂大帮忙，如不改组不能出版，以便和徐盈、杨刚等里应外合。”<sup>③</sup>中共中央宣传部及新华总社随即也电告天津市委等：对于天津市党报和私营报纸，新华社天津分社可逐日提供国内外新闻和其他稿件。对有关宣传方针与新闻写作的业务指示，对党报与非党报纸虽应有所区分。但“现在已经正式准予出版的，非党的私营的报社向我索取时，在取得市委宣传部与总社同意后，亦可同样发给。”特别是对天津即将出版的《进步日报》，应给予较特别的待遇，不仅应发总社的各项指示，而且“他们对于总社有何询问要求和意见，分社亦应负责代转。”<sup>④</sup>

1949年1月下旬，杨刚、宦乡、孟秋江等来到天津大公报馆。经过几天对报馆总编辑张琴南及各部门骨干的说服工作后，于2月3日开始集中报馆230余人分成22个小组，分别对《大公报》的“基本政治立场”、“政治作风”，以及“内部统治机构的不民主和腐化”，《大公报》与它所服务的反动政权“一脉相承的血肉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检讨和批判。经过一周时间的讨论后，22个小组的组长和报馆

<sup>①</sup> 《中央关于对天津旧有报纸处理办法给天津市委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第777～778页。

<sup>②</sup> 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26页。

<sup>③</sup> 《中央关于对天津〈大公报〉、〈新报〉、〈益世报〉三报处理办法给天津市委的指示》，1949年1月23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第783页。

<sup>④</sup> 《中宣部、新华总社关于平津新闻工作指示》，1949年1月26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299页。

负责人等进一步开会，“研究如何改革大公报，使它对外成为站在人民立场，为人民服务的报纸，对内成立真正民主机构，成为对全馆同人负责，受同人监督爱护的具有民主作风的报纸”。最后，即2月19日，召开全体职工大会，通过了将天津《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呈报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教育部核准出版的决定。会议选举了临时管理委员会，并于次日决定了临管会和新的报社负责人，宦乡为临管会主任兼报社总编辑，杨刚任党组书记兼主笔，张琴南、徐盈为临管会副主任并兼社论委员会委员。<sup>①</sup>这时正受命从香港北上的李纯青，被推举为副总编辑。<sup>②</sup>

2月26日，天津军管会正式批准了临委会申请出版的要求。次日，天津《进步日报》创刊。在创刊号上，披露了改组过程中原《大公报》同人揭发批判《大公报》“反人民反共以及其千方百计支持蒋介石法西斯政权的事实”的经过，说与会者把“大公报镇压同人，压迫同人跟着它犯罪的情形讲出来了”；“不少同人更进一步的承认自己个人过去在反动政策下面所犯的罪过”；多数还检讨了“报馆过去的非民主，官僚态度，上级工作无报告，财政不公开，对工人及下级职员的不合理待遇”的情况。最后，在杨刚等中共党员的引导下，“多数小组中提出了发布宣言，取消大公报三个字，代以新名，进行出版的问题”。<sup>③</sup>

在27日发刊的报纸上，还在头版头条刊登了由张琴南、杨刚、徐盈、高集、彭子冈、赵恩源、李光诒等人署名的《〈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宣言对《大公报》的政治定性更上了一层台阶，宣称：“在北洋军阀时代，《大公报》是依附于军阀官僚买办统治集团而生长起来的。等到蒋介石代替了北洋军阀，建立了卖国独裁的反动政权以后，它就很快的投到蒋介石的门下，成为国民党政学系的机关报。”称“小骂大捧是大公报的得意手法”。也“因此，大公报在蒋介石御用宣传机关中，取得特殊优异的地位，成为反动政权一日不可缺少的帮手。”杨刚等表示：“同人等过去在这样一张报纸工作，实在百端痛苦。我们愈深切地看出它的本质，就愈觉得难于忍受。”但我们个人在这样一家报馆中完全无能为力，常常还会“受到排挤、歧视和警告”。他们说：鉴于“《大公报》实在是彻头彻尾的一张反动报纸”，“坚决地站在反人民立场上，做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我们不能不毅然决然另创新的报

<sup>①</sup> 《〈进步日报〉是如何产生的前天津大公报改革计划委员会报告》，1949年2月27日，见《往事》第81期，2009年7月15日。

<sup>②</sup> 据李纯青回忆，他是2月15日乘船离开香港北上的，3月14日才到天津《大公报》“见习”。故《进步日报》成立时，李应还未到达。见李纯青：《笔耕五十年》，第534～535页。

<sup>③</sup> 《〈进步日报〉是如何产生的前天津大公报改革计划委员会报告》，1949年2月27日。



纸，以便“永远脱离《大公报》这个丑恶的名义”。<sup>①</sup>

天津《大公报》突然揭旗造反，改换门庭，对各地大公报人的刺激已经无以复加；而它如此上纲上线地把《大公报》钉上“反动报纸”的耻辱柱，这对刚刚掉转枪口准备向国民党开战的大公报多数同人而言，就更是如五雷轰顶般，足以让人感到天昏地暗了。这也难怪，《大公报》记者萧乾会回忆说：当晚他在香港大公报馆意外从新华社电讯稿中发现这一消息后，当班的“各版编辑统统放下工作，争相来看这篇晴天霹雳的新闻稿，”“瞠目结舌不能语”，“个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sup>②</sup>。

### 诚心“投降”的意外收获

天津《进步日报》发刊之时，王芸生恰在出发北上之际。他应该是在得知了天津《大公报》要改名的消息后上的船。<sup>③</sup>按照李纯青的回忆，王芸生对天津《大公报》被改组并另立门户一事深感担心，不知道《大公报》其他各馆是否均会落得同样后果，因而曾要先行北上的李纯青“到北平力争存名”。他自己一路上也在考虑到解放区后如何争取阻止天津《大公报》改名的问题。从同船北上的叶圣陶、宋云彬和徐铸成等人的日记与回忆的情况看，王芸生这时的心态应该还比较平稳。<sup>④</sup>但

① 《〈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代发刊词》，《进步日报》1949年2月27日。《人民日报》亦于3月4日公开发表消息欢呼“天津大公报抛弃臭招牌”。并进一步为《大公报》反动定性，称“大公报在北洋军阀时代依附于军阀官僚买办统治集团；蒋匪介石当政以后，即为国民党政学系之机关报。二十年来，大公报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立场是反人民反民主的”。

② 《萧乾回忆录》，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年，第438～439页；唐振常：《香港〈大公报〉忆旧》，《我与大公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12页。

③ 关于王芸生北上前是否看到了《进步日报》创刊号上所发同人宣言一事，目前包括王芸生儿子王芝琛等人在内的研究者和当事人的看法分歧甚大。萧乾称新华社消息来时他轮值负责香港《大公报》版面，新华社消息中就有同人宣言的全文，但王芸生已经离开，故没有见到。（《萧乾回忆录》，第438页）同在香港《大公报》，称自己也在当晚夜班的唐振常却说，当晚的电讯只有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和《进步日报》领导人名单，且当晚王芸生、李纯青都在场，“或立或坐于临窗两横一竖的三张写字台前”，唐并当面问过王芸生是否知道此事。（唐振常：《香港〈大公报〉忆旧》，《我与大公报》，第11页。）李纯青则回忆称：2月初离开香港前即获悉天津大公报改名事，“王芸生闻讯懊丧，要我到北平力争存名。”（李纯青：《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大公报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43页。）王芝琛则说：王芸生晚年曾特别强调说：“幸亏那时我没看到《进步日报》创刊号，否则，我无论如何也会失去北上的勇气。”（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189页。）查有关《进步日报》创刊及宣言最早是由新华社透露出来的，时间注明为“天津一日电”，《人民日报》1949年3月4日第1版正式报道，标题为《抛弃前天津大公报臭招牌 该报同人改创进步日报》。王芸生2月27日离港时应不可能看到此一消息，故唐振常、萧乾的回忆当不准确。

④ 据宋云彬记，王上船后不久即参加了打牌消遣，后因晕船不支而休息。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8页。



是，进到解放区后，他马上就感受到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王芸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做检查时讲过这段时间的思想感情。他说：我“刚到解放区的时候，是抗拒的”，因为在烟台一登陆就看到了《进步日报》，思想感情上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心里非常沮丧，知道阻止天津《大公报》改名来不及了。特别是读了《人民日报》3月4日痛斥《大公报》一贯反动的文字后，过于敏感的他，甚至觉得同行的人立刻对他改变了态度，似乎看不起他了。到北平后，中共有关方面仍有意关闭《大公报》，对《大公报》的历史自然颇多谴责，王“因对大公报所负的责任，必须交代，更感到痛苦与抗拒。”他内心里自然愤愤不平，想：“既然叫我到解放区来，何必如此整我？”看到许多莫名其妙的人都被奉为贵宾，自己却受到这种待遇，更感到“岂有此理”。为此，他甚至气愤地向杨刚表示过“准备结束生命”的想法。<sup>①</sup>

据王芸生说，他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才想通了的。他因此告诉李纯青，自己对天津《大公报》改换门庭一事不再计较了。4月6日，在北平召开的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他已开始尝试着用革命和人民的观点来认识这一问题，强调一个新闻记者没有骑墙的可能，不是站在人民和革命一边，就是站在反人民反革命一边。这之后，他狠着心告诉李说：我们应该把《大公报》献给国家，献给人民。“我想通了，不要大公报这个名称了。我到解放区，是投诚来的。”<sup>②</sup>

有了这种思想认识，王芸生很快就学着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检讨自己的文章，充满感慨地讲述了他此行所受到的思想震动，并检讨了自己过去的种种错误。他主动去了一趟天津，去见了过去的同人，不仅不问天津报馆财产归属等等的问题，还主动把自己的这篇自我批判的文章交给《进步日报》来发表。

1949年4月10日，王芸生在《进步日报》上发表了这篇题为《我到解放区来》的文章。他一上来就强调了自己的贫苦出身，声称：“我是一行中的唯一的一个北方人。我是在这黄土层中生长出来的。我睡过土炕，吃过馍馍，却难得想象到解放区如今这样的情形。”这真是“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所未曾有过的新事物。”

讲到中共的干部，他写道：“在人民政府的政权下，政府的工作人员都是真正

<sup>①</sup> 《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十一)，1952年9月6日。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A22，目录号2，案卷号1551，第73页(以下略写：上档A22-2-1551-73)。

<sup>②</sup> 李纯青：《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大公报史》，第443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记事暨资料选编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50页。

的为人民服务。这些工作人员，当然多数是知识分子，但是都已成为农民型的了。他们简单朴素，勤恳和气，没有丝毫的官架子和官僚气，他们是切切实实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中国一向是官世界，而解放区的政府工作人员如此，这就是一个大革命。”

讲到农民和农村，他写道：“我们在一个农村住了两天，这对我们的收获可太大了。（这）是个只有二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党政军民水乳交融合在一起。”“从这个小村子，使我们了解了土改这把钥匙的重要。以土改为基础，彻底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势力的根基，解决了占全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生活，大大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更合理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农民们“极坦白朴素地说”：过去国民党在的时候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现在可不同了，经过了土改，全村的农民人人有地种了，人人有饭吃了，没有不劳而获的剥削者了，大家都满意了。

讲到共产党优待俘虏，他写道：“在华东解放区，我们有机会看到了解放军官团。团里的学员，都是俘虏来的国民党军官。其中有一百多名将军，更多的校官。他们过着人的生活，受着比解放军干部还优一级的待遇，人人都是黑黑胖胖的。听了几位上将和中将报告他们的学习生活，忏悔过去，策勉现在，都津津有味。至于下级的尉官，被俘后，经过极短期的政治教育，经过一番诉苦运动，大家抱头痛哭了一场，有了阶级的觉醒，立刻就参军上前线了。”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人民解放军政治教育的伟大”。

有鉴于此，他沉痛地检讨自己的历史，说：“我虽是出身于贫无立锥之地的苦孩子，且在五四之后投身过大革命的洪流，但基本上仍是走的旧知识分子的路，苦读勤修，出人头地。所谓‘出人头地’，就是在既成社会中向上爬。结果自己看看爬到反动的上层，沾染上浑身的小资产阶级的气习。在生活与意识上，脱离了人民大众。”因此，我虽然时时想做一个好记者，因为离开了人民大众的立场，即使有强烈的爱国心，也常常会被反动的统治阶级所利用。他接受了《进步日报》同人宣言的观点，也转而指责了《大公报》的反动性。说：该报“既有官僚资本，主持人又甚接近反动的统治阶级，其基本的属性是反动的，实际上给反动的统治阶级起了掩护作用。”身为这样一个基本属性反动的报纸的总编辑，他的结论也很自然，那就是：“我这次到解放区来……乃是向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人民阵营来投降”的。为此，他决心要抛弃掉包括“娇生惯养养尊处优的旧习惯”和“从古老的圣经贤传到近代资本主义哲学”等知识分子的各种“大包袱”，“诚心诚

意的归入新民主主义的人民阵营”，“一切重新学习，一切从头干起”。<sup>①</sup>

据王芸生自己说，刚到北平时，因为范长江在进步记者会师会上提出，今天虽然是进步记者的会师，但仍应划清敌我界限。他曾当场表示：“我来解放区是投效而来！”当时的想法是“良臣择主而仕”，把自己视为净臣策士。<sup>②</sup>而写这篇文章时，则改了“投效”这两个字。为了要不要用“投降”两个字，他说自己曾“冥思苦想多天”，这是他“把自己前半生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作了一番认真思考，怀着痛苦的心情与过去决裂，才产生的真正回到人民队伍中来的真情实感。”<sup>③</sup>也正是出于要与过去决裂的想法，王芸生破釜沉舟，不仅在中共解放区公开发表这一言论，而且还同意把文章发送给香港的《大公报》，在海外也公开发表了这一言论。<sup>④</sup>

王芸生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他的这篇言论及其将之公布于海外的作法，因为态度诚恳、转变彻底，竟然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重视。此文甚至和费孝通的检讨一起，被收入《自我批评实例》一书，成为“华侨学习”的必读物。<sup>⑤</sup>如此一来，要不要取消《大公报》的问题就再度被提了出来。鉴于上海占领在即，要封闭的“反动”的中外报刊甚多，全面取消《大公报》又有碍中外观瞻，毛泽东和周恩来改变了原来对《大公报》的处置意见。4月底，周恩来当面告诉王芸生：“《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预。”<sup>⑥</sup>

上海这时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也是中国拥有人口最多、文化生活最丰富的城市。其他城市，包括北平、天津等城市都只有几家报纸，内中只有两三家有历史的大报，其余多是些历史短、发行少的小报，而上海仅计划中必须要“消灭”的“反动文化阵地”就有59家，其中报纸就有18家，新闻处、通讯处还有4家，外埠报纸办事处1家，刊物8家。<sup>⑦</sup>报纸中发行在万份以上，已查明背景，必须要封闭的，就有《新闻报》（有国民党中宣部背景）、《申报》（有国民党中

① 王芸生：《我到解放区来》，《进步日报》1949年4月10日，转见周雨：《王芸生》，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179～182页。

② 《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十九），1952年9月30日，上档A22-2-1551-131。

③ 王芝芙：《老报人王芸生回忆我的父亲》，《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七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77～79页。

④ 见香港《大公报》，1949年4月27日。

⑤ 见吴兰编：《自我批评实例》，北京：绿原书店，1950年。

⑥ 李纯青：《笔耕五十年》，第535页。

⑦ 《新闻出版处二月综合报告》，1949年7月26日，上档Q431-1-1-11。另据1950年4月20日上海市委新闻处《一年来的新闻出版广播工作》报告称，先后接管反动报纸共计15家，另有通讯社3家。上档B35-1-6/1-5。



宣部背景)、《中央日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益世报》(有军统背景)、《和平日报》(有国民党陆军部背景)、《正言报》(有三青团背景)等,剩下的大报只有《大公报》和《文汇报》两家了。<sup>①</sup>如果把上海《大公报》也像对天津《大公报》一样算成是有国民党官僚资本背景而加以取缔或改名的话,就只剩下《文汇报》一家真正私营的“民主报纸”了。这显然不符合中共中央这时关于在大城市中除党报外,“需要再办一两家或若干家非党进步报纸,以联系更广泛的社会各阶层”的新闻报刊接管和管理原则。<sup>②</sup>尤其是上海《大公报》,不仅是上海发行数最大,而且也是全国发行数最大,因而影响最大的私营报纸,如果断然取消或改名,对中共新政权的统战影响和宣传形象也不利。王芸生及时的转变和“投降”态度的宣示,正好适应和推动了中共对《大公报》政策的调整。

1949年5月底,王芸生和杨刚等身着崭新的解放军军装,头戴军帽,随解放军三野部队进入上海。杨刚以军代表的身份入主《大公报》,按照接管天津《大公报》的方式,在报馆内首先组织全馆职工进行了政治学习和讨论,批判过去办报方针,灌输革命的理念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6月16日,在报请上海军管会批准出刊后,仍为总编辑的王芸生在17日的《大公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大公报新生宣言》的长文。王芸生在文章中由衷地赞叹解放军是“我们人民自己的军队”,称赞中共的政府是“我们人民自己的政府”,宣称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匪帮的反动政权彻头彻尾的灭亡,是全中国获得新生,在这重大时刻,大公报也获得了新生。”

王芸生对《大公报》历史的批判,形式上并不如杨刚等人在《〈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中那样高调,但却更具杀伤力。因为《进步日报》宣言对《大公报》的政治批判更多地只是一种无限上纲,而王文却点到了《大公报》创办者和多数编辑、记者的命门。

王文指出:“大公报始终维持着一种改良主义者的面貌”,始终坚持“民间”和“独立”的特色,想方设法用改良的思想去影响社会,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来拯救国家,常常给人一种开明、进步和爱国的印象,因而也得到了中上层社会人士的欢迎。但是,改良主义的观点和立场因为脱离了人民的立足点,其实是时时处处在替统治阶级着想,甚至是帮着统治阶级反对人民革命的浪潮的。故“历史上所有改

<sup>①</sup> 《上海解放前夕各报情况》,1949年5月,上档Q431-1-21-1-2,33-35。

<sup>②</sup> 《中央关于大城市报纸问题给南京市委的指示》,1949年5月9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第828页;并见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2000年,第395页。

良主义者在实质上无不成为反动统治的帮闲甚至帮凶。”基于这一观点，王芸生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大公报》历史上如何在实质上站在国民党统治者一边反共、反苏、反人民，从而有力地论证了对《进步日报》此前的政治定性。

王芸生是真心相信“见到了久已渴望的太阳”<sup>①</sup>的，因而是从内心里想要获得“新生”，对《大公报》的未来充满了希望的。他满怀热情地宣布说：

“今后的大公报，已不是官僚资本的了，也不单是我们服务人员的，而确定是属于广大人民的了。”

“今后大公报的方向是新民主主义的，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今后大公报的任务，是巩固新民主主义下四个革命阶级的联盟，在工农阶级领导之下，努力争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向新民主主义靠拢，努力发展生产，从事经济建设。”

“今后的大公报，将特别着重于照顾进步知识分子及民族工商界的利益，并努力反映这两个阶级的意见，在毛泽东主席的旗帜下，大踏步走向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sup>②</sup>

投桃报李。王芸生的彻底“投降”不仅保住了他在中国舆论上的地位，而且为他在新中国的政坛上赢得了一席之地。他以社长兼总编辑的身份继续执掌着上海《大公报》，同时出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并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界正式代表、第一届政协委员。1949年10月1日开国盛典之际还得以荣登天安门城楼，亲身感受“时代的伟大”。<sup>③</sup>

### 新制度下的艰难挣扎

不过，在共产党政权下办报却和在国民党政权下办报完全不同。国民党同样有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1946年之后实行新闻党团会报的办法，更是动辄惩罚言论出格的报刊，直至勒令停刊。如上海《文汇报》、《新民报》、《联合晚报》等1947

<sup>①</sup> 王芸生这时对女儿说：他前半生曲曲折折，共产党来了，他也“终于找到了马列主义真理，见到了久已渴望的太阳。”见王芝芙：《老报人王芸生回忆我的父亲》，《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七辑，第79页。

<sup>②</sup> 《大公报新生宣言》，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17日。

<sup>③</sup> 王芸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典》，上海《大公报》，1949年10月6日。

年即曾遭此厄运。但是，在国民党统治的情况下，报纸依旧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传递新闻信息的功用，因为国民党并未全面限制报纸获取新闻的渠道，<sup>①</sup>并不特别限制报道新闻的范围，各报自然就可以各显神通找到“新闻”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较大的报纸也就容易在此基础上形成有特色的新闻分析的言论。而在共产党政权下，报纸被视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和党用以宣传、教育、组织群众的工具，其传递新闻信息的功能被大大弱化了。且什么信息可以传递，什么信息不可以传递，也有了严格的规定。用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话来说，就是：“人民新闻的基本原则，是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依归，对此有利的多多报道，对此利少者则少报道，对此无益甚至有害者则不报道……。这对于新华社和地方报纸都是一致的。”<sup>②</sup>

因为要强化报纸的政治导向和掌控其信息及言论尺度，新政权采取的最主要措施是深入调查办报办刊人政治历史背景及报刊过去的言论，禁止一切可能“反动”的报刊出版发行，只给党报党刊和进步的“民主报刊”以发行权。这种办法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发生像国民党政府那样疲于应付各种报刊言论，甚至不得不动辄查禁报刊的被动情况出现。

与此同时，新政权还创造性地推出了民报党办的方法。即经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定人选，以中国新闻协会上海分会为载体，联合各私营报刊共同组成一个新闻协会党组，负责具体指导各报的日常办报方针。1950年7月19日，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夏衍、华东局党报委员会成员、《解放日报》社副社长恽逸群主持召开会议，宣布该党组正式成立，除10名中共党员负责干部组成党组外，《解放日报》社、市委宣传部及市政府新闻出版处均派有人员参加。党组书记为《解放日报》社副社长陈虞孙，直接对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其任务很明确，即“保证市委宣传方针及经营方针在各报的执行”，并负责“了解各报业务、一般思想情况及问题”，“向市委或直接的领导”反映“各报行政、党、团、工会之间的不适当关系”，并“提出调整建议”。<sup>③</sup>党组成立后，定期召集各民营报纸负责党员会议，汇报检查各报工作情况，管理监督十分严格。

正是因为相关控制措施比较到位，新政权在新闻检查方面也采取与国民党统治

<sup>①</sup> 国民党搞中央社只是变相地压缩了民间通讯社（诸如胡政之的国闻通讯社等）的生存空间，但并不能阻止各报从民间通讯社，特别是从外国通讯社等渠道取得消息。

<sup>②</sup> 《吴冷西在新华社第一次全国社务会议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17页。

<sup>③</sup> 转见张济顺：《1949年前后的执政党与上海报界》，《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1期。



后期大致相同的办法，即“事后审查”，报刊一般无须事前送审。<sup>①</sup>行政上，各报管理和审查工作均由报刊主管地区军管会或地方党委宣传部所设相关部门来组织，如上海报纸行政上即是分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和上海市政府新闻出版处报管科双重机构监督负责。新闻出版处通过每天发布《简报》的方式，做事后检查，通报表扬各报长处，特别是批评各报问题。而为防患于未然，由新闻出版局牵头，每周二、三各报都要派负责人参加“各报负责人座谈会”和“专门问题报告会”，交换各报业务及宣传方针执行情况并咨询政策性问题，<sup>②</sup>把政策通气和政治教育做在前面。

当然，中共建国后对新闻报刊统制的最有效措施，还是统一新闻来源，避免各报从党所控制的通讯社以外的渠道获取信息。

中共进城以后，即专门指示各地：“通讯社原则上应归国营，除新华社外，无须鼓励成立其他的通讯社。”<sup>③</sup>故各地通过登记审批的办法，取消了几乎所有旧有的通讯社或新闻社，基本上只允许新华社分社合法存在。<sup>④</sup>中共中央及各级政府随后更明文规定：“禁用中央社及帝国主义国家通讯社电讯”。对于国际新闻和评论，对全国、全市重大的政治新闻、军事消息，各新闻单位均须以新华社稿件为准。任何中共文件、著作、法令、政策，各报社无解释之权，且“不得增删改写”，“断章取义”，而且连内中的标题也不能改动。<sup>⑤</sup>《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几十年后仍对当年这种统制办法耿耿于怀，说：“解放后一些套套，每使人瞠目束手。举例言之。在长沙解放之日，我们已在无线电中收到确讯，而翌日刊出，即被指为抢新闻，是资产阶级办报作风，因新华社未正式公告也。再如《论人民民主专政》发布之日，要闻编辑郑心永按所列问题，作分题以醒眉目，亦被指为离经叛道。如此重要文件，只能作经典郑重排版，安可自由处理！总之，老区方式，苏联套套，只能老实学

<sup>①</sup> 《中央关于处理新解放城市报刊、通讯社中的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1948年11月26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第755页。

<sup>②</sup> 《各报负责人座谈会第一次》，1949年11月2日，上档B37-1-27-1-2。

<sup>③</sup> 《中央关于大城市报纸问题给南京市委的指示》，1949年5月9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第828页。

<sup>④</sup> 《中央关于大城市报纸问题给南京市委的指示》，1949年5月9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第828页。

<sup>⑤</sup> 王平：《上海解放初期接管新闻机构的情况》，《上海解放三十五周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7页；《中共中央关于未登记报纸施行新闻管制给华中局、华东局、西北局的指示》，1949年6月2日；《中宣部、新华社关于平津新闻工作指示》，1949年1月26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281～282、299页。



# 進步日報

第一一五號

## 廣裕茶莊

南門 開張  
喜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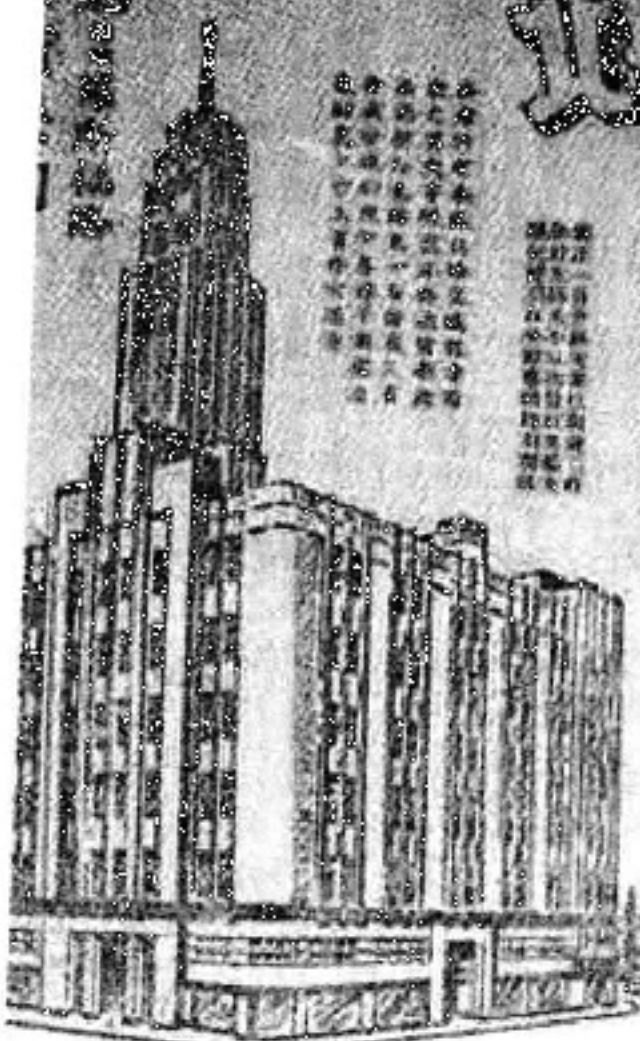
本莊承辦廣東大埠批發利於廈門市南門外於明日下午四時開張營業凡有光顧者請屆時蒞臨

### 提高成分改善品質的 北極星真正一百分紅光硫化青

本廠在化學工業部領導下，經專家技術人員精心研製，現已正式生產出真正一百分紅光硫化青。此種硫化青，其成分純正，品質優良，且能顯著提高產品之化學成分，改善其物理性質。凡在生產過程中，凡有使用此種硫化青者，其產品之品質必將得到顯著之提高。本廠現已正式投產，歡迎各界人士蒞臨參觀。

天津北化工廠廣告

### 北極星牌



本廠生產之北極星牌硫化青，其品質優良，且能顯著提高產品之化學成分，改善其物理性質。凡在生產過程中，凡有使用此種硫化青者，其產品之品質必將得到顯著之提高。本廠現已正式投產，歡迎各界人士蒞臨參觀。

#### 膠刷印

本廠生產之膠刷印，其品質優良，且能顯著提高產品之化學成分，改善其物理性質。凡在生產過程中，凡有使用此種膠刷印者，其產品之品質必將得到顯著之提高。本廠現已正式投產，歡迎各界人士蒞臨參觀。



#### 打掃啓事

本廠現已正式投產，歡迎各界人士蒞臨參觀。

天津北化工廠廣告

建華製藥廠啓事

天津北化工廠廣告

天津北化工廠廣告

天津北化工廠廣告

天津北化工廠廣告

#### 33

本廠生產之33牌產品，其品質優良，且能顯著提高產品之化學成分，改善其物理性質。凡在生產過程中，凡有使用此種33牌產品者，其產品之品質必將得到顯著之提高。本廠現已正式投產，歡迎各界人士蒞臨參觀。

天津北化工廠廣告

1949年9月的《進步日報》。



习，不问宣传效果，此为当时必经之‘改革’。”<sup>①</sup>

按照上述规定，各报理当还能采访本地一般新闻。但实际上，本地一般新闻，新政权亦加有种种限制。如新华总社明文规定：应由各地新华分社“负责交换各报社所采访的其他重要新闻，使各报能同时刊出，以利各报与通讯社之分工合作，避免包办或无政府式的竞争。”<sup>②</sup>且所有新闻的报道，均应采取事后报道的方式，“因事前报道容易失真，且有种种妨碍。”涉及民生问题的新闻报道和文章，尤“应慎重发表”。<sup>③</sup>即使是地方新闻，只要涉及政府或各机关，还要层层送审报批或经相关部门审查同意后才能见报。<sup>④</sup>哪怕是民众极为关心的诸如在上海击落国民党飞机的新闻，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才能见报，因为说是事涉军事。<sup>⑤</sup>私营报纸要报道地方信息，许多还要经过地方党报同意。如王芸生就曾在会议上抱怨过这种情况，说：复旦大学开坦白大会，《大公报》去了记者，结果《解放日报》说要统一发稿，外勤白跑了一趟。同济大学地下党公开，通知各报前往，也是《解放日报》说要统发，其他报纸便都不能发消息，而事后《解放日报》不知为何又不发统稿，最后没了下文。<sup>⑥</sup>如此办报，报纸作为新闻纸的新闻功用基本丧失，各报消息之单一，言论之一律，造成千报一面，自不可免。

夏衍在上海解放之初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文艺处处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兼文化局局长，职务不可谓不高，权力不可谓不大。然而即使是他，也不能稍微改变一下上海这时的新闻统制办法。

1949年夏，夏衍从香港回来，到北平、上海后即感到报纸办得有问题。“当天的早报要到中午，甚至下午才能看到。新闻呢，只有新华社一家，外国通讯社的一律不用。”结果是“出版迟，新闻单调，社论短评很少”，而且报上看不到一条广告，堂堂《解放日报》每天只有一张。他为此专门找来当时《解放日报》社正副社长范长江和恽逸群两人了解情况，范长江怪他多事，恽则抱怨“消息少，又有什么

① 《徐铸成回忆录》，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90页。

② 《新华总社关于新华社、报社分立的指示》，1949年8月9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398～399页。

③ 《姚溱在第二次各报负责人座谈会上的报告》，1949年11月9日，上档B37-1-27-3。

④ 《送审稿件暂行办法》，1950年2月，上档B35-2-109-1。

⑤ 1950年6月中旬上海防空部队曾击落国民党入侵飞机一架，但因这一消息有军事消息之嫌，故各报均未发表新闻。据王芸生说，此事反“引起匪特乘机造谣”。然而当他询问上海新闻处负责人以后如再有击落国民党飞机事，是否可以迅速发表新闻时，该负责人却依旧答复称：此种新闻发布仍应经新华社请示中央后，并由新华社统一发布消息。上档B37-1-27-45。

⑥ 《各报负责人会议》，1950年1月4日，上档B37-1-27-12。





1949年2月，前往解放区的部分民主人士在轮船上合影。前排左起：文瑞（曹禹夫人）、郑小箴（郑振铎之女）、包启亚（包达三之女）；中排左起：包达三、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后排左起：傅彬然、沈体兰、宋云彬、张炯伯、郑振铎、叶圣陶、王芸生。

办法？”问他们为什么不能以事实揭露美国新闻处的造谣，比如说什么上海屠杀了大批留用人员和每天有成千上万人饿死等等，范长江的回答是：“这样的问题地方报纸不能作主。”问为什么报纸不登天气预报，“回答是美蒋飞机经常来轰炸，发表天气预报会给敌人提供情报。”<sup>①</sup>

相信天气预报也是军事机密，最典型地反映出众多进城不久的农村干部在长期战争环境和阶级斗争训练中培养出来的那种政治警觉性。但是，靠这些长期在农村工作惯了的干部来办报，怕是连毛泽东也不会满意。《人民日报》记者钱江讲过中共进城初办《人民日报》的情况，说：虽然进北平办了几个月的报，到1949年10月开国之际，多数干部那种“游击习气，散漫、迟缓、不细致、不严密的作风”，依然如故。开国大典前后，《人民日报》仍接连出错。如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写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把最重要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安排在版面的次要位置。甚至就连初次发表的国旗图样说明、国歌歌词和曲谱，竟然也都会排错。

<sup>①</sup> 夏衍：《懒寻旧梦录》，第428～429页。

对此，毛泽东曾大发脾气，威胁要开除造成重大错误者的党籍。但毛很清楚，这并不能解决问题，根本的办法还是要找懂得办报的人来进行管理。他曾明确讲：“你们学学《大公报》嘛，你们有点像《大公报》我就满意了。”而为了把过去《大公报》的经验用到办《人民日报》上来，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的范长江也就被紧急调来北京，担任《人民日报》社的社长了。这中间的一个重要考虑，大概就是因为范曾经多年在《大公报》工作过。<sup>①</sup>

相比较而言，《大公报》建国后一段时间里也确实兢兢业业，延续着过去的传统，无论在管理上，还是在政治上，都表现得让政府主管部门比较满意。新闻出版处检查各报问题的《简讯》，几乎期期都能找到其他各报，包括《解放日报》出现的各种错误，唯独《大公报》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却不断受到《简讯》的表扬。不是说它版面处理得好，就是说它短评写得好，甚至对它挑选和使用新华社提供的新闻稿，都给予表扬，说它选稿政治敏感，有眼光。<sup>②</sup>但是，一年多之后，《大公报》却渐渐也开始犯起各种“错误”来了。

1951年3月10日，《大公报》在报道一月份生产情况的时候，说明了完成的数字，被批评泄露了国家机密。<sup>③</sup>

4月19日，《大公报》生产介绍专刊报道上海几家工厂的生产情况，介绍了职工人数及承接项目内容等，再度被批评泄露了国家机密。<sup>④</sup>

4月之后，《大公报》开始出现排版错误。如12日出现把“镇压反革命”排成了“反革命”，漏排了“镇压”两个字；4月29日，又出现把“反革命分子”误排成“反反革命分子”；6月28日，出现把“必须严厉”误排成“不须严厉”。而后8月29日、9月14日、9月17日、9月25日，《大公报》报道各地工业生产情况，包括转载《光明日报》新闻稿《重工业部工业试验所试制钼铁成功》，均被批评“暴露了国家生产机密，使敌人获得情报，对人民有害无益，甚至可能造成国家生产事业的重大损失。”即使是转载“也要负相当责任”。<sup>⑤</sup>

不断地犯“错误”，不断地做检讨，越是战战兢兢，就越是会犯更多更大的错

① 钱江：《范长江为什么离开〈人民日报〉》，《百年潮》2009年第6期。还可参见《人民日报回忆录》，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115页。

② 新闻出版处编印：《简讯》第10、12、13期，1950年7月2、6、7日。

③ 《上海大公报馆委员会致华东新闻出版局》，1951年3月10日，上档B35-2-65-1。

④ 《新闻出版处公函》，1951年4月19日，见上档B35-2-67-10-11。

⑤ 李纯青：《大公报工作人员的思想情况》，1952年1月3日，上档A22-2-1532-22；《新闻出版处通报》，1951年10月3日，上档B35-2-64-7，12。

误。终于，《大公报》在1952年开始接连出现把“亲人”误排成“敌人”，把卢作孚自杀报成“病逝”，忽略批准程序转发改写南京《新华日报》揭批不法商人赵金峰罪行的文章，“严重的泄露了国防秘密”等重大过失。新闻出版处为此甚至发出通报称：“大公报在二月廿二日刊载《奸商赵金峰竟向解放军猖狂进攻》一则新闻，严重泄露了国家的军事秘密；二月九日刊登《大来公司‘大老虎’朱今农被捕法办》和二月十二日刊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坦白检举大会》两则新闻，事先均未与有关方面联系；二月廿十日根据道听途说的材料，刊载了‘卢作孚在渝病逝’的消息，而卢实系违反国法，畏罪自杀的；二月十五日第四版刊《要求政府枪决王康年》新闻，把‘实际是所有的志愿军家属要往前方给自己的亲人捎去的亲切的声音’中的‘亲人’两字错成‘敌人’。凡此错误，都是非常严重的，因此造成了政治上和宣传上巨大的损失。现决定予大公报以警告处分并通报各报”。社内处分：王芸生行政记过一次，报社其他领导人李纯青、孔昭恺、刘克林、周雨均警告一次。<sup>①</sup>

对于这种情况，李纯青的总结是：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生存压力的情况下，越是想要创造自己报纸的特点，实现营业收支平衡，就越容易“陷入资产阶级新闻竞争的地狱”。<sup>②</sup> 不管新闻竞争是不是资产阶级的，至少，大家为了自身的生存，还是非争不可。只不过，上海这时各家私营报纸都没有和党报竞争的可能，<sup>③</sup> 争也只能是几家私营报纸自己相互间争一争罢了。由于资源加起来只有那么多，除非政府帮忙，否则争来争去并无助于它们发行环境的根本改善。下面这组数字就反映出，各报1949～1952年的发行量除了因特殊原因会有所增长外，一般各报的发行量都已基本稳定在一个水平量上不动了：

① 《新闻出版处通报》，1952年3月5日，上档B35-2-65-22-25、27、30-31、32。

② 李纯青：《大公报工作人员的思想情况》，1952年1月3日，上档A22-2-1532-22。

③ 王芸生在思想改造运动时曾检讨说，建国初期他曾不服气，与《解放日报》竞争过，后来认识到这种想法十分错误，以后改向党报学习。



时间 \ 报刊名	新闻日报	文汇报	大公报	备注
1949.7 发行量	约 13000	20000 余	约 60000	本年度发行数未见详尽统计, 只有约数
1950.6 发行量	89551	17666	46625	
1950.10 发行量	121341	24046	70409	因关注朝鲜战争与中国出兵问题, 读者数一度增多
1952.3 发行量	97990	19985	45398	
1952.5 发行量	99707	35232	46774	
备注		因分工改为面向教育界, 经政府帮助鼓励学校征订, 1952年5月的发行量一度增长了76%	1949年7月发行数大公报自称8万, 但外售又说只有五六万	

资料来源:《核准登记出版报纸情况表》, 1949年8月15日, 上档 Q431-1-196-48-51;《上海各报发行数量统计表》, 1950年11月, 上档 A22-2-11-7;《陈虞孙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给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报告》, 1952年5月29日, 上档 A22-1-47-3-6。

与此相反, 各私营报纸的版面、专栏、社评及其信息量, 却在逐渐大幅递减, 信息来源逐渐单一化, 报纸的新闻性质基本上不复存在了。如《大公报》在中共进上海前, 每天10个版面, 天天有社评, 周一至周日每天会有一个不同的专刊, 每天还有两个整版的广告。中共进城后, 首先是版面减少到6个, 广告逐渐减少到只有1个整版。进入到1950年, 虽然还维持6个版, 整版广告很快就没有了, 专刊也办得少了, 但还会每天有社评, 并且主要靠本报记者写通讯。到1952年4月以后, 《大公报》以节约纸张和减少读者负担的名义, 每天只出一大张。报纸开始采取采编合一的办法, 社评基本上都是转发党报社论了, 各种消息像国内所有报纸一样, 均大量采用新华社的通稿, 或市政府新闻处讯, 只有少量本地新闻还在用本报记者写的消息。

其实, 综合美国国务院相关机构和中国新闻总署1950年的统计, 新中国建国后比1948年报刊数已全面减少。1948年中国报刊数大约为1450种, 新中国建国后到1950年只剩下624种。其中报纸有281种, 私营报纸只有55种。上海1947

年有报纸 96 种，1949 年中共占领上海后，领取申请登记表希望继续出版和想要新办报纸者虽有 43 家，最后却只批准了 14 种。<sup>①</sup>这 14 种报纸中，属于公众性报纸的只有区区 10 种，1949 年 7 月时发行超过 2 万份的只有 6 种。<sup>②</sup>

报纸少了，各报读者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更少了。这是新中国建国后报刊发行上出现的最吊诡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的经济状况严格说来没有多少关系，最主要的其实还是城市中读得了报纸和买得起报纸的人数大大减少了。据 1949 年 8 月 15 日上海军管会文管会的一份报告称：《大公报》“解放后未停过，六月十七日宣布革新，编辑言论都相当谨慎持重，尚能遵循我们的指示。惟自由主义气息似尚未脱尽，版面比其他报纸齐整，销数曾达十五万份以上（最高曾达十九万份）。《文汇报》、《新闻日报》出版后渐跌，据该报（按指《大公报》）自己报告，现约销八万份左右，但外售已低至五六万份。”查《文汇报》复刊于 6 月 17 日，《新闻日报》创刊于 6 月 29 日，<sup>③</sup>两报发行不久就分走了《大公报》一半以上的客户，足以见当时上海读者的数量总体上就十分有限。夏衍 1950 年 6 月也讲过，“在解放前整个销路，每日约 50 万份左右，以上海 500 万人口计，有十分之一的人是买报的，最高时曾达到 70 万份左右，但在解放后销数降低了，现在仅有 30 万份，这销数减少的事实，使报纸经营者感觉到困难。”<sup>④</sup>

除了中共夺权造成大批读报人逃亡或被压制以外，造成报纸销售量大幅下降、私营报纸难以为继的还有其他原因。有报人当时就指出过：“都是新华社、塔斯社一个样的消息，市面又是在日趋萧条，即便（各报）把登记办妥，他究竟能够维持几时呢？”<sup>⑤</sup>时任上海《大公报》副总编辑的李纯青则认为，私营报纸转入颓势还有另外的原因，即：“解放后，共产党党报的宣传享有最高的威信，每个人都需阅

① 《一年来的新闻出版广播工作》，1950 年 4 月 20 日，上档 B35-1-6-1-8；《解放后的上海报纸》，1950 年 3 月 20 日，上档 Q431-1-21-12；《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中国的新闻自由的备忘录》，1951 年 4 月 17 日，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9～1976）》第三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 年，第 18 页。但陆定一在 1954 年 5 月 8 日报告中称：1950 年有报纸 382 种，1952 年减为 271 种，1953 年减到 258 种。转见《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453～455 页。

② 《核准登记出版报纸情况表》，1949 年 8 月 15 日，上档 Q431-1-196-48-51。

③ 《新闻日报》系在中共相关部门安排下由《新闻报》改组而成，为保持其非党报纸的形象，负责人由中共秘密党员许彦飞担任。《已核准登记出版报纸情况表》，1949 年 8 月 15 日，上档 Q431-1-196-48-51。

④ 夏衍：《在新民报的讲话（摘要）》，1950 年 6 月 9 日，丁贤才编：《探索〈新民晚报〉研究文集》，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 年，第 16～17 页。

⑤ 马在天：《解放后的北平新闻界》，重庆《新民报》1949 年 6 月 30 日，转见《往事》第八十一期，2009 年 7 月 15 日。

读党报，没有它便不能指导自己的日常言行。”《大公报》已经完全没有了过去的这种作用，再加上其自身也失去了原有的特点和长处，版面内容再也引不起读者兴趣，它自然要陷入困境。《大公报》的社评过去一直是吸引读者的重要手段，王芸生一度也十分坚持这一形式，几乎每天写，但如《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所言：既不习惯人云亦云，又不善于思想未通即先歌颂，自然会越写越苦，“越写越觉得言之无物”，渐渐也坚持不下去了。想向党报看齐，又没有党报的资本，畏手畏足，不知道怎样去积极。而且，党政军各机关，甚至各工厂，对私营报纸还颇多排斥，采访和订阅都明显地会受人歧视。<sup>①</sup>

1950年6月，《大公报》的发行量只剩下了4.66万份，还不及上海解放前月发行量的零头。<sup>②</sup>仅这一年头7个月，其亏损就达到了16.55亿元（合新币16.55万元）。<sup>③</sup>它在给新闻出版处的报告中说明：从1949年6月开始到1950年头几个月，报纸一直在严重困难中。1950年6月比1949年7月，发行减少一半，广告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全馆483人销售这么少的报纸，薪水支出占支出30%上下，业务已难维持。<sup>④</sup>很快，王芸生就发不出职工的工资了，连买纸印报的钱都不得不向上海市政府申请帮助。这一年夏天，报社被迫大规模裁减人员，原483人减为389人，裁员达16.4%。<sup>⑤</sup>因为种种困难，对经营苦不堪言的王芸生有一次甚至发了脾气，开社评会时公开冲着李纯青指责“党”不好，说你们的党要检讨一下，为什么党报就不让涨价？李纯青当场怒目以斥：“我们的党没有对不起你王芸生！”王芸生事后也自知理亏，不得不承认了错误。<sup>⑥</sup>

到1951年，政府借款总额已经超过《大公报》总资本一半以上，在继续经营的情况下，《大公报》实际上已经变成“私营公助”了。《大公报》虽然依旧是私营的，却成立了一个中共的联合支部（含新闻、文汇、大公三家党员）在指导，实际上报社内的党员又不可能真正主宰这份私营报纸，这种情况使《大公报》陷入到一

① 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第190页；李纯青：《笔耕五十年》，第536页；李纯青：《大公报工作人员的思想情况》，1952年1月3日，上档A22-2-1532-22。

② 《上海各报发行数量统计表》，1950年11月，上档A22-2-11-7。

③ 《中宣部关于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情况的通报》，1950年9月，《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第20～21页。

④ 《大公报整编工作报告》，1950年9月24日，上档B35-2-108-13-15。

⑤ 《大公报馆关于整编工作情况报告》，1950年10月4日，上档B35-2-108-3-2，《关于管理委员会整编节约小组简则》，1950年8月27日，上档B35-2-108-6-7。

⑥ 李纯青：《大公报工作人员的思想情况》，1952年1月3日，上档A22-2-1532-22。



种十分尴尬的境地，<sup>①</sup>并极大地影响到报社骨干编辑和记者的工作积极性。许多人开始变得不安心起来，甚至坚决要求调离甚或辞职。报社1950年有编辑、记者共60人，其中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有27人，他们中两年多来就有7人辞职去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社或人民出版社等公营机构。<sup>②</sup>

一方面报纸的发行数不断萎缩，经济窘迫，一方面人心思动，人人彷徨苦闷，本来一直谨慎小心的《大公报》进入1951年之后会开始不断出错被批，也就可想而知了。

新中国成立后报纸纷纷亏本，并不是《大公报》一家的的问题，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包括同属市委指导下工会和青年团办的《劳动报》、《青年报》在内）1950年上半年亏损成倍于《大公报》。因为没有或很少广告收入，定价又低于成本，就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也都在赔钱赚吆喝。<sup>③</sup>仅据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后两个月对《人民日报》等16家报纸的不完全统计，全年的赔耗即达5000万斤小米。按当时包干制计算，可供约38万人一个月之用。<sup>④</sup>

办报赔钱，虽然不是中共接管后才出现的问题，但是在国民党时期，报纸多半是私人性质的，赔不起关门就解决了。新中国条件下，所剩报纸本来就不多，相当部分又是公营性质，赔了就要靠政府接济。新政府财政经济本来就很难，自然不能不想办法堵住这一漏洞。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新闻总署1949年12月曾召集全国报纸经理会议，试图着手解决报纸发行经营的问题。但新闻总署相信，问题的关键是技术性的，比如报纸定价应该不低于纸张成本；应该用便宜的国产纸，而不应用昂贵的进口纸；应该学苏联将报纸发行统一交邮局办理，以减少发行上的开支与损失，并缩编冗员等。<sup>⑤</sup>

报纸提价及相应措施采取后，《人民日报》凭借其全国党报的优势，规定订阅，发行量扩大，开始扭亏为盈。同时，北京《新民报》以通俗文艺吸引北京下层民

<sup>①</sup> 到1952年夏天，不算借贷，大公报的私人股份名义上仍占75%。另社内的中共党员也只剩下了两个人，党的组织其实主要只是李纯青一人在负责，故仍被认定为私营报纸。《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二），1952年8月7日，上档A22-2-1551-12-20。

<sup>②</sup> 李纯青：《大公报工作人员的思想情况》，1952年1月3日，上档A22-2-1532-22。

<sup>③</sup> 《人民日报》1949年秋发行量已达到8.8万份，但越发得多越赔钱，完全靠银行贷款过日子，每月要给银行利息就2000多元。转见宁启文：《1949～1956年大陆报业企业化经营概述》，[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1700](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1700)。

<sup>④</sup>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党组关于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报告》，1949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294～295页。

<sup>⑤</sup>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党组关于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报告》，1949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294～295页。

众，销路迅速上升，也给新闻总署提供了新的经营思路。

1950年3月29日至4月14日，新闻总署又召开全国新闻会议，仍然进一步强调要由新华社统一发布新闻，但同时根据苏联经验和《人民日报》、《新民报》取得的经验，提出了报纸分工的主张。它强调报纸要划分成全国性报纸与地方性报纸，不同的报纸应内定服务于不同方面的读者对象。在平津地区，《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应定为是全国性报纸，《人民日报》的主要读者对象应为干部与先进的群众；《光明日报》的读者对象应为各民主党派及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北京《新民报》和天津《进步日报》是地方性报纸，前者的读者对象应为北京的小资产阶级及比较无知识的劳动群众，后者的对象应为天津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sup>①</sup>“上海各报的初步分工，大体上划归各自的读者对象范围。高级知识分子由《大公报》照顾，中青年知识分子归《文汇报》，《新闻报》改为《新闻日报》，仍然是工商界的报纸；《申报》改为《解放日报》，是居领导地位的党报，基本群众和党政干部属之。”<sup>②</sup>

然而，这样的措施并不能真正为私营报纸的生存找到出路。1950年3月，全国共有私营报纸55家，6月就少了12家，11月再减少4家，1951年4月又减少了8家，到同年8月只剩下25家了。<sup>③</sup>不难看出，《大公报》也处在这减少的数字边缘上了。光靠报纸分工或有公家帮助贷款，就能挽回颓势吗？非也。上海市当局1951年要求《大公报》要专以大知识分子为对象，一直受到大公报人的怀疑。因为即使在全国范围，大知识分子也不足两万人，而《大公报》这时的主要读者80%都是小工商户，一旦做如此改变，读者不仅不会增加，还会减少。<sup>④</sup>尽管从1950年夏天开始，上海市政府就已经以入股和补助的方式，介入到报社的管理过程中来。《大公报》也积极配合，与上海新闻出版局商定并经由政府协助实行了整编节约计划，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能带来多少改变。从上述1951~1952年《大公报》自身管理开始出现问题，连连出错被批，即可看出，变成私营公助，在管理上还不如私营的时候。而在经营上，私营公助后的《大公报》毫无起色，到1952年5月还是只维持着4.6万份的发行数。<sup>⑤</sup>这时每月至少亏损3亿元，而亏损总数已

① 《京津新闻工作会议讨论要点初步意见》，1949年4月。

② 李纯青：《笔耕五十年》，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538~539页。

③ 《中国新闻年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525页。

④ 李纯青：《大公报工作人员的思想情况》，1952年1月3日，上档A22-2-1532-22。

⑤ 《陈虞孙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给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3-6。

新中国新闻报刊统制机制的形成经过

77

达到了41.58亿元，当局“估计至多可吃六个月”。<sup>①</sup>

1951年底，《大公报》重庆报馆再也熬不下去了，经王芸生同意，并“与中共西南局、重庆市委商量，决定先实行公私合营，而后改名《重庆日报》，成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sup>②</sup>《大公报》在内陆只剩下上海这一家了。然而，这种坐吃山空的情况，就像一个无底的黑洞，完全看不到尽头，《大公报》这回是再度走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了。王芸生第一次感到了某种恐惧：“假如大公报办不下去，自己怎么办？何况经济情形又不好，孩子生了肺病，化（花）了二千多万医药费还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代付的，因此有‘后半生无以为生’之感。”<sup>③</sup>

### 思想改造再获“新生”

尽管《大公报》经济上危机重重，王芸生却一直在政治上努力紧跟中共中央的政策，而且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政治参与热情。这从他积极投身于1951年底中共中央发动的“三反”运动，和1952年初开始的“五反”运动，结合运动进程，连篇累牍地撰写社评，参加战斗，就能够看得很清楚。尤其是对上海的“五反”运动，王芸生因为久已对上海资方的一些做法感到不满，因而更是表现得格外积极。

在1952年2月以前，上海在工商界开展的是“四反”斗争，即所谓“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税漏税”，具体工作是交给主要由资方上层人士组成的市工商联来负责领导的。王芸生虽多次表示过对工商联的意见，工商联却或是当面反驳，或是无动于衷。随着全国范围内“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展开，上海从2月5日开始才改变了做法，并将运动的领导权统一到同时还在领导着“三反”运动的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手中来了。这一改变，自然印证了王芸生对工商联有问题的怀疑。

就在2月5日潘汉年副市长做了“五反”动员报告的次日，《大公报》就开始撰文和发布消息，含蓄地批评工商联对运动的领导软弱无力，实际上阻碍了运动的发展。此举马上又引起了工商联的反弹，工商联主委盛康年就在会议上指责王芸生

<sup>①</sup> 《中宣部关于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情况的通报》，1950年9月，《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21页；《陈虞荪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给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3-6。

<sup>②</sup> 李纯青：《笔耕五十年》，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537页。

<sup>③</sup> 《王芸生第一次检查报告记录摘要》，《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十九），1952年9月30日，上档A22-2-1551-128。



不负责任，完全是在“打落水狗”。<sup>①</sup>

2月9日，王芸生发表了一篇政治批判长文，题目叫《资产阶级有没有猖狂进攻？是我们“制造阶级斗争”吗？》。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其实早就在注意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资产阶级问题的态度。他从《人民日报》1月9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增产节约委员会主委薄一波关于“五反”斗争是对三年来资产阶级向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猖狂进攻进行反攻的这一提法出发，针对有人否认资产阶级有过这种进攻，认为这是有意“制造阶级斗争”的观点，以他所了解的上海资方的种种表现为例，为中共中央的观点做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证。此文两天后即被毛泽东看到，显然极为赞赏，当即批示《人民日报》全文转载。<sup>②</sup>

王文的基本观点是：“的确资产阶级未曾开过全国大会，未曾制定共同战略，未曾同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下过总攻击令，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他们利用一切机会，以各种不同的非法手段，争取自由发展……纷纷一致地为非法暴利的一个目的作战，就形成资产阶级全国规模的猖狂进攻。”

具体在上海，“像中国化学工业社接受肥皂、香皂的定（订）货，虚报油脂香料成本，骗取暴利十亿余元。大中金属材料厂纠合同业抗拒华东工业部的加工任务，又纠合同业对市工商局抬高工缴费，强调损耗率，暴利四十余亿元。糖商陈顺康假借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霸占台湾的紧张时局，操纵市场，哄抬糖价，攫取暴利。大中华电器材料行负责人，绰号‘钨丝大王’的奸商夏盈奎，操纵钨丝市场，暴利数十倍。制纸业公会负责人为抗美援朝捐献一亿元……公司却偷税漏税一百一十八亿余元。”各种花样多得很。而永祥华行老板陈国珍为拉拢干部，“陪嫖伴赌，送贿赂，小老婆招待”，“说明资产阶级为了赚钱，为了暴利，什么无耻不要脸的手段都用得出来。”“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平，以假药次货盗骗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采购的巨款，影响我们英勇的志愿军战士的健康”，更是丧尽了天良！

王文还在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所谓阶级本性之外，进一步提出了解放以来资产阶级的四大表现，即从“是非不分”、“敌我不分”、“公私不分”，已发展到开始公开与无产阶级“分庭抗礼”了。文中特别举了两个例子，都是针对市工商联的：

<sup>①</sup> 《五反运动情况》（八），上档 182-1-372-59。

<sup>②</sup> 《毛泽东关于转载王芸生文章给邓拓的信》，1952年2月1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03页；《人民日报》1952年2月13日。

一是上海瑞有天茶食糖果店劳资发生纠纷，持续达半年以上，各报公开批评资方陈森不该扩大纠纷，小题大做，弄到兴师动众召开市协商委员会，开了8个半钟头，才算了结。对此次纠纷，市店员工会主动出来承担责任，发表了公开的检讨书，工商联对资方领导不力，却不做检讨。不光不检讨，竟然还在一次市协商委员会上公开批评各报不该在发表新闻中批评瑞有天的资方，要各报公开检讨。

二是上海工商联领导人在一次市府委员会的会议席上，公然要求陈毅市长修改在市二届三次代表会议上的开会词，说是开会词中“必须坚决地确立以无产阶级的思想为唯一的领导力量，批判一切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错误的思想，不允许任何反动思想来损害人民革命与人民民主事业”的说法不妥。该领导人说，工商界代表们经过讨论，“一致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既然是四大民主阶级之一，为什么说他们的思想是错误的以至反动的呢？”<sup>①</sup>

由于王芸生这时的揭批文章常常不注意区别守法与不法工商户，动辄把上海工商界与“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资产阶级混为一谈，甚至有“上海工商界不仅不甘心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还想把资产阶级的思想占上风”的种种说法，因而上海工商界人士对王普遍反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妨碍王芸生继续去积极参与揭批上海工商界的各种斗争。如4月19日上海工商联秘书长胡子婴交代问题，王芸生就专门离开报馆，赶去对胡子婴提意见。他在会场一站起来，会场的气氛顿时就变得紧张起来了。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可能会说什么。果然，他开口就说明：我和胡子婴大姐每开会必打架，今天也是来吐苦水的。“我对子婴大姐的批评是十二个字：‘思想混乱，立场不明，作风粗暴。’胡大姐思想有进步，有落后，既说是出身资产阶级，又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思想混乱极点。……你公开要推翻共同纲领、毛泽东思想，要修改陈市长的开会词，这证明你很‘勇敢’的站在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三年来的资产阶级猖狂进攻，你有责任，甚至是你领导了他们。瑞有天的事，协商会是错了，而你更错的站在反动立场上来‘明’害工人阶级、共产党员。当时你在市府会议上

<sup>①</sup> 王芸生：《资产阶级有没有猖狂进攻？是我们“制造阶级斗争”吗？》，上海《大公报》1952年2月9日。

气焰昂昂的要各报道歉，指着鼻子骂我王芸生。现在呢？”<sup>①</sup>

王芸生的这种尖锐批评，如同他的社评文章一样，自然难以被胡子婴及上海市工商界上层人士所接受。在随后的会议中，严谔声就当着王的面批评王提意见“夹杂‘个人恩怨’成分”。盛康年小结时也直言不讳地表示：“王芸生对胡‘吐苦水’，使我很失望。对朋友动机应善良，感情要真挚。在我过去的理想中，王芸生是伟大的政论家，但由于他在小组的发言，使我有相反之感。”<sup>②</sup>

可以肯定的是，王芸生并没有想过要把上海工商界，或胡子婴等一棍子打死。王芸生根本上只是响应中共和政府号召，想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帮助他们进步。让他感到遗憾的是，胡子婴等全都顺利地通过了“交代”和“检讨”，但是“他们的思想尚未搞通”。<sup>③</sup>

当然，作为上海报界“五大民主人士”<sup>④</sup>之一，一向习惯于批评别人的王芸生，也免不了要像胡子婴等人一样交代思想和各种政治历史问题，接受别人上纲上线的激烈批判，并在当局的保护下检讨“过关”。

从1952年7月10日开始，上海新闻界开始进行“思想改造学习”，第一阶段是党内整风。不学习，坚持留在各私营报社内的中共党员还一心一意地想要把自己工作的那份报纸搞好；一学习，该不该搞好自己工作的那家报社反而成了问题了。因为大家对各报民主人士进行了阶级定性，王芸生被认定是“代表大资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和中间偏右的知识分子”，结果连李纯青都糊涂了。一直对自己服务的《大公报》很有感情的他疑惑地表示：过去对私营报没有概念，认为它的存在与党的利益一致，因此就努力工作了。现在如果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我们就很难处了。“这几天我就很害怕，曹谷冰有事来征求我的意见，我都不敢讲，恐怕做了资本家的军师。过去发动职工卖报、搞广告，是不是错了呢？弄不清楚。”“我们党员在私营报中应当把报纸搞好还是搞垮？”“私营报中的资方既没有资产阶级的三权，<sup>⑤</sup>又不能宣传资产阶级的思想”，能否认为这种“私营只是一个形式而已”？<sup>⑥</sup>

王芸生是以一种极矛盾的心情参加到这次思想改造学习中来的。他开始并不知

① 《五反运动情况》(66)，上档 B182-1-373-257-258。

② 《五反运动情况》(70)，上档 B182-1-373-279-280。

③ 《五反运动情况》(70)，上档 B182-1-373-280。

④ 即王芸生（大公报），金仲华（文汇报），徐铸成（文汇报），赵超构（新民报），刘思慕（新闻日报）。

⑤ 指所有权、用人权和经营管理权。

⑥ 《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二)(三)，1952年8月7日，上档 A22-2-1551-12-20、22。



道在五大民主人士中，他被中共联合支部看成是最右的分子，认为其他四位都比他要进步。<sup>①</sup>自然他更不知道报社内许多人都对他不满，“觉得报馆根本不需要他”。时任联合支部书记的蒋文杰甚至认为几个民主人士在报馆都是“无根之草”，不起作用。他说：“上海四张报纸，五个民主人士，三年来一事无成，一个也没有教育好……。实际上，如果把这五位大亨一脚踢开，报纸一样可以办下去，甚至会办得更好。”<sup>②</sup>

王芸生最初全然没有紧张感，甚至认为自己对资产阶级思想认识很透，运动和自己没有多少关系。1951年10月下旬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他就曾热情发言表示拥护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发动前，他6月间去北京，听说黄炎培、章伯钧等在“三反”中拒绝与群众见面，交代问题，结果都被保护过关，内心更是颇为安慰，相信过关没有问题。

但是，王芸生还是有一点强烈的担心，那就是自己和《大公报》的政治历史问题。他很清楚，中共对历史问题看得很重，很多人也正是因为政治历史有问题被人揭露，从高位上摔了下来。1951年底，《大公报》与《新闻日报》合办批判改良主义思想座谈会，《大公报》记者萧乾在发言中一再揭发解放前《大公报》种种亲美拥蒋反人民的“反动”思想表现，《大公报》北京办事处记者又找到王芸生，想请他写一篇文章，批判《大公报》过去传播改良主义思想的罪恶，这件事让他极为光火，认为萧乾是有意找他的麻烦，回到编辑部后忍不住痛骂了萧乾一顿。虽然事后王冷静下来，同意写一篇文章来检讨《大公报》宣传改良主义思想的历史，做自我批判，但他思想上对再谈历史问题的抵触和紧张，显而易见。<sup>③</sup>因此，当他发现历史问题可能绕不过去的时候，他难免又高度紧张了起来。他因此停止了自己十分热衷的各种对外活动，连华东军政委员会及华东文教会议都不去出席，全身心在报馆里参加学习小组的学习讨论，以争取大家的好感。并且在学习讨论过程中，他就开始主动交代自己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了。<sup>④</sup>

在9月13日小组会上，王芸生做了第一次检查，着重谈了自己的历史问题。

他在检查中对自己思想的定性是：“半封建半自由主义的诤臣思想”。说自己从16岁入茶叶店做学徒，分别在布店、木行做事，受的都是封建式的教育。只是因

① 认为金仲华代表进步的知识分子，赵超构代表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徐铸成作用不大”，“刘思慕没有市场”。《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三），1952年8月7日，上档A22-2-1551-22。

② 《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二）（三），1952年8月7日，上档A22-2-1551-15、21。

③ 《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十一），1952年9月6日，上档A22-2-1551-74。

④ 《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廿一），1952年10月13日，上档A22-2-1551-141。

为喜欢读书，早年又多读的是梁启超、孙中山的集子，再加上进了大公报馆，长年跟着张季鸾学，立志“文章报国”，因而也就学了很多自由主义的观点，一心想“立德、立功、立言”，成就一番事业功名。1934年被蒋介石召到庐山上讲日本问题，“就进一步以‘净臣’自居，以‘国士’自许”。他详细交代了自己几次与蒋介石见面谈话的情况，在抗战期间和战后国共内战期间写文章亲美反苏及批评中共的经过，以及中共夺取全国胜利之际主张和鼓吹第三条道路的尝试。他承认，哪怕是最后下决心到解放区来，自己思想上仍旧站在客卿立场，想的是“良臣择主而仕”。他对自己历史的总结是：“解放前我是人民的敌人，三年来也未曾改造。同志们，我真是惭愧，惭愧得汗颜无地；我真是沉痛，沉痛得想痛哭一场。”<sup>①</sup>

在交代检讨中使用这种考究的排比句式来表达自己的“惭愧”与“沉痛”，显然达不到打动听众的目的。王检查之后，小组成员就纷纷发言，“火力很猛”。与会者一致认为王历史交代不清，而且态度不严肃。他们并且联名草拟了一份黑板报稿，进一步揭发王芸生和《大公报》的政治历史问题。同人的反应让王芸生非常不安。为了在全馆检查过关，他接连几天都睡不着觉，每天搅尽脑汁想自己的问题，平均只能睡到4个小时左右，就怕全馆同人通不过。注意到王芸生的表现，新协党组书记陈虞孙为此专门找他谈了话，向他委婉地交了底，他才多少放下心来。<sup>②</sup>而新协党组也明确决定对王的“历史问题不追究”，学习小组集体写的揭批王芸生政治历史罪恶的黑板报也没有登出来，王芸生的历史问题自然也没有进一步追究下去。

王芸生在24日向全馆做的正式检查中，根据陈虞孙谈话的提示，基本上没有再涉及政治历史问题，只是围绕着小组成员对他建国后的工作表现及工作作风的批评而展开。他在检查中把自己的问题归结为四个方面的错误，一是形式主义和客卿思想；二是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三是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四是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

在这次检查中，他把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归纳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好名思想”，是“在求名、成名、好名这一条路上发展起来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自高自大的自由主义，好大喜功的好名思想。”他承认了自己对建国后《大公报》办不好总是不服气，总是觉得自己的报纸好，但人又总是喜欢在外面开会、讲演，很享受种种虚名和待遇的矛盾情况。说“三年来我的工作错误和作风，都由自私自利

<sup>①</sup> 《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十九)，1952年9月30日，上档A22-2-1551-128-131。

<sup>②</sup> 《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廿一)，1952年10月13日，上档A22-1-1551-141。

的个人主义、自高自大的自由主义，以及好大喜功的好名思想这一主导思想派生出来的。因为名大实空，所以专搞形式主义；因为大公报这个地盘是我个人主义好名思想的舞台，所以坚持大公报本位主义；因为我有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就自然结合着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因为我名不副实，就不得已而实行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他表示，三年来把《大公报》办成这个样子，并连累同人们也犯许多错误，都是我用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办报的结果。因此，他当场道歉称：“同志们！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共产党，更对不起毛主席！”<sup>①</sup>

上海新闻界的这次思想改造运动比各地的思想改造运动，乃至比上海多数单位的思想改造运动，都开展得晚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上海新闻界的这场思想改造免除了一度在许多单位发生过的那种深挖猛追式的激烈斗争场面。加上新协党组力保王芸生等过关，因此，尽管与会者对王的检讨仍旧意见纷纷，王还是顺利地度过了思想改造这一关，整个《大公报》的人事组织、管理模式和领导关系，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动。

学习分会明显地给王芸生放了绿灯。它在评论王的表现时称：王芸生在这次思想改造过程中，曾“带有浓厚的过关思想，但在每个环节上都能挺身负责，不逃避群众，也不避免改造，他是得到教育的，有进步的。”“他已经初步认识到自己的一套办报经验已不行了。在小组中，批判旧大公报的反动本质严厉而深刻，使他的第三条路线的残余思想及大公报的宗派主义宣告破产”，使《大公报》旧的办报思想得到了清算，使王芸生骄傲自负的个人主义受到了打击，今后王对报馆的工作可能会比较负责任，也会比较能够走群众路线，比较容易接受意见了。<sup>②</sup>

思想改造运动并不纯粹是为了通过自我批判实现思想一律，它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图，就是要通过交代揭发政治历史问题，达到人事调查和组织清洗的目的。这对中共更好地控制报刊这种舆论工具，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集中上海新闻、大公、文汇、新民、亦报等5家报社开展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其目的之一也正在于此。

据上海市委宣传部在运动结束时的一份报告称：“大公、新民、文汇各报都是从解放以前原封不动继续下来的。新闻日报仅编辑部重行改组，但人员都是临时杂凑，大部分是解放前在白区工作的新闻工作者。亦报虽属新创，但全部人员都是解放前一向在上海搞小报的。因此，不仅情况复杂，而且都保持了过去一套旧

<sup>①</sup> 《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十七），1952年9月25日，上档A22-2-1551-110-120。

<sup>②</sup> 《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廿一），1952年10月13日，上档A22-1-1551-141-142。



的办报思想与作风。”“经过学习，最后填表交代，初步弄清了各报编辑经理两部的政治情况。各报编辑部门人员填表交代历史政治问题者占总数百分之38.3%，其中国民党员65人，区分部委员以上者5人，受过反动训练者34人，三青团员31人，中统3人，军统2人，参加其他特务组者18人，反动军官15人，参加反动新闻社团者12人，汉奸3人，反动帮会16人，参加其他反动党团者2人，脱党分子16人。各报相比，以新闻与新民两报社较严重，交代历史政治问题者均占总数的41.9%，大公为37.5%，亦报为35.4%，文汇为33.3%。现行犯尚无发现。各报经理部门人员情况较编辑部门为单纯，交代问题者占总数的19.6%，以新民报最多，为37.5%，亦报为30.7%，新闻日报为16.1%，大公报为15.9%，文汇报为15.3%。现拟将其中问题较严重者调到新闻学校学习，继续了解情况，搞清问题。”<sup>①</sup>

由上不难了解，无论是王芸生，还是《大公报》，经过这次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之后，一定会吸取不少教训，更加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了。

### 尾声：《大公报》北上与转运

思想再改造，《大公报》所面临的危机还是缓解不了，但是，运动中被多数中共党员看不起的王芸生，却帮助《大公报》找到了一条活路。

早在1950年春，新闻总署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新闻会议上提出了报纸分工的问题后，上海方面就考虑过分工与合并的问题。但是，因为当时各私营报纸资方对继续办报的前景看得还不十分清晰，调整的条件尚不成熟，因而没有推动。但新闻总署显然相信上海方面应该考虑报纸的合并问题，胡乔木甚至还帮助考虑了一个合并后的报名：“大公新闻”。<sup>②</sup>

1951年夏天之后，经过“一年来的酸甜苦辣”，各报资方均已对继续经营报纸的前景不抱幻想了。华东及上海方面中共领导人也逐渐相信，问题确实出在上海的报纸太多了，应该集中力量办好一两张报纸，即在办好《解放日报》的同时，只要在上海集中力量办好一张“强有力的比党报能更灵活一些的教育上海人民的报纸”就够了。

因此，夏衍、恽逸群、姚溱等明确提出两种方案，一是《新闻日报》与《大公

<sup>①</sup>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的总结》，1952年12月13日，上档A22-1-47-129-134。

<sup>②</sup> 《夏衍、姚溱致胡乔木同志函》，1951年10月11日，上档A22-1-20-60。

报》合并，将《文汇报》改组为文汇出版公司，办一杂志兼营印刷；二是以《大公报》的编辑班底为主，新闻、文汇、大公三张报纸的编辑部改组合并为一个以王芸生为首的强的编辑部，以《新闻日报》的经理部及印刷厂作新报纸的经理、印刷部，多下来的全部印刷器材合组一文汇印刷公司。夏衍等认为第二个方案虽然调整范围较大，困难较多，但能够比较彻底地解决问题。故他们在给胡乔木汇报上述想法的信中说明：“这张报纸的名字即可照你去年所说的‘大公新闻’，翻译起来还是等于‘大公报’和‘新闻报’一样。”这张报形式上还可以是半公半私的，“内容上则有了强的领导，不会如现在这样没法控制（如大公报随便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日本人民，日本报上翻译了出来，内容与苏联及周外长所提有不少出入）。"<sup>①</sup>

考虑到上述调整幅度太大，影响面太广，实际困难太多，夏衍等在11月下旬又再度提出了另外的调整建议。这个建议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调整实施的可行性，又能够解决上海无力承担太多报纸，尤其是《大公报》这种历史大报不易管理经营的麻烦。他们提出，考虑到各私营报纸都在亏损，“公家亦万难无止境地贴补维持”，必须要加以调整合并。他们建议，《新闻日报》和《新民晚报》暂时保存不动，《亦报》与《大报》两报实行合并，《文汇报》与若干有前途的出版社合并改组为公私合营的文汇出版印刷公司，《大公报》“似以靠近中央发挥其‘半官方’的作用为宜。”即“似以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为最好，否则，迁京与《光明日报》合并，成为政协机关报亦好。”“无论迁京或迁津，似仍可保留大公报名称，因为该报所以对内对外有其一定作用，其名称大有关系。”<sup>②</sup>

但是，无论是对前一项提议，还是对后一项提议，新闻总署都没有同意。在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开展前夕，上海市新协党组提议，各报似宜暂时都不做大的调整与合并，“大公报既已由中央决定留沪不去北京，应发挥其在国际上的作用。在国内则以大资产阶级与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并应多登国际新闻（现在各报都不能登全新华社所发国际消息）。"<sup>③</sup>

对此，王芸生最不赞成。对于此前的两项调整方案，王芸生都参加了意见，并明确表示只要“大公报”三个字能够保存下来，他个人进退均可不计。因为他很清楚，无论哪种调整办法，《大公报》基本上都可以保全下来。保持现状，只能是死

<sup>①</sup> 《夏衍、姚溱致胡乔木同志函》，1951年10月11日，上档A22-1-20-58-60。

<sup>②</sup> 《夏衍、恽逸群、姚溱致胡乔木同志函》，1952年1月4日，上档A22-1-20-34-35。

<sup>③</sup> 《陈虞孙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给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3-6。

路一条。

为了延续《大公报》的生命，王芸生以参加会议为由，专程北上赴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托人转呈，详细说明了《大公报》在上海已经办不下去，走投无路的情况。他明确提出，以《大公报》的历史地位和国际影响，无论如何不应听其自亡。故请毛泽东帮助，同意将《大公报》变成公营，并批准将《大公报》迁来北京，在中央支持下办成中央大报，以便继续发挥其国际国内影响。

让他意想不到的，毛泽东很快就做出了回应。

6月18日，王芸生在开会时见到统战部长李维汉，李当面告诉他：对《大公报》的“方针已定，可以谈谈。”

6月20日晚，北京市长彭真两度打电话给王芸生，告诉王应多考虑迁京办报的不利之处，希望他不要贸然离开上海，努力解决眼前困难。但彭也提出，万一上海实在不易生存，也可考虑一下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去天津的可能性。

王芸生没有马上答复彭真，次日，他写信给彭真，仍坚持原来的想法，称：“前晚电示两点，经考虑如次：1. 移京初期销路总是要少的。问题在能较好地发挥此报作用，树立起权威，销路是会打开的。2. 上海有其重要地位，将来还有发展，只是报多了，挤得手脚不灵，人力物力皆不经济，总以走开为佳。”<sup>①</sup>

6月30日晚，统战部副部长徐冰、《人民日报》社社长范长江等受命与王芸生进一步进行了商洽。王芸生坚持《大公报》必须要实行公营才有前途。他说：“私人办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由于党和政府在群众中拥有极高的威信，只有公营才吃得开。”他举出上海《新闻日报》宣传自己是公私合营，销路马上打开的例子，要求中央无论如何尽快将《大公报》公营化。当然，他表示，可以暂不宣布，内部实行。对此，徐冰根据既定方针，明确表示《大公报》必须维持私营面貌，但中央可以帮助解决困难。王最后表示同意，要求中央一定要予以实际的帮助，“不要像过去一样拖延而不解决实际问题”。

徐冰提出，《大公报》应成为党报的助手，多做国际宣传方面的工作。同时建议将《大公报》先办成华东方面的教师报，将来逐渐向全国教师报方向发展，还是应当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要工作对象。王芸生明确表示愿意接受这两点。他并且告诉徐冰说：“当亚洲及太平洋沿岸和平会议筹备会在京召开的时候，他就曾想写些文章。后因上海市府新闻出版处通知各报不要写而作罢。”他对地方政府时常干预

<sup>①</sup> 《王芸生给彭真的信》，1952年6月22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北档），1-6-584-33。



报纸宣传这一点很不满，认为总是遇到这样的干预，工作很难开展。他要求中央能够在国际宣传方面给予明确的指示和任务。

王芸生并且介绍了他所了解的国内高级知识分子的状况。他说，如果算上在校大专学生，上海有高级知识分子 9.2 万人。属于工会系统的有 5.3 万人，其中金融、店员工会成员有 2.1 万人，教育工会成员只有 0.94 万人，大专学生有 2.3 万余人。因此，所谓高级知识分子群体，其实与《解放日报》、《新闻日报》和《文汇报》的读者对象，都有交叉。事实上，长期以来，上海工商界上层分子 300 余户始终是《大公报》的读者，外埠工商界读者也有一万二三千户，因此《大公报》依旧可以做工商界的工作。

王芸生还特别提议，请中央允许杨刚来北京办事处工作，因杨刚和中央各级领导同志熟悉，比较容易开展工作。他并希望中央能抽调党员干部五六人到《大公报》来工作，并希望有负责同志能来报社帮助说服那些对《大公报》前途失去信心的干部，使他们能够安心工作。<sup>①</sup>

范长江在谈话中提到，现在全国范围确实缺少一份针对教师的报纸，如果《大公报》以后能办成全国性教师报纸的话，迁来北京也许可以考虑考虑。

王芸生当晚考虑了一个晚上，对留在上海办报的前途还是顾忌极大。第二天，他分别给徐冰、范长江和彭真去信，一方面表示对昨晚的畅谈“感奋之至”，另一方面则表示：“昨晚所谈，皆是就留在上海的补苴之策。细加思考，沪报如此之多，分工实在困难，敷衍下去，前途日窄，把报一天天办坏下去，有负中央的期望，故甚踌躇。”他提出：“长江同志所提迁京作教师报之议，我极赞成，望作考虑。”但因范地位不够，王芸生不敢奢望，因此，他再度提到彭真 20 日晚的提议。他写道：“彭真同志曾与我谈起将大公报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之议，我以为很可研究。此论有几点好处：1. 天津是大公报旧地，接近北京，地利人和，便于中央领导；2. 进步日报工作者多是大公报旧人，容易合作，津沪合并，人力加强，干部问题解决了；3. 进步日报有两万份销路，可以完全保持；4. 天津附近日本朝鲜，有利于国际宣传；5. 从工业与文化上看，天津是发展的，比重日增；6. 进步日报也正感前途苦闷，合并无大阻碍。我以为此案可行，远胜留在上海。请中央考虑”。<sup>②</sup>

对于王芸生的态度，徐冰亦感到为难。他写信给彭真，说明：“看样子，我

<sup>①</sup> 徐冰：《王芸生关于大公报问题的意见》，1952年6月30日，北档1-6-584-3-4。

<sup>②</sup> 《王芸生给徐冰的信》，1952年7月1日；《王芸生给范长江的信》，1952年7月1日；《王芸生给彭真的信》，1952年7月1日，北档1-6-584-2，5，35。

们与王芸生的谈话并未能满足他的希望，我们在与他谈话中，打掉了他的一些幻想，如恢复大公报权威以及直接通天的幻想等等，但并没有打断他离开上海的想法。”“他现在不提再迁来北京，但他又提出迁赴天津的意见，作为一家私营报纸，他是有迁移自由的，我们不好硬说服他留在上海。”徐冰表示：“这部报纸还有作用，王芸生亦还应该争取；如果一定要他留在上海，自然亦还可以说服他，但结果一定是不欢而散，他虽然不会带着棺材回去，但一定是怀着满腹牢骚与不快回去，心里总是存着一个疙瘩，这样对于合作是不大有利的，请您考虑。”徐冰提出：“请您先把是否允许他迁移北京、天津的要求考虑一下，给我一个指示，我好再与他谈。”<sup>①</sup>

彭真接徐冰3日信后，把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表示，可以将《大公报》与《进步日报》合并，迁到北京来。9日，毛泽东接见了王芸生，当面向他宣布了中央的决定：“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择地建新馆，报名仍叫《大公报》。作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全国性政治类大报，分工报道财经政策和国际新闻。两报合并迁京，富余人员由津沪两地政府负责接收，安排适当的工作。”

王芸生听罢愁云顿消，激动得说不出话。毛见状打趣地说：“大公王，恭喜你收复失地了！”王表示担心两报合并后不好管理，并说两报的编采人员可能不是很熟悉财经业务方面的工作，毛说：“你们两家本来是一家人嘛！《大公报》人才济济，团结起来，钻进去，三年五年不就熟悉了吗！”<sup>②</sup>

7月11日，兴奋异常的王芸生订了返沪的车票急于回上海向报社同仁宣布这一绝好消息。行前，他专门去信彭真表示感谢。函称：“大公报前途得到安顿，深深感谢您的大力。承主席如此关切，尤其感奋，誓以余力办好这张报，以发挥它的作用。我今天返沪，（孟）秋江同志日内会去沪，进行筹备工作，预期在十月间实现。对您有说不尽的感谢，还望不尽地协助。恕不走辞。”<sup>③</sup>

本来，上海就一直在考虑如何合并和减少报纸的问题，这一结果正好帮助上海方面解决了问题。因此，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启动之时，《大公报》北上迁京的计划已经内定了。新协党组力保王芸生过关，也就成了一件必然之事。

毛泽东所以会特别关照王芸生和《大公报》，除了毛对“大公报”这块老牌子有些好感，无意使其倒闭关张外，主要恐怕还是与王芸生在“五反”运动中那篇洋

① 《徐冰给彭真的信》，1952年7月3日，北档1-6-584-1。

② 转见王鹏：《建国初大公报的一段曲折》，《炎黄春秋》2005年第8期。

③ 《王芸生给彭真的信》，1952年7月11日，北档1-6-584-36。

洋洒洒地为中共证明资产阶级确实忘恩负义、猖狂进攻的文章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有关。这也正是毛会想到让过去从来没有在财经报道方面展现过才华和特色的《大公报》，改成一张财经方面的全国性专业报纸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这一点，只要注意到毛泽东这时正在酝酿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一重要政治背景，就不难有所了解。

6月6日，毛泽东在建国后第一次对统战部所拟《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的批语中正式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sup>①</sup>9月24日，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准备“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sup>②</sup>这意味着，毛泽东这时正在考虑如何加速推进资本主义工商业所有制改造，实现社会主义，由此也就决定了他已开始把准备全面展开与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乃至政治上的斗争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出于这种考量，王芸生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在认识和揭批资产阶级本性方面的作用，以及《大公报》在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工商界中的影响力，显然都对毛泽东实现其下一阶段斗争任务和改造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利用价值。

就这样，王芸生可以说是鬼使神差般地再度“挽救”了《大公报》。因为，《大公报》北上和改向财经，不仅合并了《进步日报》，收复了“失地”，而且作为中央大报专门面向工商业界之后，销路和广告均不再成问题了。尽管《大公报》很快实现了公私合营，王芸生对报纸的主导权完全失去，但自上海解放后，他又何尝有过什么“三权”呢？最主要的希望，即保留下“大公报”三个字的目的却已达到了。

关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大公报》作用的高度重视，必将有助于《大公报》一改过去的窘况，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风顺水的情况，只要读一下1954年10月6日中央宣传部前所未有地专门为《大公报》下发给中央单位及各省市相关部门党组的《关于大公报若干问题的通知》，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通知》说：

一、中央曾明确规定《大公报》以财政经济贸易方面的工作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其主要的宣传报道内容，并准备条件向财政经济方面的专业

<sup>①</sup> 毛泽东《对〈关于民主党派工作决定（草稿）的批语〉》，1952年6月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58页。

<sup>②</sup> 转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编后记），第693页。



报纸的方向发展。此外，并可适当注意配合国际问题的宣传和报道。这一方针今后仍应继续贯彻执行。现在《大公报》实际已是党领导的公私合营的报纸，但为适应国内外的政治情况，目前对外仍保持私营的面目。各有关地区和部门的党组织应根据中央这一指示的精神对待《大公报》，并予以应得的协助。

二、《大公报》编辑部的主要部分决定逐步由天津迁移北京，由中央宣传部通过该报的党组实现党的领导。但天津市委仍应负责领导和管理该报在天津部分的日常工作和党的生活，特别是要负责领导该报有关天津市的工作的宣传，包括财经贸易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方面的宣传；并协助其逐步解决所需的工作干部，纯洁和整顿该报的编辑部。《大公报》企业经营方面的问题，应由中央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统一管理。

三、中央一级及各省市财经工作部门的党组和党员负责人应切实执行中央关于重视运用《大公报》进行宣传报道的通知，对《大公报》的宣传报道工作予以指导和协助。例如，吸收他们的党员干部参加有关的会议，阅读有关的文件，指导《大公报》记者进行采访工作，审阅《大公报》有关的言论等。<sup>①</sup>

把《大公报》当做党报来办，并且明文规定中央及各级财经部门必须重视利用和提供各种便利，如此种种，都使《大公报》彻底摆脱了生存危机和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从而得以又存活了十几年的时间。<sup>②</sup>

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和全国其他存续下来的私营报纸一样，经过改造后的《大公报》，自宣告“新生”之日起，就已经不再是民国年间的那张《大公报》了，并日渐发展成为一份全面服务于党的宣传任务的专业党报了。

<sup>①</sup>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大公报若干问题的通知》，1954年10月6日。

<sup>②</sup> 《大公报》一直到1966年9月10日因“文革”爆发其报名受到造反派指责宣告停刊改出《前进报》，《前进报》到12月31日亦告停办。

# 政治生存与经济生存： 上海商人如何走上公私合营之路？

(1949 ~ 1957)

冯筱才\*

**摘要** “公私合营”，是1949年中共建政后对私营工商企业及个体工商从业者采取的一种过渡性产权转换政策，其目的在于消灭私营经济的存在，于全国范围内实现工商业的公有化。在不同阶段，“公私合营”政策存在显著的差别，不同的工商人群对“公私合营”也有不同的理解。初期的“公私合营”主要与接收“官僚资本”有关。“三反五反”时期，政府用合营的办法抵充私企负债，公私合营企业因此增加。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政府选择性地将一些“有前途”的大中型私营企业乃至行业逐步加以吸收，以壮大“国营经济”的力量。到1955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政策转向激进，全国各地掀起“合营高潮”，“公私合营”成为各级中共干部非理性“政绩数字竞赛”的平台。在合营动员过程中，许多原来戴着“资本家”帽子的工商业者也希望“合营”能给他们带来“平等政治生存权”，而对一些收入不稳定的小商贩或生活困难的手工业个体户来说，“公私合营”更可能是一场广泛的经济生存、保障资格登记运动。各方面人士对“政治生存”与“经济生存”的考量贯穿于整个“公私合营”政策推行的过程，所谓“改造资产阶级”的抽象理想实际上不可能实现。

**关键词** 公私合营 “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 商人 干部 生存策略

\* 作者冯筱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 一、前言

对于半个多世纪的中共建政历史来说,1955年无疑具有重要的界标意义。在这一年,“新民主主义社会”被人为提前中止,短短的几个月中,全中国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狂飙。在最高层的发动下,一场针对私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迅速席卷整个中国大陆。私营工商业几乎一夜间突然消失,直至1970年代末邓小平执掌政局后才重新浮出并渐渐成长。时至今日,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在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快接近四分之三的比重。<sup>①</sup>人们不由得要好奇地发问:既然私营经济今天重获合法身份,当初政府为什么要那么仓促地推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呢?对这段历史,官方主流说法一直持基本肯定的态度,但也承认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单一”。<sup>②</sup>问题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在呼应这种明显偏激的政策呢?当时那些参与其中的人究竟是何种心态呢?尤其是当时被改造的对象——众多的私营工商业者,他们为什么要“敲锣打鼓”申请公私合营?

最近,有关1950年代时期历史的研究日渐增加,不过,就“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这个论题而言,学术界专题性的成果并不多。<sup>③</sup>陈永发曾用“安乐死”来形容中共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通过各种运动,打击私营工商企

<sup>①</sup> 据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最新发表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第三卷(2005~200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一书披露,在未来的五年内,中国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将达3/4,私营企业数量将占全国企业总数的70%以上。

<sup>②</sup>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06~437页。

<sup>③</sup> 泰维斯(Frederick C. Teiwes)在他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一书所撰的章节中对此只有短短的几小段叙述文字。不过他仍然敏锐地注意到运动过程中一些重要的关节点,如农村合作化的提前实现对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影响,毛泽东与工商界代表谈话的推动作用,北京市长彭真的超速示范等。Roderick MacFarquhar, John King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t. I: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 ~ 196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20 ~ 121. 专题性成果方面,主要可以参见桂勇:《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城市企业产权的政治重构(1949~1956)》,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年;李福钟:《新民主主义时期(1949~1956)中国共产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2年,第189~232页;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622~657页。不过,与此相关的“新民主主义为什么终结”的问题,汉语界倒有一些讨论。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关于俄国模式的影响问题》,《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五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变》,《二十一世纪》第13期,1992年10月;李福钟:《中国共产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0期,2003年6月。



政治生存与经济生存：上海商人如何走上公私合营之路？

业的社会信誉，摧毁其道德正当性和团结性；一方面通过资金、原料和市场的协助，扩大私营工商业业主的依赖性。所以当中共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号召，绝大多数私营工商业业主只有积极响应，“自愿接受改造”。<sup>①</sup>桂勇则以“穷途末路”来形容当时私营企业主的状态。他认为“自觉、自愿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唯一选择，因为其他的任何一条道路都已经被堵死了”。因此，他认为接受改造是资本家们理性的选择。<sup>②</sup>杨奎松比较强调“三反”、“五反”运动对“工商界资本家们”的深刻影响，所以当中共准备“稳扎稳打的所有制改造刚开始付诸实施，本来就如坐针毡的资本家们便争先恐后地、甚至是敲锣打鼓地把他们的工厂企业统统送给了政府。结果，原来计划要10~15年才应当完成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计划，转瞬之间就轻松地实现了。”<sup>③</sup>

概念的厘清有时对历史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探讨1950年代的历史尤其如此。“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提法，其实便隐含着将“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当作一个整体的预设，这个预设几乎充斥在官方公开的报道以及政策宣传书刊、档案材料之中。由于受“材料话语”浸染的影响，研究者可能会在潜意识中接受这个预设，以一种“整体”眼光来判断当时卷入运动的大大小小的私营工商业者。<sup>④</sup>相应地，将“改造”这个概念与这些不同层级的工商业者联系起来，似乎也预设他们对“改造”的意义及其后果有着清楚的认识，因此他们才会“敲锣打鼓”欢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些源自主流宣传话语体系的概念，遮蔽了这幅历史图像中更为多元丰富的板块，甚至诱使研究者得出一些简单化的历史解释。

与概念有关的是，研究者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描述，也往往侧重于1949年中共建政后私营工商业者的遭遇，并以此来说明“自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背后的逻辑。尽管这种“背景性因素”对于我们理解这一历史事件有相当的帮助，但许多偶发的“即时性因素”却常被研究者所忽略。事件的实像也往往因为一些线条的过分凸显而无法完整呈现出来，许多重要的细节隐藏在粗线条的阴影之中不易为人所察

<sup>①</sup> 《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第622~657页；陈永发：《中共建国初期的工商税收——以天津和上海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8期，2005年6月。

<sup>②</sup> 《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城市企业产权的政治重构（1949~1956）》，第23~30页。

<sup>③</sup> 杨奎松：《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

<sup>④</sup> 如果要把这些私营工商业者用一个概念来描述，我宁愿用“商人”而非“资产阶级”。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参加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不仅包括大大小小的商人，也包括一些手工业者，甚至自由职业者、失业人员等等。本文主要讨论作为主体的“商人”的心态，这里所说的“商人”，既包括较大规模工商企业的负责人，也包括中小厂店的老板，以及固定或流动的小商小贩。

觉。以政府推广“公私合营”的计划而论，<sup>①</sup>此事从中共宣布成立新中国之后便已经开始酝酿，并在谨慎实践中慢慢形成一套较有条理的方案，最后这套方案又被放弃，转而采用激进突变的方式在形式上完成私营工商业性质的转换，其间的变化脉络值得仔细推敲。这个过程中，不同层级私营工商业者的反应是有差异的，<sup>②</sup>同一层级的工商业者在不同的阶段也有着不同的利益选择考量；甚或同一层级内部，对此事也有着完全不同的认知心态与行动选择。因此，研究者需要谨慎地通过对资料的分析来作出自己的判断。

私有财产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无论是一个大工厂的产权或支配权，还是一个小商摊的所有权。正常情形下，人们不会轻易放弃私有财产，无论是一个大工厂的产权或支配权，还是一个小商摊的所有权。经营遇上困难，是否就一定会赞成公私合营？原料与市场受制于人，是否一定会主动申请公私合营？在笔者看来，这些都未必能构成牢固的因果关系。我们不能将事后一些理论家以及政治人物的言辞，作为这些商人在当时场景中真实心态的写照。我们需要深入具体的历史情境，去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下，不同的心态是什么？<sup>③</sup>

固然，今天我们要试图准确推断出50年前中国私营工商业者人们的实际想法，是非常困难的。不但地域差异性甚大，可靠的资料也不容易搜集到。目前大多数提及这一事件的著述，其资料来源均为当局各级机构公开的信息。私人叙述部分，虽然有一些当事人还在世，但他们是否愿意直言无讳也是一个问题。不过，笔者在资料调查中发现，各级部门在参与此一历史事件过程中所形成的许多内部文件与材料能够提供大量相对可信的信息。这些档案文件现在有许多已经解密，为我们了解此一重要的历史事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本文即以上海档案馆收藏的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有关机构的档案为资料重心，同时结合其他一些材料，来集中探讨1949年后上海市私营工商业者如何相继步入公私合营之路。

<sup>①</sup> 这些计划在官方文件中更多地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来表示。但笔者认为，讨论这一段历史时，用“公私合营”较“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概念上可能更为妥实。无论是当时私营工商业者本人，或者基层政府干部，以及去推动“高潮”的积极分子，乃至普通的厂店职工，他们当时稍能理解的还是“公私合营”这一个词语。他们对政策的反应也是建立在对这个概念理解基础上的。相反，从资料中可以看到，他们对“改造”这一概念是相当困惑的。

<sup>②</sup> 如陈永发所说，研究者不能把纱业大王荣德生与糊口为生的小贩混为一谈。参见陈永发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622页。

<sup>③</sup> Rashid Malik 在其研究中曾经提出有点类似的问题。Rashid Malik, *Chinese Entrepreneur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London: Praeger publisher, 1997), p.37。

## 二、“五反”前后上海工商界的处境与初期的公私合营企业

1952年的“五反”运动可算是迄今为止中共历史上最严厉打击商人的政治运动，官方宣称其目的是为了“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国营经济、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sup>①</sup>在被王芸生称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大本营”的上海，<sup>②</sup>“五反”运动席卷了整个工商界，对私营工商业者造成深远的影响。<sup>③</sup>上海较早一些公私合营企业的促成也可以“五反”运动为界线。

### 1. “五反”前上海工商界的状况

中共在取得全国政权前，对商人的政策一直是刚柔并济，软硬兼施。策略性地运用商人的力量来为自己协力，对中共在政治角逐中的胜利具有相当关键的作用。<sup>④</sup>

① 何永红：《“五反”运动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1页。

② 王芸生：《打垮资产阶级在上海的深沟高垒》，《人民日报》1952年3月26日，第3版。

③ 有关上海“五反”运动的过程及其对工商界的影响等可参见以下著述：John Cardner, *The Wu-fan Campaign in Shanghai: A Study in the Consolidation of Urban Control*, in A. Doak Barnett ed.,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pp. 477 ~ 539; 杨奎松：《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城市企业产权的政治重构》（1949～1956），第51～100页。

④ 中共曾经因应时势需要，颁发过不少保护工商业的文件。如1948年2月中共中央就保护工商业特别做出指示，严厉批评晋绥以及华北、东北等地区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认为地方干部未能“将消灭地富之封建剥削与保护地富经营之工商业严格区别，未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与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妨碍工人与人民革命事业持久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区别”，“反而是引导工人追求片面的眼前利益，盲目地将工人及自己一同引入绝路。还有带有毁灭性的工商业税收政策。”指示认为“对工商业左倾冒险的政策，已至极端危险与不能忍受的程度。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与杀人五个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中共中央关于保护工商业问题的指示》，1948年2月，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编：《统战政策文件汇编》第1册，1958年，第271～272页。



在建政初期，工商界人士仍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对象。<sup>①</sup>

1949年5月，上海易手，中共中央华东局接管了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虽然此前已有一批商人带着对共产党的恐惧逃离，但大多数人此时仍留在上海。28日，上海市政府成立。6月2日，新政府即邀请上海工商界各业代表300余人举行座谈会，表达宣慰之意，介绍中共“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sup>②</sup>会后陈毅等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还应邀出席几位商人的家宴，以示亲近。<sup>③</sup>也有许多上海商人已经在与新政府合作。陈毅则表示要保护一切“正当工商业”，让“中共将严厉压迫资方”的谣言破产。<sup>④</sup>

当时局势尚未稳定，战争状态仍未完全解除，投机之风甚烈。中共为了推广人民币，以强力稳定物价，查封证券交易大楼，逮捕“不法商人”。为了应付正在进行的军事财政需要，政府也加紧工商税的征缴工作，积极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sup>⑤</sup>上海工商各业在此情形下困难重重，到1950年“二六轰炸”后，工厂商店歇业益增，数十位主要工业企业的负责人出走。<sup>⑥</sup>最高层决定开始以统筹兼顾的名义对私

<sup>①</sup> 虽然当时中共在许多方面都想得到工商界人士的协力，但中共内部不少人对“资产阶级”持消灭态度。据曾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的周而复回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在1950年3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即表示要把“资产阶级”作为斗争对象，要“先公后私”，壮大国营经济，排斥私营经济。（周而复：《往事回忆录》（二），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第30～32页。）在对这次会议材料的批示中，毛反对南汉宸的看法（毛泽东：《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上的批语》，1950年4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92～294页）。不过，正如杨奎松所评论的“中共多数领导人没有因为客观现实的需要和政策上的调整，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本质的看法”。杨奎松：《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即使在上海，中共税收干部对陈毅嘴里所讲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税收就是政策”，对钻空子的商人，就是要“鸡蛋里挑骨头”，重罚他们。林同华主编：《蔡北华文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226页。

<sup>②</sup> 《蔡北华文集》，第224页；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档案馆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1453页。

<sup>③</sup> 《蔡北华文集》，第224～225页。

<sup>④</sup> 上海市军管会、上海市人民政府：《政策法令汇编》，上海：西南服务团办公室，1949年，第26页。

<sup>⑤</sup> 为了表现政治上的进步，一些持合作态度的商人认购了相当巨额的公债。由于经营环境未有改善，轰炸与封锁持续存在，银根紧缩，市场呆滞。因此，尽管政府采取各种催付手段，上海工商界最终仍未能完成3千万分的认购任务。《上海市推销人民折实胜利公债史料》，《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3期，第15～22页。

<sup>⑥</sup> 《上海私营工商业停业增多》，《内部参考》第145号，1950年5月17日，第29～32页；《上海各业资方出走情况》，《内部参考》第147号，1950年5月19日，第50～51页。“二·六轰炸”指1950年2月6日，国民党军派17架飞机轰炸上海市重要的电力及自来水等工厂，造成上海全面停水、停电，及1500余人的伤亡。

营工商业进行暂时性的扶助。<sup>①</sup>上海工商界的困境借此稍有纾缓。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上海工商界又面临新的巨额捐献任务。同时发动起来的镇反运动，也让商人们心理上受到强烈的震动。<sup>②</sup>经由新成立的上海工商联联合会及改组完毕的各业同业公会的推动，以及外地不断公布的捐献成绩的压力下，上海商人被迫将抗美援朝捐献数字层层加码，1951年7月以工商界名义公布的捐献数字达到270架战斗机，折合为4050亿元人民币。<sup>③</sup>这无疑给上海私营工商业主又增加了一笔沉重负担。

## 2. “五反”前上海的公私合营企业

所谓“公私合营”企业，从字面上来看，即“公家”与“私人”合作经营的企业。原义与一般所说的“官商合办”企业应无差别。这种“公私合营企业”，实际上在中共建政前的一些根据地中已经出现。<sup>④</sup>接管政权后，由于一些私营企业中存在着所谓“公股”，<sup>⑤</sup>政府有时会派员参加管理，甚至因公股比例较大，将企业予以接管。不过，对于公私合营企业的定义及其具体操作方针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政务院曾经规定“凡政府与私人资本合资，政府参加经济管理的企业，称‘公私合营企业’”，但各地对此一规定的解释并不相同。因此1953年2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重新作出解释，强调“并不是只要合资就可称公私合营”，同时要考虑国家是否派

<sup>①</sup> 这些政策包括扩大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鼓励出口滞销物资；组织资金周转；调整国营商业经营范围和批零差价等等。《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1465页。

<sup>②</sup> 有关上海镇反运动的大致情形，可参见钱丽君：《上海解放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69～83页；杨奎松：《新中国巩固政权的最初尝试——以上海镇反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上海的镇反运动中，官方公布的数字称全市共逮捕“反革命分子”25100名，其中2546人被处决（上引钱丽君文，第77页）。笔者尚不清楚这些人中具体有多少以经商为业，不过即从“公私合营”有关档案的翻阅中，便可以经常发现一些厂店因负责人被抓坐牢或被管制劳改而陷于停顿的记载。

<sup>③</sup> 上海工商界开始提出捐献9架飞机，后来看到天津工商界已捐献20多架的消息，上海工商界又提出捐献27架。当新华社播发“山东捐献空军师”的新闻（共120余架），上海工商界被迫在此基础上追加至270架飞机，是其最早想认捐数字的30倍。《上海工人捐献热烈，工商界踌躇不前顾虑尚多》，《内部参考》第114号，1951年7月3日，第9～10页；张亚培编：《上海工商社团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sup>④</sup> 1946年4月，任弼时讨论解放区的经济建设问题曾经要求各地必须尽最大努力，恢复与建立必需的近代轻工业，并称“这些企业可以用国营、公私合营和私营的方式。”任弼时：《于解放区经济建设和财政金融贸易的基本方针》，《经济日报》1946年4月27日。1948年后，东北的公私合营企业发展较快，许多便是公私合股开设。马骏杰：《公私合营形式探源》，《党史博采》1996年第4期。

<sup>⑤</sup> 主要为国民政府时期“四行一局”的投资以及被中共划为“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等人士的投资。



员管理及公私资本比重大小，“凡企业公股所占比例在百分之十之下，且国家未派专职干部参加经营管理者，可视同私营企业。”<sup>①</sup>

中共在接管上海后，除接收了前政府经营的企业外，也对一些官股比例较大的企业实行军管或代管，这构成了公私合营企业的主要部分。1949年底统计显示，上海全市公私合营的企业共15个。<sup>②</sup>1951年1月，政务院颁布《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sup>③</sup>将一部分含有公股的合伙企业改组成公私合营企业。<sup>④</sup>是年7月的统计显示：上海市当时有公私合营企业486个，绝大多数是接收“国民党的官僚资本”而来。其中，企业公股股权比重在10%以下的占76%，30%以上的有121家。<sup>⑤</sup>除了此种类型外，也有少数公私合营企业是由其他原因而促成的。

上海曾经是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主要城市，因此，有的企业在解放前便有中共地下党的投资，甚至有以共产党为主、与其他商人一同发起组织者。如1946年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刘晓以“刘镜清”的化名入股关勒铭金笔厂并担任董事。1951年7月，这部分投资转为公股，关勒铭金笔厂遂成为公私合营企业。<sup>⑥</sup>相似的，1943年，中共党内财会方面负责人之一龚饮冰，在重庆以党内公费与范旭东等人合伙创办建业银行，股份占50%以上，并担任总经理等职。1946年该行总管理处迁沪。1950年4月，由于经营困难，由仍任该行董事长的龚饮冰出面申请公私合营并获批准。<sup>⑦</sup>这类企业之所以能够公私合营，除了公股的原因，另外也许与企业本身的人脉关系有关。

类似以内部脉络而合营的又如上海中国标准铅笔厂。该公司总经理为吴羹梅，与中共关系密切。1949年8月，他以响应市政府内迁号召的名义，用公私合营方式迁去部分设备创办哈尔滨中国标准铅笔公司，合营后获得政府贷款以解除经济困难。1950年5月，他又将上海、重庆两地的中国标准铅笔厂申请实现

<sup>①</sup> 《中财委关于公私合营企业定义的解释》，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编：《工商行政通报》第5期，1953年3月20日，第4页。

<sup>②</sup>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1460～1461页。

<sup>③</sup> 《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工商情况通报》1951年2月15日，第1～2页。

<sup>④</sup> 按此办法规定，除了改组公私合营外，政府也用“撤回公股”、“暂维现状”两种办法来处理。

<sup>⑤</sup> 《上海市公私合营企业情况和问题》，《工商情况通报》第15期，1951年7月5日，第3～4页。

<sup>⑥</sup>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1476页。

<sup>⑦</sup>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1102页；《建业银行奉准公私合营》，《文汇报》1950年7月7日。龚饮冰当时正担任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总经理。



了公私合营。<sup>①</sup>

另外，市政府也有可能因某些企业有名望或与国防军需攸关加入投资，使企业成为合营。此种类型并不太多。上海华通电机厂是上海电器行业最好的名牌企业，被称为中国低压电器工业的奠基者。1949年5月，上海市军管会甫一成立，华东工业部即派军代表陈文全等到该厂商议筹备公私合营事宜。<sup>②</sup>9月，华通厂正式提出申请，12月正式宣布公私合营。合营后，华东工业部在资金方面对该厂予以投资，并增加技术人员。<sup>③</sup>中华造船机器厂也是中国私营机器造船业著名企业，据说该厂负责人杨俊生1951年5月主动申请工厂公私合营，1952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批准投资50亿元实行公私合营。<sup>④</sup>其他如新光内衣染织厂、光中染织厂、元通漂染厂、新丰印染厂等1951年实现公私合营工厂均是行业中的翘楚。

可见，除了因为被动接受以前的“官僚资本”造成的公私合营企业外，此时政府在主动接受私营企业合作的问题上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对合营条件的审核把关甚

<sup>①</sup> 吴早年加入过共产党，抗战时期在重庆与中共来往甚多，参与发起迁川工厂联合会以及中国民主建国会等。1949年6月，吴奉周恩来指示返回上海配合军管会恢复上海的工业生产。9月，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随即被任命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贺贤稷编：《上海轻工业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924～925页。又参考“中国第一铅笔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http://www.chinafirstpencil.com/gywm/dsj.htm>；《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1005页。1949年上海市政府成立后，由于形势困难，动员部分工厂内迁。《政策法规汇编》，第5页。

<sup>②</sup> “华通八十六年大事记”，引自杭申控股集团网页：<http://www.hangshengroup.com/huatong.htm>。

<sup>③</sup>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1047页；《上海华通电机厂改组为公私合营》，《文汇报》1949年12月31日。华通电机厂之所以能够被当局相中，应与此时正担任华东工业部经理处处长的金芝轩（机械专家，与华通资方为浙江镇海同乡）、华东工业部电器工业处处长恽震（电器工程专家）、副处长褚应璜（电器工程专家）等人有关。据恽震回忆，华通厂被核定为公私合营后，“使其他私营公司尤其是规模较大的华生电机厂的叶友才先生十分羡慕，不断地向恽处长要求，恽向汪道涵部长请示，当时因时机未成熟，予以满意答复”。恽震：《电力电工专家恽震自述（二）》，《中国科技史料》2000年第4期。

<sup>④</sup> 据公私合营后政府派到该厂的公方代表报告，杨俊生之所以申请公私合营是基于以下几种想法：（1）认为（对企业）无法全面领导，只能在技术方面领导；（2）认为公股派来干部后，即有公的支持，私股胆子也壮起来了；（3）有了公家扶助，发展一定较快；（4）合营后公家投资一大笔钱，排场大，吃得开。《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城市企业产权的政治重构（1949～1956）》，第236页。作者在书中使用化名处理原来的企业名称以及负责人姓名。杨俊生化名穆易，中华造船机器厂化名兴中造船厂。

严，<sup>①</sup>主管公私合营企业的部门，此时对合营也尚未形成系统的具体的工作方针和办法。<sup>②</sup>从有关文本上来看，合营企业的管理此时仍强调股东会与董事会的作用及尊重股权的比例，只是在有关“公私关系”的问题上，表示要用“公私协商”的办法解决。<sup>③</sup>

### 3. “五反”后的“献厂”与公私合营

“五反”运动对上海工商界来说，无异于一次有巨大杀伤力的风暴。<sup>④</sup>1952年2月，上海市军管会与市政府即宣布四项办法，约束私营工商业主的行动，号召职工起来检举，<sup>⑤</sup>这意味着“五反”运动已经开始。随即，上海市政府将运动的主导权从工商联及同业公会手上收回，运动在上海汹涌展开。<sup>⑥</sup>在强大压力下，上海频频发生商人自杀事件，<sup>⑦</sup>一些人为了保命，随意编造违法金额，<sup>⑧</sup>最后从整个上海商人的口中挖出的“五反”退补款达到10万亿元。<sup>⑨</sup>

<sup>①</sup> 据中央私营企业局的说法，公私合营条件应该包括：(1) 该企业是否为国计民生所必需？(2) 有没有发展的前途？(3) 合营后，会不会令我们背上了包袱，陷于被动？如有困难，是否可以不用合营的方式，以加工、订货、贷款等方式予以解决？(4) 合营是否出于自愿？(合营必须在自愿基础上，勉强合营必然会成为貌合神离，经营不好。)《做好公股公产清理工作》，《工商情况通报》第8期，1951年2月15日，第5页。对饭堂、澡堂、戏院等有“官僚资本”的小企业并不主张一律合营。《关于公股公产清理办法的说明》，《工商情况通报》第8期，1951年2月15日，第4页。

<sup>②</sup> 《上海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工商情况通报》第16期，1951年8月1日，第12页。

<sup>③</sup> 《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工商情况通报》第8期，1951年2月15日，第2页。

<sup>④</sup> “五反”之前，上海即有配合“三反”运动针对工商界的“四反”运动。官方报纸称“不法商人”已经处在“四面包围”之中，即所谓“上有国家（法律制裁），下有子弟（检举），旁有工会，内有店员（检举）”。《上海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进入高潮，围剿大贪污犯的强大攻势正在展开》，《文汇报》1952年2月1日，第1版。

<sup>⑤</sup> 这四项办法是：1. 私营商店、企业的主要负责人，不准请假离开本企业（已彻底坦白者例外）；2. 任何行业在运动期间不准歇业，不准解雇；3. 私自宣布歇业与解雇者都是非法的，一律无效；4. 保证店员、职员、工人等的爱国检举运动。《保障三反与五反运动迅速开展，军管会和市府宣布四项办法》，《文汇报》1952年2月4日，第1版。

<sup>⑥</sup> 《向不法商人全面进攻》，《文汇报》1952年2月6日，第5版。

<sup>⑦</sup> 到2月25日奉命督战的薄一波到达上海前，据公开消息，当局已逮捕了200多人，发生资本家自杀事件48起，死34人。《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67页。根据杨奎松援引的档案材料，从2月初到4月初不到2个月的时间，上海已经有超过222位“资本家”自杀死亡。杨奎松：《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Rashid Malik在其书里提及整个“五反”运动过程中，上海有几千自杀，30万人被抓去劳动改造。《Chinese Entrepreneur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p.33。

<sup>⑧</sup> 杨奎松：《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公私合营前后的上海信谊药厂——一个工商业者的自述》，《纵横》1997年第5期。

<sup>⑨</sup> 杨奎松：《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五反”使上海私营工商业受创甚深。1952年11月，官方内部消息称：“由于私营企业经过“五反”、物价下降及其他原因，经济力量极其虚弱。而私营银行钱庄被淘汰，使资金周转更见困难。加以国家控制了主要的工业原料，重要产品都由国家委托加工或订货，包购包销，规格较前严，利润较前少（偷工减料也较前困难），物资交流运动中产销直接见面，中转商人阵地缩小，再加上本身经营管理不善及若干行业供、产、销有困难，以及对劳资关系的顾虑，私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不高。”<sup>①</sup>另外，上海工商界的困难也可以从税收难以正常征缴以及劳资问题急剧恶化看出。1952年1～9月所得税，仅中小工厂欠税户即高达45000户，被解雇工人达53000多人，劳资纠纷案件高达13500余件，失业工人频频闹事。<sup>②</sup>

“五反”运动使许多私营商人在自己企业中的威信大为下降。身为“资本家”或者名列“资产阶级”之伍，在旁人眼里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身份”。政府也承认，“五反”后资本家实际上丧失了或基本上丧失了控制企业的权力，无论是所有权、使用权、用人权和经营管理权，都受到极大的侵蚀，甚至被剥夺一空。<sup>③</sup>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商人想干脆将厂店献给政府，以摆脱困境。政府则斥责这些商人是想保留“消费财产”，甩掉包袱，过舒服日子，不允许他们关厂关店，要求他们将所谓“账外财产”、“逃避资金”填到企业空洞里来。<sup>④</sup>考虑到政治影响与财政能力，政府无疑不想在这个时候把这个包袱背到自己身上。此前，周恩来在与参加全国工商联第二次常委会议的代表座谈时，即称“现在谈‘献厂’没有必要”，“不仅做不到，而且会发生大毛病。将来要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要作很好的安排。”<sup>⑤</sup>

<sup>①</sup> 《最近上海经济情况的分析和上海财委的意见》，《内部参考》第254号，1952年11月14日，第162～166页。华东局副书记谭震林在报告中直陈“三反”、“五反”后“工人失业，成品积压，物价下跌，不敢负责”。《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75页。

<sup>②</sup> 《最近上海经济情况的分析和上海财委的意见》，《内部参考》第254号，1952年11月14日，第162～166页。

<sup>③</sup> 《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49～150页；杨奎松：《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sup>④</sup> 红骏：《不要摔“包袱”》，《上海工商》第3卷第12期，1952年5月5日，第18～19页。

<sup>⑤</sup> 《周总理与若干资本家代表人物的谈话纪要》，《工商行政通报》第1期，1953年1月5日，第2页；《周恩来经济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26页。



另外一些商人则想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来解决困难。<sup>①</sup>对此如何处置，当时政府内部似有分歧。华东区及上海市政府不少人认为“私营企业这个包袱迟早要背，不如早一些背下来，该合营的就合营。”上海市财委则谨慎地认为要分别处理，应该早背的要早点背下来（如资方无法维持或无意经营），暂时可以不背的仍由资本家背，政府适当予以扶助。<sup>②</sup>当时，一些私营企业的工人与基层干部在“五反”后也想搞“公私合营”。中共中央为了避免造成大量工人失业，也批评了一些地方干部希望“多罚，多补，多搞公私合营，多没收”的想法，强调要“继续团结与改造资本家进行生产”。对“五反退款”，提出只要付现款20%，退而不出转为公股的20%，其余60%左右记账分期偿还。<sup>③</sup>

1952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开始“调整商业”，强调私营资本“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并明白表示如果成千上万人因盲目冒进政策而失业，国家是包不下来的。<sup>④</sup>22日，上海也开始宣布调整商业方案，有意识地向私营工商业者“让一步”。此举得到不少商人的欢迎。<sup>⑤</sup>到年底当局宣布实施新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这更让工商界眼前出现一线曙光。<sup>⑥</sup>

尽管政府内部在“公私合营”问题上有意见分歧，到1953年上半年，公私合营企业户数仍有所增加，正在筹备或经中央批准合营的即有91家。<sup>⑦</sup>但是，这些企业未必全是因“五反退款”演变而成的。据1953年3月份交通银行对全国695家公私合营企业的统计分析，因“五反”的退补罚款公方转为投资者促成合营者占

<sup>①</sup> 拟进行公私合营的重工业工厂资本家及主要资本家代理人情况。参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A38，目录号2，案卷号428（以下略写：沪档A38-2-428），第201页。政府认为“五反”后商人要求公私合营的动机，除去一部分“存心丢包袱”以外，主要是由于：（1）合营后劳资关系起了变化，生产经营可以改善。（2）合营后，过去欠国家之款可转作投资，因而可减轻利息的负担。（3）合营后，资金、原料、销路的困难，均较私营易于解决。《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情况》，《工商行政通报》第13期，1953年8月20日，第3页。

<sup>②</sup> 《最近上海经济情况的分析和上海财委的意见》，《内部参考》第254号，1952年11月14日，第162～166页。

<sup>③</sup>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74～176页。

<sup>④</sup>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81页。

<sup>⑤</sup> 不过，在有的商人的眼里，这种工商业调整措施也是一种“肥猪政策”，他们认为如企业好转，收益增加，政府又会来增加公债、税收等方面的压力。《上海市调整商业工作的反应》，《内部参考》第267号，1952年12月3日，第48～50页。

<sup>⑥</sup> 杨奎松认为“五反”后上海的资本家已经再也看不到私营企业的发展前途了。参见杨奎松：《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但从事实面来看，1953年上海工商业界确实因为工商业调整政策得到了实际利益，一些企业也开始有了赢利，其对企业经营的信心应该有所增强。

<sup>⑦</sup> 《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情况》，《工商行政通报》第13期，1953年8月20日，第3页。

6%，大概有40余家。<sup>①</sup>可见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是相当谨慎的。“五反”运动的负面效果也让中共高层开始反思自己对商人的政策，后来对资改造比“五反”运动缓和得多，从最高领导人到地方首脑，均不厌其烦地对商人作思想动员工作，恐怕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担心“改造”再引起商人的成批自杀，从而在政治上造成极不良的影响。

### 三、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后上海公私合营企业的试点与渐进

“五反”结束后，当中共稳健派干部正在设法“让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时，毛泽东对私营工商业的处理问题有了新的想法，提出要在10～15年内“完成”而不是原来所说的“开始”到社会主义的过渡。<sup>②</sup>为了实现这个新的计划，了解工商界的状况至为重要。于是毛派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等人到上海、武汉、南京等城市进行调研。1953年5月，李维汉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建议“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实现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毛泽东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遂据此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清楚表示“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sup>③</sup>9月7日，毛约见一些民主党派及工商界的人士（上海工商界有荣毅仁、郭棣活、刘靖基等人参加），告诉他们现在要明确“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并表示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sup>④</sup>

毛泽东新的想法，应与当时中共正在规划的“一五”计划，以及优先发展重

<sup>①</sup> 《公私合营企业的基本情况及其作用》，《工商行政通报》第18期，1953年12月5日，第2页。

<sup>②</sup>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213～215页。按照薄一波的回忆，毛泽东最迟在1952年9月便已提到“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sup>③</sup>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223～226页。关于过渡时期的起点，毛泽东在1953年8月才明确指出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算。《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9页。

<sup>④</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24页。



批 示		主 要 内 容		附 件		
		<p>公私合营申新五厂实行公私合营及任命荣毅仁为总经理</p>		<p>华东纺织管理局(五)</p>		
				<p>日期</p> <p>一九五五年九月廿九日</p>	<p>文号</p> <p>人字第八四二七</p>	<p>份数</p>
<p>申新五厂实行公私合营及任命荣毅仁为总经理</p>		<p>华东纺织管理局</p>		<p>一九五五年九月廿九日</p>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华东纺织管理局

一九五五年九月廿九日

华东纺织管理局

一九五五年九月廿九日

一九五五年九月廿九日

1955年9月29日，华东纺织管理局批准申新总管理处所属五厂实行公私合营及任命荣毅仁为总经理的公函。



工业的策略有关。<sup>①</sup>在这个方面，“五反”后一些地方干部原本有通过“公私合营”挤压私营工商业的思想，发展重工业的策略更让他们面临实际的任务压力，因此毛泽东所提出的新政策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一些地方干部的拥护。不久，公私合营企业试点的工作在上海正式开始，与以前相比较，“公私合营”这时已经有了全新的意义。

### 1. 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及上海商人的反应

1953年10月1日，新华社正式向全国发布了有关“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消息，宣称“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sup>②</sup>12～14日，华东行政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列席会议的包括华东区工商界及上海各公私合营、私营工厂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完全拥护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陈毅在会上表示华东与上海是执行“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重点地区，希望能在全国起推动作用。<sup>③</sup>会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运动即在全上海层层展开。<sup>④</sup>

为了进一步发动工商界，10月23日，当局决定召开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扩大对资改造的宣传。上海代表团由盛丕华任团长，刘鸿生为副团长，代表包括市工商联及各同业公会主要负责人及政府相关部门代表共49名。<sup>⑤</sup>全国工商联主委陈叔通在大会开幕词中号召私营工商业加速进行国家资本主义改造，他特别提到“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强调不要把“公私合营企业看成单纯的合股关系”，而是包含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sup>⑥</sup>李维汉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明确宣布，“过

<sup>①</sup> 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召见民主党派及工商界人士5天后，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提出要将重点放在“大仁政”上，也就是积累资金，全力建设重工业。《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291页。

<sup>②</sup> 《为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远大目标而奋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人民日报》1953年10月1日，第1版；《文汇报》1953年10月1日，第2版。这里并没有提出从什么时候开始，具体要多长时间进行这个“改造”工程。不过，中共高层内部以及被毛泽东召见过的那些工商界人士心里应该对此有个谱。此前9月25日《人民日报》在刊登全国政协会议关于庆祝建国四周年的口号中已经包括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但未提及这个词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人民日报》1953年9月25日，第1版。

<sup>③</sup> 《华东行政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完全拥护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文汇报》1953年10月16日，第1版。

<sup>④</sup> 《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召开干部报告大会》，《文汇报》1953年11月11日，第1版。

<sup>⑤</sup> “代表名单”，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编：《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汇刊》，北京：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1953年，第13～15页。

<sup>⑥</sup> 陈叔通：《为实行国家总路线、正确地发挥私营工商业的积极作用而奋斗——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开幕词》，《人民日报》1953年10月24日，第1版。

渡时期的总路线”中“过渡时期”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算起。他在报告中也清楚地告诉与会者，公私合营企业“首先应确立社会主义成分在企业中的领导地位。”<sup>①</sup>这意味着“公私合营”已由原来的一种企业经营模式变为对特定经济成分及阶级的政治改造模式。

正因为陈、李两位的报告，与会的工商界人士对“公私合营”问题开始高度关注。据李维汉的观察，原来这些人对利用、限制和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有反感，但此次会议让他们的态度有了转变，出现分化。“大工业资本家”听完报告后，虽然多数人都表示要争取公私合营，但有些是“真心积极争取”，有些“内心想观望一下”，还有的则是“消极抵抗”。李也发现有的代表在“会议过程中的变化特别显著”，如“上海代表×××的××仪器厂，过去国家屡次要实行合营，他一直不接受，这次也表示愿意合营了”。而“中小工业资本家”尽管也在口头上表示“拥护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而实际想法甚为复杂：有的可能为了避免“公私合营”赶紧接受“加工订货”；有的想自行联营并厂，增加未来被迫合营时的谈判筹码；也有的想趁机“丢包袱归队”（应该是指资方代表人），拿份有保障的工资。零售商与中小批发商则陷于“彷徨”状态，不知如何去走国家资本主义。大批发商更感到前途断绝，转业困难，不知道回去“怎么交账”。<sup>②</sup>

全国工商联会议于11月21日结束。按照市政府的布置，上海市工商联从12月2日起召集该会全体委员、各区工商联委员以及各同业公会负责人等2000余人举行会议，传达北京会议的精神。<sup>③</sup>其他各界的总路线宣传教育运动也在全市展开。<sup>④</sup>在这种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政策宣传营造出的强大舆论压力下，商人一般不会轻易提出公开反对意见。但是可能会通过其他实际行动来表达其真实想法，如设法将资金转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对此曾有报告如下：

总路线公布后，在私营工商业中引起对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不同看法，因之，用各种各样方式方法逃避资金，对抗社会主义改造，而抽走股东垫款也

<sup>①</sup> 《李维汉同志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53年12月，《统战政策文件汇编》第1册，第383页。

<sup>②</sup> 《中共中央批转李维汉等同志关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1953年12月，《统战政策文件汇编》第1册，第391～394页。

<sup>③</sup> 《传达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上海市工商联召开工商界负责人会议》，《文汇报》1953年12月5日，第2版。

<sup>④</sup> 11月中旬后，上海举行了宣传总路线报告会19次，由陈毅、谭震林、潘汉年等人主讲，听报告的人据称达百万。《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1492页。

政治生存与经济生存：上海商人如何走上公私合营之路？

就成为其方式方法之一。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统计，1953年1月上海工商界股东垫款7498亿，逐月下降到1954年3月只有4389亿，下降3109亿（41.46%）。……抽走以后，有的化整为零，转存定期储蓄，有的购买生活资料，也有绝少数转作投资。为此上海市财委作出规定，限制“资本家”以各种藉口提取股东垫款。<sup>①</sup>

此份报告反映出当时“过渡时期总路线”给一般上海私营工商业者带来的震恐。上海市政府全力宣传，工商界许多人感到“大势所趋”，不得不考虑自己与企业的出路。为了增加说服的力量，上海市委也准备推出新的示范性的公私合营企业，“合营一批搞好一批”，造成公私合营节节胜利的形势。<sup>②</sup>

## 2. 上海14个工厂的公私合营试点

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公布，上海市委就开始对公私合营工作重视起来。为了摸清已有公私合营企业的情况，1953年10月8日，市委统战部分别邀请华通电机厂等9家合营厂厂长、工会主席，以及天丰造纸厂等9家厂的资方座谈。目的在于调查公私合营后这些企业的经营情况及公私关系，尤其是资方对合营的看法。30日，上海市委召开公私合营厂党员干部会议，研讨对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问题。在这些调研基础上，11月5日，中共上海市委私营工业部提出方案，准备在1954年再合营17个厂。<sup>③</sup>不过北京方面最后只批准14个厂。

12月15日，政府宣布大同铁工厂、上海机器厂、华成电机厂、新安电机厂、统益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崇信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恒大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新裕纱厂、鼎新染织厂、正泰橡胶厂、江南造纸厂、顺风搪瓷厂、茂昌蛋品冷藏股份有限公司、中南橡胶厂等14家被批准进行公私合营试点。据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谷牧称，这十四个厂的“资本家”基本上都是自愿的，“做到这点也做了很多工作”。<sup>④</sup>根据上海私营工业部的报告，这14个试点厂中，统益、恒大、崇信、新裕、鼎新等5个厂由于有“敌伪资产”，其公股比例平均达40.51%，统益更高达52.681%。

<sup>①</sup> 《中共上海市委批转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党组关于限制私营厂商抽走股东垫款问题的报告和市委财委的意见》，1954年7月23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325～328页。

<sup>②</sup> 《中共上海市委私营工业部关于做好公私合营工作的意见》，沪档A36-1-12，第169页。

<sup>③</sup>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1491页。

<sup>④</sup> 《各区委工业部长会议记录》，1954年4月1日，沪档A38-2-199。



它们属于“自然合营”，并不需要做太大的工作。而新安电机厂因“五反”欠款高达115亿（资产才120亿），属于照顾性质的“公私合营”。<sup>①</sup>中南与江南是困难厂，资方只想“甩包袱”，据说只怕政府不要。顺风搪瓷厂负责人朱思明已被管制，失去自由。其他5家工厂也许才属于需要动员说服的，其负责人可能存在“惜厂”情绪，尤其正泰橡胶厂经营状况较佳，所以表现最突出，资方既顾虑经济利益，又担心政治前途，勉强的色彩甚浓。<sup>②</sup>

另外，当时被批准为试点厂的资方，有的开始还不清楚共产党的公私合营究竟如何操作，甚至有许多想当然的看法。如有人认为合营时国家应投资百分之五十以上，厂长按照公私股份比例分别设立。有的私营企业主对公方代表指责其企业未合营前管理腐败表示不能同意，只承认经营不得法，缺少资金。这些都遭到了公方严厉的批判。<sup>③</sup>可见在政策理解上，当时一些商人也处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甚至不知道中共“对资改造”的基本内容，以为公方入股他的工厂与其共同经营。这些企业主希望通过合营给其带来帮助，可能并未想到这种“合营”会导致后来对自己企业控制权的完全丧失。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避免试点工作带来过分强烈的负面反应，政府在一些政策方面，仍有意采取宽松的态度，对一些关键问题暂时搁置不予表态，以免日后陷于被动，<sup>④</sup>尤其在人事、薪资方面表面上尽量维持原状。这自然让那些被动员合营的私营业主对“前途”持相对乐观的态度。<sup>⑤</sup>

为了统一公私合营的工作，1953年12月24日，中共上海市委第二副书记谷牧在上海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成立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他检讨了上海市过去已经合营的60多个企业的情况，要求公方代表认

<sup>①</sup> 新安电机厂资方周志俊为时任天津市副市长周叔弢之兄，因此，最后该厂私股仍适当予以保留若干比例。中共上海市委私营工业部：《上海市14个扩展公私合营试点厂关于若干政策性问题的意见和初步工作总结》，1953年12月28日，沪档A36-1-11，第22页。

<sup>②</sup> 中共上海市委私营工业部：《轻工业五个典型厂公私合营工作综合报告》，1954年3月，沪档A36-1-11，第48页。

<sup>③</sup> 中共上海市委私营工业部：《轻工业五个典型厂公私合营工作综合报告》，1954年3月，沪档A36-1-11，第47页。上海机器厂资方颜耀秋希望当局在接受合营后，能以现金投资以解决流动资金困难。对于股东垫款则希望能抽回，并表示负债无法清理。《拟进行公私合营的重工业工厂资本家及主要资本家代理人情况》，1953年11月25日，沪档A38-2-428，第111页。

<sup>④</sup> 如对比较敏感的职工股处理问题，公私股比例问题等。中共上海市委私营工业部：《上海市14个扩展公私合营试点厂关于若干政策性问题的意见和初步工作总结》，1953年12月28日，沪档A36-1-11，第22～27页；中共上海市委私营工业部：《轻工业五个典型厂公私合营工作综合报告》，1954年3月，沪档A36-1-11，第47页。

<sup>⑤</sup> 14个试点厂原厂长共22人，合营后仍续任的有14人，调任副厂长6人。原来副厂长13人，除茂昌厂外，其他均保持原职。可见业务主管在合营前后相对稳定。《关于十四个合营工厂合营前后厂长的变动情况》，1954年3月8日，沪档A36-1-11，第104页。

真执行国家资本主义基本政策，重视董事会，股息红利按照盈余酌情分配，三反运动中弄错了要道歉，资方代理人要量才运用。<sup>①</sup>这种安抚举措之用意显然在鼓励更多的企业主主动申请公私合营，也暗示了已经合营的那些企业中存在的问题。

14个试点厂的启动以及谷牧的报告对工商界可能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上海工商界上层有不少人开始向政府申请合营，或打听消息。到1954年2月18日，据工业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统计，共有157家来信或来访要公私合营。该办认为符合要求的有49家，占31.2%。也就是说近七成的申请者可能都被拒绝，筛选甚严。至于“资本家”动机，该办将其细分为7种类型：

1. 要求想先走一步，以当行业典型，求得名誉与地位；
2. 通过合营实现扩大生产目的；
3. 试探态度，先挂号登记；
4. 资金与生产困难，劳资纠纷较多；
5. 企业已有对公欠款，五反退补，代管股，合营银行投资，“敌产”等，准备将其折成投资；
6. 私私联营内部矛盾无法解决者；
7. 干脆献厂给政府。<sup>②</sup>

这些动机中，既包括想主动追求政治前途者，也包括对可能的经济利益有企盼者，或者客观环境造成企业经营无计可施的。其中“五反退补”后来确实成为个别企业申请合营的因素之一。<sup>③</sup>如果企业被列入合营计划，便可以减轻“催缴”压力。<sup>④</sup>当然，申请者的动机不止这些，比如政府派员劝说以及厂内工人的压力、工商联或同业公会的影响等均会促使从业者去登记申请公私合营。

<sup>①</sup> 《谷牧关于1954年上半年上海市私营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245～246页。

<sup>②</sup> 《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的工业生产情况第13号——关于资本家来信来访要求公私合营的情况（节录）》，1954年3月6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276～277页。

<sup>③</sup> 截止1954年6月，将“五反”退款转作公私合营企业政府投资的退财金额共2116亿元。《中共上海市委转报市财委关于上海市“五反”退款工作报告》，1954年8月27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341页。

<sup>④</sup> 也有企业虽然因此申请合营，但当局仍以其“不符合条件”，继续被催缴。《中共上海市委转报市财委关于上海市“五反”退款工作报告》，1954年8月27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341～343页。

更重要的原因也许与当时政府的倾斜政策有关。为了树立榜样，以实际利益来证明“公私合营的优越性”，政府可能会对一些试点厂实行倾斜政策，事实上是用“不公平竞争”的方式逼迫私营厂选择合营道路。如大中华橡胶厂的洪念祖曾参加全国工商联会议，他回到上海后，也只是口头上表示要准备创造条件，并没有准备提出申请。然而当正泰橡胶厂合营后，生产效率上比从前似有提高，任务分配上正泰也有增加，据说洪因此“很迫切地希望大中华能迅速合营”。<sup>①</sup>对此时的上海当局来说，先将一些具有实力的“好厂”收归囊中（所谓“摘苹果”）无疑已经是其工作重心之一了。<sup>②</sup>

### 3. 公私合营企业在上海有计划的扩展

1954年1月，中央财经委在北京主持召开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会上各部委与地方当局汇总计划合营企业1295家，但中财委提出16个字的工作方针：“巩固阵地，重点扩展，做出榜样，加强准备”，要求各地区对准备合营企业的情况要调查清楚，尤其对资方意愿、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干部调度等，不打无准备之仗。会议将1954年度计划合营企业数缩减至651个。会议纪要特别提到：对荣毅仁、郭棣活两家，由于“尚未明确表示愿意合营”，因此，要求各地先不要列入计划。同时，会议也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将有10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纳入公私合营的方案。<sup>③</sup>有计划的合营工作开始进入正式的轨道。

1954年2月27日，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正式成立，主管全市范围内的私营工业公私合营工作，该会下设重工业、轻工业及纺织业三个管理局，各局设立专业小组，负责研究讨论提出合营户名单。为了减少工作上的阻力，三个小组吸收各

<sup>①</sup> 《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公私合营处关于公私合营工作的历次会议记录》，1954年2月6日，沪档A38-2-199，第22页。

<sup>②</sup> 1953年12月31日上海市委制定的《对上海私营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初步意见》，表示准备在1954年及1955年先将轻工业和纺织工业100人以上的大厂，重工业及名牌货50人以上的工厂共616个分批进行合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1493～1494页。在积极推行工业企业合营试点的同时，当局也在对商业改造进行规划。不过，此时尚未准备以公私合营为其主要形式。《郭建关于上海市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1954年3月11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284页。1953年12月23日，上海市委制定《关于上海对私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初步方案》，准备对全上海114个行业，114712户私营商业户（劳资共539369人）进行多种形式的改造。其办法还是以经销、代销为主要形式。

<sup>③</sup> 《中共中央批准中财委（资）〈关于一九五四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报告〉暨中财委（资）〈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共和国走过的路（1953～195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09～119页。



“行业性代表人物”参加。选择合营对象的原则据宣称是“国家需要，资方自愿”。<sup>①</sup>然而，私营厂要被政府选中才会进入动员阶段。如果企业被相中，而拒绝合营，那么很可能带来政治上的不利影响，甚至被扣上“抗拒改造”的罪名。3月9日，根据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精神，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重新制定了一份扩展公私合营工厂计划，拟合营205家工厂。这批企业决定分三批进行，对象为条件较成熟，合营后政治影响较大的企业。这些企业包括安达纱厂、章华毛纺厂、新民机器厂、永大染织厂、信谊药厂、金星金笔厂等。<sup>②</sup>

为了“知己知彼”，为新的合营计划作准备政府宣布派干部下厂。<sup>③</sup>从1954年3月起，第一批试点派员33个厂。第二批则扩大到270个厂，共派员1400人，组成300个工作组，领导私营工厂。<sup>④</sup>派员下厂后，便与中共的基层党组织及工会等“会师”，使私营工厂实际上处于党的领导之下，并一起加强对资方的合营动员以及防止资方的“消极抗拒”行动。<sup>⑤</sup>对这个新的控制办法，私营工厂主自然有抵触意识，因此引起许多反弹。<sup>⑥</sup>

在“派员下厂”之后，或许迫于形势压力，到3月份，提出合营申请者在慢慢增加，不过动机仍相当复杂。据工业生产委员会主任李广仁的看法，“上海大都厂原是不积极的，但在总路线宣布后，他就想乘机捞一把”。<sup>⑦</sup>因此，他提出要分开来处理，如果资本家提出要求合营，可以“开门见山”，直接谈判。但对资方未提出合营要求而政府希望合营的厂，则必须要做很多工作。李提出的策略是从内部分化，即抓住企业内愿意合营的人，通过他来推动酝酿，最后成熟时再由政府出面

① 中共上海市委私营工业部合营处，《第一批合营厂工作总结报告（草案）》，1954年，沪档A36-1-11，第1~2页。

②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1497页。

③ 《各区委工业部长会议记录》，1954年4月1日，沪档A38-2-199。

④ 《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报告》，1954年6月25日，沪档A38-2-15，第38页。

⑤ 《四个月来派员试点工作的情况、体会和今后工作意见》，1954年8月27日，沪档A36-1-18，第6页。

⑥ 据称，资方的反弹包括“讨好、恐吓职工”、“企图利用派员来反对国家价格政策”、“急于试探派员权限”、“夸大派员驻厂作用来抗拒公私合营”等方式。《四个月来派员试点工作的情况、体会和今后工作意见》，1954年8月27日，沪档A36-1-18，第7~8页。

⑦ 《第一批合营厂干部大会记录》，1954年3月10日，沪档A38-2-207，第5页。

谈。<sup>①</sup>李广仁也注意到，第一批提出书面申请要求的，“可能有大部分是提出来试探的”，不一定是真想合营。<sup>②</sup>对于一些工商界上层人士，政府也希望他们通过已有的“政治地位”，发挥表率作用。这些“合作派”商人只得以“申请”行动来表示自己在政治上的进步，“扮演表面上的开明”，内心却未必想真的将企业权力放弃。为了实现合营计划，当局无疑是“将计就计”，最后那些放气球试探的人在申请被“意外”接受时，便陷于一个被动的尴尬境地。<sup>③</sup>

类似的看法，可以从中共上海市郊区区的报告中看到。他们认为1954年上半年先申请合营的私营工商业者，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早走派”，这派人多半由于他们在政府中已经有一定地位，对中共政策比较了解，因此想早走一步，维持自己的名誉地位。如刘鸿生便表示“刘家企业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要带带头！”。第二类是“试探派”。由于先行合营的影响以及中共干部进厂工作后所推动，所以以申请为探路。第三类是“丢包袱派”。企业负债较多，经营困难，劳资紧张。<sup>④</sup>

不过，这种划分其实也是相当粗糙的，如上面提到的刘鸿生，虽然他是“全国统战对象”，但在公私合营这个问题上，也不是真的想早走一步。据中共章华毛纺厂党总支委员会秘密报告，该厂经理刘念智为了应付厂工会的合营要求，谎称已经申请合营，后来工会向群众揭穿，刘无奈之下，只有真的向政府提出申请，但他仍存在侥幸心理，认为毛纺业困难重重，提出申请政府也可能不会很快批准，最后可能“乐得出风头”。不料，政府接到其申请后，迅速批准，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sup>⑤</sup>

当然，私人资产的规模也是影响一些人应对心态的因素。如另一个重要的中共统战对象新民机器厂总经理胡厥文，其资产比起刘鸿生家族小得多，因此他考虑得

<sup>①</sup> 此类运用分化策略的例子在推动合营过程中并不鲜见。如五洲药房资方郑祥芬等人抵制合营，政府即拉拢资方代理人马荫良，推动他提出申请。信谊药厂许多股东不赞成合营，但与政府亲近的总经理陈铭珊不但提出申请，而且向政府表示垫款不收回，股息可少分。安达纱厂刘靖基想并入恒丰与海麟两个厂，以增加合营的力量，恒丰纱厂资方聂光启即称“刘既利害，又有地位，和他并不合算，刘家是创业的，我们聂家是守业的。”中共上海市委私营工业部合营处，《第一批合营厂工作总结报告（草案）》，1954年，沪档A36-1-11，第5页。

<sup>②</sup> 《第一批合营厂干部大会记录》，1954年3月10日，沪档A38-2-207，第2页。

<sup>③</sup> 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工作委员会，《工业部长、局长联席会议上合营厂的发言提纲》，沪档A38-2-199，第7页。

<sup>④</sup> 中共上海市郊工委工业部，《市郊一九五四年合营工作总结》，1955年3月24日，沪档B4-2-41，第86页。

<sup>⑤</sup> 《中共章华总支委员会报告》，1954年4月30日，沪档A38-8-227，第4页；《公私合营过程中的阶级斗争》，沪档A38-2-223，第2~3页。

政治生存与经济生存：上海商人如何走上公私合营之路？

更多的是政治地位。然而在动员合营时，他仍提出三点对自己有利的要求，希望能将在厂里的几千万垫款抽回，政府协助投资扩充，人事方面适当照顾旧有高层主管。这些要求中暗含着胡的个人利益期望。另外一个上海市级统战对象中国电工企业公司总经理包迪生，由于其企业所欠公私合营银行贷款已占资本的40%，因此走“公私合营”可以解决还贷问题。同时，他也表示自己“作为一个民建成员且是地区的代表性人物，通过学习，自应在工作上带头”。<sup>①</sup>除了企业规模外，行业间的差别也甚大。如任务订单全来自政府的私营造船业，便因经营困难，在1954年5月申请加入已经合营的大厂。<sup>②</sup>另外，也有因“五反退款”或其他公欠款过巨甚至接近企业总资产而被迫申请合营者。<sup>③</sup>

对一些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经济效益不佳的企业，当局则不愿意接受其合营申请。1954年6月，上海馥源隆回丝工厂申请公私合营，其意图据说主要是因为欠华东纺管局之下脚款未还清，负责资方逃往香港未返，原料难以获得等。地方主管部门认为该厂“系手工业生产方式，同时没前途，出口无”，决定不考虑合营。<sup>④</sup>另外，也有一些企业当局有意合营，但由于其他一些原因仍无法实现。如汇明电筒电池厂资方已经离沪，致信代理人拒绝合营；中国工业热水瓶厂资方不愿合营，该厂“群众基础薄弱”，因此又无法从内部推动。而一些企业资不抵债虽要求合营，政府也不愿意接受（科仪工具厂），或者经过调查发现产品滞销也放弃合营动员（亚美无线电厂）。相反，如果企业技术能力强，或在国内有绝对优势的，政府便会想尽办法让其提前合营。如华丽铜版纸厂被轻工业部看中，要求上海市政府一定要在1954年内让其实现合营。这种情形并不少见。还有中铸炼钢厂、秦福兴轴领厂等。对一些超大户，如荣毅仁企业系统，政府则考虑到其政治影响，准备一起解决。<sup>⑤</sup>

经过慎重的筛选，3月27日，工业生产委员会正式宣布第一批合营户名单，

<sup>①</sup> 《市民建（上海市分会）关于工商界人士在公私合营前的思想情况反映意见及谈话记录》，沪档C47-2-357，第11～13页

<sup>②</sup> 《上海私营造船业纷纷申请公私合营》，《文汇报》1954年5月31日，第2版。

<sup>③</sup> 如中国雨衣服装织造厂、美亚织绸厂等申请公司合营的申请书，《上海市人民政府纺织工业管理局办公室档案》，沪档B133-2-10，第93页。除“五反”退款外，宏文造纸厂资方想将“抗美援朝捐献部分”以及“欠工会福利基金部分”、股东冻结户、公私合营工厂投资部分等均作为公股。《宏文厂资方的合营方案》，沪档A38-2-253，第5页。

<sup>④</sup> 《美亚织绸厂等申请公私合营的申请书》，沪档B133-2-10，第82～83页。

<sup>⑤</sup> 《关于一九五四年度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及拟增剔合营户数的意见》，沪档A38-2-105，第22～24页。



共60家工厂。<sup>①</sup>这一批合营厂以名牌大厂居多，设备较齐全，工厂利润大，且公股的比例较小。<sup>②</sup>主管部门也认为这批厂“基层群众工作较好”，亦即厂内推动合营力量强大。资方中属于上层代表人物较多，如全国性统战人物包括刘鸿生、刘靖基、胡厥文。其他市级统战人物12人，余皆为区级统战对象。政府对这批人的合作可能显然有信心得多。从行业来讲，这批合营户也都属于政府急需扩展的范围。<sup>③</sup>

相对第一批合营厂，8月份上海市宣布的第二批批准的106个厂的条件便要差一些。这些厂规模上相对较小，公股比例更少。资方中少数是市统战对象，多数属于区统战对象。<sup>④</sup>从材料上来看，这批厂的资方显然在合作程度上不如前一批，主管部门认为“资本家的落后表现较突出”，尽管被圈定的厂不大可能公然拒绝，但消极对抗行为甚为普遍。<sup>⑤</sup>为了鼓动更多的企业申请，在1954年下半年，上海市乃不遗余力地宣传公私合营企业的优越性，8月30日的《人民日报》宣布上海“已有一千多个规模较大的私营工厂申请公私合营”。<sup>⑥</sup>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少属实，颇值得怀疑。<sup>⑦</sup>不过，1954年的合营计划仍超额完成，最终1954年上海实现公私合营的企业有184家，共217个工厂。<sup>⑧</sup>

为了让既有的公私合营企业起到示范推动作用，当局无疑在一些政策方面仍采取优惠办法。染织工业同业公会主委唐志尧（永大染织厂总经理）对同业现身说

<sup>①</sup> 中共上海市委私营工业部合营处，《第一批合营厂工作总结报告（草案）》，1954年，沪档A36-1-11，第1~2页。

<sup>②</sup> 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工作委员会，《工业部长、局长联席会议上合营厂的发言提纲》，沪档A38-2-199，第1页。

<sup>③</sup> 中共上海市委私营工业部合营处，《第一批合营厂工作总结报告（草案）》，1954年，沪档A36-1-11，第1页。

<sup>④</sup> 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工作委员会，《第二批合营厂的若干情况和今后工作的几点意见》，沪档A38-2-199，第1页。

<sup>⑤</sup> 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工作委员会，《第二批合营厂的若干情况和今后工作的几点意见》，沪档A38-2-199，第2~3页；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工作委员会，《第一批干部讨论情况汇报》，1954年3月15日，沪档A38-2-199，第25页。

<sup>⑥</sup> 《上海市又批准一批私营工厂实行公私合营》，《人民日报》1954年8月30日，第2版。

<sup>⑦</sup> 1955年12月，刘述周在上海一届三次人大会议上称1954年8月前有2000多户私营申请公私合营。刘述周：《关于加强私营工商业者的学习和培养私营工商业者进步分子的发言》，《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汇刊》，上海：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秘书处编印，出版时间未知，第84页。另一个公布报道的数字则称1954年全年申请合营的私营工商企业有1900多户。《上海去年增加一八四家合营企业》，《文汇报》1955年1月12日，第2版。

<sup>⑧</sup> 《上海去年增加一八四家合营企业》，《文汇报》1955年1月12日，第2版。

政治生存与经济生存：上海商人如何走上公私合营之路？

法，表示他的工厂合营后，加工得到照顾。<sup>①</sup>在人事上，1954年公私合营厂有81户仍保留经理制，由私股担任正经理的有58户，多数均是“上层统战对象”；从厂长职务来看，私股担任的只有23户，“大部分是有技术或管理能力，并在政治上靠拢我们”，如华丰纺织厂资方代理人吴赞庭。<sup>②</sup>与14个试点厂比，厂长由私股担任的比例低了许多。

然而，由于公私合营之后，企业的主导权实际上必然会转移到公方代表手中，因此一些私方经理或厂长对此不能完全接受。1954年7月15日，华东区召开公私合营（工业）工作座谈会，各公私合营企业的资方都在力争对企业的领导权，即使这些人平时都在政治上与政府非常接近，如安达纱厂总经理刘靖基、信谊药厂总经理陈铭珊、新中动力机厂魏如、章华毛纺厂经理刘念智、新裕纱厂副厂长李庭先等人均在会上表达对权力被架空的不满。<sup>③</sup>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关系显然没有那么和谐。尽管在政策上对这些在合营工作中起表率作用的私营业主，最高主管部门规定要予以鼓励，或做到所谓“有职有权，尽职尽责”，但是实际事务中的利益冲突决定了政策无法兑现。所谓“上统下战”，对基层税务机关以及要必须完成公债认购任务的区委干部们来说，即使合营实现后，这些人仍然是他们主要的“斗争”对象。<sup>④</sup>而这种情况也对其他尚未合营的私营工商业主带来负面影响。

为解决对公私合营企业的管理，厘清合营进行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为公方无条件控制企业提供一个法律依据，1954年9月，政务院公布《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sup>⑤</sup>明揭“社会主义成分居领导地位”。同时，政府也明确表示，条例颁布后，对“某些资本家的不法行为”必须进行严肃斗争，如抽逃资金，抗拒合营，“合公营私”，企业借合营来卸包袱，及其他不正当的行为等。<sup>⑥</sup>中财委副主任李维汉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暂行条例》作说明时，也针对一些商人不切实

<sup>①</sup> 中国纺织工会上海市委员会，《纺织业第二批合营厂情况汇报》，1954年4月7日，沪档A38-2-222，第2页。

<sup>②</sup>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公私合营厂干部工作调查报告（草案）》，沪档A36-1-5，第4页。

<sup>③</sup> 《华东区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力争对企业的领导权》，《内部参考》第180号，1954年8月11日，第167～168页。

<sup>④</sup> 上海市人民政府轻工业管理局，《关于公私合营私方对认购公债的反映》，沪档B5-2-56，第9页；中共上海市蓬莱区委工业部，《一九五四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作总结》，1954年12月31日，沪档B4-2-41，第6页。

<sup>⑤</sup> 《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人民日报》1954年9月6日，第2版；李维汉：《关于“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的说明》，《人民日报》1954年9月6日，第2版。

<sup>⑥</sup> 《积极贯彻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工商行政通报》第32期，1954年9月15日，第1页。

际的空想，表示国家要把企业都“包下来”有很多困难，并强调“要很快的全面实行公私合营则是不可能的”。<sup>①</sup>对商业，李则表示公私合营不是主要方式，主要应该用代销的办法。小贩则采取合作社的办法。<sup>②</sup>可以看出，由于合营后必须面临种种实际问题，此时主管部门对公私合营推行的速度仍采取相当务实理性的态度。

#### 4. 全行业合营的开始

1954年下半年，全国私营工业都出现很大困难。<sup>③</sup>这种困难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加强对私营企业利润的控制，以及对加工订货与原料供应、产品质量监督等环节方面的大力介入所引起的。在上海，公私合营计划的推行也让一些业主对工厂经营兴趣减退。<sup>④</sup>工厂越困难，税收任务越难完成，政府越介入管理，资方越消极放任，这样便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政府要再在剩下的企业中挑选符合筛选标准的合营对象显得举步维艰。因此，《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颁布后，上海就有人称“今年公私合营是吃一只只的苹果，明年公私合营是吃一串串的葡萄，但是一粒粒的葡萄恐怕等不到明年已经烂了。”<sup>⑤</sup>显然，当局也不想真去吃一粒粒的烂葡萄。在这种情形下，要继续推动合营计划，要么政府加大投资补助力量，将这些绩效不大好的企业通过输血让其达到合营标准；要么就只有走另外一条道路，就是所谓“以大带小”，不去区分行业内企业状况的好坏，采取全行业合营的办法，然后再通过内部资源重组而避免因为合营给政府带来负面后果。

另外，由于1954年合营的企业有一些是直接归属于中央各对口部委，因此地方上不但非蒙其利，反受其累。这些企业本来在行业中占据优势，合营后在加工订货上面受到更多照顾，地方又没有财力给未合营的中小企业加工订货任务，它们身

<sup>①</sup> 《中财委李维汉副主任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关于“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讲话(摘要)》，《工商行政通报》第32期，1954年9月15日，第2页。

<sup>②</sup> 《中财委李维汉副主任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关于“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讲话(摘要)》，《工商行政通报》第32期，1954年9月15日，第2页。

<sup>③</sup> 在1954年下半年，大部分城市的私营大型工业产值比1953年都有下降，其中以沈阳、上海、天津、北京等城市较为显著。不少困难行业的工厂陷于停工、半停工、欠薪、欠税款的紧张状态。上海市在1954年第四季度中有58个行业(组)共有困难厂4571户，职工5万多人。其中困难较严重的有771户，职工7697人。这些困难厂大部靠变卖存货、生产工具、家具、零件等维持伙食，部分厂已经在吃救济米。《一九五四年八大城市私营工商业综合情况》，《工商行政通报》第43期，1955年3月10日，第11页。

<sup>④</sup> 《上海市进行加工订货检查工作作法与体会》，《工商行政通报》第45期，1955年4月15日，第10～12页。

<sup>⑤</sup> 《关于学习“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和李副主任说明的若干思想情况》，沪档C47-2-354，第31页。



政治生存与经济生存：上海商人如何走上公私合营之路？

处的困境也直接给地方财政税收带来不利。所以在政治上虽然地方协助中央完成了公私合营指标，但经济上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趋于公开。1954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原来提出1955年扩展合营的计划数字是2508户，计划到1957年，使合营的企业数达到1.5万户。然而会议上许多地方干部提出不先解决私营工业的经济困难，公私合营的计划与工作，便很难进行。<sup>①</sup>为解决矛盾，此次会议提出应采取个别合营与按业改造相结合的办法来继续推动公私合营计划。

上海方面也开始调整政策，准备选择若干产品和若干行业成批公私合营，与一些行业的裁、并、改、合工作结合起来进行。<sup>②</sup>在这个过程中，“自愿”的成分更趋弱化，强迫命令的色彩加浓。政府对抵制的行动将要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5月，管大同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称“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是逐步进行的，在国家统筹安排、分行业进行改造的方针下，只要积极做好准备，创造条件，接受改造，就有可能被纳入公私合营的轨道。”“对某些资本家抗拒社会主义改造，不服从国营经济的领导和职工的监督等行为，如果经过教育尚不悔改，而继续违法破坏的，应当给予公国家法律的制裁”。<sup>③</sup>管提出这种警告的同时，中国的政治空气正愈来愈紧张，肃反运动正让上海一些商人惊恐万状。<sup>④</sup>

由于公私合营方针的变化，1955年上半年，上海地方工业主管部门已在开始“安排私营工商业”，在政策上进行适度调整，以避免经济萧条过甚而无法收拾。公私合营工作则陷于沉寂，报纸上也难见到批准新的合营企业的新闻，内部消息则透露上半年上海合营户数只完成全年公私合营计划的6.03%。<sup>⑤</sup>市工业生产委员会认为“合营计划必须根据全业的通盘改造打算制订，年度的计划必须与长远打算结合，否则必然违背中央‘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不是使国家背上包袱，便

<sup>①</sup> 《中央批转地方工业部党组关于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对私营工业生产安排问题的报告》，1955年3月3日，《统战政策文件汇编》第1册，第455页。

<sup>②</sup> 《关于本市一九五五年公私合营筹备阶段的情况及本会配合推动工作的报告》，1955年10月20日，沪档C47-2-359，第1~2页。

<sup>③</sup> 管大同：《推动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为公私合营创造条件》，《人民日报》1955年5月6日，第2版。

<sup>④</sup> 6月，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在政协上海市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讲在5年内镇压25万反革命和各种犯罪分子的计划，工商界感觉恐怖异常。他们认为“工商界与各方面关系千丝万缕，有许多企业的资方、董事现在还留在国外，对于如何才能将敌我界限分明感到苦闷。”《上海民主人士对镇反和目前应否颁发大赦、特赦令的意见》，《内部参考》第150期，1955年6月30日，第504~506页。

<sup>⑤</sup> 《最近安排私营工商业的情况》，《工商行政通报》第54期，1955年9月5日，第10~11页。

是使部分私营工业增加困难无法维持。”<sup>①</sup>此时，公私合营的工作仍可算是理性的经济计划过程的一环。

3月下旬，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第八办公室（即对资改造办公室）召集市工商联与有关行业同业公会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宣布1955年上海市扩展公私合营计划，提出棉纺、毛纺织、麻纺、造纸、卷烟、面粉、碾米8个行业实行按行业公私合营，船舶、轧钢、机器、锻铁、铣牙、动力锅炉、电器、汽车配件、水泥、染料、石粉、造漆、电讯等13个行业按行业或按产品实行公私合营。与此前单独企业合营之策动不同，要应付这种新的同业集体合营方式，需要借助工商界自身的力量，尤其同业组织的动员力。于是市工商联成立了纺织、轻工业和重工业3个公私合营工作组，分别召集有关行业同业公会负责人和私营工厂资方，举办动员大会。

这种集体动员工作的难度，可能比此前单独动员更大。<sup>②</sup>不过，全体合营有时也能减弱该行业中不同企业主的利益冲突，单个厂主的抗议效力在这种情形下也大大降低，因为他们首先要面对的是“同业”的意见。当然，如全行业合营牵涉到业内一些厂的裁并改合问题，利益冲突仍会频生。为了避免出现“小厂吃大厂”，或小厂单独合营毫无竞争力，政府采用“系统合营”、“合并合营”两种方案来解决难题。<sup>③</sup>经过四五个月的动员努力，到1955年7月，上海市政府宣布批准102个重工业企业合营。8月，又有168个企业宣布合营，总共包括22个行业的270个企业。<sup>④</sup>其中便有规模较大的荣毅仁的申新纱厂集团以及郭棣活的永安纱厂集团。

在这种集体一致的全行业合营风下，公开的反对声音未必能听到，消极抗议举动却不少见。如上海棉纺业全行业合营进行之际，在20多个棉纺厂中发现不少谣言、“反动标语”和破坏事故。<sup>⑤</sup>据上海市毛纺公司干部的反映，毛纺业全行业批

<sup>①</sup> 《关于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作的情况与主要问题的简报》，1955年9月，沪档B5-2-65，第61页。

<sup>②</sup> 不过此前一些行业已经有不少企业实现公私合营，如棉纺工业的中型厂与部分大型厂在1955年以前转成公私合营，其纱锭数占私营棉纺业全行业的46%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983页。

<sup>③</sup> 如棉纺工业中的申新、永安、丽新各厂在企业总管理处之下进行“系统合营”，不打乱原来的工厂归属。“合并合营”是单独合营的大厂带几个小厂，并厂、并人和并生产任务。《上海工商社团志》，第472～489页。

<sup>④</sup> 《本市又有一百多个私营厂被批准公私合营》，《文汇报》1955年8月19日，第2版。

<sup>⑤</sup> 《上海市正在进行公私合营的二十三个棉纺厂中发现不少谣言、反动标语和破坏事故》，《内部参考》第199期，1955年9月3日，第13～14页。

政治生存与经济生存：上海商人如何走上公私合营之路？

准公私合营时一些资方似有消极抵触行为。<sup>①</sup> 这些行为表现未必普遍，但是却反映出全行业一致合营背后隐藏的抵触心理。有时这种抵触情绪在面对合营过程中一些具体问题时会爆发出来。仍以棉纺织业为例，该业宣布全业合营后，中共上海市委专门与棉纺织业新批准的公私合营厂的资方开了两次会，本来是想促使不同厂在意见上保持一致。但据华东纺织管理局局长张承宗报告，荣毅仁在会议后，便“在清产定股方面发动攻势”，要同业公会采用他们提出的机器估价办法（据说在机器价格上相差70%），并因此与“老合营厂”的代表发生剧烈争执。荣甚至表示要将此事反映到中央，这让华东纺织管理局局长张承宗等人非常恼火。<sup>②</sup> 双方合作几乎要出现决裂的局面。后来，张承宗找荣私下谈话，要荣妥协。荣无法，只有表示“先做了，有问题以后再研究”。<sup>③</sup> 荣的让步可能更多的是从政治上来考虑问题了。对这些私营企业主来说，公私合营已经越来越变成一种政治任务。

#### 四、公私合营高潮中的上海地方当局与工商界

1955年5月，正当上海地方政府方面在准备渐进式地推动公私合营运动时，毛泽东开始对中国跨进社会主义的速度不满了。他先是将邓子恢等人相对稳健的农村合作化推行政策说成是“小脚女人走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然后亲自发动了农村全面合作化高潮。在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面，则抛弃中共中央原订的计划与方针，自上而下发动了一场私营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公私合营开始脱离原来有序的轨迹而进入一个狂乱的赛道。上海紧跟风向，全力推动。<sup>④</sup> 但是，在拥有最多私营工商企业及从业者的上海，短时间内要迅速实现这个大的变革，无疑有极大的困难。然而，在政治成绩指标的压力下，这个过程仍然在表面上得以实现。公

<sup>①</sup> 如“谨慎的老板娘，听到报喜队大哭起来”，“华翔厂资本家魏家骏听到报喜队人来，打小孩”，“天翔厂坏分子准备在迎接公股代表会上公开破坏”等等。《上海市私营毛纺织业在宣布同意公私合营后资本家的动态》，沪档B5-2-56，第25页。

<sup>②</sup> 《棉纺织业主要资本家对市委座谈会的反映与动态》，1955年9月10日，沪档B5-2-56，第48～49页；《棉纺织工业资本家对于机器估价工作过程中的内部斗争情况》，1955年10月5日，沪档B4-2-99，第222～223页。

<sup>③</sup> 《棉纺织工业资本家对于机器估价工作过程中的内部斗争情况》，1955年10月5日，沪档B4-2-99，第228页。

<sup>④</sup> 1955年6月后，上海市委领导班子由于潘汉年去职的影响有所更动，柯庆施、陈丕显仍为市委第一书记及第二书记，副书记除马天水之外，增补了曹获秋、魏文伯两人，其中曹具体分管对资改造工作，马天水则负责工业口。江怡、邵有民编：《中共上海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06～107页。



私合营此时已经远离经济理性，变成一种非理性的政治运动。

### 1. 毛泽东谈话、《告全国工商界书》与上海商人对形势的估计

1955年下半年开始社会性质的全面跃进其实是由毛泽东与他的干部们携手促成，如泰维斯(Frederick C. Teiwes)所观察到的，7月后农村合作化的高速完成，应更多的归结于党组织在运动中的热情工作而不仅仅是毛的计划。由于受毛泽东批判邓子恢的谈话以及肃反运动的压力，中国的农村干部决定采取“宁左勿右”的态度。自1955年7月讲话到是年底，中国一直在进行这种循环：即毛和中央制订计划，各省超额完成；中央修改，提高计划，各省再次超额完成。<sup>①</sup>泰维斯虽然说的是农村合作化高潮，但这个过程在城市私营工商业的全面公私合营化的过程中也得以再现。不过，我们如果要了解后者的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演变，必须注意到，大大小小的私营工商业者的心态，尤其他们对形势的解读、预测、期盼也是不可或缺的变量因素。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闭幕时宣布要让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小生产也“绝种”。<sup>②</sup>这对与会的党的干部是一个极重要的暗示。各地官员开完会，便多开始着手实施这个“绝种”计划，城市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被提到他们的案头了。为了进一步让那些要被消灭的阶级的代表人物产生自觉，减轻这个计划的实施难度，毛泽东决定仍要亲自来实施劝说工作。10月27日与29日，毛两次召见工商界人士，要他们“掌握自己的命运”。其讲话主要是三个意思，一个是告诉“社会主义高潮”来了，要商人们不要怕“共产”，表明政府要用定息办法采取赎买政策，逐步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二是“开支票”，要商人们“安下心来”，“改造”好了，在工作上与政治上都会有安排。所谓政治上的安排，便是承诺在“三个五年计划”内资产阶级就可以摘掉帽子，成为工人阶级。第三个意思是“鼓励核心人物”，要发挥工商界带头作用。<sup>③</sup>这两次谈话中，毛口气应该算是相当和缓。或许他不想重蹈“五反”的覆辙，于政治宣传上

<sup>①</sup> Roderick MacFarquhar, John King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t. I: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 ~ 196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17.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8页。

<sup>③</sup> 《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88～492页；《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93～503页。参加谈话的人包括上海方面的胡厥文、荣毅仁、胡子婴、刘靖基、郭棣活等人。

避免国际上的指责？<sup>①</sup>

除了与少数人作私下谈话以外，毛泽东也采取正式会议的形式来做新政策的发动。11月16～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并提出要在1957年底完成主要行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任务。11月21日，全国工商联一届二次执委会通过《告全国工商界书》，并公开发表。<sup>②</sup>《告全国工商界书》以“亲爱的全国工商界同志们”开头，极富暗示意义。<sup>③</sup>其内容基本上是传达毛泽东两次讲话的内容，不过，它也强调工商业者个人并不随着资产阶级的消灭而消灭。如果好好自我改造，就能“参加到工人阶级的光荣行列”。<sup>④</sup>

22日，毛讲话的意思再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公开，宣示“资本家真正放弃了剥削，以劳动为生，他们的社会成分就不再是资本家，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号召“一切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爱国的工商业者应该认清这个前途，不但不要徘徊瞻顾，而且要主动地奔赴这个前途，这就是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sup>⑤</sup>这个社论无疑是要广大的工商业者自行选择政治上的生死道路。这些头上扣着“资本家”、“资产阶级”帽子的商人，自然希望通过公私合营能够摘掉他们头上的带歧视性的政治帽子，白纸黑字的承诺，似乎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据上海市委的文件，该市工商界听到毛主席在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的指示和全国工商联会议的传达，当即“眉飞色舞”，对资产阶级分子将来可改变为工人阶级成分，“虽只有两字之差，但它象征着资本家改造后的幸福和光明”，对全国工商联《告全国工商界书》中称呼“亲爱的同志”，感到前途光明，“亲切温暖，有钱难

<sup>①</sup> 许涤新曾经向一些合营工厂的公方代表解释和平改造对于国家与工人阶级的好处：“有利于国内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资本家还可帮助做国际宣传。《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许涤新副主任在合营工厂公方代表座谈会上讲话要点》，《工商行政通报》第77期，1956年9月15日，第9页。

<sup>②</sup>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当前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情况和问题》，1955年12月18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543～545页，《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分会召开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情况综合报告》，1955年11月30日，沪档C47-2-289，第47页。

<sup>③</sup> 因为在1949年后，大小商人一般都没有被称为“同志”的资格，“同志”一词带有极强烈的政治身份认同涵义。

<sup>④</sup> 《告全国工商界书》，1955年11月21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汇划》，北京：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编印，1955年，第257～261页。

<sup>⑤</sup> 《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人民日报》1955年11月22日，第1版。

买”。<sup>①</sup>当然，在逼人的形势下，即使是上层商人，其反应也未必相同。一些与政府关系较近的领导人物（“动力派”），由于他们对信息的掌握提前许多，而且多半有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思想波动不大；一些大行业的代表人物（“工作机派”）则对专业公司问题非常感兴趣，希望自己在全行业合营后能到专业公司去当干部；另外一些过去靠资本实力和原有企业脉络的资方（“皮带派”），则担心自己跟不上共产党的变化，如没有特别技能，将来恐自食其力都有困难。<sup>②</sup>

类似的反映从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分会的汇报材料中也可以看到。该会为了动员会员学习毛泽东指示和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会议有关文件，组织各基层小组。按照该会事后报告，小组里的会员对此次会议的有关文件，特别是1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极为重视”。不过，仍有不少人表示怀疑，或认为如果行业都要被淘汰，“掌握命运”便成为一句空话。有的人对定息办法有意见，而更多的则对“剥削”工人的罪名表示不能接受。<sup>③</sup>尽管有不满意，但是这些商人无疑均明白事已至此，一般人绝不愿被扣上“破坏改造”的罪名，而在政治上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明白，一旦政治上不能生存，经济上他们更会失去一切。

## 2. 上海市的部署与全行业合营的扩展

虽然毛泽东曾表示“社会主义高潮”不是一阵风，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sup>④</sup>在政治任务的压力下，各地政府仍旧纷纷开始全力动员。相对而言，上海市委的部署，在1956年1月10日之前，还是努力保持在一个有秩序的程序内进行的。

为达到“层层搞通，逐级贯彻”的目的，中共上海市委从11月中旬起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内部传达，从市委高级干部，到区县级主要骨干，以及科级以上干部和私营厂支部书记，市委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希望能先让党内“搞通”，统一思想，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广泛的推动。<sup>⑤</sup>

随即，中共上海市委于12月15日举行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扩大会议，

<sup>①</sup>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当前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情况和问题》，1955年12月18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543页。

<sup>②</sup>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分会召开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情况综合报告》，1955年11月30日，沪档C47-2-289，第49页。

<sup>③</sup> 《市民建（上海市分会）有关私营企业和公私合营座谈会的情况综合》，沪档C47-2-289，第7~9页。

<sup>④</sup>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93~503页。

<sup>⑤</sup>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传达学习中央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的情况报告》，1955年12月17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539页。





1955年11月以后，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图为上海市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第一个早晨，永安公司的门前。



邀请工商界各同业公会负责人及私营企业代表列席会议，旨在说服工商界主要人物，配合政府工作。陈毅在会上一方面要求政府各部门不要再把工商界的人看成“剥削者”与“反对社会主义”的。<sup>①</sup>另一方面劝导商人，只要采取公私合营办法，大家以后就会“拿薪水吃饭”，并许诺“薪水能够有200元、300元。”<sup>②</sup>上海最高行政领导的表态，无疑对下面与会的众多工商界人士产生影响。陈在会上并宣称“工商界不会吃亏的，定息以后你们还有可靠的收入，中小以下，我看你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现在大家要牺牲。”最后，陈毅还是提醒干部们“不要去逼人家，要让人人都赞成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一年不行再来一年”。<sup>③</sup>无疑他也在担心上海商人中间会出现与“五反”时的极端反应。

两天后，上海市召开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主题的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与前次的会议相比，这次会议含有警告工商界不要抗拒改造的潜在用意。陈毅在会上列举了工商界各种“怀疑”、“抗拒”、“破坏”的事实，无非在提醒商人不要去采取这些办法来抵制改造。<sup>④</sup>主管公安系统的副市长许建国更称“发现极少数坚决抗拒改造的资本家纵火烧厂，杀害职工，甚至和帝国主义蒋匪特务间谍机构相勾结，进行叛国活动”，他又称“上海工商界人士绝大多数是好人。有些人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和反革命分子有过瓜葛，只有他们交代清楚这些问题，坚决断绝同反革命分子的关系，并且尽可能使自己多做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工作，是可以得到政府和人民

<sup>①</sup> 《陈毅在中共上海市委扩大会议上关于团结起来，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1955年12月15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514～516页。陈毅之所以如此讲，是因为直到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前夕，上海不少基层干部对工商界的态度仍是充满敌意，认为“资本家”不可能有什么积极性，赎买政策对资本家太宽大，资产阶级也不可能被教育改造过来。对资本家“宁左勿右”，以斗为主，其实仍是主要的态度。《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传达学习中央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的情况报告》，1955年12月17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539～542页。

<sup>②</sup> 《陈毅在中共上海市委扩大会议上关于团结起来，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1955年12月15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517页。据后来上海市委副书记马天水的说法，当时上海单纯依靠股息为主的资本家为数很少，多数资本家薪金收入大大超过股息收入，平均薪金收入约在120元左右。因此，陈毅的薪资许诺是有点经济诱惑的味道。《马天水在中央召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55年11月21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492～493页。

<sup>③</sup> 《陈毅在中共上海市委扩大会议上关于团结起来，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1955年12月15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519～521页。

<sup>④</sup> 陈毅列举的“事实”主要包括：1. 抽逃资金；2. 把私人的账变为企业的账；3. 提高工资，慷国家之慨；4. 赶快分家，分整为零；5. 增加非实职人员，扩大开支；6. 吃光、用光、喝光；7. 转移资财，公债不买，税收不缴，加紧偷漏；8. 消极不搞生产等。陈并提到，“另一方面的破坏是死了人”。《陈毅市长在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摘要）》，《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汇刊》，第24页。

的原谅和信任的。”<sup>①</sup> 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要求工商界“学习农民的榜样，同样以实际行动来回答这次大会的要求，在短时间内做出成绩来”。<sup>②</sup> 随后，会上有 112 位“人民代表”发言，工商界代表占到一半。其中上海工商联主委、副市长盛丕华的发言炮火比陈毅、许建国还要猛烈，他警告那些犹豫顾虑，摇摆不定的人，要帮助他们提高自觉，对顽固分子，仍要批评教育，否则就有“与帝国主义与蒋匪帮勾结”的嫌疑。对那些“存心破坏社会主义改造”的人，将要“无情揭露”，甚至被送去“依法制裁”。<sup>③</sup>

这次会议给商人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情境中，如果不配合“改造”的话，便可能被冠以罪名、面临指控。尽管许建国在报告中曾经表示“在一个行业里面，绝大部分合营了，如果有一小部分工厂或商店暂时不愿意合营，应该允许他们等一下，不要强迫命令。”<sup>④</sup> 但是具体执行者为完成其工作任务，或本行业内的“进步核心分子”为了表现出其“进步性”争取更好的政治成绩，不可能真的让那些犹豫的商人“等一下”。

这次会议最后提出，在两年内基本完成私营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和小商小贩实行合作化以及经销、代销任务。这个目标尚不乏冷静的成分，在两年内完成全行业合营，同时，将那些小商小贩与一般私营工商业者区分开来进行稍低层次的“改造”，但是，后来的事实却远远超过了上海市政府这个计划。

会议动员之后，12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成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小组（亦称中共上海市委对资改造十人小组），以副市长曹荻秋为组长，统战部部长刘述周为副组长，统辖对资改造事宜。<sup>⑤</sup> 上海市委在策略上也要求充分运用工商联、同

<sup>①</sup> 许建国：《关于上海私营工商业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汇刊》，第 45～46 页。

<sup>②</sup> 刘述周：《关于加强私营工商业者的学习和培养私营工商业者进步分子的发言》，《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汇刊》，第 89 页。

<sup>③</sup> 《盛丕华代表的发言》，《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汇刊》，第 111 页。

<sup>④</sup> 许建国：《关于上海私营工商业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汇刊》，第 42 页。

<sup>⑤</sup>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成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小组的通知》，1955 年 12 月 28 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 562 页。



业公会、民建会的组织及其骨干分子,从工商界内部去推动全行业公私合营运动。<sup>①</sup>这些积极分子的数量在上海全市差不多有2万人。<sup>②</sup>

在上海工商联的安排下,12月17~19日,全市中小私营工商业者,分区分批收听陈毅在上海市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sup>③</sup>到1956年1月初,据说各区工商联共举行了213场传达会议,参加的工商业者及其家属达25万余人(包括家属84000人)。在市、区工商联传达报告的基础上,市工商界学习委员会组织市级工商界代表人士1200余人,按60人1个小组进行传达学习。区级基层小组长以上的骨干分子6331人,分编326个小组,由各区工商界学习委员会组织传达学习。<sup>④</sup>上海的工商界开始大规模的公私合营动员。

经过层层动员,到12月8日止,全市78个轻、重工业行业中,全业申请合营的有11个行业,20个行业部分联名申请;104个商业行业中,全业申请合营的有28个行业,21个部分联名申请。此时只有三分之一左右行动起来,其他三分之二的行业没有行动起来。<sup>⑤</sup>截止1956年1月10日止,单独宣布合营的大企业主要有百货业的永安公司以及协昌缝纫机制造厂等。<sup>⑥</sup>宣布全业合营的工业领域有制笔业、制药业以及行业规模较小的造漆、染料业;电讯电器、木材、螺丝工业;旋钻电机、电力设备、机电仪表三工业。商业领域主要有酝酿已久的私营棉布商业及绒线业。

<sup>①</sup> 上海市委提出的具体办法包括(1)运用老合营厂现身说法;(2)运用先进、积极分子推动与说服落后分子;(3)运用同业公会熟悉业务和业内情况的条件,成立专门小组处理与解决制订方案,清产定股中的问题;(4)运用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掌握资产阶级动态,传达政策和稳定他们的情绪。同时,由于全业改造合并合营关系到全行业及多数资本家的利益,必须警惕到资本家会采取联合同业来一致对公的做法。《上海市对私营工业进行全业改造、合并合营工作的情况》,《工商行政通报》第58期,1955年11月20日,第3页。

<sup>②</sup> 据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马天水在1955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上的发言,“上海工商业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实职人员,如除去摊贩和3人以下的小业主,共计119465人”,这些人中,“政治已作了安排和工作中经常使用的,包括市、区工商联委员,市同业公会委员和行业小组长,市、区以上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市、区两级政府委员共有19913人,约占17%。《马天水在中央召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55年11月21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492~493页。

<sup>③</sup> 《陈毅市长“话家常”鼓舞了本市中小工商业者》,《新民晚报》1955年12月21日,第4版。

<sup>④</sup> 《上海工商社团志》,第538~546页。

<sup>⑤</sup>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当前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情况和问题》,1955年12月18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544~546页。

<sup>⑥</sup> 在公私问题上,政府对永安公司显然是不满的,本来可能是想以永安领头,将百货业全行业合营,但郭琳爽被认为“一向是中间带落后的”,批准合营后,郭在各方面采取措施,以减缓合营可能给其带来的损失。《上海永安公司公私合营筹备工作进展很慢》,《内部参考》第254期,1955年12月31日,第305~306页。

另外，珠玉商业与丝绸工业被批准筹备全业合营。<sup>①</sup>可见，在1月10日前，各行业全业合营的实际动作并不快，上海市当局在这个问题上仍持相对保守的态度。许多全行业合营的申请并没有立即得到批准，这当然与上海私营工商业面广人多，合营后所面临的财政经济压力较大有关。上海当局似乎仍准备在跃进中保持一定的次序，以免混乱。通过动员，推动工商界按行业提出合营申请，通过审查程序筛选一批合适的批准，让其进入筹备状态，然后做好清产核资工作，再正式改成公私合营，当局希望通过这种步骤在两年内逐步完成对大多数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合营。

当然，此时上海的做法并不是故意拖全国的后腿。1955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所刊登管大同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优越性》一文，大力鼓吹“一切重要行业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都要通过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形式向社会主义过渡。”不过，他仍估计“大部分地区将在一两年内使私营工商业的主要行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sup>②</sup>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引发了各地政府的纷纷表态。浙江表示要“在今后两年内”，私营工商业的一切重要行业将要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黑龙江表示“1956年全省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将基本上完成公私合营”，<sup>③</sup>这些表示与上海的计划应该说差别还不是太大。

### 3. 全行业合营高潮的突现及其各方心态

正当中共上海市委竭力追随毛泽东的跃进路线，打破常规扩大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范围时，一些地方政府首脑为了抢得头功，开始了一场进入社会主义的冲刺比赛。在毛泽东的赞许下，上海市政府被迫跟进，以免政治上落后于人。如泰维斯所注意到的，北京市长彭真此时扮演了重要的推手角色。<sup>④</sup>

1月10日，彭真在全国第一个宣布北京完成全市私营工商业改造，已经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消息让上海方面阵脚大乱，原来稍有秩序的计划被完全“冲破”。北京之后，天津、西安、重庆均宣布全市工商业公私合营实现。上海面临必须加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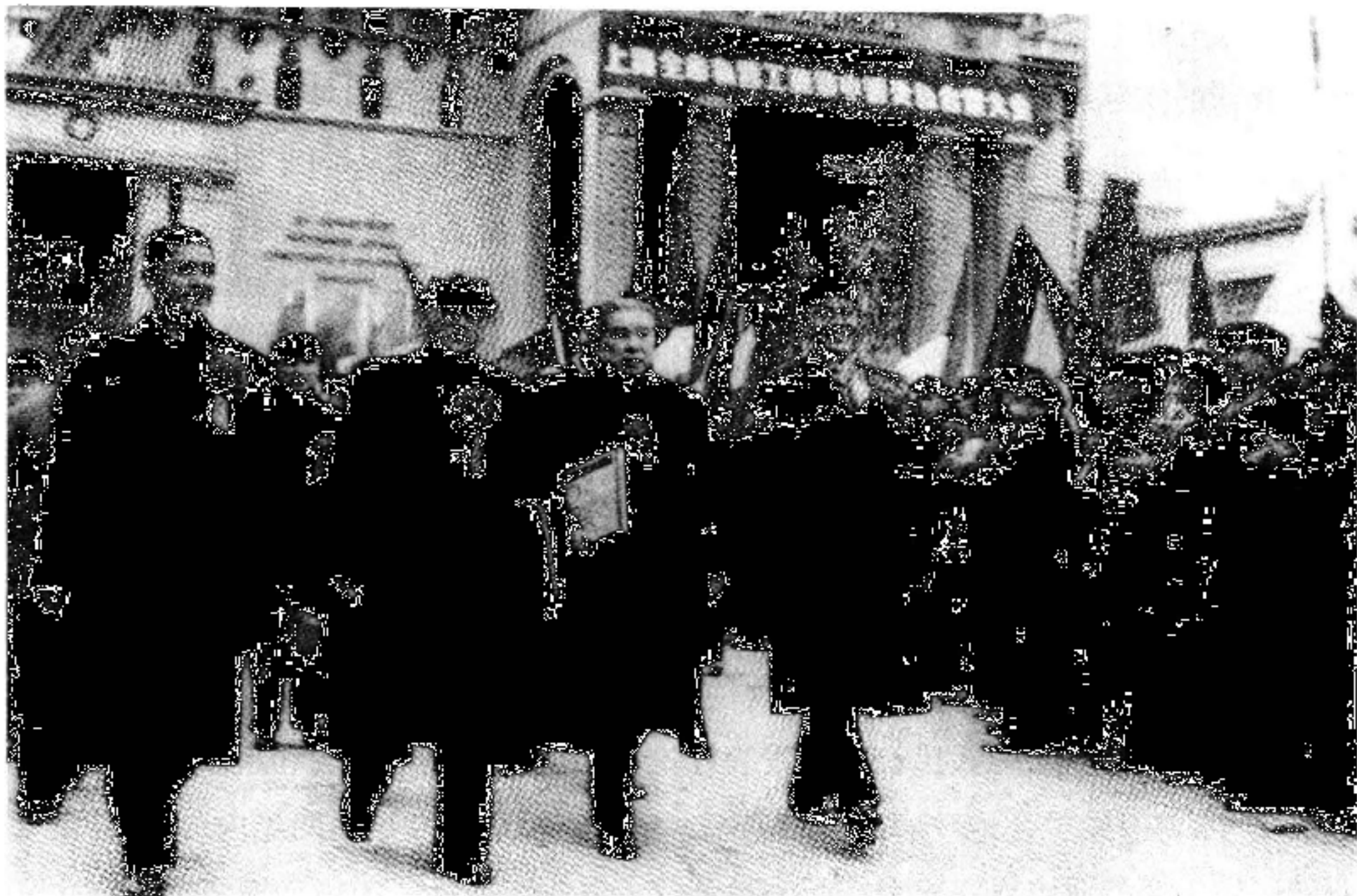
<sup>①</sup> 此一阶段各业合营的情形报道可以参见1955年11月至1956年1月《文汇报》及《新民晚报》的报道。

<sup>②</sup> 管大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优越性》，《人民日报》1955年12月30日，第2版。管大同此时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常务副局长，具体参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的制订。

<sup>③</sup> 《浙江、黑龙江、云南争取提早全面完成地方五年计划》，《人民日报》1956年1月6日，第1版。

<sup>④</sup>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t. I: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 ~ 1965*, p.121.





全国私营工商业者响应号召，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的高潮迅速在全国掀起。图为上海市工商界代表荣毅仁、胡厥文、盛丕华、杜大公（自左至右）参加申请公私合营大会。

速度的压力，<sup>①</sup> 市委乃决定改变原定的在两年内把合营完成的计划，不过对资改造十人小组仍只是表示争取在 2 月份完成全市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sup>②</sup> 1 月 13 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邀集市工商联、民建的负责人开会，要求他们把握当前形势，把运动推向高潮。

14 日下午，中共上海市委召集市工商联正副主委、常务委员和工商界各业代表人士 300 余人举行工商界座谈会。以“征求意见”的方式，要求工商界对“速度”问题表态。荣毅仁即称要“争取一周内全市实现公私合营”，一些“骨干分子”纷纷表示对政府保守的“不满”，最后“全场同意”7 天内完成“改造”任务。<sup>③</sup> 从而造成了一种政府政策落后于“群众热情”的态势，为全市合营准备了一个似乎合理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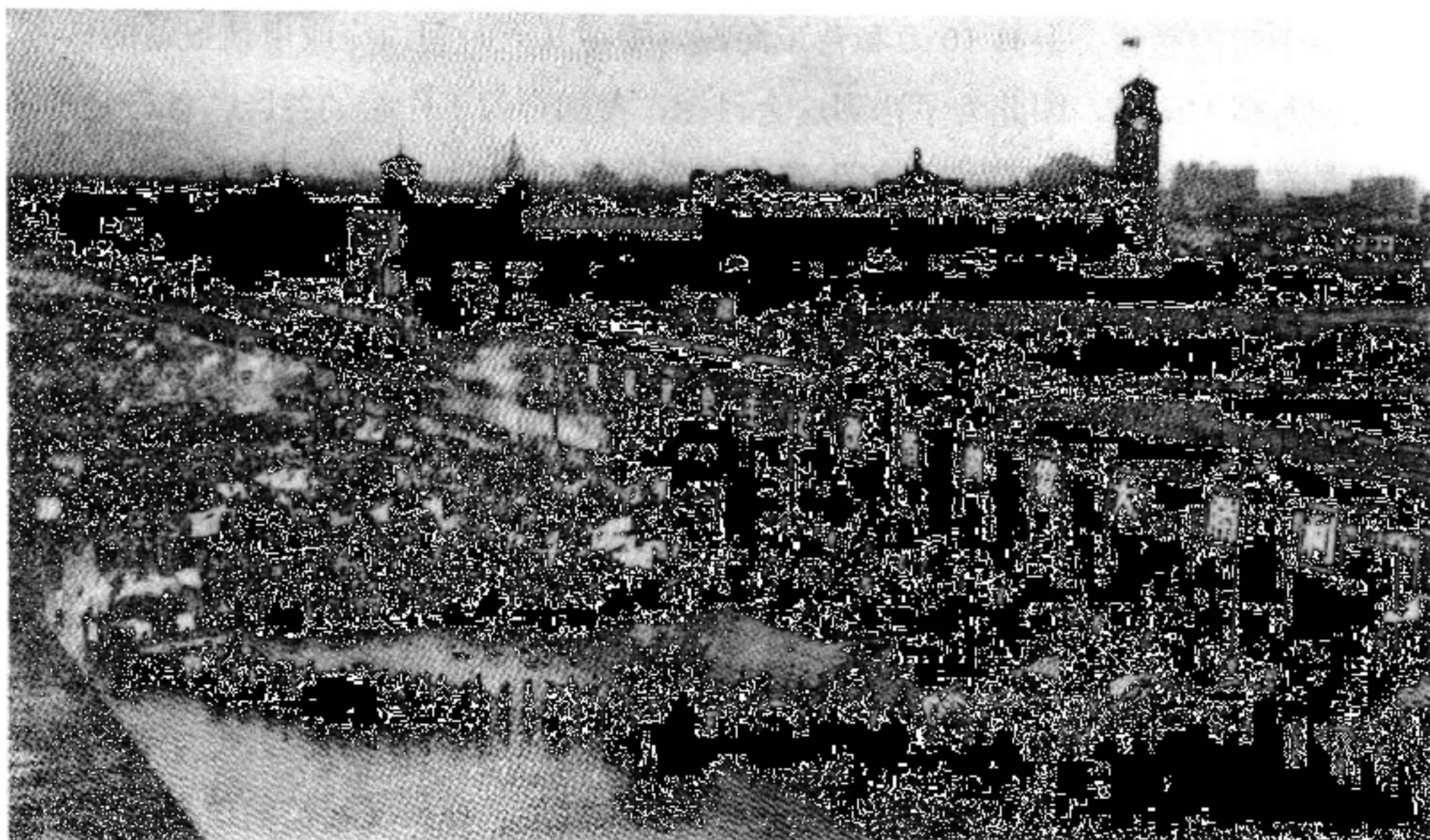
15 日，市工商联根据形势发展与广大工商业者的愿望，在天蟾舞台召开“上

<sup>①</sup> 《上海也要加快！》，《新民晚报》1956 年 1 月 12 日，第 1 版；《加快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全国各地都出现了高潮》，《新民晚报》1956 年 1 月 15 日，第 1 版。

<sup>②</sup>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 1515 页。

<sup>③</sup> 《中共上海市委召集工商界上层人士座谈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问题的记录》，1956 年 1 月 14 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 589 页。





1956年1月，上海各界50万人举行大集会和游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海市工商界临时代表会议”。荣毅仁在会上建议，6天内在市工商联统一领导下联合起来一次申请，会议乃议决全市各行业在1月20日前完成全市公私合营的申请准备工作。具体负责推动的主要包括各同业公会、各区工商联，他们动员了两三万名骨干分子参加合营动员工作。其办法以分区包干，深入到户，协助所有的私营工商户办理公私合营申请。区工商联设置接待室，由负责委员值班，不分日夜接待工商业户的询问和申请。为了营造气氛，同业公会及各区工商联在进行全面传达的同时，分别组织报喜、游行等活动，扩大宣传。

上海全市公私合营工作的组织，是按行业先成立全市合营工作委员会，下面分组。每个区又分行业组成委员会，区行业委员会下再按更小的专业或区域设立若干小组，以小组长负责本组合营推动。这种情况下，合营工作呈现多头领导的局面，市区都在为自己抢功。<sup>①</sup>而对许多商人来说，如果能参加合营工作队，或许便意味着未来“前途有保障”，因此，许多同业公会的委员抢着要担任公私合营工作委员会的职务。一些人被安排担任小组长，“高兴非凡”，但“又怕得罪人，几夜睡不着”。这种头衔不仅是政治荣誉，而且可以作为合营后争取“较高职位”的资本，拿到稍高的薪资。因此，没有争取到的人“感到懊丧”，有的便毛遂自荐，要求同业公会安排。<sup>②</sup>

<sup>①</sup> 《工业行业对合营后的情况反映》，1956年1月25日，沪档C48-2-1605，第20页。

<sup>②</sup> 《公私合营工作情况反映》第1号，1956年1月26日，沪档C48-2-1602，第6~7页。

由于时间紧急，上海 10 万私营工商户，要在几天时间内完成申请盖章的任务，本来就有很大困难，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参加合营工作组的各区、各行业的工作队员在动员过程中，便有许多不符合正常政策的举措，上海工商联也承认“少数工商界骨干邀功思想浓厚”。<sup>①</sup>为了“抢功”，一些行业合营工作组对商户“乱扣大帽子”、“强迫命令”，或者采取欺骗手段来凑足全业合营的数字。<sup>②</sup>其他如强迫厂店商户在参加合营时增资；<sup>③</sup>或者要求商户在参加合营时必须肃清欠薪与欠税。<sup>④</sup>从资料上来看，上海很多区都有肃清欠税再合营的要求。一些行业负责人之所以有这样的要求，其实也是较理性的考虑，因为合营之后一些商户的债税负担便有可能会分摊到其他合营户身上。

基层干部“抢功”也表现在合营与合作的问题上。政府虽然规定要划手工业者与资本家的界线。四人以上挂“公私合营”，三人以下挂“合作化”，但如果后者要求走公私合营，还是允许的。<sup>⑤</sup>这就造成了很大混乱，在极度匆忙的情形下，人们并不容易分清挂牌的政治后果。由于合营与合作的主管机构不同，因此，便出现争拉商户的现象。<sup>⑥</sup>而北站区政府工作队对一些铸字制版业的小业主说“如果不参加

① 《全市申请合营工作简讯》第 13 期，1956 年 1 月 20 日，沪档 C48-2-1595，第 132 页。

② 水泥业邑庙区主任便对不愿意盖章的资方称“像你这种行为是抗拒改造，新闻日报再去看看”，江宁区烟兑业小组长对不想加入的小店主说：“你盖了章不合营也可以，只不过要你一块红布，一个喜字，挂起来就算了。”甚至恐吓他是“不愿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各类行业资本家对公私合营的动态》，沪档 C48-2-1606，第 2 页；《全市申请合营工作简讯》第 13 期，1956 年 1 月 20 日，沪档 C48-2-1595，第 133～134 页。

③ 到 1956 年 1 月 19 日止，上海 179 个行业中有 2941 户 3140 人有增资行动，共投入企业现金、公债、垫款、黄金、银元等约值 1800 万元。另外还有房屋 3000 幢（间）。这其中有些是工商户为了能够顺利合营而主动增资的，但大多数则是因动员者的命令被迫增资。《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上海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综合情况的报告》，1956 年 2 月 11 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 681 页。

④ 当时肯定有不少工人担心合营后拖欠的工资无法催讨，因此逼迫资方还清工资。后来当局只得规定“凡是欠工人的工资，不要与公私合营牵涉进去，要向工人谈清楚”。但仍有一些资方因此被逼上绝路。如振丰毛纺厂资方 1 月 12 日便因欠工人工资以及税、罚款不能交齐而自杀。《曹荻秋关于上海在六天内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有关方针、政策及具体做法问题的讲话》，1956 年 1 月 16 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 611 页；《关于全市私营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工作简讯》，沪档 C48-2-1595，第 126 页。地方税务局也有人利用纳税户参加合营的机会催其缴清欠税。有的同业公会的负责人则为了追求成绩，也提出缩小欠税面迎接合营的口号，这都给工商户带来很大的压力。上海工商业联合会，《关于全市私营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工作简讯》，沪档 C48-2-1595，第 126 页；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全市公私合营情况反映》第 7 号，1956 年 1 月 20 日，沪档 C47-2-365，第 32 页。

⑤ 《曹荻秋关于上海在六天内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有关方针、政策及具体做法问题的讲话》，1956 年 1 月 16 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 612 页。

⑥ 《全市申请合营工作简讯》第 13 期，1956 年 1 月 20 日，沪档 C48-2-1595，第 136 页。





上海南洋衫袜公司职工帮助资方盘点存货。

合作化，就不批准我们公私合营”。<sup>①</sup>有的区政府干部在动员的时候甚至会用原料等来威胁商户，逼迫他们加入合作社。<sup>②</sup>而有的商户已经加入了合营，结果又被区干部拉回来重新申请加入合作社，<sup>③</sup>甚至“强要盖章，盖了就走”。<sup>④</sup>

不过，对于被动员的广大私营工商户、参加合营的数量庞大的小商贩乃至个体手工业者来说，这场大规模的公私合营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他们对运动的理解和反应与那些工商界的骨干分子、积极分子自然截然不同。如果说后者更重视争取“政治地位”的话，那么前者可能更重视如何争取经济上的生存保障。当然，重心取向也与企业规模状况，以及负责人的位置有关。

对许多原来戴着“资本家”帽子的私营工商业者来说，“公私合营”让他们以为“一合万事休”，企业交出来，帽子也可以摘掉了。当然，如前所述，这种期待心理也许与当局“有意的误导”有关。如上海市总工会负责人钟民在1月14日的会议上曾经表示，庆祝会那天，工人文化宫、俱乐部将欢迎资本家和资本家家属、

<sup>①</sup>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全市公私合营情况反映》第7号，1956年1月20日，沪档C47-2-365，第31页。

<sup>②</sup> 《全市申请合营工作简讯》第13期，1956年1月20日，沪档C48-2-1595，第115页。

<sup>③</sup> 《全市申请合营工作简讯》第13期，1956年1月20日，沪档C48-2-1595，第93页、第128页。

<sup>④</sup> 《公私合营工作情况反映》第1号，1956年1月26日，沪档C48-2-1602，第4页。



子女进去，大家一起联欢。这一点受到工商界的广泛欢迎。他们把这看成是“摘掉帽子”的实际政策体现。或如曹荻秋所说，“他们觉得自己的脚已经走进社会主义的门了。”<sup>①</sup>当然，“摘帽子”可能不仅仅是政治身份的重塑，也与经济待遇有关。如果他们由“资产阶级”变为“工人阶级”，自然也能享受到与后者相同的劳动保障，成为工会会员。为摘帽子而合营，可以从一些商人申请国营的举动上看出。在合营高潮中，徐汇区有132户“资本家”申请国营，他们认为合营之后仍然是资产阶级，仍然有剥削。<sup>②</sup>此举受到一些基层干部鼓励，或许仍是出于某种“邀功”心理。<sup>③</sup>为了迅速完成全市合营的任务，在几天的运动高潮中，市政府似乎也无意做解释的工作。想摘掉帽子的更包括一些企业的资方代理人，<sup>④</sup>这些“代理人”薪金与高级职员相差无几，分红不多，又不能享受劳动保险等福利。“五反”运动后，资方的暗贴和馈赠一般又断绝，经济上不宽裕，对他们许多人来说，戴着“资本家”的帽子实在是弊无利。<sup>⑤</sup>当然，混乱中也不乏有头脑清醒者，如内燃机工业有些资方不愿意合营而要走合作化，因为这样可以改变阶级成分，但劳方则要做产业工人，因此要求公私合营，两方为此发生冲突甚至动手。<sup>⑥</sup>

一些行业的全面合营或合作化也影响到另外一些相关行业。因为原来有业务关系的客户单位公私合营，<sup>⑦</sup>或供应副产品的农户参加合作化，可能给商人原本已经建立产—供—销的商品链中断，使一些本不想参加合营的人只有申请加入，形成滚雪球般的效应。上海工商界许多中小厂店，原来在市场链条中绝大多数并非全能型

① 《曹荻秋关于上海在六天内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有关方针、政策及具体做法问题的讲话》，1956年1月16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615～616页。钟民是上海市工会联合会主席。

② 《上海徐汇区资本家申请国营》，《内部参考》第8期，1956年1月19日，第109页。

③ 《公私合营工作情况反映》第1号，1956年1月26日，沪档C48-2-1602，第4页；《全市申请合营工作简讯》第13期，1956年1月20日，沪档C48-2-1595，第133～134页。

④ 中国纺织品公司上海市公司，《关于上海市棉布绸缎业公私合营情况的介绍》，1956年11月27日，沪档B6-1-36，第109页。

⑤ 《中央批转中财委党组、中央统战部关于处理资本家代理人的意见》，1952年8月29日，《统战政策文件汇编》第1册，第332～333页。

⑥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全市公私合营情况反映》第7号，1956年1月20日，沪档C47-2-365，第31页；《公私合营工作情况反映》第1号，1956年1月26日，沪档C48-2-1602，第10页。

⑦ 合营后，很多行业的小厂小店均归口管理，其业务也必须由专业局或专业公司、工商局相关职能部门来负责。这无疑会对既有的商品生产销售网络带来重要的影响。类似案例的反应在《公私合营情况反映》这份简报中甚多。如《公私合营情况反映（工业）》第23号，1956年2月8日，沪档C48-2-1603，第13～17页。



上海申新纺织公司实行公私合营，欢迎公方代表进厂。

的，而是承担某一部分工作，<sup>①</sup>因此，如果这个链条中的其他部分发生变化，立即会涉及整个生产与销售链。这点对许多商人来说，可能是其要参加合营的重要因素之一。如花树业鸟笼组说本市合作化后粮油统一收购，粟米无法买到，因此鸟禽食料无法解决。<sup>②</sup>铜锡业反映，铜的进销由市场决定，现在由于合营不能做自由市场（黑市），无法买到铜。钢原来是收旧货交外埠加工厂回炉加工，现在外埠加工厂公私合营，不接受加工。因此业务无法继续。类似被情势所逼加入合营，又如原来为私营厂加工纽扣的无照户，“自对方公私合营，就不往来，因此发生困难”，因此对他们而言，“不参加组织，就不能进行生产”。类似像上海市场上原来有的“流动会计”，担心全市合营后找不到事做，坚决要求扎进合营，以求口饭吃。<sup>③</sup>

其实，上海工商界公私合营的高潮，主要是针对中小工厂，以及大量的小商店甚至小商贩而言，也就是所谓“小户”。因为此前公私合营的试点已经将上海一

<sup>①</sup> 如上海私营机电等重工业，大厂少，小厂多，全能厂少，车间性工厂多。大多数仅是一个小车间或是工段工序性的工厂。其所以能制造复杂而完整的机器，主要是依靠相互间的合作。《上海私营机电等重工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计划草案》，1953年11月26日，沪档A38-2-428，第11页。

<sup>②</sup> 《公私合营情况反映（工业）》第23号，1956年2月8日，沪档C48-2-1603，第13页。

<sup>③</sup> 《公私合营工作情况反映》第1号，1956年1月26日，沪档C48-2-1602，第4~5页。



些主要的大中型企业都囊括其中。<sup>①</sup> 这些小户中,有许多属于“困难户”,工业界约2000户,商业有7000户,手工业有3万多人。<sup>②</sup> 另外,全市资不抵债户约有5000~7000户,大多数也是“小户”。<sup>③</sup> 对这些困难户来说,参加合营可能意味着在生活、工作上有保障,因此存在“赶浪潮,一窝蜂,乘便船”的心理。不过对情况较好的小商户来说,既然合营是必须的,那么只有停止生意,“消极等待”,反正命运都掌握在共产党与政府手中。<sup>④</sup> 有些夫妻店担心生活陷于困境,要求合营后能让自己与家属都参加工作,甚至有人以“全家合营”作为申请的交换条件。<sup>⑤</sup>

许多中小商人或者手工业者,填写申请表都有困难,对公私合营政策更缺乏了解,甚至连什么是公私合营都不清楚。<sup>⑥</sup> 不过,在整个上海都陷入公私合营的紧张忙乱状态时,既然有人宣称马上要进入社会主义,“毛主席的阳光普照天下”,自然谁都不想被社会主义的公共汽车撂下,在经济上与政治上无法享受基本的公共福利,甚至成为可怜的社会弃儿。因此,即使一些没有被动员申请的私立医院、私立学校,甚至是外国教堂等均来赶这趟社会主义的公车。<sup>⑦</sup>

然而无论是自愿还是被强迫,在高潮期间加入公私合营的这批“中小工商业者”(包括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后来未必得到了他们期待的“铁饭碗”,反而不明不白地全变成了“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在政治上受到歧视。<sup>⑧</sup> 经济上,他们合营前的收入除了工资,还有红利年终奖金和各种津贴等额外补贴。合营后,所谓“不合理”的额外工资制度被取消,而原来减低了了的工资又不能恢复。其他补贴生

<sup>①</sup> 1955年10月前,上海公私合营工业企业396户,生产总值已经占到全市26000多户私营工业总产值的45%。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阶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8~50页。

<sup>②</sup> 《曹荻秋关于对资改造工作情况及今后工作的报告》,1956年5月8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747页;《上海、广州两市对困难户给予安排》,《工商行政通报》第64期,1956年3月5日,第9页。

<sup>③</sup> 《曹荻秋关于对资改造工作情况及今后工作的报告》,1956年5月8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747页。

<sup>④</sup>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分会召开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情况综合报告》,1955年11月30日,沪档C47-2-289,第48~5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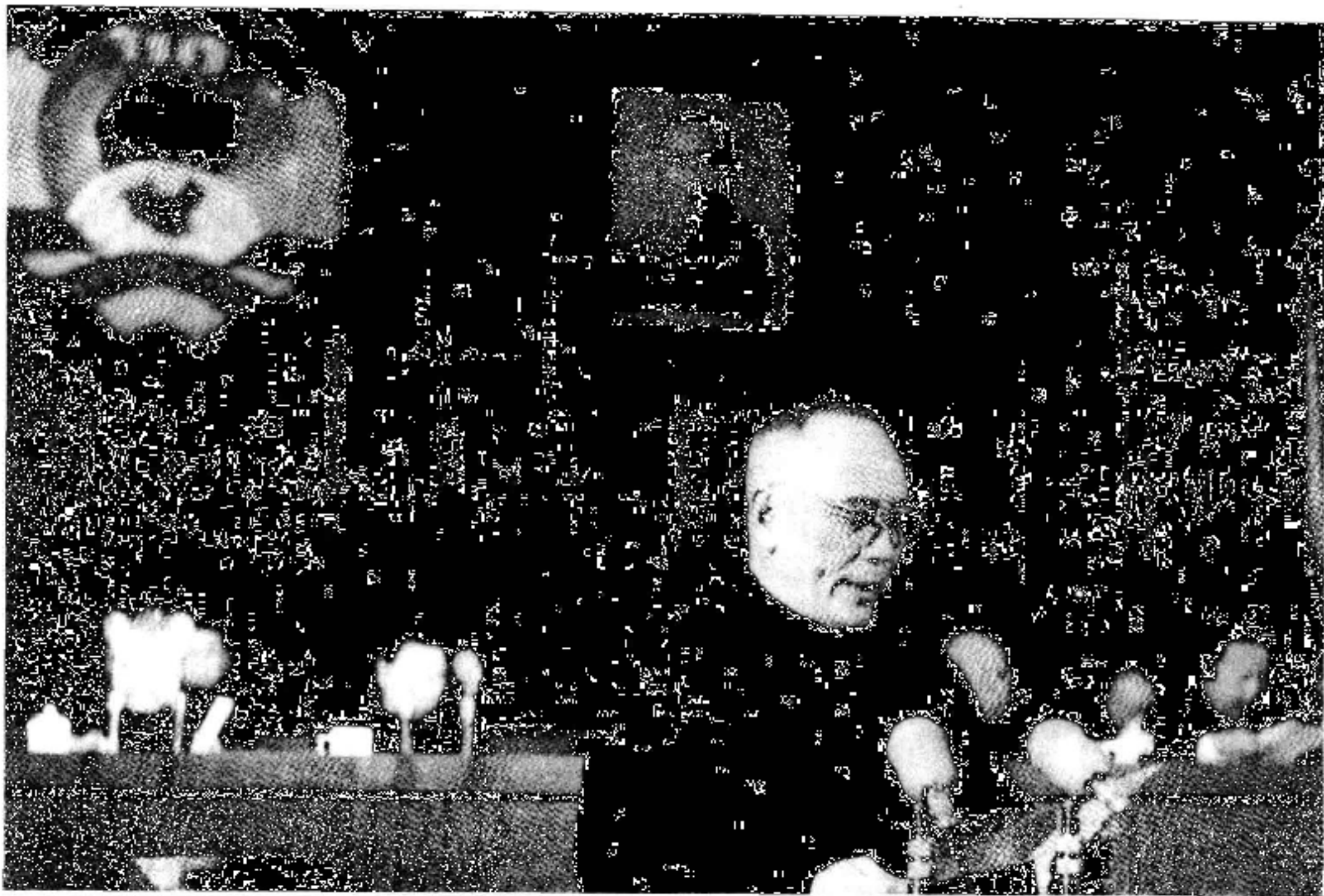
<sup>⑤</sup> 《公私合营工作情况反映》第2号,1956年1月26日,沪档C48-2-1602,第10页;《公私合营工作情况反映》第1号,1956年1月26日,沪档C48-2-1602,第1页。

<sup>⑥</sup> 常熟区一个出租三轮车的老板娘认为公私合营就是“把生产资料献给国家”。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全市公私合营情况反映》第7号,1956年1月20日,沪档C47-2-365,第33页。

<sup>⑦</sup>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全市公私合营情况反映》第7号,1956年1月20日,沪档C47-2-365,第32页。

<sup>⑧</sup> 这批人直到1979年才被“区别开来”,重新获得“劳动者”的身份及其相应待遇。《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求报告》,1979年11月12日,商业部办公厅编:《信访工作政策选编》,1987年,第633~636页。





应邀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上海永安公司董事长兼经理郭琳爽在大会上发言表示：“企业向国营商业看齐，个人向工人阶级转化”。

活的副业也因为合营而不能去经营，因此合营后生活困难。<sup>①</sup>这个结果可能让他们后悔不迭了。

不管如何，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通过数万名工商界骨干分子以及基层干部的工作，尽管时间急迫，上海仍然在1956年1月20日宣布全市完成了私营工商业的全面合营，“进入了社会主义”。据称，这次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商业共有242个行业106274户，手工业24000户，6万多人参加合作。<sup>②</sup>这种短时间内一致化的合营运动显然不是什么正常的现象。“全行业公私合营”对许多商人或手工业者来说，其实也是一种“集体强迫”，这种强迫以“同业公会”等团体的名义来执行，

<sup>①</sup> 裘绳武：《中小工商业者存在的问题》，《上海工商》第11期，1957年6月5日，第2页。后来经叔平曾经在鸣放运动中为这些小商小贩叫不平，指出合营高潮后，湖南有少数小商小贩为生活所迫自杀，要求政府给小商贩以适当自由经营的出路。《资产阶级有没有消极性？公方代表要不要撤除？工商座谈会上展开争论》，《人民日报》1957年5月19日，第3版。

<sup>②</sup>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上海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综合情况的报告》，1956年2月11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680～681页。不过，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蔡北华在市人代会一届四次会议发言中称“批准合营的工商行业有203个，84331户。”《蔡北华关于上海市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发言》，1956年8月，《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第795页。

使得商人的抵抗比较难以形成，最后形成一种“共同意愿”的假象。<sup>①</sup>然而其内部存在的问题后来却引发一连串的负面反应。

1956年1月20日后，上海虽然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新的不平等仍旧产生。所谓“大户”与“小户”，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有无法调和的矛盾。<sup>②</sup>因此，在1957年鸣放运动中，萃众毛巾厂经理李康年提出“取消定息，赎买二十年”，<sup>③</sup>尽管反映了一些“大户”的想法，却引起一般中小户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既缘于他们想尽快摘除“资本家”帽子，也反映了他们想趁早能够享受工人基本劳保福利，以及稳定的工薪。这种不满，最后却以批判李康年资产阶级反动剥削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章乃器所称“定息不是剥削”，<sup>④</sup>其实也是全行业合营高潮中一些工商业者的预期心理，后来因为定息无法摘除“资产阶级”帽子让他们很难接受。<sup>⑤</sup>

## 五、结论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与“公私合营”其实是两个过程，前者是在一个虚拟的话语系统里进行的，而后者则是在现实世界中让商人与干部们所能感觉到的。本文中，笔者主要从后者着手来进行具体分析，看当时的商人（包括后来的“手工业者”）是如何在不同的阶段来认识“公私合营”，如何提出申请，如何被接

① 工商界对公私合营的不满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有所显露。上海便有人用四个字来形容共产党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哄、吓、拐、骗”。上海市工商界整风委员会编：《1957～1958上海市工商界整风运动展览会汇编》，上海：上海市工商界整风委员会，1958年，第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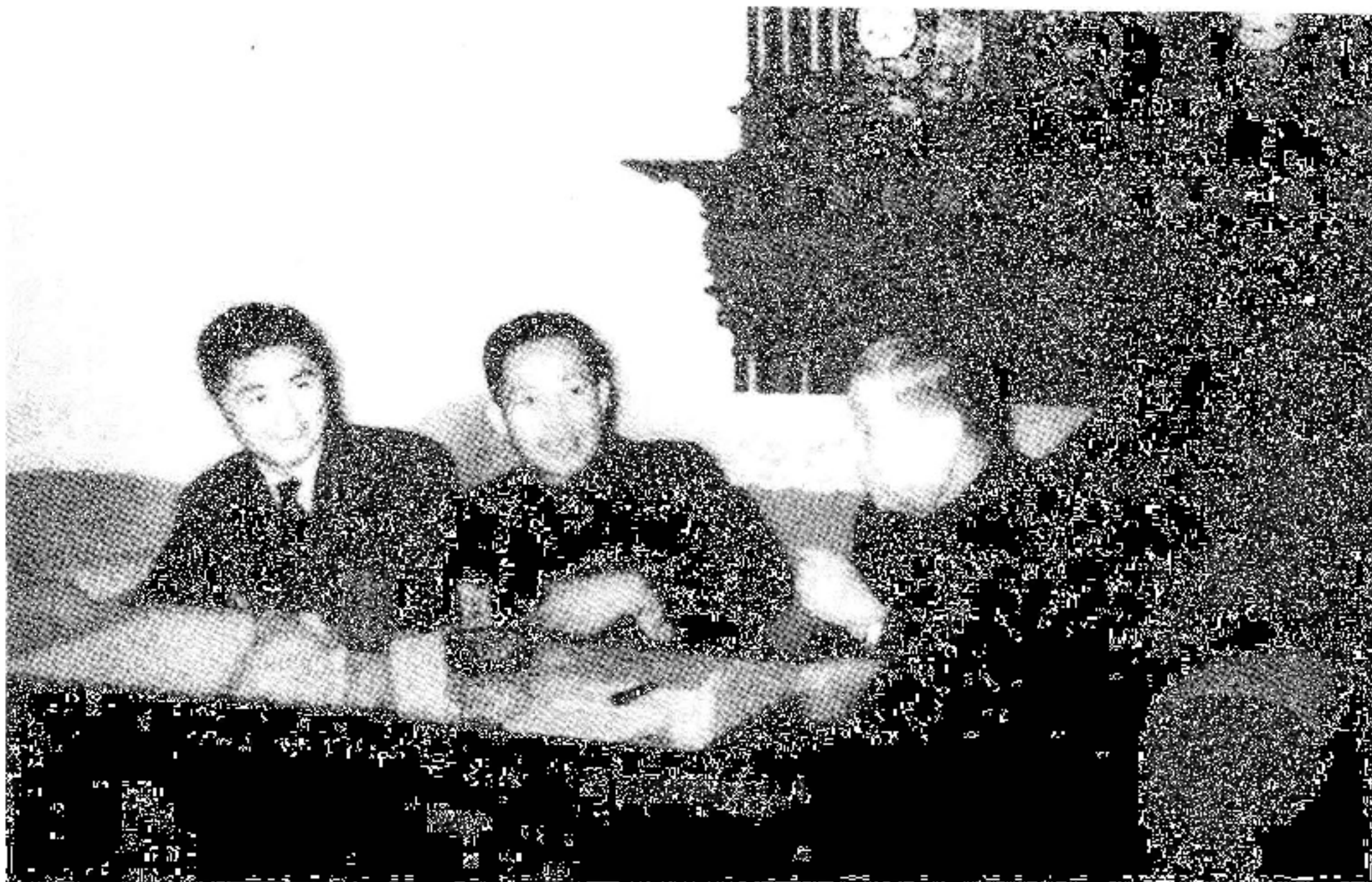
② 合营高潮后，上海流行的顺口溜称“小业主吃鱼吃肉，合营户逗五逗六，大资本家穿红穿绿，中小户苦头吃足”。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关于讨论陈云同志发言的反映专辑》，沪档C47-2-289，第52页。

③ 《李康年重申赎买二十年的主张》，《人民日报》1957年6月6日，第3版。

④ 《章乃器认为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第3版。

⑤ 1957～1958年的整风运动中，不少城市的商人提出了参加体力劳动，放弃定息和降低高薪的要求，“有的地方并且形成了群众性的运动”。中共中央认为：“资本家”要求放弃定息和降低高薪，大致有三种动机：（1）政治上取得主动；（2）去掉资产阶级帽子；（3）在政治上和劳动福利享受工会会员权利。接受他们的这种要求，从实质上看，对于资产阶级是利多害少，或则有利无害，而对于工人阶级却是利少害多，因为愈是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得干净，对于工人阶级才愈有利。《中共中央关于资本家要求参加劳动、放弃定息和降低高薪问题的通知》，《统战政策文件汇编》第1册，第697页。这些人头上的帽子似乎到1979年才悄悄被摘掉。是年7月，中共中央下文规定：“工商业者”在填写现在阶级成分时，不用再填写“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而可以填写“干部”或“工人”，并要求“今后不要再叫他们‘资本家’、‘资产阶级工商业者’或‘私方人员’等。政治上应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可以被吸收进工会”。《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五部门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1979年12月17日，《信访工作政策选编》，第636～638页。





在上海私营工商业申请合营的高潮期间，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中）访问上海工商联和上海市工商业者代表。

受，如何让他们的厂店（或者仅仅是个人的一点小资产）成为“公私合营企业”。

在不同阶段，“公私合营”是针对不同工商界人群的不同官方政策，而不同的工商人群对“公私合营”也有不同的理解。最早，“公私合营”多是随着接收所谓“官僚资本”而来的，当局很少主动去投资到私人企业，并与之“共同经营”。到“三反”“五反”阶段，“公私合营”的增加主要是因为商人的“退补款”以及其他名目的“公欠”款无法兑现，政府采取的资产抵充办法。然而，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出后，由于中共决定提前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且把所有的私营工商业都按这个目标加以改造。因此，政府进而在“公私合营”这个“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的名义下，选择性地将一些“有前途”的私营企业乃至行业逐步加以吸收，以壮大“国营经济”的力量。此时，合营的对象仍是大中型企业。其中包括经营情况良好的，也包括维持困难的。前者对合营并不情愿，但迫于“政治生存压力”而委屈妥协（同时会努力地争取减少经济上的损失）；后者可能迫于“经济生存压力”想甩掉包袱（趁势也可以获得额外的政治上的收获）。当局对不同状态的企业采取不同的策略，主动权则完全在政府手中。

到所谓“合营高潮”（或“大合营”）之际，“公私合营”实际上成为各级中共



干部非理性“政绩数字竞赛”的平台。而对具体执行“实行全行业合营”紧急计划的工商界积极分子来说，“公私合营”也是他们争取较好政治生存位置的手段，或从资源重组中渔利的机会。这次“高潮”的主要参加者则是中小型企业，也包括一般的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和失业者。对他们其中许多原来戴着“资本家”帽子的工商业者而言，“公私合营”是一场强大的政治身份重塑运动（亦即一般商人理解的“摘帽子”运动），他们期待“合营”能给他们带来“平等政治生存权”。而对一些收入不稳定的小商贩或生活困难的手工业个体户来说，“公私合营”可能是一场广泛的经济生存保障资格登记运动（亦即那些人所理解的“拿铁饭碗”）。许多企业的工人，或商店的职员也抱有类似的期待，他们希望通过“公私合营”达到有稳定的较好的收入。而对中共内部来说，“公私合营”在早期更偏向于如何在财政经济上更多地从私营工商业汲取利益（无论是所谓较理性的“肥猪政策”还是短视的“杀鸡取卵”政策）。而到后来，“公私合营”则成为各级官员力图表现“政治正确”，以及在政治权力竞争场上获取优势地位的一种手段。总体来看，各方面人士对“政治生存”与“经济生存”的考量贯穿于整个“公私合营”政策推行的过程。

从普遍人性的角度来看，以过高的道德标准为理想号召的政治运动无论如何不可能成功，其结果只能是给全体社会带来深重的破坏，并造成社会总体资源的虚耗浪费。这种模式的政治运动最后仍然会让位于较为理性的经济运动，承认个体有权适度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历史在兜了一个大圈子之后，仍回到原位重新开始。

# 中共对城市的接管与改造

——一个初步的研究回顾与思考

林超超\*

**摘要** 从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宣布全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到1957年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这七八个年头里，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完成了大规模的接管与改造工作的理论创建与实践，有关这段历史的学术研究价值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综合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状况，笔者认为，如何进行实证性研究，还原“人”在历史中的真实状态，寻找众多历史面相背后的合理逻辑，将成为未来这一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深化中国当代史研究的重要方法。

**关键词** 接管与改造 研究范式 实证研究 中国当代史研究

## 一、前言

1940年代后期，当中国共产党据有越来越多的城市之时，如何顺利接管城市，继而发挥城市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中的应有作用，成为当时及此后一段时期内共产党人不得不去认真思索的一个核心问题。从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宣布全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到1957年全国范围内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不但稳固了政权，而且领导中国走完了由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里程，这一进程之快，甚至超出了作为设计者的共产党人的最初构想。

对这一段历史的描述是千头万绪的，“接管”和“改造”二词当然并不足以概

\* 作者林超超，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括它的全貌，但仍不失为一条有效的线索以便我们“顺藤摸瓜”，只是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对这两个关键词在字面意义之外作如下界定。首先，中国大陆学界一般都将中共对城市的接管与改造，分作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然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二者实质上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以共产党的方式接管城市即意味着一种改造，而改造则是一种更加积极的接管过程。其次，中共对城市的接管与改造，从纵向和横向上看，都是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它所采用的方式除了正规化的组织和制度建设，还包括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及群众运动。再次，这一历史进程从宏观上看，是顺畅的，国家在总体上表现出了一股向心力，来自社会的各种自觉与不自觉的反抗在这一时期还不足以抵消国家自上而下的运动力量。可以这样说，无论对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而言，这都是一段有特殊意义的历史，它不单是共产党执政中国的开始，也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的转折点，更是中国当代史研究<sup>①</sup>无法绕开的起点。

在现阶段，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当代史的探究尚未全面展开，但也恰恰因此让学者看到了这一领域的潜在资源和学术前景。近年来，一股“1950年代的中国”的研究热潮正悄然兴起，继2000年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1950年代的海峡两岸研究群”之后，大陆方面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率先召开了一次“1950年代的中国”学术讨论会，华东师范大学也在2008年成立了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汇集了一批研究当代史的学者，并出版专业学术刊物《中国当代史研究》。在可预见的将来，史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必将与日俱增。

研究的新进展首先需要了解既有状况，本文将关注点放在“中共对城市接管与改造”上，<sup>②</sup>考察国内外主要学术成果。笔者所见现有的相关研究综述，除个别针

<sup>①</sup> 中国当代史，一般上理解，即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由于1949年后中共成为执政党，因此，此后的中国历史主要表现中共主导下的社会变迁，中共党史虽然不能等同于中国当代史，但却是后者的核心部分；另外中国当代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有一定的区别，后者侧重于政治与国家层面，在国内学者中使用较多，为行文统一起见，本文主要采用“中国当代史”这一内涵较为宽广的概念。

<sup>②</sup>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当代史的分期存有多种观点，本文选取1949～1957年作为考察“城市接管与改造”的时限，其原因：第一，以1949年为上限，主要依据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宣布将全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这大体上可作为中共大规模城市建设探索的开始；第二，以1957年为下限，主要考虑到这一年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基本完成，中共在城市大规模建设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告一段落。









文中，笔者除梳理学术史之外，还将重点突出几个关键问题的探讨，以便更加全面地展现既有的研究状况。

## 二、从宏观取向到微观视角：国外研究的几次范式转换

在1978年以前，中国大陆学界发表的有关1949年以后的中国当代史著作是很有限的。诚然，人们要将社会现实放进历史发展的脉络里来把握，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与反思，但官方的政策导向有时会起到更显著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看到，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美国的政治学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便投入到了了解读当代中国的行动中，特别从50年代末期以后，无论从研究机构和专家的数量，还是从研究成果的影响上看，美国都开始一步步地迈向西方中国学研究的中心位置。

由于信息资料来源上的单一和匮乏，早期的美国中国学家自然无法从细节上去把握中共在1949年后对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政治行为以及中国城市在中共的接管与改造中所经历的变革，<sup>①</sup>同时，受限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sup>②</sup>模式的眼界，大部分学者对共产党执政后的中国的描述仅止于宏观建构。<sup>③</sup>鲍大可（Doak Barnett）在他的一部著述中得出的如下结论，很能代表这部分学者的观点。他承认，尽管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后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它还是较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有纪律的精英团体和一个新的党政机构，借此将党的最高意志向中国的大多数人口贯彻到底；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法律传统的相对缺乏，意识形态就成为最好的政治资

<sup>①</sup> 周晓虹综合赵文词（Richard P. Madsen）和戴慧思（Deborah Davis）的观点，从研究方法和史料来源上将1950年代以来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划分为四个前后相继的阶段：第一阶段，上世纪50～60年代，大部分的美国研究者无法进入中国内地进行实地研究，主要依靠官方的报纸以及在香港收听大陆的广播来收集资料；第二阶段，上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大批的中国大陆公民涌入香港，为美国的研究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口述史料，同时海外形成的新的理论范式也被用来观察中国；第三阶段，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也向一批从事中国研究的美国学者敞开了怀抱，实地研究成为可能；第四阶段，上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开始与中国国内的学者合作，中国当代史研究在中外对话中继续发展。参见周晓虹：《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sup>②</sup> 极权主义理论原来是从对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主义俄国的研究中发展出来的，它把苏联视作极权主义模式的代表，当中国共产党自称仿效苏联模式时，人们就很自然地将中国也划归极权主义的范畴。参见詹姆斯·R·汤森（James R. Townsend）、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著，顾速、董方译：《中国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14页。

<sup>③</sup> 有关中国当代国家和社会状态的宏观分析，后来较有代表性的还有政治学家邹谠提出的“全能主义政治”，意指在“全能主义”（totalism）思想之下的政治社会中，国家的政治结构权力可以随时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的各个领域，它是国家在应对全面危机时形成。参见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为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页。





1951年5月5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了“改人、改戏、改制度”的三改政策。这是改编后的京剧《将相和》。



源和手段，1949年以来高频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政治运动）正是出于强化官方意识形态的目的，以防止资产阶级价值观和修正主义的复生。<sup>①</sup>和鲍大可一样从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来观察当代中国的还有弗朗茨·舒尔曼（Franz Schurmann）。<sup>②</sup>除此之外，另有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着进行专题或地区性的研究。<sup>③</sup>虽然少数的美国学者已注意到了中国共产党控制社会力度的有限性，<sup>④</sup>但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海外学者对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赋予了太多的概念化的想象：国家意志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它将社会变成了自己的附庸。

这种想象很快被证明是不准确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众多社会团体潜能的爆发，引发了海外学者对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的重新发现与定位。在中国各地散发的红卫兵小报，披露了中共高层和各级组织机构中的政治问题和派系斗争，这不仅为这一时期的海外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与资料，同时也带来了研究视角的转换。“极权主义”模式已不再为大多数人所坚持，各种新的解释框架纷纷涌现，<sup>⑤</sup>“第二代中国研究者”<sup>⑥</sup>试图从“文革”入手，追问当代中国深层的政治

<sup>①</sup> 参见 Doak Barnett: *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P.427 ~ 446。

<sup>②</sup> 参见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舒尔曼的研究强调了党和各级政府之间的组织结构及其控制与协作关系，书中提出的两种分权模式——分权 I（中央向企业分权）和分权 II（中央向地方分权）以及两种控制模式——垂直控制（vertical rule）和双重控制（dual rule），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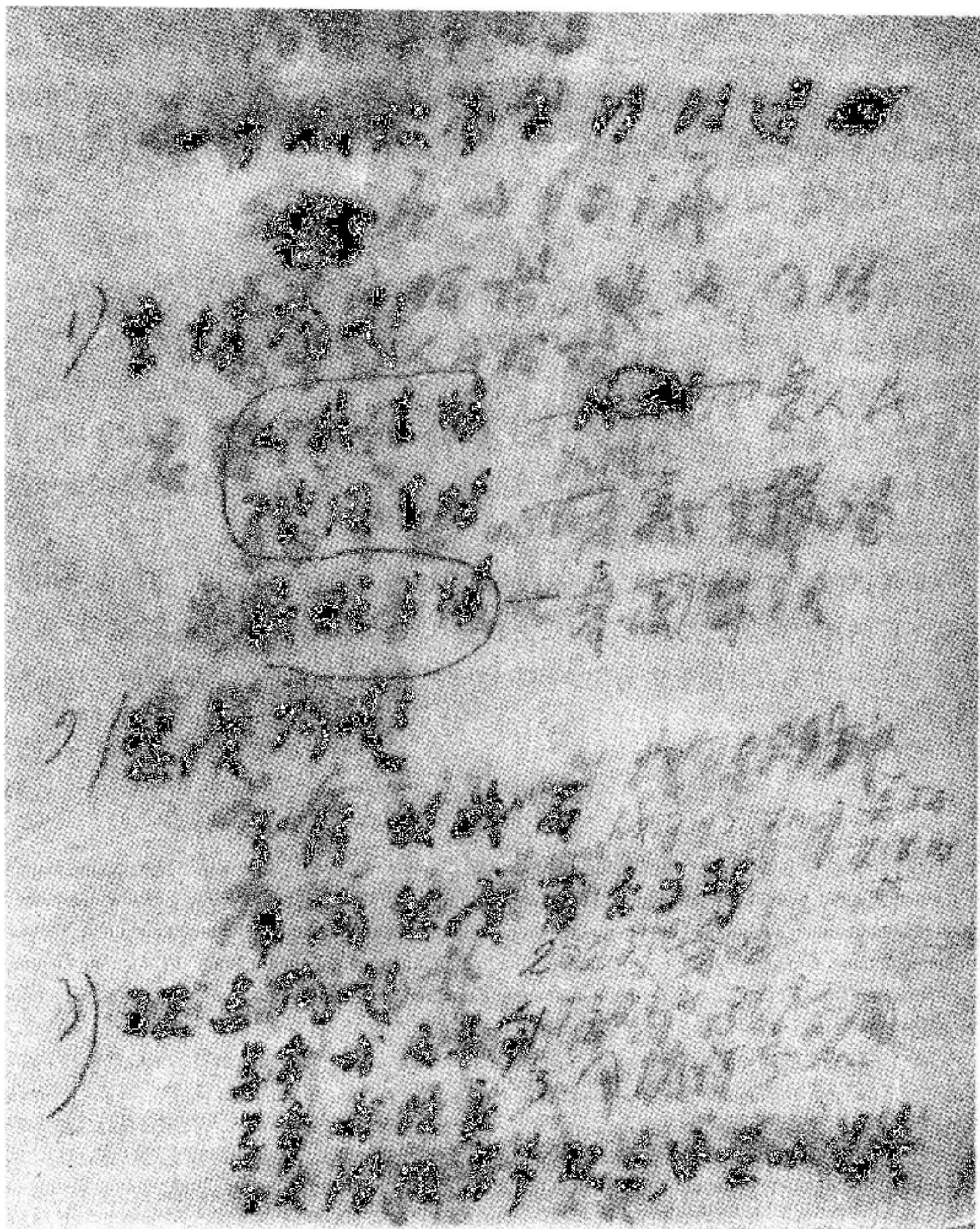
<sup>③</sup> 如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8; James R. Townse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Ezra F.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 ~ 196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该书的中文版已于2008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等。

<sup>④</sup> 如威廉·斯金纳（William Skinner）和埃德温·温克勒尔（Edwin Winkler）在《共产党中国的依从过程：一个往复的理论》中提出的“服从圈”理论就指出，中共在动员和改造社会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离心力，而不得不周期式地放松它的控制力度，以便继续得到群众的支持。参见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在《美国当代中国学的演变与展望》（李向前译，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图书资料处编译：《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2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一文中的相关简介。

<sup>⑤</sup> 王景伦在《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一书中概括了九种基本模式：倾向模式（Tendency models）、派别模式（Factional models）、官僚政治模式（Bureaucratic models）、结构模式（Structural models）、模范模式（Normative models）、毛控制模式（Mao-in-command models）、世代模式（Generational models）、利益群体模式（Interest group models）和合理性模式（Rationality models）。

<sup>⑥</sup> 这一提法参见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著，子华译：《中国政治研究：即将出现第三代学术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11期。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决定，在知识分子中开展思想改造运动。9月29日，周恩来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报告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就知识分子如何确立革命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谈了自身的体会，并号召教师认真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努力使自己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图为周恩来报告提纲的手稿。



状态，<sup>①</sup>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与前一时期相比有了较大的改变，他们发现中国的精英层和社会并不像以往所界定的那样“铁板一块”，而是充满着矛盾；共产党的全能统治仍然有其力所不能及的领域。当然，由于所依据材料的片面和不实，以及中西方文化的隔膜，他们的研究还未能对“文革”产生的社会及思想根源给出有力的解释，美国人喜欢的“多元主义”模式（或称“利益集团”模式）<sup>②</sup>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显然并不适用。

历史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国国内的新形势为海外学者接近中国提供了一条别样的途径：“文革”后期，大批的中国大陆公民通过各种途径迁入香港，随之而去的还有他们对大陆的生活记忆和对历次政治运动的个体认知；香港，成了这一时期国外学者探访中国的“绿色窗口”。同时，在美国史学界逐步兴起的“中国中心观”，正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接受，从中国内部的“微观社会”观察中国，几乎成为后来的中国学研究者普遍的研究范式。<sup>③</sup>在这其中，美国社会学家华尔德（Andrew G. Walder）是一个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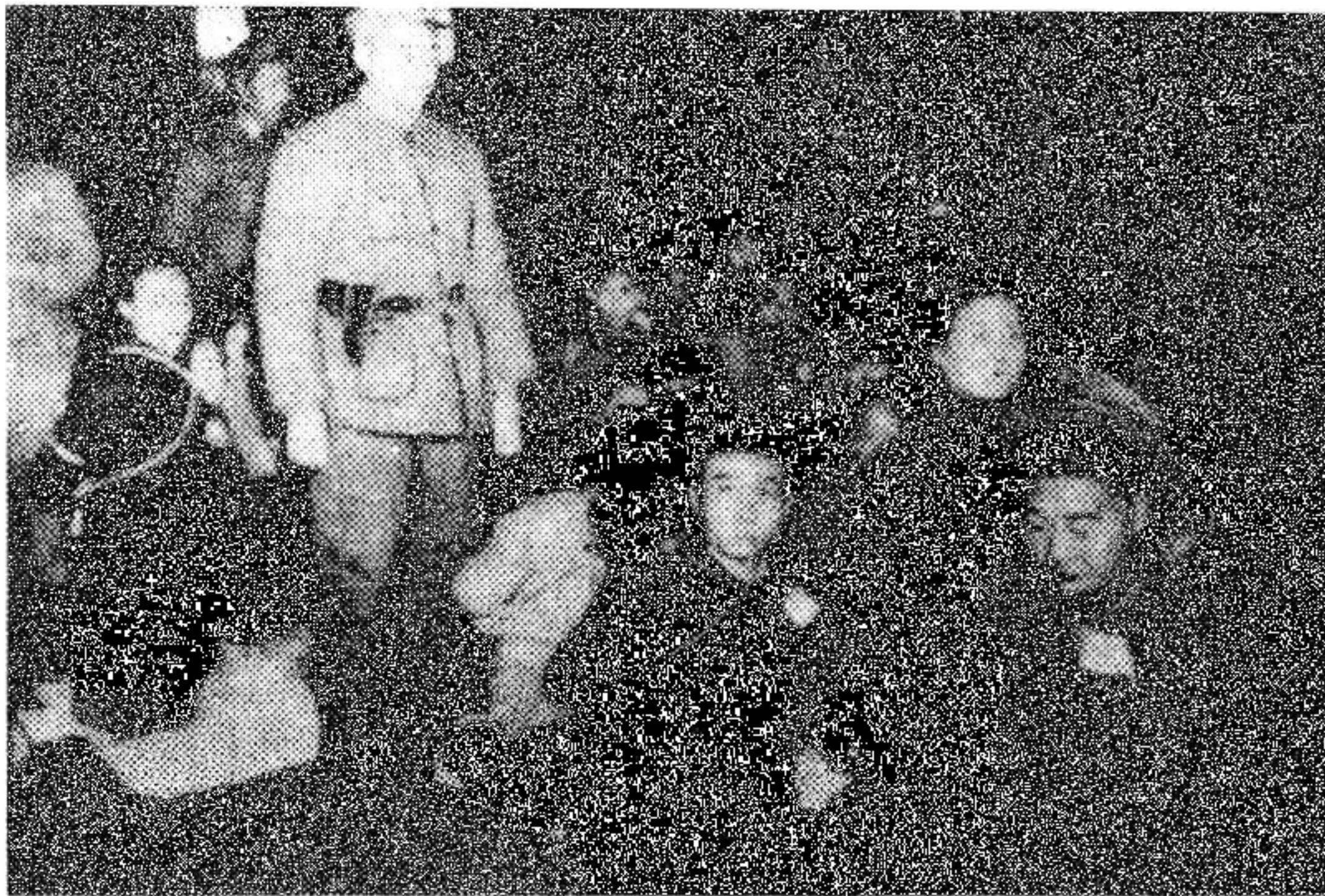
华尔德通过与80名中国大陆移民的深度访谈，注意到了1950年代以来中国国营工厂内部存在于工人与单位组织、领导私人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庇护关系”）——工人以政治效忠为代价换取物质利益和政治前途，领导则以“任人唯

<sup>①</sup> 相关的研究如 Michel Oksenberg: *China: The Convulsive Society*, New York: The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1970.; Richard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I: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II: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sup>②</sup> 多元主义模式，至少有两种含义，一指近代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尊重政治多元化的观念和学说，二指20世纪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多元化的民主理论，本文是在后者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具体地说，这种多元主义模式，主要是以美国实践为蓝本发展起来的一种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特别强调以美国为典型的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中的“利益集团政治”这一政治现象（故又称“利益集团模式”）。多元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多重竞争性的利益集团，且各利益集团是相互平行、彼此独立的，同时这些利益集团又一起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与政府进行“对抗”，对政府施以监督和制约。参见朱光磊、郭道久编：《政治学基础》，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1～113页。另可参见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半个世纪的伙伴：美国的中国研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文中相关部分。见周晓虹主编、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4～135页。

<sup>③</sup> 美国学者柯文（Paul Cohen）对“中国中心观”有很精彩的阐释，参见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1951年11月27日，上海公安部门逮捕一批妓院老板、领头。

亲”的原则在基层中发展稳固的垂直性关系<sup>①</sup>——在这种政治刺激体系之上形成了工人对单位及单位领导的高度依附。简单地说，华尔德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在单位中，无论是领导还是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他们都学会了如何用最上算的方式去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正如奥伊（Jean C. Oi）所言，这种行为往往以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风险的最小化为特征，它的出现是源于国家通过单位分配稀缺的社会资源。<sup>②</sup>“庇护主义”的分析视角注意到了利益双方的行动策略，对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有了更加人性化的把握，同时，华尔德的研究也开启了以“单位”分析中国社会组织和制度的先例。“单位”作为一个微型社会，它既是当代中国城市工人基本的聚合空间和身份归属，也是中央权威与个人联系的中间地带，从“单位”入手，可

<sup>①</sup> 华尔德将这种“游戏规则”概括为共产党中国的“新传统主义”，这种“施恩回报关系”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积极分子为领导做的工作。单位领导完成生产任务和政治工作依赖于积极分子的支持，同时积极分子作为“骨干”获得回报（包括好评和奖励）。详见华尔德（Andrew G. Walder）著，龚小夏译：《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

<sup>②</sup> 参见 Jean C. Oi：“Communism and Clientelism: Rural Politics in China”，*World Politics*, No.1,1985。另可详见其专著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国家”与“社会”的片面强调，而突现二者之间的互参与交错。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摇摆是几十年来美国学界观察当代中国，除宏观取向到微观视角之外另一个隐藏的视角转换轨迹，中国当代社会自身的发展历程和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现实关怀都影响着这一学术研究的走向。我们一方面看到，美国的中国当代史研究，受惠于理论性研究的学术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料上的不足，为他们的研究增色不少；但同时，正是由于缺少立足于坚实史料的实证性研究，他们对于1949年后的中国内地的认识难免空泛，对当代中国社会体制的实际运作方式和过程，少有完整的自足的案例分析。笔者所见的一些美国学者的新近研究正朝实证分析这一方面做出努力。如高崢（James Z. Gao）对1949～1954年间杭州城的几次重大政治运动的实证研究，在整合了广泛的档案和口述史料基础上，展现了较为丰富详尽的社会图景，他所关注的对象除了作为重点描述群体的南下干部，还包括了各阶层的城市普通居民，如工人、店员、僧侣、学生、知识分子、越剧演员、外国居民等等。<sup>①</sup>不过，书中关于接管杭州城的南下干部主要是来自山东的农民革命者这一说法似乎还需要更多的统计数字加以佐证。如何加强对中国原始档案的利用与解读将是今后海外中国学研究者力求突破发展的关键问题。

### 三、基于实证的研究分析：近年来研究热点回顾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开始有组织地进行中国当代史的学科建设和地方史志的编纂与整理工作，部分的基层档案陆续得以开放，使得学术意义上的实证研究成为可能。港台方面的大陆研究以各大高校为基地也形成了一支重要的科研力量。同时获益的还有海外的中国学研究者，他们被允许进入中国内地进行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和资料收集。如今的中国当代史研究再也不是海外政治学家的专属领域，国内外的社会科学研究专家正纷纷跨过1949年的界标向其发问，中西方学者之间相互交流与合作也愈益成为研究者的共识。近年来中国当代史研究在实证研究上取得了不少新的研究进展，其中有关中共对城市接管与改造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成果，概括起来主要涉及以下几个热点话题。

<sup>①</sup> 参见 James Z. Gao: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 （一）中共城市政策与基层政权建设研究

到目前为止，有关1949年后中共城市政策的回忆性史料和档案汇编已不在少数。<sup>①</sup>与史料发掘同步增长的是学术界对于这一领域研究的关注，一个可观的表现是近年来不少高校的硕、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围绕着这一议题，从上海、武汉、广州，到济南、南昌、桂林等大大小小的城市，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婚姻家庭、法制建设、社会整治等方方面面，都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范畴。但略有遗憾的是，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局限于政策部署层面的梳理，一者缺少对中共城市政策制定的内在理路的探究，使得不同的研究成果之间很难达到一个学术上的对话，由于研究者所选地域或领域的不同，不免各说各话；二者，常理上政策在实际落实中经常会遭遇各种“意外”，譬如接受方可能会表现出超出预计的合作或抵制姿态，与此同时决策者也会视情势发展在不同程度上调整政策，这种近似于“讨价还价”的过程，恰恰才是历史中最真实的面相。因此，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上的观照显然是不够的。

此外，研究者在考察问题时往往容易封闭在所截选的时段内。事实上，早先的农村工作经验对于这一时期中共城市政策的制定起到了很大的参考与借鉴作用。譬如在农村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共产党特有的且颇具成效的社会动员方式，同样成为中共执政后城市政策的一大特色。从社会动员这一角度入手，也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把握上层政治与底层民众之间的互动。如杨奎松通过对上海“镇反”运动的历史考察，展现了执政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如何运用农村土地改革中的政治动员经验激发城市底层民众的“阶级”仇恨和翻身渴望，从而引导后者在新旧政权之间做出情感上

<sup>①</sup> 如全国政协暨北京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城市接管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接管上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王朝彬：《“三反”实录》，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年；孙瑞鸾编：《三反五反运动》，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乌鲁木齐市“三反”、“五反”运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王守法、赵洪顺编：《山东的“三反”、“五反”运动》，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以及各省市级有关部门编纂的“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系列丛书，在此不一一枚举。



的判断与选择。<sup>①</sup>不仅是“镇反”，此后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及厂矿企业和街道弄堂里的民主改革，乃至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无一不是通过渲染“阶级有别”而展开的。郭圣莉将共产党这一城市政策命之为“阶级净化机制”，其实质就是用所谓的“阶级关系”来打破基层社会中既有的基于血缘、亲缘、地缘之上的初级的私人关系网络，同时将新政权不信任的分子纳入反革命或者其他“不法”人群的行列，而从道义的合法性上对其进行清理与整合。<sup>②</sup>但正如杨奎松在前文中指出，中国城市社会关系的复杂程度要远远超出共产党人最初的想象，所有的政治运动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当代中国陷入了频繁发动政治运动的怪圈之中。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共城市政策方针的认识基本一致，一方面强调它继承了农村根据地建设时期的工作经验，另一方面指出其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模仿与修订。<sup>③</sup>当然，有关中共城市政权建设和国家建设的总体方针和构想，在没有看到核心的高层档案时，我们只能做出这样的推测。

## (二) 城市政治运动研究

作为中共城市政策组成部分的政治运动，可谓是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显学，特别是其中受到关注较多的“三反”、“五反”运动，不断有学者力图对这两次运动的发起和经过进行阐释和再定义。2006年出版的两部直接针对“三反”、“五反”运动的专论，可算是对目前大陆学界“三反”、“五反”运动研究主流观点的一次归纳

<sup>①</sup> 参见杨奎松：《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以上海“镇反”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关于中共“动员”策略在城市基层政权建设中的运用的其他研究论述还有黄利新：《北平和平接管时期的城市街道工作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5期；张济顺：《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郭圣莉：《阶级净化机制：国家政权的城市基层社会组织构建——以解放初期上海居委会的整顿与制度建设为例》，《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郭圣莉：《城市社会重构与国家政权建设——建国初期上海国家政权建设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等。

<sup>②</sup> 参见郭圣莉：《阶级净化机制：国家政权的城市基层社会组织构建——以解放初期上海居委会的整顿与制度建设为例》，《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张济顺：《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阮清华：《归位：建国初期上海游民改造对象分析》，《史林》2008年第1期；阮清华：《“割瘤”：1950年代初期上海都市基层社会的清理与改造》，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一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143～155页。

<sup>③</sup> 国内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以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为标界，将此前回溯至1949年的历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权建设和巩固阶段，同时认为，从1956年起，中国共产党在汲取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的经验基础上，开始了一条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论点实质上已经承认了1956年之前的中国共产党走的是一条模仿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麦克法夸尔（R. MacFarquhar）和费正清（J. K. Fairbank）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王建朗等译，陶文钊等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也持相同的观点，直接使用了“仿效苏联模式”作为第一篇的标目。

总结。王顺生、李军认为“三反”运动发展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确与大量贪污案件的检举揭发直接相关，但它最初只是作为增产节约运动的副产品出现。<sup>①</sup>何永红对“五反”运动的起因在清除“五毒”之外进行了更大范围的探讨，至于这次运动的实质，何认为主要还是为解决发生在经济领域的非法问题。<sup>②</sup>相比之下，国外学者更倾向于从政治层面上给予解释，如汤森（James R. Townsend）和沃马克（Brantly Womack）认为，三反运动的真实意图是要审查和管束党内外不符合中共标准的干部，而“五反”运动则是要削弱城市中产阶级的经济资源和政治地位。<sup>③</sup>对于“三反”、“五反”运动，我们还可将其置于政治运动的范畴之下做进一步的探讨，一些学者便试图透过“五反”运动，探寻中共发动政治运动背后的深层逻辑。胡其柱在他的文章中首先强调了执政党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是会做出不同于常态的决策判断的，当资本家“非法”的经济行为被定性为政治事件时，那么按照共产党传统的思维模式，他们自然就会付诸于群众运动予以解决；其次，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利用意识形态话语与工人“合流”，同时工人也借助国家权力对抗资方，从而使“五反”后的资本家沦为社会的边缘群体。<sup>④</sup>张鸣认为如何解决制度化建设与道德意志退化之间的关系是“农民造反者”成功后都要面临的一个关乎政权兴亡的关键性问题，因此，中共“搞运动”的深层动机就是要谨防重蹈历史的覆辙。<sup>⑤</sup>

为了更加细致地了解“三反”、“五反”运动的内情，一些学者还将目光投向了部分特殊行业和地区的“三反”、“五反”运动的探究之上，如杨奎松的《1952年

① 参见王顺生、李军：《“三反”运动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4页。

② 何永红认为“五反”运动的根本原因是民族资产阶级、私人资本主义在中国地位的上升，而“三反”运动是引发“五反”运动的直接原因，此外领袖方面的因素、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民意都是本书探讨的原因之一。参见何永红：《“五反”运动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45～59、161页。

③ 参见《中国政治》，第77页。另外莫里斯·梅斯纳（Maurice Meisner）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张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一书中也持同样的观点，详见第110～111页。

④ 参见胡其柱：《1952年“五反”运动研究》，《二十一世纪》2005年12月号。

⑤ 参见张鸣：《执政的道德困境与突围之道——“三反五反”运动解析》，《二十一世纪》2005年12月号。事实上，早在上世纪60年代鲍大可（Doak Barnett）等国外学者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鲍大可认为在中共的意识形态里，是人的意志和劳力而不是技能被看做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中共似乎有意识地通过群众运动（政治运动）来抵制政府的常规化运作，以使干部们保持高度的革命热情，杜防资产阶级价值观和修正主义的再生，当然国家为此要付出高额的成本作为代价。参见 *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pp.437～438. 国内学者中，如金观涛与刘青峰曾提出，坚守“无产阶级”的立场是要通过批判和否定对立面而实现的，而批判与否定正是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进行的，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同时可参见高华：《阶级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4年，第20～21页。



上海“五反”运动始末》、<sup>①</sup>张徐乐的《上海私营金融业与“三反”“五反”运动》<sup>②</sup>等等。但即便如此，我们对于这两次运动的认识还只能说是表层的，因为“个人”依旧被掩盖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之下，身为政治运动主体的“群众”，往往只是作为一个单数意义上的概念出现。显然，群众内部的声音总是嘈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因此，若要更好地挖掘群众运动的真相，我们就需要在复数意义上使用“群众”这一概念。而相对于“三反”、“五反”运动，这一历史时期的其他政治运动大多还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状态，如1950年代在厂矿企业和街道里弄中广泛开展的民主改革运动，在国内外的学术成果中都少有述及，<sup>③</sup>有待后来人为其“著书立传”。

### （三）中共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政策研究

将共产党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政策同时提起，也许并不十分合适，但两者在共产党执政中国的头几年里却有着十分相似的命运。中国大陆现行的历史教科书在涉及共产党执政初期的城市经济政策时，一般都重点强调了对与国民党政权关系密切的官僚资本的没收和改造，而相对忽略了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保护。杨奎松认为这种保护只是一种出于经济上考虑的退让和安抚政策，一旦时机成熟，“消灭资产阶级”是共产党人的必然使命。<sup>④</sup>这种解释逻辑也被一些学者用在了1949年后中共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转变上，他们的依据是知识分子被当做“小资产阶级”而同样成为需要被改造的对象。至于“团结、教育、改造”方针的提出，一方面是出于对知识分子重要性的认识，同时它更说明了中共把知识分子看作倾向资产阶级的异己分子，而非可依靠的群体。这就不难理解中共在1949年以后的知识分子政策中表现出的极大的摇摆性。<sup>⑤</sup>这种基于意识形态冲突的分析，固然可作为一种解释，但这种解释极容易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模式化。

笔者认为中共所谓的阶级对立、意识形态冲突论带有很大的策略性成分，是否

<sup>①</sup> 杨奎松：《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sup>②</sup> 张徐乐：《上海私营金融业与“三反”“五反”运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6期。

<sup>③</sup> 笔者所见的国外新近研究成果，如日本学者岩间一弘在《在演戏和宣传之间——上海民营企业职员阶层的重组与群众运动，1949～1952》（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2007年6月28～29日，另该文已于2008年由日本东京风乡社结集出版）一书中对上海私营企业中的民主改革运动有专章探讨。

<sup>④</sup> 参见杨奎松：《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

<sup>⑤</sup> 相关的研究可参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章；于风政：《改造——1949年至1957年的知识分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杨凤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沈志华：《1956年初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

可以作实质性的分析，还有待商榷。更何况官方宣称思想改造所要斗争的对象——资产阶级思想，本身也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共产党斗争的靶心究竟在何处？是旧有的社会价值取向，还是既有的社会阶层地位落差？抑或者每一次行动的策划仅仅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而已？崔晓麟在对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做了具体的原因分析之后，认为：清除欧美文化影响、顺利进行院系调整是这场运动的直接动因。<sup>①</sup>李扬和王先俊也从整合社会思想的角度作了类似的解释。<sup>②</sup>至于知识分子如何在自上而下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获得“解放”、完成自我改造、形成与新政权之间的相互认同，则是后来的研究者可以继续努力探究的一个方向。<sup>③</sup>

#### （四）都市文化与社会改造研究

1949年后中共对城市的接管与改造，亦可纳入城市史的范畴进行考察。近年来国内的城市史研究突出地表现在对人文空间的关注上，这与海外学界对“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概念的引入直接相关。为避免卷入不必要的概念纠缠，有的学者在研究中使用了“公共空间”这一内涵和外延较为明晰的概念。<sup>④</sup>简单而言，“城市公共空间”即为城市中广大阶层提供生活服务和社会文化的场所，它的“公共性”特征决定了它与市民及市民生活的密切联系，而公共空间的另一特性——开放性，使它成了城市形象和变迁的“展示柜”。在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探访中，愈来愈多的社会存在被纳入了近现代城市史的研究范畴。国内史学界对当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关注很大一部分正是从近现代城市史研究顺延而来。若从群体上看，包括城市游民、娼妓、民间艺人在内的下层民众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若从城市生活内容上看，目前的研究关注到了公共舆论（新闻出版）、休闲娱乐，乃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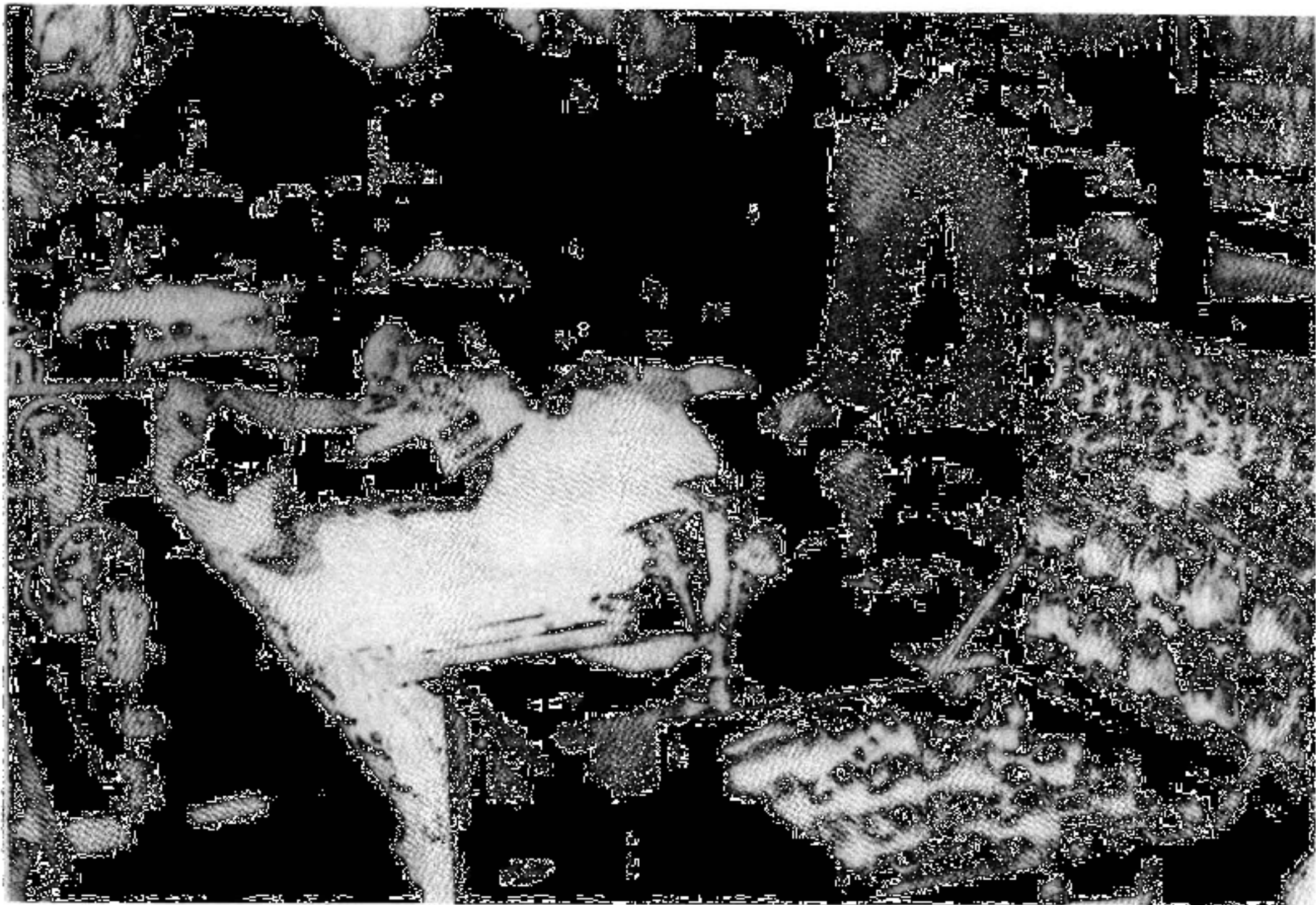
<sup>①</sup> 参见崔晓麟：《重塑与思考：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sup>②</sup> 参见李扬：《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与社会变迁——院系调整研究之一》，《开放时代》2004年第5期；王先俊：《建国初期的社会变迁与党对思想文化的整合》，《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sup>③</sup> 海外学者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一般采用个案研究的形式，如齐慕实（Timothy Cheek）通过对邓拓的研究，来观察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得不到国家意识形态庇护下的人生际遇，他把当时知识分子的主导思想归结为三种：狂热的爱国主义、谋求政治支持和知识分子自身的优越感。参见齐慕实著，杨风华译：《北美学术界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开放时代》2003年第2期，另可详见其专著 *Propaganda and Culture in Mao's China: Deng Tuo and the Intelligents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但我们也注意到，海外学者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少数“当权”的知识分子身上，因此，他们所做出的阐释是否能概括出广阔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风貌是需要商榷的。

<sup>④</sup> 参见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举办的贪污分子赃物展览。

其他形式的文化消费，<sup>①</sup>并在若干领域上形成了学术对话。如在对大众娱乐的考察中，研究者较一致地认为，虽然相比民国时期，1949年后的中国在城市管理和控制上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国家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入到了基层社会，但无论如何，新政权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改造是无法一蹴而就的，1950年代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仍旧持续了民国以来的现代化走向，只是在对国家文艺体制改革的成效上，

<sup>①</sup> 相关研究如姜进：《断裂与延续：1950年代上海的文化改造》，《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张济顺：《转型与延续：文化消费与上海基层社会对西方的反应》，《史林》2006年第3期；张济顺：《从民办到党管：上海私营报业体制变革中的思想改造运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一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40～75页；王笛：《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1950年代前期对成都茶馆中曲艺和曲艺艺人的改造和处理》，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一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76～105页；阮清华：《上海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8）》，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周武：《从全国性到地方化：1945年至1956年上海出版业的变迁》，《史林》2006年第6期；黎汉基：《重点发行与强迫摊派——中共建国初期出版政策研究》，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0期，等等。

学者的评价略有分歧。<sup>①</sup>除了艺术界,同样被纳入国家文艺体制的还有新闻出版业,新闻界作为社会舆论的一支导向力量,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一时期被编入国家体制的不仅是私营报业,同时还包括大量的自由报人,对社会“旧人员”的整编也是1949年后中共城市政策的一项关键举措。<sup>②</sup>国家一方面实行“包养”政策,使得一批得到新政权承认的社会阶层得以生存下去。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那些无法正常谋生的社会群体,又该如何安置,此事关乎新政权的稳固,国家自不敢怠慢。正如前文提到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时候就成了最好的应对之策,运用“阶级划分”手段对后者进行清理与整合,目的便是要使新政权下的每一个公民都得以各安其位。<sup>③</sup>凡此种种研究正是当前的一个新热点,有待更大范围内的探讨与学术对话。

以上对近年来相关实证研究的热点回顾显然是挂一漏万的,除此外,仍不乏其他的研究热点,譬如对“新民主主义为何终结”这一话题的讨论,就引来了国内两岸三地学者的共同关注,针对个中原因,学者见仁见智。<sup>④</sup>然而从总体上言,与本文议题相关涉的相当数量的研究论著还主要是围绕着1949年以后中共的政权巩固、国民经济恢复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改造三个阶段进行,虽在近年呈现出地区化、行业化的精细化发展趋势,但其中大部分成果仍流于史实的陈述,而对这一阶段历次重

<sup>①</sup> 详见王笛:《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1950年代前期对成都茶馆中曲艺和曲艺艺人的改造和处理》,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一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76页;姜进:《断裂与延续:1950年代上海的文化改造》,《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张济顺:《转型与延续:文化消费与上海基层社会对西方的反应》,《史林》2006年第3期,等等。

<sup>②</sup> 这里做补充说明的是,除了对“旧人员”的整编,对新人员的任用(包括干部选派)也是1949年以后新政权对城市接管与改造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见,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南下干部与原地方官员的人事关系展开,如高崢(James Z. Gao)和杨奎松在他们的著述中都注意到了南下干部在异地工作中与当地人的矛盾与冲突。参见*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和杨奎松:《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兼谈1950年代反“地方主义”的由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一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3~39页。

<sup>③</sup> 张济顺在《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了“单位化”这一概念,即将社会上的失业或无业人群安插进各种单位。另可见阮清华《归位:建国初期上海游民改造对象分析》(《史林》2008年第1期)、《“割瘤”:1950年代初期上海都市基层社会的清理与改造》(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一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143~155页)等文,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探讨。

<sup>④</sup> 相关研究有如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五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变》,《二十一世纪》1992年10月号;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关于俄国模式的影响问题》,《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李福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3年6月;朱佳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5期;王韶兴:《对中国社会制度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再思考》,《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



大事件发生的内在逻辑，以及社会变迁的深层状态，缺乏具有学术意义的史观提炼与对话。

综合考察之后，笔者以为除了以上所提到的若干研究热点，仍有几个研究领域有进一步发掘和深化的可能和必要。首先，目前学术界对社会团体与组织（包括帮会和宗教组织）的研究还相对薄弱，特别是那些从前近代中国及民国时期既已存在的各类团体在共产党执政中国前后的生存状态，许多都还不为人们所深知。<sup>①</sup>其次，就群体而言，目前的研究对象还主要围绕着政治上敏感的阶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而对1949年后日益壮大的劳工大众缺少关注。既有的工人群体研究基本上都是在“工人运动”与“中共党史”的框架之下进行，工人群体作为一个普通民众（市民）的生活场景在政治史叙事下被排挤到了学术边缘，还原劳工群体真实的历史存在是日后实证研究有待深入的一个方面。<sup>②</sup>此外，还有一些领域的研究需要大力发掘，诸如当代中国各项司法改革的推进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关系的变革，目前只有少数学者对此投以了关注。<sup>③</sup>

#### 四、共产党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几个关键问题的探讨

对于中共接管与改造城市的这段历史时期的学术研究价值已经无需多言，但有一个能更加说明其特殊价值的核心问题，仍有必要在这里被着重提出，那就是1949年后的共产党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如果说以上的研究回顾主要涉及海内外相关成果的研究视角、眼界和方法论，那么接下来，笔者将通过若干问题的引导，展现既有的研究在这一核心问题上的探讨与争鸣。

<sup>①</sup> 少数学者对1949年后的工商团体改造给予了关注，相关研究有如，魏文享：《专业与统战：建国初期中共对工商同业公会的改造策略》，《经济史》2008年第4期；魏文享：《国家介入与商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武汉工商联为例（1949～1956）》，《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郑成林：《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工商团体的改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崔跃峰：《1949～1958年北京市同业公会组织的演变》，《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sup>②</sup> 就笔者所见，目前也有部分研究著述开始关注到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如袁进、丁云亮、王有富：《身份建构与物质生活：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的社会文化生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梅方权：《安源矿工转型期的变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等等。

<sup>③</sup> 新近的海外研究成果如Klaus Muhlhahn: *Criminal Justice in China: A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该书对中国自晚清以降直至当代社会中的刑事审判程度做了一个初步的历史性回顾。

## （一）共产党何以在 1949 年执政中国？

这是中国当代史研究要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中国内地的历史教科书在解释这一问题时一般提到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的共产党与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之间的历史选择性——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海外学者虽然不会有这种认识，但他们同样注意到了其中的群众基础问题。如马克·赛尔登 (Mark Selden)<sup>①</sup> 和毕仰高 (Lucien Bianco)<sup>②</sup> 都强调了经济改革在动员民众、赢得农民拥护上的重要性。而另一个中国人在感情上不太容易接受的观点是，日本的人侵对国共之间的力量对比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约翰逊 (Chalmers A. Johnson) 对此有专著论证，他将农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了极大的渲染，认为日本人的侵略行动和共产党人的反应对于中共吸引大众支持、夺得大陆政权起到了关键作用。<sup>③</sup> 对此，笔者认为，历史的形成总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汲取各种观点的合理性成分才能得出最具说服力的解释。

## （二）共产党中国是传统中国的继续？

1949 年，当共产党开始执政中国之时，它面对的还是一个远非“社会主义”的中国，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都带有或多或少的冒险性和尝试性。从常理上思考，这一时期中共的政策应该以稳妥为宜，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无疑为中共提供了榜样；但当苏共二十大披露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危害性之后，中共对苏联模式产生了怀疑，于是，中共八大的召开被视为中共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开始。然而事实上，从 1949 年后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更多的是从自身的历史中寻找经验，正如前面提到的“动员政治”，同时他们也会不自觉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浸染。菲兹吉拉尔德 (C. P. Fitzgerald) 很早就提出了共产党与中国传统的统治方式之间的相似性，他发现“文革”后对“四人帮”现象的总结，恰恰认为是中国长期的“封建主义”传统和短期的现代民主经验作祟。<sup>④</sup> 华尔德还把这种家长式的专断统治与现代官僚制形式的结合体，概括为“权

<sup>①</sup> 参见马克·赛尔登 (Mark Selden) 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sup>②</sup> 参见 Lucien Bianco: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 ~ 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sup>③</sup> 参见 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 ~ 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sup>④</sup> 参见 C. P. Fitzgerald: *The Birth of Communist China*,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64, P.41 ~ 42。



威的制度文化”。<sup>①</sup>白鲁恂(Lucian W. Pye)更是以对当代中国政治中的文化因素和社会心理研究而著称。他认为,中国政治文化在强调和谐与共识的同时,又强调“关系”(拉帮结派),二者看似矛盾却统一于中国人的政治行为之中。<sup>②</sup>罗德明(Lowell Dittmer)对此表示赞同,但他并不认可白鲁恂把“派系斗争”(Factional Struggle)<sup>③</sup>作为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的观点,而使用了“路线斗争”(Line Struggle)<sup>④</sup>这个概念。<sup>④</sup>将政治狭隘地理解为派系间的权力斗争,的确很难令人信服,至于中国人对于“关系”的重视,一者它可能确是出于个人利益的实用性考虑,二来它可能只是中国人传统文化心理中“依附”情结的再现。从文化和心理的层面来探讨当代中国对传统中国的延续和继承,也许能对共产党的政治行为形成不一样的理解。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还少有研究。

### (三) 共产党给中国带来了多少改变?

在社会变迁中“人”是需要被关注的焦点。社会中最重要要素是人,而最复杂也最微妙的要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即解释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私人关系网络的存在及其特征。但这种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社会存在却在1949年后一场又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造中,以超乎想象的速度瓦解了。傅高义(Ezra F. Vogel)和后来的肯尼斯·利伯塔尔(Kenneth G. Lieberthal)都将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所认可的人际关系称之为同志关系(comradeship)。<sup>⑤</sup>但正如傅高义自己也承认同志之间也存在亲疏远近之分,这种关系并不能与传统的私人关系截然对立。而极权主义理论者所表征的社会原子化(social atomization)强调社会上人际关系的隔绝,同样与社会现实存在着某些抵牾,事实上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

<sup>①</sup> 参见《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第2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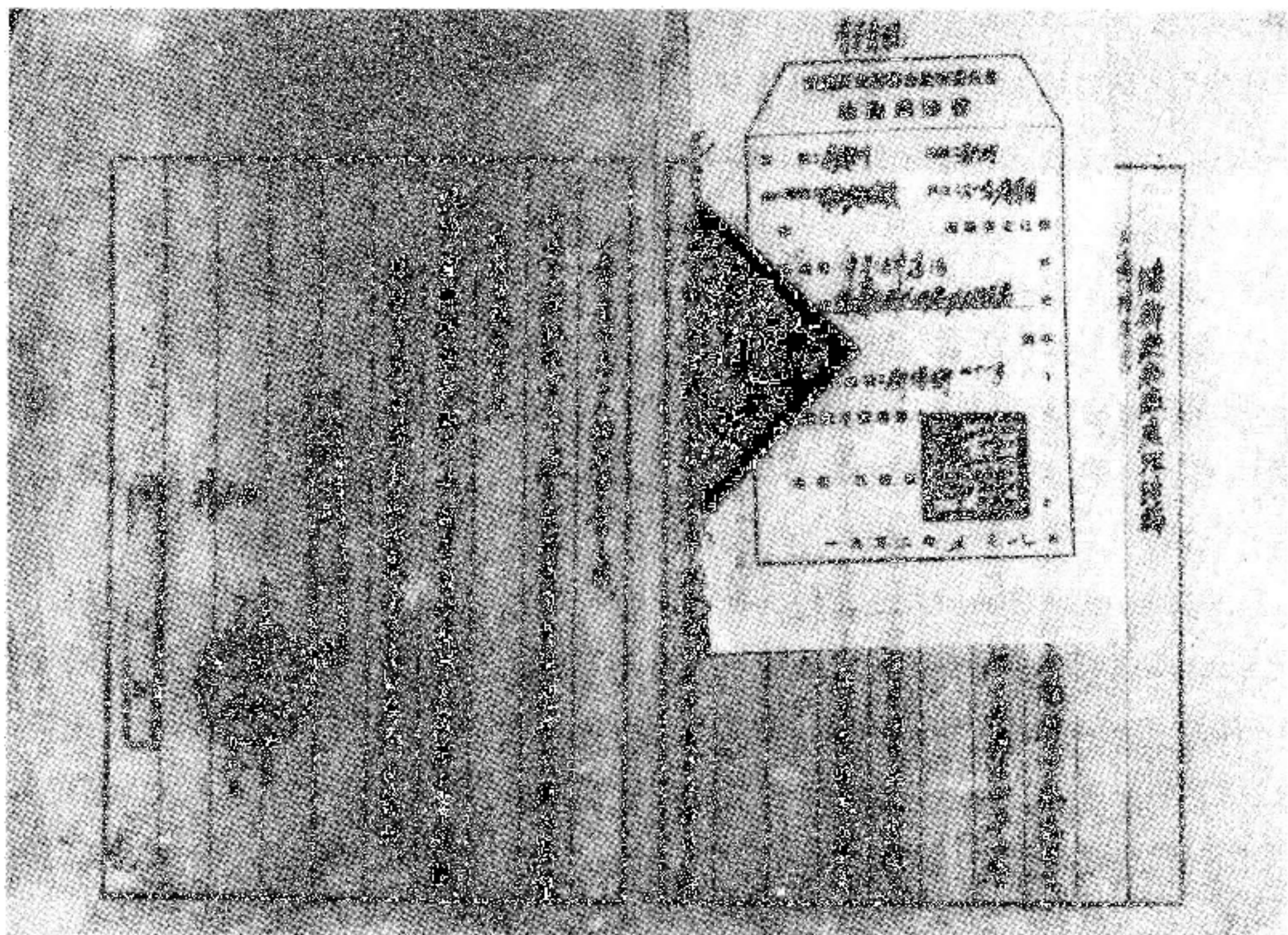
<sup>②</sup> 参见白鲁恂(Lucian W. Pye)著,胡祖庆译:《中国政治的变与常》,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9年。他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还有*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8. 和*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sup>③</sup> 同白鲁恂一样采用“派系斗争”概念的,较具代表性的还有安德鲁·纳森(Andrew Nathan),他在1973年发表了《中国政治中的派别模式》(“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53, 1973)一文,而被视为“派别模式”的创始人。

<sup>④</sup> 参见Lowell Dittmer: “Line Struggl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2, 1977. 和“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34, 1995.

<sup>⑤</sup> 参见Ezra F. Vogel: “From Friendship to Comradeship: The Change in Personal Relations in Communi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21, 1965.; Kenneth G. Lieberthal: *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 1949 ~ 195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82.





在“五反”处理阶段，对私人工商户划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五类，区别对待。图为“五反”中定案处理通知书。

时总要和周围的人发生各种各样的社会联系。<sup>①</sup> 华尔德对 195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国营企业中存在于工厂领导与积极分子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庇护关系）的探讨，为其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如果说白鲁恂对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研究突显了传统中国的延续性，那么华尔德则更多的是在强调 1949 年后的中国与传统中国的断裂，论证单位制对当代中国社会关系的重塑。正如笔者在前文提到，“单位”不仅是当代中国基本的社会构成，同时国家通过其对社会资源（包括生产资料，以及个人的生活资料、工作岗位、住房及各种社会保障等）进行分配，从而导致了个人对于单位的高度依附和当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变革。“庇护主义”关系模型，兼顾了公共关系和私人关系，并将政治活动与物质利益相联系，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当代社会个人的生存状态和行为动机。但是我们也看到，华尔德在描述工人积极分子与领导之间的双边活动时，明显受到“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的影响和局限，过多地强调了行动双方在物质与非物质上的“商品交换”，而将个人的

<sup>①</sup> 参见《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导论部分，以及孙立平的评介。参见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1996 年第 5 期。



行为都作为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甚至将某些个体的“不作为”也当做一种有意的“作为”。<sup>①</sup>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仍然有待完善。

## 五、结语

在中共对城市接管与改造的头几年里，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又有多少变化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今日中国的“新传统”，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回答的问题，宏观认识与解释必须建立在大量的个案研究基础之上，贸然地下结论都将是危险的。综合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如何进行实证性研究，还原“人”在历史中的真实状态，以便寻找众多历史面相背后的合理逻辑，这些可能是未来这一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突破中国当代史研究瓶颈的重要方法。在以上的论述中，笔者重点回顾了有关1949～1957年间中共执政中国之初对城市进行的接管与改造的研究成果，此举并非只是要强调这一历史阶段的研究价值，而是希望借此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当代史学研究的现状、规范及发展方向。同样道理，我们在进行中国当代史研究时，一定的阶段划分是为了研究的细化，我们的视野绝不能因此而局限，历史发展有它的延续性和内在逻辑，越是深层的就越是历久不变，而这恰恰也是我们最需去探寻的。

当我们横向比较国内外中国当代史的学术发展历程时会发现，国内的中国当代史研究是在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建设启动之后才逐步成长起来的，在起步上要明显晚于国外。同时更为关键的是，当代史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此后的发展。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中国当代史依旧有它的发展前景，在近年渐有勃兴之势，而如何才能让其有更加健康与成熟的发展，则需要后来的史学研究者继往开来，共同营造。笔者在这里，冒昧地谈几点自己的浅见。

首先，新史料从何而来？任何研究都要立足于大量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当代史也不例外。虽然目前大量的核心档案未能予以公开，这给研究者的史学工作带来了一定限制，但是当代史研究又有其比之于其他历史时段研究的优越性，一方面民间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私人收藏物（包括时人日记、书信，以及其他相关文

<sup>①</sup> 在后来的研究过程中，华尔德也部分地修正了自己早期的研究结论，他指出一般群众在政治运动中的政治取向并不一定取决于他此前的政治关系（积极分子或非积极分子），在一个不明确和随时变化的环境里，人的行动选择都是一样的——进退两难。参见华尔德：《红卫兵派别的政治起源：1966年6～7月间的北京各大学工作组》，朱佳木主编：《当代中国与它的外部世界——第一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文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

献资料)，另一方面就是口述史料。口述史料一来可以填补部分研究史料的缺失，另一方面，它可以对既有的文献史料起到印证、纠误和解释的作用。利用“活史料”无疑将成为今后中国当代史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史料来源之一。当然，对口述史料的使用需要慎重，甚至必要时对其进行考辨与鉴定。

其次，前文也提到了国外史学家在研究中强烈的理论关怀，笔者认为这是国内史学界值得借鉴和取法的。当然，借鉴的并不仅仅是国外已有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也更不是对它们简单地移植或嫁接，这里更多地强调一种带有“问题意识”的思维方式。目前国内的当代史学研究成果，大多还只是满足于历史真实的发现和梳理，而缺乏对既有的史观、研究视角以及方法论的反思与批判。现阶段国内外史学界日益频繁的交流与合作，正为国内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同时国外学者亦可借此更加走近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除了国内外史学界的交流合作，各学科之间的科际互动，也同样重要，这同时也是国外史学研究的一个鲜明特色。事实上国外史学理论的更新，很大程度上都源自学科间交流渗透的结果，甚至于许多历史研究者本身就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对于历史学来说，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包括心理学等等，都是它可以合作的对象。中国的当代史研究也只有形成多学科的协作体系，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 “穷棒子社”故事中的权力与社会裂痕

刘一皋\*

**摘要** 河北省遵化县西四十里铺村的“穷棒子社”，又称“王国藩社”，曾被毛泽东誉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故而在不同时期产生了众多的、不同类型的故事叙述文本，多数都与国家历史高度同构。本文通过对各种故事叙述的分析，尤其是故事叙述中的缺失、变化和逻辑冲突，揭示了权力因素对于故事叙述内容、取向的影响和所造成的深刻社会裂痕，以及在新时期社会转型中的惯性冲击，并指出了依据既有材料进行直线式研究的缺陷。

**关键词** “穷棒子社” 故事叙述 政治权力 社会裂痕

河北省遵化县西四十里铺村的“穷棒子社”，因1955年毛泽东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作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而闻名。此后，在不同时期产生出众多的、不同类型的故事叙述文本，描绘了“穷棒子社”的各种面相。一般而言，在官方档案、报刊报道、历史记述、访问、回忆，以及大多数被文学化的相关作品中，“穷棒子社”故事都与国家历史高度同构，村庄史就是国家整体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也就是说，对于“穷棒子社”故事的叙述，已经构成了解释共和国史的较为完整的材料链，更有条件做一只“麻雀”被解剖。

本文的主旨，并非通过不同时期、多种类型的材料分析进行所谓历史“真相”还原，而是将“穷棒子社”故事看成对共和国历史的一种体认，从故事叙述的缺失、变化和内在逻辑冲突，探究共和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及历史研究中的

\* 作者刘一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缺陷，特别关注权力因素和由此产生的社会裂痕。在本文中，所谓权力，主要指贯彻故事始终的乡村权力的分配与斗争，同时也涉及典型树立、维护所需要的上下呼应、高度集中的权力链问题，以及故事叙述的话语权问题，突出表现在材料制造中的选择与虚构。社会裂痕则是相对于社会整合而言，即在“穷棒子社”故事的全过程中，中国革命所预期的建立新社会的理想并未完全实现，相反，又产生出了新的社会裂痕，反映着村庄、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更为严重的是造成村庄内部社会关系的剧烈震动。而且，这一过程越是激烈、彻底，裂痕就越明显、深刻，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社会转型中，有可能遭遇更为严重、复杂的历史惯性影响。

### 一、序幕：战争、反抗和土地改革

历史故事的叙述，通常需要遵循严格的时间顺序逻辑，用以说明故事发展的因果关系，并通过强调历史连续性赋予故事合理性。“穷棒子社”的故事叙述也是如此，既作为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结果，同时也会影响到有关革命进程的解释。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sup>①</sup>这是较长时期内对于中国革命史的高度概括，村庄历史也需要这样写作。近代以来，西铺村农民的反抗，被追溯到义和团运动，当地也有“设坛练拳”的活动。<sup>②</sup>另一件值得一书的是1933年的“吃大户”事件。1932年秋前水灾和1933年的春旱，贫苦农民遭受沉重打击，“地主奸商却趁这机会勾结起来，一面放高利贷，一面勒住农民的脖子压价买地，谋算穷人仅有的家产。”“在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农民铤而走险，并取得了一定胜利。“这一阵，西铺的街里真热闹。村中间的豆腐房大车店都安了大锅，每天熬一顿玉米碴子粥。”“前后吃了一个多月。”<sup>③</sup>可是，农民的自发斗争具有局限性。也就是在此时，1933年11月，“共产党员高村到这里，发展张林洪等四人建立了党的小组。并在张狼岭警钟山下的山沟中召开了第一次党的小组会议。自此以后，

<sup>①</sup>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2页。

<sup>②</sup> 编写组：《“穷棒子”精神放光芒：西铺大队的经济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9页。

<sup>③</sup>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写组：《“穷棒子”之乡斗争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75年，第13页。



这里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找到了一条铲除剥削和压迫的彻底的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大家都走向共同富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sup>①</sup>西铺村日常生活被真正纳入中国革命的轨道，是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1938年，八路军挺进冀东地区，开辟了冀东抗日根据地，并陆续建立起各级党组织。显然，外部的进入、动员和组织，是村庄革命最为重要的因素。

战争环境对于农村社会的冲击，首先表现在社会军事化的影响。各种军事力量为控制和获得战争资源，对于乡村的渗透进一步加深，促使乡村对外支应事务大量增加，并令旧乡绅视担任“公职”为畏途，出面支应者逐渐向中下层转移。<sup>②</sup>抗战期间，西铺村一带长期处于两面政权之下，需要承担两面、甚至三面负担，也使得村庄权力更快地向一些财产不多、胆大、能干、人缘好的人手中转移。<sup>③</sup>另一方面，村庄自卫使得一大批勇于拿起枪杆子的青年进入权力中心。对外支应者和村武装领导人，两者构成了村庄权力的新精英，较之旧有的内生精英，特点是与外部的组织、事务关系强于村庄自身和鲜明的暴力色彩，以及共产党根据地政权的阶级性，即以贫农为新精英的身份特征。王国藩、杜奎等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登上了西铺村权力舞台。登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络八路军便衣队起出了地主“贼六子”暗藏的枪支。缴枪行动意味着村庄权力的正式交接，“时势变了，穷苦农民要起来了，抗日的烽火将会越烧越旺，老黄历已经瞧不得了。”<sup>④</sup>

在众多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论著中，农村社会改造多强调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甚至提出：“以税制改革为核心，改革给华北根据地地区带来了一场静悄悄的、解放的、平等化的革命。”<sup>⑤</sup>在西铺村，有关这两方面的故事叙述却极为简略，只有一个框架，缺乏具体内容。果真就无故事吗？在各种故事文本中，负担

<sup>①</sup>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系三年十班：《建明人民公社发展史（初稿）》（1958年12月18日），手刻油印本，遵化市档案馆藏。

<sup>②</sup> 杜赞奇利用满铁调查材料，说明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精英变化的情况。《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0～167页。

<sup>③</sup> 北京大学社会生活口述资料研究中心所收集的口述材料，反映了此种情况。李康：《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1938～1952冀东村庄基层组织机制变迁》，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第30、33～34页。

<sup>④</sup> 丁羽：《两个战友》，编写小组：《穷棒子社的故事——河北遵化建明公社纪事》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第16页。由于杜奎负责村武装工作，起枪的故事多强调其作用。“文革”时期故事改写为王国藩一人的功绩。《“穷棒子”之乡斗争史》，第17页。

<sup>⑤</sup> 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问题被描写成：虽然极端困难，群众仍踊跃支前，为抗日战争交公粮、做军鞋、抬担架。<sup>①</sup>至于负担数额、如何摊派、是否合理，以及合理负担对于村庄社会结构的影响，都被略去。对于减租减息的处理也相差不大，最为详细的叙述也只是说：“农民向地主、富农租种的土地，实行二五减租，一律按租额的75%交租；并保障佃权，只许佃户退佃不种，不准地主夺佃转租。农民向地主、富农所借的高利贷，已交利息超过原本一倍的停息还本，所交利息超过原本二倍的本息停付，并禁止出借高利贷。”<sup>②</sup>只是一种政策的宣示。诸如运动开展前村庄的租佃和借贷关系、运动对于土地占有的改变、运动对于农村借贷的影响等问题，也未给予正面回答，讲述中还透露出地主早已躲进遵化城里，抗战后期“甚至不敢派人下乡催租讨债”，那么，1944年开始的减租减息运动的主要目标又是什么呢？

合理负担主要涉及国家与村庄、农民之间和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复杂权力、利益关系，并非“穷棒子社”故事所要展示的内容，所以，隐去不提在情理之中。但是，减租减息主要涉及阶级关系，是“穷棒子社”故事叙述的主要脉络，为什么也要省略或简化？或许西铺村租佃关系并非十分尖锐，当大规模运动发起时，土地占有关系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或许故事讲述者依据国家历史的解释，将减租减息视为抗日战争时期一种温和的、妥协的土地政策，只能“限制”不能“消灭”封建土地制度，为突出革命的彻底性、连续性故而淡化。因此，故事侧重描述富农分子混入农会加以阻挠，致使减租减息政策得不到落实，清除富农纯洁组织后运动才逐步展开的情节，努力使村庄历史与高层决策内容<sup>③</sup>相一致，同时，进一步突出运动中的权力争夺色彩。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地经反奸清算，迅速转向彻底的土地改革，农村革命大幕正式拉开。令人惊诧的是，在“穷棒子社”故事叙述中，土地改革的内容也都被简化，早期叙述除呈现概念上的普遍贫困外，村内阶级结构和占地比例都不清楚。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故事增加了1947年土改前阶级构成和占地比例：在全村154户、耕地2160亩中，地主5户，占地1240亩（不包括在外村占

① 《“穷棒子”精神放光芒》，第22页。

② 《“穷棒子”精神放光芒》，第23页。

③ 刘少奇强调群众运动“应把农会放在第一位”，同时注意发现、教育和训练积极分子。《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1942年12月9日），《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5页。中共冀热边特委认为减租最主要的是发动群众，发动中注意培养与组织积极分子。《中共冀热边特委关于进行减租运动决定》（1944年9月1日），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河北省档案馆、山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7页。



有土地)，分别占总数的3.2%和57.4%；富农4户，占地175亩，分别占2.6%和8.1%；中农34户，占地420亩，分别占22.1%和19.4%；贫农、雇农111户，占地325亩，分别占72.1%和12.1%。基本符合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时的判断。<sup>①</sup>对于封建土地制度的主要内容——租佃制和高利贷，故事也只是提供了一个通用概念：若是永佃制，租额一般占到正常年景收获量的50%左右，而且是不论丰歉的“铁租”；若是租约制，除必须提供各种担保外，地租额占土地正常年景收获量的60%至80%不等，个别的还有超过90%的。土地改革后，全村151户、耕地2160亩中，贫农111户，占地1427亩，分别占总数的73.6%和66.1%；中农34户，占地623亩，分别占22.5%和28.8%；富农4户，占地62亩，分别占2.6%和2.9%；地主2户，占地48亩，分别占1.3%和2.2%。<sup>②</sup>考虑到中农以上家庭人口较多，可以视为土地分配的平均化。

上述数据展现的是最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式的描述，与其他叙事相比较，存在着明显漏洞。最为突出的是，数据未能反映20世纪、特别是抗日战争以来的战争、反抗、革命和社会改造的变化，叙事中却承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无论是数据还是叙事，都未能提供租佃制或高利贷在日常生活中的流水材料，也未能关注地方社会文化对于租佃、借贷安排的影响，甚至为了强调剥削之残酷，高额地租已经超出了日常生活常识，讲述者却未说明这是特例还是常态，也未说明在如此分成租之下佃农实际所得有多少，如何满足低水平的生存需要。<sup>③</sup>

叙事不但未能弥补数据的缺失，反而出现了更多的逻辑漏洞。诉苦是土地改革发动的重要环节，通过控诉阶级压迫从道德上证明土地改革的合理性，甚至比与算账式的数据统计更为重要。可是，故事中出现的一件受压迫实例，多与天灾人祸、政治腐败相关。“苦头头”王荣、王生一家三代在旧社会的痛苦遭遇，是“穷棒子社”故事中的经典，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不同版本的叙述却多有疑点。爷爷王

<sup>①</sup> “就一般情况来说，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终年劳动，不得温饱。”《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1947年10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

<sup>②</sup> 《“穷棒子”精神放光芒》，第6、8、34页。

<sup>③</sup> 斯科特的研究表明，在生存经济条件下，农民可能接受较高的分成地租，换取一定的生存保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玉的土地被地主王继亭霸占的故事，<sup>①</sup>就复杂得不合常理。地主勾结官府强取豪夺，乃是旧社会常见的故事，但是，故事叙述的曲折过程，虽不能说不合逻辑，又暴露出地主之阴险，也难免画蛇添足，根本不是诉苦语言。在旧社会，王生“熬坏了双眼”被迫要饭为生，合作社使其复明，是新旧社会对比的感人故事。<sup>②</sup>眼睛致盲原因，多数故事文本称由于贫困只能住在地主的两间破场房里，有一年下大雨，冲垮了草棚的屋顶，脏泥烂草糊住了眼睛故而得了眼病，无钱医治，两个眼睛都瞎了。<sup>③</sup>另一种说法是由于“房子塌了，全家没地方住，急瞎了他的眼睛”。<sup>④</sup>也许如此叙述未与阶级压迫直接挂钩，故又有了地主原答应修房，实际既不给工钱又不修房而酿成惨祸的文学性描述。<sup>⑤</sup>两兄弟父亲死后母亲改嫁在新社会回归西铺村，也是合作化优越性的重要故事。<sup>⑥</sup>对于小农家庭，寡妇再嫁并不鲜见，既为个人生活需要，原夫家也可以收取少许财礼作为补偿，无奈讲述者为突出旧社会的苦情，反使一个富有人情味的故事变得极度扭曲。或称母亲实在过不下去，“自卖自身改了嫁，使了四十元钱，留给儿子们活命。”<sup>⑦</sup>或称两兄弟“养活不了娘，令改嫁”。<sup>⑧</sup>前种说法有些夸张了，遮掩了地方文化中婚姻礼仪的习惯安排等因素；后种说法则不近情理，两兄弟虽一个扛活、一个要饭，但都正常娶妻生子，并未影响家族血脉的延续，如何就养活不了娘了？讲述者可能没有意识到，为了突出新旧反差，反将“守节”观植入新社会，并使“孝道”变得不伦不类。

事实上，在华北老区，经过较长时期的战争破坏和减租、清算运动，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时，农村中财富阶层的土地、财产占有已相当有限，即使完全平均化，可供分配的果实并不多，也有可能冲淡、甚至模糊了受益者的记忆。例如，在涉及诉苦的口述访谈中，讲述者所讲出的苦情故事，许多是因家人赌博等不良嗜好

① 故事情节为：“地主王继亭为了谋取这七亩地，先是硬派王玉的侄子当保长，让王玉做保人，然后引诱王玉的侄子吃喝挥霍，以至亏欠了官款；再借此写信到县衙门控告，勾结反动官府拘捕了王玉叔侄；以后，王继亭又假惺惺地出面‘帮忙’，把王玉叔侄二人保释了出来。王继亭这时露出了狰狞的面目，硬说他为保释二人垫了二百元，逼着王玉立即归还。王玉走投无路，只得把那七亩地给他抵了这笔‘债’。”《“穷棒子”精神放光芒》，第7～8页。

② 《一颗红心向着红太阳》，《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9日第2版。

③ 《“穷棒子”精神放光芒》，第18页。

④ 全国农业展览馆综合馆编：《王国藩办社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北京：农业出版社1960年版，第3页。

⑤ 《“穷棒子”之乡斗争史》，第7页。

⑥ 冯健男：《新春大喜——建明公社散记》，《人民日报》1963年1月25日第4版。

⑦ 《“穷棒子”之乡斗争史》，第6页。

⑧ 陆占山：《悠悠往事绵绵情——周总理视察沙石峪、西铺追忆纪实》，《党史博采》1996年第1期，第7页。



及战乱影响的后果，或是个人生活经历的感慨，缺乏村庄内部阶级压迫的内容，明显与土改诉苦的要求不符。即使能够依据国家重大事件的历史逻辑来讲述，也时常出现时空、事实上的混乱。<sup>①</sup>对于果实的回忆也是如此，讲述者似乎未对土改分配留下深刻印象，反说地主、富农也没有多少“油水”，不过是“矮子里拔将军”。<sup>②</sup>由于上述口述材料的收集，都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进行，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当年的地主也不再是财富、权力的象征，记忆便随之出现偏差。可是，土地改革故事的不清晰却是事实，不同时期的文本记述和回忆口述的距离，正好可以用来分析故事叙述选择的意义。

土地改革并不是真的没故事，在西铺村，故事聚焦于运动期间村庄权力的激烈争夺。也就是说，土地改革的意义更多的指向“政治土改”，即土改是中共为渗透并控制农村社会而采取的动员农民、建立新基层政权的重要策略或手段；或土改是强化国家控制和培植农村新精英及代理人的过程。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曾普遍出现过冲击原村庄干部和扩大斗争面的现象，在西铺村突出地表现为工作组下乡和“搬石头”事件。派遣工作组（队或团）下乡进行宣传、组织的动员工作，本是中共的传统和重要的工作方式，当鼓励农民自发斗争和提出“一切权力归农民代表会”<sup>③</sup>时，工作组既是运动的发起者，又是农民代表会、人民法庭等机构建立并行使权力的组织保证者，同时还是村政权完成日常工作的监督者。为什么要“搬石头”呢？在贯彻土地法大纲之前，是想在土改复查阶段促使干部退出多占果实，用发扬民主的办法，解决征兵、征粮、派款和发展生产等项工作中的作风问题，或者说是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进行“洗脸擦黑”。其后，性质和内容均有所变化，以为前一阶段土改复查不彻底，“这是因为我们党的队伍不纯洁，不整齐”，许多地主富农和有些流氓奸细叛徒“钻进我们党里来，要想仗势欺负老百姓，还有些坏干部、坏党员，自私自利，作威作福，骑在人民头上，跟着地主富农一股劲”，成为阻挡革命道路的绊脚石。<sup>④</sup>在西铺村，因王

<sup>①</sup> 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6—586页。

<sup>②</sup> 孟庆延：《从革命到“继续革命”——华北西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第21页。必须说明，截止改革开放前的叙述，“矮子里拔将军”都是用来形容“穷棒子社”创办时会计难寻的困境。《“穷棒子”之乡斗争史》，第42页。

<sup>③</sup> 《中共中央工委关于根据土地法大纲实行土地改革给邯郸局的指示》（1947年10月17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89页。

<sup>④</sup> 《搬掉大石头整顿队伍》，中共冀东区党委印，1947年，第1～2页。

国藩、杜奎等老干部被“搬石头”，故事被描写成混入革命队伍的坏分子杜志“公开歪曲党的政策”，“煽动了部分落后群众故意陷害王国藩和杜奎”，<sup>①</sup>以及杜志等人“包围蒙蔽工作组”，抓住王国藩、杜奎战时工作“比较粗糙生硬的缺点，任意加以夸大”。<sup>②</sup>“文革”时期，又归之于刘少奇反动路线的破坏干扰。<sup>③</sup>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口述访谈中，增加了新干部如何产生、上台和群众运动中行为过激的内容，老干部被整主要因贪污问题和查阶级，基本脉络是新老干部的权力之争。<sup>④</sup>

一次次修补并未使故事完整化，尤其是众多普通参与者的意愿和行为，始终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解释。事实上，“搬石头”作为华北老区的普遍现象，得到多数农民的认可，根源在于清算运动中的整理村负担而又未能彻底，多吃多占、动员方式粗暴只是负担问题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也因负担问题极为复杂，村负担又占负担总额相当比例，关系战争的胜利和政权的巩固，被有意无意地隐去，或赋予阶级斗争的含义，故浮面上看到的只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以及精妙且城府颇深的动员技巧表演。

在土改纠偏阶段，区委曾试图解决“搬石头”错斗问题，王国藩因挨斗被分，消极不满，避而不见。<sup>⑤</sup>剧烈冲击而对直接领导产生不信任感，也是消极的重要原因。无论如何，土地改革运动中的新老干部权力之争，给西铺村留下了深刻的社会裂痕，<sup>⑥</sup>影响到以后二三十年的社会发展，并决定着“穷棒子社”故事叙述的主旨和走向。

## 二、办社：分化、求变和合作化运动

“穷棒子社”故事最初的版本，就有绕开土地改革的意思。“在组织起来以前全村只有一七户能维持全年生活，其余的一三七户中又有九六户长年以靠做短工和政府救济来维持生活，还有四户讨饭吃，另外每年还得向白马峪村出卖土地三十

① 逯斐：《王国藩勤俭办社》，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4页。

② 丁羽：《枪和土地》，《穷棒子社的故事》上，第41、44页。

③ 《“穷棒子”精神放光芒》，第28页；《“穷棒子”之乡斗争史》，第31页。

④ 《西村十五年》，第75～78页。

⑤ 中共唐山地委四清工作团21分团西铺工作队：《关于王国藩同志所犯四不清错误情况的调查报告》（1965年6月5日），唐山市档案馆藏。

⑥ 据李康研究，土改高潮时期主要干部中的前9人，1人被处决，2人被两度关押，1人因历史疑点被查淡出村政，1人因结怨过多离村，仅2人在日后的村庄政治中较为活跃。其他几名委员和法警中，也有数人选择了参军离村或谨慎淡出。《西村十五年》，第132页。



多亩。”<sup>①</sup>或简略叙述，“土地改革以后，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生活比以前有了改善，但由于小农经济，经不起天灾人祸，在自然灾害面前跌倒爬不起来。”<sup>②</sup>基本看不到土改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也许意识到如此省略与中国革命史叙述逻辑严重不符，便有故事文本从添置牲畜、农具和养猪数量几方面比较论证，“西铺的农业生产在土改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亩产量超过了土改前的最高水平。……随着生产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农民土改后的生活也有了改善，再没有出外逃荒的，扛活、打短的也大为减少。在贫苦农民中，还有的户存了点余粮，有的户盖上了新房。”话锋一转，继而强调发展中的两极分化，贫苦农民仍处在困境之中。<sup>③</sup>因此，必须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这是创办“穷棒子社”的基本逻辑。

故事这样讲，显然会产生出诸多疑问，最直接的就是如何看待土地改革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问题，这也是近年来学术界存在争议的热点问题。<sup>④</sup>就西铺村而言，故事集中在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运动的村庄土地分配、利用的一点一线上，忽略了土改前农民的生存方式，也未能分析土改后贫困问题的土地外条件变化，例如人口流动、非农产业经营、市场环境和民间借贷等，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截止抗战前，外出进入城市、矿山或闯关东打工、经商，作为生存和获取较土地更高收入来源的途径，在西铺村十分普遍。王国藩在办社前，除战争时期无法外出，很长时间都在外做工，甚至可以说务农非其主业。<sup>⑤</sup>战乱无疑是社会经济状况恶化的最重要因素，大量社会财富被消耗和损毁，交通阻断，市场秩序被扰乱，生产力水平下降。土地改革运动中过分强调翻身、平均化和挖浮财等偏差，也会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但是，影响土改后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最重要因素，正是土改期

<sup>①</sup> 《遵化县第十区区委西四十铺农业合作社发展变化的基本总结》（1955年4月29日），遵化市档案馆藏。此材料为手写，可以视为4月30日《唐山农民报》发表《书记动手，全党办社》、5月4日《河北日报》发表《勤俭办社》同时的基层组织总结材料，也是观察典型发现、宣传过程的重要线索。王国藩同期的讲述在数字上有些出入：“全村一百五十四户，除了四户是地主、富农以外，有七十四户是严重缺粮户，需要政府长年照顾。实际上，全村只有二十几户能勉强维持半年，能够全年维持生活的只有十四户。”《王国藩勤俭办社》，第2页。

<sup>②</sup> 《西铺乡建明社的历史发展情况简要》（1957年），遵化市档案馆藏。

<sup>③</sup> 《“穷棒子”精神放光芒》，第39、44～45页。

<sup>④</sup> 吴毅以为土地改革导致农地配置的高度均质细碎化，造成了所谓经济学困顿。文章主旨是针对当前的农地改革，但论证却采用历史叙述方法。《理想抑或常态：农地配置探索的世纪之摆——理解20世纪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史的一个视角》，《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第211～235页。

<sup>⑤</sup> 《空间·记忆·社会转型》，第539～541页。

间高层领导人对于新国家的性质判断和发展方式的选择<sup>①</sup>。本文目的并非讨论这一重大决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只是想说明一种现象，即土改后的农村社会逐渐丧失了旧有的经济活动环境，走上了由国家负责调控的单一的发展途径，故事的讲述自然也就简单化。由于故事难以展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西铺村感受最深刻的可能当属村民外出做工、经商的机会越来越少，获利越来越难，更不要谈发家致富了。

在西铺村邻近的刁家庄，1950年，“变卖土地的十二户，共土地四十二亩，原因是：做买卖赔的钱，也有的出次地换好地，大部分是在平分前旧债。”<sup>②</sup> 尽管也有卖地现象，原因却与“穷棒子社”的故事叙述大相径庭，主要反映的是买卖经营的困难。有意思的是，王国藩由县城打工而回村办社，孤儿戴存也是在县城饭馆当小堂倌被主家辞退后流浪回村而入社，<sup>③</sup> 无论故事中对回村原因作何种叙述，在外谋生的艰难和不得志可以确定。另一方面，土改后，民间雇工和借贷的机会大大减少，贫苦农民偶遇灾祸，便感十分困难，反而增强了无助感。国家必须出来充当保护者。“在一九五二年前，国家每年要给这村发放五万斤以上的救济粮和一百几十套寒衣。虽然国家这样支持，还有四户不免讨饭吃，孤儿戴存还曾经被迫当房当地。”<sup>④</sup> 这个描述明显有内在矛盾，但却合于叙事逻辑：国家对于贫苦农民的救助数额巨大，却无法解决绝对贫困，只能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自己解决自己的困难。

“穷棒子社”的基本特征自然是“穷”，“穷”是求变创新的原动力。在故事叙述中，绝对贫困首先表现在自然地理环境上。西铺是“山多地少、石多土薄的山

①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中央九月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页。刘少奇在发言中将新民主主义经济分成国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等四种经济成分，“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斗争，斗争方式是长期的经济竞争。《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1948年9月13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② 遵化县第十区区委：《遵化县第十区第二期整支汇报》（1951年），遵化市档案馆藏。

③ 陈青山：《三条驴腿》，《穷棒子社的故事》上，第69页。改革开放后，戴存利用烧菜的手艺，自己在村头公路旁开了一家饭馆。

④ 王林：《勤俭办社》，《河北日报》1955年5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页。国家救济的这个数字在多种材料中被反复使用，但其作用在叙述中却十分模糊。如需救助100户，每户可分得500斤粮食，力度较大；但遵化县1953年财政抚恤救济开支为23万元，似没有能力每年给西铺村这样数量的救济。遵化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遵化县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9页。



村”，<sup>①</sup>因向邻近的白马峪村卖地，被该村富裕中农讥笑要把西铺的炕头都买过来，是另一个被反复讲述的故事，以突显西铺村自然条件之恶劣。只要认真阅读，不难发现，同一份文件就告诉人们不能这样理解。在以乡为单位的统计中，西铺乡下辖的西铺、东铺、白马峪、大于沟共552户，有耕地6340亩，其中地主11户、富农21户、富裕中农51户。西铺村共154户，有地主6户、富农2户、富裕中农6户。<sup>②</sup>全乡大半地主聚集西铺。地主聚居较为贫穷的一隅掌握着财富，事实上不能排除此种可能性，但作为普及教育的故事则令人费解，除非这些地主是为了强调剥削的残酷性制造出来的，这正是故事的悖论。事实上，西铺并非是一个想象中的偏僻山村，村庄位于山脚下，山不很高很陡，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料和有着较好的林牧业发展条件；村前是不宽的河川地，紧傍滦河，一条公路贴村而过，西去遵化县城40里，东距迁西县城（原迁安县兴城）仅30余里，为通往东北的要道，据考明代始建驿铺，进而成村，抗战前村中有数家大车店及农副产品加工作坊。可见，土地改革后出现的困境，涉及到更大范围发展环境的条件变化，以及自身对于发展方式的选择。

绝对贫困的另一方面含有阶级性，即贫苦农民的生活仍然十分困难，但要说两极分化，甚至给予严重的估计，未免有些牵强。故事只讲述了贫农的贫困状况，对于另一极的情况却极为模糊，什么人在土改后发展较快？什么因素使其能够取得发展？以及发展是否有损贫苦农民的利益？故事都未正面说明。想与“穷棒子社”“较量”的富裕中农王悦，也只是牲畜、农具的底子好一些和家庭劳力强一些，<sup>③</sup>看不出土改后的发展强势。如果说王悦是两极分化中另一极的代表，还不如说富裕中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代表的意识形态塑造。刻意渲染土改后的贫困状况，甚至可能造成误解。如王荣家史，解放前当长工，“一家九口人，合盖一条被”；<sup>④</sup>解放后仍然不得不“打发两个儿子扛活”，“一家六口人，伙盖着一条被子”。<sup>⑤</sup>两条材料放在一起看，故事就显得荒唐，如果完全抽去翻身的内容，又怎能奢谈两极分化？有时空错乱之感。戴存家史也是如此。“十六岁的孤儿代（戴）存因生活困难不能维持，

① 王国藩：《继续坚持勤俭办社》，《人民日报》1956年4月6日第2版。

② 《西铺乡建明社的历史发展情况简要》（1957年）。

③ 李满天：《较量较量》，《穷棒子社的故事》上，第92页。公开报道中，1955年“穷棒子社”就超过了富裕中农生产水平。也说明分化程度并不严重。《建明社生产超过富裕中农的水平》，《人民日报》1957年3月3日第1版。

④ 《建明人民公社发展史（初稿）》（1958年12月18日）。

⑤ 《西铺乡建明社的历史发展情况简要》（1957年）。

竟把大妹妹送去当童养媳，三岁的小妹妹送给外乡人，另外两个妹妹寄养在叔、伯家中。典出了房子和土地，自己出外打短工。”<sup>①</sup>一幅无助的悲惨图像令人同情、心碎，但这毕竟是解放后发生的事情，村组织和地方政府在故事中没有出现。

不管怎样，贫困还是需要尽快解决的严重问题。互助合作确是有效的办法之一，况且简单互助在农村早已存在。问题是朝向社会主义方向的合作化运动，从理论上讲是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而非单纯的救穷需要，但“穷棒子社”故事却要把合作化，尤其是快速向公有程度高的合作形式过渡，描述成唯一的办法。救穷和道路混同在一起，也许可以方便一时的故事叙述，却无法经受时间的检验，自然会显露出理论解释和事实叙述上的缺陷。“王国藩社 1952 年初建的时候，全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是三条驴腿，其他生产资料也很缺乏，社员们又投不起资，人们都叫他们‘穷棒子社’。”<sup>②</sup> 贫农和缺乏生产资料、投不起资，原本是“穷棒子社”名称的两大支柱，可是在故事讲述、发展的过程中却再三受到质疑。农业合作社成立不久，创办人王国藩的成分就遭受质疑，以后又被反复提出，<sup>③</sup> 严重动摇了“穷棒子社”的阶级属性。另一位创办人杜奎，因在“文革”期间被彻底打倒，在故事中的地位也就有了根本性的修改，成了一名在土改中多吃多占，土改后置房买地，在藏匿了牲口后抱着“捞一把”的野心勉强入社的投机分子。<sup>④</sup> 改革开放后，会计佟启、富农儿媳田玉莲的成分或身份问题也被提了出来。<sup>⑤</sup> 如此看来，“穷棒子社”并非纯洁，“三条驴腿”纯属虚构，“穷棒子社”穷则思变的光环不再那般闪亮，除了试图寻求保护的救穷心态外，参与者们还各有自己的算盘。

如此，故事便很自然地回到村庄权力争夺的叙述。农业合作化运动需要更强有力的村庄组织，不适者要为发展缓慢并产生两极分化现象负责。西铺村“在土改前有老党员五名，是个山区庄非常困难，特别自一九四八年老干部被打击而意见，工作停顿，支部不团结，虽在平分中又发展十二名党员，除支书、村长推推动外，其余都不干工作，既不缴纳党费，又不过组织生活，放弃领导”。<sup>⑥</sup> 这样的组织当

① 《西铺乡建明社的历史发展情况简要》（1957年）。

②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唐山农民报》1955年4月30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13页。

③ 有关王国藩成分问题及由此而产生的调查、结论，李康、方慧容的研究使用地方档案和口述材料，有较为详尽的叙述。

④ 《“穷棒子”之乡斗争史》，第33、99页。

⑤ 《西村十五年》，第109页。

⑥ 《中共遵化县委组织部关于十区西铺村支部对互助合作领导的经验》（1955年4月10日），遵化市档案馆藏。



然不整顿不行，于是，故事主角再度出场。

王国藩的出场，立即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故事叙述细节却存在瑕疵。据官方档案记录，王国藩自1947年底至1951年底党组织生活间断，较长时期未担任西铺村干部，又有相当时间没有在村内活动，1950年底回村，<sup>①</sup>只能归于“躺倒不干”之列。<sup>②</sup>这样，抗战、土改、合作化直线发展的故事叙述被破坏，不但有损基于历史连续性上的合理性叙述，而且也有损王国藩作为一名模范共产党员的个人形象。对于故事完整性的修补，不同作者采取不同的策略。有故事称1949年冬在村党支部的讨论决定下，王国藩在就领着一部分贫下中农上山打柴自救。<sup>③</sup>或称在1950年，村支部根据上级党号召，王国藩、杜奎等支部委员经过研究分析全村情况，召开全党会研究好分工向群众贯彻，经过酝酿自愿结合组成22个互助组，当年冬季就遏止了卖地现象。<sup>④</sup>这样讲述为“穷棒子社”的创办作了铺垫，也取得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在党的领导下循序发展的合法性资源，但无法解释历史时间的顺序和真空。所以，多数故事版本对于缺失的三年采用模糊办法处理，强调王国藩的离村是受到错误路线和坏分子的打击、排挤，当重新回到正确路线后，便服从党的召唤回村。<sup>⑤</sup>

王国藩回归党组织，并通过创办“穷棒子社”重掌村庄大权，也非完全是听从党的召唤，还有一些具体条件值得注意。首先，1951年，杜志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判处死刑。“杜志受到法办后，王国藩他们才又当上了支部委员。”<sup>⑥</sup>其次，敦请王国藩回村重新担任村干部工作的是即将升任区委书记的赵涌兴，两人“曾在日本采金公司一块当工人，彼此很熟悉”。新上任的区委书记需要自己熟悉且能干的村干部，村干部也需要有个熟识的顶头上司提供直接支持，经受过重大挫折的村干部尤其如此。第三，在县城运输部门充当小工的王国藩，现实境况十分窘迫，赵涌兴在回忆中写道：“1950年6月，我从省委学习回来，给父亲买药去的路上，见他

① 《西村十五年》，第103、108页。

② 土地改革后，在农村党员中，所谓“躺倒不干”的现象很多。如在西铺村附近的村庄，赵家庄“党员十八名，积极工作的八名，推推动动的七名，躺倒不起的五名”；刁家庄“党员二十三名，积极工作的九名，推推动动的八名，躺倒不起的六名”。《遵化县第十区第二期整支汇报》（1951年）。

③ 《“穷棒子”精神放光芒》，第46页。

④ 《遵化县第十区区委西四十铺农业合作社发展变化的基本总结》（1955年4月29日）。

⑤ 《“穷棒子”之乡斗争史》，第31页。

⑥ 《王国藩勤俭办社》，第4页。各种故事版本对杜志被处决一事的讲述非常混乱，罪名多是与国民党特务和反动会道门勾结举行或企图暴乱，实际上，杜志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追究而处决，罪状首条是涉嫌破坏1948年春征兵。征兵和动员逃兵归队是当时村庄动员的重点工作且是难点，国家与农民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作为历史罪状显然是致命的，却不适宜用作普遍的阶级斗争宣传。

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肩上背个破布口袋……”<sup>①</sup>这也许是所有故事叙述中最为落魄的描写，也是被故事讲述者和分析者最为忽略的一个条件。权力因素在“穷棒子社”创办过程中依然十分重要。即使王国藩能够在土改后期保住或重新夺回权力地位，也会以积极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方式，维持权力并从根本上解决自身的生产、生活问题。

从初级社的创建、巩固到过渡到高级社，也并非完全是经济生产的和平竞赛，丰产的事实还不足以确立优越性。农业合作化运动被视为严重的阶级斗争，国家设置专门罪则，使用国家机器保护运动秩序。“穷棒子”之乡创造了由公安助理专责指导，以乡为单位，建立互助合作保卫工作研究站，由乡治保主任负责召集各村治安员每月开会一次总结经验，并帮助西铺村党支部“以人民内部矛盾对待，戳穿了王悦、王维藩等户的假社”。<sup>②</sup>公安部得知后听取了专门汇报，又在河北省公安系统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进行了经验介绍，受到了表彰和物质奖励。待经验成熟后，王悦难逃被专政的命运，以历史上参与组织反动会道门和现行破坏农业合作社的双重罪名逮捕法办，“穷棒子社”也就巩固了。诸如统购统销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关系等近一二十年来的热门研究问题，在“穷棒子社”故事中都被隐去。

其实，所谓富裕中农王悦办“假合作社”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了土改后农村发展的核心问题：“管他是真是假，反正第一层，赶上时兴，可以向政府贷款；第二层，免得他们拘管咱们，照旧过咱们的日子。”<sup>③</sup>第二层容易理解。土改后，国家逐步加强了从市场活动到政治参与各个领域的控制，加之合作化运动高潮前已出现政社合一现象，其他途径的发展选择已不可能。至于第一层则缺乏研究，在各种历史叙述文本中又被刻意淡化甚至隐去。由于土改后民间借贷极大萎缩并受到人为限制，国家又无力充当农民所期待的保护者，因此，遵循国家导向以争取稀缺的资源，便成为合作化运动中不同参与者的目标。

### 三、典型：发现、树立和故事的自我完善

1952年10月，“穷棒子社”成立了，但要成为“国家形象”，除了确有成绩、

<sup>①</sup> 赵涌兴口述、韩士林整理：《“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精神的回忆录》，手抄本，北京大学社会生活口述资料中心藏。

<sup>②</sup>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精神的回忆录》。

<sup>③</sup> 《较量较量》，《穷棒子社的故事》上，第110页。





1964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穷棒子办社》一书。

善于总结外，更重要的是树立为典型的机遇。

“穷棒子社”创办前，遵化县委已树立君子口、沙石峪为建设山区的两面红旗，号召全县山区村庄学习；<sup>①</sup>西铺村所属的第十区也已成立了东小寨、王老庄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取得了一些经验。<sup>②</sup>“穷棒子社”未能占得先机，就需要在发展中更为突出的成绩。

办社后的第一件壮举，就是不畏严寒，顶风冒雪，由“副社长杜奎带了十七个男社员，到三十里外的邻县王家峪砍山柴”，“打回来四万多斤柴，卖了四百三十元”，<sup>③</sup>“‘从山上取来’了大

批的生产资料”。<sup>④</sup> 打柴的故事感人落泪，但毕竟只属于简单劳动，不需要特别的组织协调，在缺乏牲畜和车辆的情况下，集体劳动也不能提高多少效率。那么，为什么这种简单、快捷地获取生产资料的方式不能在家庭内部或简单互助间进行呢？如果经常“从山上取来”或被普遍采用是否能够承受？其实，运动初期这些疑问已经出现。对于山区资源的索取和利用，“发生了造林、放牧和樵采的矛盾，往往发生了争吵，形成村与村对立（平原和山村的对立），这种情况已成为建设山区一个主要问题，如不加以解决，会影响山区的建设。”要求提倡农林牧合作兼顾，有偿使用山区林牧资源。<sup>⑤</sup> 可见，打柴有可能引发资源归属争议和盗砍林木现象，跨县

① 唐斯文编著：《穷棒子精神开花结果——河北省遵化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改变生产面貌》，北京：农业出版社1966年版，第14～15页。

②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精神的回忆录》。

③ 《王国藩勤俭办社》，第7页。

④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的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5页。

⑤ 《中共遵化县第十区委员会关于山区人民生活一年来的发展变化情况综合向县委地委报告》（1954年6月22日），遵化市档案馆藏。

打柴问题就更多，几个人难以得手，集体打柴可以起到壮胆作用。<sup>①</sup>在“穷棒子社”故事中，打柴被作为法宝多次使用，并被推广到其他村庄。

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奋斗，“到一九五三年秋后得到了第一年的丰收，每亩平均折原粮二五四斤半，全社共收入折原粮五八五五三斤，粮食比本村最好的互助组多收五六斤半，超过全村一九五二年的丰收产量63%。”“到一九五四年秋收时全社八三户，共八五三亩地，每亩平均产量折原粮三二五斤，比本村互助组每亩多收九六斤。”由于效益显著，“穷棒子社”不断扩大，基本实现了村合作化，并乐观地预计五年后，“农民收入连林业、副业各种总收入折原粮每人每年就可分得四五〇〇斤粮食，社员每天都在兴奋劳动。”<sup>②</sup>其他版本的叙述，也令人振奋。“一九五四年的农业产量，和一九五二年以前比较，提高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sup>③</sup>这样快速的增长率，远远超出了农业生产发展常识和国家整体发展的速度，即使属实，也只是在极低非正常水平下的恢复性增长，不可能持续，也不能被视为农业社优越性的充分体现。个人分配所得的增长速度也快得不合常理。例如，曾对入社一度动摇的王荣，地还是那些地，人还那几口人，“一九五二年在互助组只收了六石粮，入社的第一年就分了四十一石粮。”<sup>④</sup>似乎经过简单合作，共同富裕的梦想就唾手可得。事实却是，依据上述增长率计算的五年后前景，在整个公社制时期都未达到，而且还有不小的距离。

不管怎样，“穷棒子社”的事迹和数据，还是获得了区、县合作化运动先进典型的地位，并于1955年12月18日第一个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也就产生了一些相应的总结、报告。

在区、县级的总结、报告中，王国藩农业生产社的主要经验有三：一是充分明确互助合作是农村党的中心任务，必须通过学习文件，提高干部办社能力，改进领导方法。二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通过回忆过去，对比现在，展望未来，并联系农民思想，进行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对比的教育，工农联盟等教育。

① 《从革命到“继续革命”》，第50～51页。

② 《遵化县第十区区委会西四十铺农业合作社发展变化的基本总结》（1955年4月29日）。

③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6页。

④ 《勤俭办社》，《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20页。



三是通过“重点领导推动一般，一般丰富重点”的领导方法，效果是大得很。<sup>①</sup>可以说，这是最常见就上级精神总结自身工作，事迹和数据则起到说明和生动化的作用，反映出典型材料撰写的一些必备技巧。

加强党的领导，既是一条重要原则，又是区、县党政领导的基本工作任务，必须加以强调。具体到“穷棒子社”，党的领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党支部的坚强领导，“该村五名支委，根据个人特长，支委进行了分工掌握党、政、民兵、青年、妇女等工作，每十六开一次支委会，首先是汇报情况，研究问题，决定后由支委分工贯彻，如遇一个运动必须通过党员形成决议，然后宣传到群众中去，支委经常督促检查”，以及建立学习制度和健全组织生活。另一方面，“要想办好社，党员示范的作用亦是主要的，只要党员肯干，社内一切都是顺利的。”人社积极投资、采用新式农业技术、处理分配和积累的关系、贯彻统购统销政策、影响互助组和单干农民等复杂、棘手的工作，宣传、教育、行动都由党员带头。<sup>②</sup>

对于区、县党政机关，更看重的还是典型的有用性，以便为实际工作提供有说服力的形象和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次全新的社会大变革，不但每天都会产生许多复杂的新问题，缺乏经验；而且运动声势浩大，转变过快、过急，又追求高公有制程度，工作压力很大。地方党政领导在沉重的任务压迫下，缺少办法又没有钱，开展工作自然十分困难。在“穷棒子社”故事中，“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件新的工作，不仅村级干部和社干部不懂，就连区委会的委员们也不懂。因为不会领导社，区干部下乡往往是绕开社走，不敢接触社里的问题。有时社干部主动地到区里来找区委请示工作办法，区委也不敢作肯定的答复。”<sup>③</sup>面对如此情况，故事强调的通过学习文件和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再经过本地试点、总结和推广从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在实际工作中，“不懂”是普遍的，但“不敢”并非完全由“不懂”所造成。相对而言，找不出会计、社干部民主作风、工分计算和劳资分配比例等具体管理问题，还不算最困难的问题，最令地方领导头痛甚至害怕的是村、社干部跑来要贷款、要救济。“穷棒子社”故事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此。“白手成家，克服困难”的办法，“大大的克服了经验不足和力量缺

<sup>①</sup> 《中共遵化县第十区委关于今冬明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案》（1954年7月28日），遵化市档案馆藏。报告大量重复地区文件和省、中央报刊语言，但作为基层组织报告，仍有其特定意义。“穷棒子社”故事中文件的语言循环问题，本文不拟专门讨论，由另文处理。

<sup>②</sup> 《中共遵化县委组织部关于十区西铺村支部对互助合作领导的经验》（1955年4月10日）。

<sup>③</sup>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7页。

乏的困难，使运动顺利地正确发展。”<sup>①</sup>更重要的是，在经验总结时，“穷棒子”精神被提升到国家利益优于村庄集体利益的高度觉悟之上。当社员想要求国家贷款解决生活问题时，王国藩就向大家解释：“国家现在正在建设时候，但有一分办法也别向国家贷款，另外咱们社内困难是很多的，要向国家贷款就会影响国家建设，影响社员收入，咱们想一切办法解决困难，开展生产节约渡过难关，到秋收后，才会多分收入，才能显示组织起来的优越性，才能吸收社外农民逐渐入社。”<sup>②</sup>

尽管如此，由于区、县级地方领导更偏重经验在解决具体问题时的有效性，典型或重点就不止一个，可以随工作的需要而变换。值得庆幸的是，“穷棒子社”故事引起了地区领导的重视，而发现过程又有一定的偶然性。

据时任中共唐山地委《唐山农民报》编辑部主任的卢振川回忆，1955年春节前，听说遵化县第十区鸿鸭屯姜公中社实行了包工包产，便下去采访。采访中，无意了解到区委以该社为试点，经过重点深入，集体研究，总结交流，提高了区干部办社本领的情况，认为对农村干部学会如何办合作社十分重要，回去后便向总编辑作了汇报。总编辑也很感兴趣，又向地委书记作了汇报，并引起重视。4月中旬末，地委书记等人连同报社工作人员下到遵化县第十区区委驻地鸡鸣村，用半天听了区委汇报后，地委书记讲了对农业社加强领导的几点意见。第二天下午去西铺，听了王国藩的半天汇报，同时决定就“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经验写篇报道登报推广，并敲定了文章框架，由区委干部提供材料，报社执笔润色。随后，地委书记等又仓促地去了白马峪、沙石峪听村干部汇报。《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于4月30日发表，作者当时并未意识到文章的影响，以为只是“一篇适应当时需要的普普通通的报道”，<sup>③</sup>“穷棒子社”故事也只是其中的部分内容。<sup>④</sup>不过，宣传规模的扩大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形势，都有利于“穷棒子社”故事发挥更大的影响。5月4日，省报《河北日报》刊登了记者王林撰写的通讯《勤俭办社》。

“穷棒子社”成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根本原因是获得了最高层的认可和

① 《中共遵化县第十区委关于今冬明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案》（1954年7月28日）。

② 《遵化县第十区区委西四十铺农业合作社发展变化的基本总结》（1955年4月29日）。

③ 卢振川：《回忆〈书记动手 全党办社〉采写经过》（2009年3月16日），遵化文史网 <http://www.zhsw.com>。卢振川称，文章最初在《唐山农民报》发表时，还有根据地委书记意思，将其在鸡鸣村的讲话加写为“加强领导”一节，在毛泽东选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一次编辑时的书名）时被删去。表明各级领导在总结各自的典型经验时，突出自身工作成绩的因素十分重要。

④ 赵涌兴回忆认为，《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是《唐山农民报》前不久刊登的《这个社在党的领导下白手起家》的继续，而卢振川回忆则强调认可机遇获得的偶然性。



支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通过对基层、地方和公开材料的选择、分类编辑，再加上序言和按语，被称为“合作化运动百科全书”，<sup>①</sup>是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时期群众运动的一次重要尝试。书中先后收录了《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和《勤俭办社》两篇有关“穷棒子社”的报道，<sup>②</sup>并都写了长篇按语，这在全书中绝无仅有，可见毛泽东对故事的喜爱。《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党的领导和贫农优势是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两条最根本方针，穷则思变和自力更生是合作化运动成功的精神源泉，勤俭则是办一切事业必须执行的原则。“穷棒子社”故事恰好可以成为最典型的旗帜，并为批判所谓“条件论”、“怀疑论”、“坚决收缩”、“反冒进”提供了武器，也是农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性的最为形象的证明。毛泽东在按语中热情地写道：“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sup>③</sup>

毛泽东的按语，标志着“穷棒子社”典型的正式确立。故事叙述开始严格依循按语精神发展：即合作化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唯一正确的途径，自力更生完全可以解决生活困难和生产发展问题，持续增产是合作程度不断升级优越性的具体表现。于是，中央、省、地、县、乡（区）、社各级领导均从故事叙述中获得了各自所需要的东西，好处也波及撰写故事的记者、作家，以及“穷棒子社”的社员们。因此，故事必须继续讲下去，必须对某些不足或漏洞加以完善。

很快，各路人马纷纷开进“穷棒子社”。1956年5月15日一天，吃招待饭的客人达49名，其中有农业部土地规划组来搞土地规划的，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体验生活的作家，遵化报社工作人员和《中国青年报》记者来采访，深入下层的县委书记，县教科扫盲办公室干部和区民校总校长来组织扫盲，县团委书记和区农业技术站正在合力组织农业技术学校，县公安局也有人在这里专门试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相关规定，县水利科的同志在负责指导修建水渠，县卫生院和区卫生工作者协会的人在这里推行新接生法和举行卫生图片展览，以及研究设立诊所的问

<sup>①</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6页。

<sup>②</sup> 选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尚未收进《勤俭办社》一文。

<sup>③</sup>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的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5～6页。





题，县文化馆的人在帮助搞俱乐部和传授民间舞蹈，等等。<sup>①</sup>构成了一个维护典型并制造新的奇迹的工作团队。

“穷棒子社”故事的制作数量大幅度增加，文本类型也更为丰富，但是，叙述方式与之前的通讯报道写法变动不大，就是尽量使用描述式语言，结合大环境需要插入小故事。有所增加的主要是文学性描写，试图以语言和情节打动人从而发挥教育作用；所提供的增产数据，仍然是个别的、孤立的、不可比的。以《人民日报》对“穷棒子社”的报道为例，为说明高级社更优越，当统计数据还未完成时，便大胆“预计粮食作物平均每亩产四百八十六斤，超过原王国藩初级社1955年每亩三百零五斤的60%，比1952年没组织起来时亩产一百二十斤增加了三倍”。<sup>②</sup>后又改为：“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四百四十斤，比1955年增加了66%；棉花一百八十斤，比1955年增加了125%；花生二百七十斤，比1955年增加了50%。”虽然粮食平均亩产量有所降低，但较上年的增产比例却提高了。“每户平均收入五百三十六元九角，每人平均收入一百一十元四角。”<sup>③</sup>缺乏计算方法和历年的数据，有些干脆就只提供抽象的百分比，称有半数以上的户在1956年增收百分之一百到三百，最高者达到百分之九百。<sup>④</sup>人民公社化后，数据更为模糊且混乱。王国藩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讲，1958年在总路线的鼓舞下，“战胜了几十年来未有的大旱灾和百年不遇的暴风雨，夺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原来建明合作社四个村，粮食平均亩产七百万斤，比一九五二年时平均亩产七十多斤增加九倍，达到每人占有一千斤。”<sup>⑤</sup>三个多月后，仍然是王国藩的文章，1958年生产数据出现了一些下调，比较对象的数据却有了上调。“以粮食作物为例，1958年全公社的平均亩产量为四百八十八斤，比1952年增加两倍多。我们原来那个‘穷棒子社’增产得更多，1952年每亩平均只有一百二十一斤，到去年就达到了六百零六斤，增加了四倍以上，每年递增率都在20%以上。”<sup>⑥</sup>值得注意的是，“在生产繁忙劳力紧张的情况下，胜利的完成了105

① 燕农：《“重点”的重压》，《人民日报》1956年8月22日第3版。作者的本意是认为各部门的人涌入西铺村，已经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加重了合作社负担，要求给“重点”减负。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此种现象正是故事可以延续的重要资源，而且还只是刚开始。

② 《坚持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积极发展生产，河北省遵化县建明农业合作社增产增收》，《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2日第3版。

③ 王国藩：《“穷棒子社”的生产超过了富裕中农》，《人民日报》1957年3月3日第3版。

④ 俞文元：《王国藩社的奇迹》，保定：河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页。

⑤ 《永远勤俭，永远向前——王国藩代表谈建明人民公社继续保持和发扬勤俭办社光荣传统》，《人民日报》1959年5月1日第3版。

⑥ 王国藩：《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人民日报》1959年8月30日第5版。

吨铁、45吨钢”<sup>①</sup>的跃进成绩，却未收入故事的公开版本。

故事讲述进一步与国家政治生活靠拢。在反右派斗争中，王国藩痛斥根本不知为何人的葛佩琦。<sup>②</sup>在抗议美国武装侵略黎巴嫩、反对英国出兵约旦的浪潮中，西铺村也召开了群众大会并举行游行。<sup>③</sup>“穷棒子社”还为各项重要的农村工作提供经验。当中央发出中小学生学习农业生产的号召时，<sup>④</sup>“穷棒子社”便出现了回乡务农知识青年先进典型，王国藩在天津通过记者谆谆告诫全国知识青年在农村大有可为，“再过五年十年，我们这里也就是电灯照耀，昼夜难分，万亩良田，千亩牧场，一片青葱；满山牛羊，鸡鸭成群；山上果树成荫，山下道路水渠纵横，四通八达。——生活将会多么美好呀！眼下农村生活虽不如城市，但是为了美好的将来，吃点苦耐点劳又算得了什么？”<sup>⑤</sup>在“大跃进”吃公共食堂期间，创造出“吃饱吃好又节约，有集体也有自由”的经验，并由县委书记撰文宣传、推广。<sup>⑥</sup>此外，人民公社化后，在清理财务的工作中，曾提出坚决“向贪污浪费挪用私分瞒产盗窃作斗争”的任务；<sup>⑦</sup>对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就各项财产处理和所有权划分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sup>⑧</sup>还就“废私为公”实行工资制制定了方案；<sup>⑨</sup>以及在整社工作中，提出了以“58年分配、包工包产、夏收分配为重点”的“十大落实”。<sup>⑩</sup>这些公社制度建设和管理工作的经验，虽然在当时也十分需要，因实际发展中问题诸多，也没有公开讲述。

毛泽东再次注意“穷棒子社”故事，是在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思想的最紧要时刻。1959年8月6日，毛泽东对《经济消息》所载《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等四篇文章批示：“请各省、市、区党委负责同志将王国藩人民公社一篇印发

① 《中共遵化县西铺建明人民公社关于精简机构、充实基层、干部下放的总结》（1959年2月24日），遵化市档案馆藏。

② 《坚决粉碎右派的进攻》，《人民日报》1957年6月16日第1版。

③ 牧野：《山村的愤怒》，《人民日报》1958年8月16日第8版。

④ 社论：《关于中小学生学习农业生产的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第1版。

⑤ 《知识青年在农村大有可为——全国闻名的建明农业社主任答天津日报记者问》，《人民日报》1957年8月14日第4版。

⑥ 曹寿山：《以人定量办法好，吃饱吃好又省粮——西铺建明公社公共食堂执行饭票制的体会》，《人民日报》1959年3月7日第3版。

⑦ 《建明人民公社清理财务总结》（1958年），遵化市档案馆藏。

⑧ 《遵化县西铺建明人民公社关于过渡后财产处理和所有制的规定》（1958年），遵化市档案馆藏。

⑨ 《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关于转建人民公社财产处理方案》（草案）（1958年9月4日），遵化市档案馆藏。

⑩ 《西铺建明人民公社整社办公室关于整社工作向县委的汇报》（1959年8月6日），遵化市档案馆藏。



所属一切人民公社党委，并加介绍。请各公社党委予以研究，有哪些经验是可以采取的。据我看，都是可以采纳的。”<sup>①</sup>并要求各专区均应寻找类似典型加以推广。8月19日，毛泽东写信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要求组织一次包括“穷棒子社”的人民公社调查研究，每省（市、区）选择五个典型，三个月交卷，编一本书并加上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动派。”<sup>②</sup>

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日益恶化，毛泽东“向世界宣战”的宏愿未能实现。但是，“穷棒子社”仍然捷报频传，也未遵照毛泽东要求的“实事求是，反复核对”。1959年，“粮食亩产量估计至少可以达到五百五十斤，比去年将增长近13%。”<sup>③</sup>不到两个月，数据又大幅跃进，“全社粮食作物平均亩产达到六百五十斤，比去年增产33%；棉花平均每亩可产皮棉五十五斤，比去年增产26%；花生平均亩产比去年增产60%；蔬菜、干、鲜水果等都比去年增产一倍多；牛、羊和猪只比去年同期增加26%到68%。到9月底统计，全社总收入达到三百七十万元，平均每人一百二十五元，比去年增加13%。”<sup>④</sup>11月26日，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强调亲眼所见“五业齐跃进，全面大丰收”。<sup>⑤</sup>远在上海的张春桥，也高调讴歌“穷办法办法无穷”。<sup>⑥</sup>



1960年代的王国藩。

由此，“穷棒子社”故事基本完成了自我完善，真正成了“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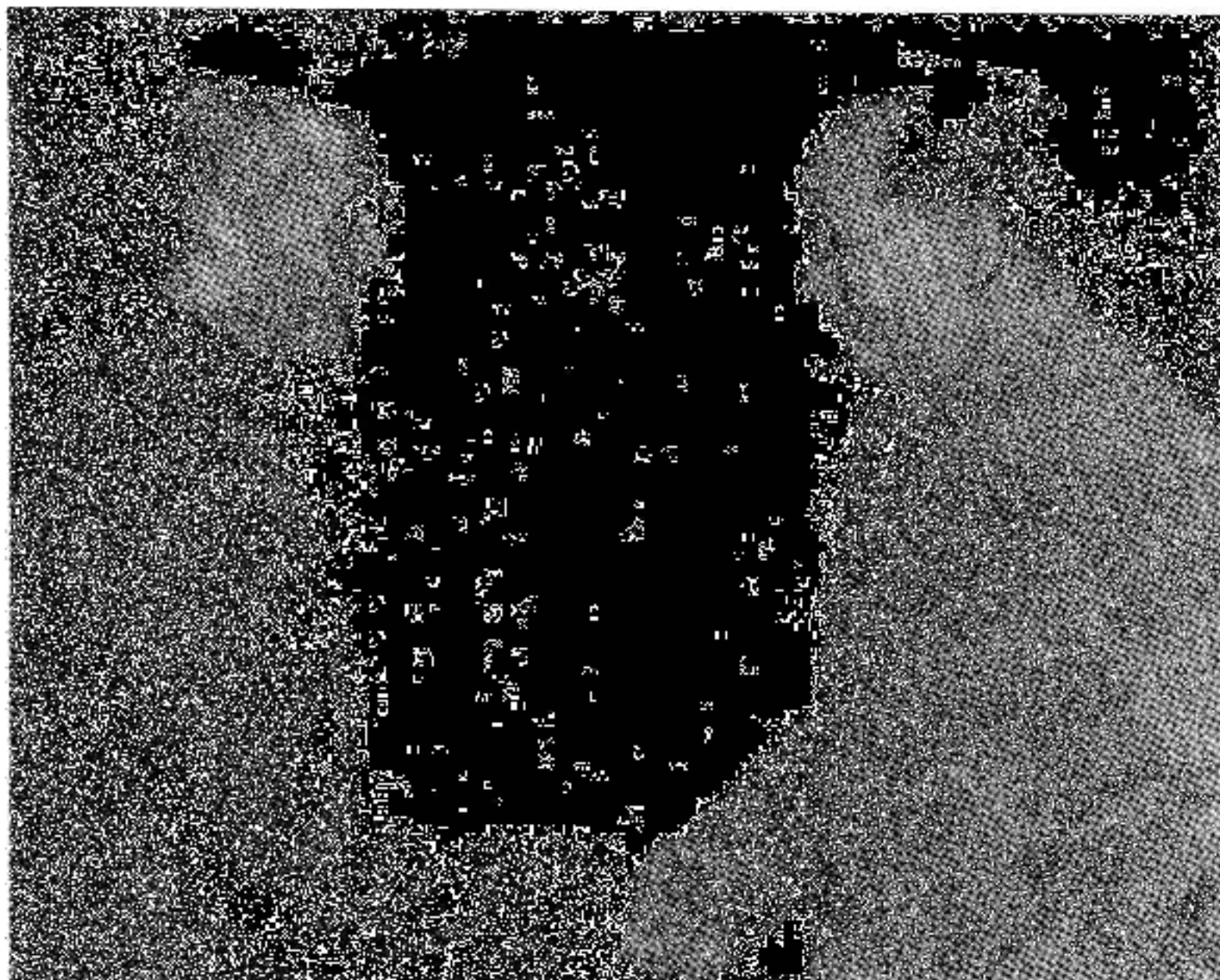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463页。

③ 《继承“穷棒子社”的勤俭传统，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建明人民公社树立了光辉榜样》，《人民日报》1959年8月30日第1版。

④ 《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今年又获农林牧副渔全面大丰收》，《人民日报》1959年10月26日第4版。据“文革”时期整理的统计数据，西铺大队粮食亩产量分别为：1955年305斤，1956年380.5斤，1958年476斤，1959年557.5斤，均低于正文中提到的数据。社员人均分配数据相差更大，以1953年的54.31元为基点，1955年为56.66元，1956年为71.61元，1958年为75.82元，1959年为70.62元。年增长有限，集体所有制水平提高的带动作用更有限。自1960年后，基本在70元上下浮动，尤其是经济恢复时期反有所下降，直到1972年才提升到90元以上。《“穷棒子”精神放光芒》，第167-170页。必须指出，在该书的叙述部分，并未使用这些统计数据进行分析。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596页。

⑥ 张春桥：《“穷棒子”精神》，《解放》1959年第24期。



1960年3月，毛泽东接见“穷棒子社”带头人王国藩。

从而越讲越大，越大越讲，构成了依附于故事的上下一体的完整权力和利益链条。

#### 四、裂痕：同构、内斗和新时期来临

当时间进入1960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已经较为明显，“穷棒子社”却是一派繁荣景象，王国藩提出了“大干百天，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宏伟计划，<sup>①</sup>并在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向代表们描绘了一幅山区面貌大变样的图画：“白天机器隆隆响，夜晚电灯放银光，水渠盘山浇坡地，汽车铁牛日夜忙。”<sup>②</sup>此刻，“穷棒子社”的跃进计划，早已非村庄史的救穷求富意愿所能包容，而与国家的政治路线和相关各级干部的工作成绩紧密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强调：“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标准。”因此，“穷棒子社”必须继续跃进，并确定更高的跃进指标。

据唐山市委报告：“接林铁同志北京电话指示后，市委书记处专门对建明社实现‘千百万’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决定市委由马力和周振华书记负责亲自抓，县委书记曹寿山同志全年拿出二分之一的时间抓建明社。同时，为了及时的总结和反映建明社的情况，增强公社领导力量，市委派出一个工作组常驻建明社，在物

<sup>①</sup> 王国藩：《穷棒子社变成幸福乐园》，《人民日报》1960年1月1日第3版。

<sup>②</sup> 《王国藩代表谈建明人民公社新事》，《人民日报》1960年4月12日第9版。





1967 年报社记者拍摄的“穷棒子社”的照片。

资上决定给建明社 100 万斤化肥。”在多项高指标中，最离谱的养猪指标。“现在全社实有猪 9085 口，其中大母猪 1175 口，按照比较保险的系数计算，年底可产仔猪 18310 口，加上现有数共 27000 多口，距离十万口差 7 万多口，县委已决定调给 10000 口种猪（其中公猪 300 口）。这些猪调去后，年底可以完成十万口。”可是，调猪进度太慢，而且都是小母猪，猪只大批调迁以后，又需要供应大批饲料，只能挤占其他县资源。<sup>①</sup>典型村庄的工作，已经成为地方党政领导的重要工作，获得了组织上、物资上的大力支持，以确保指标的实现。虽然“穷棒子社”仍是故事的主体，但是，主要讲述者换成了更高层级的领导干部，故事能否继续或如何讲述，“穷棒子”自身并没有主导的权利。

理想和热情未能维持多久，甚至在制定继续跃进计划时，危机已经显现。自 4 月始，浮肿病在建明社蔓延，“六月下半月较严重，发病 112 人，七月上旬又连续

<sup>①</sup> 《中共唐山市委关于建明社“千百万”运动情况向省委的第一次报告》（1960 年 4 月 20 日），遵化市档案馆藏。所谓“千百万”运动特指在继续跃进中，实现亩产千斤粮、百斤棉（皮棉）、万斤薯和养猪十万头的高指标。

发病41名。”尽管西铺村不太严重，但分布面达17个村，比较集中的有3个村，患者绝大多数是社员，但也有干部、工人、教员、学生。“造成浮肿病的原因：一是乱吃野菜，生活调剂安排的不好；一是劳动强度大，劳逸结合的不够；也有少数人是闹肠炎等病引起的。”另外，还连续发生苦杏仁中毒11起，患者27人，死亡4人。农业劳动力投入不足和大牲畜死亡造成土地抛荒的现象，也日益严重。“鸡鸣村管区25个食堂，有19个食堂时断时续，每天吃一顿。”<sup>①</sup>在此种情况下，唐山市委仍汇报建明社1960年取得了农业大丰收，形势很好。可是，秋收进度比较缓慢，至“9月28日只完成38%”。文件已不再讨论高指标的兑现问题，相反，却出现了国家与村庄、农民关系发生裂痕的叙述。“有些干部和社员对党的政策还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怕多征多购，怕消费指标留不足。”为确保秋收工作，转而强调要落实兑现三包一奖、口粮差别、按月发工资等政策，不过标准压得很低。例如，“每人平均先预奖粮二至三斤，由生产小队集体掌握”；在口粮差别上，“目前，规定生产好的单位吃九两，一般吃八两，不好的吃七两”；“工资标准由各核算单位根据自己的经济收入自定，但一般不少于四元，不超过十元。”<sup>②</sup>仅仅在一个多月后，唐山市委主要领导给河北省委主要领导的报告中，建明社的丰收似乎更加实在了。“粮食过秤的结果是：亩产平均486斤，比去年增长9.4%，总产1508万斤，比去年增加6.2%。”而且，在夏季分配时就坚决地停止了过渡，恢复了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度，一平二调的东西陆续清理退还，各种责任制度又相继地建立起来了，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在西铺村，8月份掀起了积肥热潮，一个月积肥100多万斤，“相当于一至七月份积肥总量的四倍左右”。<sup>③</sup>

由于维护“穷棒子社”，在国民经济进入调整之时，强调以往政治路线正确性具有重要意义，官方报告对于事实陈述的选择力度加大。1961年4月10日，河北省委再就建明社情况向华北局、中共中央、毛主席报告，经过整风整社运动，建明社已解决了“共产风”等问题，坚挺不拔地保持先进的旗帜。“去年的粮食生产，达到了亩产四百二十九斤，在大旱年来说，可以说是不错的收成。这个社（原鸡鸣区范围）五年来，粮食连年增产。以一九五五年为一百，一九六〇年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七点四，每年递增百分之九点一。总产量达到一千三百三十

<sup>①</sup> 《中共唐山市委关于建明社“千百万”运动情况向省委的第十次报告》（1960年7月17日），遵化市档案馆藏。

<sup>②</sup> 《中共唐山市委关于建明社“千百万”运动情况向省委的第十四次报告》（1960年10月4日），遵化市档案馆藏。

<sup>③</sup> 《马力、周振华给林铁同志并省委的报告》（1960年11月19日），遵化市档案馆藏。



三点七万斤，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原建明社四个村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是五百二十斤，比一九五五年增长百分之七十；总产量是一百六十六万斤，比一九五五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五。”“生活好，也可以从人口自然增长情况看出来。去年全社出生八百七十九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点四，比前五年平均人口生殖率还高百分之零点六二；死亡人口二百九十二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零九，比前五年平均死亡率要低百分之零点一五。”<sup>①</sup> 勤俭办社依然是渡过经济困难的最有效办法。

由于急速过渡、跃进指标、浮肿病、食物中毒等现象极为敏感，可能损害被高度肯定的三面红旗的形象，连年丰收的增产数据也与日常生活的切身感受距离甚大，这些内容在故事的公开版本中都被隐去，或作了更为模糊化的处理。自1960年起，故事叙述大量增加了文学性的描写，以小说、散文、诗歌、曲艺、绘画等多种形式；依据不同主题将故事拆解成为各个片断，试图用生动的语言和故事情节，塑造一个高度程式化的形象。一大批知名作家、诗人、画家和文艺工作者下到“穷棒子社”创作，制作出一批在当时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作品，也不乏标语口号式的简单灌输。李村的《“穷棒子”歌》这样写道：“合作化，公社化，共产主义发芽，马克思主义开花。帝国主义咬牙，修正主义气炸。”<sup>②</sup> 在庆祝“穷棒子社”成立十周年的通讯中，故事核心是拉出“三条驴腿”的毛驴和现在公社拥有的汽车、拖拉机、高头大马比较，以视觉的强烈反差反映成就。对十年的增产记录，却采用最隐讳的写法：“今年这里虽然遭到严重的旱灾和涝灾，平均亩产仍比1957年高级社时期还多。”<sup>③</sup> 为了证明集体化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小心回避了困难时期粮食生产有所下降的事实。

无论在叙述技巧上进行何种努力，都无法解决故事中诸多的漏洞和疑问。于是，使用阶级斗争成为故事叙述的主要话语和内在逻辑，就成为弥补缺陷的办法。阶级斗争话语高度融入村庄社会生活，主因当然是国家政治生活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发展和实践，也与“穷棒子社”故事的叙述语言紧密相关。所谓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核心问题是政权的属性和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尤其要警惕革命队伍内部的和平演变。在西铺村，故事的背景和主体都表明，所谓“阶级斗争”的主要

<sup>①</sup> 《中共河北省委关于遵化县建明公社情况的报告》（1961年4月10日），遵化市档案馆藏。

<sup>②</sup> 《人民日报》1960年8月22日第8版。

<sup>③</sup> 《建明公社集会庆祝创办初级社以来的巨大成就》，《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2日第2版。据西铺大队（建明社）生产情况统计：粮食亩产量1957年406斤，1958年476斤，1959年557.5斤，1960年605.3斤，1961年633.7斤，1962年543.9斤，1963年572.5斤，以后略有增长，变动不大，直到1970年达到829.3斤，才算有了明显的增长。《“穷棒子”精神放光芒》，第168页。

阵地的内部，即针对“代理人”的斗争，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故事就是这样讲述，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判定村庄权力的归属。所以，使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话语，继续“穷棒子社”的故事叙述，并没有什么障碍或不妥，各种生产、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或困难，都可以解释成为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并首先从清理队伍着手解决权力问题。

60年代上半期的整社、“四清”、社教运动中，村庄的阶级斗争往往表现为权力内斗。且不论斗争各方是否代表特定阶级，从斗争方式看，无论是当权派，还是不满现存权力秩序的反对派，差不多都有贫下中农、党员、干部等身份，都利用阶级斗争的概念和手段打击对手，界限十分模糊，一时难以辨别，加之“穷棒子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位置，掌握村庄权力意味着可能获取更高的地位和荣誉，因此，斗争过程变得更为激烈、更为混乱，造成的社会裂痕也更为深刻。有趣的是，村庄内斗致使社会裂痕的表面化，竟然与所谓国家最高层分歧公开化基本同步，进一步地发展更是惊人的相似，已经很难区分哪些是村庄文化在特定环境下的必然结果，哪些是依据国家政治话语的事实虚构。

村庄阶级斗争的内容，一是通过新旧社会的回忆对比，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教育，强化阶级意识，检查思想、立场和行为；一是根据运动文件，对照检查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重点有私分瞒产、投机倒把、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铺张浪费、丢失公共财物和账目处理混乱、开支不当等经营管理不善问题，以及巫婆、神汉、道会门等的迷信活动。<sup>①</sup>运动的重点是审查各级干部，以解决组织不纯问题，改善国家与村庄、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弥合两种社会裂痕。运动的方法是派出大批工作组（队）下乡，成立贫下中农协会树立阶级优势，发动群众“真正起来革命，自己救自己”，进行“大揭大议大批”。<sup>②</sup>

运动方法似乎回到了土地改革，并且出现了新的“搬石头”现象。作为先进典型，建明社干部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整风整社运动中，公社生产小队长以上干部980名，犯有各种错误的157名，占干部的16%。<sup>③</sup>社教运动中，曾创造“书

<sup>①</sup> 《中共遵化县王市庄工委关于当前“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揭发的几个问题的汇报》（1963年4月29日），遵化市档案馆藏。

<sup>②</sup> 《在建明公社贫代会议上讲话提纲》（1965年1月27日），遵化市档案馆藏。

<sup>③</sup> 《中共建明公社整风整社办公室关于组织处理工作总结向县委的报告》（1961年6月18日），遵化市档案馆藏。



记动手，全党办社”经验的公社书记赵涌兴，被认为“存有比较严重的问题”。<sup>①</sup>在西铺村，整风整社运动和“四清”运动初期，举行了由党支部负责组织有贫下中农群众参加的学习、揭盖子会议，主要揭发了管区副主任、大队长杜奎的问题。杜奎的问题主要有三件事：一是企图把水果运往集市高价出售；二是在党支部会上提出把部分集体耕地作为“猪饲料地”下放到户；三是乘王国藩外出开会，擅自决定下放猪饲料粮为名，分掉一万多斤储备粮。<sup>②</sup>在故事中，前两件事遭到干部、群众的自觉抵制，未成为事实，但定性为投机倒把、破坏国家利益、走资本主义道路和鼓吹单干的行为；第三件事则被解释成以私分收买人心，并乘机从中谋利。<sup>③</sup>事实上，所谓涉及道路问题和国家、集体利益的三件事，都是经济困难时期曾被允许或准予尝试的行为，在运动中却被上纲上线。杜奎的其他问题，还有利用职权多吃多占，以及所谓放粮放债进行高利盘剥。如有揭发称：“那年盖房我借了他八十块钱，三分利钱，到腊月还不上钱，只够交利钱的。”“我借他点红高粱，一斗还一斗三。”<sup>④</sup>又涉及到如何解决借贷问题，既然国家、集体都无法满足借贷需求，此种民间借贷关系是否属高利贷性质应该如何界定呢？当然，故事讲述者并不关心这些问题，只是依据中央文件对照检查，以为《前十条》第三条第二种情况“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杜奎能对上号”。<sup>⑤</sup>

尽管“穷棒子社”创办没多久，生产就已经超过了富裕中农水平，可是调整时期的叙述话语，“富裕”还是与企图“包产到户”的“资本主义倾向”联系在一起，<sup>⑥</sup>“穷”仍然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性的重要标志。揭发还提到杜奎经常抱怨“给王国藩扛活”，<sup>⑦</sup>言语中透露出对权力和荣誉过分集中于少数模范人物的制度安

<sup>①</sup> 《中共遵化县王市庄工委关于建明公社社教运动前后变化情况汇报》（1965年3月2日），遵化市档案馆藏。赵涌兴在毛泽东按语发表后，曾当选中共八大代表。

<sup>②</sup> 《“穷棒子”精神放光芒》，第118页。在另一种叙述中，擅自私分的粮食数量上升到几万斤。《“穷棒子”之乡斗争史》，第101页。

<sup>③</sup> 有故事称：杜奎在分粮前现买了四只猪，按猪头数领了粮食以后，他一倒手把猪又高价卖了，把粮食偷偷放出去吃利息。《“穷棒子”之乡斗争史》，第10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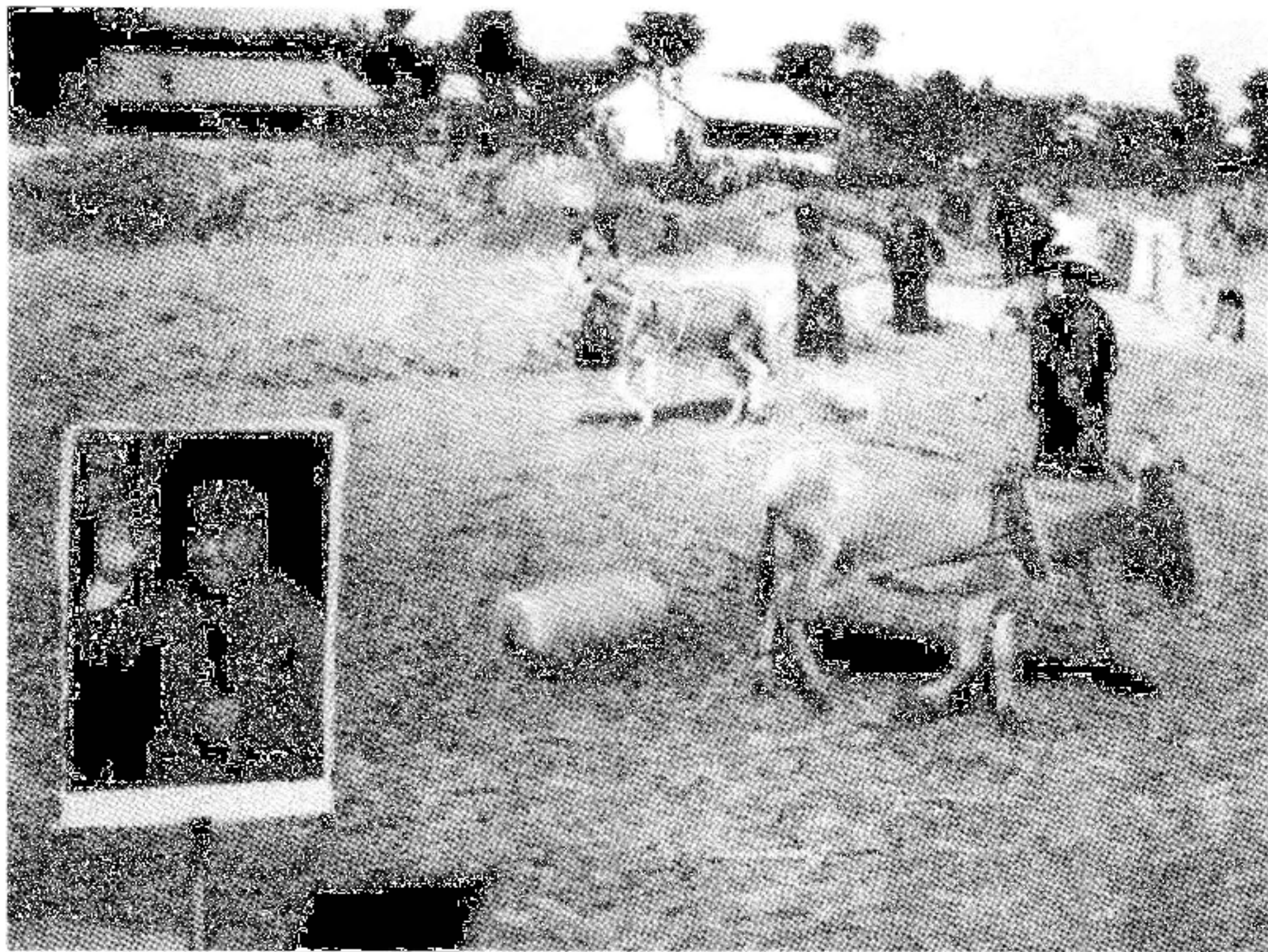
<sup>④</sup> 《“穷棒子”之乡斗争史》，第120页。

<sup>⑤</sup> 《“穷棒子”之乡斗争史》，第122页。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后简称《前十条》。

<sup>⑥</sup> 《“穷棒子”之乡斗争史》，第102页。事实上，“包产到户”在当时主要是应付经济困难的一种集体经营管理形式；被作为农村改革标志的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最初也是治穷的办法。

<sup>⑦</sup> 《“穷棒子”之乡斗争史》，第100页。该书将杜奎的抱怨，完全解释成路线之争。近十多年的口述访谈，村民多解释为个人争权。《西村十五年》，第117页。





1970年代“穷棒子社”的打麦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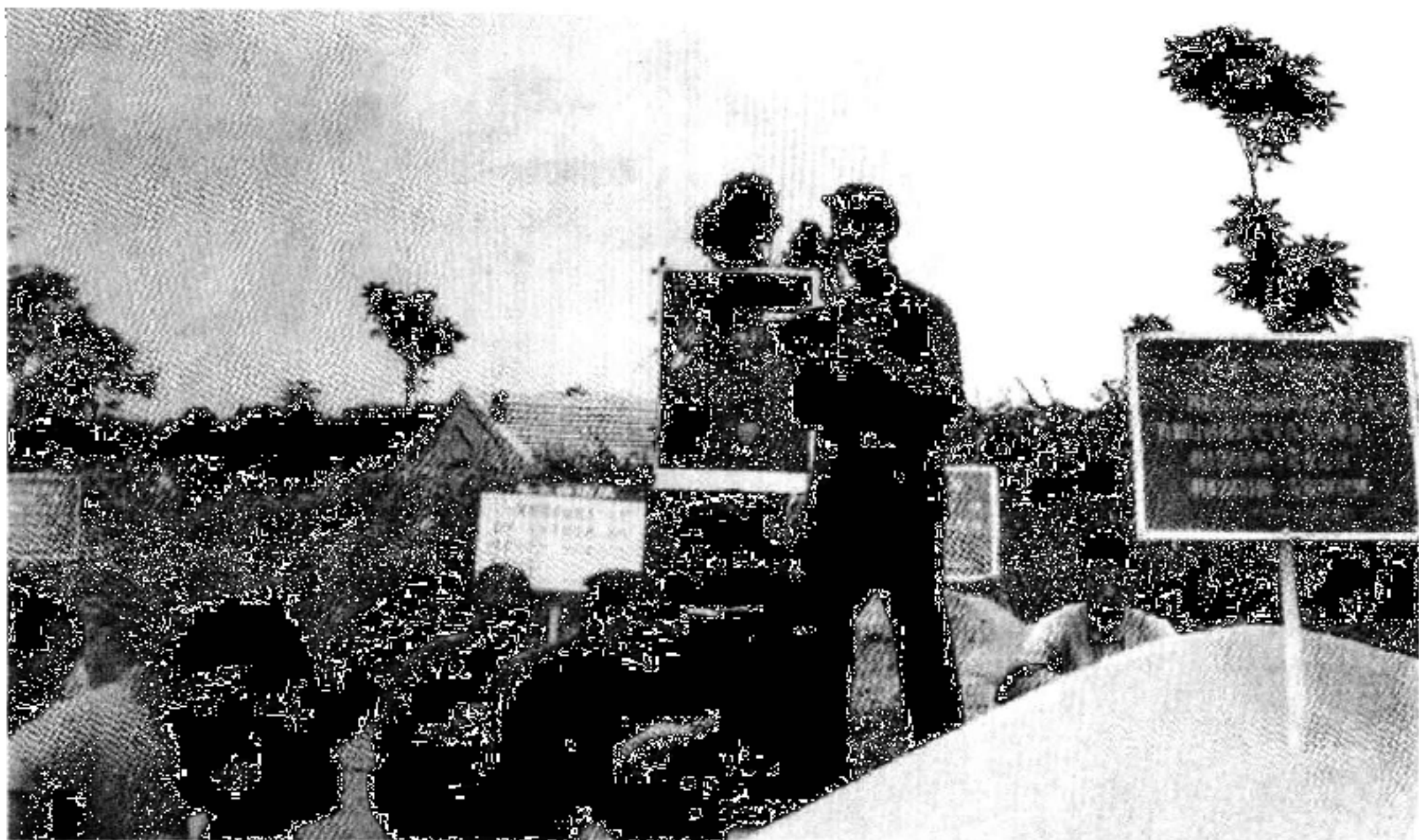
排的不满，也暴露出想通过各种表现进一步获取权力借以提升地位的企图。作为典型的代表，个人权力已经远远超出了旧日乡村精英可能达到的范围，势必与一般干部和普通群众的距离扩大，同时也更具有诱惑力和腐蚀性。借助群众运动展开个人权力的争夺，是当时最常见、也是最有效的斗争形式，群众的真正意愿被无原则的内斗所掩盖。由于杜奎在权力位置上明显处于弱势，选择了检查后在家养病的消极态度。党支部决定建立村史馆，王国藩还公开谈论建立农村档案的重要性，<sup>①</sup> 试图通过历史叙述和相关材料的收集、整理，稳固权力地位并确立其合法性。

在《后十条》中，规定运动的各项工作首先是“组织和训练工作队”，其次是犯有一般性错误或者错误比较严重的干部主动“洗手洗澡”。<sup>②</sup> 于是，工作队接手负责领导运动，对于社、队干部的冲击面和激烈程度都有所增加，各种历史上沉积

<sup>①</sup> 冀安：《王国藩同志谈农村档案》，《人民日报》1963年11月27日第2版。

<sup>②</sup> 《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69页。《后十条》指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后经小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1970年代，王国藩带领社员学习毛泽东的著作。

的不满也都借运动被发泄出来。在工作队的报告中，所谓“四不清”问题，最突出的是借权力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以及依仗权力横行霸道和多吃多占。<sup>①</sup>西铺村情况也大致如此，王国藩等主要干部都或多或少都有上述问题。但是，影响最大的还是重提王国藩的成分问题，从血缘、出身论证政治态度、立场，是“四清”运动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最重要方式，也是想要扳倒王国藩这类人物最有效的武器。在工作队（团）的主持下，形成了一套有关王国藩成分问题的调查材料，然而，调查方向、内容的设定，调查对象的选择，证明材料的取舍，都反映出“查证式”调查研究的权力性。<sup>②</sup>也就是说，由于结论主要依据现实政治斗争态势和维护权力的需要，澄清历史事实只有部分作用，因此，调查是可控的。当最高层仍想维护王国藩时，结论就必须有利于王国藩，证人的选择和证言中对事实的叙述可能发生微妙的变化，从中可以感受到利益因素和某种导向、压力的影响，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和权力争夺造成的社会裂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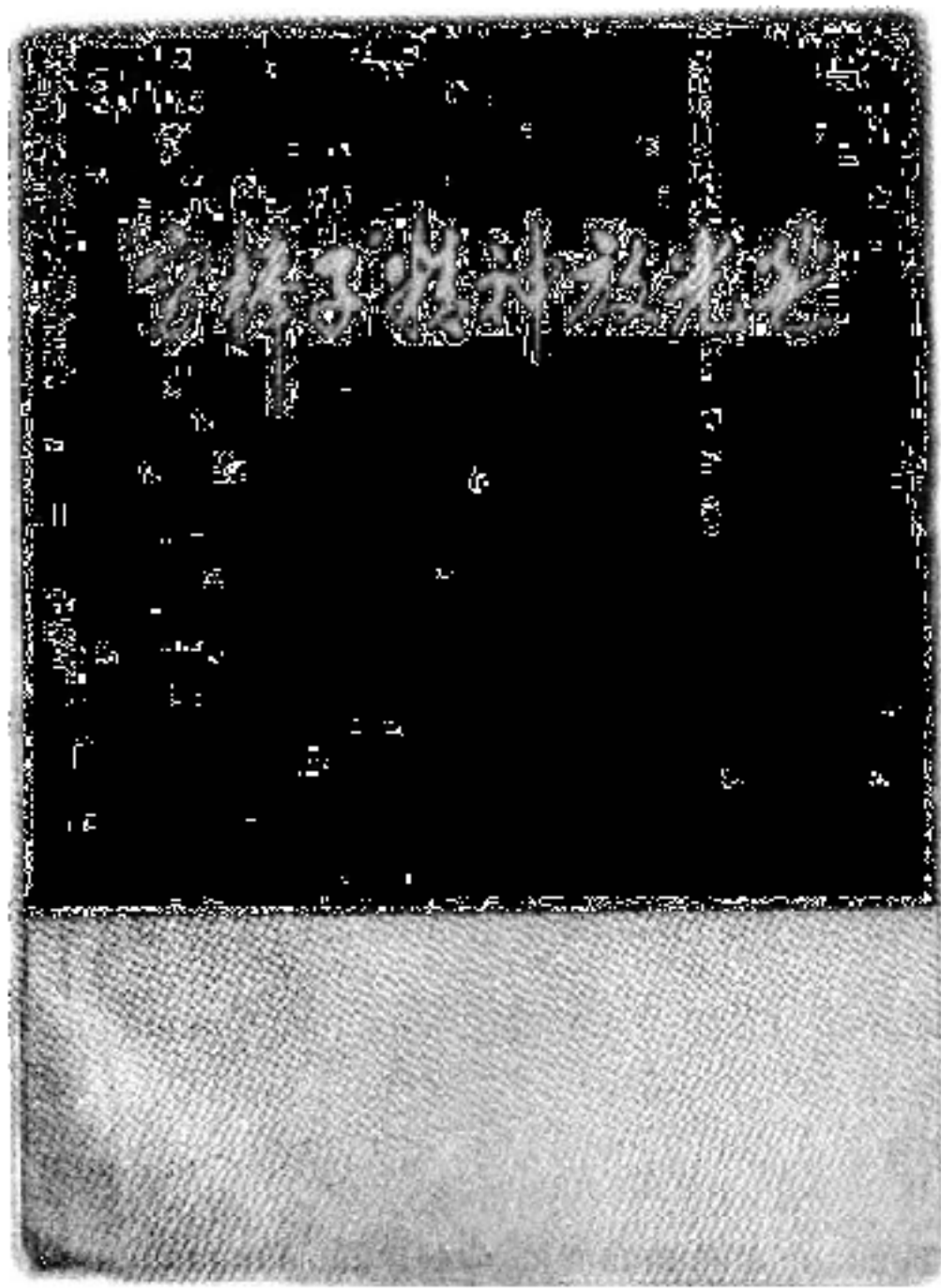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穷棒子社”内部的权力斗争迅速达到高潮，出现了拥戴不同领导人的派系斗争，被认为是创社的“二十三户贫农开始分裂和公开对

<sup>①</sup> 《张毅光同志在鸡鸣村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上介绍鸡鸣二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试点情况》（1965年1月5日）遵化市档案馆藏。

<sup>②</sup> 《“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空间·记忆·社会转型》，第536～553页。

立”。<sup>①</sup>虽然相互攻击的武器依旧，斗争的激烈程度却已上升到暴力冲突，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甚至影响到国家的外事活动。高层领导不得不出面干预，并再次动用了国家专政机器，反对派杜奎被捕入狱，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惨死狱中，王国藩则高举红旗屹立不倒。此后，王国藩的官越来越大，头上的光环越来越多，足以震慑村庄内部不满的爆发，也可以利用更多的资源部分弥合日渐扩大的村庄社会裂痕。

因此，故事依然继续，并且完全依附于国家历史叙述。“穷棒子社”继续充当国家外事活动的场所，承担扮演国家形象的重任；在政治运动中，继续充当大批判的阵地，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上，重大政治批判不乏他们的声音；在农业战线，继续在兴办社队工业、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充当先进典型的角色。在“文革”期间，另一件重要工作就是重写的历史。在同一时期内，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政治经济学系师生组成编写组，从经济史角度，撰写出版了《“穷棒子”精神放光芒：西铺大队的经济发展》，部分西铺大队贫下中农和遵化县



197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穷棒子精神”放光芒》一书。

委干部参加修改；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写组则出版了《“穷棒子”之乡斗争史》，写作上更具文学色彩。虽然两个版本的村庄史在叙事风格上有所不同，但都对“穷棒子社”故事的内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以便更加符合同时期国家历史的叙述特点。对历史的修正与建构，也许暂时有利于维护现实中国家与村庄的权力秩序，却使社会裂痕变得更难愈合。

当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穷棒子社”故事出现了新的变化。1978年11月，王国藩被免职回家，随后，报刊未点名的指责其在遵化县“实行‘家长制’，大搞‘一言堂’，违反党

<sup>①</sup> 王立新：《一个“县革委”主任的沉与浮》，《昆仑》1985年第2期，第157页。



纪国法,造成了不少冤案错案。”<sup>①</sup>揭露了“文革”中大肆宣扬的依靠“穷棒子”精神大搞机械化、水利化的造假行为,“搞得生产路子越来越窄,集体和社员越来越穷”。<sup>②</sup>

## 五、尾声：遗产、话语权和发展方式的启示

一个简单的村庄故事,被叙述的如此复杂,主要原因在于企图使村庄史完全依附于国家历史的写作方法,难免出现众多漏洞和自相矛盾。本文对于“穷棒子社”故事叙述的分析,并不是想证明故事均非事实,而是要说明在赋予故事以国家意识形态意义过程中的选择和建构,村庄、家庭、个人丰富多彩的故事,被随意截取、剪裁,变成了散碎的、缺乏内在紧密联系的、被不断修改的故事,目的只是在说明某种理论、决策、行动的正确性、合理性,失去了日常生活的多样化特征,故事叙述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村庄故事不会像政治结论那样在某一天终结或开始。国家领导人提倡顾大局、向前看,<sup>③</sup>是尽快转向现代化经济建设的理性思考,也是巩固执政地位的必要措施。对于生活在特定村庄中的民众而言,尽管周围的一切也在发生着巨变,但是,处在社会关系网络核心的权力结构变动却并非同步,甚至远远落后于经济条件的改善。在西铺村,上访、告状的事情断断续续时有发生,其中有些和“穷棒子社”故事的内容有一定关联,都想讨个“公正”的说法或结论。历史上形成的村庄社会裂痕,单凭经济发展还不那么容易平复。

作家凭借自身对“穷棒子社”故事的理解,试图为故事加上一个结尾。有的以为,在拨乱反正之后,便是改革开放的一派大好形势,剩下的应是对历史沉思的宁静。“人们告诉我,1978年,王国藩被免职回乡。杜奎的儿子,特意拿着抹子和镐头前来为王国藩搭炕。‘文革’中,他曾用这镐头刨过王国藩的炕,今天,带着惭

<sup>①</sup> 王裕录、李春泽:《中共遵化县委召开全县广播大会宣布彻底平反一起所谓“篡权复辟”案件》,《人民日报》1980年7月23日第3版。

<sup>②</sup> 《吸取过去单一经营和片面追求机械化的教训,遵化县发展多样化小型的多种经营》,《人民日报》1981年8月23日第2版。

<sup>③</sup> 1984年8月,胡耀邦路过遵化视察工作时,要求对王国藩的处理“向前看”。戴煌编著:《新格斗:〈穷棒子王国〉案》,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另一种描述是:“王国藩问题算了,不管谁提意见,都解释一下,共产党犯错误犯不起啊!”《一个“县革委”主任的沉与浮》,《昆仑》1985年第2期,第172页。

愧和忏悔，用实际行动，来弥补两代人的裂痕。”<sup>①</sup> 农民的理性让人肃然起敬。村庄与国家的利益被紧密相连，脉搏的跳动也完全一致，所有人都应该为过去无原则的内斗悔过，翻开全新的一页。故事的另一种讲述却是别一番景象：王国藩被罢官回家时，“杜奎的几个儿子围上他的家，要打断他的腿，他吓得多日不敢出门。”<sup>②</sup> 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反而激起了村庄中对于历史积怨的复仇情绪。叙事反差展现出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其含义远远超出分辨哪种讲述更为真实。

于是，争斗“穷棒子社”故事叙述的话语权，就成为如何处理历史遗产的首要问题。

最著名的是王国藩诉作家古鉴兹及作家出版社侵犯名誉权案。<sup>③</sup> 1993年3月10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宣判王国藩胜诉，一时引发各种议论，最激烈的是指责法庭受到权力干扰，质疑调查取证程序和判决的公正性。<sup>④</sup> 国家机器再度干预“穷棒子社”的故事，依然是王国藩获胜，不过判决影响却有了质的变化——法庭并未就故事的事实进行裁判，也不可能给败诉者戴上一顶一击致死的政治大帽子。其实，纪实的或不“纪实”的“穷棒子社”文学作品，在古鉴兹小说出版前就长期存在，内容也不乏“确有侮辱、诽谤的情节”，这些王国藩应该十分清楚。通过诉讼想要维护的，也许就是继续把持“穷棒子社”故事的话语权，希望借此对现实社会地位有所提升或使内心有所慰藉，绝不能容忍一个过去被打倒在地的人讲述不同的故事，并将此事和农夫与蛇的故事相类比。<sup>⑤</sup> 因此，在胜诉之后，王国藩的维护者或同情者，也并不遵守高尚法制精神下的事实辩驳，在对他们不满意的故事讲述者的批判中，也夹杂着一些事实虚构和人身攻击，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互联网络上的语

① 《一个“县革委”主任的沉与浮》，《昆仑》1985年第2期，第163～164页。

② 《新格斗：〈穷棒子王国〉案》，第22页。

③ 古鉴兹的小说《穷棒子王国》，1989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前王国藩从《社科新书目》上得知这本被称为“纪实小说”的书即将出版，找到出版社要求停止出版，遭拒绝后遂状告作者和出版社侵权。古鉴兹和作家出版社均辩称小说为创作，未出现王国藩真实姓名，不构成侵权。法庭认为，“凡了解或知道王国藩的人均认为《穷棒子王国》一书写的就是王国藩，并确有侮辱、诽谤的情节，贬低了王国藩的人格，给王国藩造成了不良影响。”

④ 《新格斗：〈穷棒子王国〉案》，第11～19页。

⑤ 王国藩在状告古鉴兹和作家出版社时，曾给中共领导写信，内称：“具有犯罪前科的杜振远及古鉴兹他们平了反，但是他们仍觉得不够，于是把对党和国家的仇恨，用小说的方式来表达，以对我进行影射污蔑做炮弹，发泄出来。”黎清：《评河北文人王立新的投机之路》（2008年4月29日），和讯评论 <http://opinion.hexun.com/2008-04-29/105629256.html>。



言暴力。<sup>①</sup>

走进西铺村，“穷棒子社”的遗迹已经不多。村头竖着一块大型广告牌，上面写着：“前进中的西铺村，‘穷棒子’精神永放光芒”，下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河北省文明示范村”，立柱已经锈迹斑驳。村委会院内有一尊毛泽东站立挥手的塑像，塑像后的墙上是毛泽东手书“按语”及与王国藩握手的画像，简单的村史馆陈列着一些历史图片，告诉人们曾经辉煌的“穷棒子社”故事。在村务公开栏内，2010年3月20日公布的“村集体资产、资源情况”（年度公开表）中，西铺村集体资产为：房屋150间值500万元，机井3眼值36万元，地下管道5000米值25万元，电力设备20台值20万元，办公用品200件值5万元，农业机械4台值8000元。主要是房产和公共设施，近三十年的集体生产积累所剩无几。年长一些的村民在参观江苏江阴华西村后，以为华西村基础还不如西铺村当年的八大企业，可八大企业都已不复存在。都是起于社队工业，为什么得到大发展的是华西村而不是西铺村？且不论华西村故事如何讲述，在西铺村的不同认识中，有一种情绪及历史观念十分强烈，以为村庄地位的变化主要受到国家路线、政策改变的影响，既突出了权力在村庄发展中的作用，又多少带有一点命定论。在互联网上，这种情绪甚至表达为对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格局变动的不满。王国藩等人始终将“穷棒子社”故事与老一代国家领导人的历史评价捆绑在一起，在晚年最后接受采访时，发表的文章中使用了拥护改革开放路线之类的套话，但王国藩的思想十分清晰：“努力干吧，毛主席正站在高处了望咱们呢！”<sup>②</sup>

如今的西铺村，仍然是遵化市、河北省的示范村，村容整齐、干净，村民收入按当地水平较高，甚至较一些平川村庄更好。村庄经济的相当部分仍然依靠“从山上取来”，但已不是简单体力劳动的打柴，农田基本建设、发展林果业和畜牧业、兴办小矿山等也变得不那么重要，而是通过出让资源进行较大规模的矿山开发。在逐步富裕起来的村民之间，除了个别几个家庭的临时合作外，还未出现新的生产互助合作形式，发展经济的条件主要为：国家工业化取得较大发展，需求扩大，提供资金、技术的能力增强；交通便捷程度提高，西铺村前的省道正在改造成准高速的高等级公路，村庄与外部的联系更为方便和紧密；城市化辐射扩大，西铺周边的北

<sup>①</sup> 互联网络“遵化吧”（<http://www.zunhua8.com>）上，在2005年7月30日王国藩去世后的一段时期内，围绕对其评价的一些言论，可以清晰地看到对批评言论的压制情况，也暴露出社会裂痕的现状。

<sup>②</sup> 张祥云、陆占山、孙伟：《幸福的回忆，永久的怀念——访当年“穷棒子”社带头人王国藩》，《党史博采》1996年第11期，第41页。

京、天津、唐山、秦皇岛、迁安、遵化等各级城市都在猛烈扩张，为村民进城务工经商提供了机会，从村庄到遵化城已经形成工厂、商业、贸易、餐饮、旅馆、娱乐等沿公路的带状市场网络，大大方便了农副产品的销售，也提供了各种就业门路，人口流动和经营自由作为身体的解放，不但有利于刺激个人、家庭的生产积极性，也能部分化解或减轻村庄生产、生活压力和矛盾，其中包括历史上形成的社会裂痕。

故事的尾声，似乎又回到序幕时关于土地改革前后农村社会发展问题的讨论，这是否是某种历史循环论？“穷棒子社”故事表明，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直线叙述，其中不乏国家领导人探索和农民群众创业的感人情节，但是，故事的走向和讲述的语言、逻辑存在诸多问题。可以肯定地说，故事只是包含了部分、甚至是一少部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内容，缺失部分对于故事叙述的完整性十分重要。对于本文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把握故事叙述缺失，有可能为历史连续性的解释提供更为准确的观察视角。



## 水旱之争的历史审视

——1950年代皖西北稻改中的政府与农民

葛 玲\*

**摘要** 文章以1950年代兴起于皖西北地区的稻改运动为基本情境,透视了政府与农民在面对这场依靠行政力量推动的生产改革举措时的不同态度。面对自上而下的稻改任务,乡村基层干部与农民基于传统种植经验表达了普遍的抵制态度;对来自底层的抵制,政策的制定者及其执行者则是以一种政治化的手法强力推动之。文章最后借助一个村庄农业生产情形的变化对稻改与饥荒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讨论,认为皖西北地区的稻改与三年饥荒有着直接的关联。

**关键词** 皖西北地区 稻改运动 水旱之争 小王庄

1953年9月6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省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对农业技术进行三项改革的设想。三项改革的具体内容为:改变和提高夏季收成的比重;改种高产作物和耐水作物;改变广种薄收的习惯。<sup>①</sup>1954年1月1日,曾希圣又在《安徽日报》上专门撰文《论“三改”对防灾保收和争取丰收的重大意义》,系统论述了“三改”与抵御自然灾害之间的关系。文章论及改种耐水作物时,明确提出要在沿淮地区推行稻改。“关于耐水作物方面,第一是在沿淮低洼地区,应逐步推广种水稻,不仅可以抵御涝灾,提高产量,而且当其普遍推广之后,是能够把广大地面上的水在广大稻田里蓄起来的,是彻底解决水灾的最有效办法。”<sup>②</sup>从以上的论述可

\* 作者葛玲,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广东工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①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农业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4页。

② 曾希圣:《论“三改”对防灾保收和争取丰收的重大意义》(1954年1月1日),《曾希圣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7~108页。

见，无论是“三改”还是后来在皖西北推广的稻改，最初都是为了应对自然灾害。曾希圣在文章中也强调了提出“三改”的一个重要考量，就是要贯彻和实现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个伟大号召。<sup>①</sup>不过，以改种来对抗自然灾害实际上并非安徽省所首创。早在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一份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中，就提出了以改种的方式来应对灾害的方针。“在一时还不易避免水灾的地区，要有计划地领导农民改变生产制度，即改种早熟作物或宜于水区的作物，建立副业基础，以适应需要。”<sup>②</sup>

在曾希圣的论述中，改种不仅可以成功抵御自然灾害，最重要地是还可以提高产量。而建国初政务院颁布的有关农业生产的决定，也一再强调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农业生产的基本方针。<sup>③</sup>1952年的决定更是指出，“完成一九五二年增产任务的决定关键在于加强农业生产的领导。”<sup>④</sup>这一要求无形中加重了地方政府在农业产量提升中的责任，也会催生他们采取一切措施来实现增产的目标。<sup>⑤</sup>可以想见，曾希圣最初提出“三改”，应当不仅是实现毛泽东的“治淮”理想，恐怕还有着应对来自中央层面增产压力的考虑。不过无论出于怎样的原因，“三改”的提出似乎很为

<sup>①</sup> 曾希圣：《论“三改”对防灾保收和争取丰收的重大意义》（1954年1月1日），《曾希圣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7页。

<sup>②</sup>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关于春荒期间加强生产救灾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51年3月27日第2版。

<sup>③</sup> 在1951年2月13日政务院发布的《关于一九五一年农林生产的决定》中，就认为，努力提高单位面积的生产量，是农业增产的关键。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2页。在1952年2月15日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的决定》中进一步明确了“集中力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的基本方针”。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75页。

<sup>④</sup>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的决定》（1952年2月15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77页。

<sup>⑤</sup> 笔者曾专文探讨了在1958年的大跃进风潮中，正是来自中央层面的粮食高产期望，构成了地方干部浮夸的一个基本社会情势。见拙文：《“宁左勿右”的政治行动逻辑——皖西北临泉县浮夸风中的干部行为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0年第4期，第3～17页。



中央认可，至少是引起了极大的关注，<sup>①</sup>这间接说明了安徽“三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的想法。事实上仅仅过了两年，1956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在谈及农业生产时，就明确提出了要“多种高产作物。首先是增加稻谷的种植面积，应当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水源，多种稻谷”。<sup>②</sup>曾希圣及安徽省委1954年的决定在此时的中央看来，应该是颇有远见地了。

恰如曾希圣在“三改”专文论述中对沿淮地区的要求一样，多数地区临淮的现实决定了皖西北地区“三改”的核心内容就是旱田改水田、种植水稻。不过“三改”的实践似乎没有沿着当初的设想行走。在增产的压力下，改种水稻不再是沿淮地区的任务，而变成了整个皖西北地区都要践行的农业增产之路。从1954年开始，整个皖西北地区都被卷入了这场农业改革的历史洪流中。以本文所重点关照的临泉县为例，从1954年开始试种水稻316亩，到1957年时发展到16700余亩，1958年则猛增到30多万亩，1959年更是达到了50余万亩（实际种植面积为33万亩），改种面积不断扩大。而在皖西北这样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水稻种植经验的地区（至少临泉县的情形如此），大面积改种不仅颠覆了乡村人的种植习惯，更面临着诸如水源短缺、劳畜力短缺、工具短缺、经验缺乏等现实困难。<sup>③</sup>正因如此，稻改从其提出之日起，就遭到了来自乡村社会各种力量的抵制。可以说，现实中稻改面积的不断增长，并不意味着皖西北民众对稻改的欣然接受。恰恰相反地是，稻改在每一步的推进中，都曾遭遇乡村社会各种形式的抵制。只是在当时的社会情势下，这种抵制多是借助斯科特意义上的“弱者的武器”<sup>④</sup>来表达。或许正是由于乡村态度的

① 在曾希圣提出“三改”的最初阶段，全省“三改”还处在摸索期，不过已经引起了诸如《人民日报》这样的中央媒体之密集关注。从1953年4月至1954年4月，《人民日报》就有6篇报道关注了安徽的“三改”，其中有5篇都是在堪称“三改”开启年的1954年1~4月刊发。所有报道无一例外地对此项农业生产改革大加赞赏，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对安徽“三改”的态度。相关报道可参见：新华社：《今年度上半年治淮工程部分开工，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已有一百万民工到达工地》，《人民日报》1953年4月8日第1版；新华社：《安徽省沿淮地区今年实行农业生产改革》，《人民日报》1954年1月24日第1版；新华社：《安徽省举行第二次党代表会议，布置今年工农业生产等工作任务》，《人民日报》1954年3月30日第3版；湜辛：《作好农业生产先进经验的宣传》，《人民日报》1954年3月31日第3版；《安徽省淮河沿岸宿县阜阳等地，农作物改种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人民日报》1954年4月13日第2版；《要使班草湖成为富饶的米仓》，《人民日报》1954年4月14日第2版。

② 《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人民日报》1956年1月26日第2版。

③ 有关水稻改种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现实困难，笔者已另文论述，此不赘言。详细内容可参见拙文：《革命的理想与现实——1950年代临泉稻改运动的初步研究》（未刊稿）。

④ [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弱者的武器》，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293~367页。

犹疑，大量的抵制并未引起决策者对稻改运动的反思，<sup>①</sup>反而是在不断加码的稻改任务压力下，催生了基层政府以政治化的手段来推进之，从而形成了一幅略显悲壮的“水旱之争”图。

本文即是以临泉县稻改为基本参照，通过对稻改推进过程中政府与乡村不同态度的细致梳理，以及二者具体的博弈过程，来呈现这幅“水旱之争”图。在此基础上还会进一步将目光聚焦到小王庄，来具体观察一个村庄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农业改革中的命运转折，并由此简要探讨稻改与1959～1961年饥荒的可能关联。

## 一、“阳奉阴违”：稻改中的乡村立场<sup>②</sup>

皖西北地区因自然条件的限制，历史上并无种植水稻的传统，这也是当地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个基本种植经验。正因为这样，1954年稻改在临泉开始之后，即遭到了来自乡村的抵制，而具体的抵制形式则涵括了“改”的全过程。具体体现在毁坏秧苗、改种旱作物以及歧视稻改农民等方面，1958～1959年稻改任务急剧扩大之时，类似的情形尤其突出。

1959年6月17日，阜阳地委专门印发了《对发生毁坏稻秧破坏生产行为不良现象的通报》，以期制止全区前段时间频发的毁苗事件。而我们则可以透过这份通报，了解农民抵制稻改的具体情形。通报显示，“亳县、颍上、阜南、蒙城、凤台、太和等县汇报，目前已有毁坏稻秧破坏生产行为的不良现象发生。亳县观堂乡

<sup>①</sup> 实际上在提出“三改”的时候，曾希圣已经考虑到了改种的要求可能不适合当地的土质，不过依然认为为了抵抗灾害，可以想办法克服现实困难来推进改种。参见曾希圣：《论“三改”对防灾保收和争取丰收的重大意义》（1954年1月1日），《曾希圣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5页。

<sup>②</sup> 本文言及的乡村立场并不单指农民对稻改的态度，也包括一些基于农村现实出发而提出不同意见的乡村基层干部。关于如何衡量在政治高压下，乡村基层干部的行动选择，学界已有诸多讨论。李若建曾考察了不同层级的干部在对待公共食堂上的态度，指出当年确有一批基层干部奉行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与我们所发现的稻改中乡村基层干部的态度颇为相似。李若建：《权力与人性：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开放时代》2004年第1期，第83页。卢晖临也曾就大跃进时期乡村基层干部的行为作过讨论，在他看来，虽然基层干部可能会成为大跃进的推波助澜者，但原因在于他们被“一股强大的潮流所裹胁”。卢晖临：《“卫星”是如何上天的——乡村基层干部和“大跃进”》，《开放时代》2008年第5期，第124页。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在我们下文的叙述中体会到，被我们划归到乡村立场上的一些基层干部，一般都是诸如生产队长与生产组长这样的层级较低者。按照李若建的研究，这样一些人因为其与农村的利益关联，往往会对上级压下来的一些不切合实际的任务采取相应“对策”。在稻改运动中，这样的考虑确实是存在的，不过另一个需要指出的问题则是，类似生产队长、生产组长这样一个群体，因其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可能更为了解稻改的实际情形，这恐怕也是他们对稻改表示异议的基本出发点。



### 巴黎協定

巴黎協定，即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巴黎簽署的關於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的附加協定。該協定旨在加強歐洲煤鋼共同體成員國之間的經濟合作，並促進歐洲經濟的復甦與發展。協定涵蓋了煤、鐵、鋼、煤焦油、電力及運輸等多個領域。

協定規定，成員國應在煤、鐵、鋼、煤焦油、電力及運輸等領域實現自由貿易，並共同管理這些資源。此外，協定還設立了歐洲煤鋼共同體高級委員會，負責監督協定的執行。

巴黎協定的簽署，標誌著歐洲煤鋼共同體成員國在經濟合作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為歐洲經濟一體化奠定了基礎。

### 巴黎協定實施

巴黎協定自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簽署後，各國開始積極落實協定內容。各國政府紛紛成立相關機構，負責具體的實施工作。在煤、鐵、鋼、煤焦油、電力及運輸等領域，各國之間的合作日益密切。

實施巴黎協定，不僅有利於歐洲煤鋼共同體成員國之間的經濟合作，也有利於歐洲經濟的復甦與發展。通過實施協定，成員國可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生產效率，促進經濟增長。

然而，在實施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難。例如，各國在利益分配、資源管理等方面存在分歧。但通過協商與談判，各國最終達成了一致，協定得以順利實施。

### 關於青年服務的通知

本報社為加強青年服務工作，特制定以下通知。凡我報社青年，應積極參與各項服務活動，為社會做出貢獻。本報社將提供必要的培訓與支持，確保服務工作順利開展。

通知要求，青年服務工作應堅持服務大眾、服務社會的宗旨。青年應發揮自身優勢，在服務中鍛煉自己，增長才幹。同時，報社也將加強對青年服務工作的指導與考核，確保服務質量。

本報社將定期舉辦各類服務活動，如志願者服務、社會公益活動等。歡迎廣大青年踴躍參加，共同為社會的繁榮與穩定做出貢獻。

### 巴黎協定與青年服務

巴黎協定的實施，對青年服務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青年應積極參與協定的實施，為歐洲經濟一體化貢獻力量。通過參與協定實施，青年可以了解國際形勢，提高專業技能，為未來的發展做好準備。

報社將加強對青年參與協定實施的指導與支持。報社將提供必要的培訓與實踐機會，幫助青年提高專業技能，增強實踐能力。同時，報社也將加強對青年參與協定實施的考核與評價，確保服務質量。

青年應積極參與協定實施，為歐洲經濟一體化貢獻力量。通過參與協定實施，青年可以了解國際形勢，提高專業技能，為未來的發展做好準備。

### 旱地種水稻

旱地種水稻的步驟如下：

- (一) 翻地：農民使用農具翻耕土地，為種植水稻做準備。
- (二) 播種：農民將水稻種子播撒在翻好的土地上。
- (三) 澆水：農民澆水，使土壤濕潤，有利於種子發芽。
- (四) 管理：農民定期檢查水稻生長情況，進行必要的管理與護理。

《阜陽報》有關“旱地種水稻”的漫畫之一。





《阜陽報》有關“旱地種水稻”的漫畫之二。



## 早地种水稻

(一) 翻地

(二) 播种

(三) 除草

(四) 收获

(五) 运粮

早地种水稻，是今年农业生产上的一个创举。它的特点是：早、省、好。早，就是早播，早插，早收。省，就是省工，省种，省肥。好，就是好收成，好品质。早地种水稻，是今年农业生产上的一个创举。它的特点是：早、省、好。早，就是早播，早插，早收。省，就是省工，省种，省肥。好，就是好收成，好品质。

早地种水稻，是今年农业生产上的一个创举。它的特点是：早、省、好。早，就是早播，早插，早收。省，就是省工，省种，省肥。好，就是好收成，好品质。早地种水稻，是今年农业生产上的一个创举。它的特点是：早、省、好。早，就是早播，早插，早收。省，就是省工，省种，省肥。好，就是好收成，好品质。

早地种水稻，是今年农业生产上的一个创举。它的特点是：早、省、好。早，就是早播，早插，早收。省，就是省工，省种，省肥。好，就是好收成，好品质。早地种水稻，是今年农业生产上的一个创举。它的特点是：早、省、好。早，就是早播，早插，早收。省，就是省工，省种，省肥。好，就是好收成，好品质。

早地种水稻，是今年农业生产上的一个创举。它的特点是：早、省、好。早，就是早播，早插，早收。省，就是省工，省种，省肥。好，就是好收成，好品质。早地种水稻，是今年农业生产上的一个创举。它的特点是：早、省、好。早，就是早播，早插，早收。省，就是省工，省种，省肥。好，就是好收成，好品质。

《阜阳报》有关“早地种水稻”的漫画之一。



已发生5起，毁坏稻秧5亩。其中陈楼生产队两个生产组，均育9亩稻秧，而西组抓得进度快，已栽上38亩；而东组负责稻改的专业组长陈东香，因去年在鸣放中有反动言论被撤职，由生产队长降到稻改组长，心怀不满，工作消极，不愿多改水稻，只栽上春夏稻28亩。他怕大队检查，追查他与西组育同样多的稻秧而少栽10亩秧子的责任，故于6月3号夜会同副组长郭秉全、地主葛汤民等三人，把未栽完的7分稻秧子拔掉，埋在地下烂坏，企图以无稻秧子为借口掩盖其责任。该县魏岗乡后高庄生产组，在完成生产队分配给的稻改面积任务后，就不愿多种水稻，将多余的2分稻秧拔掉丢到粪池里沤肥。太和县赵庙乡连桥生产组，组长连广禄，对稻改一贯有抵触情绪，去年种的稻子就没认真管理，结果生产很坏，今年的稻子才栽到40亩就不愿多栽了，并在社员中散布完不成任务的消极情绪。他说：“今年的稻改面积比去年多一倍多，我看难以保住，不如就栽这些算了。”结果领着几个社员把能够栽2亩稻田的稻秧全部毁坏掉，埋在灌水渠道旁边的流水沟里。颍上县六十里铺乡马海大队的李庄、周庄、饶庄等三个生产队有稻秧33亩，十余天未浇过水，均已全部开裂，苗干死20%以上。已耙犁稻秧2.8亩，种上了旱粮作物。蒙城县乐土乡增光大队乐南生产队，为不愿再继续栽稻，已将因底肥不足和管理不善而发黄的1.1亩稻秧毁掉种上旱粮作物。凤台县马店乡刘古城村生产组，拔掉30多斤稻秧倒在粪池里沤肥。（原文如此——引者注）<sup>①</sup> 经由通报反映的情况可见，众多毁苗事件的动机可谓多种多样。像陈东香这样因为被降职而心怀不满者，对稻改的抵制究竟是缘于不愿意种，还是表达对上级处分自己的不满，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诸如陈东香这样的情形想必不会很多，通报中的多起毁苗事件更多还是出于生产的考虑。太和县连桥生产组毁掉稻秧就是因为前一年的水稻“生产很坏”，未能享受到稻改的好处，故而缺乏积极性。而至于“生产很坏”的原因，通报归结为主观上“没认真管理”，但实际情形可能要复杂得多。“没认真管理”究竟是不愿还是不能，通报并未透露。其实对多数皖西北民众而言，改种水稻是一件新事物，他们在多年的农业生产中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当然，相比于当地长期种植的其他作物，水稻种植的工序也太过复杂，而且对水环境的要求又极高，这无疑也会影响他们的改种积极性。所以说，农民们的“没认真管理”可能既有经验缺乏的客观原因，也有太过麻烦的主观因素，而诸如环境（水）限制的因素同样需要考虑。连广禄“我看难以保住”的说法虽被通报认定为“散布完不成任务的消极情绪”，但事实上可

<sup>①</sup> 阜阳地委：《对发生毁坏稻秧破坏生产行为不良现象的通报》（1959年6月17日），临泉县档案馆藏，全宗号3，目录号2，案卷号165（以下略写临档3-2-165）。



能有着改种太多无法取得好收成的现实忧虑。颍上县马海大队李庄、周庄、饶庄三个生产队就是因稻田开裂，苗干死而将稻田犁掉，蒙城县乐南生产队同样是因为稻秧发黄而将其毁掉。经由通报还可以发现地是，无论是马海大队的耙犁稻秧，还是乐南生产队的毁掉黄苗，腾出的土地并没有被农民闲置，而是及时改种了旱粮。这无疑也说明，农民们的毁苗行为并非出于一般意义上的生产不积极，而是结合实际情况对究竟种什么的一种自主选择。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了临泉县黄岭乡侯寨村生产组长侯来山身上。1959年大队分配稻改任务43亩，队里仅完成12亩，尚有31亩未栽。6月13日，生产组长冯德立从稻田地回来对侯来山说：“稻芽子地干了，上级知道了能不处理咱吗？”侯即说：“反正提水工具少，锄了拔扳了（当地土语，意为拔掉扔了——引者注）”。当夜侯即带领5个社员拔掉稻芽子1.66亩，并犁掉稻田8亩，结果以毁坏稻田被拘留。<sup>①</sup>很显然，侯犁掉稻田并非出于主观上的故意破坏，而是在稻地已经干裂，提水工具又缺少的前提下，一个很无奈的选择。类似这样的情形显然都是对连广禄“我看难以保住”的最好辩护，同时他们改种旱粮的行为，也印证了我们对毁苗多是基于客观原因而非主观原因的分析。

不管出于怎样的原因，毁坏稻田都有点直接对抗稻改的意味，最终难免获罪。也正因为直接抵制的成本较高，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相对较少的。而对多数乡村人来说，对稻改任务的“阳奉阴违”则更为普遍。这种“阳奉阴违”体现在尽管领受了水稻种植任务，但却在私下里进行“改种”，将原计划种水稻的地种上了他们认为保收的秫秫等。临泉县委1958年检查稻改进度时，就发现黄岭区黄明社将20亩稻田种上了高粱（即秫秫——引者注）。<sup>②</sup>周边其他县也发生过类似情况，“涡阳义门公社，分给华光大队500亩稻子，该队只打算种300亩。颍上刘集公社刘圩子生产队，在已打好埂的40亩稻田内种上30亩高粱。”<sup>③</sup>“阜阳苏集区灯塔四社，在已确定的稻地偷种秫秫50亩。该区唐集乡辽远社大庄4个队，有3个队已将打好埂的地种上秫秫，第八队育秧的地都没有了，第七队原计划种一亩秫秫，现在种30亩。原计划种45亩春稻，现已种上秫秫。凤台县官店乡三星社12队将已打好的田埂挖掉4亩种高粱，颍桥区永光一社叶超润将没有水源的20多亩作为改种水稻（原文如此——引者注），将有水源的80亩地种上了秫秫。”<sup>④</sup>阜阳地委将这种现

① 临泉县委：《对姜寨、黄岭两起破坏稻秧案件的通报》（1959年6月17日），临档3-1-219。

② 临泉县委农工部：《临泉县稻改干部会议总结报告》（1958年5月9日），临档121-1-26。

③ 阜阳地委：《关于当前稻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意见》（1959年5月5日），临档3-2-165。

④ 阜阳地委：《关于当前稻改工作中存在几个问题的通报》（1958年4月26日），临档3-2-146。





此。为了帮助皖北农民改种水稻，省委从皖南调了大批稻农到皖北帮助稻改。1956年2月22日，阜阳专署即从芜湖邀请种稻能手百余人到阜阳、临泉、蒙城指导稻改。<sup>①</sup>作为掌握水稻栽培技术的稻农，照常理而言，理应受到当地干群的欢迎。但由于基层干部、群众对于稻改的抵制，所以稻农也受到了牵连。在他们眼中，稻农俨然成为稻改的化身，他们与稻改一起都成了乡村的抵制对象。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辱骂稻农的现象，“个别地方不尊重他们，有的社员叫他们蛮子，有的甚至叫他们蛮羔子、蛮舅子。甚至有个别干部听到社员侮辱他们，不但不制止，反而也跟着社员一起辱骂他们，这样影响很不好。”<sup>②</sup>其实不仅临泉如此，皖北其他地方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凤台县阚町区公路乡驻点干部潘林轩骂稻改农民，致使稻改农民情绪不高，影响了工作。据了解，稻改农民中，目前思想不安，坚决要求回去的约800余人，尚缺被子396条，棉袄961件，棉裤1255件，有的因衣服稀薄，不足御寒而自行返回的就有400余人。”<sup>③</sup>如果说社员辱骂稻改农民是蛮羔子、蛮舅子尚且可以看做是皖北农民听不懂皖南方言，是地区方言差异的反映，那么干部、尤其是驻点干部也一起辱骂稻农，就有点不寻常了。其实除了这些直接的歧视，我们还可以透过稻农在当地的生活境遇来体会民众对他们的态度。作为南方人，皖北的严寒是稻农无法忍受的，因为这里的冬天要比皖南冷得多。来到皖北后，稻农面临的第一个棘手问题就是缺少过冬的棉衣、棉被。在上述材料中就提到，有800多人因缺少棉被、棉袄、棉裤要求回去。而实际上，稻改农民作为传授稻改技术的人才，上级一直是非常重视的，也不断要求基层干部积极帮助稻农解决生活问题。但这份材料中所反映的基层干部显然并未如上级所希望的那样给予稻农们应有的帮助，甚至“仍有个别区乡社干部对稻改农民生活、生产中遇到的困难，熟视无睹。”<sup>④</sup>当然，稻农们的遭遇应该不会是他们本人和当地人结下了什么梁子，而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实在不受地方的欢迎。在多数农民眼中，稻农就是稻改的象征，抵制了稻农，稻改就会无以为继。为此，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将稻农退回去的现象。“阜阳新桥红光社，原分配4个稻农，经划社后要求退回3人，也不给做饭吃；蒙城县现360人，打算只留109人，其余要求退回南方，有的私跑回家。据统计原调进4328人，私跑和不符合条件回去的共1681人，现有2647人”。<sup>⑤</sup>经计算，阜阳专区退回稻农的

① 阜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编：《阜阳地区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年，第43页。

② 阜阳地委农工部：《阜阳专区调进稻改农民情况统计》（1957年3月4日），临档3-2-118。

③ 阜阳地委：《关于做好请进稻改农民工作的指示》（1956年12月27日），临档3-2-94。

④ 阜阳地委：《关于做好请进稻改农民工作的指示》（1956年12月27日），临档3-2-94。

⑤ 阜阳地委农工部：《阜阳专区调进稻改农民情况统计》（1957年3月4日），临档3-2-118。

比例高达 39%。甚至有些干部将稻农派去支援新疆，“城关镇不经请示即批准稻农支援新疆。”<sup>①</sup>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因为稻农要落户到当地而打击稻农的现象。“如插花区有一寡妇和稻农恋爱，经乡批准了结婚，社内不给救济、不发粮票、不给伙食吃。”<sup>②</sup>虽然乡里已经批准了稻农可以落户当地，但是社里对上级的决定却并不认同，这恐怕与其对稻改的态度有很大关系。正是因为对改种水稻不抱太大希望，所以当有稻农打算长期留在本地时，社领导采取了抵制态度。稻改是否成功还不可预期，但增加一个人就使本已不多的口粮多了一个人来分，这确是很现实的事情。

## 二、双面水稻——革命者与现行犯

尽管在改种水稻的过程中，遇到了群众、乃至基层干部的重重阻力，但上级领导们依然坚信早改水、改种水稻是提高农业产量，改变淮北落后面貌的一个重要手段。只是，稻改运动在实践中的具体贯彻毕竟离不开民众、尤其是干部的配合。所以为了更好地保障稻改运动的推行，各地在实践中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操作手段，以应对其与农民的“水旱之争”。我们在临泉县的稻改运动中，发现这种操作手段主要包括将稻改任务“政治化”、大辩论、现场评比、建立稻改专业队四种方法。

底层对于稻改的质疑之声显然对于稻改运动的推广十分不利，于是县委通过将稻改“政治化”的方法，阻塞了质疑稻改的通道，迫使社会大众在思想上接受稻改，尽管这种接受有可能只是“阳奉阴违”。在总结 1958 年稻改运动的经验时，临泉县委即是如此定义稻改运动的。“1958 年我县是将稻改任务作为一个政治任务提出来的，因此今年各级党委都是把稻改工作作为农业生产中一项头等重要的任务来完成的。”<sup>③</sup>稻改被确定为一项政治任务后，就走上了神坛，不再有讨论的余地。而实际上，旱田改水田、改种水稻作为一个生产方面的变革，它的成功与否应是可以讨论，并进而改正的。但是当稻改被“政治化”后，这一讨论的余地失去了。稻改任务的政治性质，也成为领导惯用的一面挡箭牌。在 1959 年长官公社书记命令下边抄掉出苗的豆子种水稻的理由就是这是一项“政治任务”。<sup>④</sup>而稻改在成为一项

<sup>①</sup> 临泉县委：《关于个别地区对使用稻农不合理、不尊重稻农的通报》（1959 年 8 月 23 日），临档 3-2-165。

<sup>②</sup> 阜阳地委农工部：《关于稻改农民当前存在问题及解决意见的报告》（1957 年 3 月 8 日），临档 3-2-118。

<sup>③</sup> 临泉县委农工部：《临泉县 1958 年水稻栽培总结》（1958 年 11 月 17 日），临档 121-1-26。

<sup>④</sup> 高大文：《师范泉河小组讨论》（1961 年 8 月 19 日下午），临档 3-1-320。







政治任务后，也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新功能——基层干部政治觉悟的测试器。积极配合稻改是忠于革命的象征、可以成为一个革命者的典型，而消极对待则有被打为现行犯的危险，稻改在这样的背景下呈现出了“双面”特征。

艾亭区在1959年即是以栽种水稻的进度来衡量一个积极分子是否符合入党标准的。“通过党的中心工作，大力培养考察好红专积极分子，审查登记好积极分子和建党对象，教育提高他们在艰巨复杂的任务面前交代任务，让其完成。如积极分子黄玉英同志在4月17日带动劳力11人栽春稻15.6亩，比原来日进度增加到8.5亩，工效提高60%。并经过一定的考验，具备入党条件的建党对象，接收一批这样既能做好建党工作又能完成和推动中心工作。”<sup>①</sup>在黄玉英的率领下，水稻栽秧工效提高60%，这成为黄玉英具有革命性的一个重要象征，入党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除了可以入党，稻改搞得好，还可以当模范。1960年艾亭人民公社评出了365个模范人物，其中有一等模范94人，二等模范105人，三等模范66人。这些模范人物主要是在粮食征购、稻改、收贷、农副产品收购、工改、食堂、治安七个方面做出成绩的。搞好稻改当模范，也就成为一些基层干部改种水稻的动力。临泉县中心社就提出了“不怕苦、不怕累，水稻成后比模范”的口号。<sup>②</sup>仿佛只要不怕苦、不怕累，就可以搞好水稻。这就把本来受主、客观条件制约的水稻种植简化为只受主观条件的限制。这样的简化，也使基层干部在面临上级的批判时，无法再以客观条件所限来为自己辩护了。而实际上，改种水稻受到水源、劳畜力、稻种、工具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是不能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但在稻改任务政治性质确立之后，本来很纯粹的生产问题转变为党性的考验，这也就极易使稻改运动偏离正常的轨道。

如果说水稻任务完成得好，是觉悟高、革命的象征；那么消极对待稻改则有被撤职、甚至成为现行犯的危险。1955年3月4日，安徽省公安厅就曾经指出，对于散布稻改谣言的破坏分子要予以打击。“保卫农业生产改革运动顺利实施。首先是要积极地宣传推行‘三改’办法的好处，讲清‘三改’具体内容。其次，了解群众思想情况，搜集具体反映，提供党委研究，加以解释，以克服群众保守和落后思想。第三、注意防止谣言，一有发现，及时追查，公开揭发，教育群众，以缩小敌人谣言市场，扩大我之宣传阵地；但在处理谣言时，严格区别落后群众的不满言论

<sup>①</sup> 临泉县艾亭乡委员会：《艾亭乡委员会“对刘心圩大队党总支关于建党工作准备情况和培养红专积极分子的几点经验的报告”》（1959年6月10日），临档3-2-179。

<sup>②</sup> 临泉县委农工部：《临泉县1958年水稻栽培总结》（1958年11月17日），临档121-1-26。



和反革命分子的造谣破坏，对前者应坚持说服教育，对后者应予打击。”<sup>①</sup> 尽管公安厅提出要区别对待落后群众的不满言论与反革命分子的造谣破坏，但是在一个阶级斗争主导的政治社会中，落后群众的不满言论与反革命分子造谣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极易混淆。<sup>②</sup> 周晚山自杀事件即是这种界限被模糊造成的悲剧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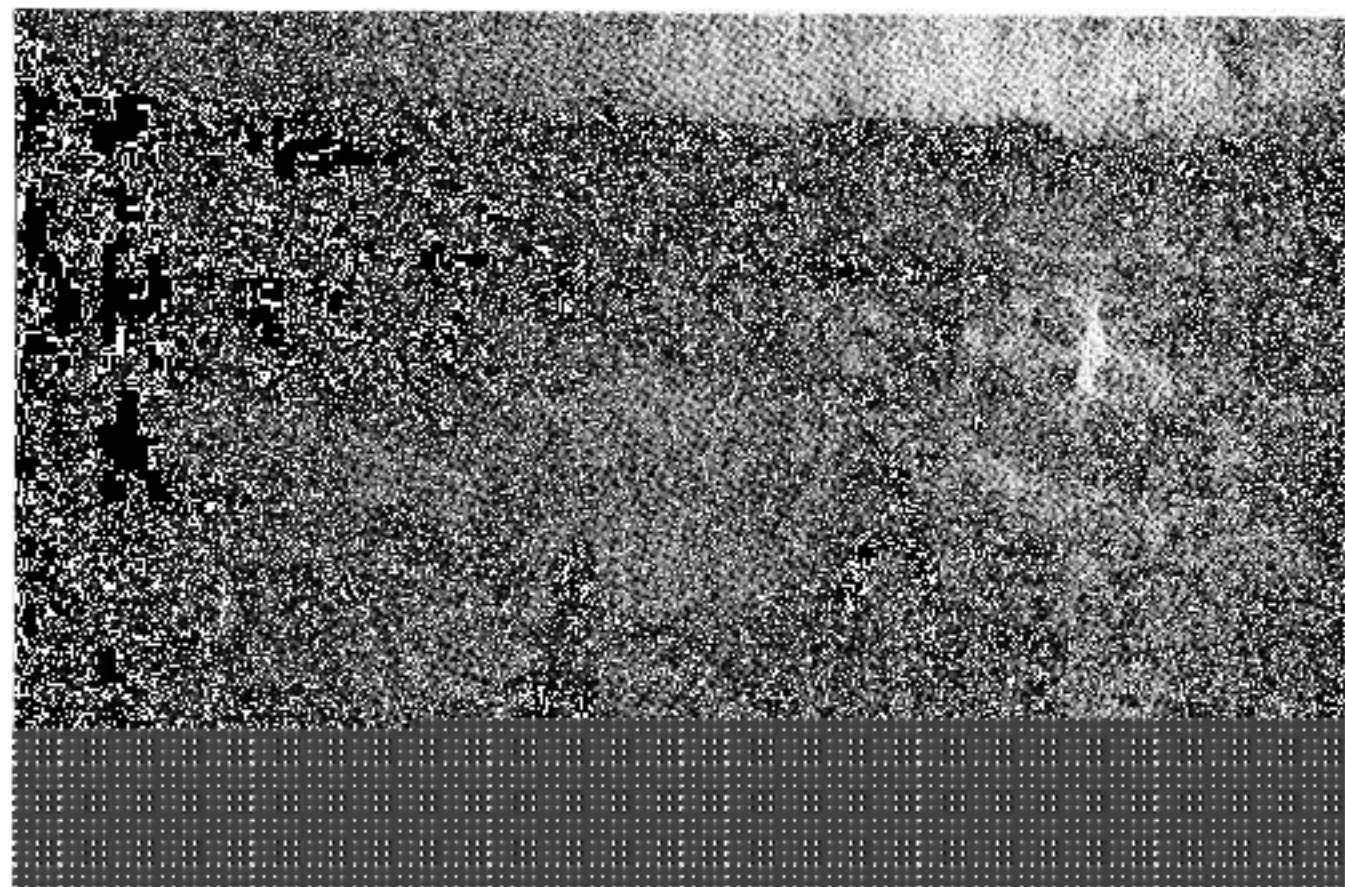
周晚山是临泉县化集区谢集乡永远高级社周圩村的一个老汉，自杀当年65岁。土改时家里有四亩九分地，被划为中农成分，应当属于革命团结的对象。对于合作社，周一一直不是很看好，直到1956年10月份仍然是一个单干户，这在村内是很少见的。为了生产方便，周与本村的周备山合伙买了一头牛。一天早上，周向村里的另外一个单干户谢四借了一头牛，两头牛合到一起犁豆茬。但让周晚山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正在地里犁地，本村人陈加才却跑了过来将牛卸掉，不让犁地。周非常气愤，要知道陈加才是本村的地主，怎么也敢欺负到自己头上呢！一问之下，才知道陈加才是奉队长周振德之命来卸牛的。得知陈是奉队长之命而来后，周晚山只能是打掉牙往肚子里吞，一句话也不敢说了。谁让自己是单干户呢！只能忍了。但之后发生的一件事，却使周绝望了。周晚山地里的豆茬被社里犁光了，原来周的地与社里的地相邻，周地的地身与社里地的地头挨着。社里犁地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将周的豆茬犁光了。直到此时，周才意识到继续坚持单干的困难。于是在无奈之下，周晚山连夜写了申请要求加入合作社。在合作社待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周晚山就后悔了。于是在1957年2月份他向社里提出要退社。但社里认为周晚山写过申请，不应该退社，如果实在要退社，原来的那块地也不能给他了，只能将一块距离本村4里地远的另外一块地换给他。周当然不愿意，合作社也不让步，开始在周原来的地中打稻田埂子。

社里的做法让周又气愤、又着急，因为自己的地没有打算种稻子，是要种麦子的。打了稻田埂还怎么种麦子呢！于是一怒之下周将“自己地里”的稻田埂扒了六丈多远。在周看来，扒掉稻田埂的行为只是要宣示自己对于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但让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举动却使自己成为了社领导眼中的落后分子、现行犯。

3月22日永远高级社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如何打击现行犯。主持会议

<sup>①</sup> 安徽省公安厅党组：《关于春夏季大生产运动中保卫工作的意见》（1955年3月4日），临档3-2-56。

<sup>②</sup> 满永的研究认为，“反革命”本身就是一个主观性极强的概念，是难有客观标准的，而这种主观性则催生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政治社会。见满永：《政治社会的初现——镇压反革命与1950年代初的皖西北乡村社会》，《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215～221页。而在我看来，政治社会同样也是稻改推进的一个最主要社会情境。



《阜阳报》1960年3月6日第二版有关稻改的图片报道。

的闫锦香副乡长要求大家汇报治下的落后分子。随后10名落后分子的名字被列了出来，周晚山便是其中之一。当晚，周与其他落后分子一起被带到了社里。在审讯过程中，周的主要罪名就是“为什么扒稻田埂子、破坏农业改革”。在周晚山看来，自己并没有破坏农业改

革的想法，也就没有认罪。由于认罪态度不好，周被副主任陈宜甫等人打了几耳光。被打了几下，这在周看来还不算什么。但两天后的一次公开批判，却让周觉得丢尽了脸面。25号周与其他现行犯一起被带到了有11个村群众参加的大会上。在会上，周作为现行犯受到了公开批判。众目睽睽之下，周感觉丢尽了老脸。回家后不断对别人说：“这次人叫我丢光了，没有脸了，还不如死了。”发现周有自杀倾向后，社干部当然不能坐视不理，专门安排人看着周以防他自杀。但最终周还是在4月22日上吊自杀。<sup>①</sup>因为扒了一段六丈多远的稻田埂而被视为“破坏农业改革”的典型，从而被作为现行犯予以批判，这最终导致周晚山走上了不归之路。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度责备社干部，他们自身也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张治宣是临泉县杨集大队仓屋生产队的队长。1960年公社分配给仓屋生产队的水稻种植任务是130亩，接到任务后，张忧心忡忡，不想种那么多的水稻。他担心水稻不保收，农民没有粮食吃。所以尽管已经培育了5.6亩的秧苗，但只种了8亩水稻。看着这余下的秧苗，张又是一阵忧虑，担心上级领导来检查时发现这些没有栽种的秧苗。为了免除后患，张决定毁掉秧苗，先是自己犁掉了1.8亩，又派社员马居三犁掉3.3亩。在他还没有来得及毁掉所有秧苗之前，公社就发现了他的这一“罪行”。于是张被作为破坏稻改的坏典型带到了公社的扩大干部会议上，并被当场撤职，逮捕法办。<sup>②</sup>张治宣的经历告诉我们，稻改运动搞得好与坏，不仅关系到官员的政治

<sup>①</sup> 化集区委：《化集区谢集乡永远高级社实施违法的调查报告》（1957年5月7日），临档3-2-132。

<sup>②</sup> 阜阳地委：《对发生毁坏稻秧破坏生产行为不良现象的通报》（1959年6月17日），临档3-2-165。



生命，甚至影响到他们的身家性命。或许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压力，周晚山扒稻田埂的行为在基层干部眼中才变得如此严重，因为它会影响到稻改的进度，而进度又决定着自己的前途与命运。永远社的干部们将周晚山定为现行犯既是对周破坏稻改的惩罚，也是在显示自己维护稻改的决心，从而为自己赢得政治上的主动。事实上，周晚山扒稻田埂的用意不太可能是对抗稻改，更多地是想表达对社里不让退社的愤怒。而社里以“破坏农业改革”的罪名将其定为现行犯，则显示了此时在基层干部们看来，破坏稻改要比破坏合作化严重得多，否则完全可以以一个更合“逻辑”的破坏合作化罪名对其进行惩罚。<sup>①</sup>当然，周晚山被以“破坏农业改革”定罪，也间接说明了至少在1956年的永远社，稻改对干部造成的压力远比合作化要大。

不过常令决策者苦恼的是，即便将稻改定性为一项政治任务，依然会有人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这对稻改的贯彻显然不利。为了解除基层干部对稻改的疑虑，临泉县委采取了大辩论的方式。1958年稻改计划修订后，化集区在一次摸底中发现，干部对稻改工作十分抵制。“在2465名乡、社干部中，思想认识正确，接受任务快，决心完成任务的有619人，占25.1%，怀疑保守的1602人，占67.4%，思想抵触，公开反对的186人，占7.5%。为了解决这一思想问题，县委指示区委开展了以反对右倾保守为前提，以生产革命为中心的大鸣大放辩论。在基委委员43人中，组织学习稻改文件59次，辩论稻改问题51次，辩论具体人6个。在34个农社，131个社干中，召开辩论会127次，批判辩论了51个干部。在1087个生产队，2251个干部和党员中，组织辩论生产改革问题51次，组织到稻改成绩较好的地区进行参观访问46次。”<sup>②</sup>辩论的效果可以参见表一：

表一：化集区大辩论前后干部思想变化情况表 单位：%

思想认识	辩论前	辩论后
积极的	25.1	92.8
怀疑的	67.4	6.25
抵触	7.5	0.95

说明：此表系根据临泉县1958年水稻栽培总结自制，临泉县委农工部：《临泉县1958年水稻栽培总结》（1958年11月17日），临档121-1-26。

<sup>①</sup> 1956年，在安排部署工作时，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运用检察工作职能，从法律上保障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顺利发展”的文件精神，特别强调了要正确地同一切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违法犯罪现象进行斗争。参见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司法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62页。很显然，永远社并未遵照省检察院的精神，从破坏合作化运动的层面来考虑周晚山的行为，这应该与基层干部们在现实中所承受的稻改压力有很大关系。

<sup>②</sup> 临泉县委农工部：《临泉县1958年水稻栽培总结》（1958年11月17日），临档121-1-26。

对比辩论前后的变化可以发现，干部思想转变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这可能与对“具体人”的辩论、批判有很大关系。另外，针对具体人的辩论比例是很高的。在基委委员中辩论具体人6个，占总数的14%。在社干部中，辩论具体人51个，占总数的39%。由对具体问题的辩论到针对具体人的辩论，无疑强化了辩论对于干部的威慑力。当某个抵触稻改的“具体人”被辩论时，其他干部也会想象到，如不转变自己对稻改的态度，就很可能成为下一个被辩论的“具体人”。在这种警示作用下，一些原本思想抵触的干部不但改变了抵触态度，而且变得异常积极。同东生产队队长单国斌，在辩论前对扩大稻改面积有非常严重的抵触情绪，辩论以后不但不再抵触稻改，而且非常积极。会后两昼夜都没有睡觉，完成了全队52亩的稻改任务。<sup>①</sup>单思想转变之快，实是让人惊讶。但仔细想来，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由于之前对稻改的抵触态度，单国斌在辩论中应该是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至于单是否成为被辩论的“具体人”，我们不得而知。但亲眼目睹与自己态度相同的干部受到辩论，无疑会催生单的引以为戒之感。很显然，如果不加快思想转变的速度，那么自己就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具体人”。在这种情况下，转变思想并且异常积极搞好稻改，就是单国斌挽回先前“落后”印象的唯一方法。实际上，单国斌的瞬间转变是较为普遍的，姜寨公社也发现了类似倾向，“受批判的同志也更加积极，庙岔大队杜庄支部书记陈安同志原来对抓水稻不重视，把稻改专业队搞午收，会上受到批判后，把其他工作交给副书记，并表示决心说：‘不完成稻改任务，累死也不再回来。’带领36人专业队，铺盖行李，搬到工地，从七点钟一直干到上午12点钟，五个钟头不歇一会，共活田3.8亩，栽稻3.7亩，保证猛战五昼夜完成45亩稻改任务。”<sup>②</sup>

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干部即使对稻改有意见也不敢轻易提出。单庄支部书记陈保均在1961年承认，“五九年咱知任务大，就不敢说，说了怕挨辩论，戴‘右倾’帽子。”<sup>③</sup>而时任安徽省副省长的王光宇在晚年反思三改时也曾指出，“‘三改’在推行过程中也出现严重问题，1、在思想酝酿还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要求过急过快，带有一些强制性；2、不能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与对‘三改’有不同意见的人对立

<sup>①</sup> 临泉县委农工部：《临泉县1958年水稻栽培总结》（1958年11月17日），临档121-1-26。

<sup>②</sup> 姜寨公社委员会：《关于全体党团和组长以上的扩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1960年6月9日），临档3-2-225。

<sup>③</sup> 临泉县委检查组：《对单桥大队稻改情况调查》（1961年9月20日），临档121-2-29。



起来，将他们说成是反对‘三改’，并在反右派斗争中将这些人打成右倾、右派分子，造成严重后果。”<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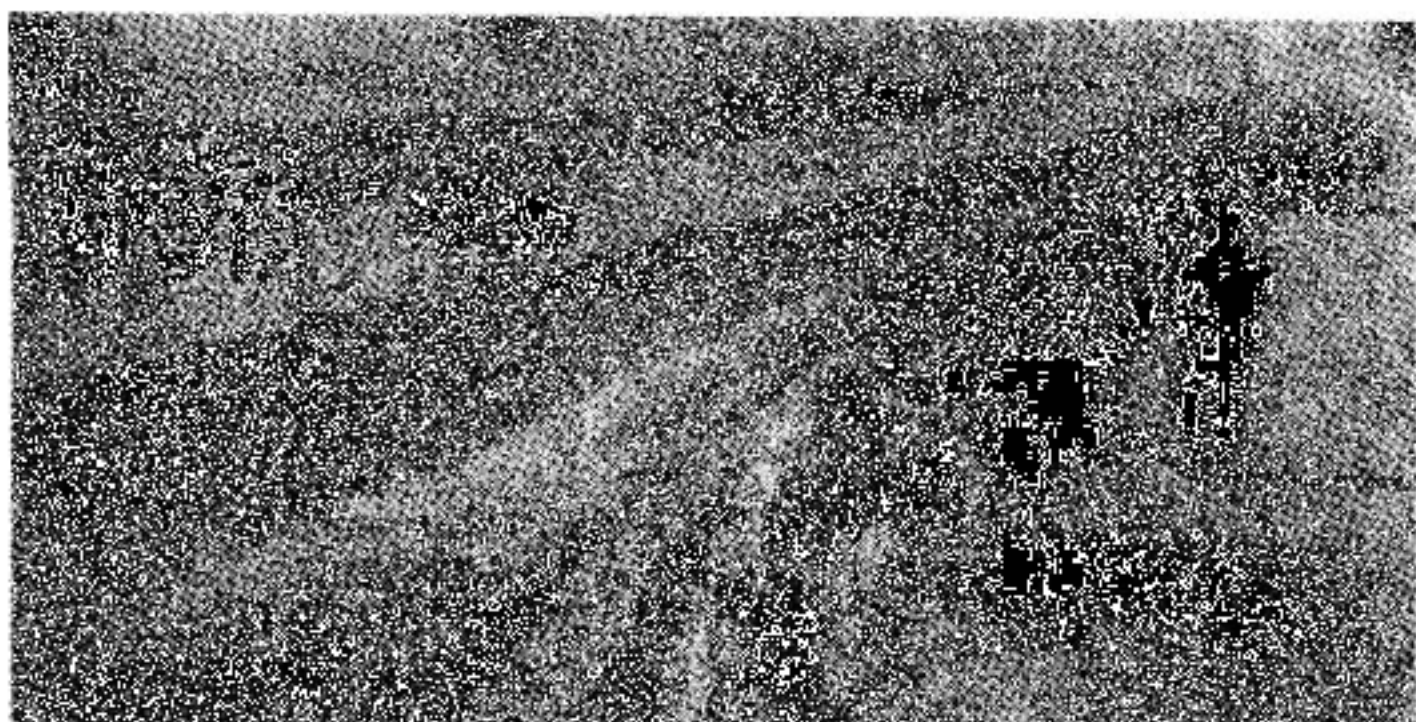
除了辩论外，现场评比也成为改变干部思想认识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当运动遇到困难的时候，县委领导往往以现场评比会上的典型来论证稻改的可行性，从而推动其发展。1959年化集公社的水稻栽秧进度比较慢，公社领导十分着急。为了加快栽秧进度，公社于5月22日在先进大队——马郢大队召开了水稻栽秧现场会。参加会议的既有县领导、又有公社干部、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生产组长、社员代表。在马郢大队进行现场观摩、听取先进经验介绍后，与会人员马上表示了对先进经验的认同，并保证限期完成水稻栽种任务。“谢集大队的队长胡振芳在会上表示要学先进，下决心夺先进，现在看进度，秋后比质量，他们提出保证25号要完成稻改任务。该大队的大孙庄原计划稻改任务36亩，在现场会上他们只安好家20亩，参加学习后他们也表示态度，坚决完成。现在已全都安好家，进行栽秧。栽秧进度最慢的谢集大队前进点参观实习后，连夜召开200多人的组长、专业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进行了再次全面发动，第二天一明他们都全面出动。”<sup>②</sup>前文我们曾论及，在稻改被定性为一项政治任务后，上级将稻改任务完成的好坏基本归结于基层干部的主观努力程度，客观条件被忽视。所以在参观了马郢大队的栽秧进度后，与会人员已经意识到自己无路可退了。向先进大队看齐，加快栽秧进度，完成任务是唯一的选择。而谢集大队队长胡振芳提出的“现在看进度，秋后比质量”的口号读来颇值得玩味。可见，胡振芳对上级领导意图的领会是非常透彻的。其实，领导现在需要的可能只是一个数字，至于栽秧的质量就是秋后的事情了，这在当下显然是顾不上的。在县委领导面前，公社干部们迫切需要看得见的数字来体现自己在稻改工作中的表现。

1961年在三级干部会议上，老集公社委员会书记金福胜承认，“在1960年，王桂田向我汇报水稻400亩，我未实际调查，由于我的思想在脑子里支持，说有600亩，叫他们把牌改成600亩，还叫我批评一顿，说他保守。”<sup>③</sup>在解释自己为何强迫属下虚报200亩水稻面积时，金福胜强调是因为自己思想在脑子里支持。换句话说，也就是金福胜主观上认为应该会有600亩的水稻种植面积，所以才强迫属

<sup>①</sup> 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20页。

<sup>②</sup> 化集区委：《关于在马郢大队召开现场会议的情况报告》（1959年5月26日），临档3-2-183。

<sup>③</sup> 金福胜：《老集区三级干部会议检查报告》（1961年9月15日），临档3-1-333。



《阜阳报》1961年3月11日第一版有关稻改的图片报道。

下将牌子改成了600亩。可见，不仅一般干部面临着报数字的压力，像公社书记这样的领导同样会有如此压力。

在1961年批判宿松县委书记处书记费成全的材料中，曾经提到了这样一件事。“60年5月

9日早稻抢插因进度缓慢，费在电话上骂道：‘他妈的，你这几个书记统统都给我滚下去，不管怎样，重报’。公社副书记罗良义报少了，费令罗背条被到公社反省。公社书记李春秀在电话中未听清费的讲话，连问几遍，费又说：‘我碰到你们这些书记算倒了霉’。次日费却得意洋洋向李春秀说：‘你们这些书记真不聪明，今天是10号，是个关口，你报1600亩向县委难过关呀，后我卡了一下，报2400亩还有个差不多，不然是过不了关的。’<sup>①</sup>公社书记罗良义承受着费成全的压力，而费同样要面临县委的压力。这种压力是一级一级传递下来的，无论是生产队干部、大队干部、还是公社干部、乃至县委、地委干部均要过这一数字关。

解除干部思想障碍后，只能保证干部表面上接受稻改，不再公开抵制，但不能保证他们真正投入到稻改运动中去。为了保障稻改在基层得到真正贯彻，阜阳地委要求各地建立稻改专业队，以保证稻改任务的完成。“各级党委应加强对稻改工作领导，确定专人负责，建立健全稻改专业队的组织。已建立的应加强领导，未建立的应迅速建立，并要派责任心强、对稻改工作热心的干部、党团员参加专业队领导，钻进去、踏实工作，领导生产，参加生产，采用划片包干办法，一包到底。”<sup>②</sup>临泉县黄岭公社在1959年就因未建立稻改专业队而受到地委的批评，“临泉黄岭公社大部分队、组干部未亲自领导研究，并未建立专业队。如14大队柿园生产队秧田管理上采取两天一换班和一天一换班，造成烂秧死苗。”<sup>③</sup>在地委的要求下，各地纷纷投入大量人力建立专业队进行稻改。临泉县1959年抽出了70%左右的劳力，

① 安徽省委：《宿松县费成全的材料》（1961年6月3日），临档3-2-245。

② 阜阳地委：《关于当前稻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意见》（1959年5月5日），临档3-2-165。

③ 阜阳地委：《关于当前稻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意见》（1959年5月5日），临档3-2-165。



组成稻改专业队，突击搞水稻。<sup>①</sup>而稻改专业队建立之后，是不允许从事其他生产活动的，姜寨公社庙岔大队杜庄支部书记陈安 1960 年就因让稻改专业队搞午收，而受到了批判。<sup>②</sup>黄岭公社也存在类似问题，“1960 年稻改 155 亩，抽 70% 劳力，实际参加 500 余人，群众要求抽出部分劳力锄秫秫未允，378 亩秫秫一锄未锄，结果造成减产，稻子也减产三万五千余斤。”<sup>③</sup>稻改专业队建立后，对于农村本已不足的劳动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浪费。县委书记处书记庞培庆在 1961 年的检查中承认，“搞水稻也是强调以大队为单位搞稻改专业队，集体搞，这样劳动力浪费过多。”<sup>④</sup>稻改专业队的建立，加剧了水稻与其他旱作物之间在劳力需求方面的紧张关系，这样的紧张，在 1959 年的秋旱中体现得尤其突出。

### 三、保水还是保旱？1959 年的两难

以上的论述，主要呈现的还是乡村与政府在稻改推进中的博弈过程。乡村的态度体现的是对“水”的抵制，而稻改推动者对这种抵制行为的应对，也体现了他们以“水”抗“旱”的决心。可以说，这时的“水旱之争”还主要体现在民众与政府对水稻的不同态度上，并未涉及到“旱”与“水”的直接相争。而这样的情形在临泉县 1959 年的秋旱中发生了变化，“水”“旱”关系开始由原来的对“水”的不同态度转成了直接相争，从而也就为人们呈现了一幅更为清晰的“水旱之争”图。

临泉县 1959 年遭遇严重旱灾。“自 6 月 1 日至 9 月 1 日，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只下了四次小雨，平均雨量 50 ~ 122 公厘（毫米），天气突热，气温高达 40 度左右。地温高达 60 度左右，日蒸发量高达 20 公厘（毫米）左右。”<sup>⑤</sup>此次旱灾也被很多人解释为临泉三年饥荒的一个重要诱因，但是对比其他年份可以发现，干旱在当地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该县“全年雨量分布不均，多集中于暴雨季节，多季缺雨，年平均雨量为 847 公厘（毫米）。”<sup>⑥</sup>在 1953 年 6 ~ 8 月份降雨 365 公厘（毫

① 临泉县委：《临泉县农业生产领导的经验（初稿）》（1959 年），临档 3-2-197。

② 姜寨公社委员会：《关于全体党团和组长以上的扩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1960 年 6 月 9 日），临档 3-2-225。

③ 地委下放干部工作组、黄岭公社刘火庙大队总支：《临泉县黄岭公社刘火庙大队整风整社工作总结报告》（1961 年 5 月 10 日），临档 3-2-248。

④ 庞培庆：《自我检查》（1961 年 8 月 17 日），临档 3-1-316。

⑤ 临泉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临泉县 1959 年抗旱总结》（1959 年 9 月 30 日），临档 69-1-26。

⑥ 临泉县委：《关于我县河网化目前行动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1958 年 11 月 27 日），临档 3-1-158。

米), 旱象面积超过 189 万亩。<sup>①</sup> 之前的历次旱灾均未导致大面积饥荒的出现, 只是在 1959 ~ 1961 年才发生了三年大饥荒。这种不同时期的反差应该与 1959 年水稻面积的急剧增加有很大关系。因为相比于旱作物而言, 水稻的需水量要多得多, 我们从下表不同作物的需水量中或许能够体会出稻改对旱灾的加剧效应。

表二: 农作物需水量调查表<sup>②</sup> 单位: 立方米

作物种类	土质	需水量					总需水量
		分月需水量 (需水量 / 月份)					
小麦	黄垆土	60/10	30/3	60/4	30/5		180
	黑垆土	60/10	30/3	60/4	30/5		180
黄豆	黄垆土	30/6	80/7	30/8	30/9		170
	黑垆土						
秫秫	黄垆土	30/3	20/4	30/5	30/6	20/7	130
	黑垆土						130
水稻	黄垆土	70/3	60/4	180/5	180/6	120/7	610
	黑垆土	70/3					
其他	黄垆土	25/4	15(原文如此——引者注)	/6	29/7		35
	黑垆土						

由上表可见, 6、7 两个月水稻的月均需水量在 150 立方米左右。而秫秫 6、7 两个月月均需水量只有 25 立方米。黄豆 6、7 两个月月均需水量是 55 立方米。显然, 在 1959 年干旱的情况下, 需水量较少的秫秫能以其高强度的抗旱性显示其优势。而结合降雨量以及各种作物的需水量, 我们或许能够理解, 为什么现实中会有那么多人甘愿冒险毁掉稻田改种秫秫了。相比于需水量较大的水稻, 秫秫在旱灾发生时保收的可能性显然更大, 而且其抗旱的成本也相对较小。但这种想法在 1959 年是行不通的。此时面对旱情, 如何抗旱已经不是以哪一种作物能够保住来衡量了, 而是要视作物的重要程度来决定。高产的水稻和红芋相比于黄豆、秫秫就受到了上级更多的关照。“水稻和红芋有多少保多少, 我们就要靠这些东西。”<sup>③</sup> “重点保红芋, 抽时间保豆子, 黄豆耐旱。”<sup>④</sup> 在这种情况下, 基层干部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

① 临泉县河网化指挥部:《临泉新河网规划介绍》(1958 年 9 月 14 日), 临档 69-2-46。

② 临泉县水利局:《农作物需水量调查表》(1955 年), 临档 69-2-10。

③ 《临泉县委会议记录》(1959 年 8 月 13 日), 临档 3-1-172。

④ 《临泉县委会议记录》(1959 年 8 月 26 日), 临档 3-1-172。



之，集中劳力进行水稻抗旱。但是水稻抗旱的效果却是非常小的。

表三：1959年临泉县作物受旱详细一览表<sup>①</sup>

作物 类别 项目	总计	粮食作物						
		水稻	红芋	黄豆	高粱	玉米	其他	合计
累计受旱面积	1605340	226925	700000	268026	95876	26140	58060	1375027
累计抗旱面积	1053221	226925	453229	116857	61445	16140	58060	932756
抗旱解除面积	360761	147435	165266	36447	/	/	/	349148
下雨解除面积	628663	/	310153	115850	61445	26140	6748	520336
因旱减产60% 以下	1043855	147435	475419	152297	/	/	26748	883915
因旱减产60% 以上	541485	79490	224581	115729	/	/	31312	451112
尚能保收面积	973170	147435	434734	152297	95876	26140	6748	863230
需补套种面积	474925	/	265266	105794	/		47312	418332
无收需改种面 积	147205	79490	/	9935	/		4000	93425
有水浇受旱面 积	602268	138715						463553
无水浇受旱面 积	1003072	88210						910862

说明：累计抗旱面积，是指抗旱以来，累计浇地总面积。抗旱解除面积是指在抗旱面积里经过多次浇灌、保苗基本上解除了旱象，对作物生长影响不大的面积。下雨解除面积：经过上次降雨，部分地区下透或基本下透地区的面积。在受旱面积里减产60%的面积，是指目前有死苗在20%~50%，或严重发黄、干裂的现象。减产在60%以上的，是指目前死苗在60%以上，或基本无收及枯萎的面积。保收面积，是指在降雨和抗旱的大力抢救下能解除旱象的，维持作物正常生长，而影响不甚严重，减产轻微，仅在10%~30%的面积。无收需改种的面积，是指全部枯死及死苗在70%的作物面积。需补套种的面积，是指减产在30%~60%的作物面积。

由上表可知，水稻被抗旱面积达到100%，即全部得到了灌溉。但是抗旱的成绩却非常小，有点得不偿失。这里我们不能被抗旱解除面积所迷惑，表面看来，经过抗旱，水稻解除旱象比例高达64%。但同时，有水浇受旱的水稻面积也达到了61%。这说明，经过艰难的抗旱斗争，水稻并没有解除旱象，下雨后水稻没有一亩地解除旱象即是一个例证。另外，水稻减产60%以下的面积也是64%。而减产60%以下也就意味着，死苗在20%~50%之间，或严重发黄、出现干裂。此情形

<sup>①</sup> 临泉县水利电力局：《1959年临泉县作物受旱详细一览表》（1959年8月），临档69-2-50。

也证明水稻解除旱象的数据不太可信。另外还有36%的水稻经过抗旱，仍然减产在60%以上，基本无收。可见1959年的水稻抗旱效果比较差。抗旱面积100%，但是绝收面积至少是36%。迎仙乡友谊大队在抗旱中就发现水稻保水是很困难的，浇后不到六小时就干，原来浇一次水可保三天，现在已保不了一天。<sup>①</sup>但在当时，即使水稻旱死了，也不允许撤出阵地。必须坚持保稻，撤出阵地是要被批判的。蒙城县涡北乡小街子大队在1959年抗旱过程中，发现水稻根本保不住水，就想撤出阵地去保其他作物。于是支书李如旭两次向乡里要求批准撤离阵地。但是李的请求不仅被拒绝，还因此受到了乡党委董书记的严厉批评。<sup>②</sup>

与水稻的待遇相比，其他作物在旱灾面前的境遇就不那么如意了。比如红芋就没有水稻那么幸运，在受旱的红芋中，得到浇灌、抗旱的比例只有64%。而下雨后解除旱象面积占抗旱面积的比例是68%。解除旱象也就意味着地被雨水下透了，这说明抗旱效果比较明显。而黄豆被浇灌、被抗旱比例则更少一些，只有43%，是几种作物中抗旱比例最低的一种。雨后解除旱象面积占被抗旱面积的比例是99.1%。显然，黄豆的抗旱效果是十分明显的。玉米被抗旱比例是61.7%。下雨后不仅被抗旱的玉米解除了旱象，就连没有抗旱的也解除了旱象。可见，玉米的抗旱成绩是最大的，也全部保收。最后来看当地人最喜欢种植的高粱，高粱被抗旱比例是64%，下雨后解除旱象面积占被抗旱面积的100%。抗旱成绩最为显著。这与表二所反映的，在高粱、黄豆、水稻三种作物中，高粱需水量最少是成正比的。在1959年旱情发生后，长官公社专门召开了老农座谈会，研究如何抗旱。座谈会上老农以民国31年为例，指出秫秫是最耐旱的，“民国31年80天不雨，中秋作物全部旱死。但秫秫还好，种的较多，每亩还合四、五斗。”<sup>③</sup>再有就是高粱与黄豆、水稻不同，没有因旱减产60%以下、或者以上的地亩，全部保收。显见，高粱的减产成数比水稻少得多。综合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对各种作物的抗旱效果进行如下排队：玉米、高粱并列第一，被抗旱的面积在下雨后全部解除了旱象；而黄豆第二，99.1%；红芋第三，68%；水稻第四，是0%。

以上呈现的是旱灾来临时“水”、“旱”作物的不同命运。当然，1959年的“水旱之争”图还不仅仅体现在旱情严重的特殊时期。在平常时期，因为稻改专业队的

<sup>①</sup> 临泉县委：《县委关于开展抗旱保苗的紧急指示》（1959年7月13日），临档3-1-224。

<sup>②</sup> 沈子芳：《关于蒙城县涡北乡南岳和小街子两个大队水稻管理情况的检查报告》（1959年8月27日），临档3-2-165。

<sup>③</sup> 长官公社党委：《长官公社召开老农座谈会议情况的报告》（1959年7月28日），临档3-1-197。



普遍建立,也使得可用于旱作物种植与管理的劳动力捉襟见肘。此情形一方面导致了大量旱作物无法按时种植;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不少白地的出现。

1959年临泉旱情严重时期,也恰是当地红芋种植的关键时期。但由于保稻占用了太多劳力,结果使得很多地方的红芋栽种任务未能完成。1959年6月份临泉县田间管理的劳力只有12万人,其中保稻劳力就占去了6万,<sup>①</sup>占用比例高达50%。当然另外50%的劳动力也不可能完全投入到栽种红芋工作中去,劳动力的紧张最终导致很多生产队未能完成红芋种植计划。长官区郭洪礼的说法较为形象地为我们描述了这幅“水旱之争”图,“俺队的稻子没浇好也耽误了栽红芋,不是浇稻占50多个劳力,每天抗旱起码也能栽5亩红芋。”<sup>②</sup>杨桥乡安全大队总支书记于万里在1960年提出,“今年稻改任务不小,去年只让抗旱浇稻,稻子也没全保住,红芋也没栽上。”<sup>③</sup>“59年大旱稻子种的多,如小李庄520亩土地栽36亩稻(计划40亩),83个劳力上去36个还保不住水,影响的其他活也缺少人干。据总支书记韦洪运同志说,全大队有200亩春地没种上庄稼,水稻还旱死300亩,留的红芋地1200亩没有栽上。”<sup>④</sup>这些情形都在说明,此时的“水旱之争”已经变得相当尖锐了。

“水旱之争”的另一个表现是大量白地的出现。由于稻改计划任务过大,很多地方无法完成稻改任务,但上级又不允许种植其他作物,所以出现了不少白地。“高产完不成任务低产不种,不按计划不种。”<sup>⑤</sup>在种植过程中,“长官公社1959年6000多亩地一年未种上作物。单桥大队59年规划4000亩水稻,完不完750亩(原文如此),也不叫改种其他作物,结果1000余亩地一年粒粮未收。”<sup>⑥</sup>县委书记赵宋则认为稻改导致几年间出现荒地20多万亩,“那时认为只有扩大水稻面积才能超纲要,根本不顾条件,不问可能,而盲目扩大水稻,有的把稻秧丢在井里未栽,有的稻子干死无力浇,其他作物也没种上,造成几年来荒地20多万亩和严

① 临泉县委:《积极采取措施,想尽一切办法,力争完成粮、棉、油生产计划》(1959年6月28日),临档3-1-197。

② 长官区委:《长官区郭洪礼错误言论》(1959年11月21日),临档3-2-177。

③ 临泉县委:《鼓干劲誓夺水稻大丰收、树雄心定把淮北变江南——临泉县稻改工作会议总结报告》(1960年3月15日),临档3-1-285。

④ 临泉县委检查组:《对长官公社铁佛大队57年到60年农业生产情况的调查报告》(1961年3月7日),临档3-2-275。

⑤ 艾亭区委:《关于修订农作物播种面积计划的通知》(1959年4月18日),临档3-2-179。

⑥ 崔振国:《在扩干会上对整风错误的揭露和检查报告》(1961年1月20日),临档3-1-333。

重的减产。”<sup>①</sup>这是赵宋在1961年3月份所作的一份检查，所谓的几年来应该指的是1958～1960年三年间。因为1957年临泉县的水稻计划种植面积还很少，只有16700亩，不可能造成大面积的荒地。只是从1958年水稻的计划种植面积才急剧扩大。而三年间荒地20多万亩，那么年均荒地就达到了6.66万亩，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无论是旱灾中红芋、秫秫的不如意，还是大量白地的出现，至少从表面上说明，在这场看似严酷的“水旱之争”中，水稻似乎取得了胜利，即便看不到抗旱成效也要死保的命令就是对胜利的最好注解。但这样的胜利却只能是政策的胜利，对乡民们的生活则未必是一件幸事。旱灾之后接踵而至的饥荒，昭示了水稻的胜利是如此凄凉。而通过以上的论述，人们或许能体会到，如果在1959年的这场“水旱之争”中，最终赢得胜利的是旱作物，那么接下来的生活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至于会是怎样的景象？让我们进入小王庄一窥究竟。<sup>②</sup>

#### 四、水稻之殇：小王庄的命运

由于所有关于小王庄的材料都是以统计表的形式反映出来的，所以我们无法确知小王庄究竟属于临泉县的哪一个公社。不过由于材料反映了1953年至1961年小王庄所有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基本情况，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村的变化，来考察稻改对该村农业生产的具体影响。考察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小王庄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大体上与全县的情况是相吻合的，小王庄可以看做全县的一个缩影。1959年小王庄水稻种植面积30亩，占耕地面积的15%；而全县当年水稻实际种植面积33万亩，占耕地面积的18%，二者情况大体吻合。1961年小王庄没有种植水稻，

<sup>①</sup> 赵宋：《代表县委对几年来工作中的错误的（初步）检查》（1961年3月18日），临档3-1-336。

<sup>②</sup> 最为理想的方式当然是就全县的情形来衡量稻改对三年饥荒的影响，这需要我们准确获知1959年的农业减产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稻改所致。这就要求我们掌握1959年全县水稻及其他旱作物种植以及最终产量的详细数据，以及稻改对其他作物影响到了什么程度，又最终导致了多大程度的减产，这种减产给人们的口粮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从而判定稻改与饥荒之间的关联。不过，由于1959年存在严重浮夸，各种作物的亩产量、总产量数据均不真实。在1961年召开的县直机关各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农工部就提出，59年产量约3亿斤，曾报8亿斤。参见：临泉县委农工部：《县直机关各单位负责人会上座谈情况》，1961年8月10日，临档3-1-317。而这一说法也为赵宋的检讨所证实，在1961年作检查时，赵宋指出1959年粮食总产量仅有2.6亿斤。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指出各种作物的真实亩产量。所以我们无法给出全县层面极具说服力的论证。好在我们有一份小王庄从1953～1961年所有关于农业生产方面的数据资料，这就使得可以在一个村庄的层面来作分析。在不可能掌握全县材料的情况下，小王庄就显得弥足珍贵，而我们也唯有管中窥豹了。



全县实际种植水稻 5000 亩，<sup>①</sup> 占耕地面积的 0.27%，也基本吻合。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小王庄的变化来观察全县的。而由上面的变化也可见，无论是小王庄还是全县范围内，1959 年与 1961 年水稻的种植面积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所以为了更好地衡量水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我们的论述将以 1959 年与 1961 年的情况进行比照。而将 1959 年与 1961 年生产情况进行比较的一个前提就是两个年度面临相同的自然条件。根据前文叙述，1959 年该县遭遇了大旱，小王庄的情形与全县的整体情形差别当不会太大，那么 1961 年的又如何呢？

据《临泉县志》记载，该县“1961 年，7 月旱，受灾面积 130 万亩”。<sup>②</sup> 由此可见，仅从农业生产所面临的自然条件来看，两个年度是有可比基础的，因为这两年都是旱灾年。1961 年 7 月 26 日，临泉县委农工部曾将当时的旱情与 1959 年情况做了详细对比，并将比较情况专门向地委作了电话汇报。<sup>③</sup> 我们可以通过汇报材料所附的一份受旱比较表，来具体看一下两个年度旱灾的基本情形。

表四：临泉县 1959、1961 年度主要作物<sup>④</sup> 受旱面积比较表 单位：万亩

作物	年度	受旱面积	其中		
			重的	一般的	较轻的
黄豆	59 年	23.4	8.1	12	3.3
	61 年	47	30	10	7
红芋	59 年	44	15.7	21.6	6.7
	61 年	45	2	9	8
什粮	59 年	8.6	3	3	2.6
	61 年	5	3	2	0
其他	59 年	16.8	3.96	6	6.84
	61 年	11.5	4.3	4.5	2.7
合计	59 年	103.5	33.76	46.6	23.14
	61 年	112.5	66.5	27	11
对比	增	+9	+32.74		
	减			-19	-4.14

通过上表的比较可以发现，无论是从重度受灾面积还是整体受旱面积来看，

① 临泉县委农工部：《抗旱材料（电话汇报）》（1961 年 7 月 26 日），临档 121-1-29。

② 临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临泉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4 年，第 68 页。

③ 临泉县委农工部：《抗旱材料（电话汇报）》（1961 年 7 月 26 日），临档 121-1-29。

④ 需要指出的是，这份比较表没有提到 1959 年度占据大量抗旱力量的水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全县 1961 年水稻种植仅有 5000 余亩，所以被忽略不计。

1961年的旱情似乎都要比1959年严重。而几种主要农作物的受旱面积中,除了受旱面积本就较小的什粮及其他外,红芋和黄豆的受旱情形同样是1961年重过1959年。这样的情形至少说明,就自然条件而论,1961年的农业生产条件不会好过1959年。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视线聚集到小王庄,看一下该庄这两个年度基本农作物的生产情形。

表五:小王庄1959、1961年度农业生产情况统计表<sup>①</sup> 单位:斤

作物种类	1957年			1959年			1961年				总产(不包括个人自留地的产量)
	面积	单产	总产	面积	单产	总产	面积		单产		
							集体	个人	集体	个人	
中稻	5	400	2000	30	100	3000	0	0	0	0	0
高粱	22	185	4070	7	100	700	16	2	200	240	3200
薯类	79	530	41870	70	220	15400	72.5	8	356	400	25810
杂粮	4	100	400	6	40	240	0	0	0	0	0
大豆	76	240	18240	51	90	4590	75	3	104	120	7800
小麦	150	190	28500	138	70	9660	127	0	80	0	10160

由前述县委农工部1961年的汇报材料以及我们对1959年旱情的描述可知,两年的旱灾基本都发生在7月份,这也说明无论是1959年还是1961年,受旱灾影响最大的都是秋收作物。而上表所列小王庄主要农作物中,水稻、高粱、薯类、杂粮、大豆五种为秋收作物。我们以1957年的产量作为基数,分别计算1959年与1961年五种作物的减产比例可以发现如下情形。1959年五种作物的减产情况分别是:水稻减产75%,高粱45.9%,薯类58%,杂粮60%,大豆62%。而1961年该庄未种植水稻和杂粮,其余三种作物的减产情况分别是薯类32.8%,大豆56.6%,高粱则比1957年增产8.1%。<sup>②</sup>至少从表面上的减产情况来看,水稻确如我们前文所言,是受旱灾影响最大的作物。不过,更需要说明的则是,在1961年旱灾比1959年还要严重的情形下,小王庄其他作物的减产情况却不似1959年那么严重。这直接导致了年度秋收作物的总产差异。对表中两个年度各种秋收作物的总产量进

<sup>①</sup> 临泉县委农工部:《小王庄1959、1961年度农业生产情况统计表》(1962年),临档121-1-57。

<sup>②</sup> 1961年小王庄不仅有集体种植的农作物,同时还包括了少量个人自留地内种植的农作物。而个人自留地的作物亩产量均比集体的高一些,这里我们计算的减产比例是以集体种植土地的单产产量为依据的。下文所指1961年总产量也是不包括个人自留地内的作物产量的。



行相加后,可以得到1959、1961两个年度的秋收作物总产量。1959年秋收作物总产量为23930斤,1961年秋收作物总产量则达到了36810斤,足足比1959年增加了12880斤。换句话说,在没有种植水稻的1961年,即便是遭到重过1959年那样的旱灾,农业生产所受影响也要小很多。小王庄的情形与全县基本一致。1959年全县因灾减产1.67亿斤,而1961年减产仅有0.87亿斤。<sup>①</sup>从总产量上来看,1959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是2.6亿斤,<sup>②</sup>而1961年的总产量是3.29亿斤,<sup>③</sup>比1959年增加了约0.69亿斤。当然,从1959年到1961年间,粮食增产的因素可能会有很多,但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无论小王庄还是全县范围内,1961年水稻的种植在农作物种植面积中所占比例都可忽略不计。

如果要判定水稻在1959年旱灾中对粮食减产造成的影响,仅仅通过比较小王庄和全县1959年与1961年粮食总产量的变化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是需要回到1959年的具体情况中去。从上述计算可知,在1959年的旱灾中,水稻75%的减产比例是所有秋收作物中最大的。而1959年小王庄的水稻种植面积为30亩,在164亩秋收作物中占到了约1/5的份额,这个比例虽不算很大,但显然无法忽略。而1958年制定的一份1959年春种安排计划表则显示,1959年全县可耕地面积180万亩左右,其中秋种面积约为135万亩,而改种水稻计划是69万亩,<sup>④</sup>后来此计划虽未实现,但最终改种面积还是达到了33万亩,约占到了当年全部秋种面积的1/4左右,全部耕地面积的1/6左右。而据县志记载,1959年改种的水稻多为春插中稻,<sup>⑤</sup>这就意味着至少最终改种的33万亩土地无法正常种植冬小麦。<sup>⑥</sup>从上表的统计也可见,1959年小王庄种植的同样是中稻。如此情形,使得水稻一旦遇到灾害无收成时,就极易导致改种土地整年度的绝收,从而影响最终的粮食产量。当然,我们从全县以及小王庄1959年度水稻在整个秋种作物种植面积中的比例可以想见,当年水稻75%的减产率势必会对年度产量造成极大影响。这或许可以解释

① 临泉县委:《十年来的农业生产和自然灾害》(1962年12月25日),临档3-1-350。

② 赵宋:《代表县委对几年来工作中的错误的(初步)检查》(1961年3月18日),临档3-1-336。

③ 《临泉县委会议记录》(1961年11月15日),临档3-1-307。

④ 临泉县委:《1959年春种安排》(1959年1月7日),临档3-1-216。

⑤ 临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临泉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89页。

⑥ 临泉当地一般会在冬季种植冬小麦。而由于小麦是冬种夏收,所以多数秋季作物一般是在麦茬地里种植,这就使得正常年份可以实现冬小麦和秋红芋等秋季作物的轮种,进而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而春插中稻由于要在前一年冬季就预留土地,这就使得在稻改的土地上只能种植一季作物,当水稻一旦受灾时,年度绝收现象就容易出现。

为什么旱灾更为严重的 1961 年，反而会因为水稻种植面积的极度萎缩或消失而取得了好于 1959 年的收成。这些分析还只是从水稻自身的减产情况对总产量可能造成的影响上来看的。事实上，1959 年度水稻改种对总产量的影响，可能还体现在它与其他作物的关系上。由前文的分析可知，春插中稻对小麦年度总产量的影响应是直接的。而对比其他秋收作物的产量，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从 1959 年和 1961 年的其他作物产量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在旱灾更为严重的 1961 年，小王庄除水稻外的秋收作物因旱减产比例都比 1959 年有所降低，高粱更是不降反升。实际上，小王庄 1961 年的农业生产，不仅自然条件逊于 1959 年，其他条件也与 1959 年度有不小的差距。具体情形，可参看表六：

表六：小王庄 1959 年与 1961 年牲畜、劳动力负担耕地情况 单位：亩

年度	1959 年	1961 年
耕地面积	200.6	200.6
牲口	9	4
每头负担量	22.28	50.15
人口	53	43
每人负担量	3.78	4.66

可见，该庄 1961 年无论是牲口、还是劳动力需要负担的耕地面积都比 1959 年多，换句话说，1961 年的农业生产条件与 1959 年是无法相比的。但是对比两个年度秋收作物的总产量却可以发现，1961 年秋收作物总产量比 1959 年增加了 12880 斤。不过，从表五、表六中还可以发现地是，虽然 1961 年农业生产的各项条件均劣于 1959 年，但 1961 年的秋收作物的种植结构相对单一了，尤其是 1961 年没有了 30 亩的水稻。那么两个年度农业产量之间的反差似乎只能从水稻上找原因了。

我们前文曾就 1959 年各种农作物在旱灾中的际遇有过详细探讨，接下来再以小王庄的具体情形来看下水稻及其他秋收作物在旱灾中的不同境遇，并由此分析水稻对其他作物减产的影响。就全县的情形来看，在严重的旱灾面前，水稻抗旱占用的劳动力要明显多于其他作物。临泉县委书记处书记王晋玉在 1959 年 8 月 15 日的县委会上，就提出因为劳力集中到水稻上而影响了红芋栽种。“栽红芋没有抓稻子抓得紧，口头紧，行动迟缓，稻子任务重，力量都集中到稻子上了。”<sup>①</sup> 那么 1959

<sup>①</sup> 《临泉县委会议记录》（1959 年 8 月 15 日），临档 3-1-172。



年全县保稻到底占用了多少劳动力呢？当年6月28日的一份材料显示，“水稻要确定专业队或采取包到户的办法。改革提水工具，把多人一车改为一人多车，每个劳力保稻5~7亩。全县要田间管理的劳力12万人，其中保稻劳力需要6万人。”<sup>①</sup>材料显示，在正常条件下，保稻的劳力就占到了田间管理劳动力的50%。而在7月份旱情加重后，6万的劳动力已经无法保证水稻用水，县委只能要求继续增加稻改专业队的人数。7月21日县委的一份旱情专题报告透露，全县“现在投入抗旱保苗运动的有26万多人，确保水稻、红芋。组织两套班子，一班子保稻，一班子保红芋及早作物。对稻田专业队，从原来9万人增加到15万人，要求吃饭、劳动、住宿三就地，日夜轮流车水，人闲工具不闲。”<sup>②</sup>稻改专业队劳力数目具体什么时间由6万人增加到了9万人，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再次增加到15万人的论述可以想见，抗旱保稻似乎已经成为当年抗旱工作的头等大事。在稻改专业队增加到15万人之后，保稻人数已占全县抗旱劳动力总数26万人的57.6%，而当年全县水稻种植面积仅占全部秋种作物面积的1/4。这样的劳力投入与面积之反差，一方面可能是水稻的耐旱性能确实太差，更多的原因则是保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政治任务。正因如此，很多地方为了确保水稻，甚至将全部劳动力都投入到了保稻上去，干脆将其他作物搁置起来。8月1日县委常委开会时就提到，在下乡检查工作中发现“沿途没人浇棉花和红芋的，赵砦51个劳力，全在稻田，抽不出人，8个生产队有5个沟塘干。”<sup>③</sup>

小王庄1959年种了30亩水稻，在严重的旱情面前，保稻所占用的劳动力想必不会与全县情形相差太大。该村1959年总人口是125人，其中男、女劳力共53人。在抗旱过程中，若如县里要求的投入50%的劳动力用于保稻，就需要27人。这样一来，用于其他旱作物抗旱、管理的劳动力只有26人，需要保134亩旱作物，每人需要保5.15亩。而根据7月29日的一份县委会议记录显示，旱作物基本上是每人保3亩，水稻是每人保2亩。<sup>④</sup>小王庄需要每人保5.15亩的情形势必会影响旱作物的收成。我们可以与旱情同样严重的1961年相比。1961年再次面对旱灾时，全庄共有101口人，劳动力43人。因为有了保稻的任务，所以全部劳力都可投入到163.5亩的旱作物中，这时人均保地3.8亩，与1959年相比，人均抗旱面积减

① 临泉县委：《积极采取措施，想尽一切办法，力争完成粮、棉、油生产计划》（1959年6月28日），临档3-1-197。

② 临泉县委：《关于旱情情况专题报告》（1959年7月21日），临档3-1-224。

③ 《临泉县委会议记录》（1959年8月1日），临档3-1-172。

④ 《临泉县委会议记录》（1959年7月29日），临档3-1-172。

少了26%。在这种情况下，旱作物的产量当然会有所保证。由此我们也能够进一步理解，为何小王庄1961年在各种生产条件都劣于1959年的情形下，还能取得好于1959年的收成。这也意味着，1959年的30亩水稻应该是影响到了当年的总产量。1961年在反思三年饥荒发生的原因时，副县长陈俊岭就提出改种水稻是一个重要原因，“水稻面积要求过大，劳力顾不过来，种一亩稻需四个劳力，而一个劳力就能种10亩旱田，实际上多种不利。今年如果种那么多的水稻，遇到这样的大旱就不得了。”<sup>①</sup>在师范泉河小组的讨论会上，也有人提出“59年不栽那些稻，把浇稻的水用在抗早上，就能得到丰收。”<sup>②</sup>经由以上的讨论，亦可发现，水稻不仅在1959年的旱灾中自身大面积减产，同时因保稻占用大量劳动力也使得其他作物抗旱效果受到影响，并进而加重了其他作物的减产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1959年的水稻大面积种植，应与当年的粮食减产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然，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简单讨论水稻在减产中的责任，而是透过减产来观察水稻与几个月后发生的饥荒之间的关联。由于水旱之争主要表现在秋收作物方面，所以我们接下来将主要考察两个年度秋收作物对村民口粮的影响。结合表五反映出的秋收产量，并结合下面这份1959年与1961年粮食分配情况调查表可见，该庄1959年的粮食总产量是33590斤，其中秋收作物为23930斤，占到全年总产量的71.24%，扣除种子、饲料以及征购和机动部分，自留口粮仅为7390斤，加上回销的21080斤也仅有28470斤，当年全庄125口人，人均口粮为227.76斤，远低于同期国家要求的口粮标准。另外，在考量口粮对于饥荒的影响时，21080斤的回销粮是不能计算的，因为大部分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都发生在粮食回销之前。而在扣除回销粮后，该庄1959年从生产中人均得到的口粮仅为59.12斤。如果按照秋收作物在总产中的比重计算，自留口粮7390斤中秋收作物的贡献约为5264斤，人均42.11斤，也就是说每人可以从秋收作物中分得42.112斤的口粮。对比同样遭遇旱灾却未种植水稻的1961年可以发现，该年份全庄总产量为46970斤，其中秋收作物为36810斤，占到全年总产量的78.36%。与1959年相比，1961年秋收作物对全年总产量的贡献高出约7个百分点。扣除所有应当扣除部分之后，自留口粮34318斤，如果按照秋收作物在总产中的比重计算，秋收作物的贡献约为26891斤，如果还以1959年的全庄人口来算，那么每人可以从秋收作物中分得约215.128斤的口粮，这一数字是1959年的五倍左右。当然，两个年度差别巨大的一个重要原

<sup>①</sup> 临泉县委：《临泉县委扩大会讨论情况简报》（1961年8月6日），临档3-1-314。

<sup>②</sup> 张主任：《师范泉河小组讨论》（1961年8月29日），临档3-1-320。



因是1961年的征购率较低,而且小麦收成也好过1959年,总产量自然增加。为了消除这一影响,接下来以1961年的秋收作物产量(可以想见地是,如果没有水稻导致的减产,在各项生产条件都好于1961年的1959年,秋收作物产量至少不该低于1961年的水平)和1959年的小麦产量作为总产量,以1959年的粮食征购率扣除征购量,计算秋收作物对口粮的可能贡献量。这时的粮食总产量应为1961年的秋收作物总产量36810斤加上1959年的小麦产量9660斤,总共为46470斤,其中秋收作物占比为79.21%。那么扣除1959年所留种子、饲料以及按照63.1%征购率算出的征购量后,自留口粮为 $[46470 - 3800 - 700 - (46470 \times 63.1\%) = 12647.43]$ 斤,按照79.21%的比重计算,其中秋收作物约为10018斤,仍按1959年的125口人计算,其中人均口粮为80.14斤。也就是说,扣除所有部分之后,秋收作物对人均口粮的贡献量约为80.14斤,比1959年的实际贡献量42.11斤多出了38.03斤。此情形说明,1959年水稻种植对秋收作物产量造成的影响,至少造成了小王庄当年人均口粮减少了38斤。38斤的粮食,如果按照1960年饥荒时期的供应标准,至少可以维持一个人40天左右的正常生存。但或许正因为这38斤的减少,小王庄人在几个月后的饥荒中难以应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959~1960年的人口变化中看得出来。

表七:小王庄1959、1961年粮食分配情况调查表<sup>①</sup> 单位:斤

项目 \ 年份		1959年	1961年
总产量		33590	46970
种子		3800	3781
饲料		700	1200
征购	计	21200	4341
	占总产%	63.1	9.25
	其中:净征购	11600	2677
	每人平均净购	125	26.4
上交大队机动粮	计		3010
	占征购任务%		69.2
	每人平均		29.4

<sup>①</sup> 临泉县委农工部:《小王庄历年粮食分配情况调查表》(1962年),临档121-1-57。

表七：小王庄 1959、1961 年粮食分配情况调查表（续表）

口粮	计	28470	35984
	自留量	7390	34318
	回销	21080	1664
	每人吃粮	191.7	356
储备粮			320

我们缺少 1959 年冬至 1960 年春的饥荒发生过程中小王庄人口损失的具体情形。不过从 1959 年前后总人口的变化中，还是可以作简单讨论。据统计，该庄 1949 年解放时共有 96 人，此后逐年递增，直至 1958 年达到 136 人。1958 年到 1959 年，减少了 9 人，还有 125 人，而到了 1960 年，人口数又锐减为 99 人，一年内共减少 26 人，1961 年 101 人，又开启了一个新的人口增长期。<sup>①</sup> 综上所述，解放十余年间，该庄只出现了两个人口减少年份。而 1958 年的人口减少，很可能与当年的招工有很大关系，<sup>②</sup> 这也可能是其减少数量不大的缘故。1959～1961 年全村人口锐减 26 人，达到了 26% 的比例。<sup>③</sup> 这样的大幅减少，虽也可能有其他原因，但恐怕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该庄与其他地方一样，未能幸免于 1959 冬至 1960 年春的这场饥荒。从我们此前对该庄 1959 年度粮食生产状况的分析，也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人口减少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而结合此前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小王庄的饥荒应该与当年的稻改有着直接的关联，至少稻改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当年旱灾的严重程度。

透过以上我们对临泉全县范围内“水旱之争”图的具体描绘，以及对小王庄 1959 年与 1961 年农业生产情形变化的梳理，可以发现稻改与饥荒确实存在着关联，这种关联性也让我们对民众抵制稻改的行为更加理解。而政府以强力手段推动稻改

① 临泉县委农工部：《小王庄历年人口、劳动力调查表》（1962 年），临档 121-1-57。

② 1958 年 12 月 7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轻工业部党组《关于人民公社大办工业问题的报告》。批转指示提出“人民公社和县联社必须贯彻执行工农商学兵结合和农林牧副渔结合，特别是工农业并举的方针，在切实抓紧农业的同时，还要大力举办工业。”《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第 577 页。此后，各地公社以及县联社都开始大办工业。在办工业的过程中，从农村招收了大量工人。《临泉县志》记载，1958 年 8～11 月，为支援新疆、合肥、凤台、淮南、芜湖、马鞍山、临淮岗的建设，全县即招工 45488 人。临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临泉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4 年，第 15 页。由此可见，小王庄 1958～1959 年的人口减少也应与类似招工有关。

③ 小王庄的人口减少比例，与我们曾经考察过的该县三年饥荒中 30% 的人口死亡率也基本吻合，参见拙文：《统购统销、干部行为与饥荒》，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硕士学位论文 2007 年，第 17 页。



显然是未能充分考虑地方的实际情形。而小王庄 1959 年的粮食减产，以及相伴随的人口锐减，则说明了农民对待稻改上的先见之明。实际上即便是在没有严重干旱的情况下，水稻在皖西北的生存状况也并不理想。也正是因为因为在旱情发生前就有多处稻田干裂，所以县里才要求各地一定要建立专门的稻改田间管理专业队进行保稻，为此全县共投入了 6 万劳力。<sup>①</sup>而 1959 年旱灾发生时，全县投入大量人力保稻，依然不得不面对其大面积减产的事实，这样的结局显然不会是不努力抗旱的结果，而是生动说明了“橘生淮北而为枳”的道理。实际诸如此类的现象，在未有旱情的 1958 年即已出现，“阎中社韦柿园大队 11 个小队，计划种春稻 155 亩，仅完成 57 亩，有 40 亩普遍干裂，10 亩秧苗普遍干裂枯萎。”<sup>②</sup>可以说，水稻在皖西北的境遇，正如当地农民所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临泉的漏风土特性，本就不适合种水稻。<sup>③</sup>只是这样的地方性常识在稻改的政治推动中，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三年饥荒则以惨痛的现实警醒了稻改的决策者。此后，水稻在当地农作物种植结构中的比重逐年降低，并最终彻底退出了这片并不适合它生长的土地。

（本研究得到华东师范大学 2010 年度校级“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基金资助，资助编号：XRZZ2010011。文章曾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当代社会史史料研讨会”上宣读，期间韩钢教授、曹树基教授、王胜女士等都对文章的进一步修改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① 临泉县委：《关于加强春稻管理十项措施的通知》（1959 年 6 月 3 日），临档 3-1-219。

② 单桥乡检查组：《关于单桥乡稻改情况的检查报告》（1958 年 6 月 15 日），临档 69-2-45。

③ 临泉县委农工部：《临泉县 1958 年水稻栽培总结》（1958 年 11 月 17 日），临档 121-1-26。

# 私人历史叙述的解读与考证：以天津地震日记为例

沙青青\*

**摘要**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不仅给唐山市带来空前惨烈的破坏，也使周遭广大地区陷入灾难之中。临近的天津市便在这场地震中，蒙受了巨大的人员与物质损失。时至今日，除了各类抽象的数据统计外，地震期间天津市基层社会的生活实态似乎正变得越来越模糊。有鉴于此，后世的研究者有必要借助诸如日记等私人叙述材料来重新检视这段天灾与人祸交织的艰苦时期。另一方面，研究者还能透过这些当事者在第一时间所留下的记录来窥见“文革”末期特殊的社会氛围与个人心态在遭遇突发自然灾害时，究竟是如何发生异变的。不过，在利用这类历史材料前，同样需要研究者先进行仔细的解读与考证。

**关键词** 唐山地震 上山下乡 灾难记忆 日记 基层实态

## 一、资料交代

唐山大地震，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中国当代史上最为惨烈的自然灾害之一。关于这场灾难的回忆、叙述及科学研究成果已多有积累，但立足于历史学角度所进行的探讨却并不多见。另一方面，关于此事件的绝大多数回忆和叙述，多围绕唐山市的情况而展开。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大地震的威力如此之巨大，不仅位于震中的唐山市毁于一旦，也同样波及了临近的广大地区。以天津为例，当时便遭受了史上最严重的地震灾害侵袭。根据《天津通志·地震志》的记载，唐山大地震期间天津市

\* 作者沙青青，历史学博士，上海市图书馆助理研究员。



区内外受到6级至9级烈度的破坏，伤亡人数高达14万余人，全市67%的房屋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sup>①</sup>1986年7月29日，唐山大地震10周年之际，位于成都道与南京路交口的天津抗震纪念碑正式揭幕。然而，在此后的20年间，关于这场地震的记忆似乎就越来越少地被世人所提起。<sup>②</sup>

作为受波及的灾区，天津虽也遭受空前的损失，但惨烈程度不可与唐山相提并论。无论是在地震发生之初，还是在今朝此刻，天津从来都不是这场灾难最受关注的地区。此后三十余年间，天津市民们似乎也渐渐淡忘了挤在临时帐篷中度日的艰难时光，关于这场地震的种种记忆变得模糊起来。在很长时期内，除了关于这场灾难的宏观描述和数字统计外，史学研究者似乎都难以给出真实可信的叙述以及严肃的学术分析。在那些为数不多的文字回忆中，除了知晓各级政府如何“组织力量，抢险救灾”外，我们始终很难了解天津民众的灾后生活实态以及当时生活所受影响。

除了搜集经历者的事后回忆外，是否还有其他来自现场的第一手资料可以帮助研究者重构事件的过程呢？很幸运，笔者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获得一本记录于1976年大地震前后的私人日记。该本日记始于1976年7月25日，终于同年12月13日，140篇，共计178页。日记的主人是一位即将上山下乡的天津高中生。此人名叫“同山”，家住天津市和平区胜利街。家中共六口人，除了父母外，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当时，他临近高中毕业，即将被分配到天津郊县的农村地区劳动。<sup>③</sup>

众所周知，虽然诸如日记、书信、笔记等叙述材料带有私人的属性，但还是无法脱离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束缚，尤其是在政治影响力全面辐射的特殊时

<sup>①</sup>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编著：《天津通志·地震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58～59、63页。另可参见天津市地震局编：《天津及附近地区地震对天津市的影响》（内部编印1982年，第6页）

<sup>②</sup> 唐山地震过去三十年后，天津各界在天津抗震纪念碑举行的大规模纪念活动中，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2006年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以及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举行哀悼活动。

<sup>③</sup> 由于在日记未提及作者的完整姓名和所在学校的全名，所以只能通过文中叙述得知该作者名“同山”。出于叙述方便，下文中将简称此日记为“同山日记”。

段。<sup>①</sup>自1949年后，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因素开始越来越多地渗透入普通人的日记写作之中。根据吴艳红、David J. Knottnerus的研究：自1960年后，有关日记写作的报道呈现急剧上升的势头，在“文革”爆发前夕达到高峰。以《人民日报》的为例，1965年以“日记”为篇名的文章达到110篇，1966年则达到128篇，亦即平均不到三天就会有日记的报道。<sup>②</sup>官方通过强大的宣传动员能力将诸如《雷锋日记》、《王杰日记》树立为新时代的革命范本。这类政治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私人日记的公共政治属性和日常仪式化的功能。在很多情况下，日记写作被认定为一种政治学习、自我反省的手段，而记述功用却反而遭到淡化。另一方面，随着所谓“日记罪”的出现，也使得许多人在写日记时担心日后成为“罪证”，要么干脆不写，要么就只写一些日常琐事或誊抄语录。

不过，我们在对此抱有清醒认识的同时，也应承认即便是在那个特殊时代中，日记仍可能反映个人的真实体验。私人日记虽然不可避免地成为抒发革命热情的政治渠道，但日记写作也往往成为人们缓解内心压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翻阅“同山日记”时，能发现充斥那个年代的豪言壮语，又或是革命话语的仪式性复述；但也能在这些模式化写作的背后发现作者对社会的独立观察，甚至还会流露出与当时政治宣传主流大相径庭的思想倾向。而这些观察与思考正是值得去关注的。

## 二、日记中的天津震情：基于档案文献的验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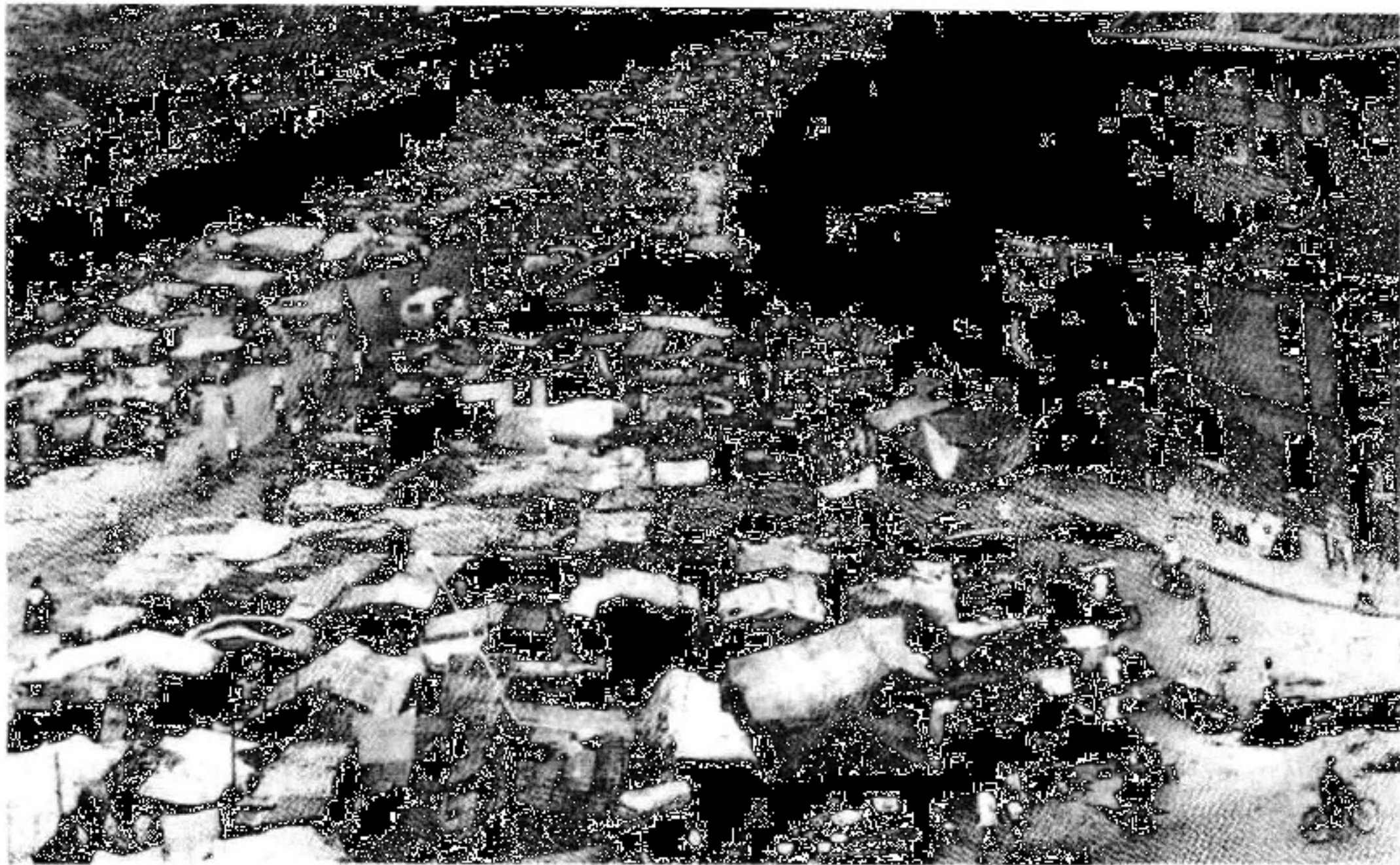
如果该日记仅是记录个人情感的起伏变迁而缺少对社会的观察，那么其史学价值必然是有限的，至少它无法帮助后人研究地震期间天津基层实态。所幸在地震发生后，面对空前灾难所带来的惊恐，日记作者同山“冒着随时都有被地震震亡的危险，在写日记”，<sup>③</sup>坚持记录下自己每天的所见所闻。通过朴实的言语将他在地震前后数月间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毫无疑问，在缺乏关于此事件

<sup>①</sup> 以“文革”知青的口述回忆为例，除了遗忘外，选择性记忆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对于许多经历“文革”的口述者来说，专制主义、威权主义的阴影仍旧是阻碍他们实话实说的主要原因之一。相关研究意见可参见刘小萌：《关于知青口述史》（《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第19～24页）、梁丽芳：《记忆上山下乡——知青回忆录的分类、贡献及其他》（《自由评论·当代文坛》，2008年第1期，第25～29页）、王汉生、刘亚秋：《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社会》，2006年第3期，第46～68页）。

<sup>②</sup> 相关研究可参见吴艳红、David J. Knottnerus：《日常仪式化行为的形成：从雷锋日记到知青日记》（《社会》，2007年第1期，第98～119页）。

<sup>③</sup> “1976年7月28日”，“同山日记”。





1976年地震后的天津南京路。

相关细节记述的情况下，这类当事人在第一时间所记录的资料自然有着其研究价值。<sup>①</sup>然而，对于日记中的各类描述，研究者仍有必要通过档案以及其他文献来予以验证。唯有如此，才能确认该材料叙述内容的可靠性与准确性。

在7月29日的日记中，同山在日记中描述道：他约在凌晨3点40分左右被一阵剧烈震动所惊醒，自己觉得“足有六、七级”，而“附近街道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房屋倒塌了，足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房屋已经震坏，眼看整个楼房都变成了废墟”。<sup>②</sup>

根据官方灾后组织的详细调查，天津市房屋的确损毁严重。在天津市，地表裂缝分布达70余处，180余条。其中长达数十米至数百米不等，又主要集中于和平区、河西区及市东南部。<sup>③</sup>天津市区房屋破坏的特点则是河东轻，河西重，尤其是日记作者所居住的和平区最重。<sup>④</sup>在地震中天津市区房屋的损毁率约为68%，市区

<sup>①</sup> 在现当代史的研究中，包括日记在内的非出版物史料尤其应得到研究者之注意，有必要投入精力、时间与金钱予以搜集。相关见解，可参见金大陆《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准备》（《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第164～170页）。

<sup>②</sup> “1976年7月28日”，“同山日记”。

<sup>③</sup> 详细数据可参见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天津地区震害地质条件分析与震害预测的探讨》（《唐山地震考察与研究》，北京：地震出版社，1981年，第45～55页）。

<sup>④</sup> 参见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天津地区震害地质条件分析与震害预测的探讨》（国家地震局科研处编著：《唐山地震考察与研究》，第45～55页）。

的房屋破坏以房屋倒塌为主，主要分布在和平区与河西区；其中甘肃路、西藏路、贵州路，人民公园东北的海河两岸、胜利路（南京路）东南等地都有较多房屋倒塌。<sup>①</sup>和平区与河西区的倒塌房屋数占到全市倒塌房屋总数的 91.6%。<sup>②</sup>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日记中对于和平区房屋损毁情况的描述是基本准确的。

表 1：天津市房屋震害情况统计表

地区名称	原有房屋面积	破坏总计		倒塌		严重破坏		一般破坏	
		面积	占原有	面积	占原有	面积	占原有	面积	占原有
市区	10368.8	7052	68%	1498.3	21.2%	2624.6	37.2%	2929.1	41.6%
郊县	5688.3	3709.9	65.2%	1160.5	31.3%	1305.4	35.2%	1244	33.5%
合计	16057.1	10761.9	67%	2658.8	24.7%	3930	36.5%	4173.1	38.8%

(单位：万平方米)

资料来源：《天津通志·地震志》，第 63 页。

表 2：天津市区民房破坏典型区域一览表

民房破坏程度	典型地区
倒塌	1. 四平路西，营口西道北，胜利路西，新光路东； 2. 营口道南，胜利路西，贵州路东，人民体育场北； 3. 人民公园东北，海河两岸，胜利路东南； 4. 丁字沽； 5. 纺织器材厂至第 52 中学一带
严重破坏	1. 南起多伦道，东起东马路，海河西北马路与南马路之间； 2. 人民公园西南 600 米一条西北、东南间条带； 3. 沿津塘支路西北一带，金钟路以西一带
一般破坏	1. 多伦道以北，海河以西，东马路以东，河北大街以南； 2. 五马路以南，金钟路、中山路交界两侧，狮子林大街； 3. 广开五马路以东，富庄以西，西安大街以南，天宝路以北； 4. 南门外大街西南，开二马路以东；

资料来源：国家地震局科研处编著：《唐山地震考察与研究》，第 49～49 页。

除了大量房屋损毁外，人员伤亡更为惨重。由于地震发生于凌晨，人们多尚在熟睡之中，对地震根本毫无防备。在惊魂未定之中，同山在地震发生当天就得出与之类似的想法，他在日记写道：“（地震）发生在出奇不易的半夜，人死伤得实在惨

① 《天津通志·地震志》，第 63 页。

② 参见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天津市抗震工作情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编：《唐山地震抗震调查总结资料选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77 年，第 10～17 页）。



啊”、<sup>①</sup>“对于房屋、人员损伤，我一直不敢正视，也不到什么地方去看，只是有时不得不看”。<sup>②</sup>根据天津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事后统计：大地震期间同山所在的和平区共有761人死亡，重伤1234人，轻伤5968人，为市区范围内伤亡第二惨重的区域。<sup>③</sup>而当时和平区人口总数为477123人，共计125732户，每户平均3.7人。<sup>④</sup>

表3：1976年7月28日至8月12日地震期间天津市人员伤亡情况表

区县	伤亡合计	死亡	重伤	轻伤	
全市总计	140337	23938	32572	83827	
市 区	市区小计	39887	6012	14627	19248
	和平区	7963	761	1234	5968
	河北区	5409	185	853	4371
	河东区	3391	28	325	3038
	河西区	2990	153	481	2356
	南开区	692	53	170	469
	红桥区	856	47	206	603
	塘沽区	3419	405	571	2443
	汉沽区	15167	4380	10787	
	郊 区	郊区小计	3453	141	538
东郊区		1094	41	147	906
西郊区		645	15	80	550
南郊区		1064	42	154	868
北郊区		650	43	157	450
各 县	各县小计	96997	17785	17407	61805
	蓟县	10643	251	2590	7802
	武清县	11924	663	1436	9825
	宝坻县	18353	762	2947	14644
	静海县	642	12	120	510
	宁河县	55435	16097	10314	29024

资料来源：《天津通志·地震志》，第78～79页。

① “1976年7月28日”，“同山日记”。

② “1976年7月31日”，“同山日记”。

③ 《天津通志·地震志》，第78页。天津市区范围内伤亡最惨重的是位于东北方向的汉沽区，共死亡4380人，重伤10787人。天津郊区伤亡最多的地区为宁河县，死亡人数便达到了16097人。具体伤亡情况，可参见表1。

④ 参见和平区革命委员会计划统计科《天津市和平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1975年》（内部编印1976年版）第3～4页。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周二，大雨。  
 我总想着随时都有被地震震亡的危险，在  
 这一天，大概是在早上三点四十分发生了一次天津史  
 无前例地震，只有六、七级，街道上有百分之十  
 的房屋倒塌了。百分之九十五的房子已震坏。  
 也不记其故。眼看整个楼座变成了废墟  
 是在这西其不易的半夜，人死伤得实在惨痛。  
 我家的房子万幸没有倒塌，只是已有了裂  
 缝。幸亏有一座楼座却快感着我家，只  
 要一二次，楼座立即会把我家流毁。  
 变成废墟。  
 昨晚可海二字的找到我了，他到  
 了找道，人的扶危帮助我聚一  
 命运而定。  
 我也走了一个找道，轮流睡觉，监视着  
 有没有，困也不住倒下。睡得什么  
 也没有。  
 有人说找道，无人去过问。我  
 在找道同家在西是找道  
 在找道在西是找道。

同山日记。



同山家所在的楼房虽有裂缝却并未被震塌，家中也未有伤亡；但是“旁边有一座楼房却威胁我家，只要再震一次，楼房立即会把我家淹没，统统变成废墟”。<sup>①</sup>当时周遭的居民都纷纷逃到街道上避难。同山家附近的“胜利路上摆满了帐篷”，大多是“盖了一个帐篷，轮流睡觉，监视震情”，一整天不停的雨水更是把人心浇的惶恐不安。<sup>②</sup>

类似的情况在整个天津市都比比皆是。由于大量房屋遭地震破坏，全市大约有一百万人只能露宿街头。<sup>③</sup>天津市政府还为此特别指示工商业部门调拨塑料布和塑料薄膜 90 吨、草袋子 195 万条、毛竹 8700 根、木竿（杆）1.88 万根、苇席 9.2 万片、铁丝 5 万吨等物资。<sup>④</sup>其他经历者也曾回忆道：几乎一日之间，人们用竹竿、木棍、塑料布搭起来的棚子几乎在一日之间遍布大街小巷，曲折蜿蜒犹如百里联营。<sup>⑤</sup>震后的最初几日中，全市搭建的临时窝棚就多达百万平方米。截止于 8 月中旬，仅日记作者所在天津和平区由政府 and 民众搭建的临时建筑和窝棚就多达 11200 余间。<sup>⑥</sup>

28 日晚上，一位民警向在街上露宿的居民宣布：“今天晚上仍有较大地震，请同志们不要回家，要沉着，要避开高大建筑物”。<sup>⑦</sup>于是，居民便更不敢回到尚未倒塌的家中生活，只好“像幽灵一样，游荡在街上”，人们的生活变得毫无规律，时刻提心吊胆地躲余地震，一天连吃几顿饭也搞不清楚。<sup>⑧</sup>同时，由于有家难归，许多人只好随地大小便，街中间随处都可见一堆堆的粪便，按同山的话来说就是“为了活命什么也不顾了，什么革命啊之类的，连脸也不要了”。<sup>⑨</sup>这种混乱的情况只持续了两三天，整条马路、胡同都快被粪便所覆盖了。地震之后，天气炎热、阴雨潮湿，卫生环境愈加恶化，在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痢疾、肠炎、脑炎等传染病例。31 日下午时分，街道代表开始走街串巷要求每家每户都必须派人出来打扫卫生，情况方渐有好转。<sup>⑩</sup>面对天灾所带来的生活困苦，惊慌失措的人们都期盼着各

① “1976 年 7 月 28 日”，“同山日记”。

② “1976 年 7 月 28 日”，“同山日记”。

③ 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及附近地区地震对天津市的影响》，内部编印 1982 年，第 8 页。

④ 《天津通志·地震志》，第 285～286 页。

⑤ 相关回忆可见于边纪哲：《在天津地震的日子》，载《随笔》第 14 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 年，第 29～31 页。

⑥ 《天津通志·地震志》，第 208 页。

⑦ “1976 年 7 月 29 日”，“同山日记”。

⑧ “1976 年 7 月 30 日”，“同山日记”。

⑨ “1976 年 7 月 30 日”，“同山日记”。

⑩ “1976 年 8 月 2 日”，“同山日记”。

方各方面伸出的援手。

地震发生当天，天津市委在早晨紧急召开了常委紧急扩大会议，下达了一系列抢险救灾指示。当天下午 13 时 30 分，市委向各区委下达电话通知，具体部署抗震救灾工作。<sup>①</sup>然而，在“文革”后期微妙敏感的政治气氛中，哪怕是在慰民救灾时也无法摆脱“采取紧急措施，领导全市军民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阴影。<sup>②</sup>直到 9 月初，天津市委仍坚持号召全市应“以批邓为动力，搞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sup>③</sup>市委书记徐信在讲话中还特别表扬“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等同志始终坚持以阶级为纲。地震后，政治夜校照常学习。”<sup>④</sup>

7 月 30 日上午，中央慰问团天津分团抵达天津，带队领导为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张宗逊等。次日，同山也听说“华国锋总理来我市慰问灾民们，我虽没有看见，但看到街上贴的标语。”<sup>⑤</sup>可没过多久，他又听说华国锋那天并没来，是 8 月 2 日才到，也只去市总医院慰问伤员。<sup>⑥</sup>实际上，直到 8 月 4 日晚，华国锋才正式赶到天津慰问。5 日下午，天津市县区级干部均被召集至天津干部俱乐部，集体听取华国锋代表中央传达有关精神。<sup>⑦</sup>而此时大部分普通灾民也始终处于闭塞的情形之中。<sup>⑧</sup>包括日记作者在内的大部分天津市民在第一时间都不晓得唐山大地震的惨状，甚至还以为天津就是震中。比如日记作者直到 8 月 5 日去市区办事时才晓得“天津这般严重，竟是波及到的地区，而唐山、丰南才是地震中心”。<sup>⑨</sup>

在政治优先的气氛之下，救灾工作的开展必然是迟缓与艰难的，况且天津也并

① 《天津通志·地震志》，第 285 页。

②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在兄弟省市自治区大力支援下，我市军民团结战斗奋勇抗震救灾》，《天津日报》，1976 年 7 月 30 日，第 2 版。

③ 《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徐信在唐山丰南地震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天津日报》，1976 年 9 月 3 日，第 2 版。

④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徐信同志的发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唐山南丰地震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1976 年 9 月，第 30 页。

⑤ “1976 年 7 月 30 日”，“同山日记”。

⑥ “1976 年 8 月 3 日”，“同山日记”。

⑦ 参见杨武进：《蓝光闪过之后：忆地震与抗震》，载《天津河北文史》第 4 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37～43 页。

⑧ 论及灾难与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欧美学者曾对地震灾难中的传播学机制进行过探讨，指出不同社会形态在面临地震时，所可能产生的不同信息传递方式，这或许也是国内研究者值得关注的领域。参见 Gary J. Krug, “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 Media Messages and Local Life in a Predicted Arkansas Earthquak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993 vol.10, p.273 ~ 285.

⑨ “1976 年 8 月 5 日”，“同山日记”。



不是本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sup>①</sup>于是,种种不满情绪渐渐开始在社会基层挣扎的市民中蔓延,而这一切在该份日记中都有所反应:“社会上成了无政府社会,无人来过问,领导一直没有下来……也不曾听到有什么慰问”、<sup>②</sup>“中央指示我们灾区人民自力更生,确实我们也是自力更生下度过了几天难民生活,不曾见国家的微小的援助”。<sup>③</sup>除此之外,他还曾听到人们传说“当干部的都集中在和平区,只要他们逃之夭夭,平民就无人管了”。<sup>④</sup>当然,无论是同山的想法又或是他所听到的小道消息未必能够代表当时所有天津灾民的心声,但却或多或少地验证了灾难经历者的救助期待与现实产生落差后可能发生创伤性的心理变化。<sup>⑤</sup>

### 三、“文革”背景下的震后心态：日记写作动因的探究

虽然天灾无情,但在灾后的日子里,真正困扰同山这位年轻灾民的最大烦恼却并不是那场可能会夺取他性命的大地震,而是即将到来的上山下乡安排。

地震发生前的几日里,日记作者同山一直深陷于焦虑不安的情绪中。因为不久后,他将被分配到蓟县务农,“迈进生活的第一步是从当农民开始”。<sup>⑥</sup>自7月下旬以来,同山全部的心思似乎都放在了这件事情上。在日记中,他和那个年代大多数青年一样喜欢写下慷慨激昂的革命口号;但他还是会用“只有经过在农村的几年实践,才能获得日后继续学习的机会”之类的实际道理来安抚自己的紧张情绪。<sup>⑦</sup>虽未正式前往农村,但日记作者已经开始认真思考到蓟县后自己该“怎样对待贫下中

① 与之相较,所谓抗震救灾模范事迹的评选却在第一时间便已着手展开。参见“推选我市出席中央战唐山丰南地震及出席我市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名额分配意见稿”(天津市抗震办,天津市档案馆藏,401206800)。

② “1976年7月28日”,“同山日记”。

③ “1976年8月3日”,“同山日记”。

④ “1976年8月5日”,“同山日记”。

⑤ 由于灾难性事件的突发性、危害性、恐惧性,很容易使经历者出现严重的心理失衡。在认知层面,会产生包括否认、自责、无力感、敌意、不信任别人等反应,形成所谓创伤心理(Trauma)。相关研究可参见伍泽莲、何媛媛、李红:《灾难给我们的心理留下了什么——创伤心理的根源及创伤后应激反应的脑机制》(《心理科学进展》,2009年第3期,第639~644页)。此外,关于唐山地震后,灾民的实际心理反应案例,可参见王绍玉、马春勤:《无形的震灾——唐山地震心理行为反应纪实》(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另根据事后调查,在唐山地震后,灾民需求的梯级结构明显呈现出底层化的特点,相关研究可参见邹其嘉、王子平、陈非比、王绍玉主编:《唐山地震灾区社会恢复与社会问题研究》(北京:地震出版社,1997年)。

⑥ “1976年7月25日”,“同山日记”。

⑦ “1976年7月25日”,“同山日记”。

农”，同时“自己又将怎样使贫下中农对自己信任呢”。<sup>①</sup>可能是听闻了一些年长知青的经历，同山在7月27日的日记中警告自己“对贫下中农要骄傲是不容许的，贫下中农最嫉妒骄傲而看不起他们的人”，“他们最厌恶知识青年在劳动中偷懒，最憎恨知识青年搞对象”。<sup>②</sup>

在经历地震而得以幸存后，虽然必须忍受着生活环境的困苦，苟且于余震阴影的笼罩。但同山又很快重新想起了即将迎来“上山下乡”安排，以至于他在自己的日记中不平地写道：“通过这次地震，使我更放不下心了，对上山下乡更有不满情绪了！”<sup>③</sup>、“我这时就想我完了，地震暂时没有砸死我，而前途却将要毁灭我”。<sup>④</sup>与“文革”初期积极投入运动的第一代红卫兵不同，同山这批后来者往往缺乏诸如“砸烂旧世界”般的革命豪情。相反，他们在目睹“文革”激情过后的各类社会乱象后，对此后革命运动很容易产生一种隔阂感甚至不满。<sup>⑤</sup>例如在8月3日的日记中，同山兴奋地写到“由于要去蓟县，倒使自己十分害怕，好像是一种逼压。甚至对‘上山下山’等于‘变相劳改’的说法，也不觉得可恶了，或者是说这种说法深合了人们的心愿”。<sup>⑥</sup>此处所谓“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的说法，显而易见是出自于《“五七一”工程纪要》。<sup>⑦</sup>

8月15日，学校的老师找到了同山，了解受灾的情况。同山得知他同年级也有人不幸死于地震，而他也由此明白了老师的来意：一方面确认他是否还能够上山下乡，另一方面也怕毕业分配的时候找不到人。<sup>⑧</sup>虽然心怀怨念，但同山同样明白上山下乡的政策短期内不会改变，“上山下乡对于我，和其他人一样，是迫不得已的事情”。<sup>⑨</sup>周遭甚至有人给同山出谋划策，教他伪造房屋倒塌或家中受损的情况，

① “1976年7月27日”，“同山日记”。

② “1976年7月27日”，“同山日记”。

③ “1976年8月3日”，“同山日记”。

④ “1976年8月10日”，“同山日记”。

⑤ 陈佩华将这类现象称之为“非政治社会化”，指出许多红卫兵的“革命热情”消退，往往出现于“上山下乡”的时期，随之而来的就是对高层的不信任感与失望情绪，参见陈佩华《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天津：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年，第235～241页）。不过，陈佩华论述的起点乃是“威权人格”之概念，适用与否，笔者认为有待商榷。

⑥ “1976年8月3日”，“同山日记”。

⑦ 林彪事件后，中共中央下发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材料，让普通民众都知晓这份被认为是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重要文件。在对林彪诅咒之声传遍全国的同时，各类异端的思想却悄悄萌生。《“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的许多批评性的言辞在客观上促使很多人开始对“文革”的种种现象做出新的思考，甚至刺激他们对整个“文革”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同山在日记中写下在当时近乎“大逆不道”的抱怨，竟与这份《纪要》中某些片段产生共鸣，也正验证了这个吊诡的社会现象。

⑧ “1976年8月12日”，“同山日记”。

⑨ “1976年8月9日”，“同山日记”。



以此为借口逃避上山下乡。虽然，同山对这类事情有所耳闻，但他却在地震前就早早退了户口准备去农村，如今再想办法留在城市的可能性就很渺茫了。唯一的希望是由于地震所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所以学校的分配工作可能会因此有所改变。在和同学聊天，同山听到自己也退了户口的伙伴同样心存幻想，他以为“我们一定走不了，全部留城，户口问题迎刃而解”。<sup>①</sup>

此后，同山都在为他的户口问题左右奔走。跑去学校找校领导，对方却不愿搭理，感觉就像“走上了断头台，心里很不是滋味，见了老师就像见了杀人魔王一样，从他们的眼里怀有一种鄙视我们的目光”。<sup>②</sup>当初逼下乡学生退户口的班主任，现今一瞧见同山便借口买烟而逃之夭夭。学校方面冷漠态度让同山这类学生感到无比的绝望，“既然是你逼我们退的户口，现在你又不管了，你这不是致（置）我们于死地吗？”此类愤恨情绪几乎充斥着那些天的日记，“总以为现在没有坏人了，其实不然，有的就是坏人，有的正在变为坏人，就是不曾变过恶人转变为好人。”<sup>③</sup>对同山而言，在经历过地震的洗礼后，他已经无法说服自己再去坦然接受上山下乡的命运。相反，上山下乡则成为了引爆同山内心种种不满的导火索，正如其在日记中所言“连最低生活水平都保证不了，怎么能让知识青年生活的下去呢？”<sup>④</sup>

震后一个月，学校方面则表示毕业分配仍将继续。<sup>⑤</sup>8月23日，学校果然召开大会，宣布新的分配方案。原方案说在4万6千名毕业生，有条件留城的是1万3千人。现在由于受灾，由于从下乡3万3千人中抽调1万留城到基建部门去。其中，若是已经退了户口，凡符合条件的，由区里统计后开证明，重新上户口。<sup>⑥</sup>于是，在那届的毕业生中也就多了一个所谓“震留”的新名词。30年后，仍有许多天津市民回忆称：8月底刚被通知重新上户口，9月1日就去建筑公司的工程队报道了。<sup>⑦</sup>不过，同山却未成为“震留”大军中的一员，依旧上不了户口，只能继续等待上山下乡的命运。他所在班级共37人，其中24人留工矿、1人社会招工、2人返回原籍，其余10人全部分配下乡。面对这个无法改变的局面，同山显得心灰

① “1976年8月14日”，“同山日记”。

② “1976年8月18日”，“同山日记”。

③ “1976年8月19日”，“同山日记”。

④ “1976年10月13日”，“同山日记”。

⑤ “1976年8月22日”，“同山日记”。

⑥ “1976年8月23日”，“同山日记”。

⑦ 参见王遇桥：《震留：非常时期的名字》，载贾长华主编：《1976年大地震》，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81～82页。

意冷，写道“对于我的命运，变化不会太大了，我无力改变命运”。<sup>①</sup>

在等待最终分配的煎熬过程中，同山迎来了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被打倒的重要事件。如同他对“上山下乡”的态度一样，虽然形同惯例般在日记本上誊抄了几天的报刊社论，但年轻的同山却在9月16日的日记里对当时政治局势进行了大胆揣测：“现在物色领导人来，实在太不好办了。老将们不好接任，新人物又没有培养出来。成年人也就是华国锋了，张春桥又不太了解，姚文元又不是很出名。我多么希望姚文元出名啊！”随后的一个多月里，类似的言论屡次出现，如10月12日写道：“华国锋同志当选为主席，这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情”、“至于谁来当总理，还没有下文件，从形势来看很可能是张春桥，但也不一定，说不定是李先念”。17日的日记写道：“据说中央又出现了一次未遂政变。围绕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的继承人问题，中央的几个领导人展开了激烈斗争”。

虽然高层政局动荡，但“上山下乡”的动员分配依旧在继续。同山周遭的同学们“为了分配到好的工作岗位”，他们“真是不辞辛劳，走遍了老师的家”。但由于面子的问题，同山自己却始终难以下决心去“走后门”，只能在日记里感叹自己“太幼稚了”。<sup>②</sup>而他所能做只是热心参加学校组织的劳动。据说当时天津其他学校凡属上山下乡的毕业生都不组织参加灾后重建的劳动，唯独同山的学校是个例外。他自己也比“分配到工矿的同学都积极”，只是希望通过优良的劳动表现来换取“学校的照顾，分配到近一点、好一点的地方去”。虽然明知这种做法“也许很幼稚”，仍存一丝幻想——只要“能够起到一点作用，再坚持几天吧！”<sup>③</sup>

不过，命运终究是无法改变的。1976年10月29日，学校和蓟县方面正式通知同山：他被分配至蓟县杨津庄马龙港大队。对同山而言，“分配到近一点、好一点的地方去”的希望就“像泡影一样，被学校踩灭了”。<sup>④</sup>事后，同山发现在学校公布的“下乡榜”上，自己的名字被排在了第一个。目睹此景，非但没感到荣幸，反而觉得“有一股被当作傀儡的感觉”。果然，老师瞧见他，便要推他作为代表讲话，但却遭拒绝。此时的同山已经认定“今后要量力而行，能挑九十九绝不挑一百”的道理。

“文革”前后，广大知青日记也往往显现类似的情感表达。虽然，一方面当时写日记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政治化的仪式；但在另一方面知青日记对周遭环境，对

① “1976年8月23日”，“同山日记”。

② “1976年9月27日”，“同山日记”。

③ “1976年9月29日”，“同山日记”。

④ “1976年10月29日”，“同山日记”。



日常生活同样会给予关注的。以日记为代表的私人写作，不应被盲目视为社会大范围推行意识形态的简单翻版。每一份日记都需要被视为单独个案，进行具体的剖析。该份日记保存了唐山大地震前后约四个月的记录，从中可以挖掘出不少生动、真切的历史细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正可以帮助我们窥得“文革”末期真实的灾后社会心态。

以该日记而言，自我安抚、自我宣泄、自我解惑或可被视为作者最重要的写作动机之一。在地震之前，作者或许是希望用一些革命的大道理来安抚不安。然而待地震之后，日记本则变成了他发泄个人不满的场所。而这类心态的表露，也给予了研究者观察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与个人历史心态（Historical Mentality）间彼此差异的机会。通过这种考察，或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文革”末期普通知青的内心感受。同时，也让研究者能够了解日记作者的写作心理，从而更好地对这类日记文本进行解读。

#### 四、始于余震的上山下乡：结合过往知青生活的比较

同山终究难逃发配蓟县的命运。然而，若就在几年前，天津知青若能分配到此处已经算是非常照顾的下乡安置，甚至还需要“开后门”才能办到。实际上，蓟县已于1972年从河北省划归了天津市。只不过，当时的天津市民在习惯上仍将上述地区视为“外地”而非市郊。在此之前，天津知青所面对的境况要比此时严峻得多。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直辖市中，天津知青跨省安置的比例最大。1967年，天津重新恢复为中央直辖市后，全市面积仅为4994平方公里，仅相当于现今天津市的一半。当时天津郊区幅员狭小，根本无法应付源源不断的知青大潮。于是，这也就造成了大批早期的天津知青被迫跨省安置的局面。他们的足迹遍及黑龙江、吉林、辽宁、宁夏、甘肃、内蒙古、山西、新疆以及河北等九个省、区。这个情况直到1972年8月，国务院批准将蓟县、宝坻、静河、宁河、武清等五县正式划归天津后才有所变化。自1973年12月，和平区首批初中毕业生赴蓟县插队落户后，和平区的知青也开始大批被陆续分配至该县。<sup>①</sup>

<sup>①</sup> 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天津市和平教育年鉴：1949～1983》（征求意见稿），内部编印1984年版。

表 4: 1974 - 1975 年天津市和平区知青上山下乡分配情况表

		1974 年	1975 年
上山下乡知青总数		4240	1714
具体分配情况	蓟县	1083	879
	农场	242	362
	返回原籍	2245	269
	厂社挂钩	184	173
	内蒙古	16	21
	其他	470	10
(单位: 人)			

资料来源:《天津市和平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1975年》,第71页。

11月6日下午,学校召开欢送会,郁闷的同山故意拖了一个小时才去了会场。面对会场里尴尬的气氛,校领导也没了讲话动员的兴致,原本计划举行的座谈会只好草草结束。大伙儿各自拿了慰问的礼品,马上就各自回家了。<sup>①</sup>两日后,心怀忐忑的同山便已坐上火车,前往蓟县杨津庄马龙港大队——那里将是他“学习和改造思想的第二学校”。<sup>②</sup>

到达蓟县不久后,陪同下乡的两位老师在离开蓟县前,给同山和他的同学提出了五点要求:一、多干活,少说话;二、服从当地的领导;三、加强内部团结,统一思想;四、不要搞分裂,不要闹意见;五、不要私下议论人。此外,他们还特关照同山“不要掺和到个人闹意见的纠纷中去”,也千万“不要掺和到社员闹派性中去”。<sup>③</sup>显而易见,这些建议既不是虚无缥缈的革命口号,也不是热情洋溢的动员令,反倒更像是在传授相处安居的经验教训。虽说有了老师这番告诫,但面对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环境,知青情绪依旧十分恶劣。

正式开始劳动的第二天就发生了知青之间严重斗殴事件。大队书记亲自赶来解决,为此事还专门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进行公开批评,端正知青的思想作风。<sup>④</sup>同山无奈地在日记感叹:“知识青年的集体生活才开始几天,就出现了问题,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啊!”<sup>⑤</sup>另一方面,虽然才来当地几天而已,同山却已经意外发现了“贫下中农”也有着不少“坏作风”,所谓“私有观念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不能自

① “1976年11月6日”,“同山日记”。

② “1976年11月8日”,“同山日记”。

③ “1976年11月9日”,“同山日记”。

④ “1976年11月14日”,“同山日记”。

⑤ “1976年11月23日”,“同山日记”。



拔”。<sup>①</sup>虽然才刚来马龙港大队，但同业已观察到“社员之间体现不出共产主义的协作精神，而表现出来赤裸裸的商品关系，多干一点都不肯，都拿性命来维护自己的利益”。<sup>②</sup>

虽然并非是最贫苦的乡村，但蓟县的劳动生活也不轻松，而且充实了许多城市知青所始料未及的东西。第一天的下乡劳动便是从出河工开始的，“由于从没干过此活”，所以同山“心里没谱，唯恐干不好”。<sup>③</sup>因为听说“队里用工分来衡量我们”，于是也让这些初来乍到的知青有些紧张，“我们现在干活是挣工分的基础，现在干不好，以后就不要再想挣工分了”。<sup>④</sup>与其他地区的知青一样，大多数知青一般都很难自给自足。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从事集体生产所得的收入总比当地农民低，而个体收入他们同样也是较低的。在分配工分时，知青所得自然较少。那些全力投入劳动的知青往往会因此而觉得不公，可在地方干部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久而久之，知青难以自足的下乡生活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灰心丧气和抵触情绪自然也由此而生。<sup>⑤</sup>

当知青还在琢磨初下乡的五味杂陈时，他们又再一次遭遇了地震的威胁。11月15日深夜，宁河、南丰一代发生6.9级强烈地震。<sup>⑥</sup>地震发生时，同山正在给同学写信，“猛然间发生了地震”，他“急忙叫醒了睡熟的战友，他们都穿着小裤衩跑了出来”。作为唐山大地震余震的宁河地震进一步加重了天津地区的地震损害，继而又引起了当地知青的“思想波动”。<sup>⑦</sup>当知青们听说天津南市地区受灾严重的情况后，便有人哭着非要回家去看看，结果直接找到大队党支部。在强烈要求之下，党支部批准当地知青派代表回天津市区看望家人安危。于是，下乡不到10天，便已经有知青想方设法返城探亲了。而在1975年，同山家所在的和平区就有多达

① “1976年11月12日”，“同山日记”。

② “1976年11月17日”，“同山日记”。

③ “1976年11月12日”，“同山日记”。

④ “1976年11月12日”，“同山日记”。

⑤ 相关分析可参见潘鸣啸（Michel Bonnin）著，欧阳因译《失落的一代：中国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7～239页。

⑥ 参见“1976年11月15日天津宁河6.9级地震”（《中国地震年鉴：1949～1981》，北京：中国地震出版社，1990年，第325～326页）。

⑦ “1976年11月16日”，“同山日记”。

1160名知青以病退、特困等各种名义返城回津。<sup>①</sup>

此后，在接下来陆续召开的知青生活会上，“同志们对政治没有任何反应”。在同山看来“造成一个浓厚政治气氛的幻想，将会成为泡影”。他以往总是听说“现在绝大多数青年都不要进步”，如今却只能感叹“这种人所说的话如今在我们集体中得到了证实吗？”其实，同山自己又何尝不是其中一分子呢。之所以对周围同学冷漠不满，可能还是因为他自己觉得“如果脱离了政治，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多么的无聊”。<sup>②</sup>在早年的老红卫兵中，有不少人都有明确的政治理想并投身运动，他们在下乡后也会希望在同伴之间继续讨论政治。然而到了“文革”后期，这种知青之间的政治讨论，多半早已流于形式，又或是难以组织，甚至反而逐渐成为产生异端思想的温床。<sup>③</sup>

下乡不足半月，繁重的劳动和毫无生趣的氛围已让同山对蓟县的知青生活没有任何奢望。公社里的当地干部曾跟同山抱怨说“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忘恩负义，欺骗了很多社员，社员不是给咸菜，就是给烟叶，结果一选调就把我们都忘了。”<sup>④</sup>虽然同山也觉得知青把“第二故乡忘记是没有道理的”，但当他自己从大队广播上听说“大专院校要招生”的通知后，也立刻就开始思考将来自己的出路。他在日记中坦承：“对于我确实需要在农村锻炼几年，但不适宜在农村扎根一辈子”。这次通知里的招生条件比较苛刻：一、报名者必须有两年“农龄”，二、高校深造的原则是“社来社去”，即毕业后仍要回到原来的公社。尽管如此，同山还是不愿放弃日后考大学的想法，以至于他周围同学得知后都嘲笑他将来“可能因为考不上大学而得精神病”。<sup>⑤</sup>

正如同山这类知青所亲身感受的那样，上山下乡运动推进至此，在基层渐已是末路。其实，早在1975年8月举行的知青办长春座谈会上，便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希望实行知青的轮换制度，而不是长期甚至一辈子插队落户，所谓“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sup>⑥</sup>为了反击这种思想倾向，时任副总理吴桂贤于1976年2

① 天津市和平区革命委员会计划统计科：《天津市和平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1975年》，内部编印，1976年，第71页。此外，关于全国范围内知青“病退”、“困退”的宏观论述或可参见史卫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病退”和“困退”问题》（《青年研究》，1995年第2期，第46～49页）。另可参见潘一：《知识青年大返城风潮动因探寻》（《青年研究》，1994年第3期，第26～28页）。

② “1976年12月12日”，“同山日记”。

③ 参见潘鸣啸著：《失落的一代：中国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年》，第342～344页。

④ “1976年11月28日”，“同山日记”。

⑤ “1976年11月18日”，“同山日记”。

⑥ 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136页。



月1日向毛泽东转呈一封基层反对大批知青招工返城的信件。此时的毛泽东也已病重，2月12日只下一句批示：“印发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于是，为贯彻这项最高指示，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在5月初正式成立。成立之初，领导小组便调集人马赶赴全国各地调研，为原定11月召开知青问题会议收集情况，寻找所谓“扎根派”和“拔根派”的典型。然而，整个调查工作却因为唐山地震而被迫暂时中止。9月9日毛去世，接着则是10月6日“四人帮”遭到逮捕，会议被无限期推迟了，关于知青问题的讨论也就被暂时搁置起来。直到1980年，整场运动方告收场。

至于同山日后的命运，日记中并没有交代，记录终止于1976年12月13日。在天津郊区插队的同山，很有可能早已返回天津市区的原籍。<sup>①</sup>然而，那段刻骨铭心的地震经历，也必然会使他日后的知青生活多了一份异样的色彩。

## 五、一些思考

当人们回顾灾难时，总会倍加珍视当事人的回忆，将之视为有价值的事物。美国史学家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曾在其名作《美国生活中的大屠杀》中描述了1960年代后美国社会对犹太大屠杀的“神圣化”过程。<sup>②</sup>这种“神圣化”的结果便使得那些叙述大屠杀的证词拥有了不证自明的可靠性，也使研究者可以完全不必担心此类回忆的准确性。于是，最重要的乃是收集、保存和接受证词的仪式过程，而非将其作为证据的内容本身，所谓“记忆”便就变成了“纪念”。<sup>③</sup>然而，如果后世的研究者仅仅把历史看做“纪念物”，那也就相当于将历史叙述局限于当下的想法与行为之中。在唐山大地震的例子中，灾难记忆本身成为了纪念与崇拜的对象，关于遭遇的回忆性叙述似乎也成为了我们了解当时社会实态的仅有资源。然而，对实际历史认知的不足也会妨碍后人触及在灾难中社会形势演变的实际脉络。换言之，研究者需要的是通过其他形式的历史遗迹来与事后回忆进行史学层面的对话，继而予以验证。

自1949年后，尤其是1960年代后的十余年间，日记写作成为一种国家所推崇

<sup>①</sup> 虽然绝大部分在天津郊区农村插队知青都在“文革”后陆续回到市区，但根据周杰荣（Jeremy Brown）所做的田野调查，仍有少量天津知青并未返城而是留在了郊县。

<sup>②</sup> Peter Novick, *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Life*, Mariner Books, 2000.

<sup>③</sup> 阿兰·梅吉尔：《记忆与历史》，赵晗译，《学术研究》，2005年第8期，第84～95页。

的政治仪式而进入青年的日常生活。在这些日记中，自然会充斥着高度政治化的口号式言论，但形式上的表征背后仍隐藏着日记书写者各自不同的写作内涵与动因。艰苦的生活环境，一再崩溃的革命理想，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足以让许多年轻人感到迷茫与困惑，甚至倍感压力。<sup>①</sup>于是，原本作为革命生活政治仪式的日记写作也逐渐转向为个人化的表达需求。以“同山日记”为例，便可以读到他如何在日记的字里行间发泄对知青命运的不满，又是如何在笔尖下调试安抚这种愤恨的情绪。通过对其所记叙内容的考证与重建，浮现在我们眼前的不仅是一段地震灾害前后的社会现实，更是“文革”末期中国基层生活的缩影。

当然，任何私人叙述类的材料固然不可能完全与历史事实相契合，但却可以帮助研究者来填补基本事实之间所遗留下的空隙。在中国当代史的研究领域中，唯有尽可能地填补这些空隙，方能真正理解当时当地的历史情境，同时也能让研究者真正走进那些“无名者”的生活。<sup>②</sup>这些社会基层的“无名者”虽常被卷入各种运动，但他们却并非是绝对的盲从者或者纯然被动的接受者。相较于社会名人的记述，社会中下层那些“无名者”的个人记述，反而更应予以特别的关注。<sup>③</sup>无论是面对天灾还是人祸，任何普通人的经历都是独特而值得关注的，因为他们才是那段历史真正的承载者。

<sup>①</sup> 参见吴艳红、David J. Knottnerus:《日常仪式化行为的形成：从雷锋日记到知青日记》，《社会》，2007年第1期，第98～119页。

<sup>②</sup> Frederik Rosen, “Off The Record: Outsourcing Security And State Building To Private Firms And The Question Of Record Keeping, Archives, And Collective Memory”, *Archive Science*, 2008 Vol.8, pp1～14.

<sup>③</sup> 社会中下层人士的日记往往不存在日后公开示众的顾虑，按照罗志田的说法这类人的日记时常“存在一个‘为人’到‘为己’的过程”，有时候反比那些专门写给他人看的名人日记更有史学价值。参见罗志田《日记中的民初思想、学术与政治——20世纪20年一位学人观察》（《东方文化》，2003年第2期，第24～30页）。





中国当代史研究

外稿选译





# 接生的故事

——1950年代中国农村接生婆

贺 萧\*

**摘要** 相比以往研究多将现代国家与旧产婆、旧式接生术对立起来的观点，贺萧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旧产婆之间的实际关系异常复杂。新的革命政权对旧产婆在农村妇女生育领域所具有的举足轻重作用有着十分清醒和现实的认识，在新中国成立伊始不但未排斥旧产婆，反而花费了极大力气重新训练旧产婆以发挥她们在妇女生育领域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对妇女生育问题的重视逐步服从于动员妇女参加集体劳动这一宏大目标。同时，国家在宣传一些作为社会主义劳动模范样板的产婆时却回避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产婆与所谓“迷信”领域的关系。这些都说明了在探讨妇女（包括其生育问题）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学者们更应当关注处于历史叙事边缘地带的妇女自身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 农村 产婆 接生术 国家

1996年，我和中国的研究者高小贤一起开始探讨1950年代农村社会主义建设

---

\* 作者贺萧 (Gail Hershatter)，圣克鲁斯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天津的工人，1900～1949》(1986年)、《个人的声音：1980年代的中国妇女》(与艾米莉合著，1988年)、《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1997年)、《中国漫长20世纪中的妇女》(2007年)。



的最初十年：这是一个令人充满好奇却又被历史遗忘的年代。<sup>①</sup> 研究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著作往往会讨论 1950 年代的一系列运动及其影响。然而对于 1950 年代权力中心以外的情况，我们却知之甚少，更不用说边远地区 / 边缘人群的历史。国家公开宣扬的各种政策，和当时国家机构内外的人们对即将发生的一切的理解，以及大约半个世纪之后回顾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这些人所想起的之际，分别是什么关系？有可能为以上问题提供答案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中国农民的个体和群体记忆；而这也因当事人的衰老和死亡而越来越难以搜集。

在这些正在迅速消失的乡村记忆中，我们最关注的是妇女的记忆。假定 1950 年代农民占总人口的 80% 左右，那么农村妇女大约占 40%。<sup>②</sup> 尽管数量庞大，她们却因其出生地（农村）和性别（女性）而被双重边缘化了。文字记载几乎无法告诉我们这些妇女对国家动员的反应，她们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 1950 年代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社会、心理各层面她们有多大改变。要想对农村妇女有所了解，我们必须超越国家公开宣扬的各种政策。通常认为 20 世纪中国历史被 1949 年革命，也就是解放，一分为二。但当以性别为关注焦点时，我们对 20 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转折点的理解会产生什么变化？历史学家乔安·凯丽（Joan Kelly）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曾经提出：“妇女也有文艺复兴吗？”如果她不是写欧洲史而是写中国史的，她很可能会问：妇女也有中国革命吗？如果有，是什么时候？为了研究这些问题，我和高小贤重点采访了关中和陕南的四个村子，搜集了大约 70 个 60 岁以上妇女的生活史。<sup>③</sup>

本文介绍的是建国初期生育习惯的变化。研究这一变化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解放前的接生活动和解放后的国家动员是怎样交融在一起的，以及这二者对农村妇女

<sup>①</sup> 本研究于 1996 年开始、2006 年结束，主要经费由卢西基金会美中合作研究项目（Luce Foundation's U.S. - China Cooperative Research Program）提供，加州大学太平洋沿岸地区研究计划（Pacific Rim Research Program）也提供了部分经费。在此，我向我的研究伙伴，陕西省妇联研究室主任、妇女研究会秘书长高小贤致以最深切的谢意。我还要感谢在两次艰难的访问行程中帮助过我的王国红和赵晨。我还要感谢我能干的研究助理姜进、Lyn Jeffery、康文庆、孙晓萍和莫亚军，这部分经费由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学术理事会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Research of the Academic Senate）提供。我个人对此论文中发表的观点完全负责。此论文是我正在写作中的《记忆的性别》的一部分。文中除刘西罕以外，所有被采访者的名字均为假名。

<sup>②</sup> 这一估计极不严谨。相关城市人口数据，见 Judith Banister,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29。城市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率逐年增加，从 1949 年的 10.6% 增加到 1959 年的 18.4%。Banister 在第 25 页给出 1953 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全国人口性别比例是 107.6:100，而农村的男性比例很可能更高。

<sup>③</sup> 这些村子都远离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陕北：B 村位于关中的植棉带；T 村位于陕西西南，靠近四川，主要种茶和水稻；Z 村在陕西东南山区，接近河南和湖北；G 村在渭北山崖上。

生活和态度的影响。文献和档案资料对理解 1950 年代发生的变化至关重要，但是只有口述史的搜集整理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个体生育经历的记忆、家庭关系以及接生婆和国家动员在改变个体记忆和家庭关系上所起的作用。

## 一、接生婆与国家

1950 年 6 月，妇联的一小组年轻干部来到了西安以南的长安县西韦曲村。<sup>①</sup>在两个新法接生员的陪同下，她们来调查农村妇幼卫生工作。在共产党农村地区的国家建设过程中，这一举动如此之早令人吃惊，甚至比附近地区的土改还要早。<sup>②</sup>

她们的工作开始时并不顺利。当时村民正忙着收麦和筑坝，大多数妇女在田里劳动，<sup>③</sup>不能来开会。由于调查人员询问有关孩子的情况，还问是谁给接生的，有的村民担心她们是来抓孩子或者惩罚产婆的。工作组不得不从西韦曲转移到东韦曲，因为一个组员正好在那里有点私人关系。通过她的关系网，她们找到并逐一走访了六个产婆。<sup>④</sup>

最初产婆满心疑虑，害怕政府禁止她们接生。当工作组解释说是来向她们学习接生时，她们才慢慢地放松了，并且全面而详细地描述了处理各种难产的方法以及四六风的防治方法。其中一些方法活生生地体现了生育的危险和农村医疗设施的匮乏，比如在生产威胁母亲生命时如何肢解胎儿。还有一些则是没有进行消毒的结果，比如新生儿普遍感染了破伤风，由此死亡的婴儿占新生儿死亡总数的将近一

<sup>①</sup> 陕西省档案馆把这份年代不详的材料和 1950 年的材料归为一档。《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日期不详（1950？）。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178（陕西省妇联档案），目录号 106，案卷号 002（以下略写：陕档 178 - 106 - 002）。1950 年 4、5 月的新闻报道可以证实调查妇女健康的迫切需要。见《群众日报》1950 年 6 月 27 日，第 2 版。

<sup>②</sup> 这项妇婴卫生调查比 1950 年 6 月才在全国范围内宣布的土改还要早。本书中周杰荣（Jeremy Brown）对中国西南的讨论和高崢（James Z. Gao）对新疆的讨论都表明，新生政权的巩固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鉴于此，这项卫生工作这么早就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首要任务，实在令人惊讶。位于长安县东北的渭南专区直到 1950 年 10 月才开始大规模的土改。参见渭南地区农业合作史编委会编：《渭南地区农业合作史料》，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7-8 页。然而渭南县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已于 1950 年 5 月召开并成立了县妇联。参见渭南县志编辑委员会编：《渭南县志》，陕西：三秦出版社，1987 年，第 491 页。如果长安县也按照类似进度，且调查人员是妇联的人，那么妇婴卫生和生育行为的调查就是这一新组织采取的第一次行动。

<sup>③</sup> 尽管有对户外劳动的种种限制，关中妇女在农忙季节都下田劳动。有关详细论述，见 Gail Hershatter, “Local Meanings of Gender and Work in Rural Shaanxi in the 1950s,” in Gail Henderson and Barbara Entwisle, eds., *Re-Drawing Boundaries: Work, Household, and Gender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79 ~ 96。

<sup>④</sup> 《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陕档 178 - 106 - 002，第 1、2、9 页。





1950年代初北京郊区农村六郎庄就办起了农忙托儿所，图为一妇女将刚出生不久的幼儿送到托儿所。

半。当地的新生儿死亡率为38%（195个婴儿死亡），<sup>①</sup>与中国其他地方农村新生儿死亡率大体接近。<sup>②</sup>

村里出生的522个婴儿中，只有8个不是用旧法接生的。<sup>③</sup>共有3个妇女接受了“新法接生”，其中一人是新法接生员的姐姐；<sup>④</sup>另两人，因为她们的婆婆太老了，

<sup>①</sup> 该村出生的522个孩子中62%活了下来，死亡婴儿中84个（43%）死于新生儿破伤风，111个死因不明。该调查未注明这522个孩子是在多长时间内出生的。其中521个平产，278个男孩和243个女孩，还有一个男孩是难产。参见《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陕档178-106-002。同期的一份省级报告指出，该村出生的522个婴儿中514个用旧法接生，其中314个死亡。这一巨大差异说明同类报告的可靠性也很值得怀疑。见民政部档案：《陕西省1950年妇婴卫生调查总结》，1950年，陕档198-113-2（原文如此），第29～34页。

<sup>②</sup> 1928年全国新生儿死亡率大约为250%，许多死于新生儿破伤风。Marion Yang, "Midwifery Training in China," *China Medical Journal* 42 (1928): 769。另见Ka-che Yip,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 ~ 1937*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5), 10。农村死亡率很可能更高。1951年中央妇幼卫生小组的一份调查估计，在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每年有83万多个婴儿出生，死亡率为285%，大约为23.8万个。参见《群众日报》1951年12月1日，第3版。

<sup>③</sup> 这项调查中的婴儿出生数字有出入，一说521个，一说522个，其中8个用新法接生（有6个是一位母亲生的，另两个是由其他两位母亲生的）。

<sup>④</sup> 这个新法接生员肯定是在1949年共产党到来以前就受过训练的，因为到1950年为止她已经为姐姐接生了6个孩子。

没法接生，则是从当地妇女代表那儿知道的新法接生。<sup>①</sup> 妇联工作组的报告指出，这8个孩子全都健康地活了下来，所以村民们都夸新法接生好，但他们仍然顾虑重重。

这份起草于共产党解放关中头几个月的报告，预示了贯穿合作化时期妇女卫生工作始终的很多主题。这包括妇女卫生工作是国家首要任务之一，妇女健康的关键是生育安全，而只有良好的接生技术才会使之成为可能。接生改革是中国农民直接接触新政府的最早事件之一。

很多研究接生问题的著作都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直线式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国家努力把科学知识和科学实践带进农村的过程。约书亚·古德斯坦因（Joshua Goldstein）指出，培训新法接生员的运动是党和国家“把妇女生育行为从地方关系网与地方机构中脱离出来，而将其重构于新的国家体系中”的一种努力。<sup>②</sup> 他认为，通过把封建与科学对立起来，“孕期保健工作者被动员起来去消解”旧的惯例。<sup>③</sup> 事实上，他引用的1950年代国家出版物《新中国妇女》的许多文章都把农村接生描绘成“封建、迷信、落后”，旧式产婆则“思想封建、自以为是而且不愿意学习”。<sup>④</sup>

迪莉亚·达文（Delia Davin）对产婆给予了稍微肯定的评价。她认为国家提供了科学，而旧产婆奉献了辛勤的汗水。“许多‘学员’是乡村产婆。尽管她们的脏手和长指甲感染了无数的妇女，但这些产婆有多年的实践经验，一旦其经验和一点理论知识相结合，她们就成了能干的卫生工作者”。<sup>⑤</sup> 然而，哪一方面占主导地位却一目了然：无知的产婆必须接受科学方法的训练，否则她们会对妇女健康造成威胁。

这两种讨论都很有价值。国家的确批判旧产婆，也的确重新培训并利用她们。然而，接生习惯的改变并不仅仅是一场新中国与封建愚昧的一次性交锋，而是一种

① 《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陕档178-106-002，第2页。

② Joshua Goldstein, "Scissors, Surveys, and Psycho-Prophylactics: Prenatal Health Care Campaigns and State Building in China, 1949 ~ 1954,"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1.2 (June 1998), 154.

③ "Scissors, Surveys, and Psycho-Prophylactics: Prenatal Health Care Campaigns and State Building in China, 1949 ~ 1954", 156.

④ "Scissors, Surveys, and Psycho-Prophylactics: Prenatal Health Care Campaigns and State Building in China, 1949 ~ 1954", 163,162.

⑤ Delia Davin, "Women in the Countryside of China," in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Margery Wolf and Roxane Witke, ed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257; Delia Davin, *Woman-Work: Women and the Part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Oxford, New York, Toronto, and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131 ~ 132.



更加广泛却又暧昧不明的互动。政治运动的语汇和时间概念无法完全捕捉到这种互动。共产党国家继承了国民党政府开始使用的语言和政策，但其在农村的执行程度要广泛和深入得多。政府官员和接生婆的接触方式与土改（甚至婚姻改革）中的对抗性策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旧产婆没有被丑化，也没受到攻击和排挤；相反，她们的技术得到了全面的调查和汇报，她们还受到强化训练。她们是结合对象而不是讨伐对象，并且被当做重要资源。直到50年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多数陕西农村妇女还是习惯于在家里生孩子，而且许多是由受过简单复训的旧产婆接生的<sup>①</sup>。一些在解放前就为人接生的产婆甚至参与了解放后新一代接生员的培训工作。

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考察接生活动和接生人员的连续性问题。乐观地讲，我们可以认为这一连续性表现出了国家各级政府的适应能力和实用主义，没有把产婆妖魔化，而是充分利用她们的技术，同时提高她们的服务质量。不太乐观地讲，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国家并没有始终如一地把妇女生育健康当做首要任务，它利用更多的资源来动员妇女参加劳动，而不是用来改变妇女的生育环境。高小贤注意到，新法接生直到70年代才开始在陕西普及，远远落后于50年代对促进合作化和动员妇女下田劳动所做的努力。生育上的革命比生产上的革命进行得慢得多。<sup>②</sup>在官方对迷信的接生活动和封建家庭关系的谴责声中，当年轻妇女被号召下田劳动时，她们关于生育的身体经验和社会经验有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没有，这对于我们理解革命有什么寓意？

## 二、两个政权，一种政策

在促进生育习惯的科学化、现代化时，共产党政权继承了国民党在南京政府时期就开始的努力。国民政府于1928年设立了卫生部，并立即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要求接生员接受为期两年的培训或类似训练，以便在政府登记注册。旧产婆要接受两个月的训练，并也要登记注册。<sup>③</sup>卫生部还设立了全国助产士协会，由其负责在北平和南京组织开办助产士学校来培训接生员、复训旧产婆。包括陕西在内的几个省也开办了助产士学校。1935年包括政府代表在内的卫生教育委员会建议扩大

<sup>①</sup> 复训是当时的用语，即对旧产婆按新方法进行再训练的意思。——译校者识。

<sup>②</sup> 高小贤，私人谈话，2000年10月。

<sup>③</sup>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 ~ 1937*, 58 ~ 59。另见“Midwifery Training in China”, 774 ~ 775；以及“Editorial: Midwifery Training in Peking,”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42 (1928), 782 ~ 84。

培训乡村助产士。<sup>①</sup>就像南京政府时期国民党的许多政令一样，关于助产士的规章制度也收效甚微，在农村尤甚。<sup>②</sup>

民国时期新法接生员和旧产婆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大多来自中上层家庭，在城市接生；而后者主要在乡村接生，其数量大大超过了前者。<sup>③</sup>费侠莉（Charlotte Furth）指出：“在1930年，20世纪公共卫生改革家玛丽安·杨（Marion Yang）估计大约有20万旧产婆需要复训”。<sup>④</sup>国民党的政策承认在今后的若干年里旧产婆仍很重要，但她们的接生方法却遭到了公共卫生专家的强烈批判。有人谈到福建产婆用牛粪敷脐带导致的恶果；还有人“哀叹缺乏教育的旧产婆根本没法掌握现代医学的基本理论，培训班毕业之后就马上回到老办法上去了”。<sup>⑤</sup>1928年玛丽安·杨在一篇关于接生培训的文章里用了一幅照片：一个妇女坐在篮子里，一个抬篮子的男人站在她旁边。照片的说明让人一身冷汗：“中国旧产婆（坐在篮子里）。她只能用双手和膝盖爬行。人们看到她从这个姿势直起身来，用衣襟擦擦手，没再做任何其他清洁，就把手指直接伸进了产道”。<sup>⑥</sup>旧产婆是常常被诋毁的他者，而现代医学实践就是以这个他者的反面来界定自己的。但是，在绝大多数农村地区这些产婆是人们唯一可以获得的资源。而且正如李廷安在1935年的一份农村卫生研究里所指出的，大部分农民根本不相信新法接生。<sup>⑦</sup>

---

①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 ~ 1937*, 165 ~ 172。1934年陕西建立了一所助产士学校，招收18岁到25岁的未婚女性学习三年，包括一年实习。该校每年招收30人，对农村卫生习惯却没什么影响。秦燕、岳珑：《走出封闭：陕西妇女婚姻与生育，1900 ~ 1949》，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0页。

②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 ~ 1937*, 59。

③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 ~ 1937*, 167，概括了江西南昌有关此情况的一份调查。

④ Marion Yang, “Control of Practicing Midwives in China,”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44.5 (1930): 428 ~ 431，引自 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 ~ 166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298, n. 68。在更早的一篇文章中，Yang 估计需要复训的旧产婆为40万人。Yang 1928, 774。

⑤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 ~ 1937*, 10, 167。

⑥ Yang, “Midwifery Training in China” (1928): 插图 768/769。Yang 在第769页引用的数字为：中国产妇死亡率为15%，新生儿死亡率为250，~ 300‰。

⑦ 李廷安：《中国乡村卫生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5页。李指出，尽管有一个长期的农村卫生项目，定县90.7%的婴儿由旧产婆接生，10%由接生员接生，0.3%自己接生。关于各种生育流行病的简要介绍、造成产后感染的诸多原因，以及对训练有素的接生员的需求情况，见第65 ~ 68页。



共产党继承了这些做法，既批判和复训旧产婆，又努力训练新法接生员。<sup>①</sup>国民党和共产党有关接生问题的区别不在观念上，而在实践上。共产党在农村的渗透力要广泛而有效得多；相应的，其农村接生改革也影响了更多的人。

1950年5月，由几个国家机构联合派出的三个工作组下乡调查妇幼卫生情况。这是农民与新政府最初的一些接触。<sup>②</sup>和此后那些类似的运动一样，工作组的中心任务是改造旧产婆。工作组发现产妇大多死于大出血和产褥热，而50%的新生儿则死于破伤风。<sup>③</sup>有两条陕西谚语形象地概括了这一情况：“只见婚嫁妇，不见生儿女”；“只见娘怀儿，不见儿走路”。<sup>④</sup>

在为期三周的调查中，工作组教育了十个产婆用开水洗手，消毒剪刀，在接生时把剪刀放在蒸锅里，这样剪脐带时剪刀可以保持干净。“工作组的经验之一是对待旧产婆的态度，应是团结、教育、逐渐改造她们，不能嘲笑、讽刺、打击”。<sup>⑤</sup>

1950年8月，卫生部召开了全国妇幼卫生工作者大会，展开了一场消灭产褥热和破伤风的运动。<sup>⑥</sup>此后十年里，中国农村新生儿死亡率有了大幅度下降，可能比以前的300‰减少了一半。<sup>⑦</sup>伊丽莎白·卡罗尔（Elisabeth Croll）注意到：“‘怀一个，生一个；生一个，活一个’这个家喻户晓的口号反映了对婴幼儿健康的关注”。<sup>⑧</sup>提高新生儿存活率的最主要措施是卫生部和妇联的复训旧产婆的方案。<sup>⑨</sup>1959年，回顾十年来的卫生工作，有人指出，接生员的数量已经由15700人增加到35290人，而“助产士”（即复训的旧产婆和接受短期训练的接生员）的

① 有关妇女卫生工作和改造旧产婆之必要的早期文献，见陕西省妇联：《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续集），出版者不详，1985年，第165～166、356页；另见《走出封闭：陕西妇女婚姻与生育，1900～1949》，第179～205页。有关陕甘宁边区1944年4月开始的妇女卫生运动的简述，见陕甘宁三省区妇联：《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述》，出版者不详，1987年，第166～170页。

② 这几个工作组调查了宝鸡、蓝田以及西安郊区。《群众日报》1950年6月27日，第2版。

③ 《群众日报》1950年6月27日，第2版。

④ 《群众日报》1951年12月1日，第3版。

⑤ 《群众日报》1950年6月27日，第2版。

⑥ Kahti Lim,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in Past Ten Years,"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79.5 (November 1959), 375.

⑦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82～83。她认为五十年代中期的许多农村调查结果过于乐观，并对其持怀疑态度。

⑧ Elisabeth Croll, *From Heaven to Earth: Images and Experiences of Development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183.

⑨ "Scissors, Surveys, and Psycho-Prophylactics: Prenatal Health Care Campaigns and State Building in China, 1949～1954," 153.

数量已经从 44000 人增加到 774983 人。<sup>①</sup>

### 三、旧法接生：困难与危险

1950 年政府工作人员走访的一些旧产婆描述了难产的种类及其接近残酷的应对措施。“井圈生”是指产道太窄胎儿无法分娩出，产婆用腿支撑产妇的后背，把她往后拉，挤按产妇的肚子把胎儿挤出来；要么就神道道地“把井绳用斧头砍断，或用斧头在井口砍三下”。如果胎儿还生不下来，产婆就会问产妇的长辈是要母亲还是要孩子。如果要母亲，产婆就用一个钉子做成的钩子或者砍柴刀把胎儿拉出来，有时用刀或者镰刀把胎儿肢解在子宫里。<sup>②</sup>“饿老生”（胎儿横产）是指一只手或者脚先出来而产婆无法把它送回去，这种情况下产婆就用针扎手脚或者用刀把它砍断，或者在上面抹盐（据调查，村民认为如果孕妇出门时手里有盐，她生产时胎儿就会伸手要盐）。<sup>③</sup>“西瓜生”是指胎儿下来的时候仍包在羊膜囊里，而产婆不懂得要打开羊膜囊，却把胎儿活埋。<sup>④</sup>孩子几天生不下来叫慢生，这种情况下产婆就要开骨缝（耻骨联合处），由其他两个人把产妇的两条腿尽力拉开，产婆在手上抹点油把胎儿掏出来（开骨缝会导致产妇终生残疾）。“莲花生”指胎儿屁股先出来。产婆会把屁股推进去再把双腿拉出来。如果羊水未破而胎儿头先出来就是“顶包生”，产婆会用手破水，然后用双手往下推胎儿直到完全分娩出。<sup>⑤</sup>胎盘不能分娩出的时候，产婆就用手把它拉出来，为了止血就熬些黄蒿水、墨水、童子尿让产妇喝，因为这三种东西性凉。<sup>⑥</sup>

如果是夏天生孩子，产婆就用火把脐带烧断，因为人们相信夏天时婴儿的肚子凉，所以该用火烧以防腹痛。冬天时小孩的肚子热，所以用剪刀在离肚子 8 寸左右的地方把脐带剪断。之后产婆把脐带里的血肉挤出来，把脐带打个结，穿过一张油

<sup>①</sup>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in Past Ten Years”, 375。第二组数据见诸福棠：《建国十年来儿童保健事业的成就》，《中华儿科杂志》第 10 卷第 5 期，1959 年 10 月 1 日，第 367 页。

<sup>②</sup> 《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陕档 178-106-002，第 3~4 页。类似事件见《陕西省 1950 年妇婴卫生调查总结》。

<sup>③</sup> 《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陕档 178-106-002，第 4 页。

<sup>④</sup> 《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陕档 178-106-002，第 4 页。

<sup>⑤</sup> 《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陕档 178-106-002，第 5 页。

<sup>⑥</sup> 《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陕档 178-106-002，第 5 页。更生动的描述见《陕西省 1950 年妇婴卫生调查总结》和《陕西省 1951 年妇幼卫生材料》，1951 年 3 月到 12 月，陕档 178-112-006。关于宋代和清代医学文本对接生婆的类似批评，见 Yi-Li Wu, *Reproducing Women: Constructions of Female Health and Illness in Qing China*, 书稿，第六章，引用经作者同意。



纸，再盖一层棉花，最后用布包好。<sup>①</sup>

官方文献多批评产婆剪脐带时不卫生，认为这会导致新生儿破伤风和产妇产褥热。<sup>②</sup>但在一些产婆看来，新生儿破伤风是因为母亲怀孕时受了惊吓或者生气，尤其是生闷气。<sup>③</sup>这种病在出生几天之后发生，这也是“四六风”叫法的由来，其症状为啼哭、呕吐（涌口）、抽搐。预防四六风有几种方法，可以在婴儿出生时往嘴上抹开口霰，用香烧婴儿嘴的两侧和脸颊，在肚脐上抹万应锭和清心丸或者口服，或者让婴儿口服用雄黄粉焙干的老鼠睾丸。<sup>④</sup>1950年礼泉县的一份卫生调查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方法，产婆用一块碎陶片把出生才一天的婴儿的胸部皮肤划破，然后在一个铜钱上烧艾叶，再把铜钱放到婴儿眼睛、耳朵、嘴、鼻子的附近烧出豆大的水疱。<sup>⑤</sup>如果婴儿最后还是得了四六风，就有两种治疗方法。一种是抓一只活鸽子，撕掉胸部的皮，趁着热气放到婴儿脐带上。另一种办法是抓一个刚生下来还没长毛的小老鼠，把它焙干给婴儿喂下去。<sup>⑥</sup>尽管有这么多防治措施，在韦曲出生的522个孩子中还是有84个死于新生儿破伤风，占死亡婴儿的43%。<sup>⑦</sup>

对产妇来说，大出血和产褥热非常普遍。政府部门的报告常把妇女的健康问题归咎于产后恢复的恶劣条件。在有些地区，产妇要一天一夜不许睡觉。有的甚至更长。产后的最初几天大多数人只能喝得到粥，然后是面条或者干馒头片。山区的产妇只能吃到玉米，所以产妇和婴儿都很虚弱。<sup>⑧</sup>

早期官方报告除了生动地描述了难产的危险、不消毒接生工具以及贫困状况以外，还详细记录了许多产婆的接生技巧。关于华阴县一个村子的报告提到了产婆郝陈氏。她当时已经70岁，接生了40多年，郝陈氏处理难产的技巧在周围几个县家喻户晓。据说她有一个S形的钩子，一尺多长，但是从来没人见她用过。她都是用回转法和头颅穿刺法。报告总结郝陈氏“唯一的缺点，是不知消毒，故妇婴常有致病之危险”。<sup>⑨</sup>

① 《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陕档178-106-002，第5~6页。

② 批评陕北产婆的概括，见《走出封闭：陕西妇女婚姻与生育，1900~1949》，第191~194页。类似批评见1951年妇联的一份调查：《陕西省51年妇幼卫生材料》，1951年12月，陕档178-112-006。

③ 《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陕档178-106-002，第7页。

④ 《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陕档178-106-002，第7页。

⑤ 《陕西省1950年妇婴卫生调查总结》，第29~34页。

⑥ 《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陕档178-106-002，第7页。

⑦ 《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陕档178-106-002，第8页。

⑧ 《陕西省1950年妇婴卫生调查总结》，1951年3月，陕档178-112-006，第29~34页。

⑨ 《陕西省1950年妇婴卫生调查总结》，1951年3月，陕档178-112-006，第29~34页。

我们在1990年代采访的那些经历过1950年代的农村妇女也证实了这一点：大多数技艺娴熟的接生员基本都是1949年以前跟自己母亲学的，然后又受了点训练。渭南县王家村<sup>①</sup>一个姓党的妇女在解放前和解放后都给人接生。她是跟母亲学的，接生多年以后在50年代又在乡里上了培训班，还学了一首接生歌，歌词总结了新法接生的主要步骤。她儿媳妇庄小霞记得人们来找党氏接生的情形：

庄小霞：有时下大雪，下大雨，拄个棍，身上披个啥就走了。

高小贤：你妈解放后有没有参加培训？

庄小霞：学过。原来公社组织培训学习班，学那接生歌。

高小贤：你妈接生有没有难接的？

庄小霞：有哩。有坐胎。就那我妈把那都接下来了。我妈给人家接生都没有伤亡。

有时医生给一接，也下不来，就叫我妈来了。我妈就把那取下来。<sup>②</sup>

#### 四、新法接生

1951年西北地区指导妇女卫生工作的口号是：“推广新法接生，改造旧产婆，训练新法接生员”。<sup>③</sup> 国家开展妇女卫生工作的关键是介绍“新法”接生。新法接生员是新中国招募训练的新代言人，她们象征着并将以接生行动体现出现代性带给农村妇女的好处。

除了洗手和消毒，新法接生还强调产前检查，让产妇躺下生产，帮产妇娩出脐带和胎盘而不是生拉硬拽导致大出血。以上各项都被拿来与旧法接生相比较以突出其优点。<sup>④</sup> 山东省的一本小册子较为详细地列出了为期十天的复训旧产婆的课程，内容包括：“孩子是从哪来的”（包括女子生殖器生理解剖介绍），孕期注意事项，新法接生的好处，产前准备，如何接生，发生难产怎么办，怎么坐月子，最后一部

<sup>①</sup> 王家村位于西安东北大约六十公里。

<sup>②</sup> 高小贤与 Gail Hershatter，采访庄小霞，1996年8月5日，第二盘录音带，记录第16页。儿媳都管婆婆叫“妈”。

<sup>③</sup> 《群众日报》1951年12月1日，第3版。

<sup>④</sup> 以陕北生育习惯为基础所做的概括性论述，见《走出封闭：陕西妇女婚姻与生育，1900～1949》，第191～194页。1951年的一份陕西调查显示，妇女生孩子没有固定地点，要么蹲在茅房，要么在牲口棚，要么在墙角。《陕西省51年妇幼卫生材料》，1951年12月，陕档178-112-006。



分是关于小儿疾病，打疫苗，怎样宣传新法接生，以及怎样写工作报告等。<sup>①</sup>附录中的《接生员守则》分为“六要”、“六不许”。“六要”是：要躺着生孩子；要剪指甲并用肥皂或酒精洗手；剪子要用开水煮；要是孩子不能呼吸，立即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要给新生儿滴眼药；要打疫苗。“六不许”是：不许坐土炕、蹲着、站着、坐着生孩子；不许用高粱秆、瓦片、牙齿来弄断脐带；不许用脏盆子给新生儿洗澡；不许硬拉脐带及胎盘；如果流血过多，不许产妇起来活动，应该躺着；不许伸手入产道或将产道撕开；遇到难产不许乱动手。<sup>②</sup>

尽管1950年代极少数农村妇女做过产前检查，但只要当地有受过训练的接生员，其他措施就都有所实施。王友娜在家生了5个孩子，前两个生于合作化初期，由她婆婆接生，后几个由大队接生员接生。她婆婆接生是接住胎儿，然后等着胎盘下来，再剪脐带。而接生员的步骤就复杂多了：她先检查产妇，用药签消毒阴部，接住胎儿，剪断脐带，包裹婴儿，然后才接胎盘。<sup>③</sup>马丽是1949年以后训练的接生员，她记得旧法接生是这样的：“不敢拾婴儿，把婴儿撂到地上，等ni（拼音，下同）包子下来，胎盘下来，这才敢拾娃。现在是把娃先拾下，用钳子把大人的胎盘系系剪住，先拾娃，把娃拾过炕，再来管你这里”。<sup>④</sup>何改珍解放之前和之后都生过小孩，她记得新旧法的最主要区别是体位的变化：旧法接生让产妇“坐在地上”（也可能是蹲着），而新法接生让产妇躺着。<sup>⑤</sup>她觉得新法接生对产妇好，因为：

那旧社会接生人家说，叫人坐地上，害怕把炕弄脏了，叫人坐地上，坐下人发晕，说是血迷心，眼看着鲜血流呀流几盆。那是旧社会坐地下，眼看着鲜血发晕，说是血迷心，只叫你坐下，不叫人睡，呀，到底是睡下来舒服呀，我生我这个娃子，人家叫我睡下，一会儿就生下了，人家那浑身都不痛。<sup>⑥</sup>

有的妇女在生孩子时不愿意有生人在场，连受过训练的接生员都不行。当马丽还是一个正在受训的年轻接生员时，有一天她姨妈让人找她去救急。她表嫂前一年

① 鲁霞：《改造旧产婆经验介绍》，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8页。

② 《改造旧产婆经验介绍》，第18～19页。

③ 王国红、王友娜采访记录，1997年7月6日，第3～5页。

④ 高小贤与Gail Hershatter采访马丽，1999年7月31日，笔录第23页。

⑤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接生运动正好与此相反，该运动置疑医生的权威，推行产婆接生，把产妇从卧姿“解放”出来，指导产妇多走动，蹲着生产，这样地心引力会起到辅助作用。

⑥ 高小贤与Gail Hershatter采访何改珍，1999年7月28日，第5部分，笔录第20页。

刚死了一个婴儿，现在又难产。马丽跑到她师傅、已经不再接生的刘西罕家求助。两人一起跑到她表哥家。尽管这是婆婆找来的接生员，她表嫂也不愿意意见她们：

人家说：“难受，生个娃叫你都来看一下。你是看把戏哩吧”，生娃的那人还说是看把戏啦？……把人坐到那儿都坐了几个小时了，人家不让看，我说你不对呀，你这让人坐了几个小时了，到底是娃生下来没有，娃的一个胳膊在吊着哩。

高小贤：哎呀！那最后怎么办了？

马丽：往日那还不上炕，拿个板凳坐到那儿，老婆把她弄上炕，把胳膊慢慢送上去，送上去，又下来了，那老婆就说是这个娃成不了。你想我呆了大会子了，人家不叫看……

高小贤：她不让看还是婆子不让看？

马丽：那媳子偏偏不让看。我问说那你看娃头出来了没有。人家说：“说的怪，说的怪，都过了半会了才说是不知是腿还是一个胳膊都冰凉了”。我说她哩，“你要不是我老表的媳子，我到你这来做啥来了？”……娃一个胳膊下来了，头在里头弯着哩，最后弄下来就死了……跑的噎噎就去了，去就坐了几个小时。人家就说：“看啥哩，难受不难受”，那老婆[刘西罕]就说：“厉害啥哩，给你办好事来了，都是妇女吆，看啥来了，这是新社会，若是旧社会你把我请都请不来”。<sup>①</sup>

了解新法接生不一定就意味着妇女会继续使用它，或者继续按新法接生消毒剪刀。比如康杏芬，她从1963年到1973年生了5个孩子，第一个是在竹林关卫生站生的，其余四个都是在她丈夫的帮助下在家生的。她对新法接生的了解并没改变她对消毒的态度：

高小贤：你生娃，剪脐带，你知道不，用啥剪的？

康杏芬：剪子么。

高小贤：那时剪子消毒不？

康杏芬：还消毒咧，消个屁，一剪，就一挽。

<sup>①</sup> 高小贤与 Gail Hershtatter，采访马丽，1999年7月31日，笔录第23页。



高小贤：娃脐带上啥也不包？

康杏芬：不包。<sup>①</sup>

就连婚前受过接生员培训的马丽也眼睁睁地看着她的第二个孩子死于败血症，因为孩子下来得太快了，而水还没烧开，她哥哥就用没有消毒的剪刀剪断了脐带。<sup>②</sup>

## 五、培训与合作化

随着合作化在陕西农村的迅速发展，许多乡都建立了接生站。在妇联的协助下，地方卫生部门早在1951年就承担起这项工作。<sup>③</sup>比如1952年的一份妇联工作报告称，在这之前的一年里丹凤县卫生院为85个旧产婆办了两期训练班，<sup>④</sup>到1953年秋，全县有13个接生站。<sup>⑤</sup>接生站与其说是产妇生孩子的地方，倒不如说它是个监督和培训机构。比如，咸阳县渭滨乡三个接生站的40个接生员实际上分布在27个村子里。<sup>⑥</sup>复训过的旧产婆被派去协助新法接生员接生，组成学习小组，按规定每周开一次会，每个月还要与卫生工作者和妇联干部保持联系。<sup>⑦</sup>

关于妇女卫生的官方资料也展现了动员妇女下田劳动的农村合作化的大背景。例如，陕西妇联1954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指出，新法接生不仅能减轻妇女的痛苦，而且能让她们更好地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这本小册子介绍了五个模范，有模范接生员，也有模范接生站，每个模范事例都表现了接生员是如何战胜人们的怀疑和各种困难的，其叙述方式与其他领域的劳模事迹的描述如出一辙。有个接生员在庙会上宣传新法接生，对邻居的嘲讽不屑一顾。因为她拖着裸体妇女的图片到处

① 高小贤与 Gail Hershtatter，采访康杏芬，1999年7月29日，笔录第9～10页。

② 高小贤与 Gail Hershtatter，采访马丽，1999年7月31日，笔录第22页。

③ 《陕西省51年妇幼卫生材料》，1951年12月，陕档178-112-006。

④ 《丹凤县妇女工作一年来的总结》，1952年9月27日，丹凤县档案馆馆藏档案（妇联报告）（原文无档案号——译校者识）。

⑤ 《丹凤县一年来的妇女工作总结报告》，1953年10月30日，丹凤县档案馆馆藏档案（妇联报告）（原文无档案号——译校者识）。

⑥ 《咸阳县渭滨乡一年来妇幼卫生工作情况》，1956年10月22日，陕档178-153-081。早在1951年妇联干部就开始负责对旧产婆的政治培训。《陕西省51年妇幼卫生材料》，1951年12月，陕档178-112-006。

⑦ 这些早期工作报告中雄心勃勃的计划很难反映出与政府机构实际接触的程度和复训的彻底性。比如见《陕西省51年妇幼卫生材料》，1951年12月，陕档178-112-006。

走，邻居骂她辱没了祖宗。虽然因为缠足行动不便，这个模范接生员还是顶着暴风雨，爬过小山沟，到山对面去给人接生。1953年1月在西北地区卫生工作劳模大会上领奖时，她说：“我高兴得流出眼泪，不是毛主席、共产党，我哪有今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种光荣”。<sup>①</sup>

与小册子中的其他事迹一样，在这一事迹中，女劳模在党的领导下为集体利益积极工作的主旋律掩盖了接生的具体细节，关于接生的早期官方报告中那些常常令人不安的细节都不见了。但还是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除了一个例外，所有这些劳模都是在解放前就用旧法接生而且经验丰富的产婆，她们只是后来接受了新法接生的短期培训。而且在这些事迹报导里，新法接生员和旧产婆是用相互学习、相互尊敬的语言进行交谈的。其次，每个事迹中最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新法接生如何能使胎儿安全分娩出，这些都被一笔带过，重要的是她们坚持不懈地向农民宣传新法接生的积极精神。早在1951年，妇联工作报告里就非常丰富地展现了这一主题。妇女工作干部积极配合卫生干部，利用扫盲班、告示、快板书、街头剧、招贴画和墙报来宣传新法接生。陕南和关中各县还举办了妇女卫生展览，据说参观者达数千人。<sup>②</sup>

合作化还改变了接生的管理机制。渭滨乡卫生科于1953年开始宣传新法接生，第二年就扩大了宣传范围，把经期卫生和产后恢复也包含在内。1955年合作化开始时，乡接生站和合作社签订了合同，派代表到各合作社检查当地接生员的工作并提供适当帮助。胎位不正的产妇都被送到了医院。在半年时间内，全乡11个合作社中的8个采用了新法接生，提高到全部新生儿的74%。接生员领工分，产妇有50天产假，并按产前三个月平均工分的一半领工分。<sup>③</sup>

然而，当合作社合并进入高级社时，接生站就没人管了，合同也不执行了，接生员和产妇也一年左右没拿到工分。1956年10月省妇联社会福利部在一篇报告里提出了以上问题并承诺予以解决。<sup>④</sup>1957年县卫生部门派人下乡到各接生站去，把有关接生员的各种规则进行标准化，评估接生员的表现，并确定需要复训的人员。<sup>⑤</sup>

① 陕西省妇联福利部编：《妇婴卫生工作经验介绍》，1954年9月，第1～3页。

② 《陕西省51年妇幼卫生材料》，1951年12月，陕档178-112-006。

③ 《咸阳县渭滨乡一年来妇幼卫生工作情况》，1956年10月22日，陕档178-153-081。

④ 《咸阳县渭滨乡一年来妇幼卫生工作情况》，1956年10月22日，陕档178-153-081。

⑤ 《渭南县人民委员会1957年一到六月份妇幼卫生工作计划》，日期不详，渭南县档案馆馆藏档案，第6号（本文作者标号）。



到1956年下半年，渭南县已经对接生实行了集中计划管理，收集各乡新法接生的使用率，然后为下一年度制订更高的使用率。1956年已有几个乡汇报95%的新生儿用新法接生，而在其他乡这个数字还不到50%。<sup>①</sup>县政府1957年的文件中强调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妇幼卫生工作也应该像其他生产一样有相应的提高。<sup>②</sup>这种以其他生产运动的时间进度来衡量妇女生育健康的进展的做法，一直持续到到大跃进时期，当时又建了一些新的产院。

## 六、超越政治运动的时间：接生的故事

国家重视训练有素的接生员不应该被误解为农村接生的完整图画。<sup>③</sup>直到50年代后期，绝大多数陕西婴儿都是在家出生的。除了一部分由接生员接生以外，大部分由婆婆或者产妇自己接生。

1949年前后的接生故事里婆婆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这种角色通常不是正面的。除了显而易见的痛苦和危险以外，生孩子还是新娘融入婆家的转折点。关中和陕南的妇女在婚后经常回娘家，有时一住就是几个星期，她们是逐渐过渡成婆家人的。但是在娘家生孩子却很让人忌讳。如果娘家妈觉得回娘家的女儿快要生孩子了，她就会急忙把女儿送回婆家去。<sup>④</sup>当地人相信：“亲妈生死都不见……死了人家不见那种瘟气，生了也不见”。<sup>⑤</sup>无论从礼俗还是实践上来讲，通常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她就不能再经常回娘家了，这通常也是婆婆全面掌控儿媳幸福的开始。

许多妇女在回忆第一次生孩子时，首先提到的不仅仅是痛苦和恐惧，还有婆婆、丈夫，或者二者的冷漠和袖手旁观。杨安秀记得：

我生我们老二的时候，吃了早饭，下雨大，发现疼，我也没[吭气儿]，婆子脾气大得很。究竟知道是不是要生了？感觉到下坠想上厕所。身上来了红

<sup>①</sup> 《渭南县人民委员会1957年一到六月份妇幼卫生工作计划》，日期不详，渭南县档案馆馆藏档案，第6号（本文作者标号）。

<sup>②</sup> 《渭南县人民委员会1957年一到六月份妇幼卫生工作计划》，日期不详，渭南县档案馆馆藏档案，第6号（本文作者标号）。

<sup>③</sup> 在Goldstein的讨论中，国家显得过于一致，其影响也显得过于连贯；而且“妇女”也好像是不受国家建设和封建父权影响的自主主体。对这些看法，我不能同意。

<sup>④</sup> 高小贤与Gail Hershatter，采访LZR，2001年3月26日，笔录第59页。

<sup>⑤</sup> 在招赘的情况下，女儿虽住在娘家，也遵守同样禁忌，亲妈不能接生。高小贤与Gail Hershatter，何改珍采访笔录，1999年7月28日，第5部分，第22页。

带又不敢给说，你一说，她会说你不嫌羞人还说呢！生娃是自然现象，我一直都没敢开腔，就走到这走到那。<sup>①</sup>

杨安秀 1954 年被选送参加接生员培训。初产妇的痛苦、产后感染、冷漠的婆婆和好心却又懦弱的丈夫，所有这些使她下定决心去改变别人的生产环境：

我生我们娃娃时，那时都是坐到小凳子上生嘛。我都会引。拉通了的。过去上床，把黄篾席子一抽，坐到草上，铺点灰。上面铺个烂布，坐到上面，受了困苦了。（所以）我现在坐的时间长了都受不了。最后那个灰一打，受不了，更恼火。一个月都肿到起。吃饭都肿到起。所以我接生，她们都说下（仔）细。因为是我亲身体验过的，很恼火。我说我自己吃苦不能叫你们受痛苦。我那 40 天都爬（扶）着墙走。所以产妇恼火的很！都认为我小意（心）。所以接一辈人又一辈人，（我）接过三辈人。原来这 T 村的大多数人都是我接的。除非有的到医院。<sup>②</sup>

而李六斤在 1940 年代后期和刚解放时的两次生产导致了她对丈夫和婆婆的强烈不满：

我给你说，我生我们头一个女子时是十七岁，发作了那天黑了我们在一个床上睡到的，都没有人说，最后人家去割柴呀，我还起来给做饭，做饭时肚子呀都疼的没法呀！扒到锅头上搅锅的时候都疼的没法，最后硬几个三下把饭控（汤滤干）了，饭蒸上，起来吃饭时，我也没说，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我要生了嘛，我也没说过。

最后他走了，[我]发作，到堂屋里转出转进的走。肚子疼的没法，那才十七岁嘛！所以转了一些，走了一些，到吃早饭的时候呢，都生过小孩的吗，这个浆包一破，都跟到喔个浆包。月娃都下来了，月娃下来了头一个 XX 奔了后了，肚子疼得不得了，憋到生不下来。老太婆吃斋呢，初一、十五敬神吃斋。人家又不到你屋里来看，她叫你弄个裹脚，她那时缠了裹脚的。弄巴掌这么宽的白布，挺长，缠了脚的。

① 高小贤与 Gail Hershtatter，采访杨安秀，1997 年 7 月 7 日，笔录第 5 页。

② 高小贤与 Gail Hershtatter，采访杨安秀，1997 年 7 月 7 日，第 1 页。



安到板凳上，把屁股嘛坐到抵，抵到别叫从后头XX，抵到起，不能睡！有个啥法呀，天老爷！一坐呀都要命。最后就喔个家转出转进走。疼的没法，一直疼到下午阵了没法。我那时当女子家时听到人家说，生月娃的时候了嘛。奔了后了睡哩。人家又说的睡不得，睡了趴到心上去了。想了想，说，死活管他去，我来睡，我恁气趴到我床上去，展展的睡到床上，睡到床上是，一下逼了两gang（二声）子（阵子），挣了两阵子，月娃到前头来了，奔到前头来是。叮叮咣咣挣了两阵子，月娃滚下来了。落下来之后，老婆婆弄了个木盆舀了点水来。给我搁到床边上，给了我个剪子，我自己一些把月娃子脐带一绞，挽了几个疙瘩，给了一坨套子（旧棉花）扒到高头，我提前也准备了。弄了些布布，袋袋包到起，月娃一洗包到，弄了个裤子布。Yi子（胎盘）是自己落了的，就是喔。人家割柴的还没回来……。你说按这当乎这个夫妻噢。那都有了感觉得说一下子，夫妻感情就这个球势呢（样子）？我没说他也不知道。就这个样儿来！这是生头一个小孩这个样子。

生第二个娃儿时，到喔守谷子，我们到灶火门下（dia）ba（二声）了个铺，守谷子呢。那么的？肚子又疼开了。我跟他两个人睡到门下守里来。肚子又疼了，我就爬起来。人家说，木匠打那个凿子呵，kao（一声）的（打）那个拍拍，我也去绞了点毛毛提前装到那，最后把巴巴一（最后）来我就去弄了点火烧了一下，烧了点灰灰研了一下。起来烧了点开水，锅头跟前睡到的来，（灰灰）弄了点黑糖，弄开水冲了，两口喝了。喝了以后，肚子又疼开了。跟到那一样，水一破，又奔后了。我就进睡房里去。地下给了个一扫，展展睡到地下，睡到月娃落了都才爬起来。你还说！这个事情啦，睡到地下，最后娃儿落到地下了，才爬起来拣月娃，才抱到床上去。你说那当乎就这样儿！所以都根据这个情况来说，我还没法，看了一下，我才二十几嘛。最后宣传婚姻法，干脆，我就提出离婚！<sup>①</sup>

我们无法从官方资料和妇女个人的生育故事中知道这种家庭关系有多普遍，也无法知道这种关系是何时发生转变的。当这些妇女描述她们的儿媳的生育经历时，她们提到的是医院昂贵的费用，还有干轻活的妇女第一次生产时要更困难。这些人中的接生员也提到她们最近接生的难产。现在农村妇女生育已不再是孤军奋

<sup>①</sup> 高小贤与 Gail Hershtatter，采访李六斤，1997年7月6日，笔录第17页。

战，而新娘通常也不跟婆婆住在一起，更不用说被婆婆掌控了。尽管李六斤一句话就概括了从独自接生到婚姻法、再到离婚的过程，但还是难以想象这类家庭关系的变化会像接生方法的变化那样快。生育习惯不仅受国家运动的制约，还受整个社会关系的制约，因为接生员和产妇都无法脱离这种关系。<sup>①</sup>就像下面这个故事所表明的，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超越了看得见的农村社会关系而进入了看不见的灵异世界。

## 七、刘西罕和有关接生的魑魅魍魉

刘西罕大约 1906 年出生于陕西省东南角的西关。7 岁时就开始帮母亲做家务和接生。她 14 岁时嫁到竹林关，在家织布。1949 年以前就开始为人接生。解放后她参加了培训，1952 年 2 月成为竹林关接生站站长，该站是妇联在该县建立的 13 个接生站之一。她在三年里领导了 8 个人，到 1955 年为止她接生了 41 个孩子，其中无一例新生儿破伤风，也没有产后疾病。<sup>②</sup>她在乡亲中的威望很高。竹林关村民何改珍觉得自己 1953 年生的孩子死于败血症，就是因为不是由刘西罕接生的。她第二年生的二儿子是刘接生的，就活了下来。刘西罕接生从不收费，乡里给她发材料费。<sup>③</sup>

刘西罕积极宣传新法接生，<sup>④</sup>还唱歌介绍新法接生的好处。<sup>⑤</sup>她在其他方面也是模范公民，1954 年还说服丈夫和邻居把余粮卖给国家。有个邻居因为她推广粮食统购而骂她（“刘西罕，你把我的锅提去，把我被子拿去，我要吊死你门上去”），但她还是继续耐心地劝导，让这个老太太想想旧社会挨饿的时候。从各方面来讲，她都是党和国家塑造的新一代农村妇女典范。<sup>⑥</sup>

然而，与官方出版物和内部资料对积极推广安全接生（和粮食统购）的白描不同，农村妇女对刘西罕的记忆却要复杂得多。刘死于 1950 年代末 1960 年代初。农

<sup>①</sup> 关于改革时期中国农村的生育文化，见李银河：《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年；高小贤：《贫困地区妇女孕产期保健服务分析》，《妇女研究》，2002 年 4 月，第 59～62 页。

<sup>②</sup> 《丹凤县第四区竹林关乡刘西罕模范单行材料》，1955 年 2 月 21 日，丹凤县档案馆馆藏档案。该县接生站的数量，见妇联报告：《丹凤县一年来的妇女工作总结报告》，1953 年 10 月 30 日，丹凤县档案馆馆藏档案（以上两件，原文无档案号——译校者识）。

<sup>③</sup> 高小贤与 Gail Hershtatter，何改珍采访记录，1999 年 7 月 28 日，第一部分，第 4 页。

<sup>④</sup> 《丹凤县第四区竹林关乡刘西罕模范单行材料》。

<sup>⑤</sup> 高小贤与 Gail Hershtatter，何改珍采访记录，1999 年 7 月 28 日，第 5 部分，第 20 页。

<sup>⑥</sup> 《丹凤县第四区竹林关乡刘西罕模范单行材料》。





1955年中国农村由于实行了新的接生法，儿童的成活率明显提高。图为当时中国农村的景象。

村妇女称赞她新法接生的技巧，但她们也认为刘西罕和所有给人接生的人一样，在婴儿出生时会遇到很大危险。在她们的叙述里，生产不仅威胁产妇，对接生的人也同样不祥，新法接生也无法驱除这种不祥。生产时的血污对接生的人和她所接触的人都不吉利。一个年轻的接生员记得她帮刘西罕接生之后带回家一些黄瓜，但谁都不肯吃，都说：“她太脏的了，你没看她做啥去了……后来这个人笑话，那个人笑话，拿的东西都没人吃了，我就不喜欢了。”<sup>①</sup>另一个妇女想起来刘西罕的前任也是一个技术高明的旧产婆，因为经常接触生产的血污，眼睛瞎了。有个妇女告诉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刘西罕要教她接生时，她拒绝了：“不啊，我这眼睛不太好，我这眼睛不太好，我不学这，学这血气扑眼睛，我不学这”。<sup>②</sup>

即使在解放之后，即使在设立了接生站而且刘西罕当了站长之后，即使在普及消毒和新生儿破伤风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接生的不祥还是没有消失。人们都说刘西罕是“接生给死了”。有一次接生的时候，她发觉自己接下了一个奇形怪状又很难闻的东西：

接生，到那把那娃，看她掉下地以后，不知道是娃不是娃。她吓得那一晚就发高烧。第二天才给他屋里娃带信，这娃子去把他妈抬回来的，像这下午……到下午四点，就没气了，就死了。哦，那个老婆呀，人家接生接的好太呀，谁要是一喊，那应声得很呀，人家说那人受罪着了么，一喊，她说我就走。<sup>③</sup>

这并不是刘西罕之死的完整版本。死前几个月的一天，她向同村的一个女人透露了一个闹鬼的故事，并让后者发誓保密。这个人是这样回忆的：

还有那一年，她下来给我说，我到底都没敢给人说过，人家说，“风存呀，我都不敢说，你可不敢说哇，说了人家政府明儿斗我哩”。那黑上有个人，小

<sup>①</sup> 高小贤与 Gail Hershatter，采访马丽，1999年7月31日，笔录第22页。关于生产不洁的禁忌，见 Emily Ahern [Martin], "The Power and Pollution of Chinese Women," in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193 ~ 214.

<sup>②</sup> 高小贤与 Gail Hershatter，采访何改珍，1999年7月28日，第5部分，第20页。Yi-Li Wu 指出，中国关于鬼胎的经典医学话语里，人与鬼交媾或者是因为女性性存在受到压抑就会导致假怀孕。Yi-Li Wu, "Ghost Fetuses, False Pregnancies, and the Parameters of Medical Uncertainty in Classical Chinese Gynecology," *Nan Nü* 4. 2 (2002), 170 ~ 206, 尤其是 188 ~ 195 页。

<sup>③</sup> 高小贤与 Gail Hershatter，采访何改珍，1999年7月28日，第5部分，笔录第20页。





在文化卫生尚未普及、乡村里缺医少药的艰难年代，接生婆成为一种受人敬重的职业。

伙子，在她窗底下喊她哩说，婶子，给我接生，就说这两句，她说哦，来了，她就穿衣起来，把那药箱子背上。

人家说那小伙子给它背上，就那……东坡坡那儿，回去后，没拿包包（药箱），上面写的有十字，划的那十字。老婆回去了后，老汉到第二天说，呀，你那包包咋没背呢？人家说，那娃人家这样说，人家说生了娃子，人家说，娃，你给我倒一点儿水叫我把手给洗下子。人家说，婶子，那没有水呀，人家说我还没有啥给你做点吃的，我不吃。你叫我给手洗一下子，我不吃你啥，你把我手洗一下子。人家说没有水她就到人家那石头上擦擦，摸摸后，就回来了。她一个人回来的，回来后，她说她给人家接了个娃子，到第二天，人家我那叔叔说，那你那药箱子咋没见呢？人家说，哎呀，我咋黑上没拿，说那怎么没见你药箱子。那你就走哪儿走的，她说了，老汉去寻了。

在人家那家坟头上。那血手摸到人家坟头上，那石头上，她吓得回来看数（只）给我说，她就不敢给别人说，给人家说，公家斗她哩，嘿，公家斗哩。吓得不敢说，这是迷信，给人家……给人家阴间接生去了，某老婆没多长时间

到那接生，就把命送了。<sup>①</sup>

在这个故事里几个世界交叉在一起，无法分清各自的界限。像她同时代的接生员一样，这个新法接生员带着充沛的服务精神出去接生。接生之后她害怕了，她对丈夫的回答暗示出她不愿意说出她的恐惧，甚至不愿意承认她曾经出去过。但是医药箱的确没了，而她丈夫找到医药箱的地方说明有什么东西很不对劲。她在自己不清楚的情况下，带着医药箱到了鬼界，还接生了个鬼孩子。这本身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越界。尽管她是以个体来经历这种恐惧的，而反映的却是一种古老而强烈的群体恐惧，许多中国神怪故事都有与此几乎完全一致的情节。<sup>②</sup>

然而她的恐惧不止这些。她已经接受了科学，而且还在村子里积极宣传科学，所以她还害怕自己的恐惧会被当做迷信遭到批判。科学的世界和这个接生员的一套旧观念交叉在一起，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她想进步、想做贡献、不受谴责，她所能讲的就只有科学。所以她保持沉默，或者说基本沉默。不久以后，阴魂不散的鬼魅又来找她接生，这次就要了她的命。

关键不在于和那些妖魔鬼怪的接触是否真的要了她的命，也不在于再次出现的心理创伤是否加速了她的死亡。我们无法知道她自己是否把这两次给她带来心理阴影的接生联系了起来。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妇女们记得她，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技术，她对新法接生的投入，以及她的热情；还因为她是由于接生而死的。就像采访对象说的，她“接生给死了”，而这个采访对象本人在50年代也是个积极分子。

对于建国初期的育龄妇女来说，生产的危险和不祥在1950年代就像要对医疗器械进行消毒一样真实，而且在1990年代的记忆里也一样真实。<sup>③</sup>从某种意义上讲，她们的确按国家时间来生活——她们满怀激情地描述了各种运动给她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变。但国家时间与其他时间共存，或者说国家时间是按照其他时间的反面来定义自己，而其他时间并不因新国家政权的出现就消失了。知识、信念和习惯以

<sup>①</sup> 高小贤与 Gail Hershatter，采访何改珍，1999年7月28日，第5部分，第20～21页。

<sup>②</sup> 余华的短篇小说《世事如烟》(World Like Mist)也采用了这个主题：一个接生婆在接生了一个鬼孩子之后死了。见 Yu Hua, *The Past and the Punishments*, trans. Andrew F. Jon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6), p.87～93, 104, 109～110。特别感谢 Andrew Jones 提醒我，刘西罕的故事为什么这么耳熟。17世纪中国文学也经常出现“男人让女鬼受孕”这一主题，见 Judith Zeitlin, *The Phantom Heroine: Ghosts and Gen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chap. 1。

<sup>③</sup> 我们的研究助理也有同感。她当时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在说听了这个故事之后，竟无法入睡。



非常复杂的方式进行流传，其复杂性是“国家是科学知识传播者”这一模式所难以完全解释的。反过来，这也表明，要真正历史地理解农村的分娩和接生以及 1950 年代的中国农村，不但需要国家运动的完整记录，也需要探索妇女的记忆，至少是她们愿意讲也能讲的那些记忆。

（孙晓萍、姚昱 译 刘宪阁 校）

中國當代史研究

# 回忆和口述





# 怪诞莫名法官路

张思之\*

## 小引

“北京法院烂掉了”——反右时，北京市委领导人向毛泽东如是汇报。

毛泽东笑答：“烂掉好哇，可以再搞一个嘛。”

当初乍听，为之一震：真是伟大统帅才有的气魄！

我当然不可能知道汇报的详情细节，但作为所指事件的亲历者，明白他所谓“烂掉”的根据大致是：正副院长被认定各组了一个“反党集团”，平素猜疑，互不团结，运动一来，互相攻讦，结果是两个集团的骨干分子统统成为右派。两位“团长”，一个是“大革命”时代出身知识分子的地下党员，一个是红军时代在陕北坚持游击战争身留敌弹的“放羊娃”，也统统出洞入网。市法院系统包括司法局、律师协会（当时合属一个“联合党组”，下有分党组）在内，俘获右派六十多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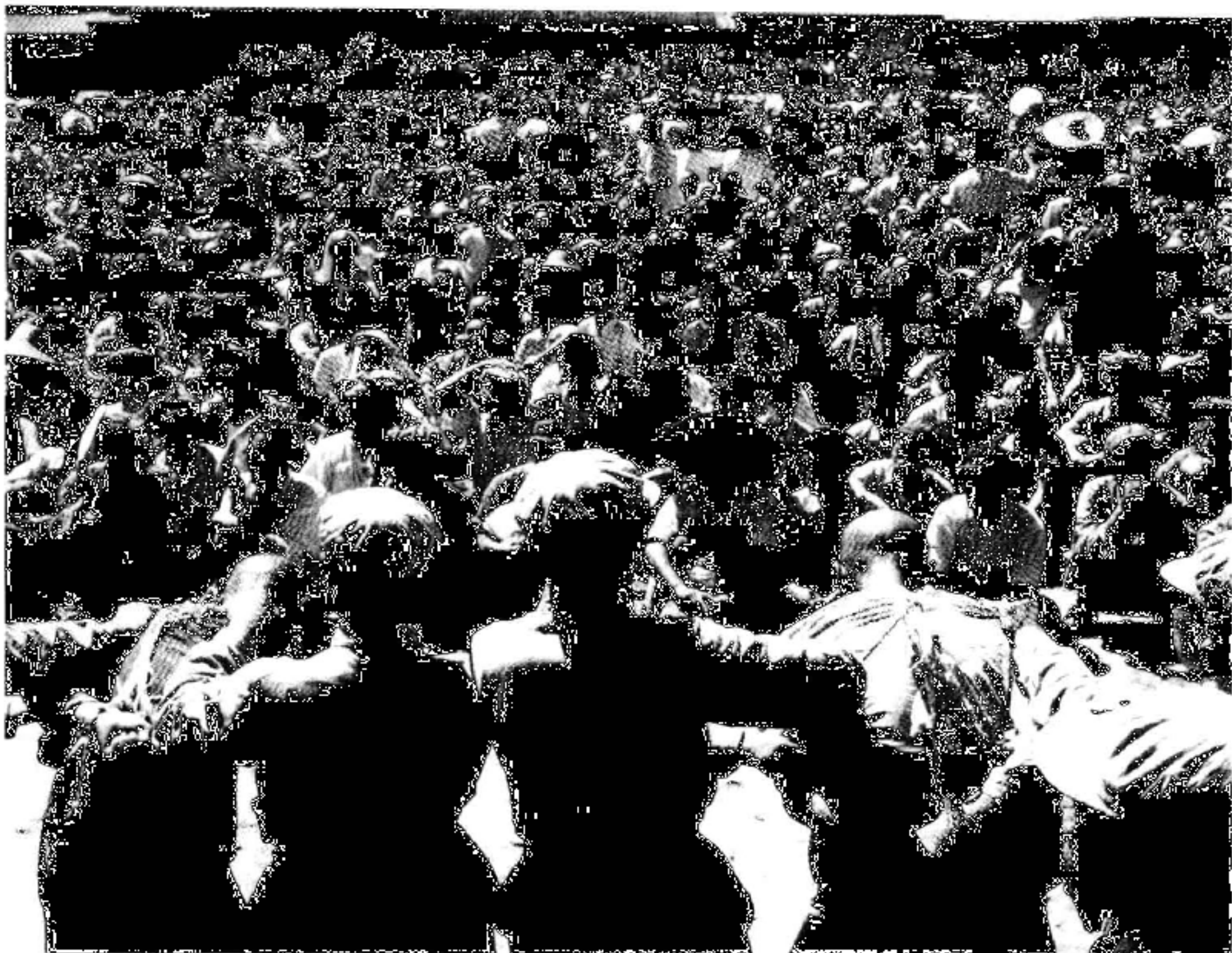
常识告诉人们：任何事物果真烂掉，其过程或有短长，方式可能不一，总会有起因，也必有发展。我作为北京法院初建时期的一名工作人员，有幸目睹并不幸卷入了这个“烂掉”的过程。

事隔半个多世纪，当事者、亲历者多已作古，幸存者无不“日薄西山”。我这个当时未及“而立”的小青年，已近八旬，残留一息，来日无多，实该对当年“反

---

\* 张思之，律师。1927年生于河南郑州。1943年参加“学生志愿远征军”，曾赴印缅前线。1947年考入北平朝阳学院法律系。1949年至1957年先后担任北京市人民法院法官，法律顾问处主任。1957年被划为右派劳改15年。1979年恢复旧业，先后担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市法律顾问处主任等职。1980年曾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组组长。曾任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1988年创办《中国律师》杂志，任主编。参与的诉讼案件主要有：李作鹏“反革命案”，鲍彤、王军涛、魏京生等人的“颠覆政权案”等等。著有《中国律师制度》、《律师实务》、《我的辩词与梦想》等。





1950年代的镇压反革命的政治运动，图为批斗会场。

党集团”的形成与发展的种种，以我这个当年“团”中活跃分子的经历为“重点”，勾画出一个轮廓，略作解析，作为忘却的纪念。

涉及的事实各有主体，这里都再无贬义。为此我把不可能避开评说的王斐然院长简称“斐公”，副院长贺生高，我则一如既往，亲切地呼为“老贺”。还有一些人，虽隐了真名，但我清楚，瞒不过往日同事的慧眼，可实在又想不出好的办法。至于那些仍用原名的情况自然决无不敬之意，诸友谅解。

### 一场司法改革，法院两份“总结”

法院的变化，初起于1952年司法改革。

先是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后期，北京市委为了加强法院的领导工作，从市公安局调来老贺担任副院长。首批同来的还有四人，都是老贺在公安局的强将，分任办公室正副主任、人事处长，而司法建设处长一职因工作范围较宽，业务性又

强，由“延安知识分子”常真担任。他在老贺身边自始至终起着“谋士”作用。正副院长，前者精于业务，日常事务不免细中有粗，注重请示报告，四平八稳；后者强调政策，在大事上常能粗中有细，富有开拓精神。二人正好互补，各项工作一度顺畅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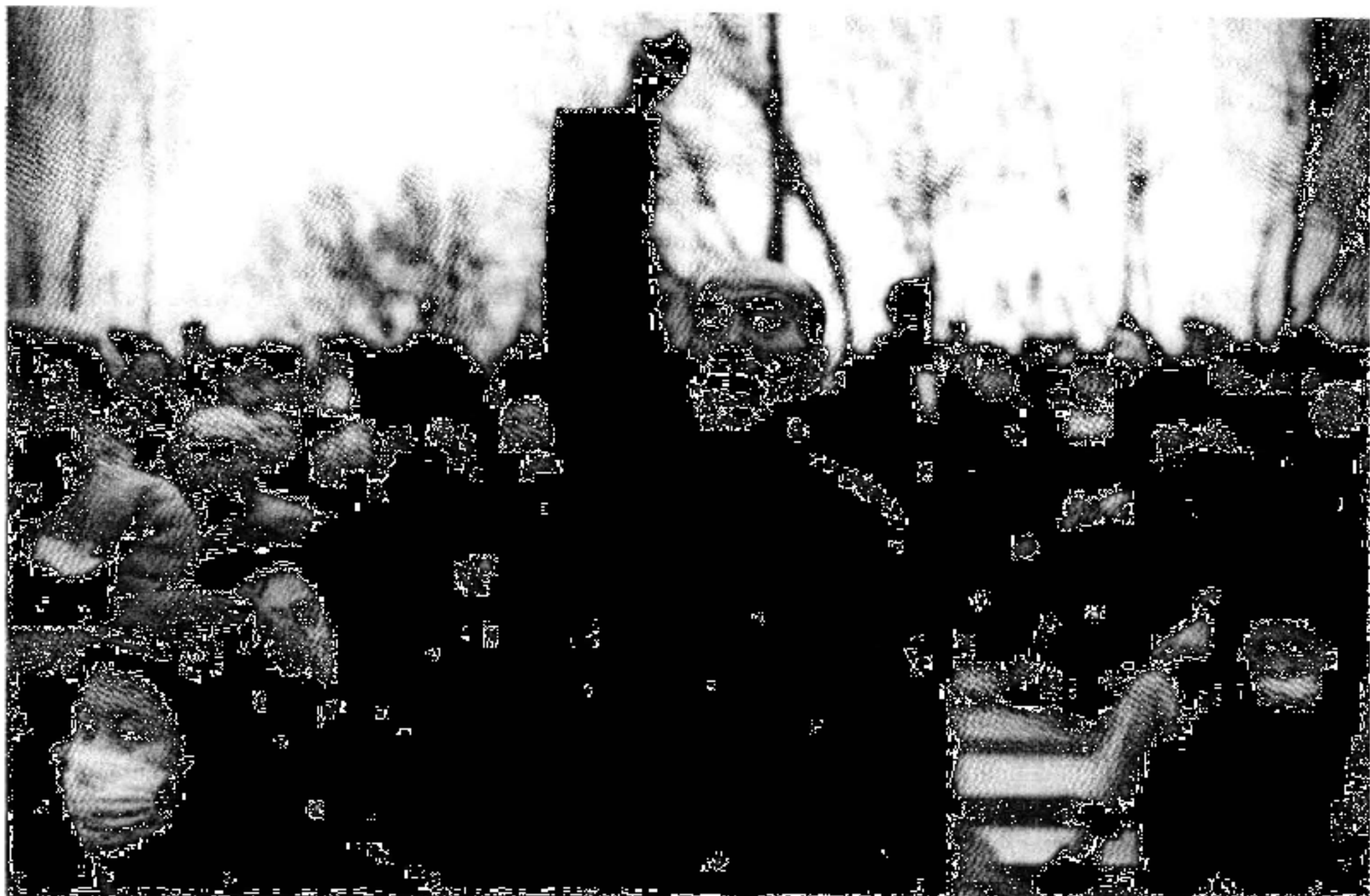
1952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法院系统开展司法改革，重点是批判“旧法观点”和“衙门作风”，在此基础上，彻底清理旧司法工作人员，另从“残疾复员军人”和“失业工人”中招募合适人员充实法官队伍。在粉碎旧法统、旧法律制度上，中共自始没有手软，此为大陆政权易手之后第一次司法改革的主旨，是为“破”；至于创建新的法律制度，在运动中很少涉及，除了《中央政府组织法》、《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其他“相关”组织通则外，也只是公布施行了《土地改革法》、《工会法》和《婚姻法》，再有就是《惩治反革命条例》以及《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加上一些零散的法规和规章。打击目标，保护对象，初见端倪。一些重要的法律制度诸如律师辩护甚至被视为别一阶级所专有，付诸阙如。

斐公作为干了多年司法工作的法院院长，被市里确定为旧法观点的代表，运动的重点，在全市检讨，接受批判。在全市大会上公开检讨的还有民庭庭长李葆真。大会由老贺主持。他在总结发言时，着重说了旧法观点和衙门作风在市法院的表现和危害，依照中央精神重申了运动的意义和必要性，号召大家把司法改革进行到最后胜利。何谓“最后”，他当时怕也未必会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或者明确的目标。而对斐李二人的检讨则未置一辞。斐公大为恼火，公开指摘没有保护他“过关”，在私下甚至说起了“下石”于井的作用，攻之为想“取而代之”。斐公的这种心态，是他对贺心存芥蒂产生矛盾的主要根源。不久，又吹出来一股风：老贺带着队伍来，实际上是对法院的“二次接管”，现在院长的权已经被夺得差不多了。这是火上浇油，而且把矛盾升了级。

运动结束，应有总结上报。党组在讨论对运动的评价上出现分歧。正副院长各持己见。起草小组几度易稿，陷入无法下笔的困境。

周奎正当时是市政府政法办公室的负责人，他作为张友渔副市长的联络员了解司法改革运动的全过程。此公聪明点子多，想出了一个看似解决矛盾的主意：按正副院长的意见各写一份总结上报，由市里决断。这个馊主意立马被斐公采纳，称赞说：“奎正是个政治上成熟的干部。”于是同一个党组写出两份内容不同的总结，同时送到张副市长办公室，被张否决。无奈熟饭已馊，无可挽回，法院领导层中有宗派情绪的苗头由是公开，两位院长互不团结的信息渐为人知。不出一年，“集团”





北京市二区代表单瑞忱在镇压反革命分子大会上呼喊口号。

之说扩散，无能扼制了。

我在那场运动中，自始至终是斐公依靠的对象。运动开始不久，他指派我以市院代表身份下郊区法院指导运动。那时北京市设四个区法院，市区三个分建于东、西、北三城，郊区法院辖四郊各区县，本部设于石景山，院长阎希贤是位富有经验、能力挺强的老革命，只是运动中反映出他的问题不少，事涉工作作风，还有渎职罪嫌（其中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正副院长加上一位庭长，往往以被告人的刑期如何判定“打赌”，各押一段，距判决最远的为“输”，输家请酒）。斐公交给我的任务是：传达市里意图，反映下面情况；指挥运动，重点把阎的“问题”搞清楚，并选择时机拿到区院的业务大权，暗示我日后取而代之。我大约每周回来汇报一次，直接与斐公联系，能知道他的一些想法，但尚没有条件介入他与副手的分歧。

问题是，“两份总结”的阴影从此挥之不去。春水已皱，孰能抚平？

### “此情可待成追忆”

我与斐公初识于1948年12月，时解放大军兵围北平，待机入城。中共北平市委业已组成，彭真率部驻扎良乡城内。在中共中央华北局的统一配置下，从解放区

各地抽调了十几个司法干部，准备傅作义将军起义后进城接管国民党法院。斐公是内定的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处长，北平市人民法院院长。我那年21周岁，从北平一所学校潜入解放区不久，人称“学生干部”，其实是披着深灰军装的“娃娃兵”，不谙世事，只是由于学了几天法律，调入斐公麾下。

1949年2月，接管国民党法院的工作顺利完成。议定诉讼活动仍由原先的“推事”（即法官）照常进行，并不中断。唯一的变化是，接管人员在推事审案时，与他们并坐审判台上，只听不问，任务是起监督作用。

推事们熟悉法学，功底深厚，推断事理，富有经验，判决文书写得言简意赅，有的已臻佳境。他们哪会重视我这个“儿童团”。一个有着地下党身份的“推事”告诉我：他们都喊你“娃娃”，说“那个胖娃娃坐在台上陪着审案，有意思！”我无意猜测那“有意思”的感叹里含着什么意思，只因佩服他们的功力，加之根本不懂诉讼的种种程序以及审判的奥妙，想向他们学习审案，思考怎样推理，琢磨如何“制服”人犯，特别是探求他们在完成规定的程序之后怎样下判。我几乎天天都坐上审判台，也不管他们烦不烦！短短两个月，大有收获。他们够得上我的启蒙老师，他们的实践补充了我从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共同纲领》中得到的关于法律是阶级统治工具的知识，体察到法律除了阶级性外，还有它继承性的另一面。这一点对于抑制我当年大有可能不断扩展的“左倾”幼稚病，具有一定的作用。待到4月人民法院成立，我被任命为“学习审判员”，已经能带着两个留用书记官独立地审判案件了。这两位书记官都是1948年以前的法科学士，学历都比我高，其中的刘亚男在旧法院就是干练的“书记官”，业务能力强。在他（她）们的帮助下，我们这个合议庭（当时称为“民事第8审判庭”）的审判活动干得有声有色，人们夸我的判决文书写得够“格”。

我能感觉到，斐公对我相当看中，所以半年之后就在全院评我为“模范”。

他当时独居于单位后院，环境幽静。某日下班前，约我谈事，正遇他与人通话：“晚上听戏去吧……你不用来，何必跑那么多路！上了一天班，会挺累，我让司机接你，咱们一块用饭……好，我等你。不用太急，一会儿见。”放下电话，他见我表情茫然，得意地说：“谈恋爱嘛，得温柔点！”语气轻松，心境舒畅。前此风闻他进城以后坚持要与配偶离异，此刻才明白已进入求偶新阶段了。他对我，似无隔膜。

待到年末，我就结束了审判员的“学习”阶段，升职副县（团），工作也有了变动，调去“审判委员会”协助主任秘书李凤林审核各庭上报的裁判文书。由于件





镇压反革命运动宣传画。

件都应调阅案卷，工作量大，通常每日工作15小时。凤林30年代毕业于朝阳大学，又在解放区干司法工作十几年，他审核批改案件的意见，很少被斐公否决。我却认为，他的语言酸腐，文字陈旧，不免故意同他“捣蛋”。比如处分凶器，他会改作“手枪一支没收之”，到我手上就一定会把那个“之”字划去，惹得他很不舒服，有时还会当面重新改回。司法文书，生杀予夺，我硬敢在文稿上添来划去，实在胆大妄为，不知天高地厚。斐公对此，却时表满意，在业务上还不断给予指导。

1950年代开局，北京市委根据中央要求部署机关整风。重点是领导层的官僚主义。那时党在我心目中是何等神圣，认为党的领导也必是圣洁的化身。但现实使我有动摇，而且日趋严重。我容不下斐公这样的高级领导有疵存垢。在市委联络员朱启明的启示与鼓动下，就轰了几炮，批他保守，揭发他是官僚主义加事务主义。我讲得好痛快！朱说批得好，整风应当是这样，延安整风就是这样，所以才整出一个新中国！

恰在此时，人民大学的法律专修班成立，要求各地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县团级业务骨干报考，合格者用莫斯科大学教材进修一年，由苏联专家讲授。我被选送报考。入学以后，学习紧张，没有时间返回法院，整风情况从此一无所知。结局大约是“皆大欢喜”。斐公对我，并不因我的“放炮”而另眼看待。总而言之，一切依

旧。有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学完回归，向斐公报到。他开口问道：“在学校怎么样？”

“还可以。全优成绩。”我答得轻飘飘地。

“成绩我放心。我问你在学校干什么了！”

“除了学习，没干什么呀。”

“学校里发现过反标（即反动标语），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也没听说。班上学员都姓‘共’，怎么瞒着我，难道对党员也分三六九等？”

“一发现反标，就有人怀疑上你，说那里过去是你的母校，你对校园环境最清楚，你的嫌疑最大。人家把材料转来了。”

我忍无可忍：“纯属胡扯！”

“看来你学习这一年还是那么自负。不懂合群，吃了大亏！”

“我知道有人对我不舒服。有些人学习太困难，成绩差，还要摆老资格，只不过没想到竟会这样干！”

斐公扫了我一眼，没作批评，只是说：“这事你知道就行了，不要再提。你的工作已经安排了，去刑庭吧，那里任务重。”

他的谈话，处处流露出爱护与关切，这种上下级的关系寻常么？只是怎么也没有料到，只过了两年，情况巨变，我也只能哀叹“天翻地覆慨而慷”了。

## 人有“过”，天知否？

1951年6月到刑庭，大规模“镇反”早已开始。我受命担任庭长助手，同时负责清理“敌逆产”案件。该项业务的特点是：情况复杂，政策性强，任务奇重，时间紧迫。斐公采纳我的建议，留下了几位尚未来得及“清洗”的推事，包括司法改革前的检察长于兆吉先生，加上一批年轻干部，组成了“敌逆产清查代管小组”，简称“清管组”，共20人。处理这批案子，无法可依，但政策规定具体，也不易出错；大案直报张友渔副市长，由他把关。我在业务上倚重于兆吉和其他几个老推事，重要案件都交他们查办。斐公高兴地说：“没想到你这么爱才！”

我与何占庭长关系尤为融洽，几达亲密无间；凡大事他都同我商量，观点往往一致。时值镇反再掀高潮，狱中忽传情报，在押的一批“一贯道点传师”密谋组织暴动，实施组织与具体方案已被狱方掌握，要求对其中的“主犯”重新判处立即执



行死刑。当年狱政归公安统管。鉴于事态特别严重，涉及几十个人犯，牵连监狱管理工作的重大漏洞。我们商量，经斐公同意，先向市局冯基平副局长（局长是罗瑞卿，后由冯继任）通报情况，听取他的意见，再定对策。到冯办扼要地通报了情况，他说：“知道了！”然后把桌子一拍，指着一摞材料冲出来一句：“他妈的！看来杀少了。不行，得狠点！你们赶快把材料研究一下，从中杀一批！”根据什么“杀”呢？他没说明，我们也没问。

然而，我与何都觉得不踏实。“点传师”全是重刑犯，看管严，怎么能搞地下活动意图组织越狱暴动？现有的几十份交代材料，在主要之点上竟然完全一致，让人不敢轻信。经验告诉我们，这类事件，情节越讲得具体，越值得怀疑。后经专门审查，原来是有人妄图立功减刑，谎报“军情”，狱方一见越狱暴动材料，就紧张起来拼命扩大线索，造成串供，材料越写越一样，终致一场虚惊。

想当初，“一贯道”是被一纸布告宣布为反动会道门的反革命组织。法院执笔写布告的，主要是李凤林和谢邦敏，三易其稿却未通过。彭真急了，说“算了，你们（法院）别管了，我请邓拓来写。”邓果然是高手，一挥而就。文章开宗明义定了性：一贯道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毒害中国人民的工具（大意）。彭看后大喜：“看，邓拓同志就是比你们这些纯粹搞法律的人高明！”无须解释，邓“突出政治”，通过了。从此开始，一贯道“点传师”以上的信徒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无不判了重刑。

我与何占合作默契，私交也好，下班之后“拱猪”的笑声经常充溢楼道。

转折来自我一位学长的夫人。她没学过法，但灵巧。不算美，却娇媚。她调进法院就做刑庭办公室的秘书，专责处理何占的行政性事务和外联。何在工农干部中能力强，有文气，口才好，颇具吸引异性的本领。没过多久，二人情趣相投，难舍难分了。

规劝他时，他赌咒发誓没有出格，要好而已。

事实上，幽会在升格。时在区法院任职审判员的张元成告诉我，星期日回市院去找何闲聊，推门正见二人“穿衣提裤”，十分尴尬。他说要向上级反映，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不忙。你见到的情形人家可以否掉，反过来再把你说成“诬告”倒不好。元成恨恨地说：“太不像话了！哪里像个领导，大白天公开这么干！”

“他以为没人可以管他。”我对元成说——“等等看发展罢。”

事态发展到他可以同时怀拥一对女郎。人们纷纷议论，何疑心是我在“作祟”。他知道元成与我亲近，估计早把眼见的种种透露给我，由我广播了。其实，他那般肆

无忌惮，怎么可能瞒天过海不成“丑”闻？偏巧此时我的工作调动，我们从此疏远了。

调动我的工作是老贺的主意。

我敬重老贺，始于一件事。刑庭谢邦敏心脏病复发住院，宣告“病危”，我打电话给老贺：“老谢怕不行了，我马上去找‘四大名医’，总有一位能请来抢救。”贺说：“好！从现在起，我的小车派给你专门找医生给老谢治病。别怕花钱。有情况马上通知我。”孰料病情太凶，不容我请来名医施今墨，当天傍晚他就走了！尽管人没救下，由此我对老贺的那种爱护部属作出的决断，印象极深极好。他没有臭官僚架子，办事的气魄，对部属的气量，听不同意见的气度，让人折服。

老贺从工作发展的前景考虑，力主法院设研究机构，对下指导工作，对上汇报情况，与各省市法院交流经验。

我被指定主持新机构。配备的人员称得上法院系统的精兵强将（三年以后除一人外，都是惨遭重点打击的右派分子），工作上得很快，出手的专项业务总结受到上上下下的肯定。我成了老贺口中的“精华”，被他吹嘘。那段时间，法院内部的一些知识分子，几乎都团结到了老贺的周围。

不过我与他工作之余的单独交往，偏偏是始于他找我了解何占“绯闻”真相。他告诉我：何找他，哭着说我背后打击他，造他的谣，他很难开展工作，让贺对我施压。老贺说，看他哭的样子，根本没信他那一套。事已至此，我只好详详细细地陈明了事情的发生与发展，交代了所知情况的来源。老贺说：“你别管，也别对人说我找过你。怎么办由我来处置。”其实我那时心里明白，何找贺，是斐公的意思，因为党组分工，贺管干部的思想工作，我断定何一定先找过斐公，而且得到了谅解和支持。

随着事态的发展，围绕此件“情殇”，牵涉的人“与时俱增”。何占为了自救，在斐公的庇护下，开始组建起以他为核心的“神圣同盟”，攻我兼及老贺。隐私之事，演变成政治角逐。

“人有过，天知否？”为了这些不该发生的故事败坏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任分歧一步一步地升了级。空余无奈，能说什么？

### 我也病得不轻

1953年高、饶事件突发。中共中央于1954年2月召开七届四中全会，作出



“加强团结”的决议，要求全党结合实际贯彻执行。北京市法院党组根据市委部署召开了持续一个月的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会，会议一转入联系实际就泛出了火药味。

从老区来的一位“三八式”第一个“联系实际”，他挪开座椅站了起来，开口说的是，去年的评职定级对他如何不公道，讲到气愤处，手指人事处长嚷了起来：“马润生，瞎了你的狗眼！你狗眼看人低，我哪点比不上张三，哪点比不上王五？”他点名一一攀比，尔后把会桌一拍：“你凭什么把我定得比他们低？你根据什么？”

与会者无不惊愕。如此争官职、抢位置、闹待遇，发生在党的重要会议上，不敢想象；发生在一个自称“老共产党员”的身上，前此未见。会议没有对这种异常情况作任何表示，意味着有意见就可以提。

各种“意见”就都端了出来。发言经常表现出两种观点、两种力量的对峙。支持斐公的占数量优势，拥护老贺的火力集中。过去的陈年老账包括司法改革中的分歧，都翻了出来，“派”性越来越浓。

我一直没有开腔。会下，老贺问：“怎么不在会上讲讲意见呀？”我取敷衍态度，闪烁其词。

待到会议最后一晚，常真发难，说：“思之同志到现在还没说话，今天最后一次会，总该说说意见。”我心想，既然点了名，那就说。于是未经披挂，赤膊上阵了。我从建院之初就对斐公的负面心有不满，1949年秋天还和其他两个同志联名上报过书面材料，现在论及往事，自然有话。闸门既开，一泻千里。讲到了斐公不尊重市委，怕向刘仁汇报工作，“纲”上得挺高；讲到他袒护何占的缺点与问题，多涉细节；说他打麻将通宵达旦，听京剧可以不顾工作，又不免绘声绘色；我甚至莫名其妙地以批评之名讲了他早先同我闲聊的夫妻私情，并指为“低级趣味”，惹得斐公当场给了我一句：“无非是‘房中术’嘛！”我的发言长达五小时，独占了会议时间。发言结束，斐公二话没说，宣布散会。

我这五小时的发言宣泄了对官僚主义的不满，只是由于掺杂着宗派情绪，对斐公、何占进行了绝情的攻讦，实际上站到了老贺这一边，从而为自己日后戴上右派桂冠举行了奠基仪式。“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古往今来，信或不信，谁逃脱了这样的“谏语”？

## 时间已到，阶级斗争来了

1954年夏秋反胡风开始不久，就把我“隔离审查”了，关在地下室的一个小屋里，除如厕外不准外出一步。

最初的罪名是“组织小集团”，这正是钦定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基本特征。至于我们“小集团”是怎么回事，说来不免好笑。

当年各单位奉命组织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法院指定我与另两人组成“学习领导小组”（人称“三人小组”），辅导机关学习。三人小组每周学习一次，为辅导作准备。我早年在四川养成茶馆读书的习惯，加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茶室距单位只有一箭之遥，那时的工资收入又够得上宽裕，于是每周一次的学习如无特殊原因就在茶室，“小集团”由是“形成”。偏巧其中有一位与胡风相识，且有书信往来，顺理成章，“小集团”戴上了“反动”帽子。

“审查”经月，实在找不出胡风问题的影子，因此连一次小会都没开过。我知道这是前不久“团结”会上发言的收获。不料，一个傍晚，何占闾来看我，嘘寒问暖之后说道：“这么干，可能王院长也没料到，估计是上边的意思。你有什么意见，要是还信得过，不妨告诉我，我可以找王，同他专门谈一次，尽快解决算了。总圈在这种地方算什么事儿？”当时我认为他来是“摸底”，看我是否会在情急之下扯出他的那些问题，所以只说了一句：“你可以告诉王院长，我与胡风沾不上边，没有一点关系。”我说的是实情。我因不大习惯胡风的文字风格，很少看他的文章，那首著名长诗《时间开始了》饱有激情，未必尽涵诗意，粗粗看过，也未终篇。把我与胡风问题挂上钩，堪比“风马牛”，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

## 内部肃反，我的“历史问题”

然而躲过了初一，逃不过十五，“暴风雨就要来了！”

反胡风斗争一结束，紧跟着“内部肃反”，即肃清机关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那风刮得正紧。

我曾于1943年参加“中国学生志愿远征军”，授衔“二等兵”，兵中最低一阶，到达“印缅战区”后，升“上士”，士兵中的最高一阶：自始至终是“士兵”。1945年随军回国，旋即开了小差，继续学业。这段历史，时被诬为参加“伪军”，属重



大历史问题。就凭这一条肃我，应属有“事”可依。于是斐公在大会上宣布我是这次运动“重点中的重点”，要求全体科长以上的党员干部停止日常工作，全力投入对我的斗争。我哪见过这样的战阵，不过还没被吓晕。因为有两点我很清楚：第一，反革命问题与我不搭界；第二，斐公的基干队伍未必坚挺。

斗争由一份从图书馆查到的宝贝史料切入。那份“史料”，涉及我“投笔从戎”后的一个小故事。1944年末，中央社记者在印缅战区后方基地活动，我奉所在的“独立炮兵第五团”团长刘措宜之命接受采访，记者以《重炮在怒吼》为题发表通讯，引用了许多“我的”谈话，美化战地生活，宣扬青年的使命。当时日寇正兵犯贵州，重庆告急，记者意在借此践行委员长“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这件事当然无妨审查。但问题在于：记者通讯中的“谈话”百分之百出自他的编排。我一个十七岁的中学生，知识甚少，发不出“高论”，更何况，即使硬要加在我的头上，那内容也无非是为了抗日，与反革命有什么相干？这让我觉察出：肃反整我，果然是“醉翁之意”！

斗争会选“题”不当，开局不顺，休整之后换了方向：改查“现实”（而且从此没再查过“历史问题”）。

### “团结问题”

重点自然是“团结问题”。如此布局，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岂不是向我交了底：那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不经雨打就被风吹去了？

然而斗争激烈。最初阶段几乎每天一场斗争会。由于我已被迫“认真对待”，加之态度“顽固”不肯投降，故一直处于围而未剿的态势，用对方的“术语”说，就是“拿他不下”。

人们都懂得堡垒易从内部攻破。僵持不下之际拉来机关“学习领导小组”（即前所谓“小集团”）的秦智，与我开展“面对面”的斗争。他从1949年建院谈起，一直说到去年反胡风，五年中我如何利用各种方法，恶毒攻击王院长。诸如给院长起外号称“胡子”，说院长追求某女部下很有手腕；说院长夫人越权批案，曾对一份应予“存卷”的材料批为“存券”，院长不察，居然入档，她文化低，不能怪，该打她老师的屁股，因为误人子弟——这是对工农干部的污蔑；说贺副院长政策水平高，到中央做副部长也够格，而王院长保守，不思进取，没有开拓精神；等等。口中滔滔，尽是鸡毛蒜皮；心中栗栗，不见理直气壮。作为朋友，他扮演这种角

色，我有点替他难过。让我表态时，我淡淡地回了一句：“你揭的这些事，让我来说你，可以讲三天三夜。”他本人未置一词，却招来某女士对我大吼一声：“你少扯别人！告诉你，我们的秦智同志起义了，早同你划清界限了，你吓不了谁！”斗争会在一片对我的警告声中散去。

此后，我终于还是被迫逐一按秦智的揭发“交代”。

——“‘胡子’，我起的，常喊，但无恶意，有时是表现顽皮，有时是情出亲切。”他蓄的胡子，乌黑浓密，剪裁整齐，比“仁丹”上的胡子形象好看。我讲的是实话。

斐公气呼呼发话：“胡子，东北话就是土匪。不是恶意？是骂人！”我反驳道，“‘胡子’就是土匪？没听说过。贺龙、任弼时在党内也都被称为‘胡子’，谁也没认为他们是土匪！”

迎来的是几位女将的轮番狂批：“你的立场与革命者的不同，你的意思就是骂院长土匪。”

如此这般，有什么可争可辩的呢？

——“追求某女，我在这次会上第一次听说，以前根本不知道。”

“不老实！”一排声浪袭来。被“追求”的某女，沉不住气自己跳将出来，质问道：“你造这谣有什么根据？你这是污蔑，必须交代你想干什么？”

我默不作声。因为我的确不知道。

——“院长夫人把存卷批成‘存券’，是案中情况；要打她老师屁股，不是我的创造，那是邦敏的俏皮话。夫人的批语，就存在他办的案卷内。我传播过邦敏的话，主要是对夫人批案不满，不及其他，不发生污蔑谁的问题。”

谢邦敏，四川犍为人，1940年代北大法律系著名的“四才子”之一。他原是重庆南开中学学生，考物理交了白卷，心有不甘，在卷面上填了一阕《鹧鸪天》：

晓号悠扬枕上闻，余魂迷人考场门。

平时放荡几折齿，几度迷茫欲断魂。

题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电、磁温。

今朝纵是交白卷，柳耆原非理组人。

率真有趣，颇为动人。物理老师爱其文才，在试卷上赋句作答：

“卷虽白卷，词却好词。

人各有志，给分六十。”

邦敏以其词作在物理白卷上得分六十，乃得毕业，考入赫赫有名的“西南联



大”。此事传为校园佳话。您想，像邦敏这样的英才，在生活中来点幽默，打一下老师的屁股，何其自然！居然放在会上“批斗”，实在大煞风景。

——“我说过贺副院长政策水平高，可以当副部长。这是我的认识与评价。没有贬谁反谁，更不是反革命。”

……诸如此类，鸡毛蒜皮。

别的人，更揭不出我在“团结问题”上有什么罪，也只能放放空炮，如此而已。

斐公鉴于斗争会未达目标，意图“救急”，乃一反常态，约我到他的办公室单独谈了一次话。谈话简明扼要，直截了当。他先作启示：“有些问题，你可能不知深浅，说不定上了别人的当。不妨借这个机会好好想想，作个彻底交代。讲清楚了，也就可以告个段落，老这么拖着终归不是办法。”

“我知道的，想到的，该说的，都没有隐瞒。”

他听后忽然冒出这么一句：“你可以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嘛！”话语如此明白指向老贺，诱发我恶从胆边生，毫不掩饰地回敬了一句——

“你要是早这样做自我批评，我就一点意见也没有了。”

他一时似乎没有反应过来，沉思片刻，突然地，把脸一沉，怒气冲冲地说：“我再也不同你谈话了！”

“是你找的我，又不是我找的你。”

“你回去！”他挺有分寸，没说“出去”。

我却忘了应有的礼仪，转身“回去”了。我当然知道，这下又闯了祸。我的“下场”由此注定，回不去了。

## 年轻人上阵了

“团结”问题作为“现行”到此暂告终结，也只好另觅内容，另组“阶级队伍”。下拨上阵的主力是年轻人，把他们摆在一线与我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希望能揭发出有分量的新问题。屡经斗争，揭出的“主要问题”倒有几件：

其一是“压制新生力量”。

受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先生一度受阻、被毛老人家斥为“压制新生力量”的启发，说我也犯有此罪。当时我是《法院工作简报》的负责人，按规定，每期的“编者按”是代表法院和院首长的言论，必须送请审查批准，任何人不得自“按”

自发。小青年李正德中学毕业后经半年培训分来与我一道工作，他胆大敢干，试写“编者按”，不经送审就要付印，被我阻止。他争辩说：内容不涉及重要问题，你们何必审？我严词批评，问他“既不重要，加什么按语？”他很不高兴。现在来翻旧账，说我压制了他这个“新生力量”。

是耶，非耶？就算难以分清，但这能是多大问题？

其二是同情与袒护反革命分子。

“三反”运动后期，有位沈静交代参加过“中统”特务组织。按政策宽大处理后，继续留在刑庭工作。党委要求对他加强团结，不得歧视。当时左倾情绪遍布，人们都不理他。我是刑庭党小组负责人，只好带头贯彻执行党委指示。每到周末，如无其他情况，我会把他请到家里茶叙，有时还搞些小吃招待。自不曾料到，此刻这位沈先生居然揭发说，我明知他是特务分子，如此示善，意在袒护，为反动势力撑腰。

奇谈怪论，荒唐如是，只能不予置理，由他瞎扯。我的沉默得到的回应是：没话说了，说明认罪。

其三是包庇坏人坏事。

帽子不小，内容却玄乎其玄。有位同志家用的电灯泡坏了，经济困难一时没能力买新的，他要求每晚下班时从办公室摘走一个应急，次日送回。我同意了。那位同志有点懒散，次日忘记送回。现在攻我是假公济私，同情贪污。当时虽然还没有“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明文规定，但法理上应作如是观当无疑义。一家首都法院的业务干部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讨伐被斗对象，我以为应属奇闻！

再举下去恐怕连鸡毛蒜皮都够不上了，君不见荒诞之路尽荒唐！这样的“斗争会”，除了乱斗胡斗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那年盛夏温高，40℃以上不是偶现，斗争会场却连电风扇都没有。许多人穿着背心与会发言，我宁肯受热衣衫整洁依旧。听着一些不着边际毫无意义的“对敌斗争”言论，我会轻摇竹扇，得点清凉。不料这种姿态遭到一位复转军人出身的执行庭人员痛斥：“张思之这小子，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实在嚣张，让他把扇子收起来，不准再搨！他眼里还有群众没有？我他妈的不信把他拿不下来。”应者寥寥，主持人见机行事，宣布散会，我摇扇离去。

事后，我找到“五人小组”，郑重声明：那位复转军人的脏话发言，态度蛮横，有违党的政策，以后的会如果他参加，我决不出席！



他确实没有再来“斗”我，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我取得了胜利。

### “特务组织”的匿名信

几个小青年出演的几场斗争会，翻来覆去，没有一点新鲜味，于是再度休会，秣马厉兵。

没过几天再开会，参加的人数果然增加许多，“各方”都有，而且气氛异常严肃。会议一开始，主持人汪魁宣布：组织上收到一封寄给张思之的信，里面涉及的问题需要他说清楚，现在让他给大家念念。

信交到我手上。收信人的确是我，地址写的是“北京市人民法院”。信封已被撕开，内容只有一页，从头到尾看下来，竟是一个特务组织的口气，对我在肃反中表现出的“硬骨头精神”给予表彰，并要我坚持到底。措词低劣恶毒，这分明是阴谋陷害。我起立声明：“我不会用自己的口宣读这样卑劣无耻的文字。”我把信退给汪魁，以示拒绝。他无可奈何地给与会者念了全文，包括中共如何对我施压迫害，我在长时间的反复斗争中如何针锋相对、决不屈服之类的细节叙述，都念了。然后要我交代与来信人的关系，是什么组织。

我拒绝回答任何与“信件”内容有关的问题。

我从剧烈的“炮轰”中察知，有些天真的人认为我真的被抓住了“辫子”，现在是理屈词穷，只好沉默了。

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想想：第一，我从运动开始的第一天就被“软禁”，行动失去自由，遑论通信？再笨再蠢的“特务组织”也绝不会把这般“密信”寄到法院转我。第二，没有“特务”参加我的斗争会，他们怎么知道斗争的“进程”、会上的“较量”、会中的“曲折”和由此而产生的“气氛”以及我的各种“表现”？第三，来件没有签署、没有签名，既是“特务组织”，总该有个“代号”，否则收件人从何而知谁对他做了“表彰”，岂不是达不到目的？

原以为可以开得漂漂亮亮的一场斗争会，只听得几声空炮，无疾而终。

那时法院对我的斗争还算“客气”，技术水平也还没有从“口水”过渡到“喷气式”，除了三两位出身高学府的女高音声浪震人，未闻拍桌子打板凳的噪音。我不开口，也只是收获到“态度恶劣”，吃不到其他坏果子。人们败坏法制的行径那时还没有达到极致。

我要求“五人小组”把这封“匿名信”送交公安局侦破。斐公是明白人，他一





这又让人好生奇怪。肃反怎么肃到“工作领域”了？冷静一想，不禁暗笑：“技止此矣！”

我笑得又太早了。

斗争会上无非是舌剑唇枪，再怎么激烈也不过是吼声响处，难解难分。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不知还能有什么新花样？

果然，大约一周过后，我接到市检察院的“谈话通知”。他们如约到达，说是找我了解处理敌逆产案件的情况。他们告诉我，你是这些案子的主要负责人，现在积案如山，国家受损，法院说你得负渎职责任。因此，你要认真对待，从程序到实体，作出详细说明。该是谁的责任，都不必回避，我们要弄清楚。

我归纳了在斗争会上的“交代”，向市检的同志说明了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三反”运动后期，房地产管理局根据市委决定，把原由他们审查的“敌逆产案件”全部移交市法院，同时调派三个人随卷报到。法院陆续调集20人组建了“清管组”，统一调查处理这些积案，其中包括书记员、行政人员。

第二，“三反”运动结束，各种渠道检举、揭发、交代涉及“敌逆产”的材料确有万件，但大部分只是一点线索，极不具体，而且事涉日伪、国民党时期，经过几度转手，有些牵连许多人，有的又属“善意购置”，查证任务繁重，工作量大。

第三，按每人年平均结案30件计（这是根据1953年的工作条件），全组年结案不可能达到千件，再加上陆续新收的大量案件，没有一二十年不可能处理完。

第四，市里规定：所有决定没收或者代管的敌逆产，都必须做出判决，批准权归院长。但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的判决，应报副市长张友渔审批或者由他上报中央。我作为组长，决定权极小，主要任务是审核判决文书。

第五，我主持“清管组”工作大约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调动工作时办理了正式移交，1954年以后的工作不能由我负责。如因为这批积案拖延未决而使国家受了损失，首先应由总揽全局的法院院长负责，其次应追究主管刑事业务的刑庭庭长的责任。我没有大功，却有大劳，够得上尽职尽责。渎职之说，出于打击报复，与我无关。

检察官的态度平和稳健，听完我的陈述说道：听明白了，你先回去，我们会如实报告检察长，这种情况不可能立案，你不必顾虑。

斐公领导的“五人小组”抛出的杀手锏又没有击中目标，落了空。

## 我的“小动作”

这时，老贺露面了。

他作为“五人小组”主要成员，似乎一直在静观事态的发展。彼时外派全国各地调查“张思之历史真面目”的人员陆续回京，据说没查到问题，老贺心里一块大石头落地。他已完全明白，借肃反整我是在搞“团结”问题，也就是整他，于是急于找我面谈。

他见在夜间监视我的人撤走之后，与我电话约定：在前门箭楼下见面。他穿棉军大衣，戴大口罩（日后整他时指为“化装”）。

他向我表明了四点：

第一，“全国跑遍了，没查出你有问题。”

第二，“他们想把你往死里整。”

第三，“他们还想拉扯上我，把我攻成你的后台，一锅煮。”

第四，“你沉住气，也别急，谁不按政策办事都通不过，看他们怎么收场。”

我着重谈了与斐公单独谈话的情况。他听了很兴奋，说：“顶得好！他这是冲着我来。”我要求他在可能条件下，把“匿名信”查清楚，此事一明，他们一伙的动机就全清楚了。他说：搞这封信，是想说明斗争你的合理性与正义性，想激起群众的愤恨，这怎么可能？群众又不全是阿斗！他当时一直没说这封信是否送给了公安局侦破，我疑心，斐公在“大事”上是背着他的，只是不知他对此有无察觉？

交谈时间不长，互道珍重，分手告别。

坦率地说，老贺的态度只是让我更进一步地明确：“五人小组”并非铁板一块，斐公尽管有权决策，未必能左右一切。但老贺的态度并没有让我感到有了“后台”。我在经历着孤军奋战的磨炼，碰到有趣处，还会自得其乐，没有那么多“闲愁”。

## 我被一伙“群众”判了

转眼到了寒冬。那年气温比往年低，老天爷变了脸，“左”得出奇的英雄们的调门似乎也高不起来了。为了掀起新的浪涛，不知何方高人出了个“高招”，让几个与我一向友善的小青年虚拟出一份判决，宣布我的罪状，企图作最后的威慑。

汪魁又被派来担当宣判重任。



那天会一开始，先由他发言为判词铺垫。只见这个日常细声细气的青年，满面愤容，满腔怒气，冲着我高声喊道：“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别以为你的事儿都滑过去了，仿佛拿你没什么好办法。你打错了算盘！你的所作所为，用法律加以衡量，我们作出了判决，你好好掂量一下，迷途知返，也许还有出路。大家委托我来宣读。”

我实在没有看重这种假判决，不论他说什么，我都不会当真。我在想，你会写判决，是我一手带出来的，我是“逻辑学长”、“语言教师”，现在把那点初学乍练得来的本事用到“老师”身上了。世事是如此怪诞，人竟这样绝情！

这类蹩脚东西的内容无须详记，他宣读的要点是：

张某人12岁加入“三青团”，16岁参加伪军，自幼反动。混入革命队伍后，一贯反党反领导。1952年开始结成反党小集团，帮助胡风分子进行反共活动。七届四中全会后，反对中央号召团结的方针，疯狂地在机关内部进行分裂活动，后果极其严重。在刑庭工作期间，包庇坏人，对清理敌逆产工作严重不负责任，积案上万，国家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在研究室工作期间，拉拢亲信，打击新生力量，搞宗派活动。肃反运动中，组织上列为重点挽救（按：这一句写得好！）历时数月，不思悔改，立场顽固，态度恶劣，持续同组织对抗，坚决与群众为敌。应积极分子的要求，依党的宽严政策，应予惩处，判决如下——

至此顿住，问我：你掂掂分量，该判多少？

“罪名呢？”我反问他。

“你自己琢磨琢磨该怎么判。”

“是让我对你的判词作出估价么？”

“谁让你估价！”有人吼道。

“那我是否可以问一下，这样的判决，有什么用呢？”

“你眼里有没有群众？”另一个声音责问。

“既然是群众，哪来的判决权？刚才读的判决不是连审判长是谁都没签名吗？”

“到定案时，当然有人签署。”

“那就等审判长来定罪量刑罢。”

“我们是想让你明白，你的问题严重，再不回头，就只能换个地方了。”

“我从一开始就明白。我有什么问题，有多大问题，比在座诸位都清楚。”

“终于露馅了！终于承认了有问题，那就快点交代，还拖什么！”——那位擅长断章取义声调刺耳的女高音，好久不见，又亮相了。

“露馅？什么馅？我可以再重复一次，我该说的，早就说完了；与肃反运动中心议题无关的，也都说了。是谁在拖，时间会作出证明。”

我的回答招来阵阵“态度恶劣”的怒斥，但并无实际内容，一场宣判就这样在一些人的狂吼中宣告结束。什么罪？没有说。判多少？没人知道。它的作用在于：替代了几个月来历次斗争会的“闭幕词”。所差的只是没有写出主事者的战略部署与各阶段的重心，没归纳战役策划和战阵安排；还有，没道出某些人的心理活动与最终目标；当然更写不出我所经受的锻炼以及我从中学到的斗争艺术。我真的感激斐公当年的那支战队，他们在斗争中给予我的多方面的启发与引导，为我日后能够比较自如地从事律师实务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斗争真的是艺术，我从那时起，就信服了。现在讲出这点感受，是真诚的。

### 肃反的锣鼓收场

外调，没查到问题；内斗，没整出名堂：一切似乎都该收尾了。问题是，怎样下结论呢？

斐公领导的“五人小组”自有主张。他们先给我定个“反党分子”上报，被驳；再报个“反领导的坏分子”，被否。当年上级党委主事的先是薛子正（市委常委、市政府机关党委书记，后来担任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后是柴泽民（市委委员、市人委秘书长，后来曾任驻美大使）。他们熟悉北京法院内的种种情况，又因工作关系对我有所了解，加上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对斐公的印象一直欠佳，所以不可能任由他们给我乱扣一顶“破帽”。法院“五人小组”无可奈何，最后作出了一个同我见面的结论，上书12个大字：“经查，张思之不是反革命分子。”看后，我难禁愤慨。人们会说，证实你不是反革命，难道不实事求是？可是，它果真是实事求是的么？怎么不敢写出12字后面呼之欲出的“潜台词”？请听我的反应——

“整肃年余，花样用尽，手段使完，甚至制造匿名信用敌特名义进行陷害，所有这些，一句‘不是反革命分子’能概括么？对这种结论，我不能签字。”

“你有意见可以写在结论上，再签上名。”

我未作思索，提笔写道：“我当然不是反革命。许多人也明知我不是。问题在于：借运动对我打击报复，直至政治陷害，对此也应作出相应的结论。”

不会有人给我重写结论。只是在“运动”全部结束之后，主管干部工作的成玉林处长对我说：你的全部政治历史，我亲自写了正式结论，王院长认为把你写得



“太好了”，他不签字。他不签就不生效，同那个“肃反结论”一起，都睡在档案里了。

待到它们“醒”来，这个世道可就又生变化了。不久，就有了新一轮的“阳谋”，全国掀起反右巨浪，“反对肃反运动”便成了我的罪名，在劫难逃了。这场历练，长达20年，只能“下回分解”了。

## 尾 声

肃反之后，我就彻底离开了法官的岗位，但依然没有脱开斐公的领导。反右运动中，北京市法院系统俘获了包括斐公、老贺及其手下骨干在内的右派分子六十余名。

老贺划右后，我有揭发之“功”。其中致命的一击，是交代了肃反中前门见面沟通情况那件事。按照当时的政策，这种做法不仅仅是违反组织原则、破坏纪律的问题，够得上“敌我不分”的立场错误，足够划为右派了。

为此，我悔恨终生。我对他，于公十分尊敬，于私相当亲切，没有距离，更无隔膜。反右领导小组要我揭发，竟也降服，证明我当时本质上是个懦夫。哪有马寅老那种宁可孤军战死志不可夺的浩然正气！

老贺对我的“怯懦”持谅解态度。1958年划右以后，我们失去联系。1978年，他突患胃癌。当时他的右派问题已早于他人先期改正，重回公安局任职顾问，住在公安医院治疗。我跑去看他。老贺仰卧病榻，消瘦憔悴，只是精神还好，见到我十分高兴。他对我说，已是晚期，发展很快，已经几乎不能进食，“但今天，你带来的梨，我一定要吃一个。”我懂得他的心，没有劝阻。他艰难地、带着微笑一口一口地往下咽，我陪着，用眼泪，一滴一滴地朝下落。我们都动了情。他握着我的手，说：“人，谁都会死，不必难过。我只可惜没能为党多干点工作。你还年轻，帽子也摘了，教书这个职业很神圣，好好干番事业，争取再入党，为党多出把力。你能干，别失去机会，过去法院那些事，别再想它。没什么了不起！我就不会带着它们去见马克思！”

贺公走得太急太早了。他是第一个因早逝而给我大刺激的人，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愧疚：我害了他！……

斐公1979年初春“改正”以后，调市人大常委会任了副职。某次开会巧遇。他独自一人，早有的腿疾似乎更重了些，步履维艰。我赶上去扶着他，一阶一阶地

登楼步入会场，他很感动，边走边含歉意地说：“别怪我。那时候主要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领导你们这批青年学生！”含蓄委婉，我能听懂。我回应道：“我能理解。我有些事也很不像话。”他接着说：“你转到律师上来，合适，好好发挥吧，等你的好消息。”会散，相拥而别。

他们此刻在另一个世界里，在那个许多人心中的理想王国，一起品茗遥指尘世吧？我思念他们。是他们，领我迈进了中国社会的门槛，懂得了一些世事。是他们，相识之初就给了我许多难求难得的锻炼本领的机遇。又是他们的坎坎坷坷，逐渐地，唤醒了我的觉悟。我似乎已经明白，该怎样地来弥补我给他们造成的不快与损害，该怎样地来弥补我在那段历史中发生的严重失误，作为对他们的永恒的纪念！

写下以上一场场一幕幕我亲历的荒诞不经的故事，既为记录历史，也希望有助于人们对此进行思考，也许还能让后来者感悟到：应该做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思之念之不禁心痛的、我们亲爱的祖国，为人类的共同进步与繁荣做出什么样的努力。





中國當代史研究

史料輯錄





# 一位中学教师的整风笔记

(一九五八年)

**整理者按：**这组史料是广东省南海县一位中学教师在整风时期的工作笔记，颇能反映整风运动在基层开展的原生态场景。为尽可能保持资料的原貌，整理过程中原文内容一律照旧，但因记录者行文中错漏衍字甚多，加之年代久远、字迹模糊，或记录者笔迹难以辨认等因素，故整理时不得不作些许的技术处理。这些技术处理具体包括：1. 原文中的错字以〔 〕符号订正。2. 漏字以（ ）符号填补。3. 衍字以〈 〉符号注明。4. 辨认不清的字以□符号代替。

## 南海县中小学教师整风大会

1958年1月7日

开会理由宣布

朱奕章局长

整风目的：提高自己，帮助党整风，克服三害。整个会议内容：通过鸣放，达到向党提意见，助党整风。必须大胆彻底鸣放，我们也将这样态度去整改。

这个会议过程：小学在本月廿日左右，中学则在二月十五日左右。大会设主席团、秘书处（长二人），下设资料组、通讯组、总务组。

鸣放方法：老中学则分组，新中学（除大沥外）则每校一个组，以各校负责人为组长，组以上联系是主席团。

本次参加学习的人共 1009 人，希大家共同做好保卫工作。

新中学、小学组长会议

召集者沈良材

组长职务问题：主席团在组的中间，加“片”的领导机构。正付〔副〕组长均



须负责搞好这次整风运动。但付〔副〕组长负责记录，要记得全面。组长同志，应注意带头助党整风，以带动教师大胆彻底鸣放，又希望能引火烧身，以助己提高改进工作，不要怕别人提错意见，要相信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开始时遇到一些对自己提（的）意见时，要用什么态度对意见？要不要急于辩解？更希望大家有决心去改，但在鸣放过程，也需进行初改，以推动大家乐意继续鸣放。总之，这阶段务求大家尽（情）地鸣放，尽（情）把心里话讲出。

石碣：我校老师多无所谓，鸣不鸣也不要紧，现在得以有人鸣我助鸣为好。

汤：如何使他们动起来，重视鸣放。

恐大家认为没什么可放，有人以为只鸣领导，起初不论鸡毛蒜皮也鸣，不希望一定正确。

谢：学校负责人思想要准备，因为初放，必对领导，因此考虑勿阻。领导带头初鸣，主要是上级行政，不可先鸣教师。

汤：小□的批与自批过去难展开，倘立即先鸣，恐大家互为顾虑。有认为有此顾虑。我们认为先提校外意见，教师也有很多意见的。

众：对教研室教育局定多意见，引火烧身，未必自鸣，只是自放。鸣放时要有互相启发作用。不怕没有得〔的〕鸣。对公费医疗实要人鸣。保留学额、收学费多问题，教师难开展工作实要人鸣。恐怕有些人怕“引鱼上钩”一鸣出来，给人抓住。（年纪大的，历史有问题的人）

生活日程

6：30 起床

7：30-10：00 会议或讨论

10：30-11：00 早饭

11：00-12：30 会议或讨论

12：30-2：30 休息

2：30-4：30 会议或讨论

4：30-6：30 晚饭及自由活动

晚 6：30-9：00 会议或讨论

## 主席团会议

1958年1月8日

县委宋书记召集

整风中鸣放的主要问题：①据四间老中学了解，大部分是政策问题。但掀起高潮关键在领导！能否放手发动群众，不要害怕高潮起来，要下决心不要先急躁，面色都变，行动不自然。②其次，要跟群众一块放，否则别人会做成“看风头”！当然放也是应实事求是，不是凑数。③第三要发动落后，有些可改的要马上改，对群众表示态度，要大力支持大家放，就算有人看法有错误，也不应拨[泼]冷水。（特别对顾虑大的人）反要鼓励鸣放。④抓紧可即改的，及时改（通过座谈会、写大字报）。

估计情况：（一）初放的东西，多是生活作风问题，一般是一天二天便掀起，三天才掀起则不够劲了。（按：看师院，对！）这第一高潮质量不高。（二）第二高潮时大字报会少些，但质量较高，较对得准三害。这时可能编些小组座谈会鸣放。大字报可继续鸣放。（三）第三个鸣放高潮，继开小组会、出大字报，还要开展大会发言鸣放，还要略抓“揭发”。（可分区、片进行）这是较后的阶段。必到这样，才达到鸣深放透。但这才是整风运动的第一阶段“鸣深放透”。这阶段能好，便能使整风打好基础。这不做好（不深不透），以后各阶段必不能搞好——不能除三害，提高全体教师。

## 整风会议布告

1958年1月8日

石湾戏院

宣布大会主席团名单、县委、教工会、副县长、文教局；

中学：各新老中学的负责人、小学数人、各乡文教助理员。（名单略）

文教部付[副]部长李铃报告：

县内四间老中学整风已开始个把月，新中学、部分小学现才开始（第一批在这里800多人）先报告：今年不准备放寒假，全部投入整风。因我们一边上课一边搞较不方便，（老中学的经验教训如此）但主要还是更好地达到整风的目的。故中学



大约搞到春节前为止，但春节一定可结束，这利用寒假去搞，许多个专区也有。关于星期天放假问题，这不能肯定那个星期天，总之，有时有机会会放一些假便算。

内容：老中学整风小结，新中学、小学如何开始整风？

题目：提高认识，积极投身整风运动。

（一）对前一步学校整风成绩估计。（二）全民性整风问题。（三）整风的步骤问题。（四）端正一些认识。

（一）去年十一月十七日县内四间老中学开始整风，参加的教职工，138人，过程是“鸣放——初步整改”。开始时，是利用割禾假，但后来多是边上课边整风，每周差不多用7-8小时，成绩可见，通过大字报、小组漫谈，结果老师取消顾虑，积极投入大鸣大放。如南海一中，首先是领导、党团员带头，使全体老师积极投入，石中也写了不少大字报，九中、南师也有。这是县内中学从未有过的。去年五月间，各校在社会的鸣放浪潮下也略为[微]鸣放，但目的不大明，也未提到学校要整风，及以大字报为主的，结合各种座谈会、漫谈会的方法，这在我们学校整风，也是很适用的。

现四间老中学至现在共鸣1070张，意见2千多条，平均每人有九张半，意见较多的是领导作风问题，其次是党团群关系、教学、方针、福利、干部政策、历史问题……被提意见对象不仅本校还有机关行政负责人，绝大部分是正确助党整风的。至于初步的整改可见（马上可改的马上改），领导初步表示改正的初步态度，某些尚未能彻底。——如校长的听课问题，因整风而不得不参加得较少，未符所诺。福利也有初步解决。帮助领导了解本身思想作风工作、有何错误，有助于提高领导工作水平，密切政、党群的关系。

但也存在毛病缺点：①首先是领导未进一步讲清道理，但还有部分老师对意义认识不足，还未做到鸣深放透，还未讲出心里话，三几位老师还未出大字报，或马虎应付一下，这一次集中，有人以为“无可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为转入第二阶段。但我们认为，还要大力鸣深放透，根据我们所了解，老师确还有许多问题未肯放的。如：对各级领导的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工资、人事、教育方针、党群关系、学校工作几年来的主导缺点……等还未放，这当然是各学校（的）存在发展情况的不同，因此还须大力彻底去放。

为何还有些老师还未大鸣大放？主要是认识不深刻，有些以为是过去的事。但我们认为要总结一下，吸取经验教训，对今天工作是有好处的。有人怕提缺点恐否定成绩？其次有些人顾虑到反右问题。

②在整改方面：虽有，但还未令人满意，本来一些问题是可及时去改的，但还未进行，可见有些领导还未深刻了解，这是群众要求运动的重要步骤，整改才是整风的最终目的，鸣放只是手段而已。这些同志所以把目前可办的，推到明天，……这是会影响鸣放。校长初步更深明确，可见一些教导主任、总务主任还未积极起来，拖拉！这非改变不可，否则会令群众大失所望。还有，初期只有领导包办整改，小手小脚关门定方案去搞，但对发动群众参加方面是很不够的。如有关教导、总务、教学……等问题，可先交有关部门先提改法，再由领导共批方案，再联系群众去商量，这确还不足的。

③运动发展，各校是不平衡的，大字报有多有少，小组谈话，发展有松有紧，部分有讲心里话，有些揭露问题较深，有些领导信心不强，强调问题多、时间短、工作多、难解决……

## （二）全民性整风认识问题

这是在新形势历史条件下提出的。过去的民主革命斗争时期，我们未获政权，忙于军事革命、社会改革……，现在则不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在经济战线基本取得胜利，确要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这就是全民性的整风运动了。党的整风，是一种划时代的、全世界从未有过的一种措施，整风——大鸣大放大争，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然也解决了敌我矛盾问题。追溯整风历史，可从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开始，这次主要是整党的“三大作风”，解决历史问题。（对）三次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的批判，使全党政治觉悟、马列主义水平，迅速提高，有助于民主革命的加速成功（的）。可见收获是很大的。去年四月党再号召全党要深入整风，更好地克服三个坏主义。这次整风将是为胜利建成社会主义，打下思想基础了。因为党在今天取得很大成绩，有些同志，沾染了资阶作风，不自觉地产生了三个坏主义。又由于吸收了很大批新党员，部分的教育不够，也存有坏作风——非社会主义的是资阶、小资的东西，这是在党内算不合法的，不可能担负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所需。可见党整风是历史、人民所需要，党能处于永远不败的地位，这就因为党经常开展批与自批，从下而上的揭露错误，说明党能大公无私，只要对人民事业有利，我们便要坚决去做，历史上有哪些政府能这样做？这不是他们有无缺点，有无改问题，而（是）他们是应根本被人民推翻的，不能并比。可见助党整风是必要的。但有人问为何整风中间又搞一下反右？这是很明确的，因为右派想打垮党，要建立资阶国家，这是历史人民所不容许的。因此必须反右。

现又述及资阶、小资产阶级与党、工人阶级的整风性质是有所不同，（见邓小平



报告内容)前是改造问题,后是整顿作风问题。(按:特别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可细看邓小平报告有关内容)小资知识分子40%,剥削家庭的45%,劳动人民家庭的15%。但后者也比较长期脱离劳动,脱离劳动人民,所以也沾染了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也需改造。至于现虽在经济地位上已(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但思想基本仍是资产阶级范畴,也需要改造。当然,整风的目的是时刻不能忘的。

(三)关于学校整风目的要求、大体做法:现南海农村、机关早已开始,卫生系统已开始一部分,老中学也已开始,新中学与小学现才开始。目的是:通过整风,端正教师社会主义方向,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克服领导上三个主义,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团结,孤立右派,加强党在文教系统的领导,扩大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加强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

整风形式是大字报、座谈会,一把火烧敌人(反右),一把火烧自己(三个主义、缺点),反右只是整风中的一个阶段,不能以为整风单是反右问题。

时间步骤如下:中学用半年时间,才可完成。一、大鸣大放,二、反击右派,三、系统整改,四、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小学大约用三个月时间搞完第一、二阶段,今年元旦左右大约可完。分二批进行,将来有可能再去集中鸣放。小学在三月左右才反右,老学校现开展深入鸣放,或可进行专题鸣放形式,要求真正做到鸣深放透,(大多用十多天)约在寒假止,便可搞好第二阶段。

关于鸣放范围事件问题:范围不限,属领导上的三个主义的坏东西均可鸣放。有关生活福利、教学业务、干部提拔调动是否适当问题,也可放。有关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也可放,有关各项改造运动的处理问题,有关教学质量、方针政策问题,无论本人或别人的问题,有所感觉的也可放。当然还有各方面,也可自由去放。鸣放形式主要是大字报,这是非常有效的东西,也可在座谈之后再出大字报。

边整边改:鸣放期间,一定要做到边整边改,能即改则改,能即答则即答。予[预]算开始几天后即找一个专门时间进行,据经验是可以的,主要是领导肯下最大决心,多花一些精神、时间,好好走群众路线,便可解决。采“先拣芝麻后抱西瓜,各债各还”的办法。

设整改组,各级中也可设立整改组,专门研究整改。(但记得必须走群众路线,否则顾不到全面,不能真改,使对全面群众都有益。)

(四)解除同志顾虑,深入投入整改:我认为有1.领导怕引火烧身,将来下不了台,难领导;或安于平定[静]无波,不敢发动群众,害怕群众动起来,对整风认识不足,但这是不可靠的,始终会被揭露,更难搞好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我们不

主张表面的相安无事，这是很不够的。我们主张要真正的团结，今次整风，便是为了大大发扬民主。当然，我们为人民做了很多事情，但也产生一些缺点。这虽小，但也须克服，才能更好领导群众。怕分不清是非，下不了台，这是不必要的。我们要相信群众多数，这样做，威信才增加。不要怕所谓有碍面子问题，这是对整风下决心不大，怕痛，不敢改。但这有利（于）整风呀！其次一些领导怕揭露问题后会被处分，其实今次整风的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严重违法乱纪外，一律没有给予组织上的处分。根据老中学的经验，领导态度明朗的，群众才能充分发动起来，各级领导人也首先向群众表示态度。

教师群众中是怎样？1. 怕当右派、怕受批评。这主要（是）对两类矛盾性质不清楚。不必要的顾虑，右派的性质，与一般人认识不清讲错话的不同。教师大部分是我们人民内部可解决的矛盾问题，即使有一些错，也可通过大家辩论较正确的解决，提高自己的认识，也有好处，必须认为整风是好好提高的机会。2. 患得患失、怕报复，面子难过，少说为佳。其实各级领导也知国法党纪，不会压制，面子难过是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东西。3. 有些人采取业务第一，不管整风，这些人其实这些人不理会为谁服务，如何能搞好教育事业？其实在这一次能否积极整风，便表明是否愿意改造，建设社会主义。

总之，领导要虚心听，耐心听，大胆改，坚决改；群众要大胆放，坚决放，党团员更要带头，这样（才能）搞好县的教育事迹。

### 县委宋绍萍讲话

表示自己的态度。当我们县教师第一批开始整风，希掀起鸣放高潮，这次是很重要的，要必须搞好，为下一（次）阶段工作打好基础。这工作必须大力发动群众，我们领导要好好检查自己的三个主义的沾染情况，好好虚心考虑群众意见，希望各级领导的三个主义，甚至在各方面的表现，也可鸣放。当然，整风要和风细雨，才能情况事实，但必须认识整风重大意义，不须有任何顾虑。我们要暴露缺点，改正错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早日完成，端正我们的社会主义观点、立场，更好为社会主义服务。我要坚决支持大家的整风运动，把整风搞得更好。



## 开始参加整风资料备忘

1958年1月8日

1. 关于南一中有提我是否符合提级问题, 我认为可在教学工作、工作中总结资料去检查(特别在科组总结时, 教导处对教学效果进行检查的结果), 以明真相。不能根据一些人凭感觉个人义气的放, 作事实。资历问题在符合调薪工作的精神实质应如何体会?(是否可有相当××程度的评定?)

总之, 应如何正确、实事求是去处理这一问题。(注意: 我当然不应有抗拒改正, 不敢面对现实, 妨碍整改的态度, 还要多于领导、群众了解才决定如何答复!)

2. 听动员报告后, 特别要注意, 分析问题应心气平和, 以马列主义观点——摒除个人主义的思想立场, 去对待今次的整风, 这更是必要的。

## 大字报稿

1958年1月9日

这样对文教事业领导, 要改!

官窑乡人委最近个把月来, 有几次随时召集教师开会, 有时连会议内容、开会时间也不说明, 且多是即日通知, 甚至即刻通知即刻开会。这些会议计有号召反走私会议, (全体教师参加) 号召美化官窑乡及协助水利积肥工作(全体教师参加, 又在星期六日夜七时至九时半, 这内容已经本校负责人单独去开会时汇报传达过), 又号召协助水利、积肥工作(星期日下午一时通知要全体教师参加, 结果只有刚在校的几个人去)。他们不理会有没有影响教师工作, 这因为是临时通知, 使教师不能把工作预先安排, 以致陷于工作忙乱。而且, 对教师也不够尊重。如在要参加反走私会议之前, 我校因不清楚是否要全体教师出席, 曾打电话去问, (因我们在事前听官窑乡中心小学对我们说可派代表) 后来乡委书记开会时即首先批评说“这个学校是闹独立”, “自高自大”, 使教师很反感。这种种做法, 使教师对乡人委的官僚主义领导不满意, 又损害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对文教事业是有损害的。希望他们今后要改过这种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

## 丧钟敲响了，新的“老中学”——县一中

县一中领导上对认真进行教学领导这一方面，是口号叫得多，实际工作做得少的，这样大大遏止〔制〕教师改进教学的积极性。主要原因：在教学上不以检查贯彻大纲为主，而仅是从一些本科教学的环节，研究一些教学原则，略提（虽然这也重要的）。这样对提高教学便是舍本逐末。教师之间，大家也是这样态度听课，有时人言各殊，谁也不服谁。1956秋季至现在，不知有否改变？

### 教育局能安心下去吗？

官窑中学这学期全校领导只有付〔副〕教导主任一人，正教导主任去学习。原初中班的教导组长又因上级没有命令而心里整天想不搞教学工作、班主任工作。但要办起新中学来，中学各种工作也得搞。

### 县团委对我校团工作为何不重视？

我校是新中（学）之一，也有团支部，可是县团委整个学期来，从未有人到过我校商量工作。我记得一九五四年、五五年时，每学期起码有三四次来学校与搞团工作（的）同志碰头，难道今天的团工作已不需要加强领导了吗？照从前那样去领导工作不好吗？希县团委要答复。

## 整风中间第一阶段的讲话

1958年1月12日

沈良材

整风几天，成绩很大。鸣放大字报数量全县（今朝止）7469张，单小学5474张，共七千多条意条〔见〕。每人写最多的三十多张，但有些一张还没有。鸣放内容一般性三害东西能揭露：如个人作风、生活作风，较大量；对各级领导执行方针政策、业务处理有缺点的也多。还有生活福利，工资，干部提拔，对一些党团员的作风。再次，对各次运动中的存在问题，也有谈，但不够多。大字报形式也多式多样。心里话也渐开始讲，但较少。

存在问题：还未够深入尖锐，许多教师尚未大胆坚决彻底鸣放，有人积极每天放一张，有写些皮毛问题应付。至现在为止，有人松懈。如有人去写生。或出外四



周走，睡觉，自由散漫一些了。

原因：主要在于学校的领导问题。被鸣放一下，觉得矛头对正自己，不如做好一个教师为好。或不够虚心接受同志意见。有些整天跟着老师看他写大字报，或见几条意见，即眉头大皱。个别领导还有搅扰，上茶楼避之提意见。教师方面，还有怕伤情面，怕互相擦，（平时自己缺点多，有顾虑）怕带右派帽子。如九江乡一老师平时意见最多，现在一条也无放。据此，现在更要推动第二高潮，……

首先要求党团员带头把心里话讲出来。全体老师也是，甚至几年前的旧事也可。有人以为可否组织大众发言，我们认为可以。至于整改，这些来先找一般容易解决的先解决。予〔预〕算明天（1月13日）县和乡先整改一批，以文字去答复大家。这次鸣放内容，更希放出心里话，对领导的三害更深刻地揭露吧。

李部长补充：这阶段可多开座谈会，互提意见，谈后出总结，个人还可出，也可大会发言，或分别召开各种座谈会……

### 有关工资、人事、干部使用提拔问题的大会发言

1958年1月13日

一中何华祯：

我觉得到南海几年后对领导对人事问题，处理转业军人问题，当时组织部长说你们无论到那处，薪给起码不能比部队低。但我一到南海县即使我碰钉。一写介绍信便125分，谁知另一同志也当校长却得190分（在佛中）。经林校长反映后才给190分，可见县不按照国务院对安置复员军人的规定。

转业军人黄光绳也要试用期（据国务院规定，无），至1956年还如此，后经争论，才取消〔消〕，补发工资。可见经批才公平。

又：我转业无生产补助金发，只是补半年的工资（？）同是转业，为何有遵守法规，有不遵守？我认为，安置工作，也有问题。如南师何庆进，一字不识，硬要到南师做总务，如何适合？会搞坏工作。

又：培养、使用干部方法，确不对头。一九五五年评薪初级，恐我高过邝浦主任，硬是同级，这是不按实际处理，即是降低我的级了。经争辩，才准我与邝浦同级。对评薪问题（1956年）我认为不合理。吴校长，他又〈有〉这样说：想调我回来搞行政工作，这是否怕我闹意见而调我？！如我不对，应即批评，何苦升我级？（做医院院长、人事秘书。）

又如过组织生活问题，硬放在夏东乡过生活。选支部支委，硬将这区委会的人来参加选举，（恐选到我搞农村工作，有矛盾。）使用干部不适当，本学期我身兼七职，又要常去文教部开会。（不理时间，性质）这样的会议，如何开得好。李部长对我们党员常号召“克服单纯业务观点”，但作为教师，不重视业务，如何有威信！？

我认为1956年评我达到教导主任级，我认为不妥当，且全县校长、教导主任各一律同级同薪，这如何合理。为何各校不发动教师提意见？我不是对邝浦有意见，我是对县领导有意见：他自南师调到南一中几年来，以至今天居然代校长。潘跃光一九五〇年前还是小学教师，但一路来，红运亨通，一直至一九五六年调去华南师院学习。为什么回来后反提为副教导主任。与邝元贞比，邝元贞一路都做教导主任，我认为他在县中学中的教导主任，可认为首屈一指。但现在还竟（将）长期补助也取消。去年，曾想提邝为付校长，但因恐调走，南一中无校教导主任，只调邝浦？！这如何合理！？又如现容羨付校长（的）当时教导主任级，他爱人钟中（文教处付处长）强调提级，（见各老中学的大字报吧！）又调蒲计同志（听说认为八区最好，其实并非）的提升问题，非宗派，则官僚。又如李启登、任学茂的中师毕业所派的工作，李启登被周围踢，便一下小学要当教导主任？强调从未搞过的工作如何可使这些人去搞？还有别的人比他更适合呀！何不提他们呢？任学茂，中师（专）毕业，助建校后，即马上调去作文教委员。（这如何可得！从未搞过的呀！）总之，这怕是官僚。

最近，教育局处理教师个人问题，严重败坏道德问题，为何沈科长、尤达仁不按这些办法处理？！否则人也会仿效！

又如：最近公费医疗问题，不是官僚主义吗？看病先收费（说是防微杜渐），这是不按教师经济情况的消极办法，非改不可！如邝元贞的福利费的处理，使他连续欠债百多元，如何使干部安心工作？！是否，请批评。

#### 霍元超老师发言

我实际上还有（些）心惊胆跳，因为过去曾有人压迫过我，现经领导小组说明“不会有处分”，我现在才大胆讲话。

述对戴老师为何要当付校长：他一参加民盟后，很顾虑。我认为（对老师讲）他一定会升付县长……我觉得一定会这样。总之，必定如此！但我以为，党提拔干部是有问题的。我以为他已做县长，不搞教学专业吧，他也以为也



好。因此，我认为提拔为付〔副〕县长，本够根据。我认为他观点尚未有明确，如何可能？！如□□华侨中学负责人黄××，主办华侨中学的错误（见各中学大字报）。

因此，我认为教育局提拔干部有意见，如容羨、邝浦、潘跃光的提拔问题；我知道他到南一中后游手好闲。潘跃光，我对他略接触，（当时我任南师付〔副〕教导主任，我是坚决不做的，我认为我做□□□□）当时潘知我（！）将升官窑中学教导主任，向我介绍官中情况，说邝克、罗洁芝难搞，其实何苦要你关心？！又听南一中教师石中梁瑞贤返〔反〕映还有八百多万的数，搞未好，倘将来做校长如何得了？我感觉是否文教局负责人对潘有好感，而格外看待！？

霍元超诬蔑，那时我如何识他！！（整理者按：此句系作者侧批）

对梁寄鸥，有人以为我抓住他的辫项？我以为他在南师几年来，培植私人，我常与争论！如郑抒、麦加、麦自强、叶茂良的培养和提拔，一路来都是非按党组织原则去培养。许志此人更是霸道！他常表示可踢走教师，故我心存警惕。他随时抓我痛部。逢开教师大会，必大批教师。许志常讲自己过去如何参加地下斗争，使人听到熟。又说自己的历史、资历、文化水平如何高……对刘江山（？）教师，搞斗争会。陈玉凤、郭世美也因对他不满而被踢走！对我，也大弄手段，假仁假义。

研：霍何时当南师的教导主任，何时邝克、罗洁芝等人到来？文教科有想过调霍到官中吗？在何时想，与他讲的时候相符吗？研：霍为何制做出这些诬蔑！？

组织欢送会送行！（其实我知道他的葫芦的药）又如调动人事，当时南师就不放麦叔、马锡聪、叶茂良去石中？上级调也不服？如何得了？！又：当时专区要抽曾文干支援佛中，也不放走。提拔白：如陈莉认为，我一向未搞过文教工作，从机关一调便任石中总务主任，她自己也认为不满意。又如刘希裕（本是大固乡的小学教师），品质极端恶劣，常要留五、六年级的大女生留堂，摩〔摸〕头控面。又石中在一女教师身上乱搞。后又托大腿升教联主席，又被选为优秀教师，现在上爬到校长席位，……可见文教科的官僚主义。

又佛山市法院院长陈茂运（东北人），文化很低，连信也写不出，如何可掌握法院？他对爱人帮助得很不好！她曾犯贪污罪，被判劳改。陈也使她不去，作风恶劣，他还说等待她觉悟，派过很多地方工作，怕辛苦常使回家，这是什么组织纪律。

又：佛山市里为何使一些受管理过的分子，陈炳礼、郭应通（民革的人）去搞

文化中学，是否负责？

石中谢校长，重大原则均不敢抓。如对一老教师，常不搞本业、不负责任，（余维刚）有流氓手段？但我以为谢怕犯错误，不敢处理他！党性何在！？又如一文学教师（郭汾任）整天用串讲法讲文学。（总说这个人观点极端错误的事例很多……）又污蔑党的领导合作化给毛主席，反说毛主席也与我有联系呀！完！

### 李部长在新中学展开专题鸣放前的讲话

1958年1月14日

1. 新中学这几天的情况（略）。
2. 〈分析〉新中学本质的分析：

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基建工作正忙，对县的意见……本来问题也不能少于旧中学。但新中学当前的问题：对提拔干部，领导工作，不深入，作风问题；方针政策问题较少谈。

关于专题鸣放，可否采下面的：

①工资福利问题。②干部提拔调动问题。③能否根据特长发挥知识分子特长。④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及其他社会政策问题。

这些，都可从几年来的情况去分析，看是否掌握得好，有无存在三害行为，好给我们今后工作改正。

其次，对历次社会运动：土改、思改、三五反、整队、肃反各运动，有否存在意见和问题。新中学中由小学提上来的人员，对小学的问题还提得过少。以及学习苏联贯彻教育政策方面也大可鸣起来。

⑤对党员的意见。

做法：每一天可用一节写大字报，其余的搞座谈会。将一间老中间〔学〕夹杂一间新中学进行座谈，则更有利于鸣放。

时间：约有四、五天，每天鸣放一个专题左右。

### 在南海一中、官中、沥中联合发言会上的讲话

1958年1月14日

一中张思聪：关于调动问题，我与余启通从师院抽调支援中学问题。我认为其



中有对人材〔才〕使用不当的事例，有用非所学之感。余本来学化学，到南一中（初中）要教数学，当时佛中欠生理教师，为何叫我到一中任植物？为何不调一年制毕业的人外出，而将本科毕业生外出！？未够适合！

在南海一中评薪，感未合。我们本科毕业，但石太沅专科一年，谭江沅同志、洪见溥、黄振球的评级有些及我，竟一律7级！？彭美华为何又高一级，科组长是应高一级吗？在师院薪高，到一中初评低，后来才与其他同志一齐。我们问为何不上6级，领导以为影响全校，而总额指标又有限制，而我校领导均有高级，将教师一律过，这不是三大主义吗？评薪后，同志也不降低工作效率，领导也未能帮助教师解决同志问题。南一中的领导把接近他们的人，一手提二级，其他不理（按：指谭江沅？）。我要求对教师应合理使用，使发挥所长。又：当前有些品质败坏的人，要求严肃处理！

一中何文成：关于提升调动的意见。教育局提升我，是拉伕式，不详细说明，一个电话便拉人。我学过地质，但一到南一中即要我教植物，可知我处理的狼狈。可见教育局“拉伕”。

评薪问题：小学教师提上中学的，统分别与老中学教师集会评薪。时间少，互不了解，如何能评得恰当？！我听人说这次评薪不根据德、才、资，只根据底薪高低。结果，如九江中学陈老师的所谓明升暗降。这些矛盾，为何仍不解决？各级行政负责人，分别前来安慰，说有答复，但至现在仍没有答复！？该评薪问题是周到庭领导的，为何他评己偏高？有些学历比他还好，这是“分赃大会”！教育局对小学，只石小重点，不理其他，不好看，始终不使其改好，最坏的人偏派去。

南一中关明逵：对调职评薪的意见。调职本好事，但因领导不好，便变坏事。我本在石门中学，因与吕校长、陈莉主任不睦，便被调职。（其中包括何伯阶被返纳上专区分配，使何伯阶当排球用，谭绍康亦因此被调出，到南师又被转佛中。）如我，因与谭绍康指出吕、陈的缺点，被不满而使调而已。其实石中尚需历史教师，可见非为工作需要。张弢、陈淑平也因此！由此，这些老师思想不安，工作当然不好。

评薪问题：评薪本根据德、才、资，过去曾以为德只〔指〕出身好。今次评薪本是资历、教令〔龄〕、工作量、质，但本校领导未能按此原则解决，事后群众意见多，也不向上级反映。（包括按县的行政领导）但我校是凭少数人在桌子上（不

是深入了解群众工作为基础)去评!评得不好,当然后患无穷。又:评薪为什么县与县有差别,番禺县六级,最普遍,东莞也是(小学提升的也有此级)。南海的水平较他们差么?我认为,根源是三害,如教厅评薪后为何不来县了解。县内搞评薪,先与校长商定,不按国务院精神。宗派主义:教导处职员,为什么一偏高,一偏低?我以为与领导靠近的人便高,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以为,领导会后要加强政治学习,使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现在是不一致)。如:南中的老师有“死老师”“半生死老师”“生老师”(与领导关系、好丑、活跃与否的批评)之叹。我以为我校领导,还有凭印象主义去对教师,对教师以为一差便差,不耐心教育,不主动团结老师,消除教师分裂状态。希领导以班主任爱学生的心情去爱教师。领导不亲近教师,希每学期对教师作当面评定!

### 继续一中、沥中、官中教师联合发言大会内容

1958年1月14日

整风运动

续关明鏊:县、省级领导为何不深入学校,只求看报告,听汇报。(如石中吕校长总结三害即发至各部门)这如何能实事求是处理工作。对评薪问题,我要求今后同一实质则级别不应有偏差(如番禺县的教师)。

官中尹巧婵:党得干部使用与调配不够好。如区文教的非本行出身,罗村的文教为农民出身,现麻中的辅导员过去南师出身,教学还不好,便当区文教!有些最坏的教师,偏放去穷区,罗村、官窑也有,结果没有人理,文教应调大校锻炼[炼]才好。我的工作也被拉伏式拉上官窑,我要求科派回如我差不多一样的人到我原任的小学。结果没有做,使小学大差!我又常被随便抽出县工作少理学校。

有关知识分子政策:(如她第一次大字报的内容:一个复员军人的“惨”遭遇!)整编时,整甩肺病的便算。我不能回香港省亲问题:(小组会讲过的)。区文教助理员,单从学校领导了解教师情况,县也只信任区文教汇报,这太官僚。

团对青年的关心问题:过去我区团支部只关心出身好的人,我的家庭因在香港,认为来历不明(不能了解),不被批准!(当时是现在麻中的×××女同志)我校麦江老师,从顺德琨山至官窑,也遭此待遇。

关于小学整顿的工资改革问题:我认为非常“乌龙”,领导们早已开列名单级别,只叫组长(各校领导)回去说服教师,这合理吗?我们反映,领导也不从。



南一中黄光绳：五五年复元[员]，当时首长说得很好，当时很听从，以为就业问题不会彷徨，我便返广东。我初□□被调回乡，不少人没有知识技能，但得不到安排被转建今介回乡村，当时引起知识分子的军人不满。但我想，不接受，连吃饭成问题。总之，许多人学非所用！说明任何一级领导都不实事求是。历史关系未转来的人，党也不大信任。而我因这问题未转来，被轻视，使难入党。我认为各级党委需要对知识分子猛吹猛播，大大需要，运动过后，则视同敝屣。我校党支部即不如是？！不能□□空调说服，我相信许多同志也有同感吧！我认为：党未能爱已有旧知识分子，只爱未来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对前者，有错则受排斥，不信任。甚至如斯大林的看法一成不变去看！

关于我校工友问题：陈淑平不合工友水平，屡叫换也不换，使工作不好，也不换人？希下(学)期开课前解决。

#### 新中学全体教师大组发言会

盐中周到庭：新中学教师及小学提升为中学教师的人的评薪，教育科完成放手给我与张鹏程等去搞，我们主观订去□□，去原小学去商量一下，便主观地认为某应某级、某应某级，与小学原教导主任带有矛盾，较低，我与沈科长研究，他大发脾气，最后只说最多六人可提多，老中学也一样，又说指标限制，其实老中学有些指标还达不到。沈对我研究问题偏粗暴。

人事问题：听说从老中学抽能力强的老中学老师来，可是老中学校长死手[守]不放。特别批评石中放欧光大过来的弊端！甚至老中学的校长(九中)也在会议上表示不愿调出支援。对人事提升有主观主义。又：和我一齐[起]调入叠片为重点校教师的十余人，现十多人个个提拔当领导。(有些人我认为不满)我对自己坐直升飞机也不满，苏四屏在平地乡提为教导主任，薪水一定要比其他高，各校长也不满。钟兆芳一向工作搞不来，一定要提升(!)这是什么主义？总的来说，提升非常粗糙主观主义，做[造]成教育事业有损失。

西樵中学刘志清：对评薪提拔本校领导工作问题：小学工薪改革，区文教靠中心学校校长，工作搞不好。(如何文成、高安步等人的反映)我们一区小学教师曾因评得低，后来又俱提高一级，(儿戏!)这是不按实际出发！又：小学那时，校长未派青年人，教导用老年人相补，评薪时群众认为教导薪应高过校长，那些人

(掌评薪者)便说人,“校长应高些啊!”

对直升飞机问题:李惠球,挂后[候]补党员资格,初师毕业入南师附小,后来又当财神(管全区校经费),后又做付[副]文教,以组织自居对各教师。后又调出本区,后又去县医院人事室工作。工薪65元,较我们最高级的行政一样,我们教师评生评死不及她,是何道理?沈科长的所谓6个,可以休矣!

又有一年青人×××,在南海乡工作质量极差,郑浩赏识,便提为校长(!)

黄家跃教师认为,教育局将全未教过中学的小学教师,调来中学当教师,如何可以!?!有以为张鹏程入党,当时党支书用儿戏态度说:“这恶仔无甚缺点便算”。你想“儿戏”到极。

又:西樵中学校址前后左右俱无发展余地,为何仍选这里,连球场都不可发展,有何用处!又说戴县长曾亲自来看,竟也如此!以后如何发展?!费款共15000元,仅能建楼上下课室共四个而已!教育局岂不知道?后来局长到,见此也发雷霆,但又有何用处,说明事前他官僚到极才有此恶果!

我们对我校两领导人有如下意见:黄家跃付[副]教导应下放做教师,我也以为我校领导对思想领导不行。怕处理教师矛盾,学校无思想领导,此二人亦可作业务领导,希教育局派一校长来,负责思想领导,我校才可搞好。大家以为两领导狗咬狗骨,关校长对意见只有“唔唔”,不处理如何能领导学校?!说学校期中总结仅听体育教师一节课即下半期结论,如何可以?!关校长对教师信任、利用也不够,接受意见,不作处理,政治学习水平很差!领导听课搬椅不便,即就不听课,可见听课儿戏!听课后书中已有的事情,他以为书中没有!可见听课儿戏。

麻中谭子敏:关于提拔、使用干部问题:提拔干部执行得不当,本区文教员,又兼里水第一小学校长。仅在南师毕业,入了党,后来又入了南海糖厂,当了校长,即抓青年为教导主任。我想,未经风暴,如何可以,以为觉悟高,我不敢恭维。中年老年不乏有才者在,有人以为我们无背景(不红),如何升得起,培养干部要通过考验才可以,否则易变质。

我认为教育局使用干部,硬则“黏”(?)对李彦森叫他教汉语,不识则叫去老中学学一学期。有教师本可回新会[校],但教育局偏不准,又叫我们对老中学的态度,制造矛盾,抽人只要党组织层层下压便可,没此力量,万不可能。

对公费医疗的不合理,我认为最不聪明的公费医疗。(弊处略讲)



盐中谢家彤：评薪、调职问题：我痛恨评薪的黑幕与骗局，所谓德、才、资、教龄、学历、工作质量，完全骗局。小学教师提升的评薪，其实只按小学原薪作底而已。评薪既普遍的不合理，为何不改？但我认为被操纵于三大主义者手上。我被评九级，我认为极不合理。（继引述自己解放后搞官中一路来的工作情况，总之在小学做教导几次坚决不做，几年来我担任工作，未犯过任何错误，工作质量可查。）

对调职：本无意见，（单身汉也）期末在南一中，本已分课，但领导叫我调职，我以为恐不胜新学校要求，后领导认为可以去，且教育局也已决定。后到盐中，担几（何）、代（数）兼科组长。由此可见，我工作胜任吗？但薪级又是否能合理？（按：职高薪低也）可见我的意见合理也！我建议何不〈或〉在中学校教半年才评？或放回在小学校中评完送来！？评薪后，我思想大有问题，对精神威胁极大。

麻中黎恩生：初在张庄中学曾与钟应鸣局长谈到如何医神（经）衰弱，殊不知被梁老寄与教育局提为南师校医。我自以为也与他们所谓只红汞水、APC而已！不要我兼教学，后来学生遇流行性感冒，“官”下来了，花花公子（叶主任）也来了！可见紧张才来，平时不知情，有事才来了解。领导对我的听课也官僚主义。后来调我出校，被调回处以后，才到麻中。

我的来历：本校本厂人员，后动员回乡参加生产，中间也写稿子，后文化局长叫我写自传来，后来我爱人到南师当保育员，广州又开始高级知识分子登记，招聘工业我去学习四个月后才派出工作。我感到服务的机关，层层“官”……（中断算完）。按：这人奇怪！

沂中徐晓峰老师：请问张鹏程校长，向上级取爱人还是取教师？李月婵一九五六年本在石中学习（她现为我爱人了），初，石中语文组长凌风以为留李月婵在石中较好，教育局认为要调去麻中，后来有人使我知，张鹏程□□。这是容羨讲给我听的。但李当时不愿去，但钟应鸣硬认为工作需要，不说是照顾她。到麻中，张竟分她教历史、植物而已。李到麻奢不久，张竟散播空气，谓张云“李月婵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张岂能这样态度！学期末，张又散播：“李的工作能力是否胜任，”又说：“请她放下心，我也据理力争的！”请问这有何根据？这可算是是什么手法？五七年一月，李与我结婚，但张放发集体备课，以后也没有理她了。甚至开始攻击她了，简直人身攻击。又向教育局反映，说她不得胜任了。期末，张曾下鉴定：谓张不能胜任中学教师工作。我认为他不过以为李已结婚而已。

关于我工作调动问题：我问钟应鸣是否威胁我？当时六间任我拣，但我以为沥中教师团结不好，不去大沥。又：以为李月婵要降我，我也有意见反映问题钟局长，他竟以我意见为征求，笑话！又要我去大沥的原因是李均可调去（其他中学无额），否则要降李为职员或小学教师。我以为，这即是要我服服帖帖去大沥，否则便要把李月婵降职或不调去其他中学。（按：即说耍手段也！）

## 讨论

侨：使用有片面观点，我的教导组长之职，只是在大会宣布出来便算，事前也无通知酝酿。我认为在小学当行政，不能担起中学领导，这是填充法，使用干部不适当的。

陈：我以为办新中学确有困难，不比老中学已有规模，我以为应在老中学摸一批，而提拔的新中学教师，应在老中学学习一年，如昨晚讲西樵中学的办学不适当，可知先找一帮老先生帮忙，相信不会这样。

谭：我认为教育局提拔，光从青年党团员着眼。如我区文教对教学领导绝少，如何把工作搞好。教育局也官僚，如官窑的谭民宗初掌握了二区教师命运，调干、评薪与他们有关，使这宗派发展，文教局要负责。

邹：官窑中学与小学分家，（矛）盾文教委要多掌握，问题必少，只使二校长共商，如何解决得了。

谭：谭犯组搜索组去搜官中，如何解释，可知目无法纪。

刘：同意陈意见，六新中学领导未教过中学，也未到中学实习过。如我，也未实习。一派我便是中学教师。我听到有些县组织起一个科的教师，定期研究教学。这岂不是好，好过马上派我去工作。我刚从中师出来，马上教中学是有困难的。还有，培养我们在中学学习，倘中期不胜任，可调我返回小学呀！这对教育工作没有好处。

陈：过去阳春中学助云浮县办新中学，提拔云浮优秀小学教师到阳春一中实习，培养好后，并送四个好的优秀教师也调去，又抽一批新教师入老中学，不断培养出新师资。

邹、潘、徐晓峰出来新中学，也因石中有宗派而已，老中学这样做，使人感到到新中学是受罪的人而已。

郑：我以为，教育局、区文教使质量差的人才去山区，其实这是违反社会主义原则，不重视发挥艰苦劳动，这是罪恶活动，非改不可！



刘：土改前对文教事业不重视，因旧关系而使师资质量太差。土改后显然好了。

陈：还有，过去师院从山区抽些好教师去，这也能启发教师积极性。

尹：教育局以为可欺的随便调他，硬的不敢调，是不是怕犯错误，这做法要不得，可见对文教政策学不深，对南师、石中、南一中的不愿支持新中学迁就极！

谭：教育局平时对教师思想领导不好，一时需要，便调老中学教师去，他思想未通，如何可以，就算肯，也使到新中学后工作情绪未高，影响工作。

麦：我认为教育局对支援问题无底，故老中学死不放，又叫新中学攻击老中学，增加矛盾。其次强怕软欺，归根结底是“无底”，说不服人家，一遇人顶他，做贼心虚，人软，才容易被调而已。顺德县有一区文教派人去，□□该校只是女教师，其实并非，可见其糊涂。例如我来官中，初本征可顺兼体育，同学说我也可，他便因官中叫要体育教师把我调去。后来杨校长也知不可能了。

郑：教育局煽动新中学攻老中学是毫无原则的，说出好笑。可见对知识分子政策，迁就、温情，缺乏教育，对宗派本位的人，显然欢喜它〔他〕。

尹：教育局只听行政片面之词，便调教师，学校行政常去区抢教师，为什么上级不摸底派他去？！

谭：教育局年年发教师人员名册，有没有看，为何成这样？如多看一下表，不可解决了吗？

戴、刘：教育局以上的做法，使教师对它减少了威信，如季庭康到教育局，以为关胜乔是自己的学生，不绥与己谈，要局长才可以！

陈：我在阳春主动参加，学期末宣传部必召我们教师谈话，不给领导去，使大家畅所欲言，如好朋友，大家讲心腹话，还拉近了领导与教师，山区的政治工作还搞得好的。

麦：如领导深入了解，调动工作必搞得好的，如顺德县的整顿小学，绝大部分欢喜。

邹：教育局对新中学有要求、无培养，如我们到南一中实习，彭锋局长猛动员，使我们力学自己所想科，但派李月婵则植（物）、历（史），这是为何！如黄等，初要求与后工作的矛盾。

郑：省教育厅摸初中师资提到各县，未与县联系是否对口径，不理，只平均主义拨去。不照顾学用一致，相当不好。

尹：我认为厅与局无联系而已！

杨：这是恶性大发展的结果，教厅负全责。教育局对执行知识分子的政策是较轻视的，如官窑区每年差不多有很多件搞男女关系，也不好好处理！

潘：教育局对老中学的领导，领导不重视，强调不识，使老中学的领导削弱（□□老中学中的教师矛盾问题）。

陈：广州的学校，应派先进学校专巡回领导教学的行政，这样层层领导好教学。

## 全县新老中学教师对历次运动意见的大会发言

1958年1月15日

南海一中郭世美：整风思改问题，思改通过后，我要负起帮助关明銮老师的任务，秘书认为我不深入，反复要我讲，又威胁说要再浸我，令我一直背新包袱，可知党虽好，但非教育这些干部不可！否则使运动带来缺点。

石中张益中：家庭成分工商业地主，本人成分学生。土改时思想负担很重，我虽在××中学教书，我不满意有人叫——地主仔、学地主仔，心中总不快。一直到(19)56年周总理的报告后，才摆脱这包袱。在思改肃反中的看法，我以为历史简单的人算数，复杂的不算数。我认为调查研究有否改动是必要的，但对历史复杂者不可另有不信任之心，否则令许多人失信心，我认为也要多多尊重这些人，不可使其失去自尊心。

对石中处理何伯阶问题，这人何算资阶知识分子典型，工作不算认真不负责，但停英语一学期后，他被上淑调去四会。我认为领导要如班主任一样对教师，不要如现在那样（一脚踢开），这样做是不好的。

九江中学邝克：有人以为出身地主、资本家便会受苦，其实这因为使用了青年人，搞错了的原故。

我没学历，完全是共产党爱护提携，严格要求我所至。1927年我曾（是）列宁少先队员，失败后到香港搞许多工作。我(19)48年从香港回，直到去年。我做了一个个人总结，可说“不感谢你劳动”！高初中、小学也教过，我高中毕业，教过农校，薪级初给8级，我历级打报告，至南方报，才解决问题给七级。几年来，我曾当官中、九中教师，但都不与这两学校教师□！未与南师、南一中、石中教师□。



思改，年青的秘书领导，故意擦我浸我而已！

潘跃光认为我难搞，他一路把历史交给各校领导，使我一路来成为落后分子。潘以为我毒害人——刘灿森，但他现在当医学院学生，我认为思想改造我得不到改造，之后，我对领导，我是觉他们幼稚而已。以“风与太阳想脱人衣”的故事，说明不使自己靠近党。如果在以前，我便理你，我出洋卖猪仔，不是很容易找二三十万回来！这可见年青干部的错误，我将泪和血吞入肚而已，不计！最使我难堪者为(19)56年肃反，追查我前在香港的一般历史！因这样引起领导怀疑了，曾被谭校长，谭令德，大问一顿，问了点多钟，大家伤气，尝谓人激动易死，你们也易死，何苦这样呢？这是领导幼稚乱搞所致！使人难堪！我认为：人异于一般动物因有理性，我们为理性而生活，如果旧社会、新社会也一样对人，在过去我必去卖猪仔掘金回来何尝不可！如以为给两碗饭我食便算，又何必讲理性？

石中欧杰：思改、肃反问题：在思改中我感觉这运动存在一些缺点，只提供领导参考吧！我带进步包袱去参加，（因抗战中我写漫画反对国民党，在重庆、贵阳非资阶、地主……）我以为我无三敌思想。但我人资阶自利思想很强，小资作风是浓厚的。我对历史是老实的，但组织竟三四次浸我，但只说要我端正学习态度而已，值得吗？重点只说我因一幅画参加“联合国招贴画竞赛”，内容只是鼓吹和平、鄙视战争而已！他们不就画论画来批评，而是批我参加美国华尔街老板的宣传，不看这画，可以吗？浸我一日，于是我只有认，但还以为我学习态度不（正）确。再浸。再浸。我想拾包袱走，我以为恨我自己通过我吧！不理你们！怕你们锁我吗？何科长叫我再招一次便通过啦，明天再一次批检，便真通过了！哈哈！（意外以为儿戏也，奉命通过也讽刺这次思改！）秘书也说我看不起他，大约她讲不过我吧，好处是浸透了我，使我对领导不敢嚣张了，这就是收获。

(19)56年在佛中搞肃反，有老朋友以为我是被审查对象了，（见梁炳剑在石中鸣放的大字报）记当时，胡淳向我讲：上级说我和你过去是一个小集团，是邝介眉叫的，胡淳以为自幼与我同大，无可检举，卖友求荣是不可的。我去问邝介眉，邝以为上级叫吕校长布置的。后来我居然做了县人民代表，其后，我知是宋达庭、陈仲光、邝介眉，由吕校长指使，大约以为我是表过去一贯打击领导，我批评领导的缺点，说为打击？！难道要唯唯诺诺的人，才算靠近领导。(19)54年黄新叶被选为优秀教师，几年是否认为不较近领导，不得！后来说定额关系（一个）故不准了。接受领导工作，领导有缺点，也要提，这才是真是靠近领导！否则不算！我教学生

画手，吕校长前无讲，但后来竟说画手无政治思想意识，又像〔向〕各方面说，务求证明我不对！这就批评，可以吗？1955年文教科谭彪说我教学生画耳朵竟画一年！这不是领导讲的吗？石中制二种总结（像奸商二本账部〔簿〕一样），可见其真实与否！

肃反问题，宋达庭这样做，岂非爪牙！？梁炳剑也说宋达庭串连的。

南一中欧阳棠：我是旧社会知识分子，历史较复杂，解放后党对我的帮助提高是很多的，历次改造思想均有进步，我衷心感谢党的关怀，我认为历次运动中缺点不算完全没有。我的历史（19）46年任过伪龙门县民政科长，在一间中学中霍元昭被污为奸匪，（过去我只识为霍兢池——元昭本名）思改我反映，秘书认为要再检查，硬要我说“愿提霍元昭，抵他死”！才算，不许我说为救朋友而救他，这是勉强的，可知！

石中郭汾任：思改、其他的拉杂谈。江门思改，基本上贯彻了政策，收到了效果，但也有不同程度的偏差。我认为思改的方式方法简单、粗糙化，（岂不是主观主义？）它不理每个人员真实情况，只以为历史复杂便要浸得久，年轻很快便通过，这岂非粗糙、主观。我认为这运动不单当时领导负责，本单位的领导也要负责！这些人“乱估乱猜”（如欧杰），这是平时不了解，焉办得好？可讲各单位负责的不够负责。间接做成的偏差：个别群众品质恶劣、胡言乱语，这便搞成“满天生佛”，但不能无中生有。如我因握笔，如果笔被人以为有政治问题，便做特务抄写工作？！如今次还有人无中生有，我以为这样的人破坏运动！这可使官僚主义的领导无以分别，久弊了，这也是各单位领导人负责。如果平时掌握得清楚，便无问题。我认为当前大字报，也有宗派情绪，我过去素以第三者自居，现知一定要参加大是大非，我希望今后运动越搞越好。

拉杂说问题：知识分子政策本好，但在石中却不好。谢校长未来前，学校情况大差，我入“中间类”，在教学中尚有威信，所以领导不便抛我！其实：我和欧杰同是敢言分子，没维维〔唯唯〕诺诺，我希望领导关心我们，不要把我们抛于墙角。

南一中关明鉴：我把肃反运动一些问题一谈。肃反成绩主要，但□□有些干部有三害思想，教育有缺点。未参加前，我听到是很厉害的。初读文件，以为无



问题，后来又有干部单独与我谈解放前新会一中的迫害进步师生问题，因为我与校长是亲戚……硬要我检查，（思改时也如此）并指出为三青团干部，由小会到中会，类似通法，认好过不认而已，等党宽大，我便这样“一时松”，后来又要串事实，拼凑写成事实，心中实闷，说及家人听，家人也指摘〔责〕我。回家后一路思想斗争，把这些事情一一二二写报告给肃反办公室。后组织再次了解再向我下清楚总结，才算我是人民内部的人。我认为党是不冤枉好人的，右派诬灭〔蔑〕肃反搞糟是错误，只因一些干部有三害思想，从事工作而已！今次整风大有必要，搞好运动，清除思想，为社会主义服务。

### 领导小组召集准备大辩论前的会议

1958年1月16日

形势可转人大辩论，现组织领导做法，需核心组统一：

a. 新老中学划为四片，四个核心组：

一片：一中、大沥、官窑。组长：关则榕；副组长：邝浦、潘跃光；组员：曾雪梅。

二片：石门、西樵、盐步。组长：谢国华；副组长：关统章、卢玉山（到盐中）；组员：谢振中，并石中三组长。

三片：南师、张煜。组长：许克；副组长：陈级培、容羨。

四片：九中、麻中、华侨中学、黄岐。组长：谭元太；副组长：兆安。

以后整风就用这核心组领导，组长召集，分片各校搞各校。

b. 大辩论的目的：这是反右斗争的前哨，主要是分清大是大非，提高群众觉悟，形成反右斗争队伍。通过辩论，孤立了右派，（澄清思想、提高觉悟）□□反右斗争的彻底打垮他们。现只抓紧几个大问题来辩论，如思改到底搞好还是搞坏？党能否领导文教事业。（如所谓下放问题）这也是一个继续鸣放过程，但辩论结果，应是正气压倒邪气，当时中间必有争论。辩论中可能有自己人，也可能有右派。辩论的对象可找一些中间性的人参加。

做法问题：要选择对象和论点，作为分析研究，如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思改无收获……我们针对〈对〉这些论点，所谓事实，准备材料（理论、事实）去批驳他！又说提拔干部只党团员问题（其实我县统计非党员占60%—70%），当然批驳不能空洞无事实，否则不能教育群众。

2. 应在骨干中做到准备工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的），使他们明确思想，准备材料。做法过程是：全部中学集中一个人，叫他提出理论根据来与人辩驳，可能他不肯，但一定要他论证，因为他已在前说过。其次，是小组长小争小辩，把那些错误论点彻底批驳，这当中把大家都提高了。或在本校只举行小争小辩也可，大家研究一下。

具体时间安排：（准备星期六、日放假，小学已经散了，以后一路到底吧！）

先布置骨干（认识辩论目的）。

a. 先在小组中展开一般性小型辩论。

内容：1. 领导下放（外行、内行）。2. 思改、肃反。3. 干部使用政策。

b. 叫建立错误理论的人大会发言（小组讨论）。

c. 大会批驳——小组讨论！

时间：18日小组辩——24日完；19日晚大会辩。

d. 辩论对象：杨振琰、郭汾任、关明鏊。

e. 揭发问题——在反右前，辩论后。

十七日下午收现有大字报。

十六日起转另一专题。

对骨干的培养，首先注意武器，划界线，使大家放下个人顾虑，勇敢投入辩论。

## 大字报稿

1958年1月17日

乡党委要加强对乡村中学的政治思想领导

我们建立农村的中学，它是农村中较重要的宣传、教育阵地。这不仅因为中学生，是农村中政治认识、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它可担负起农村一般人更大的宣传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人材〔才〕。当然，要达成教育这个任务，中学教师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要求乡党委加强以〔一〕下各方面的政治思想工作。

1. 经常对中学教师、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如定期作当前农村形势政治报告，或组织党课团课。2. 研究如何展开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工作。

做好这些工作，是很必要的，因我们的中学多在圩镇，对农村情况了解还不

深，对学生结合实际的思想教育工作，力量是较薄弱的。其次，老师多有提高自己的政治要求，所以这是很不必要的。

### 关于开展大辩论前的骨干（校负责人、组长）会议

1958年1月17日

#### （一）杨振琰的领导下放论（论点节录）

1. 谢校长一套理论，不熟悉业务，要下放。
2. 吕校长讲课当不及教师好，不能示范。
3. 钟处长、余、钟、朱局长及一些文教委员要下放。

俱要体会教师思想感情！

4. 领导虽有阶级斗争经验，无教学工作经验，故应从教师提拔领导干部。
5. 校长职权下放兼班主任担15-18节课，教务由正教导主任□。

6. 现是应从生产领导生产新形势要求，领导下放是下基层做教师，不是去农业社，培养教师的思想感情才能与教师打成一片。领导与教师隔一道墙，教师与教师还亲密（与资阶作风的杨之元教师）。他说在学校中无人情味。几年来教师政治业务水平不断提高，与党的领导分不开，但与石中领导无关。

（二）他的理论实质：要求领导培养教师感情，反对中央的干部下放方针，（只要求下放到本行业，不要参加体力劳动）既要下放了文教领导，应从教师提拔干部，否则是不好使用知识分子。

1. 干部下放论的理论基础、思想基础是什么？

2. 他所谓干部下放性质与我们所理解的“加强领导”方针有无矛盾？所谓体会教师的思想感情，在今天教师的思想感情主要还是什么阶级感情？

### 转入大辩论阶段前的动员报告

1958年1月18日

李部长

大鸣大放以来，大字报共2617张，意见3600条，转入专题后，质量日高。揭露出我们工作在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大可供我们今后工作参考。从揭露问题的深度来说，新中学还是不及老中学的。整改也因时间少而少搞。（予【预】算在第三个



阶段补行整改)这些中学的领导人,大都比较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但也有个别的领导,诸事解释不够虚心。

今天开始,转入大辩论(大争),这是很必须的。这是由于整风目的所决定:达到正确地整改。大鸣大放过程中,各种不同意见很多,但真理只有一个,非争论无以定正确,得出大是大非。如以前杨振琰老师的“学校领导干部下放论”,即有不同见解。又有些老师以为思改、肃反,因有主观主义,收不到效果,又有关于现在提拔了的干部问题,有人确有赞成下放之意。

现要争:①领导干部下放问题。②有关思改、肃反问题。

中央提出的干部下放的精神实质何在?意义作用是什么?抽调一部分领导干部到文教部门的基层单位,教师感情是一个是什么感情?建立于什么基础之上?领导是否一定需有教学经验,才能领导学校?领导下放了,谁来搞领导工作?

属于第二:郭汾任提出的思改偏向,是否历史复杂的人要多浸几天?是否整人食死猫?

辩论做法:全体中学老师集中在大会辩论,也可从小整辩论,首先是小组的小争小辩,以校为单位去辩。

方式是摆事实,讲道理,不加扣帽子,要辩得深透,时间五至六天。

辩论过程是提高思想、改造思想的过程。希认真投身这个阶段中去。

又:整风机构、组织现特明确公布,(有些学校的校长或没参加,而由上级指定另一些担任,这些校长或因一些人对他还存在一定的意见,所以暂不参加,仍应努力支持)这次因是整风,非是搞学校行政领导,岂万不可有其他顾虑。

### 吴灿喜同志在南一中大片上的讲话

争论务求发扬民主,容许不同的见解互争。

1.石中校长不悉业务,不懂搞学生工作,上课也不好,要从新当教师,班主任担十七八节课,还可兼支部书记,没削弱党领导。

2.从文教部以至于文教委员,各级领导干部不懂业务,均应下放当教师,以培养教师感情。

3.新形势、新任务,当前领导如不识业务,应下放去锻炼,但不要到农村劳动,主要是到教师中间去。

4.领导与教师向有一堵墙,格格不入,教师与教师比兄弟还亲密,领导与教师无人情味,到喜马拉雅山也无。几年来,石中有成绩,但成绩的获得与石中的党的

领导无关。

5. 中央的领导干部政策，如何理解？

6. 党派有阶级斗争经验的干部当领导干部，是将原有的领导干部（教师出身的）打落冷宫——不信任小知识分子。

### 官中小组讨论发言摘要

1958年1月18日

郑：有放无争，无补于得出真理？

尹：大放大鸣中各有提出不同的见解，这须要统一正确的意见，才有利于整风、整改、除三害。

刘：鸣出来的东西虽是主观见解，但通过争放，以得出客观一致的结论是必要的。（对杨问题，我目前便有意见）

戴：对杨问题，目前我早日意见，应大辩论，否则无利于整改。

侨：这个问题要争，因平时有一些教师以为领导不识业务，不能领导，所以确要展开争论。

陈：大辩论必要，是辨别是非的最好方法。如下放问题，搞的精神与中央是不合的。

讨论：

1. 下放培养教师感情问题。
2. 领导的业务、教师的业务的认识。
3. 新形势新任务要业务，有强调业务思想。
4. 党与知识分子关系是密切的。
5. 杨的阴暗反党领导。

郑：杨的下放论是否与中央精神一致？我认为基本不同。

戴：要领导一定要做得示范课，只要熟悉党的教育政策事业和要求就是称职。

谭：三害是否完全出自领导？完全下放了干部，是否能摆脱三大主义。他所提与中央不符合？

刘：对下放干部去教师队伍问题，下放干部非是有缺点三大主义下放。又以为不熟悉业务要下放，这与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同一鼻孔出气。有缺点的领导，也可通

过工作锻炼，至于下放学学班主任，又兼党支书，是更〈是〉不可能的。

谭：能领导起推进社会发展，就是内行。

尹：不识业务去领导，当然是有很大损失，但领导教师思想使发挥得多，但并不等于要下放，只要把自己搞得又红又专，他的要求即使无人贯彻方针，对工作有何好处！

正侨：以为有成绩不是石中领导的功，其实便是否愿〔认〕党的领导！

杨：教师感情是与工农感情一样，否认落农村，要下放教师中间，岂非矛盾（意即指落工农中与教师一样，提放到工农中，他是矛盾）。

麦、郑：所谓业务：应有教师的与校长的不同，硬把教师的与校长的业务混作一起，以为校长不能示范一堂课就决定校长不好这是不对的。

刘：在知识分子中来锻炼劳动人民感情，得出的是资阶、小资产阶级感情而已！且学校行政亦有接近教师呀，接近，为着帮助党改造他们。

陈：党对我们没有冷冰冰，常常关怀我们的家庭，出开〔差〕广州也有到我家坐坐！党能推心置腹地和我们谈话。

尹：党很珍惜每个劳动人民的劳动，我觉得，倘自己热爱党的事业时，觉得党很关怀，倘自己不热爱党的工作，才会觉得党冷冰冰。

刘、戴：我们认为教师与行政之间无墙，依我们说我校是没有的，请他说明事实来。

杨：建议将南师处理梅至森问题：钟忠处长随时打电话问题，事实如何？请领导组公布，使教师更进一步了解鸣放的态度与实质。

### 展开继续辩论前的本校骨干会议

1958年1月19日

官中

总结第一次辩论，准备第二次辩论。

杨：指出尹一路来辩论存在右倾，有与政策抵触情绪。正侨、邹俊顾虑尚有，陈尚些不知所谓。认为应注意群众情绪的变化，多做群众中间的个别思想工作。

刘：以为陈多讲歌颂说话，怕讲错。邹俊只提习惯如此，想不出问题来研究。

郑：我们开始时是一边倒，从正侨、巧婵的：“假如有些教导主任听了课些少意见，你定不出时怎办？”可见对此问题还有抵触。



麦：从组内情况来看，一些人是还有顾虑的，所以未敢摆事实，据事实去谈，这或怕带右派帽子，本组要解决这些怕讲错话的问题。

### 在大片传达地委对整风的指示

1958年1月19日

吴灿裕

地委骆书记的指示：运动情况，加强领导，加速进行，当前有些由放转入大辩论。对整风提出四个要求。

1. 鸣放未透，应深入鸣。
2. 辩论要抓好。
3. 反右要积极准备。
4. 结合加速整改以推动反右。

关于两把大问题：不怕先引火烧身，其次消灭敌人。领导不怕引火烧身，做到三狠，狠狠打击敌人，改进工作，改造思想。做法是坚决相信群众大多数，以鸣放反右，领导经常反对右倾思想及温情主义——对有严重问题的人的姑息。

又省委指示：文教界整风较复杂，县委必先抓起来，如未够，春节后还要搞，当前主要做好准备材料工作，要求做到不出问题，宜早不宜迟，全部结束时间不过元月，应组织好骨干学习，提出四个要求：1. 认真改进工作。2. 揪出右派，结合肃清残余反革命分子进行。3. 提高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觉悟，使为社会主义服务。4. 加强党在文教战线的领导，吸收左派参党，必先明确几个思想：整风是提起一切工作的纲，推动一切工作的动力，必须借此推动革命事业跃进。

本县整风时间安排：第三、四阶段在下学期进行，私立民办学校也一样。采取分大片搞，配备骨干，各提前放寒假或推迟上课。

经验问题：准备工作经验，强调要加强学校，核心组织可向群众公开，强调材料准备，队伍要经常排队，一头是明确依靠，心中有数，注意队伍内部变化情况（小组也一样），排队要注意，既不凑数，也不漏掉。

鸣放经验：领导要下决心，敢于引火烧身，党团员左派要带头放，鸣放不应有范围限制，学生也可放、可看大字报，（但不动员，但我们现在没有学生）适当可集中学生开会说明。（？）

整改经验：先易后难，由简到繁，能攻则坚决改，注意走群众路线，属于是大

非问题，经大辩论后才改。辩论（小）可搞三五天，放出来的东西，能改即改——批，免影响反右劲头不足。

辩论经验：辩论是鸣放深入的发展，辩论的问题应是普遍性的原则性的大是大非问题（领导下放、提拔干部、历次运动等问题）。广东历史问题，学校无，可不讨论。

政策问题：先搞反右，后搞肃反。若准备得好，可结合进行，但右派与肃反要分别对待，前者只戴帽子，（班任工作、政治课应调整）后者还要按法律处分。

具体问题：领导力量，县委要下决心抓起来，专职干部要抽3%。运动时间的确定，以能深透为原则，不拘束于时间，不可图快走过场，中学大多数在春节前结束反右，但三月底至四月一定要开课，不影响毕业班的工作，寒假中学生搞劳动（县农民部结合抓）。

材料问题：实事求是，不左不右，右派比例一般县不过10%。中央划右派六条标准，可放在群众中讨论。学校要精简下放指标13%（包括右派数），此是开学后才搞。

保密问题：对右派分子要采取措施，集中（？）解除顾虑，领导讲话，对反常的人要掌握情况，做好思想工作，要注意文娱活动，不可太紧张，对右派要指明前途，春节后召集右派的座谈会。发生事故要马上报告。

本指示可算方针，应常常研究。

汤处长指示：

必须明确：大辩论是深入鸣放，锻炼骨干考察，争取中间，扩大队伍，弄清疑似分子，是反右斗争的前哨战。但大辩论不是反右（因性质是解决内部，或敌我矛盾，俱可的，不同反右）。因此辩论中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进行。其作用还可孤立右派，突出右派分子，使群众心中有数，至这一阶段，就是确定斗争策略。

大辩论有两种做法，一是以具体人人手，一以具体问题入手，各用作用。前则时间断[短]，中间易向左转，但后者则可使充分暴露思想，可考察锻炼队伍。但又不易得出完全正确结论，甚至相持不下，甚至有时可能“西风压倒东风”，所以不易掌握，要注意！总之各有作用、好处。辩论对象可以是中右、疑似分子或右派。形式主要是大会，结合（大会）可出专刊、大字报，形式可多种，辩论必须有领导进行，结果一定要正确的[得]胜。

反右斗争，要求：1. 将右派打垮打光，搞透搞臭，做到狠、准、稳。2. 进（一）步做到团结、改造广大知识分子，提高社会主义觉悟。3. 考察干部与积极分子，为

今后建党建团做好准备。

必须明确的几个指导思想：反右是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考察知识分子能否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克服六个反社会主义的行为，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是阶级斗争。1. 必需[须]加强领导，反对右倾。因思想可指导行动的（如匈牙利事件可说明）。2. 必须相信群众大多数，必须依靠左派，团结中中、中右，孤立右派，给极右分子以坚决打击。3. 坚持讲道理摆事实，充分运用说理斗争。必须做好下列工作：一、必须有较为强的领导。二、有较为壮大的队伍。三、有较为充分的材料，不这样恐搞不透。4. 斗争中注意三个问题。一、反复动员，明确反右意义，端正态度。二、做法（是）先讲明反右意义，使群众投入战争，进一步号召揭发，突出右派分子（做法一由领导点名，群众揭发，或可由群众举名、领导圈名使交代）。三、选择重点，集中骨干，先斗争一两个以形成队伍，再分片分校搞斗争。（一）开展斗争后，领导要组成人员分工深入战地及时发现问题，经常交流经验，必须大力开展宣传斗争声势，扩大影响，鼓舞士气。（二）斗争经过：①进一步揭发右派材料，突出右派，排列斗争次序（先易后难，先明后暗，先攻集团成员，后围剿首脑，倘头子突出，则先攻头子，再攻次要）。②斗争开始，把对象材料下放给战斗小组，或群众讨论根据对象特点，思想情况研究斗争，根据右派言论，分组分工，准备批驳。③斗争时，首先要由右派交代言论及集团，群众进行质问，结合纠正态度，打开缺口，便是乘机进攻他。先弄清事实，要他承认暂不即批驳，但要注意事实的性质，辨别真假。研究避重就轻，先肯定反动的言行。（避免是非参半，迷惑群众）因为有些问题，要具体分析有否付[副]作用，指出他的阴谋手法，注意不可过早追他的最终的目的、动机，避免使揭露不透。④迅速转入放批驳右派论点。先由右派交代论点与事实根据，彻底驳透，不追动机、目的，追组织活动。批透改透后转入戴帽子，这可由群众讨论，（根据毛主席六条）然后由他自戴帽子。个别人肯戴的，由群众给他戴。⑤以后由群众挖根，追历史根源，先由右派检查，再由右派分子自挖。⑥斗后，要他根据这次的情况结论，写书面检讨，不准翻案。⑦每斗垮一个后，进行休顿、总结，注意队伍变化情况，再进行排队。5. （1）要选择他最怕、最痛的问题在先，以先打下威风。（2）出现“顶牛”局面，便要进行停战，分析原因，研究对策。（3）善于组织斗争高潮（善于研究群众情绪）。（4）重要问题，要在适当时机找专人顶证，找人证物证。6. 总结成绩。



## 大片组织骨二会议

1958年1月19日

大辩论：由20—24(日)，各校根据被驳对象“杨振琰的下放论”，由南师、一中、石中组织人搞大会发言。

钻研杨的八论的荒谬。

内部过关者，何华楨（用内部的人辩他），附材料一份。

他是严重个人主义，争做领导，对工资转动的绝对平均主义，以为自己资格老、立场稳，经常以此自夸，发展到一路对社会主义的各项政策不满，合作化，统购统销……

历史：自小是独子，家庭纵容，青年时嗜赌如命，(19)41年卖身为国民党兵，一路来沾染旧军队独坝[霸]为主作风。回来后曾才短期乡下民团，又在广州做过小贩，佛山米机(厂)的工人，后又去当兵。淮海战役被解放过来，继当卫生兵，有些表现工作较积极，提为医佐，以后自高自大，讲怪话，不服从领导，不满领导把他的卫生员调动。……(一九)五一年才参党，一直到(一九)五四年转业到南一中……(事实大家可知)。

(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争党书记不满，(一九)五七年吴校长去学习，当了付[副]书记，表面积极，但渐有非组织活动倾向(如传染黄光绳)。现表面虽知错，但未够决心改。大鸣大放初期间，他努力发动群众收集对吴、县委的意见，强调群众顾虑很大，不敢提意见。

## 继官中骨干会议

1958年1月19日

杨：侨本人考虑深长怕得失，世故深，明哲保身，曾与他谈很多，承认自己温情。

麦：尹那天只讲道理，少摆事实，说明在讨论过程中还有顾虑，本组还有只多讲大道理，少拿事实分析，服人力还未深。虽一边倒，但还觉得牵强，就算正方意见还是分根行，未够深。有时未各方面分析透，而因过早压下大理论，影响她有顾虑，不敢发言，要注意改。

郑：要多方估计那些人的言论的因模糊可诡辩性，否则抓不到那些人的思想本质。

杨：经常在讨论，结束时指出一些存在思想情况，以有利于动员群众，这也是对群众做好思想工作。这是不可少的。

麦：开始讨论时，〈讨论完，〉要摆清本次讨论目的，解深一些不利于讨论的态度想法。讨论完，也指出达到效果，存在问题。特别注意随时解决有些因前有些讲不好（而我们组内又不注意在每次把这些想法的人拖起来，使他不要恐怕以前讲错，扯上身）。要及时注意解这些“围”，使骨干才能逐渐形成（进步的人才能逐渐增加）。还有，有些人又以为大众的运动各阶段又未公布，又因目前李部长曾宣布：“有些领导有些问题存在，故未编入核心”，这也易引起每个人思想顾虑。我提思改对老人不尊敬论，昨天也考虑到怕错误，可见影响，杨也同意此说的客观效果。——倘将心底话暴露时（是有些错误的感想），恐又与被□出来批驳的一样，那时人人必不敢讲话（郑、杨两同志此说，并说出这就对这些人不能帮助。

潘、杨：我们有些急，所以大坚持正面道理，考虑不到产生付〔副〕作用，以后及时做好思想工作。

刘：有些教师一提出一些不正确意见，不好马上驳下去，方法是否应注意这样。

麦：还希讨论之前，估计本组对此问题的思想情况，恰当使用方法，使大家畅所欲言，讨论得才好。

刘：反映戴浩池追问杨为何不能当核心组，刘以上级决定，杨对本（学）期学校工作不够了解为答。

### 1958年1月19日晚，看杨的“八论”

20日，明晨参加辩“八论”的大组发言

1958年1月19日

当前还应细辨问题

1. 杨的全部下放与有些人说，不称职便要下放，这些观点实则有无分歧？
2. 关于下放到教师中，有人以为下放去学习“照顾知识分子的感情”，与杨说相同吗？

3. 关于政治与业务问题：有人以为光有政治不懂业务不深，但倘听了老师的课，些少意见也不能提得出，这算否称职。

4. 有以为杨因无看报所以与中央政策不同，又有以为他动机好，想下放干部锻炼〔炼〕而矣〔已〕。

1958年1月20日

对杨问题的深入讨论

谭：解决三大主义，唯一方法便是下放，光这可解决三害么？没告他思想武装可以吗？且提出下放一定不到农村中，一定要到教师中，这对吗？

何：下放是锻炼〔炼〕群众观点，是可以克服三大主义的。

杨：从下放来说是可克服脱离实际，了解群众情况，便多从实际出发，当然下放到教师中，不到工农中去，这是不能除三大主义的。

郑：杨振琰以为领导虽有阶级斗争经验，但未有教学经验，所以要下放。这还要商计。

尹：我认为，教师群是否专有资产思想，且领导有斗争经验，未必一定可染资产阶级思想呀！

何：我们知道领导本身的业务了，当然教学也要逐渐熟悉起来的。

刘：杨老师他说所有文教队伍也有这样，也要下放，这点要说清楚。

郑：领导如缺乏阶级斗争知识、工人阶级思想，进行思想领导，这是根本不可能办今天的学校，但要求领导如教师一样教学水平去分析教学，这如何可能呢？马克辛能领导银行可说明这。但并不是说行政不需要熟悉教师工作，行政可深入了解教师工作，也无需要下放！

尹：如解放八年来，仍未能熟悉教师，这不能帮助到教师，不能满足教师要求！各方面教学活动，都不能搞的人，我认为需要再教一下书，不称职的人层级下降，体会教师工作是必要的。

谭：我认为，能掌握到教师的思想，未必不通过业务可得，因此，能掌握教师思想情况，推动工作，即可以领导学校。

尹：他有些是有错误的，如编教科书者，编得不好，也要下放，这是不可能的。

刘：若照他意，没有那一个干部不需下放。这如何得了？

谭：职权下放，没有削弱党的领导，对吗？



陈：杨从旧观点看事物，如旧社会专看履历一样，他以为所谓不熟悉（我认为他仅是个人乙〔意〕见而已）便要下放！又以为不懂教学（但我以为校长有些要抓政治思想的），又以为仅有不好（如钟忠事）便要下放！这是旧观点，一脚踢，但我们的工作是要不断改进呀，并不是要一脚踢去呀。我所知，下放的人不是有错误的！

戴：倘不称职的人，是应降职，不是下放！又如南师李慧球刚毕业不久，即当文教委员，难道是可以的么？！

尹：光抓政治业务学习，（稍）微关怀一下教师生活，又不解决实际问题，这确须降职！所谓不称职，如南师初毕业便当区文教，或错误提作校长。

麦：应将不称职与下放的性质要分开，不能混淆。

郑：我认为如教师的总务主任（一字不识）应需调到适当工作岗位，但不等于下放。

尹：照杨意一反来研，假如把一个好的班主任调上做领导，是更不好，强调依苏联的要求，是不符合目前中国的实际的。

杨：不称职的人下放，是合中央下放的要求的。我以为南师的杜主任（总务）。

郑、麦、杨：南师的杜主任是不称职，应调职。

众：他认为自己的意见与中央符合，他不是没看报，而是他……总来讲：1. 歪曲中央下放精神。下放目的，教育领导，不熟悉工作不是要下放，而是应深入而已（如他提出的工厂厂长、党委学入车间），但层层错误，由此而生。2. 把不称职与下放混为一谈。3. 他的歪曲论据倘成为事实，效果……乱抛学校领导，制作学校混乱，想学校脱离党领导而已。倘照他意，客观效果坏，问动机如何？待查。

### 对“杨振琰的下放论”的大会辩论

1958年1月20日

首由杨振琰发言（摆己论点，讲我当前的认识）。

我认为我的公式是“下放——领导——再下放——再领导，才可避免产生三大主义”。我对中央下放干部精神理解得肤浅，便一口咬实与中央精神符合。我见领导干部，少能与老师成为亲切朋友，下校只接近领导，无教师的思想感情（我所指的是教师的工作、生活的感情，不是什么哪个阶级的感情），我思想上认为绝大多数文教领导同志都要下放。我又以为轮流下放，不是轮流执政，我以为下放基层体

验一下生活，未尝不好？

我的下放论是根据目前的形势要求的。过去革命斗争，领导（党团员积极带头）了中国人民革命，今天更应深入基层，以得到更好领导。我看了大字报后，听了大家的意思。

我没有认真体会中央干部下放的精神实质，强调相符，其实是脱离了阶级立场去理解的。这是自己一向轻视出身（工商业）问题，以为自己解放后才读大学，没有资阶东西，时常听报告听到“资阶知识分子”这个词，心里不服气，其实无体会到过去多受资阶教育。我认为我大部分论点是站住脚，但我认为“下放——领导——再下放——再领导”还是正确的。下放到基层锻炼〔炼〕后再上来领导，这还是好的，可提供给党参考。

但我又认为，照我所讲的下放，确实多少有削弱党的领导。我以为所谓培养教师感情，是指领导能与教师生活思想沟通而已！我的论点仅作对党一点建议而已！这问题我以为我思想不解放，多写大字报，多错，不如少写还好，提出给人讨论，被人抓痛？——但我认为这应克服，不应有个人利益斤斤计较，怕戴右派分子（帽子）。我自信自己一向可无右派倾向，不应怕，自己有问题，摆出来，可教自己教群众，有何不好！我或又以通通认错，免做极右分子，现也认为不对，只是为己。我认为整风以来，一贯忠心助党整风，我希我的八论，算有多少给党参考的，也算对自己负责，也对党负责。要下基层，要关怀老师，这是应坚持的，因为可供领导参考，引火烧身，我是高兴的，愉快的，大家深入讨论，互相都有帮助呵！

一中林庭远发言：根据他的八论及今天发言，虽认自己的论点有些暂〔站〕不住脚，他以为自己动机好，助党整风，但我认为他的“下放论”，与中央干部下放政策相反的，荒谬的，不值得参考的，应批判、驳斥吧。

原因可见：中央的政策目的：①精简机构，加强下层机构，特别农业文教部门的领导。②锻炼干部，成为经得起风浪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当然也包括可克服三大主义）中央指出，大部分到农业劳动，少数加强基层领导，这次县党代会决定下放干部 1/3，大都到农业生产上去，今后提拔，都在劳动中经得起考验的优秀人物。我们的知识分子，今天基本仍是资阶世界观、立场，因此应下放培养工农的阶级感情。我以杨的论点看是否与中央的相符？他不仅说业务不熟要下放，他还提出，有三害的人要全部下放。（他主要精神在此，并非只说不识业务要下放）对教育部编历史不好（其实历史教学已有说明改好的经过，基本算好，也经实验，才

决定)。认为要下放,是何论据。他又说:“党在今天已走在群众后头,非下放不可”。可见他的精(神)却是取消党在教育在全国领导,反对思想改造而已!又:他反对下放到农业生产去锻炼[炼],是违反中央精神,他实质是“下台论”,说党跟不上群众的要求,要下放,其实是下台而已。其实是反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如反对干部到农业劳动中去锻炼[炼]。这不是反对知识分子改造吗?这论点与右派分子的言论一样,而更加完整、巧妙。(如教授绍权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三害由于无阶专政所生)他以为要根除三害便要将领导下放,这其实是取消[消]党领导。(因为党下放了,叫谁领导?岂不是叫那所谓人“熟悉业务”的当领导?!)

我觉得他是利用中央的招牌,达用反党领导,反思想改造的目的。

南师马锡聪:杨的下放论与中央的下放政策根本相违,且又否定解放后八年来的成绩。(领导不能胜任领导职)所谓领导不能上好一堂课,其实应知领导职责,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于校,主要不是在课堂上上好一堂课。但并非非优秀教师不能当校长了。文教委员有些也能对教学有好经验,而文教委员职责是具体贯彻执行党的文教政策,主要是领导思想。不上得示范课,不能担课的,未必不能当校长!校长应是政治成熟,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政治领导者。而他实质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否定八年来党领导的文教事业无成绩(因为认为当前许多领导不能领导,要下放!)。八年来是否无成绩,看南师吧!(一九)五一年学生仅有6人团员,(19)56年有406个;学生知识质量优良者,(19)52年65个,(19)54年184个,(19)55年316个;毕业生共1442个,分配〈个〉几个专区,对国家负[付]出很大贡献!老师的生活思想觉悟,也是天天提高。他的主要动机还是取消[消]党的领导而已。

石中许重璋(东江普通话):阐明校长的职责、工作性质,指出杨的班工作搞不好的原因是,无明确思想指导工作。主要指出杨的思想对当前教育政策的抗拒,所以不能把政策贯彻下去,教育本班的学生。我校领导是经常关心教师的工作,提出意见,深入教师、学生的工作中,去了解、分析、指示,难道这是没有帮助老师吗?又搞同学下乡劳动,得到农民异常亲切的关怀,互相结识了朋友。可见是解决政治思想的重要,问题是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杨所谓谢校长主观,他的指示难被贯彻下去,我校学生的事实,更驳斥他的谰言。



大沥邝浦：我只谈有无培养教师思想感情问题，其实他所讲的教师思想感情，其实非工农群众的，（而是）小资、资阶思想感情吧〔罢〕了！几年的教师生活中，我了解所谓教师的思想感情，如所谓“直升飞机论”，其实这是妒忌人家提升，要提升自己吗？自己扭扭摇摇不愿努力去搞，工资提升，人人有意见，不与他谈，又说不关心，与他谈时，又以为多事，诸多猜忌，不听课又说不听课，听课又说捉鸡脚，学习时自由散漫。……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教师思想感情。也许杨以为这不是，我以为拿他本人作为教师的思想感情去看吧！他以为不要下放到生产社，是看不起劳动人民，为什么对这样下放，竟以为万万不可！又看他，要求各级领导下放，这其实即说要自己那样的人上台。又看他大字报的与李部长谈话，故意不讲名〔明〕给李听，又说自己的班，难贯彻谢校长的意图，他自己整天计划运用生活费去搞恋爱。总之他这样算是什么的思想感情？他的论点，实则是取消党在学校的领导，把学校办成资阶的学校，要领导改为资阶、小资思想而已！

石中张炳垣：我认为他的建议实则取消党的领导，与我们积极向党建议有根本的不同。他把领导说成无能，三大主义是否如此？前揭他：根本不敢接触学生的思想实际，只讲讲话，而问题仍多，特别学校搞大辩论，他更是反对。大辩论更是有步骤有计划的，并非领导主观主义贯彻下去。其实领导的感情，首先在于在政治思想上带领教师进步，并不首先在于上课很好。

官中麦江：根据他大字报的反映的论点，归纳三大条，予以驳斥。关于下放李部长，教育部长的下放根据，关于所谓校长不熟悉“业务”的问题，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业务”的性质不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论可休矣。关于教师的思想感情，可见周总理对知识分子情况的分析。可见去培养教师感情，等于培养资队、小资感情。其中亦即说出教师思想不须改造了（党的领导也要来培养这些感情呀！）。

南师（女）钰颜：我现在严重驳斥所谓培养教师的思想感情。这些感情是否值得工人阶级的领导去学习、培养？因为绝大多数人还后于中间状态（看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时，多少人共鸣、同情，甚至堕落），知识分子的思想还非常差，有待于改造。杨振琰以为领导缺乏教师感情，不与教师同甘苦，所发指示，不为教师接受，其实正是非工人阶级思想，对工人阶级干部的抵触而已！如照他讲去做，培养了教师感情，三大主义更是严重了，学校的方向再不是社会主义方向了。杨老师正是以

资阶知识分子世界观去改造今天的社会。关于所谓人情味问题，倘站不同的立场观点，便有不同的感情，并不是如杨老师的“拍拍肩膀、一齐〔起〕吃狗肉”的希望，对资阶、小资的立场看，甚至是冬季晚落的太阳。而教育局三个局长，虽有慢性病，仍艰苦地工作，这不是热爱人民的感情吗？总之来说，他实则认为教师不需改造，工人阶级干部要学资阶思想的问题，要党下台不领导学校工作问题。

一中潭江沅：我谈所谓“不懂业务不能进行学校领导问题”，从职责来认识校长的任务，是不能与杨所想的一样的人。关于新形势下业务是不是第一的问题，我们以为，知识的宝贵与否，首先看那运用知识的人，站什么阶级立场来运用他的知识。

驳：下放——领导——再下放——再领导，其实是反党的。①即整天是会染三害，所以才不断要下放。②以为领导要与群众在一起时一定有矛盾，有矛盾就是下放。领导与人民的矛盾始终存在，即认为党对人民领导，始终有矛盾。

### 小学部大字报反映

#### (1) 要正规厕所。

大意，小学厕已够五百人，中学为何要正规，新建多花了四百元，将旧厕修理岂不好！？提者官窑乡耳听口闻。

#### (2) 向印表格者进一言。

印表格大过点名部〔簿〕，增加老师麻烦。

备课部〔簿〕的印制，又花时间，有些老师未能满意，用钱一样，老师写更好的纸章〔张〕不好吗？W.H.S.

#### (3) 南一中宣，问话重提

潘跃光，相当大学肄业，有问题。

在中学教专业时间，不比一般教师长，也没有独特成绩，从语文科中如何测出他是大学肄业程度呢？可能因他做了多年总务，不得不“相惠”而已，抬举吧〔罢〕了，要不然本科毕业及大学毕业教中学十多年的人都还是七级呢！希有关方面检查并解释。

为何曾在一九五六年夏全校各组选出优秀教师时曾提我和邗炘国较接近条件？可问教导！

(4) 官窑中学：遇上现在的小学，地方文多，可供发展(?)因原曰小学课室已够用。“官窑乡耳听口闻”

(5) 深恐今期的辅导员会成为昙花一现，希学校当局注意。(邹俊)

(6) 局拨专款 2400 元，后来又拨 600 元(?)无布置讨论，只单独通知教师估计本科的予[预]算，结果余下的钱(按：应是有些科本身购不完所剩的钱)，调去购置体育用具或别种教具，不满足各科的要求，这样处理数目，不是群众路线。W.H.S.1958 年 1 月 9 日

教导组长这样“信任”教师，是否工作深入?

负责学生课外小组，很少了解组的工作，中间又叫老师做一次总结，问他情况，只能是“这个”或“可能”，对值日教师的工作也不督促，编时间表编得不好，使教师时间不好用。W.H.S, 1958 年 1 月 9 日

(7) 到哪里去备课呢?

课桌晒，不能备课。总务说不办也可以的。(按：当时她也曾向我说搬桌子也可，我自己也可以了)结果不办，放在下学期才办，老师以为，“我有交房租”，为何晒得我要命，是否关心教师的工作? W.H.S。(又：另两人接连批驳其二张，评价不主张□□) 1958 年 1 月 9 日

(8) 潘主任的工作领导。(桂)

内容：光反映教师对总务的意见给总务，不算是都[都是]好同志，团结教师，如果你认为确如实际，则请以领导人的态度向我提，不是更好?(按：当时我未明真相，提出问题，作为研究是否事实，要否改进而已，光是反映给她，不与她共商解决方法) 1958 年 1 月 9 日

(9) 南一中放鸣室，看唔过眼提，1958 年 1 月 9 日

潘提官中教导主任令人骇异，旧官中并入石中时账目不清，调到南一中搞建校时，也账目不清。这人可当教导主任，真奇哉怪也。请教局审查潘的情况。

(10) 凭什么条件去培养高中教师。(呆人、呆德共鸣)

应选送一个有一定政治业务修养的人去学习才符合祖国要求，学校偏马马虎虎送潘跃光去学习。据了解潘的政治业务水平值得考虑的，他的质量虽不算最坏，却不见得是好。教好初中文学也不容易，学校凭什么条件选送他为高中教师?真令人费解。1958 年 1 月 9 日，南一中宣。

(11) 新中学宣放鸣，减轻学生过去负担的成绩，飞侨，1958 年 1 月 9 日

官中室外校外，垃圾多，几乎门口也被掩，这是生物辅导老师坚持“减轻学生



过重负担的结果”。潘主任开会或说话，开口就是全面发展原则，闭口就是全面观点，难道清洁卫生不属于全面发展的范畴吗？

(12) 我学校体操凳多（老中学也没这么多），有一张长期躺在外面，风吹日晒，严重浪费，学校领导如何感觉？（正侨）1958年1月9日

(13) W.H.S 提小学提升为中学老师的人，要等到工资改革才评，这是否长期试[适]用？1958年1月9日

(14) 官中老刘提单杠下放地毯，下雨淋也不管。1958年1月9日  
（整理者按：原文即无第15条）

(16) 浪费、安存、安放。

双□在木器社久不取，机器员在场地长期安装不好，体育教师、领导作何感想。（俊）1958年1月9日

(17) 潘主任你认为我们的教学搞得好吗？W.H.S.1958年1月9日

认为学校教学搞不好的原因，在于：（领导不知）学生的学习质量如何，没检查学生作业，没从中发现问题，帮老师解决。你听课有没有订详细计划？为什么喜随时通知随时到？每一时期应以什么为重点来教学生，你有没有做？学期初全体教师学过学生守则，情况如何？为何不提出？学校学生当前存在问题，老师的教学问题，你没有注意到？（按：知）后期组织老师互相听课，为何不让组织老师一齐[起]组议该老师的公开课？使一些老师在上课前几分钟看课本去听课，能否解决教课老师的问题，和提高听课老师的教学水平，及提高教学的道路？（按：有可能）

(18) 助学金≠购置费，（正侨），1958年1月9日

官窑地瘠多灾害，人民生活提高比其他区慢，年终清收各费，还有人在班主任前哭泣（这些同学都是申请助金，及免费未获批准），现尚有一些学生不能清缴学费及膳费，但学校此时正移近二百元去购置图书，我要问为什么不把此款补助贫苦的学生解决困难，这是什么观点，什么主义？

(19) 郑胜根提教导组长“失己责，负众望”，是行政的左臂，学期初已分配他搞“学生课外小组活动”，协助生活辅导工作，自然科教研组……可是期末还坦然自述，“我本来就没有予[预]算搞这么全面性的领导工作”，难怪他整（学）期只注意本科教学。

(20) 戴又提，县人委传达□□医疗的新措施不当的意见。

(21) 郑胜根提，南师毕业生质量，南师体育室〈的〉建得小，无计划。

(22) 戴、刘提，老师提议做地垫架，可是至今未用，怪事。

(23) 官中老师真够忙，晚十二点不在讲，要知其由，请问潘跃光。(附教师工作图一)未署名(尹?)

(24) 官窑乡等放鸣室有：

“和中学的班主任商量”，内容以为中学常要了解小学毕业生思想、经济情况，常发表到小学希助调查，使人费时很多，协助须需要，但如中学班主任亲自出马了解更好！

(25) 勿以为小事，今古喜欢，(官中说) 邝？

陈邹的小屋矮、湿，影响生活，要求筑渠(九月曾提)，再不理叫你官僚主义。地方涝湿，落雨浸到房，屋无琉璃又烂。

(26) 主任潘跃光，我有没有吗[骂]错？(桂)

内容大意：工作怕负责，把话来推搪，说话不认账，又说自己先看见，虽有小错失，老实认便无错，为什么偷偷把(按：?)发票放在我抽屉……我向你有没有提错！按：由此可见，我不批她粗枝大叶，她反咬我一口，其心可见！(因无事实证明)

(27) 工友忙里奔命(漫画)，W.H.S. 桂提。

郑老师恣意使工友狂奔买东西，潘主任反以为锻炼[炼]干部。

(28) 我是高人一等。(漫画)

潘主任不愿急忙帮陈老师拿仪器箱，反叫谭转拿给陈，是以为自己为主任自高身价。桂，W.H.S.

(29) 开会开到鬓长，麦江

主观将老中学经验搬来，强要政治学习十节，初只抓读文件，无具体布置，要求不深刻、具体，一星期担四节课，二年级汉语从未听过一堂。掌握班情况靠会议，一开开到三点半钟之后。

(30) 破折号两种不同意义，语文老师

潘跃光打理官中师生伙食——错数。

今并石中公物交接——求其十数

调到一中——又错数

公开教学——胎死半途

评薪——最高(教师中最高之一)

原因——相当大学程度

师院学习——提高

荣升教导主任——再提高。

(31) 以下小学平庸

1. 官中老师讲究生活舒适，浪费修建费，要每人有一房，有些条件较差，又没有□再问。（按：享乐宜乎？）

2. 希官窑中学种下竹树，要一条来用也不肯。

3. 官中教师人少宿舍□（指三楼、二楼、尹巧婵房……）但学生除架床外只有一条小路？

(32) 官窑区小学放鸣室

题：碌碌无能潘光烧（干戈）

学校头，无主张

老师这，你就这

老师那，你就那

没批评，有迁就

你□□，工友捧

学生住，沙□□

老师住，大夹光

学校乱，你不管

注：潘跃光原自己有一间房，他不要，要工友住的房，至令这天工友将房让出住一天，增加工友工作忙。

(33) 究竟怎么一回事，南一中室（路透社鸣）

潘搞南一中会计产几百元？据初说有记账？使人难以寻味，然在这次整风中讲清楚。

(34) 潘跃光对唐诗之运用，南一中室

举头望明月（思教师）

低头思故乡（思上级）

(35) 戴刘鸣我开会多拉长时间，送表一个，检查时间，今后要切改。

(36) 桂鸣我多坐房中，少理团队问题，为何与压根不关心。

(37) 桂雄鸣我与正侨两人不拍挡[档]，思想不见面，不够真心把学校工作干。

(38) W.H.S. 漫画鸣我整天写各方面的工作计划、布置，少接近师生。我不接



近教师（画是写一张长通知，全围自己本身）。

（39）（尹）漫画鸣学生冲凉室不设门，使冲凉要在看守，要用毛巾遮。

（40）正侨鸣“是谁官僚”，鸣教育局为何还设教导组长？

（41）潘跃光是否想人死？（麦江）

工作到深夜——应该

文体活动不应开，病魔常到教师身上来，体育教师也不例外，两次三番向领导提意见——不理。问问潘跃光，是否想人死？

（42）桂雄又鸣，浴室不装房门，致使如〈如〉尹漫画那样，说我拖拉。

另戴、邹二人各一张，鸣团支部工作不展开，邹还鸣团员质量日降。

又：郑胜根也大鸣质量差，兼揭出上级团委表扬支委老刘，行政老练，教工支部，不够负责，自己又因过去南师培养成“姑息养奸”，应责任其负，整风之际应彻改。

（43）陈仲廉用花词大鸣……刘大量揭发郑胜根的目无王法，他对教学、团工作、生活工作的放任，怪不得他肥了十多斤。

（44）这样鸣科组（侨记）

大意：社会科组，自然科组，各科并作一组——主观、草莽，使业务研究为门外汉，组员冷淡，组长难当，若政治学习成为一组更妥当。1958年1月11日

（45）登高比赛（漫画诗），南一中（难讲题）

你坐的是“名牌”飞机，烧的是好燃料，而我们只靠自己劳力，当然不够你快啊！

漫画乘“相当大学肄业牌飞机”，一路由八级坡——教导主任——代校长。

（46）领导为什么选送潘跃光去进修（南一中）

估计代答曰：因评薪时现赐相当大学毕业，后数经公开办学的“成功”，学了堵塞舆论，不枉上级培养后起之秀的苦心，只好让他去，“专一专”、“烘一烘”以符合形势需要，走上高中教坛。

（47）潘跃光为何会升级，（南一中参考资料部长）

潘评为六级，实则是升了级，试问领导根据什么条件来评？是根据“德、才”。所谓德，对领导服从性好，多向上级笑，少将上级的军（政治可靠）；所谓才，样样都能，善于搞好业务财政，多关心教师生活，体、唱、语文，无不精通，而且相当大学肄业程度，还有天才的“领导组织天才”。

（48）请问教育局提拔干部根据什么条件？（问人提）

潘从官中、石中至南一中，均有糊涂账，潘的能力，公开教学亦胎死腹中，工作量、质都不比一般老师突出，出身不过小学毕业而已。不过潘处世哲学，对上级唯唯诺诺，善得领导欢心，其提升理可当然了，但在教师中工作能力和文化上比她高的大不乏人，难道教育局没有调查了解研究？或首先他[她]优点局外人未知？请教育局负责同志把提拔干部条件公开，务复。“食饭大”代抄。

(49) 业务学习，日记数则，郑胜根鸣

学习三级分，大争一番，无结果散档。

读□大×却××先进经验，读得头来忘了尾，失望。

(50) 漫画，张冠李戴，发失品，女生尽同名，使同学大笑，主任懵然。1958年1月11日，老刘提。

(51) 地垫的对话，旧地垫遭不爱惜，新地垫尚懵然。W.H.S.

(52) 南一中室，赛跑（漫画）（部分老师集体创作）1958年1月12日

把邝浦、潘跃光二人的学历、资历作跑道的高栏，二人短跑，潘至(19)57年，紧跟邝后，有写说明：他们可能跑至“宇宙教育局长”地位。

(53) 官中听课不够重视，陈仲廉

全(学)期不及听十节，有时过几天才□□，事情过去改过工作，一无所得，学生质量如何还不知。听课时还要问老师讲到第几课，进度计划不关心吗？

(54) 一道证明题，从潘听世界地理、自然地理、物理课(后二科未有听过)，可知他对教学等于□□□□。

(55) 骂潘跃光压人，郑胜根

劝我不要印发总时间表事，我却答：老中学都这样办。(按：态度不好！要改！)

(56) 一闻楼梯响，走□□□□，麦江

内容：潘谈琐事(学生把篮球藏起来不对)，也跟我谈上近一点钟，指出我必前因后果，层层分析，讲到今后方向等。

(57) 潘主任为何说了不做。刘

美化工作，半学期才开始，后来又叫生活、美术实习老师赵委元去搞，但今天我美化仍未有搞过。(按：有，粉墙，但未完全□□)

(58) 官僚主义又不承认错误，郑

有了(按?)学生手册之后，还印发请假单给老师，老师指出你又说未印手册，狡辩!

(59) 五鸣潘主任，W.H.S

1. 行政决定取消午睡，值日教师也不通知。且老师不同意（按：后同意）。
2. 安全教育不重视。
3. 女生卫生课不重视上。
4. 对落后现象不斗争，郑胜根生活用具散漫，一学期改得多少。
5. 对老师教学计划缺乏检查。

(60) 旧账，石中室，梁瑞贤

官中合并往石中，潘主任把存余经费 10,600,000 元存入石中，9 月份取回 1,800,000 元，剩下 8,000,000 多元，一向作暂停款处理，多次问他处理，他说要与教科对数方知，恐因有他私有款在内……但为什么今天（53 - 58）仍未搞妥，你居心何在，你的责任心何在？！

(61) 吹到胀，一中室，1958 年 1 月 13 日

潘跃光，潘跃光，做事不大方，像个小足姑娘怕出房，谨小慎微心慌慌，做组长事事求推搪，谈□百科全书样样讲，真博学够堂堂，想！想！想！音乐专家个头长。

喜样送去学习门面光，油漆过后人人赏，内心英雄不改似何样，如若不改一定被人吹到账！

(62) 综了解，教育局对干部调动是无从细致考虑和深入了解，靠会报去提拔干部，如邝浦、潘跃光等人，对新中学长远事业不作慎重考虑。

(63) 蚁振让要负责，石中方山提

蚁去学习，其他由潘处理，但总务账目糊涂，遇事拖拉，学生的车费，至数年不清，潘本不学无术，教图画从未在黑板或画纸绘画作学生临摹，亦是随便叫学生写生，教语文，作文从未作只字批改，可见对工作教学不负责任。(19)53 年蚁仍未予纠正或作处理，还令继续工作。官中与石中合并的数目问题（按：如梁瑞贤大字报所揭），潘的错误因应本人负责，但蚁用人不当，亦难逃其咎。1958 年 1 月 13 日

(64) 穷人见旧账，陈淑平

潘初到一中时，在我家搭食，一至【直】期末给钱，共计 2.10 元，请交还！（有谭家辉为证）

(65) 从派潘往师院进修说明学校行政的三个主义。

潘实中语文教学质量差，（开始公开课胎死腹中）为什么还选送他去进修，一中无别人可选去吗？潘的文化水平如何？在师院能否完成学习任务？学成后不做高



中教师，去做行政领导，原因是什么？南一中“轰”提。

(66) 无独有偶(南一中漫画)

石中的万能花旦陈莉，南一中的万科老官潘跃光相比。1958年1月15日分：上音乐科像我骂的声音，公开课胎死腹中。语音课把□写成□，图画课整个学期画香蕉(手指)和鸭蛋(眼也)。又：把钞票一帙帙[叠叠]纸帮作(人形分写)南一中款，应陈淑平伙食款，石中款、官中款，由潘跃光指着它们，叫它们入自己的口袋(!?)附字：“说明领导用人不当，官僚主义！”

(67) 潘跃光如此领导，石中，方山，1958年1月15日

方谓我代教导主任时，把他降职为职员兼教语文，薪水少了(?)是因刘兆福来不好分课，乃临时改变主意，把我作名职员兼教师，即对人说“学生对分的教学极大意见，故这样处理”，试向你的教学没问题吗？图画、音乐、语文、总务，(俱如前述)对老师又能团结，不能作业务帮助，以此论，你那能当中学教师？更那配当领导！恐怕作小学教师还有问题？

官中整改问题。

大字报共97张，意见120条，以领导作风为主，团有三四张。

可分为点，16点：1.领导把教师意见照搬给人，不分析说明问题。

(68) 有关提升问题，石中(人中)，1958年1月15日

潘从(一九)五〇年(应是1951年)由小学教师提为中学总务主任、教导主任，说明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可是8年来，他的政治水平不高，业务水平不高，品德也不大好。(见诸大字报)我认为领导以为他在中学多年，以为可当领导而已，如果真不能，请他做回一、二年班主任，再调回做领导，这对搞好文教事业有利。

### 开展大辩论的被辩论资料(摘录)

杨振琰“领导下放可以根除三大主义”(1放——8论)

(第一论)第一段中：领导害了三大主义，主观想纠正，但也很难克服，其中原因是领导缺乏下面的工作体会和锻炼(按：下放当教师也)。

第四段中：老谢对班主任工作，体会不深，学生思想活动和具体情况不太清楚，只靠班主任会[汇]报和学生干部的反映，从这些情况所发出的指示和原则，必然很多时不合实际，难于贯彻……(又一句)领导应改[该]是一位优秀教师班主任才对。(按：这句话应如何理解才算恰当?)

（又一段）谢听课之后，什么意见也不够具体，教师教得不好，教导处、校长同志能够上一堂示范课带动老师？

（第二论）：钟付〔副〕处长也存在三大主义，从随便打电话便叫容羨回去，来看，需下放中学一、二年，认为这种下放与今天中央各级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炼〕，有同样重大意义。（予：末段，我反对每个文教干部都下放，我坚信部分文教领导和学校一些领导人不下放是必要的）（按：但第三论则沈科长、朱、余局长、李部长都应下放）

（第三论）……沈、余、朱等人都缺乏教师工作的体会，更缺乏教师的思想感情……在工作上就易犯三大主义了。从实际工作中来培养教师的思想感情，有了老师的思想感情，那么工作起来的时候，就易于切合实际，符合老师的利益，老师们愉快地服从和接受了。有了教师的感情，老师们很自然会感到这是我们的真正的领导……带来重大的收获。

又：我跟李部长寒暄几次……我也有点不主动说出我的名字……横竖几分钟就忘记了，我又何必去讨人欢喜呢（按：注意这是什么感情）。

（第四论）……文教领导下放一个时期到学校体验工作、生活，有如厂长和党委××向去掌握技术和体验生产一样。我认为解放已八年多，领导同志单纯作政治思想领导，忽视了业务领导，这是完全不对的。

按：他人以为，这不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言论，厂长也深入车间。中央各级干部也下放呀！……大家不要以为我对有错误的同志才下放，而这不要主要一面，主要的是缺乏具体工作经验和业务的，就要深入来学校，下放来学校，体验、生活一个时期，使以后更好领导。（按：这与中央的干部下放政策的积极精神相同吗？）

（第七论）……这样就无需（按：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目前领导往往走在群众的后面，又那〔哪〕能领导得好呢？三大主义又有什么办法防止呢？……领导下放基层是会比下放生产社来得恰当和急切。

（刘建平 整理校对）





中国当代史研究

学术评论



# 近期中国的毛泽东研究： 一个政治意识生态的框架草图<sup>①</sup>

萧延中\*

**摘要** 本文是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前提下，对中国学术界近期毛泽东晚年研究状况的一个评价性报告。它将目前这一研究领域中的基本倾向概括为“主流意识形态”、“否定批判取向”、“‘新左翼’研究论述”和“历史主义学派”四个流派，并对各家观点的基础预设和争论焦点进行了初步的梳理。最后，作者认为，在当下的中国，“毛泽东”已演变成了某种政治符号，而“毛泽东问题”，则实际隐含着研究者自身对于良好社会制度和正当政治秩序的一种愿景。

**关键词** 晚年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 政治意识 当代中国思想

本文是笔者在阅读了数百万字的文献资料之后，所做出的一性报告。它的目的是在有限的篇幅内，使一般读者对近期中国毛泽东研究的各种主要观点、基础预设和争论焦点，有一个大致轮廓和初步了解。为节约篇幅，本文将尽可能地减少原文引证，而且尽可能地省略了大量同质性的文献资料，但这种冒险的“省略”不是有意地“忽略”，而只是一种在写作文章时的技术要求。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含混表述；二、否定批判取向的研究进展；三、“新左翼”理论的激烈辩论；四、历史主义学派的实证叙述。本文

<sup>①</sup> 本文撰写的过程中，曾征求过韩钢、高华、李杨、沈志华、杨奎松等朋友的意见，采纳了他们的很多中肯建议，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

\* 作者萧延中，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



将依次对这些学派的观点进行概述，最后，给出我的简要结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目前中国毛泽东研究的政治意识<sup>①</sup>生态分布做如此的划分，并不意味着各家内部的评价观点都呈现一致性特征。在思想史研究的角度上，我们毋宁说，其中各学术派别内部分析路径的差异，并不见得比不同学术派别之间的价值态度差异要小。总体而言，各派思想在基本态度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交叉，但就其基本的研究方法和表述形式，它们之间观念分歧的基本轮廓还是清晰可见的。因此，本文基于一种宏观描述的考虑，只是在整体上给出一个框架性概括的参照基点。

### 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含混表述

“主流意识形态”是指执政党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解释，它控制着中国毛泽东研究的政治话语权，其功能是宣传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并以不断强化这种话语的渗透力作为研究的首要任务，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倾向。同时要指出的是，存在着一个可以被称为“亚意识形态取向”的层面，其特征是围绕“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旨，对其观点作进一步、更学术性的再诠释，这一研究群体主要指各高等院校和中央及省级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在公开的报刊发表的主要是这类作品。他们虽然可以欣赏不同的研究话语，但自己则不想成为政治—社会批判的角色。<sup>②</sup>

首先，如果以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参照系，那么应当说，在对毛泽东的问题上，“主流意识形态”还是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尽管这些变化是以一种不明言说的形式（implicative form）出现的。最为明显的例证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

<sup>①</sup> 此处使用“政治意识”（political sense）而没有使用更为规范的“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一般而言，“意识形态”大致是指一个特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对自己政治合法性的辩护。如是，本文中思想评述的各种流派，显然不完全属于此一类型，虽然其中各派评论都难免沾染浓厚的政治色彩，而“政治意识”则能更为确切地体现本论题的这一特征；其二，在被列举的各家评论中，既有严谨的推理论证，又有经验的感受描述，还有即时的随意点评，并没有呈现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阐述，这样，更具模糊性特征的“意识”一词就恰好适用。

<sup>②</sup> 这里所谓“亚意识形态”的研究区域，其论著不仅数量相当庞大，而且即使排除掉那些平庸的应景文章，其中众多论述也颇有见地，学科和观点也呈多元化分布。但其共同的基本特征是研究者的观点以不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根本冲突为限度。对于这部分研究论述的评介，需另文专事分析。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sup>①</sup>

中共官方的这个表述，明确地显示“毛泽东思想”已经不再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导部分。换言之，“毛泽东思想”已不再是中共当前理论的指导思想，而仅仅被视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需要“坚持”和“发展”的历史对象了。

虽然中共中央权威部门对于这一表述上的变化没有给出任何进一步的解释，但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于2007年11月7日和13日在《文汇报》和《河南日报》两次发文，具体解释中共高层的这一意识形态变化。而后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什么不包括毛泽东思想？”石仲泉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解释：首先，目前的中国历史可划分为“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两个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叫做“现代中国”，而1978年至今叫做“当代中国”。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涉的对象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以它并不包括“现代中国”的部分，顺理就不该包括那个时期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其次，所谓“中国马克思主义”就其性质而言，应区分为“基础部分”和“创新部分”。“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尽管提出过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但是，由于在总体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毛泽东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不系统、不完整”。所以，作为基础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就不包括在作为“当代中国的创新理论”之内；再次，“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但它不是这一理论本源。“若就当今提出的一系列创新理论而言，特别是在实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而制定的那一套方针政策之后来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就很难说“中国

<sup>①</sup>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国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见《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着“毛泽东思想”了。<sup>①</sup>

由于石仲泉教授的论证所涉及的原则上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因此，这里我们不对其逻辑依据的合理性进行评价。但是即使如此，石仲泉的论证仍然受到来自社会舆论和中共中央权威部门直接和间接的批评。一些网络文章对“石文”发起了强势的攻击，认为“此文妄图将社会上刮起的一股非毛化、去毛化反动逆流公开化、合法化，为私有化改革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鸣锣开道，但是我们老工人早就讲过这是一条资本主义复辟的不归路”。<sup>②</sup>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共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也在中共核心理论刊物《求是》上发表文章阐述这一问题。文章引用邓小平的话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习近平认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既继承了毛泽东同志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留给我们的重要思想成果，又以改革开放新的实践为基础发展了这些重要思想成果。”最后文章明确断言，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所从事的事业与毛泽东同志的关系”而言，胡锦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同志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重要思想成果的继承和发展”的论断，已“从根本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联系说清楚、讲明白了。”<sup>③</sup>

我个人判断，在此时此刻由中共重要人物发表这样的文章，而且使用了如此强调性的修辞看，实在具有理论和态度的“澄清”用意。至于当初中共十七大报告起草时如何界定“毛泽东思想”的性质以及历史地位的真实意图，则已超出了一般学术评价的范围。但是通过这一即时的澄清和更正，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系中，毛泽东的思想和形象仍然是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毛泽东思想”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在其政治谱系中依然占据着一个不能省略的合法性象征的位置。

其次，从学术角度看，“主流意识形态”系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无疑应首推

<sup>①</sup> 石仲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什么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河南日报》，2007年11月13日；另见：石仲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中国创新理论的科学体系》，《文汇报》，2007年11月7日。

<sup>②</sup> 老工人：《反击“石文”，打响毛泽东思想保卫战》，乌有之乡网站 www.wyzxsx.com 2007-11-25。

<sup>③</sup>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载《求是》，2008年第7期。



由逢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该书的价值与其说是由于它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的国家级的权威版本，不如说是因为该书直接以历史档案资料为依据，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内部资料，许多历史细节是第一次公之于世。在这样的意义上，该书毫无疑问可称为毛泽东研究中的珍品。为表彰该书对毛泽东研究的贡献，2008 年 2 月 21 日，《毛泽东传》获得了由新闻出版总署主办的“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之图书奖的首项。<sup>①</sup>

《毛泽东传》的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逢先知认为该书的宏观历史价值在于：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新中国前 27 年的历史中，不论是我们国家取得的辉煌成就，还是走过的曲折道路、遭受的严重挫折，无不与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密不可分。在这 27 年中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毛泽东都是主要决策者。作为记录毛泽东这段历史的《毛泽东传（1949～1976）》（以下简称《毛传》），对这些重大事件都是用了重笔，以写出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它们是怎样发生的，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事件发展的过程是怎样的，它们在历史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毛泽东是怎样决策的，在决策过程中，他同中央其他领导人发生一种什么样的互动关系，等等。这部《毛传》出版以后，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就是因为它使用和公布了大量第一手的档案资料，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人们非常想要了解的毛泽东这段历史的思想和活动……

《毛传》的最大特点是用事实说话。它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的指导下编写的；反过来，通过对大量档案资料的研究，又进一步证明了《历史决议》的科学性和正确性。<sup>②</sup>

此外，该书还对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和问题，给予了较详细的正面回应。这些事件和问题包括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怎样提出来的及

<sup>①</sup> 参加过几届中国图书奖评审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研究员认为，在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过程中，评审学者较注重作品的原创性和学术含金量。“获奖作品都相当有水平，是学术界和读者都认可的作品。”见《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正式公布》，新华网，www.xinhuanet.cn，2008 年 2 月 22 日。

<sup>②</sup> 逢先知：《〈毛泽东传〉对建国后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党的文献》2006 年第 2 期。

为什么提出来、关于中共八大、关于《正处》和整风“反右”、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吗、毛泽东与“四人帮”的根本区别、毛泽东如何对待周恩来的病情等八个敏感问题。<sup>①</sup>例如，《毛泽东传》中对“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大病一场，此后就再难得恢复的细节给了大量的描写。特别是对毛泽东病情有所好转后的精神和心态记录，其根据是毛泽东的病历档案，所以相当珍贵和真实。再如书中说：“随着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sup>②</sup>“毛泽东关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一方面表明他试图改变党内的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他已感到自己的病情而对‘后事’的某种担忧。这种担忧，随着他本人健康状况的明显下降，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形势面对的复杂局面而日益加深，甚至变成焦虑不安，直接影响他此时对许多重大问题做出的决策。”<sup>③</sup>这些评价没有“官腔”，客观中允。

当然，尽管《毛泽东传》披露了大量第一手档案资料，但也难免留下若干“为尊者讳”的明显痕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史料的引证和使用上，存在着按当下意识形态模板的需要，侧重选择与其相一致的资料，从而有选择地省略了毛泽东晚年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思想表述。如毛泽东1976年6月以后对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以及“四人帮”的评价等，早已在民间流传多时，而《毛泽东传》对此则只字未提，甚至没有任何暗示和隐喻的标识。最为典型的是，《毛泽东传》在第1781～1782页上，引述了一段现在已广为人知的毛泽东晚年对涉及自己之一生的自我评价。原文如下：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

<sup>①</sup> 逢先知：《〈毛泽东传〉对建国后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党的文献》2006年第2期。

<sup>②</sup>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4页。

<sup>③</sup>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666页。

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对于这段极为重要的史料，《毛泽东传》的作者没有给出毛泽东此次谈话的具体时间，也没有具体交代毛泽东此次谈话的具体对象和语境背景，而只是以“这一年，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一语概之。从《毛泽东传》此处引证的上下文看，前面一段讲“从该年五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而后面一段讲“这年六月下旬，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按时间排比，毛泽东的这个自我评价应当是在该年的6月上旬，至迟到中旬。假设6月上中旬共20天，那么，毛泽东此次谈话究竟是那一天？是一次性谈话，还是断断续续的谈话？他此次谈话的对象，除华国锋以外还有谁？毛泽东所说“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中的“你们”又是指哪些人？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毛泽东传》语焉不详。更为让人费解的是，《毛泽东传》的作者拥有直接查阅原始档案的便利，该书涉及毛泽东谈话、著述等重要引文一般都直接加引号，采取档案注释方式，而唯独这段引文只是使用了不同的字体，但却未加引号。甚至对这样一则如此重要的史实，作者标示的文献出处却是“参见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7年3月22日。”这样的注释方式与该书中其他引文形成鲜明反差，实在与常规不符。我们弄不懂作者这样处理文稿的具体用意。在这里，《毛泽东传》似乎特意隐去了此段重要史料的具体背景。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其中或许暗示着某种难言之隐？对此我们只能存疑。<sup>①</sup>正如该书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所说：“坦率地讲，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材料都写进去，因为：第一受篇幅的限制，第二受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好写。不好写的原因主要还不是因为说出来以后有损于毛泽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这还是有一些禁区的。但是，我们保证一条：凡是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sup>②</sup>李捷的话说得很实在，也很实际。按我个人的理解，所谓“凡是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的意思等于说“没有写出来的真实的东西还有很多”。这样看来，这部权威的《毛泽东传》就与真正、丰满和全面的毛泽东全景形象，还有距离。究竟其距离有多大，只能有待于历史给予回答。

<sup>①</sup> 我在2007年3月31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纪大讲堂”的文字稿中曾提出过这一疑问，但编辑认为游离了主题而做了删节。在正式发表稿中，我又将其补入。参阅萧延中、曾子墨：《探索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史林》2007年第8期。又，将来出版此一阶段的《毛泽东年谱》，将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因为年谱需要逐日记录，以上疑问必得冰释。

<sup>②</sup> 李捷：《对毛泽东新中国探索的再思考》，《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其二，就现有可公开的毛泽东晚年历史事件的评价来看，《毛泽东传》在不少问题上，不仅没有使读者清晰地了解具体的政治操作内幕，反而增加了更多的疑惑。例如，《毛泽东传》对“林彪事件”采取了完全“一边倒”的评价，而使用的资料显然经过了精心的选择。但目前已出版的各种当事人<sup>①</sup>和其他民间研究<sup>②</sup>表明，重要历史当事人汪东兴的回忆<sup>③</sup>存在不少明显的自我辩护的陈述。面对这些矛盾的史料，《毛泽东传》在没有任何澄清和辨析之前，就把这一历史事件的全部责任归给了已不在人间、因而无法辩解的林彪，这本身已有失厚道公允，为史家所不取。或许正因如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著名中共党史专家石仲泉则评价说：“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是各类版本的传记中比较全面、客观的，但是它受到一些因素影响，有的地方放不开，只能点到为止。很多读者看了以后觉得不过瘾，转而去寻找一些外国人写的版本，很多内容太过猎奇而且失实。这是因为读者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不是读者的错。我确实想过在有生之年能写出一本《毛泽东评传》，把30年研究毛泽东的功夫、时间能凝结出一件作品。如果有机会写成，我自信我的这本书会和别人不一样。”<sup>④</sup>

虽然《毛泽东传》还有诸多可商榷和可开掘的方面，但我仍然认为，即使仅从历史学角度考虑，这部著作仍是近年来中国毛泽东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

## 二、否定批判取向的研究进展

总体上说，持否定批判取向的学者对毛泽东持激烈的批判倾向，如果可以使用化约（reduce to）的方式，那么，我们则可以从其整体研究中抽象出一个至少由五

<sup>①</sup> 参阅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丁盛口述：《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香港：星克尔出版社，2008年版；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据说，“林彪事件”的另一位重要当事人邱会作的回忆录也即将出版。虽然我们目前对他的陈述还不得而知，但这将对研究此一事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则是无需赘言的。

<sup>②</sup> 参阅丁凯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上下册），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共分“林彪事件的再认识”、“关于‘林副主席一号令’问题”、“关于‘设国家主席’及其林彪篡党夺权问题”、“过于林彪阴谋政变杀毛问题”、“关于林彪‘叛国投敌’问题”、“文革中林彪事件的一些思考”、“林彪事件的影响”7个专题，36篇专业论文，全书1000余页，是民间林彪事件研究的重要成果。特别是国防大学已故著名学者王年一教授最早并一贯地坚持重评“林彪事件”的来龙去脉，是值得后来之历史学人铭记的。

<sup>③</sup>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sup>④</sup> 《党史专家石仲泉羊城开讲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信息时报》2007年1月12日。

个批判要素所构成的结构模式。这五个批判要素是：信仰体系上的乌托邦理念；政治上的个人独裁；行为上的诡诈谋略；心理方面的自恋倾向；以及由这些要素综合而成的政治认知格局。这派学者认为，正是这些因素，导致毛泽东晚年走出了一条给中国的正常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的政治轨迹。

在这一研究流派的内部，细致体察又可划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民主社会主义”取向的批判思路。这些作者大部分曾以青年知识分子身份融入革命潮流，在其生活过程中受到过政治运动的冲击甚至迫害，经历坎坷；另一种则表现出较鲜明的自由主义取向，大部分属于50后一代学人，具有较强的学理意图，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毛泽东问题的分析。

中国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把毛泽东一生的功过是非概括为三句话：“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sup>①</sup>并认为：“新民主主义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可说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坚持毛泽东思想，即珍视新民主主义。”“我们曾长期‘一边倒’，走苏联式的道路，实行暴力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越搞越穷，失败了”。特别是：

他[毛泽东]追求“君师合一”，又当秦始皇又做孔圣人……执掌全国政权之后，“三座大山”消失，更要以“毛泽东思想”来征服天下。1950年颁布的“五一节口号”，最后一个“毛主席万岁”是他自己加上去的。于是天下归心，君师合一，惟我独尊，一言九鼎。尤其斯大林问题出来之后，更是无所顾忌，我行我素，更不容拂逆，而一意孤行了。与天地斗的“大跃进”，明知出现了错误，但皇帝决不能下“罪己诏”，还在会议上正式提出：“要一点个人崇拜”……由此可见，不实行民主法治，权力不受制约，文采武功不亚于历代雄主明君的毛泽东，让其一意孤行，可见荒唐到何种程度！<sup>②</sup>

据此，李锐认为，“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九四九年取得胜利。但这盖世的功劳，比起他执政后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来，只能是次要的，第二位

<sup>①</sup> 李锐：《如何看待毛泽东——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发言稿》，载《李锐谈毛泽东》，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页。

<sup>②</sup> 李锐：《如何看待毛泽东——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发言稿》，《李锐谈毛泽东》，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3页。

的。”<sup>①</sup>在后来的评论中，他还使用了“功劳盖世，罪恶滔天”这样的判语。<sup>②</sup>

类似的研究作品还包括重要的历史当事人，如王若水、李慎之等人的著述，尽管他们的表达相对地比较平和。王若水在遗著中把毛泽东晚年的政治行为和心态概括为五个方面：“一、孤独感、恐惧感和异化感；二、没有私人情谊的同志关系，同志和战友都是毛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三、毛最大的性格特征是迎接挑战，逞强好胜；四、毛常读的书是‘线装书’，把《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但很少读西方的著作，甚至没有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五、毛说定了的事，不允许别人反对，不肯改错和回头。”<sup>③</sup>李慎之所著《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和《大民主和小民主》，<sup>④</sup>以及何方的几部论著，<sup>⑤</sup>也大体上持同一观点。

可能由于这些作者的生命历程曾与执政党的发展和挫折密切相关，又由于他们的知识构成的核心已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底色，因此，我们很容易在这些作品中感觉到一种由于其投身革命理想与政治发展现实之间所形成的严重背离，而遗留下某种在怨怒与焦虑之间徘徊不定的伤感，其激烈言辞的深处似乎暗含着某种抑制不住的“痛心疾首”和挥之不去的精神遗憾。这种波动情绪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张力和内在冲突，构成他们研究风格的独有特征。

相对而言，50后自由主义学者则似乎要更加冷静，他们更加注重对“毛泽东问题”的思想性质、内在理路和历史成因进行分析，倾向于在更加学术化的角度上，探讨毛泽东及其时代的自我使命和精神愿景。例如，当仅仅把毛泽东视为纯粹个体政治行动者时，有学者对其政治诚实性提出了严重的质疑，认为“毛虽然可以这样那样地取得各种思想资源为其所用，但是，毛不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因为，你如果亲[轻]信了他某一个阶段的想法，去求证他的所有思想，你就会成为另一个愚昧之刘[少奇]。”<sup>⑥</sup>如单少杰和辛子陵的著作，<sup>⑦</sup>也基本是在这个层面上展开论证。而以下三位自由学者则试图在更加广阔的视域下考察毛泽东政治行为之思想实质的独特性，其透视角度比较典型，故略述如下。

① 同上。

② 参阅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上下卷），香港：书作坊，2008年版，第1～2页。

③ 参阅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上下册），香港：明报出版社，2002年版。

④ 参阅李慎之：《李慎之全集》（三卷本），香港：明报出版社，2004年版。

⑤ 参阅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上下册），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⑥ 刘自立：《毛的非主义主义和非教旨教旨》，[http://www.wretch.cc/blog/philosopher9&article\\_id=4205699](http://www.wretch.cc/blog/philosopher9&article_id=4205699)。

⑦ 参阅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1949-1976）》，香港：明镜出版社，2000年版；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上下卷），香港：书作坊，2008年版。



王力雄概括地指出，对毛泽东来说，“获得权力仅是开始，他真心想要实现理想，是前无古人的改天换地，再造人间！”：

他同只贪恋权力的统治者之不一样，那些人即使打着“天道”旗号，一得到权力，所图唯有坐稳江山。而对于毛，获得权力仅是开始，他真地是要去实现造就人间天国的理想。只做个统治者不能满足他“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乎天外”的大胸怀，古今中外帝王有无数，不都是过眼云烟？他是要把帝王与圣贤集于一身——所谓“内圣外王”、“君师一体”——去用帝王之权实现圣贤理想。在他眼里，“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无非只是有点武功文治，都没脱出在权力圈中打转。而他要做的却是前无古人的改天换地，再造人间！<sup>①</sup>

作为一个不尚空谈理论的人，毛泽东的政治实践路径则是把无产阶级思想定义成“公”，而把资产阶级思想看作为“私”，进而通过向人们的头脑中灌输“公”而驱逐“私”的改造途径，向“人性”开战。这样就必然形成“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观念。因此，与其说“专制独裁”是毛泽东政治统治的特征，不如说那只是历史的表层，而其深层则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矛盾体系：“一方面，毛虽一直以反封建自居，其专制程度却超过大多数古代帝王；另一方面，他又力图给底层群众相当的政治地位和权利，不断实践其‘人民至上’和‘人民主权’的理想。固然天下政客无一不把‘人民’挂在口头，却只有毛亲自鼓动群众把他统治的国家搞得天翻地覆，把他手下的党政系统打得七零八落。”<sup>②</sup>正是“高度集权”与“人民至上”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并存与平衡，构成了研究者的关注聚焦点。在这个表层对立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通过“改造人的灵魂”而“变换政治秩序”的强大动因。

任不寐把毛泽东的上述思想特征概括为“教皇情结”，即以某种至高无上之精神权威的代理人名义，对世俗社会进行“教养”。这种角色定位的“必然逻辑结果是相信道德的力量和群众运动。上帝的尊严来自群众或‘选民’的自动崇拜，教皇的主要工作是布道而不是命令。这种教皇情结是把毛和世界上其他独裁者区别开来

<sup>①</sup> 王力雄：《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香港：麦田书屋，2007年版，第205页。

<sup>②</sup> 同上王力雄：《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第225～226页。

的标志之一。强迫思想转变和命令‘主动’交代‘罪行’是神权政治的政治艺术之一。但是，毛相信道德的力量主要是相信自己道德的力量；他相信群众是相信盲从他思想的群众和相信群众的热情而不是理性……毛从来没有把‘群众’当作同他平等的人的团体来看待，‘群众’存在的价值就是证明他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和群众的工具价值。‘为人民服务’的重点不在‘人民’，而在‘服务’，是为了‘服务’而‘人民’，而不是为了‘人民’而‘服务’。人民是只能被服务、但不能自己服务的那群人……由于群众的无知，中国只能走独裁的道路；既然中国必须独裁，那么，所有的政治斗争必然是关于谁独裁的斗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sup>①</sup>

陈小雅将史料片断插入散文体叙事，可能是“学院式规范”所不易接受的表达方式，但这并不妨碍其中包含着重要的“发现”和富有意义的“命题”。这里，所谓“发现”或“命题”主要是指：她把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与《水浒》所展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陈小雅认为，“《水浒》经验在‘打天下’方面的效应，经过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到毛泽东，已经屡经验证。它比前代农民起义提供的更多、更重要的思想，在于‘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根据这一思想，建立军阀割据大势中的‘红色割据’，再以《三国》演示的进退折冲为战略，避日寇与国民党的正面锋芒，观有利时机进取中原，辅以《孙子兵法》的纯熟运用，应该是毛泽东‘前半生’成功的诀窍。”而“《水浒》经验”到毛泽东掌握政权以后，就失去了它先前的灵光。其中“奥秘”就在于《水浒》是一部经济缺位的“乌托邦”。“《水浒》——作为一部造反者的‘圣经’——还有一个巨大的盲区，那就是它没有回答：造反者如何养活自己？”陈小雅通过对《水浒》及其毛泽东早期回忆的政治诠释，试图证明在“造反者”与“新皇权”之间“并不存在一条鸿沟”，“他们的身份是可以相互转换而无需经历痛苦的‘裂变’”。就此而论，“朱元璋，——《水浒》之产儿也；而毛泽东尤其著者耳”。<sup>②</sup>

显然，上述两类学者的批判，都可视为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激烈社会批判思潮的持续，但其方法论基础则存在很大不同。前者的经验性直观判断的色彩更加突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作者根据自身卷入政治过程的亲身经历，对诸如“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所造成的痛苦历史的反思结果。这就决定

<sup>①</sup> 任不寐：《学术视野中的毛泽东的思想》，<http://bmzy.126.com>。

<sup>②</sup> 均引自陈小雅《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上下册），香港：明镜出版社，2005 年版，第 55～92 页。

了该派研究的目的论倾向比较明显，正如李锐所说：“研究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研究毛泽东执政时期的方方面面，理清事实，探讨根源，仍是不可推卸的长期任务，仍同我们当前的建设和未来的走向紧密相关。我一直认为，不彻底清理毛泽东的问题，不彻底查明前三十年（1949至1978）走过的大大小的弯路，不彻底弄清‘左’为什么根深蒂固的全部历史，我们就不能轻装前进，就还会犯错误、走弯路。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是条长腿，政治体制改革是条短腿，致使我们总不能大步前进。原因何在？关键就在我们没有彻底清算过去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同‘左’的结合……‘文革’十年‘砸烂一切’，将人类社会历史进步所依靠的民主、自由、科学、法治、市场经济，统统踩在脚下，致使整个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至今回顾，仍不寒而栗。有鉴于此，1980年邓小平作了要彻底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可惜的是，报告中讲到的种种措施，二十年来未能得到认真落实。我们还是习惯人治，习惯家长制，习惯个人说了算，还是一个权大于法的权力社会，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法治社会；有法不依、知法犯法乃至执法犯法的现象，仍普遍存在。这就是腐败难治、民意难申、言路阻塞、党的威信日益下降的根本原因。”<sup>①</sup>

有鉴于此，一方面，这些著述的批判重心和意图指向，大体集中在对毛泽东个人政治行为的政治道德品质提出严重质疑的框架内，而尊重历史道德的本色内涵成为这一学派突出的特征之一。这些作者强调要发扬孔子“春秋笔法”和司马迁“秉笔直书”的撰史传统，坚持即使面临着再大的政治压力，也要对历史后果之是非曲直给出一个道德义涵（moral implications）上的明确判断。毋庸赘言，这些作者面对历史所持守的责任良知和道德勇气，自有其理由和价值。另一方面，这些批判性论述也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强烈的印象：中国1949年至1976年的历史，似乎只是一部毛泽东个人为所欲为的荒唐记录。这些作品没有使读者清晰地看到从“功劳盖世”如何导致“罪恶滔天”的必然逻辑关联，进而对于“一个人究竟如何可能全面地操控历史”一类的综合性复杂问题，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深刻答案。就其论述的基本预设，仍然未脱“功过分割式”的传统思维模式，只是完全颠倒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分割尺度，从“正三七开”变成了“负三七开”，甚至“负一九开”等等。

自由主义学派的学理论证，问题意识强烈，逻辑理路清晰，措辞定位也更加审慎严谨。在这样的解释路径下，诸如“个人崇拜”、“反智主义”（anti-

<sup>①</sup> 李锐：《彻底走出毛泽东时代的阴影》，载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香港：明镜出版社，2000年版。



intellectualism)、“民粹主义”等一系列由毛主义之精神根源所引发的诸多社会现象,就得到了较一般的直觉判断更深一步的理论批判和思想梳理。但在以上引述的分析中我们也能明显感受到,这些作者对毛泽东的观察都更侧重于其精神动机或宏观文化影响的透视,而没能将这些现象融汇中国近代以来的具体历史语境进行考察。这样,问题就似乎只论证了一半,诸如:人性改造与重塑之道德性质究竟应当如何评判?此一时代中国人为什么会 Charisma 强势人物情有独钟,以及政治“教养”企图与社会依赖意识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等一系列“现代性”问题就被明显搁置,进而多多少少给读者留下了一种问题的深刻性与诠释的简要性之间的不对称,更由于这种不对称,为退回到“一个狡诈的领袖忽悠了亿万个愚昧的人民”这样化约论的简单概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 三、“新左翼”理论的激烈辩论

与中国学术界的整体转型相一致,自 8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毛泽东研究界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新左翼”的崛起。

按中国学者萧功秦的划分,“新左翼”思潮内部也由“温和型”(后现代主义)和“激进型”(民粹主义)两种类型组成。<sup>①</sup>我把评论的重点聚焦在前者。这类学者一般具有西方现代教育的背景,或者对西方现代政治——社会理论具有相当高的素养,其中尤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激进左派思潮有较深入的接触和研究,他们的理论预设,一般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和后现代理论(Postmodern theory)的某些思想要素,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质疑,持明确的批判态度。其基本的理论特征是:对后资本主义社会所形成的“现代性”弊病给人类造成的内在伤害(特别是价值、道德等方面的扭曲和经济及身份上的不平等)如此地反感、焦虑和愤怒,以至于对富豪的贪婪、权贵的霸道和精英的傲慢,采取了一种仇杀式的激烈抨击,并以能成为下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而欣慰和自豪;对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以及商品吞噬人性的无限制消费化趋

<sup>①</sup> 参阅萧功秦:《新左翼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公羊[编]:《思潮:中国“新左翼”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 2003 版,第 406~414 页。

势，忧虑重重，从而期望建构一种不同于主流西方模式的新社会的诉求。<sup>①</sup>“新左翼”学者并不绝对地排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但认为，中国的这些改革新政所逐渐暴露出来的一些弊病，需要用“真正的毛泽东精神”予以补救。我把这些学者的论述概括为两个核心思想：一个是由平等主义、道德主义和民族主义所构成的“刚性三角架”理论；另一个则是由此而导出的“毛泽东思想超前论”的观点。

在第一个角度上，“新左翼”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除了要击败自己的政敌之外，而且其背后存在的是一个如何阻止韦伯意义上“合理化”进程必然释放出来的科层化（bureaucratization）压抑的国际性难题。而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晚年所倡导的“大民主”，是以“人民群众具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出版、言论权利和四大自由，左倾激进的革命意识形态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武器，而不再是空洞的教条或官僚手中的工具”，这无疑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政治改革实验”。<sup>②</sup>毛泽东晚年明确提出“党内资产阶级”的概念，其真正对象正是“党内官僚集团”。虽然在他之前，卢森堡（Rosa Luxemburg）、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和吉拉斯（Milovan Djilas）等人已经提出过共产主义“新官僚制”和“新阶级”的概念，“但是，毛泽东的令人特别瞩目之处，在于他以执政党领袖的身份，勇敢地提出了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防止新阶级的出现、实现‘大民主’的理论并付诸实践。”<sup>③</sup>所以，如果可能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这种“大民主”做出重新解释的话，那么，至少其中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核心内容的“鞍钢宪法”<sup>④</sup>，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部分。”“辩证地扬弃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是建设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的必要条件。”<sup>⑤</sup>

著名政治学者王绍光，在国际比较和数据分析两个维度上，对毛泽东及其时代

<sup>①</sup> 中国“新左翼”的理论来源，一方面是葛兰西（Gramsci, Antonio）的文化霸权（quoted from wiki; cultural hegemony）、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的“多元决定论”（over determination）；另一方面则是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和德里克（Arif Dirlik）的“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参阅童小溪：《精英与群众的辩证法：毛泽东的政治社会学》，《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郭建：《当代左派文化理论中的文革幽灵》，《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3月号。

<sup>②</sup> 萧喜东：《“两个文革”，或一个文革？》，罗金义、郑文龙编，《浩劫以外：再论文化大革命》，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172页。

<sup>③</sup> 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http://www.chinampaonline.com/lunwen/maozedongwenge.htm>。

<sup>④</sup> “鞍钢宪法”是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所作的批示。其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是指：“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

<sup>⑤</sup> 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1996年第3期。

“群众路线”的政治效能进行了学术性辩护。他说：“当今对公众参与的讨论似乎假定，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一扇门，决策者在里面，公众在外面。建立公众参与机制无非是把原来紧锁的门改装成虚掩的单向弹簧门，公众参与就好比公众推开了那扇门，得以登堂入室参与屋内的游戏。不过矜持的决策者却不会走出户外。毛泽东等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对‘参与’的理解截然不同，他们主张决策者必须走出户外，主动深入到民众中去，这就是著名的‘群众路线’。”虽然他赞同美国学者哈丁认为群众路线与西方社会科学中关于包括信息采集、议程设定、政策策划、政策确定、政策实施、政策评估等几个阶段的决策过程模式不谋而合，只是用语不同的概括，但同时进一步认为这样的分析仍然没能把握住毛泽东之“群众是群众路线决策模式的主角”的精髓。在与西方民主参与理论比较下，他把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称之为与西方民主模型不同的“逆向参与模式”。<sup>①</sup>王绍光还把毛泽东时代的“合作医疗”制度看作“群众路线”思想的实践范例，通过数据分析，说明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之“中国模式”的来龙去脉。<sup>②</sup>

另一位重要学者汪晖在西方学者<sup>③</sup>的论述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而“‘去政治化’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政治’不是指国家生活或国际政治中永远不会缺席的权力斗争，而是指基于特定政治价值及其利益关系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亦即政治主体间的相互运动。”<sup>④</sup>在这种意义上，“去政治化”是指对于通常上那种具有明显支配力之“政治”的消解（更确切地说，应当是“隐藏”），而代之以一种诸如“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发展”和“民主”等等“中性化”(neutralization)话语，用以掩盖、替代和置换“政党政治”、“理论辩论”和“阶级问题”等政治现实的支配实质。他认为，这个“去政治化的政治”过程，是一个近数十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性问题”。而震惊全球的中国“文革”运动，则是对“去政治化的政治”趋势的拒斥、狙击、破坏和反动：

① 王绍光：《公众决策参与机制：一个分析框架》，<http://www.strongwind.com.hk>。

② 参阅王绍光：《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比较》2003年第7期。

③ See, Carl Schmitt, "The Age of Neutralizations and Depoliticizations," tr. by M. Konzett & J.P. McCormick, *Telos*, No. 96 (1993), p.130 ~ 142; Alessandro Russo, "How to Translate 'Cultural Revolutio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ume 7, Issue 4 December 2006, p. 673 ~ 682; Tom Crumacker, "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 and the End of History," *State of Nature* 2, Winter, 2006.

④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7页。



“文化大革命”是在政党的国家化过程发展到一个阶段的产物，在政党国家化的条件下，重新进行社会动员，亦即在党——国之外激活政治领域和政治价值，形成大众参与性民主，构成了“文革”初期的特点之一。毛泽东重申革命政党的政治价值，试图通过社会运动和政治辩论打破政党与国家的绝对权威，目的是重构一种包含着自我否定态势的社会体制，即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国家，一个通向自我否定的国家和一个自我否定的政党。作为“文革”宗旨之一的“五七指示”将文化大革命与社会分工的灵活性联系起来，力图从根本上铲除官僚制得以确立的社会分工模式。社会主义实践，就其根本宗旨而言，在于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工与既往一切等级主义的社会模式（贵族等级的、封建等级的）或对抗性关系（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等等）区分开来，进而让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彻底改造一切再生等级关系和对抗关系的政治机制、生产方式和文化条件。[而文革初期的各种群众自治组织]是对旧的国家机器进行改造尝试，亦即一种超越国家机器的文化 - 政治实践。<sup>①</sup>

而在“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框架下，伴随着60年代理想激情的消逝，在中国，真实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形式过程上的“政治辩论”以及内在灵魂的“道德感召”，均被淹没在“去政治化”（汪晖还使用了“去革命”、“去国家”、“去阶级”、“去敌我”等术语）之“向钱看”的“金”色浪潮之中。最终，新的、政治性的安排被置于“去政治化的”表象之中，新的社会不平等被“自然化”和“正当化”了。因此，汪晖的结论是，在清除了“去政治化的政治”这层“现代性”的重重迷雾以后，毛泽东“文革”运动之“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实质，就自然地得以再现。今天，回头审视毛泽东“大民主”理论和实践的理论价值，将会对人们理解和反思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引发颇多的反思和启迪。

在第二个角度上，一些“新左翼”学者认为毛泽东晚年思想实际上已被后人大大地误读了，因为毛泽东当时所提出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人乃至中共高层的领悟水平。有学者借助民间意识而直截了当地把毛泽东再次称为“神”：“正如中国老百姓说的，毛泽东是‘神’，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这么一个真‘神’，有谁可以和毛泽东相比呢？……本来是个平庸的凡人冒充神威主政，恐怕就不可

<sup>①</sup>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4～15页。

能取得毛泽东领导的成就。摩西在带领犹太人艰难跋涉的漫漫长途，也有失误和悲剧，但摩西毕竟把犹太人带到了新家园。如果犹太人老是把目光聚焦在摩西的失误和悲剧上，无休止地埋怨和诅咒，那，他还能办什么事情？”<sup>①</sup>甚至更有网友把“文革”比喻为毛泽东的“十字架”，并描写了一幅相当悲壮的超意志主义之神正论（theodicy）的诠释图景：

基督被犹大出卖，不得不死，他选择了死，并扛着那个钉死自己的十字架去刑场。毛泽东不得不也扛这样的一副十字架去死，这个十字架就是“文革”。与基督不同的是，毛泽东自己精心的、自觉自愿的打造了这个十字架，并把自己钉了上去……毛泽东“钉死”了自己，而人民获得了自由。被他拯救的人们，虔诚地将他解救下十字架，就这样他复活了，并将不再死去，并将庇佑每一个弱小者的心灵和魂魄。<sup>②</sup>

何新认为，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者都把马列的著作当做政治“圣经”的时代，毛泽东“提倡人民关心国事，勇于怀疑和独立思考，鼓励造反和‘反潮流’，倡导‘四大’和‘大民主’，把权威的标准由迷信党组织、社会的集体理性而下放于个人理性。这恰恰是启蒙精神的标志。”由于毛泽东的思想具有极大的超越性质，所以自然很难被普通人所理解。在让思想冲破牢笼的意义上，“文革”应当被看成当代中国的“毛氏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宗教改革运动”。<sup>③</sup>也有人直接地宣称：毛泽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尼采！”<sup>④</sup>毛泽东饱受争议是无疑的，甚至是自然的，因为这些争议的动力恰恰来源于他那超越的创造性批判精神。最后，何新极富激情，气势恢宏地结论道：

文化大革命最终彻底失败了。但是，毛泽东——这个驾驭中国革命彻底改造了中国之人性和生活的人，这个以人民战争的形式领导了二十世纪历史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席卷了数亿人口的伟大国内战争和群众运动的人；这个动

<sup>①</sup> 吴明：《因为有了毛泽东，才有新中国》，载《导师毛泽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sup>②</sup> 佚名：《孤独的毛泽东》，[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709/23852.html](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709/23852.html)。

<sup>③</sup> 何新：《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http://www.hexinchina.com>。2004-4-8。

<sup>④</sup> 武振荣：《论“十年文革”中的毛泽东》，新世纪新闻网（[www.newcenturynews.com](http://www.newcenturynews.com)）2006-11-15。

员了十亿人民，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超人之伟力，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营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类终极平等的乌托邦理想国的人，这个打破了雅尔塔三强瓜分世界协议、打破了冷战的两极格局，从而使中国屹立而起成为世界之第三极的人；这个导致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世界地缘政治发生根本改变的人；这个发起了十字军东征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行动、使西方势力被逐出于东方的人；这个最终把千万人的思念引向天安门前那块孤独耸立的岩石的人；必将永远屹立于人类历史上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sup>①</sup>

另外，有部分“新左翼”学者的作品注意到在历史语境的上下文中解读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政治选择，<sup>②</sup>但与理论论述文章相比较则是相当有限的一小部分。

在我看来，才华横溢的“新左翼”严肃学者，通过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再解释，进而反思“现代性”病症的深刻焦虑，并以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批判和政治行动为透视镜，试图凸显和抨击目前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中某些严重的弊症，这些反思和批判无疑是振聋发聩和发人深省的，其理论视野和中心立意都具有跨时代、跨历史、跨学科的“大跨度”特征，其论辩雄心相当广阔，甚至不能仅用对当下中国社会出现“新不平等”的忧虑加以简单解读。在更深刻的层次上，这些论述时时触动和激荡着那些不满足于世俗安康而关注着人类命运的“不安的灵魂”。在一定的意义上，他们的关切和焦虑已超出了自我的限界，他们的意图是试图找回非物质之价值的置放基点，其眼光与其说是中国性的，不如说是超国界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同时看到，经过“新左翼”的再解释，丰满复杂的历史变成了逻辑严密的理论，作为政治家兼思想家的毛泽东，就被从历史的具体语境中剥离出来了，他那原本带有强烈个人意欲的政治动机，就被抽象成某种具有普遍意向的理想图景。这样，带着一种理想的洞见去观察“被选择”以后的历史，“新左翼”所建构的实际上只是一个“应然”（ought to be）的毛泽东，从而就不可避免地把自己诸多对现实的愤慨和对未来的愿景（visions）投射进一个美丽的乌托邦镜像之中。但是，理论阐释的合理化意图必须首先满足和尊重历史过程的情境化

<sup>①</sup> 何新：《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2004年4月8日 <http://www.hexinchina.com>。

<sup>②</sup> 参阅水陆洲的《文革简论》，该书由“乌有之乡”网站连载。此文当属为毛泽东辩护的最著名的网络文稿。另参阅萧喜东：《刘少奇、王光美与群众运动：以四清为例》，《中国与世界》2000年第12期、2001年第1期。



(contextualization) 要求, 恰恰是传统观念史研究遭受质疑的要害之一。<sup>①</sup> 另外, 似乎与这种“理性”判断同等重要的是, 任何一个富有情感的血肉之躯, 每当念及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 特别是在“文革”中曾为纯洁理想而付出生命代价的年轻亡灵, 再追溯至近代以来为保卫国家而壮烈捐躯的所有中华儿女, 思想家完全忽略后来历史过程中由于权力分配的无情角逐和翻来覆去的意识形态运动而付出的惨重代价, 难道高调的理论阐释真的就可以做到“心安理得”吗? 主导政治家个人的历史责任难道也真的就可以轻易回避, 甚至一卸了之吗? 就笔者体会, 毛泽东本人临终之际对后人对其晚年思想、行为之评价的高度疑虑和深深戒忌, 其实已对这一问题提供了别具深意的特殊解答。

#### 四、历史主义学派的实证叙述

与“新左翼”强调理论分析的研究路径形成鲜明对照的, 是中国毛泽东研究的历史主义学派。这派学者均为训练有素的专业历史学家, 他们“严守家法”, 坚持历史阐释必须基于原始史实(包括档案、文献和口述资料等)的治史原则, 认为理论上的过度解释, 虽然可能红极一时, 但终究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更有甚者, 当解释者把历史人物, 特别是他们的只言片语, 抽离出连续性的具体历史语境之后, 许多的结论甚至违反人类生活的基本常识, 就更别奢谈试图给出一个“全面真实的毛泽东”了。

高华所著 60 万字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 选取了“延安整风”这个毛泽东乃至中共历史上最为关键的环节, 在核心档案并未开放的前提下, 通过对各种史料的耐心收集、筛选、考证和排比, 讲述了一个“毛泽东如何可能一步步地成为中共党内被普遍认可的第一领袖, 毛泽东思想如何成为中共指导思想”之详细的故事。特别是关于这个故事建构过程中的诸多细节, 书中都有相当精致的深描式(Thick description)叙述。最终, 该书给读者勾画出了一幅融汇组织机制、思想渗入、感情调动和政治整合于一体的全方位的历史画卷。高华在谈及自己的研究动机时说, “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 延

<sup>①</sup> 参阅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任军锋译, 载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1卷,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39~79页。该文被视为政治思想史之剑桥学派的奠基性文献。后收入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I,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57~89。

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而他自己的关注点则是要“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sup>①</sup> 史学界把这部书评为“关于延安整风最翔实的著作”，是一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最高权威的上层结构，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1949年以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的历史名著，<sup>②</sup> 是“一部凝聚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理性反思与心灵体验的”传世之作。<sup>③</sup> 我个人认为，仅对毛泽东研究的学术突破而言，高华这部著作真正的价值，与其说在于史料的细腻整理，不如说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修正、摆脱，甚至颠覆了自40年代以来已固化了的意识形态解释框架和话语表达，而独创了一套崭新的历史叙述模式。尽管这部学术著作仍有进一步规范 and 提炼的空间，如该书仍表现出一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反话语”意味，<sup>④</sup> 但至少在我个人看来，即使如此，高华的著作之历史学“考据—梳理”的丰厚底蕴，仍是一般“评述性”著述所无可比拟的，它无愧于被称之为中国当代“新史学”之不可替代的研究文本之一。

作为中国著名的当代史研究专家，沈志华、杨奎松等近年来在冷战史框架下发表了几部厚重的专著和大量论文，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sup>⑤</sup> 虽然在此我们不能对这些论著一一展开介绍，但沈志华、杨奎松重要的研究贡献，一方面是对原始史料的挖掘和开发，纠正了许多似乎已是“铁板钉钉”的叙史谬误，从而使未知和被误读的历史真相得以展现。例如，1956年波兰危机爆发时，赫鲁晓夫在10月19日抵达华沙与哥穆尔卡会谈，并企图以武力迫使波兰人就范。但第二天，赫鲁晓夫一行便启程回国，苏联军队也停止了军事行动。据当时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吴冷西回忆说，其原因是毛泽东接到了苏共打算动武的通知后，紧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转达了中共强烈反对的立场。于是，人民普遍认为是毛泽东阻止了苏

<sup>①</sup> 高华：《我为什么研究延安整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655、653页。

<sup>②</sup> 韩钢：《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www.xschina.org. 2008-6-24.

<sup>③</sup> 萧功秦：《拒绝残酷的美丽——评高华〈红太阳〉》，《二闲堂文库》，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 2010-2-20.

<sup>④</sup> 参阅黄化：《名著与瑕疵——读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有感》，www.xschina.org；老田《评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http://bbs.ecnu.edu.cn/dispbbs.asp?boardid=31&id=48474&star=1#664063.

<sup>⑤</sup> 参阅：www.yangkuisong.net and www.shenzhihua.net.

联的这次军事行动。但解密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记录和发给驻华使馆的电报表明，当时苏共根本就没有向中共透露打算采取军事行动的任何消息，而毛泽东是在事件平息后才得知此事的。这样，就使重要当事人的错误记忆得到了更正。<sup>①</sup>另一方面则是力求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联系多重相关要素，对个别历史事件进行解释，这样就使看似孤立的个别事件得以呈现它自身的来龙去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沈志华在研究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毛泽东的思想变化时，将这一现象置入前后数年之国际、国内、党内、党外的大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除引用大量公开的领袖言论、当事人回忆录和第二手研究资料外，同时根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的内部讲话记录稿，新华社编《内部参考》，云南、吉林、陕西、上海等省市的原始档案资料，未出版的《林克日记》（手稿），对事态的演变展开逐日的排比披露，从而使“党内整风”与“反右运动”之间关系以及如何导致最后结果的线索一目了然。<sup>②</sup>杨奎松在其著述中设问：“如何解释一向明察秋毫、运筹帷幄如毛泽东，竟会被一个弄虚作假的‘大跃进’所迷惑、所激动，以至于心态大变，个性张扬无忌，而且以后也没有悔意，由此引发了以后一系列严重的政治事件呢？”他的研究方式是首先复原1958年毛泽东所面临的相当复杂的历史局面：其一，1957年底美国单方面宣布要将其谈判代表由大使级降低到代办级；其二，同年7月下旬，苏联以不平等的条件提出与中国共同建立长波电台问题和联合潜艇舰队问题；其三，1957年中国经济形势发展不错，《人民日报》1958年元旦社论宣布15年左右赶上英国，再用20到30年的时间赶上美国的誓言，随后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当把毛泽东的决策思路嵌入这样一个中—美—苏三角关系和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多重因素具体语境下时，我们就会看到，“由于其[毛泽东]在处理与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关系的历史过程中，长期存在着压抑感和屈辱感，大跃进成就的取得，显然使他在精神上得到一种空前的释放，由衷地获得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由此，其对来自美国和苏联的轻视，甚或仅仅是以为轻视的反应，才会变得如此敏感和激烈。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以后虽然也明白大跃进的种种成就多为浮夸虚报所致，却始终异常抵触地不许他人置喙。”研究者不应“忽略了当时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即对毛泽东所造成的心理刺激，和大跃进对毛泽东

① 沈志华：《档案：还原历史真相》，2005年11月28日《北京日报》。

② 参阅沈志华：《1957年整风运动是如何开始的》，《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第72～83页；《整风是如何转为反右派运动的——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研究之二》，《香港传真》（内部刊物），No 2007-79，2007年11月15日，第1～54页（单行本）。



心态上转趋亢奋的影响”。这样，仅仅从毛泽东“好大喜功”和“争风吃醋”的个性因素解释他对“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和维护，显然只是一种相当表层的评论。<sup>①</sup>

还有一部分很有价值的毛泽东史学的研究成果也要提及。“文革”后期上海部分历史学家遵奉毛泽东的要求，为若干历史典籍进行注释。如今，这些学者结合自己的所感所受，再次对那段历史及其自己经手注释过的史书，给出其“当代涵义”的再诠释。由于自身的特殊经历，这些作者的价值取向表现鲜明，但不应因此而忽视其历史功力的深厚度和历史体悟的深刻性。例如，复旦历史学家朱永嘉根据毛泽东1969年春夏之交读《南史》的原始记录之痕迹，如他“在《南史·陈庆之传》的天头圈了四个圈，还批了‘陈庆之传’四个字……翻过这一页的天头上，毛泽东批了一句‘再读陈庆之传，为之神往。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他在阅读《二十四史》时，虽有阅读时间的批注，但也不是很具体，唯这一篇有他具体阅读的时间，而且有批语。说自己再读这篇传时‘心神往之’”等等，体会出毛泽东的阅读是“依照《南史》的次序，他应是先读梁武的本纪，然后是曹景宗传，韦叡传，最后才是陈庆之传。最使毛泽东动情的是韦叡和陈庆之这两篇传。”随之将“《南史》语境”和“毛泽东当下语境”这两个交叉的时空秩序融合在一起进行系统的诠释和解读。<sup>②</sup>这就使读者对毛泽东本人的政治决策之心路历程有了较深入的理解。历史学家刘修明曾参与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按毛泽东的要求校点注释古代历史文献并印刷“大字本”的工作，其中包括史传、政论、辞赋、诗词和散曲等体裁共计86篇。前后有三种版本形式，字体都比较大，从正文四宋、注文小四宋，发展到正文三宋或二宋、注文四宋或三宋，最后成为特制的三十六磅长宋字体（正文、注文同）。

<sup>①</sup>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页。

<sup>②</sup> 参阅朱永嘉：《从毛泽东读〈南史·陈庆之传〉说起》刊载于《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这批大字本当时印制的数量极少，多时不过二十几份，一般只有五至七份。<sup>①</sup>这些“大字本”透露出了毛泽东垂暮之年的焦虑和思考，其信息价值弥足珍贵。如，“1972年底，毛泽东对包括天与宗教在内的社会、自然、宇宙的大问题发生兴趣，”当年12月8日布置排印《旧唐书·傅奕传》的注释，12月31日，布置排印屈原的《天问》和柳宗元的《天对》的注释。自1974年6月周恩来住院后，前后6次大手术，8次小手术。1975年2月四届人大后病情又恶化，每日便血。据张玉凤的回忆，毛泽东在床上曾嘱张玉凤询问周恩来病情。<sup>②</sup>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1975年4月18日布置注释张元干的《贺新郎》词。词云“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毛泽东把这首词的最后两句“举大白，听《金缕》”改为“君且去，不须顾。”据此，刘修明认为“这首词，寄托着他同这位相处几十年、对自己无限忠诚、在处理国家大事上须臾不能离开，然而在思想上又不能完全同自己一致的老战友的复杂感情。”<sup>③</sup>诸如1974年5月10日毛泽东布置注释的大字本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别赋》及《恨赋》，更无疑直接反映出“政治，社会理想，现实疾病，家庭壮志，暮年，这一切，在晚年毛泽东的感情上掀起巨大的波澜，造成他错综复杂的心态和至深且巨的精神创伤，使

① 这些毛泽东指示注释印刷的大字本古籍是（括号中是其指示的具体时间）：《旧唐书·傅奕传》（1972年12月8日），屈原《天问》、《明史·朱升传》（1972年12月31日），《史记·项羽本纪》（1972年12月31日），《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晋书·刘元海载记》（1973年7月），《三国志·魏书·张辽传》、《三国志·魏书·张邻传》和《旧唐书·李想传》（1973年2月7日），司马迁《报任少卿书》（1973年6月），《史记·汲郑列传》（1973年6月19日），《旧五代史·李袭吉传》、《史记·陈丞相世家》（1973年7月），柳宗元《封建论》（1973年8月5日），章炳麟《秦献记》、《秦政记》、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皇》、韩愈的《石鼓歌》、柳宗元《咏荆柯》（1973年8月至9月底），《后汉书·李固传》、韩非子《说难》（1974年4月4日），韩非子《孤愤》（1974年4月），庾信《枯树赋》、谢庄《月赋》、谢惠连《雪赋》、江淹《别赋》、《恨赋》（1974年5月10日），晁错《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和《上书言兵事》（1974年6月），柳宗元《天说》、刘禹锡《天论》、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1974年7月），《后汉书·黄琼传》（1974年11月20日），洪皓《江梅引》（1975年3月27日），蒋捷《梅花引》（1975年4月11日），汤显祖《邯郸记》[中的“度世”]（1975年3月21日），王安石的《桂枝香》、张孝祥《六州歌头》、辛弃疾《贺新郎》、《摸鱼儿》、《水龙吟》、《水调歌头》、《永遇乐》、《汉宫春》、《破阵子》（1975年4月4日），蒋捷《虞美人》（1975年4月11日），张元干《贺新郎》（1975年4月18日），吴潜《满江红》（1975年5月3日），张元干《石州慢》（1975年5月31日），陆游《渔家傲》（1975年6月上旬），吴锡麒《梧桐树》[一舸]（1975年6月4日）。

② 参见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载《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北京：华龄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135页。

③ 刘修明：《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31页。

他不得不从中国古典辞赋诗词等文学作品中寻求心志的抚慰。”<sup>①</sup>

不用说，历史学阐释在此展现出了“用史实说话”的内在震撼力，从而使人明白“前人的脚步‘如何’以及‘为何’如此行进”一类“情境逻辑”的足迹。在历史的漩涡中，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利害、关系、好恶、情绪，乃至偏见和误会，大到那些宏观的社会发展取向，小到细微的心理折射反应，都可能对后来那些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的生成实施着挥之不去的“干预”影响。简而言之，在历史主义的研究语法中，所谓“偶然”中恰恰可能蕴含着“必然”的因子。

当然，从理论的抽象性品格的角度考虑，无论描述的细节多么详尽，叙事终究超不出经验直观的知觉（perception）层面。正如一位著名学人评价一部重要的“文革”史书是“没有思想的文化大革命史”，<sup>②</sup>可谓允中肯切，值得举一反三；而且，就具体事件的考据性复原，又极容易因史家刻意的精心投入，而不自觉地忽略了“长时段”历史观察的视角。这样，被牺牲掉的恰恰是历史学所特有的跨代际、超生理（即超越个体生命局限，而使人们可能观察数千年的人类连续性的行为和思维过程）的本能优势，反而陷入因对意识形态介入所必然产生的“权力对历史的扭曲”的敏锐烦感，而产生出对意识形态话语中的任何要素，包括其中的若干合理性要素，一概持不屑和排斥的态度，这就可能在史家“忠诚于事实”之“家法”的深层内核中，留下一个不易觉察的“主观陷阱”。

## 五、简要结论：“毛泽东问题”的开放性

中国学术界关于毛泽东的争论展现出了双重意义：一方面，各种角度和各种层面的毛泽东研究，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格局，这是一个学术讨论的必要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说，激烈的争论意味着毛泽东研究学术化的真正开始；另一方面，学术界对毛泽东研究持续不衰的兴趣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已经被符号化了。表面上，学者评论的对象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且不可替代的历史人物，但他们真正关切的对象则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前景与社会发展。因此，我们有理由判断：毛泽东研究无疑将会长久地成为中国学术领域里的重要话题。但是，在上述各家关于毛泽

<sup>①</sup> 参阅刘修明：《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29页；另见载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639～666页。

<sup>②</sup> 参阅陈家琪：《我们依旧期盼着另一种形式的“文革史”——我读〈“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www.xschina.org。



东的评论中，激烈的争论持续不断，目前似乎还看不到产生相互协调的任何迹象，在理论逻辑的角度上，也并未显示出为各派论述所可能共享的某种“中立”的思想因子。

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毛泽东”就像一面多棱镜，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对他的评价仍然是理解和评价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心态的一个晴雨表和参照系。<sup>①</sup>但是，这个参照系却是一种充满张力的多元镜像，在很强的意义上，目前这种张力已明显陷入了某种激进的实质性“思想”<sup>②</sup>困境之中：

一方面，姑且不论那些具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辩论，即使形式上保持着缜密逻辑论证的话语体系，或在严谨的史料排比中重现各种微观细节的叙述之中，其骨子里也多多少少透露出正、负“情感——情绪”的必然牵扯，很难像史华慈对待“中国研究”那样，给出一个试图超越了“爱”（崇拜）与“恨”（厌恶）以后的那份“尊重”。因为我们本身摆脱不了因涉身情境而引发的焦虑关切，而这种“焦虑”则正是此一现实研究最为重要的激情能量的来源之一。不容否认，当前中国的毛泽东研究领域，呈现出一片派别林立，激辩迭起的“喧嚣”场景。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中国学术界可能达成某种接近于一致性的审视和判断，而激烈的多元论辩自身就饱含着明确省思指向的厚重意义。但我个人则顽固地相信：如果历史只是一种可以被轻易贴上 YES 或 NO 之类记忆标签的话，那它将是这个世界上最省事和最无聊的事情。这种“化约论”（reductionism）之“划线排队”的思维和言说方式，被“化”掉的不仅是那些“众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和富有成果的歧义性”（unresolved problems and fruitful ambiguities）中保存着的“丰富多彩与悲惨

<sup>①</sup> 我们所说的“毛泽东热”是指社会舆论和群体心态对毛泽东的评价，在这其中包括赞颂与批判两个方面。我曾在某一场合表达过这个意思，即是说人们对于毛泽东的，你无论是爱他还是恨他，你都会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上想到他，谈及他，“甚至你想忘掉他也不容易”。参阅《萧延中解读晚年毛泽东的悖论情境》，Sohu 网新闻栏目：2006 年 09 月 05 日；该访谈的整理版发表于《中国大陆研究与教学通讯》（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第 78 期，2006 年 12 月。

<sup>②</sup> 我极其赞成史华慈间接地对“思想”一词之理解及所做出的界定。他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一书的一个重要注释中说：“我所使用‘history of thought（思想史）’一词，而不使用‘history of ideas（思想观念史）’或者‘intellectual history（智性思想史）’，恰恰是因为‘thought’这个词的语义没有明确的边界。这个词可以用来包括认知（cognition）和推理（reasoning），也可以包括自觉的意图（intentionality）、想象（imagination）、思想感情（sentiment）、诧异（wonder）、困惑（puzzlement）以及无法简单地编入电脑程序的人类意识活动的其他很多方面。此外，这个词还有另外一种受欢迎的模糊性，它既可以指思考的过程，也可以指诸如观念（ideas）、心态（mentalities）或惰性的态度（inert attitudes）这样已固定的思想‘产品（products）’。一方面在本书中我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属于‘高层’文化的文本的思想上，另一方面，我的关切也不仅仅限于按某种狭义的理解可以为其贴上‘智性（intellectual）’标签的那种‘思想’”。See,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85, p.423.

交加的人类处境” (both wretchedness and grandeur of the human condition),<sup>①</sup> 甚至还可能被再次“化”进一个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那种致使性灵之人彼此仇视之自我折磨的情绪陷阱。恕我直言，当下中国的毛泽东研究，激烈的意识形态的论争，掩盖不住“绝对的真理宣称”远超过“审慎的基本预设”的事实。但是，历史的沉积早已警告过我们：自以为己就是“真理”的化身，自以为己的追求正在趋向“至善” (ultimate good)，恰恰隐藏着极其危险的过失。因为，一旦当研究者失去了质疑自身深埋在意识深处的“那些未经审查的知识预设” (the unexamined intellectual assumptions) 时，必将无意于清理自我判断的杂质，甚至会不自觉地乐于炫耀那些属于“人”不可避免的限制与缺失。<sup>②</sup> 特别是当那些某一信仰体系上的价值形成固化的褊狭之时，离历史遗赠后人之明理和教训的本意，只会日趋渐远，诚如犹太格言所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是也。

另一方面，每当读到毛泽东，卢梭的身影就会不自觉地浮现于眼前：一个精神深层孤独到不可替代程度的思想怪杰。无论如何评价卢梭，但似乎无人否认，他是一个制造精神悖论的天才，包括所有的那些“公意”与“众意”、政治与宗教、目的与工具、悲悯与冷酷、狂傲与自卑、执著与算计……如果说，就其本性而言，在任何意义上权力自身都更容易地与人性之阴暗一面保持着挥之不去的紧密粘连的话，那么，毛泽东与卢梭之最明显的不同则在于，前者还实实在在、完完整整地充当着一位“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并极本能、极善于权力运作<sup>③</sup>之政治家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给毛泽东一个明晰的定位，就似乎比梳理卢梭思想的复杂理路更加艰难。面对这一艰难，中国的研究者当然不是无事可做，它反而要求学人更加“深入”去体察、解析和探寻（不是议论所引发的判断），需要在思想史和政治哲学角度去抽象毛泽东“俗语”之中所隐含着的“思想—精神”要素。时至今日，中国学术界并没有能提出一个类似于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关于“平庸之恶” (the banality of evil) 那样具有原创性深度的关键性分析命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深深的遗憾。虽然王力雄关于“人类不仅需要畏惧和防范暴君，更需要畏惧和防范这

<sup>①</sup> See,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96, p.16.

<sup>②</sup> See,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85, p.61.

<sup>③</sup> 白鲁恂 (Lucian W. Pye) 秉承拉斯韦尔 (H. D. Lasswell) 关于“政治人” (homo politicus) 的研究思路，对毛泽东的权力倾向做出过细腻的研究。尽管就这一具有心理学取向的研究视角学界争论不断，但白鲁恂独树一帜的透视，仍不失于明显的启发性。参阅：白鲁恂《毛泽东的心理分析》 (Mao: in the Leader)，刘宪阁译，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三部分“作为公共角色的毛泽东”。



样的理想主义者。一旦让自以为代表绝对真理和至善境界的理想主义者掌握了人类命运，他们就将以发自真心的美好动机——类似解放全人类或实现共产主义——去命令人类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理想，并把一切都交由他们安排。那时，所有的苦难和牺牲都会被他们视为‘必要代价’，而任何反抗与不满，也会被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毫不留情地镇压”<sup>①</sup>的观点，已经开始接触到了思想悖论的某些核心部分，的确可圈可点；也有评论者引用波普尔“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sup>②</sup>的论述予以支持，但对于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雅各宾专政之道德悖论”的中国变异版本，还未见系统化的全面梳理和深刻论证。毋庸赘言，这样的“问题意识”已经不限于对于毛泽东本人之功过是非的评说，而把我们反思的视域扩展和提升到了另一个深入的层次，它所涉及的至少是一个特殊时代的整体精神。

总而言之，以上的一切都在明确地表明，“毛泽东问题”（the Mao's Problematiques）所引发的“理论—学术焦虑”已经爆炸在中国学界各行学者的“灵魂深处”。这里借用史华慈的“Problematiques”一词，恰恰是因为该词所蕴含着的模糊性。<sup>③</sup>当人们面对“毛泽东问题”时，实际上其潜在的预设都存留着研究者自身对于良好社会制度和秩序的一种愿景（Vision）。批判者讲述的是一个有关宪政民主制度的普世祈望，而赞誉者则强调一种中国模式的特殊价值。这些内容并没有脱离古今比较和中西比较这一交叉十字架的冲突与困惑。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问题”所折射出来的问题是当下中国社会价值选择上的漂泊与混沌之“不确定性”。如果再进一步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或许“毛泽东问题”将成为从我们这一代开始，留给中国思想和历史的一道无解难题。因为这一“问题”的涵义，不仅仅涉及当代中国史或“毛泽东时代”之思想与制度的判断与评价，而且其潜在深度还直接指向了“人性悖论”这一难有确解的“奥秘”。

有鉴于此，本文只能是一篇没有确定结论的陈述，因为历史自身是一个开放着的、也很可能是一个循环着的进程。

① 王力雄：《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载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香港：麦田书屋，2007年版，第231页。

②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315页。

③ 参阅林同奇：《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初探》，载《人文寻求录》，香港：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9页。



中國當代史研究

书评书介





## 王亚志回忆，沈志华、李丹慧整理： 《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邱路

中苏军事关系，长期以来都是秘密。即使在苏联解体以后许多年，要想了解当年苏联是怎样具体援助新中国保卫自身安全、应付各种战争，和创建自己的现代化军队的，也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因此，关注新中国建立后中苏军事关系史的学者，应当感谢沈志华和李丹慧夫妇。他们找到了当年曾经做过彭德怀的军事参谋，并且在周恩来手下做过军事秘书的王亚志，通过口述的办法，把老人掌握的有关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的种种情况，挖掘和记录了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并没有用第一人称的形式撰写。这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简单地把老人的原话发表出来，而是在利用口述记录补充档案文献遗漏、缺失的内容的同时，以能够找到中俄两国相关的档案文献材料进一步订正口述记录的误差，最后由他们以学者的眼光，对档案文献和口述记录进行综合整理，交代事情的前因后果，将相关内容串并归纳，分章分节，并做出适当的评述，使之成书。

本书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具价值的地方，就是十分详细地列出了苏联历次援助中国军事装备的情况。像1950年11月中方出兵朝鲜后双方商定苏联于1951年1月无偿提供中方36个师的步兵轻武器的枪弹型号与数量；1952年4月双方商定苏联买给中方60个陆军师的全套装备的型号和数量；1950～1952年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向中国移交各种类型飞机的情况，包括向中方提供最先进的伊尔-28喷气式轰



炸机，和战斗机从米格 9 升级到米格 15，再到改进型米格比斯的情况，以及 1958 年卖给中国米格 19 并向中国转让制造图纸，1962 年卖给中国米格 21 飞机等情况，1951～1955 年苏联向中国提供海军舰艇和海防武器的种类及经过，以及 1950 年代苏联向中国提供各种军事技术，帮助中国仿制苏式武器，和中国军队全面学习苏军与内部争论的情况，等。

本书最有特点的地方，是对各种苏制武器，特别是步兵武器和飞机种类输入中国，和向中国转让制造图纸，中方仿制和改型的种类及其经过，有十分具体的介绍与说明。作者显然认同赫鲁晓夫的说法，即“当时中国武器库中所有的现代化武器都是苏联制造的，要不就是根据我们的工程师和研究机构向他们提供的样品和设计图纸仿造的”。作者认为，至少在 1960 年代以前，中国自主研制的武器只有个别项目，而且还是在起步的过程中，成品武器都是苏制的或仿苏制的产品。

但书中对苏联方面帮助中国建设现代化军队和巩固国防的作用，做了比较客观的说明。既一一指出了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向中方提供的，包括出售的武器装备和技术图纸，很少苏军现役装备，多半是苏方已经淘汰或正在淘汰的东西；也指出遇到关键时刻或在个别重要装备上，斯大林也会发现问题，并马上改变做法，提供一些新式装备，如朝鲜战争期间紧急提供可以与美军对抗的米格～15 飞机，及提供最先进的伊尔～28 喷气式轰炸机等。特别是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在军事援助上已变得相当开放，提供的陆、空武器与技术转让，多较先进。

关于苏联军事援助的意义，作者的评价是：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对志愿军在朝鲜顶住美军起到了首要的作用，使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在短期内起了质的飞跃。用彭德怀的话来说，就是“短短几年超过了旧中国几十年的建设”。

对美军能有如此效果，对国民党军队自然就更不在话下了。

书中举了 1950 年上海防空作战，以及 1955 年和 1958 年两次台海危机时的情况为例来说明这种情况。如 1949 年 10 月到 1950 年 2 月，上海，包括东南沿海城市广州、福州、杭州、南京、徐州，都在国民党空军的打击范围内，上海就受到空袭 26 次之多，损失惨重。因为苏联紧急提供了两个驱逐机团、一个混合航空兵团、一个探照灯团和一个雷达营，仅一个多月就击落国民党 6 架轰炸机，从而彻底解除了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的空袭威胁。

又如 1955 年 1 月解放军攻克一江山岛作战时，就完全取得了制空权。当时使用的就是苏联米格～15 比斯飞机，轰炸大陈岛敌军目标时使用的也是苏制图～2 轰炸机，用伊尔～10 强击机支援步兵登岛作战，并用苏联提供的鱼雷快艇击沉了

国民党的护航驱逐舰“太平号”和炮艇“洞庭号”。对登陆作战还使用苏制火炮支援，并把苏联造的反坦克炮装在船上支援登陆部队。

1958年炮击金门，以及同时开展的与国民党争夺东南沿海制空权的作战，依靠的也都是苏联售予的武器，而台湾当时的空军装备明显地不如解放军，也因此失去了对大陆沿海进行威胁和攻击的能力。

本书要目如下：

中苏之间早期的军事合作

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

陆军武器装备

空军武器装备

海军武器装备

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及中国仿制苏式武器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学习苏军

军队建设以我为主、以苏为鉴

## 龙应台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

这不是一本史学著作，书中虽然有不少口述的片断节录，也未必能够简单拿来当做历史研究的证据使用。被访问者张玉法教授就讲过，书中引述的谈话内容与当时的谈话内容并不完全一样。

但是，它还是值得一读，尤其是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学者和学生，一定要读。

龙应台是文学家，也更是一介知识分子。无论是作为文学作家，还是作为知识分子，她的关怀从来都不在我们历史学者通常所关心的高层政治的内幕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也不在今天众多年轻历史学者和学生关注的，以一个县、一个乡，甚或一个村为对象的所谓实证性研究。

她的对象是人，而且是一个个不以阶级、阶层为划分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具体的普通人。他们可以是父母，可以是子女；可以是军官，可以是士兵；可以是侥幸在国民党军刺刀下活命的山东学生，可以是因千辛万苦逃离大陆而成就了一生事业的记者作家；可以是一生都在寻找父亲骨灰而不得的台湾子弟，也可以是因为挑着海货到厦门去卖此生再也回不到丈夫和孩子身边的金门渔妇……

《大江大海》所以值得一读的，就是因为它记述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历史瞬间，勾勒出了一个鲜活的历史场景，让我们可以看到，那场决定了中国几十年命运的历史性大决战，对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情感、生活，甚至是生命，发生了怎样的可怕的影响和冲击。而这一切，通常都不会出现在历史学家的历史记述之中。

我们研究的历史都是由人构成的，是人就有感情。无论其地位高低，权力大小，贫富贵贱，是敌是友，历史研究者理当一视同仁，均能以同情之心而努力理解之。读《大江大海》的最大收获，就是能够更深切体会到海峡那一半经历了1949年这场历史巨变的很多人的情感世界，能够意识到人其实未能可以简单地依据政治



分类来划分善恶好坏。尤其是，任何一种营垒，无论建立在何种基础上，多半都是由许许多多普通人组成的，大家能有多少分别？

因此，作者在开头和结尾写下的两段话，确实有它值得思索的地方：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年华正茂；  
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  
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  
他们被带往战场，冻绥于荒野，曝尸于沟壑。  
时代的铁轮，辗过他们的身躯。  
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也正因为，他们那一代承受了  
战争的重压，忍下了离乱的内伤；  
正因为，他们在跌倒流血的地方  
重新低头播种，  
我们这一代，得以在和平中  
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  
那么，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  
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  
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

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样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本书总共有 8 部 73 节，各部的标题是：

在这里，我松开了你的手  
江流有声，隔岸千尺

在一张地图上，和你一起长大  
脱下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  
我磨破了的草鞋  
福尔摩沙的少年  
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隐忍不言的伤

## 贾植芳著：《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

贾植芳这个名字很多读者都不陌生。1996年他曾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回忆录，叫《狱里狱外》，讲的是他1948年从国民党的监狱里出来，于上海解放后先后在上海震旦和复旦大学教书，因为一直和胡风走得很近，1955年5月18日被捕入狱，1966年3月底被以“反革命”罪而判刑十二年，两个月后被放回复旦大学印刷厂继续“监督改造”。

由于这本书很不完整，只有“狱外记”和“狱中记”两章，前无头，后无尾，幸好附录了贾植芳夫人任敏同一时期被流放经过的回忆，两相对照，还可以了解贾回到复旦挨批挨斗的一些片断。

《我的人生档案》虽然依旧是片片断断的点滴回忆所组成，但较前书还要完整许多，要目如下：

且说说我自己

且说说我自己

我的写作生涯

书与我

我和社会学

怀念丸善书店

上海是个海——我在上海生活史

一九七九年进京记

世纪印象——一个老人的自述

在那个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哭亡妻任敏



狱里狱外

人的生据（在蒋匪特务机关监狱中的回忆）

狱外记

狱中记

我的三朋五友

悲痛的告别——回忆胡风同志

一位值得纪念的长者——郑超麟先生

纪念余上沅先生

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悼念陈仁炳先生

我的两位值得纪念的朋友——林同济先生和杨必女士

回忆王中

悼念施昌东

萧军印象

我的老乡王瑶先生

我与陈瘦竹先生的交游

忆覃子豪

纪念我的朋友卢杨（克绪）先生

……

贾植芳一生入狱四次。第一次是因为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捕入狱三个月；第二次是1945年春因为被怀疑是共产党间谍被日本人关进徐州市警察局特高科监狱里，直到抗战胜利才被释放；第三次是1947年8月因为写文章反内战，被关进国民党中统在上海的二号监狱里，关了一年零三个月；第四次就是1955年因胡风案被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关了将近十一年。用他的话说：“我生于袁世凯称帝的那年……经过了军阀混战、国民党专制、抗日战争等时代，一直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的新社会。有缘的是我每经过一个朝代就坐一回牢，罪名是千篇一律的政治犯。”

对于自己明明是旧社会的反叛者，在新社会却又被认定为“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为任务”的这一荒诞经历，贾植芳曾用屠格涅夫散文诗《门槛》中的女民粹党人的命运做过比喻。

他说：屠格涅夫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要是这个女英雄受尽折磨后，奇迹般地走

出了沙丘的流放地，看到了沙皇政权的末日，旋即又被抓进了斯大林的契卡的审讯所，再一次经受同样的折磨，并逼迫她承认自己是沙皇的特务或者是一丘之貉，而且还能找出几个真的沙皇时代的变色龙来证明她的罪案，“这位女英雄又会作何感想呢？”

让贾植芳略感自豪的是，他始终没有丧失过自己的人格。他写道：“我虽然身被奴役，但精神上是清醒和独立的，在心理上并没有被奴役。”“我永远不会把灵魂卖给魔鬼，我还是我”。

读贾植芳的回忆，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确一生都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

## 李思慎著：《李立三后半生——前中央常委及中央 秘书长、中国工运先驱》

香港：大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李思慎曾经是李立三的秘书，2004年出版过《李立三红色传奇》一书，但当时的资料有限，对李立三一生的叙述比较简单。《李立三后半生》一书，没有再交代李立三抗战以前，特别是自中共初创担当工运领袖，到1930年以“立三路线”大胆号令苏联出兵的奇特经历，而是从1945年抗战结束后李立三从苏联回国之后开始写起，一直写到李立三1967年在“文革”开始后自杀身亡。由于作者是传主的前秘书，章节目录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作者对李立三的热爱和崇敬之无以复加。这本书虽然仅描写李立三后半生的经历，就用了75万字以上，也足以见其内容之具体，描述之细微，和作者倾向性之明显。这一点我们不难从这本书的部分目录中了解到。该书部分目录如下：

- 一、1945 序幕 重踏故土
- 二、1945～1949 第一章 解放战争贡献良多
  1. 重逢与补课
  2. 得罪林彪
  3. “我就是李立三”
  4. 加入三人小组
  5. 完成遣送日人艰巨任务
  6. 不畏战乱，丽扎坚决来华
  7. 翻译者是谁——“半个外国人”



8. 敌工部长的“第二战场”

9. 工人阶级的盛会

10. 对李立三难忘的回忆

11. 沈阳赴迎接全国解放

### 三、1949～1951 第二章 开拓工运屡建奇功

1. 全总机关大门口的岗哨撤走了

2. 第一个提出“群众路线”概念

3. 回忆“五卅”

4. 劳资两利

5. 首倡建立消费合作社

6. 身居要职，享受副总理级待遇

7. “你给我们培养了一位中央委员李立三”

8. 促进中苏友好

9. 是“忽视生产”，还是面向生产？

10. 亚澳工会大会在北京召开

11. 群众来信

12. 悼王荷波

13. 组织全国工人团结

14. 失业救济

15. 为新中国工资制度奠基

16. 新中国劳动立法第一人

17. 重大胜利果实——劳动保险

18. “生产必须安全”

19. 废除搜身和把头

20. 战火纷飞赴朝慰问

21. 一件小事

22. 双模会议

23. 加强工会国际交往

24. 悼念任弼时

25. 推动青妇工作

26. 精心办好《工人日报》和《中国工人》

27. 工运干部，桃李满天下

28. 倡导职工教育

29. 组织劳动人民文化宫

30. 同时主持两大机关

31. 改造旧企业

32. 强调民主是工会的灵魂

33. 抗美援朝与人民防空

34. 工人阶级内部矛盾的争论

35. 拓荒者遭错误批判

#### 四、1952～1960 第三章 政治舞台骤失光芒

1. 改造工商业意见获毛主席基本肯定

2. 被撤销劳动部长职务

3. 回到老家醴陵

4. 批判高饶反党

5. 任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

6. 为恢复工作甘当“小媳妇”

7. 我第一次见到李立三

8. 准我赴苏，却未成行

9. 老友喜重逢

10. 对企业领导制度的正确意见

11. “犯错误时间只有三个月，却坦率地检讨了三十多年”

12. 获接纳“企业党委不设书记处”

13. 最大的心愿实现了

14. “鞍钢宪法”与立三劳动成果

15. 代中央管理工业系统干部

#### 五、1961～1965 第四章 政途遇险刚毅不屈

#### 六、1966～1967 第五章 文革冤魂壮志未酬

#### 七、1979～1999 第六章 身后平反英名长存

坦率地说，由于作者并非着眼于研究，而是志在为传主申冤颂德，因此，本书的历史叙述存在着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情况，特别是对许多问题的讨论都

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包括在资料的引用上，都表现出很强的片面性。比如，对于建国后导致李立三被打入冷宫的重大事件，即1950年代初党内围绕工团主义问题的争论，作者用于交代过程和讨论研究却只用了两小节，且只是引述李立三的言论，说明其合理和正确，对对立一方的意见很少介绍和说明。作者似乎也没有利用到目前研究这一问题最具史料价值的《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和林蕴晖等人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书中对当时出现这一党内意见分歧的问题实质，完全没有作出深入合理的分析和讨论。

本书之所以还有可读的价值，主要是因为书中引用了大量李立三的个人信件、工作报告、书面建议和谈话纪录等文献资料。尤其是李立三下台以后到自杀之前的情况过去有关资料较少，此书披露得较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李立三自杀前的各种资料。如李立三在1967年自杀前四次向周恩来求救的信函，向红卫兵交代历史的记录，最后两次批斗会上的口头和书面辩解，给江青的辩解信，以及没有完成的向毛泽东的求救信，和自杀遗书等等。



## 征稿启事

一、《中国当代史研究》是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以中国当代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系列出版物。举凡 1949 年以还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国防、外交、教育、科学、社会等历史问题，均属本书讨论范围。本书设有专题研究、对比研究、史实讨论、外稿选译、回忆和口述、史料辑录、书评书介、学术动态等栏目。

二、本书以还原和解读历史为宗旨，奉行学术自由、治学严谨、力求新知之原则，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稿件取舍唯以学术质量为尺度。

三、来稿字数不限，提倡言简意赅，务去空言，详略得体；务请遵循学术规范，遵守国家有关著作权、文字、标点符号和数字使用的法律和技术规范；引文应准确无误，注释置于页下，每页重新编号，具体格式以《历史研究》为准。

四、来稿请附 300 字左右摘要和 6 个以内关键词。

五、为便于联系，来稿请在文末注明作者姓名、单位、职称、学历、联系地址（含邮政编码）、电子信箱、电话。

六、纸介来稿请寄：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500 号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刘建平收，邮政编码 200241；电子文本来稿请发至：[zgddsyl@126.com](mailto:zgddsyl@126.com)。

七、来稿一律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稿件一经采用，即行通知。稿件寄出三个月后未收到采用通知者，可自行处理。

竭诚欢迎各位研究者赐稿。

《中国当代史研究》编辑部谨启